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主编/高介华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The Combination History of Sino-west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

杨秉德/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SBN 7-5351-3470-X



9 787535 134707 >

定价：170.00元

主 编/高介华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The Combination History of Sino-west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

杨秉德/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杨秉德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高介华主编)

ISBN 7-5351-3470-X

I.中... II.杨 III.建筑史-研究-中国-近代

IV.TU-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3792号

责任编辑

杨唐轩

整体设计

夏金中

责任印制

张遇春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电话 027-83619605

邮编 430015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3013号

开本: 889mm × 1230mm 1/16

字数: 561千字

印张: 23.75印张 5插页

版次: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5351-3470-X/T.11

定价: 170.0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序(一)

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1 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1.1 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广义地看,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竞争力,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资源。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才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却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1.2 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阴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1.3 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¹。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²。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³，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前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

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2 “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2.1 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诸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了《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4]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5],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了《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6]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7]一书,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像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也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该书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2.2 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題,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8],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9]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10]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11]

3 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1]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懈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2]、地域文化^[3]、地区建筑学^[4]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的探索。

(1) 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¹⁵。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¹⁶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¹⁷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

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俱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 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 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18]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真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 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收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乃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4 喜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与发行

从文化角度研究建筑,或从建筑论文化问题,应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一大进展,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提出(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自1989年在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召开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后开了6次会议,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二是1996年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高介华先生的努力下,组织“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计划出书30余种,蔚成系列,短短几年,已见成果,将在今年10月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先推出第一辑。我尚未读过书稿,但“文库”总目所列,正是涉及中国建筑文化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是值得加以研读的,也正是我个人渴望猎取的知识。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欣喜之余,聊书感怀,权代总序。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与人文两方面的结合;写这篇文章时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文化方面的探讨只是尝试之一,思考还远不成熟,但结稿时间在即,匆匆提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研究。

2002年8月25日

[1] 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第三世界——前景忧虑与赶超希望之间的文化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 据美国百人会在1995年做过的一次调查,“美国人在不少方面对中国持有否定态度,但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却有强烈的肯定和崇敬的态度与浓厚的兴趣。”见:Shirley Young. *Cultural as an engine for Shanghai's development*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4] Mumford, L.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5]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 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6] Hall, P. *Cities of Tomorrow*.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8

[7] Hall, P. *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2001

[8] 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10] 吴良镛,基本理念·地域文化·时代模式——对中国建筑发展道路的探索,建筑学报,2002(2);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文化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1] 刘秀峰同志,共和国第一任建设部长,可以被看作建筑界行政官员学习专业的代表,对建筑学专业他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在1950年代批判所谓“复古主义”后的1958年,他在上海组织了建筑理论座谈,探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二是在1960年代后期,他组织了古建筑研究老中青年的代表人物参加,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他也亲自筹划、组织并伏案编写,终能在文革前夕得以完成,实功不可没

[12] 1985年在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城市文化”,中国重庆;文章修改稿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 [13] 吴良镛.地方文化与全球文明: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1997年9月现代乡土建筑国际会议大会主旨报告人之一,中国北京
- [14] 吴良镛.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8(3);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1995—1996,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7(1)
- [15] 皮特斯.作为杂合的全球化.见: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6] 吴良镛.关于古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学报,1999(4)
- [17] 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
- [18] 吴良镛.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的学术报告——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建筑学报,2000(7)

总序(二)

齐 康

泱泱中华,方圆九州,五千年古国,星移物换。西起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东至太平洋的东海岸,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中,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所有这些大自然的赐予,滋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由汉、回、壮、藏、蒙等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丰富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她有着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积累、融合和创新,虽经无数次纷争离合,但始终凝聚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永远向上的精神——民族魂。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她蕴藏着强大的凝聚力,颂扬着自己的文明,荣耀着自己的文化,不断抗击着外来者的入侵。古代四大文明中,有的消失了,有的残缺了,有的转化了,惟有中华民族的文明能不断继承、发扬和创新,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她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亮。虽然经过了屈辱的年代,终能坚强地站起来,为世人刮目。近百年来,她屡遭列强的侵略、蹂躏,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经过了短短的五十年,焕发出青春。人民需要历史的记载,人民需要历史的回忆、历史的总结,更需要历史的开创,让存在和延续了五千年的文化具有新的魅力和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伟大民族存在的基础,是启迪我们未来的信念和信仰的基石。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忘却和割断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广博,不论是在音乐歌舞、诗文书画中,还是在典章文物、礼俗制度中都蕴涵铭记着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反映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建筑艺术的表现最具有综合性,表现方式独树一帜,表现效果遒劲有力。建筑是艺术和生活的空间载体,是技术和艺术的结晶,是文明形成、发展的物化体现。

原始人群聚集生活开始后,尝试用树枝、泥土、石头等原始材料来构筑生存空间,建筑活动开始了。在进一步的演化发展中产生了城市,城市是人类高效的聚集形态。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形制,作为社会体制的空间体现,具有显明的东方特征,是世界城市史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城市,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中国古代建筑受宗教、礼仪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有严格的等级性。王城之内,宫城居中,前朝后市,早在周代,已有都城“营国制度”。中央政权统治和管辖着地方行政,控制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以行政体系为主的城镇体系。在汉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少数民族城镇仍然保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必然依托区域政治、经济特点和文化特点,且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丰富的城市形态遍布于全中国,并不断地延续其生命力。虽然它们有的被战争破坏,被自然灾害所湮灭,但对于它们的发掘和研究仍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生命力延续的象征。中国的城市选址注重依托水系,水系依托大江大湖,江湖依托自然生灵,自然生灵的生存离不开古代的自然生态。虽然经过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但中国城市始终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历史形态和形象特点,始终得以保持,那些壮丽的城墙、城门、城楼、护城河等构成了城市的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性建筑形象。

山地的城市与建筑,为适应自然地貌的特性,沿着蜿蜒的山麓,利用易于建筑的地段,与山形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都城的选址,意在“象天法地”。北京城选址在华北平原,历经千年修葺,特别是明代的大规模建设,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的瑰宝,保留了最为完整的城垣。西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朝代的更替,依然保留了城墙和城市结构的特点。南京是一座宏伟的城市,明代建设的城墙,宽达9m,高13m左右,至今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过它的。它顺应自然形态,蜿蜒于钟山之下,北起长江,南至秦淮河,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是适应自然与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城池典范。东海之滨,历史上有许多海防城市,如惠安崇武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在抗击外敌入侵中起过很大作用。中国最宏伟的城墙是长城,从战国时始筑,至明清一直修筑不止,成为人造卫星上可见的中华长龙。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从风光绮丽的北国到绿林茂盛的南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隔绝,影响了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区的城镇和建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历史的丰富资源和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技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布达拉宫,没有长城,没有故宫、天坛,没有承德避暑山庄,没有各地民居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等等,又怎么能够让人们完整地理解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它们为载体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生

活的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凝结。中国各地的民居绮丽多彩,由于各地的气候、地理、人文、生活习俗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并仍统一在相对固定的院落模式中。从冰封千里的东北看厚大石墙的四合院,从云、贵、黔山地看山寨的吊脚楼,从闽江、珠江流域看飘逸通透的闽粤民宅,真是缤纷多彩。又如皖南民居依山面水,一簇簇、一群群,展现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除黄河、长江外,我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河流,孕育、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人们利用黄土夯筑墙垣、城墙,城楼建筑十分壮丽。窑洞民居,浑然天成,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中国的山林一般都与人文文化相融合,如泰山、华山、衡山、峨眉山、武当山、武夷山、雁荡山等等,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深含文化根基。中国的山水是文化的山水,是与人民息息相关,有血有肉的山水。

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水平,曾经达到了世界建筑文化的顶峰。建筑以“间”为单元,形成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并以砖、石、土材相配合,形成一种特有的组合体,它们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城市营造中的朴素自然观,曾创造了宜人的人居环境,城市、建筑、园林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选址依托大自然,城市周围或有绿色的山林,或有优美的水面;城市中的水网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水系,沿主要水系形成绿色地带。都城中按方位的不同建有皇家坛、庙,皆有大片绿地林木环抱。城中官衙、民居的合院以至私家园林也均有绿化,更不用说皇家园林了。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园林一体化,组成了适合人们游憩栖居的良好人居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虽以“间”为单位组成四合院,但相互组织的单位是“群”,“群”是中国建筑的基础。“间”和“群”是体现和谐之美的所在。这些“间”、“群”又与自然山形、水面结合,丰富了山水城市的内涵,在城市中,“间”和“群”又形成分层次的街巷空间结构,城市群落有机的组织是中国城市美的主要特点。这些山水城市注重宅第的选址、排水,及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街坊、里弄成为组织、管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间”为基本单位,形成单体,再由单体围合组织成建筑群体。群体的组织,反映了社会层次的高低,也反映出贫富的等级性。故此,我们便能看到故宫壮丽、天坛均衡、孔庙庄严、民居活泼的各类建筑群体。木构架的使用和形制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重要特点。举架、开间作为形制的基本标准,既可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同等级层次的要求,也能适应不同建筑功能的需要。四合院空间的穿透组织,不论是连续的建筑群,还是独立的一颗印民居合院组合,都具有内向封闭的空间特点,由于防御和气候的需要,也多采用内向的院落式布局,强调围合。院落式的围合布局形成了建筑和宅居的群体。由于南北气候的不同,乡村和城

市对地形环境适应的不同,贫富差别反映在群体规模上的不同,防御性强弱的不同等因素,会影响到群体组合形态的特征。

重人伦,强调空间秩序。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群体往往以轴线的方式组织空间,空间结构往往与社会中的等级结构相对应,分别轻、重、主、次,使空间组织秩序井然。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结构,在建筑、聚落和城市中有空间表现,大量的坛庙、祠堂、厅堂,是祖先祭祀的空间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进入封建社会中期后,木结构建筑,特别是官式大木结构,具有大体一致的形制和模式;这一木结构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综合解决了不同使用功能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各种建筑需要,充分体现出它的“通用”特征。而民间匠人和建筑的使用者,有些为文人墨客,参与了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他们充分利用木材的特性,配合砖石,有的地方用夯土墙围护木结构,就地取材,丰富了建筑的空间和形式表现力。中国建筑以自己独特的优美线形成为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的美丽建筑形体,那飘浮流畅的屋顶,黄色、绿色、蓝色的琉璃,出挑深远的檐口,层层叠叠的斗拱,都显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木构技术的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形式也是多样的,虽然木构建筑是一条发展的主线,有完善的形制,但用于墓葬、军事防御、天象观测及桥梁等用途的建筑,却以砖石为基本材料,砖、石拱结构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各种类型的塔,在高层结构技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木构建筑的坡屋顶,在形式上很有表现力。木构架有一定的可变性、弹性,对抗震有好处。然而,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也有不足之处:1.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上无重大的、跃进式的突破。2.木构建筑围护体系的保温、隔热、防视线干扰的物理性能较差。3.垂直交通系统不够发达,建筑多为单层,超过二层的建筑比较少,且多为塔、阁等特殊类型的建筑。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及其群体大都朝水平的横向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地区差异较大。中国古代建筑的地方性特征明显。地方的风土民俗、建筑材料、装饰细部等等,反映在建筑上,形成了浓郁的地方建筑风格。建材的地方化,木材、砖石、竹子、陶瓷、琉璃制品,即使是同一种材料,如土坯墙,各地的具体做法亦有所不同,形式上亦各有特色。不同的地方材料也丰富了建筑的外观造型。各地区都有结合自然环境的建筑群体,结合地形,利用山水,适应地方气候和地理环境,使群体形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虽然中国古代建筑地区性特征明显,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建筑文化的交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曾广泛影响过周边国家和地区,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产生过合璧的新的建筑类型、新的建筑空间和形式。

使用功能要求、建筑材料、构造、结构,结合度较高。在构造上结合并发挥木材的特性,创造了斗拱这一空间结构,寓美观于其中,材料和形式美达到高度统一。在木材的连接,木材与其他辅材的连接上,构造的功能作用与形式美也是统一的,是建筑材料和构造的真实反映和美的组织。为保护梁柱,雕梁画栋,装饰、材料与功能结合一体。构架组合一般都分为三段:屋顶、墙身、基座,在整体上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感。

中国古代建筑集中了多种装饰手法及艺术表现方式,主要有圆雕、浮雕、砖雕、彩画、壁画、编织物、书画、金属饰件等等。装饰纹样的题材多样,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丰富。装饰的部位有梁柱、屋脊、马头山墙、檐口等等。建筑的用色大胆、丰富、醒目,强调与环境的配合协调。中国的东南部建筑有多种色彩的配合,适应山清水秀的环境。寺庙建筑多用黄色墙体,掩映在绿水青山中,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氛。青藏高原的寺庙、宫殿建筑色彩尤为鲜艳明亮,在茫茫荒漠的景色中,突出了建筑对环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过程中技术分工明确,高等级建筑的营造,分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彩画作等等。后期,发展到30多个匠作种类,形成了繁复的内、外檐装修体系。建筑施工工序计划极为周密。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在组织机构上有完善的工官制度,国家设立了专司管营造的将作监(将作少府或工部)。在建筑设计上,很早就采用了模型审定的方式。为了准确地估算工程量、征集材料与加强施工管理的需要,制订了各种法式或作法则例,最著名的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在施工中则运用了图纸放样的方法。严密的施工组织管理制度加上以木构件的标准断面为设计模数的方法,简化并系统化了材料的加工程序,便大大地提高了设计、施工效率,加快了营建速度,大量的民间匠人是建筑设计,营造的主力军。

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赐予,在建筑中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采光。在黄土高原,窑洞建筑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防风效果;在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不仅运用开窗大小和布幔来控制通风采光,而且采用芦草做外墙,以提高墙体的保温性能;运用对景、借景的园林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建筑中人的审美结合起来。聚落和城市的选址具有防灾观,濒水筑城,城内的水系有利于防火。防火山墙及建筑群内的水井、水池等也有利于防火,但建筑的用材及建筑密集程度往往又构成了防火的不利条件。

中国具有5000多年深厚的建筑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百年来,封建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工业化的滞后加上外敌入侵和军阀割据混战,使国力衰弱。在外来文化面前,古老的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在整体上变成了弱势文化。在社会的激烈变迁中,中国建筑缺乏功能的提升,技术的飞跃和空

间形象的大突破。即便如此,中国近代也出现了一批有作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吸取国外的经验,奠定了开业建筑师制度和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基础,探索了一条吸收、传承和转换的建筑创作和建筑教育的道路。所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很自然的形成了近代五种建筑形态的特征:

1.帝国主义列强带来的早期现代建筑和殖民样式建筑。

2.出自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尊重和崇敬,外国建筑师探索、设计的中式建筑,以及大量的中国建筑师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作。

3.学成归来和本土的中国建筑师,运用所学而创作的早期现代建筑。

4.由于文化的交融,为适合业主的兴趣与当地建筑杂交而产生的一批地方的加洋式的或中国古代传统样式加洋式的,变异多类的民国建筑。

5.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封闭性,一方面保存了大量传统的地方建筑;另一方面,民间的乡土建筑不断更新,清末、民初的地方乡土建筑没有停止过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的,上述五种子建筑文化的类型的混杂所体现出的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性弱势,在中国不太可能在传统的地区建筑文化中产生新的地域主义。所以,从近代开始,在对外开埠的城市,在传统建筑文化整体弱势的形势下,具有了与西方交流的特征。这个分化分离的过程,强势外来建筑文化必然对这些地区和城市的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冲击和破坏,从而使它们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发生了一次无序的新陈代谢过程。从近代的民国时期一直到今天,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没有很好地完成“传承—转换—创新”的过程,没能在整体上将传统的建筑文化转化推进成强势建筑文化。同时也缺少对建筑历史的深层次的思考。所以,在建筑学上难以形成完善的体系,只能从国外生硬地搬来,消化、转化、进化得不够。

近50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加快了中国建筑业的现代化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更需要树立国人的建筑意识观,有必要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知识。应当看到,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创造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1.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有时阻碍了建筑师聪明才智的发挥。

2.城市和建筑的设计与建造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要进一步加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落到实处。

3.人们还没有从大量的建设中,理解城市和建筑的本体。

4.缺乏对城市和建筑的整体研究。

5.缺乏对地域主义的理解和研究,缺乏对传统和地域建筑文化的现代表现及其他与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和建造体系结合的整体研究。

6.对建造过程与地区建筑文化传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对地区建筑的材料、构造、结构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待系统地深入。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有传统和地区精神的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体系的工作需要大力推进。

7.建筑师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在外来强势建筑文化的冲击下,缺少自己的主张和创新意识,因此要加快建立自我的建筑文化价值体系。在建筑的创作过程中,离不开合作、协作,因此要强调团队精神。

8.对现代建筑技术缺乏整体、深入的研究,在传统和地区建筑文化背景下,转化运用现代建筑技术的途径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9.现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式和途径在探索之中,适应时代发展和国情的完善和建筑教育体系,还在改进和建立完善之中。

10.对城市和建筑中人的行为、活动、交往缺乏整体、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在人和社会的需要与建筑功能的转化之间也缺少系统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出版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开创中国建筑文化的新时代,我们要研究如何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精髓,同时要克服、摒弃人们的屈从思想。要有更新、创造的主体意识,探索出一条中国自身的建筑文化发展道路。文库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振兴传统建筑文化之举,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的振兴和创新意识。

我们还应发挥建筑评论和建筑批评的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促使中国整体建筑设计水平和建筑建造质量的提高;②统一和提高建筑设计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好的城市环境,什么是好的建筑;③促进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④促进建筑设计手法的丰富和建筑空间构成艺术的提高;⑤让社会更关注城市的环境和建筑,促进全社会建筑意识的提高,培养大众的建筑鉴赏兴趣,提高大众的建筑素养,以便他们在参与设计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对于古代建筑历史和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研究,无疑是建筑评论和建筑批评的基础之一;《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在这方面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希望中国的建筑文化,像一条巨龙,又腾飞起来,建立新的价值观。继承吸取祖先创造的建筑文化的精粹,积累发展的力量,创造发展的条件,奠定发展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文库》的出版增强了人们的自信,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寻求地区自身的优秀建筑文化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深入地剖析和深层次的思考的同时,还要看到世界现代建筑的

发展,在兼容并蓄的同时也在追求地区文化的保护、再生和创造。实际上,保护建筑文化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一样,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创造合理的机制,寻求完善的体制,更要培养大量优秀的规划师、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以及城市和建筑的管理者。

学传统、研究传统不是造反,也不是自大狂妄。完善的建筑意识观的形成,不可能完全脱离民族和地区的传统,不要把传统当成前进的负担,要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胸怀和气概。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选题所涉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度、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是一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这在国内还属首次,必将促进我国建筑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并对完善全社会的建筑意识产生积极作用,发挥广泛深远的社会效益。在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还要进一步重视对传统建筑技术和建造过程的整体研究,鼓励用新的方法,新的视点来重新诠释古代传统建筑文化,所以文库要不断地充实。中国建筑需要建构适应时代新发展的“传承—转换—创新”机制。建筑是大地的印记,优秀的建筑师的创作一定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就像茫茫大海与天相接处出现的一片建筑文化的船帆,正向我们驶来,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

2001年11月于南京

编纂“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缘起

高介华

如果说在英国的建筑史学家弗列治次所编绘的“建筑之树”这棵大树上，“中国及日本的建筑”还能凑合成一小小的枝丫得到存在，那么英国建筑师法古孙(James Fergusson)就干脆把中国的文化也一股脑儿压入了地下。因为“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似儿戏。”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某些老奶奶在跟自己的小孙子“儿戏”时会开开玩笑说：“你是从你妈的腋窝里生出来的”一样地有意思，因为小孙子毕竟对自己的怎样出世还茫然无知。

新派建筑人有一句口头语：建筑是要用心去“读”的。看来是有点道理。

西方人多热爱“茶花女”，却少有知道《桃花扇》和李香君的；不少中国人也爱奥赛罗和朱丽叶，却少有知道窦娥和杜丽娘的，大概也就是少“读”的缘故吧！

名著《红楼梦》用上的汉字可能不足四千个，一般读者大体上不会将字读白。如果读了半天，还只知道贾宝玉爱林妹妹，焦大却不喜欢，恐怕会使地下的曹雪芹感到悲哀。所以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学家在不倦地精读。

对于法古孙和弗列治次的断语，好在有他们的老乡李约瑟博士在生前作了回答，原因是博士用了60多年的时间来攻“读”中国文化。

用心读中国建筑的西方人并非没有。曾任第一任罗马教廷驻华使节的刚恒毅枢机主教就是一例。他确立的北京辅仁大学校舍的建设方针是：“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1]辅仁大学的总建筑师、比利时艺术家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在他的

Chinese Architecture 著述中饱蘸浓墨,激动地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2]

我们知道,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对楚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谓的“南方之强也”就是指的楚国,他怀着恐惧而又欣慰的心情感叹:“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还认为南方文化比周文化更文雅,更有文采。可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人谈论过楚文化呢?由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哲学、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艺术以至于城市、建筑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楚文化的奇谲瑰丽才展现于世界。如今,楚文化已被公认为“光彩神州,丰润中华”,“宛如太极之两仪”“与西方希腊文化竞辉齐光”的灿烂文化,不就是能让世人瞩目多“读”的缘故吗?“楚学文库”面世后,中外学术界更惊奇地发现,原来楚学是一片值得研究的学术沃土。

自1989年始,中国建筑学术界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UNESCO World Decade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1988-1997”)紧扣国际建筑师协会提出的“建筑与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建筑与文化”研究学术活动。与此同时,自然要广涉中国文化与建筑的再发掘和研究。在“建筑与文化1996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一系列专题研究中,不少是属于中国建筑文化的范畴,又经过一年来的努力,而有编纂“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之举。

中国建筑文化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熔铸的亦属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晶,无论是文献、实物,皆有深厚的底蕴。近现代的老一辈建筑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形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文化高度切入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研究尚在开创阶段。

就本“文库”的系列而言,从建筑文化学到建筑思想的渊源、流变,从建筑的词源到典章制度的考录,从墓葬建筑到园林,从史前的聚落形态到历代城市的演变,从创作理论到形制的源流,从装饰艺术到小品的文化观,从建筑的外部空间构成到环境生态观,从历代名作、名匠到军事、桥梁建筑艺术莫不包罗并列、几乎各专著本身即具有创新性。

诚然,我们的心情也像20世纪初侨居中国的刚恒毅主教一样,“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中的某些绝世珍品)倒塌”了。毕竟,刚恒毅惋惜的只是某些建筑实体的毁弃,而中国建筑所铸成的历史文化丰碑是不会倒塌的。“文库”的奉献就在于提供

一些“读”本。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且形成了多个亚文化圈内的特色。至于是否博大精深,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精心品味,作出客观的评判吧!须得申明的是,“文库”的主旨重在催动中国新建筑文化的开拓与发展。就研究中国建筑文化而言,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放眼观之,则此路方长,绝非终结。

1997年5月31日于武昌

[1][2] 参见董黎,《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5.3.



第一章	人文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三个层面	2
第二节	从外使觐见礼仪之争看“中国中心论”传统观念的渐次嬗变	4
第三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早期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	7
第四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期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	9
第五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	11
第二章	构筑舞台——中国近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17
第一节	商埠城市中租界区的形成与拓展	18
	一、上海租界模式的确立	18
	二、上海租界模式的扩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埠城市中租界区的开辟与拓展	26
第二节	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天津与武汉的发展	36
	一、上海——以租界区为主体、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商埠城市	36
	二、天津——以租界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北方沿海商埠城市	46
	三、武汉——租界区与华界区同步发展的长江沿岸商埠城市	55
第三节	济南与芜湖——商埠城市影响的扩散及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转型与发展	61
	一、自开通商场——黄河下游的历史文化	

	名城济南的转型与发展	61
	二、商埠城市影响的扩散——长江中下游的 中等城市芜湖的转型与发展	64
第四节	北京与南京——都城的更迭与兴衰	67
	一、古都北京——天子脚下也开始大规模地 主动接纳西方建筑文化	67
	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27~1949) ——《首都计划》与都城十年建设	71
第五节	租借地与铁路附属地及租借地城市与铁路 附属地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75
	一、租借地与铁路附属地的产生	75
	二、铁路附属地城市——新兴城市哈尔滨的 产生与发展	77
	三、租借地城市——新兴城市大连的产生与 发展	79
	四、租借地城市——新兴城市青岛的产生与 发展	81
第六节	学术反思——基本学术观点的提炼与研究 思路的整理	84
第三章	历史回溯——前近代时期进入中国的西方 建筑	93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澳门	94
第二节	广东十三行与十三夷馆	104
第二节	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	116
第四章	主流趋势——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的克隆、 传播与变异	127
第一节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 三条渠道	128
	一、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 的三条渠道	128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基督教建筑 的产生与发展——以教堂建筑为例	130
	三、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 的另一条渠道——殖民式建筑	161
第一节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	

	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	174
	一、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正宗建筑师队伍的形成	175
	二、西方复古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克隆与传播——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例	178
	三、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克隆与传播	187
第三节	前期局部地区新艺术运动建筑东进与后期整体趋势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	193
	一、哈尔滨建城初期的新艺术运动建筑	193
	二、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	199
第五章	移宫换羽——民间建筑工匠的杰作	229
第一节	里弄住宅概论	230
第二节	石库门里弄民居的产生与发展	233
第三节	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变异	247
第四节	石库门里弄民居建筑形式的演变进程及其体现的城市民俗文化现象	251
第五节	发人深省的建筑文化现象——民间工匠与普通民众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理解	256
第六章	探赜钩深——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	259
第一节	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与西方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早期尝试	260
	一、教会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及其世俗化与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261
	二、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与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早期探索	264
	三、题外补述——美国建筑师凯尔斯与国立武汉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与校舍建筑设计	282
第二节	参照体系——清末民初新式官方建筑的全盘西化趋势	286
	一、清末民初新式官方建筑建造的社会人文背景及其整体上的全盘西化趋势	286

	二、清末国立大学初创期的社会人文背景及其校舍建筑的西化趋势	291
第三节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第一次高潮期	293
	一、中国近现代建筑史时期(1840~2000)	
	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整体回顾	293
	二、社会变革催生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探索热潮	296
	三、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队伍的形成与其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整体贡献及其正确定位	297
	四、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前奏——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	304
	五、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期(1927~1937)	312
	六、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体系的创立及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起步	336
	七、结语	338
	主要参考文献	344
	后 记	350

中國近代中西建築文化交融史

第一章

人文背景——中國傳統
文化的近代化進程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 转型的三个层面

人类的文明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其发展进程中关键性的转变是由传统农业社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近代化进程。^[1]人类文明史的近代化进程始于西欧,然后扩展到北美与欧洲其他地区,然后再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其他地区。早期西方国家如英、美、法等国的近代化进程属原生形态的近代化进程,是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演进过程,经由社会内部的创新而形成,采取渐进的演进方式,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点滴积累才完成这一进程。而后许多国家如德、俄、日等国的近代化进程则属诱发型近代化进程,是在与已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接触后,借取、效法其经验而发展实施近代化进程者,这是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相对于前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属于后一种类型。^[2]

中国近代史时期(1840~1949)是两种社会形态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痛历“四千年未有之创局”(王韬语),在因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被动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进程中,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在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与碰撞中解体与重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旋律,也同样构成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主旋律。

文化泛指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只要是超越人类本能而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简言之,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如果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体系细加剖析,可以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其外层是器物层面,即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中层是制度层面,包括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化了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各种体制、制度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内层是精神层面,即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审美情趣、民族素质等。文化的三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文化嬗变的过程中,表层即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较易,中层即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较难,最艰难的是内层即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首先发生碰撞,进而相互交融,促成文化重构时,文化嬗变总是首先在器物层面,然后在制度层面展开,最后才触及深层的精神层面。^[3]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进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种冲击产生的影响:“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十年左右,发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发了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引者按:指中日甲午战争),紧接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引者按: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4]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冲突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就是中华帝国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即传统的“中国中心论”观念的转变。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进程中,也正是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三个层面的渐次的文化嬗变。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一文中这样论述这种嬗变:“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引者按:指中日甲午战争)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了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中国近代史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从本质上讲,是时代性的文化冲突,即不同时代的文化——中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时代性的文化冲突导致文化整合,使来源不同、性质不同、目标取向不同的异质文化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史就是这样一部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的历史,这种冲突与整合在11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三个层面的文化嬗变:鸦片战争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引起“道”、“器”、“体”、“用”之争,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折衷思想,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具体实施则是自1860年至1895年为期35年的洋务运动,这是文化表层——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在维护封建社会体制的目标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吸纳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物特征。1895年甲午战败后,文化论争转入制度层面,中国的思想先行者已经认识到应当用“变法”,乃至“革命”的手段来改变国家体制与社会制度,这是文化中层——制度层面上的文化嬗变,其结果导致1898年的戊戌变法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之后,自1915年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何去何从的论争,从而引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反省,这场史称“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化史已经步入内层文化嬗变的阶段,导致精神层面的文化变革。精神层面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关键在于精神层面的特征,从这场没有结论的“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开始,这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导向之争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文化转型期的这种三个文化层面上的渐次嬗变并非截然分开,互不相干,而是相互影响,交错进行的,这一文化嬗变的进程,从表象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步步后撤,承认中国的器物不如西方,承认中国的制度不如西方,最后承认中国的思想不如西方。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正是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反省,使“中国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彻

底破灭,思想禁区渐次开放,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从外而内,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终于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迈开了向中华文化重构的长远目标前进的步伐。这种重构实际上是一种再生,时代进步,五千岁的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不能永远停留在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有诗题为“凤凰涅槃”,诗前有一段小注云:“天方国占有神鸟名‘非尼克司’,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这鸟就是中国的凤凰,所以诗名“凤凰涅槃”。近代中华文化的重构正是这种“凤凰涅槃”式的文化再生。

第二节 从外使觐见礼仪之争看“中国中心论”传统观念的渐次嬗变

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这样评论中日两国引进、吸取、消化外国文化的不同心态:“首先必须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有着大量引进外国文化的传统,并在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首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文明(其意义包含着不是地区性的、‘具有世界规模的文明’的意思)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拥有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升自己文化的传统。加藤周一在《杂种文化》中指出,日本与其他国家隔着大海,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它积极吸收外部文化的原因。”“由于隔着大海的地理环境,很少有被外部征服的担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文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是以武力威胁中国的地区。实际上中国自南北朝以来,以佛教为首的西域文化刺激中国文化发展是很大的,排除西域文化的流入来谈唐代的灿烂的文化也是不可想像的。可是,中国人却长期没有考虑中国要学习外国文化。这就是日中两国在面临现代化时,在摄取欧美文化上产生差异的原因。”“如果说是或曾经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会成为摄取外国文化的严重障碍,那么,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摄取外国文化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是由于它不是‘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的中心地’。林屋辰三郎在对谈《历史夜话》中说:‘日本人对外国人、外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偏见,明治的文明开化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素质早从三世纪就有了,从那时就一直接触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比较自然地接受和学习了中国文化。’当然,事实上任何国家要发展文化都必须摄取外部的文化,日本也是不断地摄取其他文化,但也不断地形成具有日本个性的文化。不过,中国是古代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以后又以一贯的文化的连续性为其特征。它与具有经常摄取外国文化传统的日本之间,在摄取外国文化的技巧上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这是理所当然的。”^[9]旁观者清,局外人的评论也许能促使我们更清醒地回顾这一段历史,正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身份与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连续性,使古代中国形成极其强烈的“中国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把中国当成世界上惟一的文明礼义之邦,而把域外的一切民族都视为“蛮貊”与“夷狄”。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八份第二),孟子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国的典籍中充斥着这类华夷之间地位不平等的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言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对“蛮夷”慷慨赏赐而使之感恩戴德的动人故事,由他的随行人员用诗的形式记录在案:“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据忠诚。”^[6]

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三百年殖民主义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经对中国虎视眈眈,清廷统治者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君临天下,统驭万方,称“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清文献通考》刑考)凡外国使臣来华,均视为藩属贡使,是“仰慕天朝”的表现。因此,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访华,在承德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时就发生了觐见礼仪之争。马戛尔尼坚持行英国臣下觐见英王的礼节,即屈膝单腿下跪礼,清廷则要求行中国臣子觐见皇帝的礼节,即三跪九叩首礼,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万树园宴会行英礼,正式庆典行三跪九叩首礼。此次英使访华历时204天,是中英两国首次通使,也是中西文化的首次直接正面碰撞。通使增进了相互了解,但英使提出的允许英商在珠山(今浙江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在北京开设洋行,在珠山、广州附近各指定一未设防的小岛供英商使用并可居住等项要求,乾隆皇帝则逐条驳斥,全部拒绝。拒绝侵占中国岛屿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确决策,但拒绝通商要求就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机会,拒绝通商的理由更是典型的“中国中心论”的代表作:“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蚕丝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7]敕谕又云“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8]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巨大变化毫无了解,还是一派人朝大国教训藩属的口气。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以威廉·皮德·阿美士德为正使的使团访华。这次英使访华最难解决的还是觐见礼仪问题,使团于8月28日至29日夜里到达北京,嘉庆皇帝准备立即在宫中接见使臣及其随员时,英使却一反常态,正、副使臣已到宫门,均称有病不能参加觐见而使此次访华失败。嘉庆皇帝敕谕道:“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恤,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此次尔等奉国王之命来天朝纳贡,不能成礼即属尔等之咎。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9]

1792年英使觐见乾隆,在祝寿庆典上是否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史家尚有争议。其实,英使行三跪九叩首礼,也只是例行公事,但在清廷官员眼中,就成为外夷敬畏天朝的伟绩,《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人贡,使臣马戛尔尼等觐见,自陈不习拜跪,乃率御前,而跽伏自若。”英使觐见乾隆皇帝的当事人之一,当年曾在军机处任章京之职的管世铭有题为《癸丑(乾隆五十八年)仲夏扈蹕避暑山庄恭记》的诗:“猷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诗后有注云:“西洋英吉利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充分表达了当时清廷官员认定天朝皇帝天威使外夷屈膝的虚骄自大思想。

1872年,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虽已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但清廷居高临下,虚骄自大的外交观念却并未改变。当年10月16日同治大婚,崇厚于大婚之前两日拜会各国公使,告之16日皇帝大婚,届时全城戒严,要求各公使和其侨民不得外出。按国际惯例,各国庆典均首先邀请外国大使参加,清廷不遵惯例,反而要求公使一律不许外出,各国公使都认为此举侵犯公使权益。1873年2月24日(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同治亲政,清廷

仍不邀外国公使观礼,驻京各国公使遂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同治帝,祝贺亲政之喜,实际上是争取正常的国际礼仪待遇。于是就是否允准外使觐见同治帝及觐见礼仪问题又引起一场争执。3月11日,文祥赴俄使馆与俄、德、美、英、法五国公使商谈觐见礼仪,各国公使提出行免冠五鞠躬礼,文祥坚持行跪拜大礼,双方不欢而散。14日再次晤谈,仍各执己见。21日,总理衙门致函五国公使,强调觐见时须行跪拜大礼,五国公使不允,就此僵持不下。此时,朝臣亦议论纷纷,各抒己见。4月15日,编修吴大澂上奏,言祖宗之法不可破,不可允洋人觐见。4月24日,御史吴鸿恩上奏,言可允洋人觐见,但须开导洋人,中外于礼仪问题要互相让步。5月1日,李鸿章上奏,言各国使节要求觐见,应宽其小节,示以大度,不必就行跪拜礼一事纠缠不休。5月25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上奏,也言使臣觐见礼仪不必强人所难。28日,御史王昕上奏,主坚持行跪拜礼,御史边宝泉上奏,主不准觐见。按国际惯例,公使代表本国呈递国书,觐见国王,双方地位平等,五国使臣允行免冠五鞠躬礼,已属尊重中国皇帝,清廷要求公使行跪拜之礼,实在是强加于人,不合国际惯例。经数月争执,清廷于6月14日正式下谕,允准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并拟定了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程序和礼仪。6月29日,外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同治帝,并呈递国书。按预定程序,各公使均行免冠三鞠躬礼。一场觐见礼仪之争至此方告一段落。

18年后,又有觐见地点之争:同治及光绪朝均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臣,1891年10月,德国使臣巴兰德向总理衙门提出,紫光阁为清廷筵宴藩属之地,各国使臣于此处觐见有视同藩属之嫌,请总理衙门代奏,另易他处觐见。别国使臣亦持此说。总理衙门再三辩驳无效后,奕劻等于10月20日上奏,代陈各国使臣更改觐见处所之要求。清廷准其所请,改在文华殿接见各国使臣。

又过了十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各国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时,将公使觐见礼仪列为条约重要内容。1900年12月24日各国公使提出条约大纲十二条,第十二条即要求更改觐见礼仪。1901年8月26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议定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礼仪并录入条约附件中。觐见礼仪要点为:一、在乾清宫正殿觐见;二、各国使臣乘绿色轿加黄帏至景运门外,换坐椅轿至乾清门,下轿步行入宫觐见;三、各国公使呈递国书,中国应派轿至使馆迎接,事毕送归,往返均派侍卫沿途护卫;四、使臣入宫走中门;五、使臣呈递国书,中国皇帝必须亲手接受;六、中国皇帝赐宴使臣,必在宫内并躬亲入座;七、一切仪节均以两国平等态度对之,以互不损伤国威为主。

1902年1月22日,光绪帝按《辛丑条约》规定的仪制在乾清宫接见德、英、法、俄、日、葡六国公使。1月28日,慈禧也按《辛丑条约》规定的仪制,在乾清宫觐见各国驻京公使。2月1日,慈禧又在坤宁宫接见慰问各国公使夫人。持续了几十年的觐见礼仪之争,至此终按各国要求订制而告一段落。觐见礼仪本应按国际公法办理,清廷要求公使行跪拜之礼,实在是强加于人。虽有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较早认识到这一点,但最终的转变却是在枪炮逼迫下实现的。^[10]

第三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早期 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

马克思这样论述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华帝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大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一个帝国逐渐死去的过程是缓慢的，这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也经历了无数的波折。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官员与士大夫总结战败的原因，基本的立足点仍然是将西方列强视为南疆海国，把鸦片战争当做海疆问题来认识与反思，于是，巩固海防成为议论的焦点。战后短短的七八年间，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述相继问世，这一现象，史家称之为“睁眼看世界”，中国人终于开始主动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就组织人员翻译澳门出版的报刊及外人著作，并于1841年根据译文编辑成《四洲志》。1842年魏源在林则徐所赠《四洲志》资料的基础上，据历代史志并广罗西书，出版50卷本《海国图志》，后经补充修改，1847年增订为60卷本，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本，是近代中国较早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和社会状况的著作，后来洋务运动时期推行洋务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出于此书。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畲经五年努力，完成世界史地巨著《瀛环志略》10卷，并附采用当时西方先进制图方法绘制的地图42幅。此外，还有梁廷枬撰《海国四说》，姚莹撰《康輶纪行》等。这些著作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其主观目的并非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出于解决海防问题以抵御外侮的实用目的。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传播，导致本来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天文地理、工艺制作之类“夷之长技”逐渐成为学习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了志在自强的洋务运动。以维持封建制度为前提的实用目标的实施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不是洋务运动推行者的意愿所能左右的，此后的中国社会客观上也就从器物层面上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1861年1月，清廷设立旨在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门办理对外事务的机构，不久，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62年，开办京师同文馆，先后设立英、法、俄、德、东（日）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学习语言以及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万国公法等等。培养各种语言的翻译人才。1863年，仿京师同文馆办法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初设英文班，后又添设法文、德文班。

1861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用土法制造子弹、火药、炸弹等，亦仿制轮船。安庆内军械所用土法制造洋器的实践虽不大成功，但毕竟是洋务派仿制西方船炮的开端，标志着手工制造向机器工业的过渡。其后至1872年间陆续建设了一批官办军事工业，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局）（1865）、南京金陵机器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等，1872年至1885年间围绕军事工业建设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

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7)、天津电报总局(1880)、兰州机器织呢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等,并于1881年修筑了唐(山)胥(各庄)铁路,1887年成立天津铁路公司,修筑了唐津铁路(北洋铁路)(1888),又修筑了唐山至山海关的铁路(1894),建设了湖北织布局(1890)、上海华新纺织新局(1891)、上海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894)等。而于1890年建成的湖北炼铁厂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钢铁企业(即后来的汉阳钢铁厂)。洋务运动期间还建设了一批商办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海源昌机器五金厂(1883)。这样,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南京、福州等地,乃至西北边远地区的兰州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业建筑。与此同时,筹建与训练新式陆海军的计划也全面实施,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共拥有22艘舰艇,其中铁甲快舰9艘,可以航行于大洋。

洋务运动时期始终存在着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要不要制船造炮以求自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先进国家。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为富国强兵,应当向西方学习,西方各国有自己的政教制度,国富兵强,并不是什么“蛮貊夷狄”。顽固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破坏了“夷夏之大防”,违反了“祖宗成制”与“立国之道”,对各种洋务活动应坚决扼制。1866年12月,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同文馆于英文、俄文、法文3馆之外,另设天文算学馆。奏称:洋人制造机器、火器、轮船等项,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上海、浙江等处制造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只学习洋人皮毛,仍无裨于实用。故拟添设一馆,学员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数年以后,必有成效。1867年1月,恭亲王奕訢等奏呈新订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此奏文在朝廷内引起了激烈争论。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反对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奏文称:朝廷命官任用科甲正途者,乃因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习外人之淫技奇巧,弃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张盛藻此奏,代表了清廷中一些守旧官僚的成见。3月20日,又有大学士倭仁上奏,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倭仁思想更为糊涂,其奏文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求,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师事夷人?4月6日,恭亲王奕訢等上折驳斥倭仁等的礼义治国论,称:倭仁等若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橛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4月23日,清廷谕令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生员。对倭仁之论,则以请君入瓮之法驳回,同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生员,又着令倭仁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倭仁只好复奏:“请不必另行设馆,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至此,关于天文算学馆之争才以顽固守旧势力失败而暂告结束。

但事隔不久,当年春夏久旱无雨,天灾严重。清廷为此诏求直言。6月23日又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奏文称:圣人常以天道警人事,近时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认为久旱不雨,缘于同文馆之设。淫技奇巧皆衰世所为,于世事无补。自古以来,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算学者中国为最,言技艺者中国为备,恐西学之轮船机器未必有中国幽深微妙,西洋之天文算学未必有中国之精深。这种言论实在荒谬,所以当即遭到清廷驳斥,但当时持这种荒谬思维方法的大臣并非少数。^[12]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这种论争贯穿洋务运动时期的始终,只是早期论争激烈,后期顽固派的态度已大有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逐渐形成“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写,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萌发于魏源的“师夷制夷”之说,此后,冯桂芬、薛福成、

王韬、郑观应、沈毓桂等都多有论及。在这一过程中，“西用”的内涵也日渐丰富，从最初的制造枪炮、军舰等“西艺”，逐渐推进到“西史”、“西政”，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在军事、工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学习西方，开始官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兴办新式学堂、翻译西书、创办报刊。张之洞是“中体西用”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这种中西文化观集中体现于其名著《劝学篇》。张之洞撰“劝学篇”的1895年，已是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结束的年代，所以张氏在《劝学篇》的序言中说：“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13]当时正是中西文化交融史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演进之时，世道更迭、人事兴衰的表象是政坛变换，而本质则是文化嬗变，“于是图效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瘡，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14]当时新旧思潮激烈冲突，张氏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言：“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5]后来发展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取得全国性的影响。

陈旭麓在《论“中体西用”》一文中这样评价“中体西用”思想：“本来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自的‘体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与同一国度内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既否定又吸收的形式相比，是被逼拶得变了形的。”“‘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设法把这部分引进到中国来，而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后的当时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形式。”引进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力量虽然有限，但终究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6]

第四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期 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

1894年至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果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至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对中华帝国的第一次冲击，那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帝国的第二次冲击，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势力全面入侵，清王朝彻底屈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酝酿已久的“变局”意识，发展为大规模的呼吁救亡、力主变法、宣传革命的浪潮，甲午战后产生了诸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种种局部改革的思想，全面变制的思想，乃至民主革命的思想，其共同目标都是将腐朽的封建帝国改造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中西文化交融史也就开始了第二层面的文化嬗变，开始寻求制度层面的改革，

鸦片战争以来思想先行者们孜孜以求的重建中华帝国秩序的“中体西用”思想被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所取代,以国家观的改变为核心,新的社会思潮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是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学术著作与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严复是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五年,1877年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留学,1879年学成归国,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及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20年。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观察英国社会制度,辨析“西学”“中学”异同,甲午战败后大力倡导新学,主张向西方学习。严复通过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第一个系统介绍近代西方文化,但他在其译著《天演论》中介绍的已是按中国社会需要改造过的严复式的西方社会进化学说,宣传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保持“以人恃天”的进取精神,“自强保种”,变法求新。学贯中西的严复这样整体比较中西文化:“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7]通过对比,严复认为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争,中学与西学的对立,是两种历史背景、两种精神文化的对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18]

1895年康有为联络18省1300余举人开会议事,联名递呈由他起草的上皇帝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三年之后,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至9月21日因慈禧发动政变而失败的“戊戌变法”,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社会动员与思想启蒙,戊戌维新运动所传播的科学民主精神,为培养现代国民、组织现代社会团体、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而进行的初步实践都为中国此后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

庚子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不能再寄希望于清廷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革,挽救中国危亡必须在清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外另寻出路。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孙中山对于1900年前后的这种人心世态的转折有过一段生动的回忆:“回顾国人之心,已觉前后有别矣,当(1895年广州起义)初次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口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20]孙中山的亲身体验,反映了当时社会心理和政治走向发生的巨大变化。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终于导致制度层面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最终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家制度与皇权观念的变革得以实现,辛亥革命实现的国家体制的转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辛亥革命基本上没有触动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孙中山刚刚当选总统就被迫退位,袁世凯篡夺民国筹安称帝,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思想,民国初年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观,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寻求救国之道,于是有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精神层面文化嬗变的序幕。

第五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后期 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迁至北京出版。当年12月,陈独秀率先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优劣。陈文发表后不久,《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6年10月以“伧父”笔名发表《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提出与陈独秀针锋相对的观点。自此,在批判反思19世纪中叶以来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从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高度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摄取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并据此设计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史家称为新文化运动。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至1927年,思想文化领域论争的焦点转向社会性质等问题,新文化运动才告一段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已经达到新的高度,中西文化交融史已从制度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是以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比较探讨拉开序幕的。陈独秀以不调和的立场对待中西文化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以接受西方近代文化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21]“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22]陈独秀所说“欧化”,主要指提倡科学与民主:“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3]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用逆向思维的方式举起“反孔”的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通过反传统来推动思想启蒙。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代表,所以当时的这批热血青年选择“反孔”为突破口来冲破以旧礼制为核心的文化格局,为建构新的文化格局开路。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想之梦破灭,战后的欧洲,战胜国与战败国两败俱伤,战争使繁盛的工业文明化为一片废墟,西方学者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将西欧一隅的历史发展等同于世界历史,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优越论的“西欧中心论”观念受到挑战。1917年,斯宾格勒在德国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打破了西方史学界“西欧中心论”的一统天下。随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把斯宾格勒提出的八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采用多个文明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其史学巨著《历史研究》“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着我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止当前的1972年。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引自1972年版中译本)^[24]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将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作为价值相等的文化加以评价。在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睁眼看世界”近 80 年后,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原来在西方世界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文明同样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这种思潮很快就影响到中国文化界。1921 年,梁启超游历一战后的欧洲后归国,整理西欧观感,发表了《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实际提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观点。他讥讽思想文化上的顽固保守派所主张的‘西学中源说’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荒唐可笑;也批评全盘欧美化论者‘沉醉西风’、‘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同样无知可笑。他提出,‘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显然,他是要用西学作为整合手段,达到复兴或改造中国文化的目的。”^[29]

同在 1921 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理论上分析欧洲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认为三种文化分属于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向”:欧洲的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的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的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在此基础上,称这三种“路向”的不同,实际上是三种文化的不同,其间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建立在西洋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已经暴露出众多弊端,西方文化之路向已经走不通了,而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明时代又没有到来,因此,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欧洲的路向过渡到中国的路向,西方文化要想摆脱危机,就必须走中国文化的道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序言中,梁漱溟言:“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29]梁漱溟此书是后来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论述极端偏颇,但这种哲学层次的讨论则有利于文化论争的深入。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激进的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论争,二者是作为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的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其动机都是救亡图存,寻求中华民族富强之路,论争的焦点则是中学(本土文化)与西学(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化派主张照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之路,文化保守主义则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物质文明结合之路。两者在论争的过程中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这也正是论争的目的与价值所在。西化派的主张也许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如陈独秀言:“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0]这“西洋的新法子”就是前面引文中的“德赛两先生”,即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激进的话语中包含着正确的认识,联系前文,应当理解为主张用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批判改造中国文化。但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也不容忽视,如吴宓言:“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来自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30]此种深刻的见解直至今日仍极富启示价值。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论争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争,是对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文化认知与反思,激进的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

主义思潮,前者强调输入西方文化,后者强调继承传统文化,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各有其立论的片面性。论争所触及的核心问题是外来文化如何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永远不会有终极认识的,时时需要反省、讨论、研究的课题。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政府行为倡导儒学,鼓吹尊孔复古,恢复封建伦理道德。而此时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日彰之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加剧,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于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压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在思想文化领域又掀起新一轮的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论争。前者主要是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论与胡适提出的“充分西化”论。后者先有“本位文化”的倡导,至抗战时期则有作为一个文化哲学派别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要员戴季陶、陈立夫相继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光芒万丈,无与伦比”,“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同月,成立由陈立夫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标榜以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为宗旨,企图用“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则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的将来”。^[1]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武埭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儒、樊仲云、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即《十教授宣言》。《宣言》主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原则:“一、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二、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五、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个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2]十教授的上述观点,在此前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理论中已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十教授以学者身份发表的宣言博得了广泛的响应。

“十教授宣言”发表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由此而再度展开。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在其1932年所撰《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提出,1933年底在中山大学作过讲演,讲演稿后来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曾在广州引起一场热烈的文化论战,1934年1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后陈氏又陆续发表了许多宣传“全盘西化”的文章。陈序经出生于海南岛的一个侨乡,早年随父旅居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后留学美国与德国,得以亲身体会西方文化,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文化是包括经济、政治、精神诸方面的一个整体,文化整体不可分割,学习西方文化只能全盘搬来,即使是缺点也不得不接收,又强调各种文化只有时代的差距,没有民族的特殊,全盘西化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全盘西化”论以“矫枉过正”的激进姿态出现,虽然目的是尽快

推进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但立论未免片面,在当时支持者不多

1935年2月24日,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把时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与复古派,吴氏自称为折衷派,批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又援引胡适1933年发表的《建国问题引论》的观点,认为胡适也属折衷派。胡适立即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又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称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主张“复古”,是洋务、维新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针对胡适等人的批评,十教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予以答辩,在此前后,陶希圣、萨孟武、樊向云等各自撰文申辩,均反对盲从,决不守旧,反对任何复古的企图。而胡适亦感到“全盘西化”论提法不妥,也不太符合自己的一贯主张。因此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重新解释并修正“全盘西化”的提法,表示愿意放弃“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词,而改用“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或“充分世界化”的提法。即在历时年余的论争过程中各派都在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至1935年的下半年,华北局势日趋恶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场文化论争即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半个中国被日寇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要求认同民族、认同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呼声也空前高涨。在资料缺乏,生活极不安定的西南大后方,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在这一时期著书讲学,各立新宗。熊十力立足于传统文化,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新哲学体系,著《新唯识论》,揭示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探寻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强调要将儒学与封建意识区别开来。冯友兰著“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与《新知行》,建构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贺麟则倡导“新心学”。于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抗战时期,萌生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现代新儒学形成了“现代新儒家”学派,无论我们对其价值如何评价,应当肯定的是,“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群体形成于此时,是爱国学者对民族危机的一种回应,也是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的过程中,不论西化思潮还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拥护者,都逐步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即用“近代化”(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与“中国化”的概念,其中张奚若(字熙若)对“近代化”(现代化)这样论述:“为讨论方便计,我们不妨说: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将中国古书加以句读(注意:是加句读,不是加新式标点,因为新式标点是不大适用于中国的古文的),或将古文译为白话文(也不一定要用欧化文体);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许多地方还是必需的)。比较起来,第一种的现代化比第二种的现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但第二种的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若是有人愿意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复杂的社会情况是不容许我们笼统的。”^[3]二十世纪三一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是二十年代论争的继续,在不断的论争与探求中,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化。至四十年代初,“近代化”(现代化)的概念已进入政治家的语汇,也引起冯友兰、贺麟等哲学家的注意,冯友兰这样评价:“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

代派或现代派。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产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之名,实亦较不含混。”^[1]这已经很明确地道出了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本质,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近代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也是世界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矛盾,在近代化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造成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不断冲突,传统文化体系的根基愈深厚,这种冲突就愈剧烈、愈持久。综观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精神层面的几次论争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如何继承民族传统始终是离不开、摆不脱的课题。传统与近代化是不能割裂的整体,背弃了传统的近代化只能是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而拒绝近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西方国家的近代化是成功的模式,但西方近代文化与它自身的历史传统也是连续的,把西方近代文化嫁接到中国来是两种异质体的融合过程,正确处理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是成功的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与论争中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建筑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史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二者共性的一面,只有在深入研究这种共性、这种大背景的前提下研究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特性,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本章不吝篇幅论述这种人文大背景,其目的亦在于此。

[1] 近代化,或现代化一词,英文都是 modernization,国内学术界使用比较混乱,有用“近代化”者,有用“现代化”者,有用“早期现代化”者,在同一著述中三者混用的情况也不鲜见,这种混乱现象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现代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整个世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从 16 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由于这一过程历时很长,可以有更细的分期,其中早期阶段可以称为“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都包涵于“现代化”的大概念之中。这类名词的使用,学者见仁见智,这里不拟展开讨论。本书研究的时限范围属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早期阶段,所以书中统一使用“近代化”一词,但引用他人文字,则忠实于原作,用三者中任一词或三者混用都不改动。

[2] 参见戴逸,《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 6—12 页;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之反思》,载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 1—36 页。

[3] 参见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

[4]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3—4 页。

[5] 依田意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第 177—179 页。

[6] 马欢《纪行诗》,载《瀛涯胜览》,转引自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第 14 页。

[7] “上谕档”,转引自秦国经,高焕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第 148 页。

[8] “上谕档”,转引自秦国经,高焕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第 148 页。

[9] “上谕档”,转引自秦国经,高焕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第 178—79 页。

[10]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近代中国报道》。

[11]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 页。

[12]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近代中国报道》。

[13] 张之洞,《劝学篇》,第 41 页。

[14] 张之洞,《劝学篇》,第 41 页。

- [15] 张之洞,《劝学篇》,第121页
- [16] 转引自李忠兴,《张之洞与劝学篇》,载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39页。
- [17]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第3页,转引自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第93页。
- [18]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50页,转引自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第94页。
- [19] 参见袁和平,《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20] 孙文,《革命原起》,载《辛亥革命》,第1册,第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转引自程歌,温乐群,《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第164页
- [21]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原载《新青年》,第2卷3号,转引自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5页。
- [22]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原载《新青年》,第3卷1号,转引自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5页
- [23]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新青年》,第6卷1号,1919年1月15日,载王中江,范淑媛选编,陈独秀等著,《新青年》,第296—297页
- [24]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页
- [25] 李喜所,元吉,《梁启超传》,第456页。
- [2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转引自于桂芬,《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化文化的比较研究》,第287页
- [27] 陈独秀,《独秀文存》,第152页,转引自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第37页。
- [28]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学衡》,第4期,转引自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第36页。
- [29] 《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转引自魏宏运,《民国史纪事本末(四)》,第299页。
- [30]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93—394页
- [31] 参见魏宏运,《民国史纪事本末(四)》,第306—308页
- [32]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原载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1935年4月,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50页。
- [33] 冯友兰,《新事论》,《二松堂全集》,第4卷,第225页,转引自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2页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第二章

构筑舞台——中国近代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剧变,有史家概括为从纳贡制度向条约制度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是通商口岸中外国租界区的产生与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以租界区为主体的近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影响的扩散。费正清言:“英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具有一般性的目的,即废除纳贡制结构。1842年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准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来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从而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印度鸦片和外国侵略已经开始捣毁中国排他性的藩篱。中国的战败使烟毒进一步泛滥,而取得战争胜利的英国人则试图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这一点,他们在后来的二十年内办到了,其间他们与清廷及其地方官更有时一致行动,有时则发生冲突,而与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从1842~1844年至1858~1860年这段时期,这些新制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初期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二十年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第一阶段。从西方的观点看来,那是这种条约制度结构得以逐渐形成的初创阶段。后来的几个阶段是使条约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变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今天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条约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工具。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的下一个三十年中,通商口岸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中心城市;它们对整个中国有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第三个三十年中,主要通过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像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在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最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第四个三十年中,条约制度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的侵略所取代,接着又被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时代的革命秩序所代替。在这风云多变的一个世纪中,条约制度就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1]条约制度的产物:租界与以租界区为主体的商埠城市及局部开辟租界而使之发生变化的城市、租借地与新兴的租借地城市、铁路附属地与新兴的铁路附属地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及受这些城市的影响而向近代城市转型的其他类型中国传统城市的巨变,一起构筑了中国近代建筑从中世纪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转型的大舞台,也构筑了近代中国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大舞台,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一出出大戏就在这个舞台上亮相。

第一节 商埠城市中租界区的形成与拓展

一、上海租界模式的确立

租界是一个专用名词,与之相近,在许多相关著述中经常出现而易于混淆的名词有:“租借地”、“居留地”、“外人居留地”、“外人租地”等等,其中,“租借地”与“租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在后文专章论述。“居留地”一词源于日文,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都把“租界”称为“居留地”,如开辟苏州等九处日租界的条约的日文文本就将这些日租界都称为“日本居留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居留地”是“租界”的同义词,但应用并不广泛。为与应用广泛而涵义完全不同的“外人居留地”明确区分,不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不宜用“居留地”一词代替“租界”,或二者并用,所以本书不使用“居留地”一词。“外人居留地”则指通商口岸中尚未发展成租界,但外人已拥有一定特权的居留与贸易区域,亦称为“外人租

地”，这是与租界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本书中只使用“外人居留地”一词，但引用他人文字则仍忠实于原作，凡使用“居留地”、“外人租地”诸词或混用者都不改动，必要时另加注释。

鸦片战争后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等官往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地方官公文往来。”^[2]《南京条约》还规定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只有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有权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行商制度，以后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就各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3]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议定的过程中，英方要求英国商民享有在各通商口岸的任何地方居留贸易的特权，清廷虽不得不允许外商携眷至通商五港口居留贸易，却力求对其活动范围有所限制，结果清廷不允外人自由择地居留的交涉获得成功，保留了对外人居留地“会同商定”的权利。清廷的本意是希望按旧时在广州设十三行商馆的思路，将外人活动限定在通商五港口的特定地区，华洋分居，利于控制；而此时也有不少英人认为，有一个外人集中居留的地方较之分散居住更为有利，因而并不反对清廷的要求。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不是当初订约双方所能预料的，正是这一条款的规定，导致最早在上海，后来遍及中国主要商埠城市，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的外国租界的产生。换言之，清廷植根于闭关锁国观念的、限制外人在各通商口岸自由择地居留的政策，反而成为通商口岸外国租界形成的起因。（图2-1-1）



图2-1-1 《南京条约》签字图（1842年8月29日），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虎门条约》除规定英人可在通商五口租地建屋外，还规定英国取得两项特权，一是领事裁判权，英人在通商五口犯罪由英方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管制；二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虎门条约》第八款），在以后的若干年中，这一条款被列强各国相互援引，使一国获取的权益为有约的其他各国共享，从而组成利害相关的侵华同盟。1844年7月3日，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可在各通商口岸建造医院、礼拜堂等。同年10月24日，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凡法人“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棧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4]“凡佛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设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

惩。”¹⁴这一条款规定了清政府保护法人教堂的义务,自此外人在华的传教事业都受到保护。次年2月,清廷又作让步,允准天主教弛禁。自此,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教会建筑亦因此成为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建筑的主要类型之一。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 Balfour)即与上海道宫慕久商定英人居留地的界址为: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南至杨泾浜(今延安东路),东至黄浦江边,西面是一片荒地,当时未明定。发人深省的是,上海英人居留地地点的选择,却是当时对外商进入上海持不同心态的中英双方一致同意的共同结果。英领巴富尔与上海道宫慕久一起,“在黄浦的边沿选择了一片上海人所弃置不顾的泥滩”,巴富尔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军舰在这里可以停泊,”“可以使英国人看得见而感到安全。我们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扬子江。我们藉着据有这个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公允的条件,以稳定我们的商业关系。”¹⁵英人是从有利于海上入侵以保障商品输入中国的目标出发,选择黄浦江畔的泥滩荒地;中方官员则着眼于将外人于县城之外,实行华洋分居,以免多生事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却选择了同一个目标,于是,上海英人居留地,即后来的租界,也是今天上海最繁华的地区就此定位。

1844年至1845年,由英领事会订的有关上海英人居留地租地办法的一系列法规陆续交上海道宫慕久公布。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将其汇总后张榜公布,这就是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Shanghai Land Regulation),又称1845年《土地章程》或《地皮章程》。订立这份章程的直接目的是落实中英《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中关于通商五口中国地方官会同英国领事官议定英人租地建屋基地的有关条款,解决英人租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但章程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可以说,章程实际上是拟定了一个朦胧的近代上海城市建设规程,使由此产生的上海租界从一开始就按西方近代城市模式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章程的制定可称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点。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相反,正是租界区的产生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进程。

章程以条约形式规定了上海英人居留地的地界为“前议杨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并规定了若干细则,使之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商人租赁基地,必须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定界,注明步数、亩数、竖立石柱。如有路径,应靠篱笆竖立,免致妨碍行走,并在石柱上刻明外有若干尺为界。”(章程第一条)¹⁶英人居留地土地出租采用的是脱胎于中国民间习用的土地出租方法的“永租制”,清代民间出租土地,或限期租赁,或永佃,即租赁者先付押租,然后每年再付年租,便取得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原主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不能主动收回土地使用权。坚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清廷不允许将土地卖与外商,所以章程规定采用“年租减钱一千,增重押租十千”之法,增加押租使之相当于地价,减少年租使之相当于地税,还规定“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准商人禀报不租,退还押租;不准原主任意退租,更不准再议加添租价”(章程第九条),这也是清代民间通行的租地规则。外商原希望买地以保证投资安全,但当时的清廷官员不能区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管辖权的区别,因有此规定。¹⁷

章程规定了英人居留地“华洋分居”的原则:“该处本地居民,不得自相议租,亦不得再行建房、招租华商”(章程第十五条),但却向所有外人开放:“别国人在前议定杨泾浜以北租给英商界内租地建房、租屋居住、租棧贮货或暂行借住,均应与英人一体遵照各条,以永和好”(章程第二十一条)。使之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名下的国际性都市,这也是以后所有租界的共同特征。至于“华洋分居”一节,短短的十年之后的1854年即告终结,大量华人华资的涌入成为租界发展繁盛的重要条件。

如果说,土地制度的确立为英人居留地这一上海近代城市的雏形奠定了法律基础,

那么,章程中有关市政建设的若干规定则开创了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的先河。首先,确定了英人居留地的基本道路系统。黄浦江边原有一条沿江纤道,划入英人居留地范围后“因坍塌未及修理,现既出租,应行由各租户将该路修补,以便往来。其路总以粤海官尺二丈五尺宽为准,不惟免致行人拥挤,并可防潮水冲激房屋。其既修之后,任凭僱船员役及正经商人行走,不准无业游民在此窥探。”(章程第二条)这就是今日外滩中心一路的前身。章程还规定:“商人租定基地内,前议留出浦大路四条,自东至西,公同行走。一在新关之北,一在打绳旧路,一在四分地之南,一在建馆池之南。又原先宁波枝房西至,留南北路一条。除打绳路旧有官尺二丈五尺外,其余总以量地官尺二丈宽为准。不惟往来开阔,并可预防火灾。其出浦之处,在滩地公修码头,各与本路相等,以便上下。其新关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码头之北,俟租定后,仍须酌留宽路两条。”(章程第三条)“商人现租基地内旧有官路,兹因行走人多,恐有争竞。议于浦江以西、小河之上,北自军工厂旁冰厂之南官路起,南至杨泾浜河边房坛西首止,另开二丈宽直路一条,公众行走。……其军工厂之南,东至头坝渡口码头,旧有官路一条,亦应开二丈宽,以便行走。”(章程第四条)这样,章程规定了一个基本的城市道路系统,道路的位置、起止、走向,道路的宽度、用途,新建道路与现状道路的关系,华人原有使用权的延续,乃至资金的来源都作了具体规定,因而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几年之后,城市道路骨架形成,一片泥滩初现近代城市雏形。

对照十年后的1855年出版的上海开埠后的第一份英租界地图,可知按章程规定实施的道路系统是以沿黄浦江的沿浦大道为基准,由六条垂直于沿浦大道的东西向“出浦大道”与两条与沿浦大道平行的南北向道路构成的棋盘格式的道路系统,规整而又顺应地形,并非横平竖直的死板方格。这种规整的地块分割与道路系统明显受到工业革命后西方近代城市结构模式的影响(图2-1-2,图2-1-3)以后的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区,天津早期英、美、法租界区及汉口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区都是受到这种西方近代城市结构模式影响的产物。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一道路系统的出发点是“出浦”,即方便地通向沿黄浦江边一字排开的各商号的码头——对外贸易与对外交往成为当时英人居留地建城的首要目标,与黄浦江航运系统的呼应成为城市道路系统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从传统农业城市向近代商业城市转型,城市功能的转变带来了城市基本构成骨架——道路系统的巨大变化。试将同处黄浦江畔,与之相邻的上海县城与英人居留地作一比较:前者立足于封闭的、自成一体的防卫目标,后者则着眼于开放的,有利于对外交往的便捷交通条件,所以对近在咫尺的黄浦江,城墙内的上海县城视而不见,英人居留地却视为命脉。早期英人居留地的建设奠定了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基调。从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的整体视角考察,作者研究绘制了《中国传统城市旧城区与商埠城市早期租界区之城市道路骨架构成肌理对比分析图》,将上海旧城区与上海早期英租界区,及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区,天津早期英、美、法租界区,汉口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区之城市道路骨架构成肌理作对比分析;又将1904年济南自开通商场后的济南旧城区与商埠区的道路骨架构成肌理作对比分析;并将二者作整体对比分析研究。结论如下:以上海旧城区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旧城区的代表,以济南旧城区为中国近代边缘城市旧城区的代表,其中国传统城市的基本性质是相同的,其中世纪的中国传统城市的道路骨架构成肌理也是相同的——城墙围绕,封闭内向,自然形成,自由发展,杂乱无序,无规律可循,杂乱的不规则的道路骨架系统形成同样杂乱的不规则的小尺度街区:街区尺度小,是适应以平房四合院为主的中国传统住宅要求的街区尺度;街区不规则,土地利用率很低;不重视城市的对外交通,维持着的是封闭内向的基本城市格局。这是封建社会日给日足的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以上海早期英租界区,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区,天津早期英、美、法租界区及汉口英、俄、法、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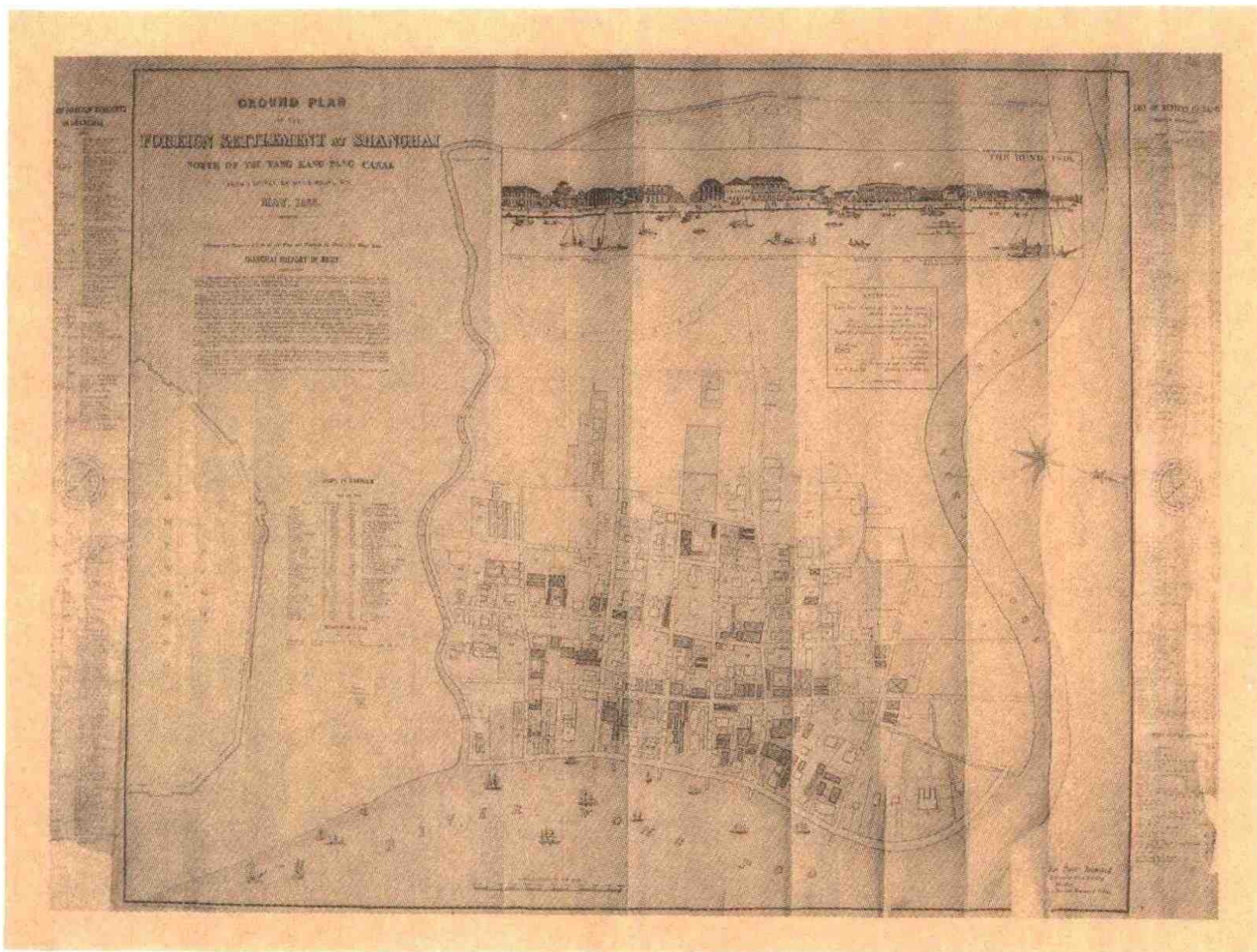


图 2-1-2 《上海租界图》。上海开埠后第一份英租界地图,1855年出版。上海图书馆藏,原图载上海图书馆编,《近代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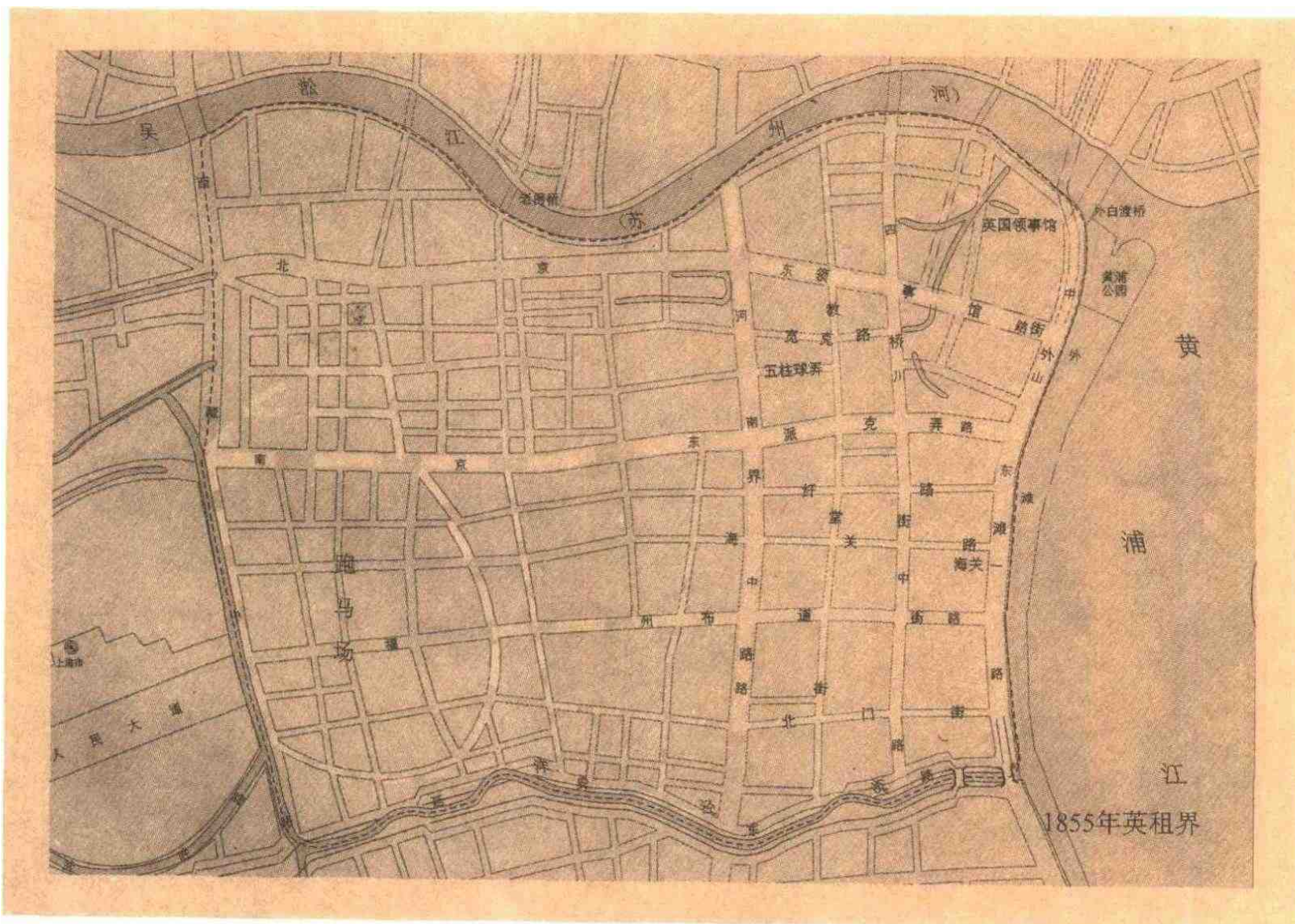


图 2-1-3 上海《1855年英租界》,原图载《上海历史地图集》。

日五国租界区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租界区的代表,其以西方近代城市为蓝本的近代城市道路骨架构成肌理也是相同的——照搬照抄西方近代城市构成模式,先有基本规划设计,后有计划地发展,形成规整的方格网道路系统,这一道路骨架系统形成的街区尺度较大,着眼于容纳较大尺度的近代城市建筑,但这还只是表象,不是本质。更重要的是,城市

道路骨架构成以临水(沿江或沿海)与临铁路为基本出发点,目的是方便对外交通,以保证商业的发展。这是早期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侵占租界的主要目的之一。反映在城市管理方式上,各商埠城市的早期租界区都实行了商品化的管理——将租界区的土地分片出售,其回收资金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以保证商业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的城市道路骨架构成模式,也为50年后自开通商场的济南商埠区所模仿。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1900~1937),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租界区的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对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影响。这和影响,本质上是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对中世纪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对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封建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上海早期英租界的这一在今天看似简单的城市道路骨架构成模式,实际上产生了远远超出其自身城市发展需要的影响。(图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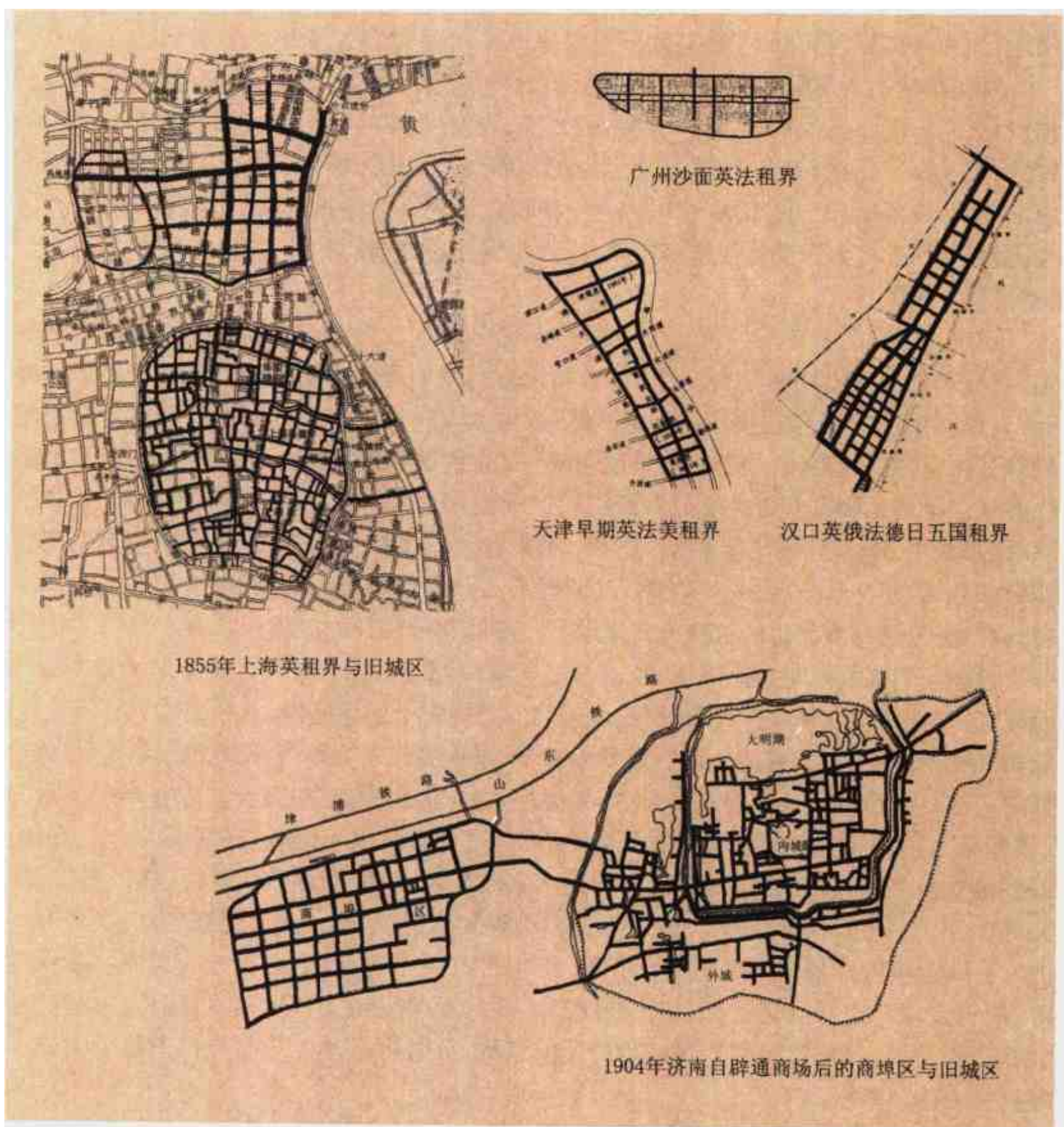


图2-1-4 《中国传统城市旧城区与商埠城市早期租界区之城市道路骨架构成肌理对比分析图》。本图参照本书各有关章节所附之地图绘制。

章程还规定了英人居留地租户的市政建设义务：“商人租地并在界内租房,自杨泾浜以北,应行公众修补桥梁、修除街道、添点路灯、添置水龙、种树护路、开沟放水、雇募更夫,其各项费用,由各租户呈请领事官劝令会集同商捐。”(章程第十二条)除雇募更夫

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手段外,章程规定的一系列市政建设管理措施将西方近代城市的建设管理模式移植到了上海。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后,英人居留地的城市面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杭州人葛元煦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旅居上海,著《沪游杂记》,1876年葛氏成书时已居沪十五年,初至上海当在1861年前后,书中所记正是上海租界的早期面貌。其时道路已由泥土路、石板路改建为碎砖碎石垫底、细沙压平的新式马路,道路之下建有“水仓”,敷设管道通至外河,道路两旁辟有人行道,并种植行道树,已是一派近代城市景象。

章程还规定了城市防灾措施,道路宽二丈至二丈五尺,“不惟往来开阔,并可预防火灾”,(章程第三条)“惟不得屯贮违禁货物,不得非年非节点放枪炮,更不得打弹射箭,妄作危险伤人等事,惊吓居民。”(章程第十条)“界内不得搭盖易烧房屋,如草棚、竹屋、板房等;不得收藏危险可以伤人货物,如火药、硝磺、及多存火酒等;不得占塞公路,如造房、搭架、檐头突出、长堆货物等”,“如火药、硝磺、火酒等物运到上海,必须会同在界内距住房、栈房较远之处公议一地,以备存贮而防疏失。”(章程第十八条)这些都是保障近代城市正常运行的防灾措施,其目的“皆系为出保房屋货财,永图众商平安也。”

章程规定英人居留地允许建造住宅,也允许建造公共建筑,“商人租地之后,建房居住自己眷属,屯贮正经货物,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会馆各项,并可养花、种树、作戏玩处所。”(章程第十条)甚至还考虑到华界商贩供给日常用品的集中市场,“杨泾浜以北界内,准各租户公建市房一处,以便华民挑运日用物件在此市卖。”“其坐落处所及办理各法,必须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定义,商人不得私自建造,亦不得建房转给华民租用。”(章程第十六条)

还应当提到的是英人居留地建设的资金来源,所有市政建设、公共建筑建造、外商住宅、货栈等的建造都由租地外商投资,沿浦大路坍塌未及修理,“应行由各租户将该路修补”,(章程第二条)界内道路“其租定路基,业由商人先行给价者,如有损坏,应由比邻租户修补,嗣后由领事官派令各租户公议均摊。”(章程第三条)界内公用设施“其各项费用,由各租户呈请领事官劝令会集公同商捐。”(章程第十二条)“宽路码头新设栅栏,原出价值、续修费用,皆由先到附近各租户垫办。将来有续到之人,及现在尚未摊钱之租户,仍应按数摊补,以便同行行走,免致争竞。”(章程第二十条)城市建设资金出自投资者,而非出自政府,正是这种商品化的筹资方式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按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外人在英人居留地拥有市政建设权、部分征税权及部分行政管理权,中国官府仍拥有土地管辖权、部分司法权与行政权:沿黄浦江外商码头“仍由海关巡船随时稽查”;(章程第二条)旧有官路重修,须“会同勘明何路应改,再行示谕”;(章程第四条)商人租地“均应报明领事官,照会地方官会同存案”;(章程第九条)刑事犯罪“由领事官照会地方官照例办理,以示惩戒”;(章程第十二条)地基估价“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派公正华英商人四五名,将房价、地租、迁费、垫工各项,秉公估计,以昭平允”;(章程第十三条)各租户公建市房“其坐落处所及办理各法,必须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定义”。(章程第十三条)此外,第二十二条还规定“凡有查照条约新议各事宜,将来如有应行更正、另须商议或意思不明以及须用新立字样,均应随时会同酌定。如众商有公议之事,俟禀明管事官会同地方官酌议后,再行遵办”,清廷地方政府保留了条约修改的审核权。

总之,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迈开了在中国商埠城市设立外国租界的第一步,但此时的上海英人居留地与以后的租界还有很大的区别,如上所述,清廷地方政府仍保留了管辖英人居留地的一部分权力。上海的外人居留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租界,是在1854年《土地章程》出台之后。

1846年,英领巴富尔与上海道官慕久议定上海英人居留地西界为界路(今河南中路),英人居留地四至确定,面积830亩。1849年4月6日,上海道麟桂同意开辟法人居留地,其四至为:“南至上海北门外的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19]面积986亩。1848年,文惠廉等美国传教士在虹口地区购地建房,并要求同意美人在虹口居留,这一要求虽获许可,但因文氏并非官方代表,所以既无协议也未勘定界址。

这样,在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港口中,只有上海在开埠后的五年中出现了外人居留地。又过了五年,这种中国官府还拥有—定管辖权的外人居留地发展成为完全摆脱中国官府控制的租界。1853年春,起事已有二年的太平军攻克南京、镇江后定都南京,有席卷江浙之势。于是外人居留地内成立了武装组织“上海义勇队”,后来扩大组织,称“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又成立办防委员会,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宣布外人居留地“中立”。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占领上海县城,知县袁祖德被杀,上海道吴健彰被捕,后为美传教士救出藏匿于英人居留地内。此时,上海道及上海县地方政权瘫痪,为外人居留地提供了建立独立的自治政权的时机。1854年4月4日,外人与驻在外人居留地西北的清军发生冲突,而有外人以武力驱逐清军的“泥城之战”,清军被逐,兵营被焚。从此中国官府无法再过问外人居留地内的事务,这是上海外人居留地转化为租界的重要转折点。

小刀会战事使县城内大批居民逃入英人居留地避难,使英人居留地人口在短时期内增长了几十倍,“到1854年,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从一年前的500人猛增至20000人。”^[20]开始,英领阿礼国坚持“华洋分居”,要求禁止华人进入英人居留地,但因华人进入,地价房价暴涨有发财的商人却不同意,一个商人这样说:“我的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中发一笔横财。我预期至多在两二年之中必须发财,即行离去。那么,上海以后即使化为灰烬,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21]由于英国商人的反对,阿礼国放弃了“华洋分居”的主张。于是,借上海清政府地方政权瘫痪之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英、美、法三国共同要求取消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中有关“华洋分居”的规定,并借机扩大外人居留地的权力,成立拥有警察权、立法权及行政权的政权机构,于是于1854年7月5日三国共同拟定《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通称1854年《土地章程》。此章程规定三国外人居留地实行行政统一,界内侨民选举三名或三名以上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征收税款,并可成立警察武装。7月11日章程在租地人大会上通过,成立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权力扩大到管理界内各种事务,后改称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也就是后来所称之“工部局”,同时成立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警察武装,即后来所称之“巡捕”。至此,上海外人居留地演变成为拥有独立的市政管理机构,拥有支撑这一机构运行的警察武装,完全摆脱中国政府行政管理的,由外人实行属地管理的“国中之国”。

美人霍塞在其《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评论1854年《土地章程》导致的后果:“这次的地皮章程载有使上海成为世上没有先例的市政区的根芽条例。其中规定:市政的管理权应操于全部侨民之集体的手中,这便推翻了条约中所规定土地的主权依旧归于中国政府之原则。上海租界从此成为一个自有主权的、自治的、国际的政治体系:它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治国。”“这部上海宪法实是一组最自私自利的、最示预兆的、最现实主义的法典。这批眼光远大的上海先生们,利用中国政府的缺乏能力,替未来的上海先生树立了这个市区之特殊的法律基础,而使后人得在其中自由活动,使这上海滩逐渐滋长而成为一个供人以发财机会、不尚感情的、乐观的、门户开放的城市。”^[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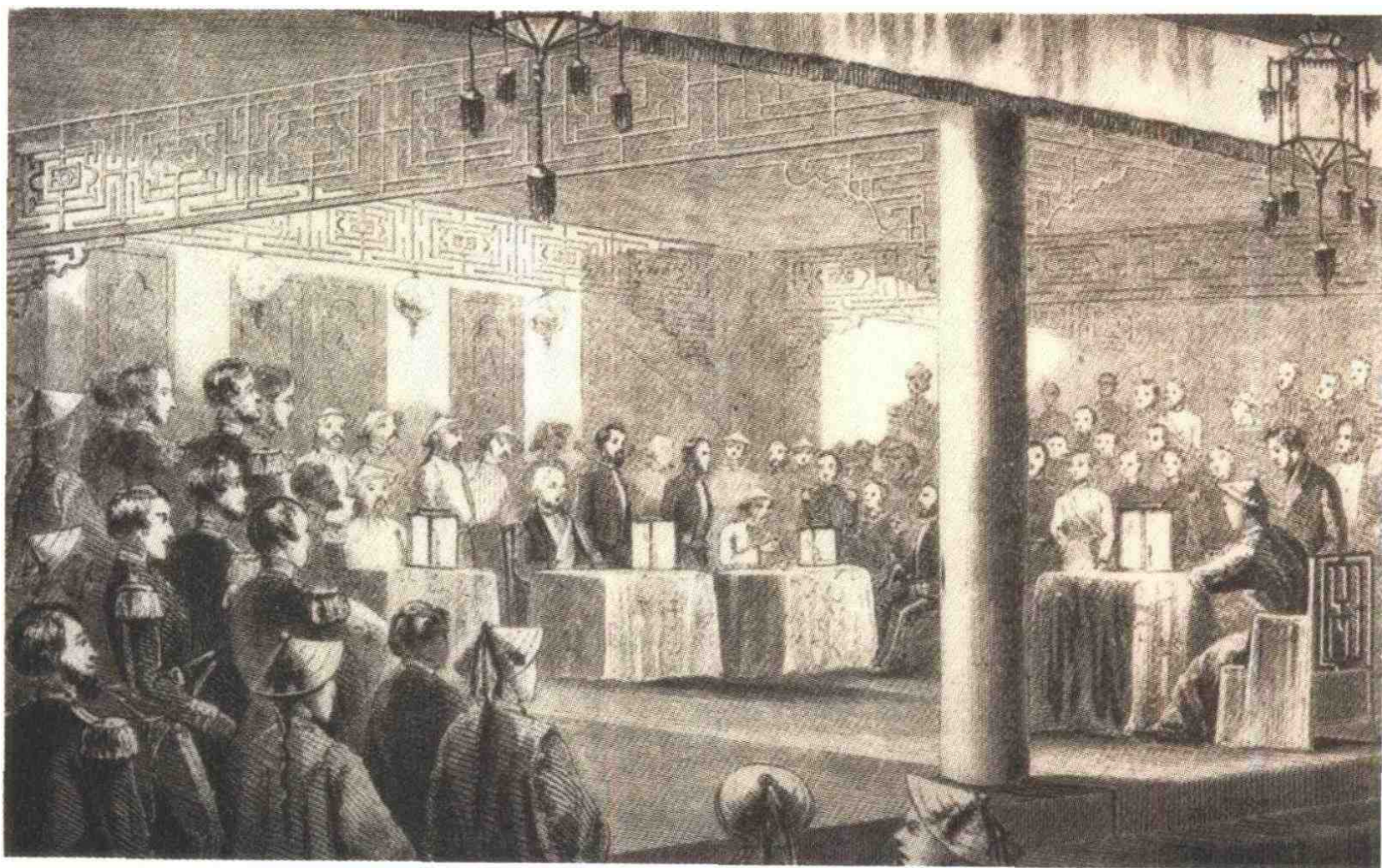
1854年通商五口中只有上海形成了当时实行统一行政管理的英、美、法三国租界。

(不久法租界独立成立了公董局)这就是后来在中国主要商埠城市中普遍援用的上海租界模式。

二、上海租界模式的扩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埠城市中租界区的开辟与拓展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6月26日、27日,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允许英法公使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1860年10月24日、25日,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归英属香港界内”。自此,中国沿海七省与长江沿岸的要害之地都已辟为通商口岸。(图2-1-5)

图2-1-5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时的情景。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在新开各通商口岸“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墓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12]当时在已通商五口中只有上海已经形成外人可将这些事务付诸实施的租界模式,于是,在新开各通商口岸及此前已开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按照上海租界模式开辟租界。据费成康统计,“在中国共出现过25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公共租界之一,即上海公共租界,系由2个租界合并而成。”^[13]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远非所有租界都得到发展,各通商口岸中的租界区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这个口岸是否具备形成近代商埠城市的人文、地理条件,取决于这个口岸的人文、地理条件能否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如上节所述,在上海开埠的前几年,早期来华外商多持短期发财的暴发心态,并不关心城市的发展;那么,不久以后,在上海的外国人已经改变了这种暴发心态,“我们应当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会使我们能够过着更加正常生活的社会。外国人到上海来住上几年,然后带着一笔财产离开的旧思想,现在正是抛弃它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将要永久住下去的地方。我们有权要求取得一切文明国家共同享有的同样自由和安全保障。”^[14]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来华外

商的短期暴发行为逐渐转变为长期居留行为,开始关注与其长远经济利益相关的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于是,经营的目标就集中在通商口岸中占据了最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的上海、天津与汉口,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三个商埠城市也就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充分、影响也最大的近代城市。与之相比,也正是人文、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广州与厦门近代城市的发展不够充分,最终只停留在发生局部变化、产生局部影响的阶段。至于其他商埠城市,与上海、天津、汉口相比,近代城市的发展就更不充分,城市的变化不太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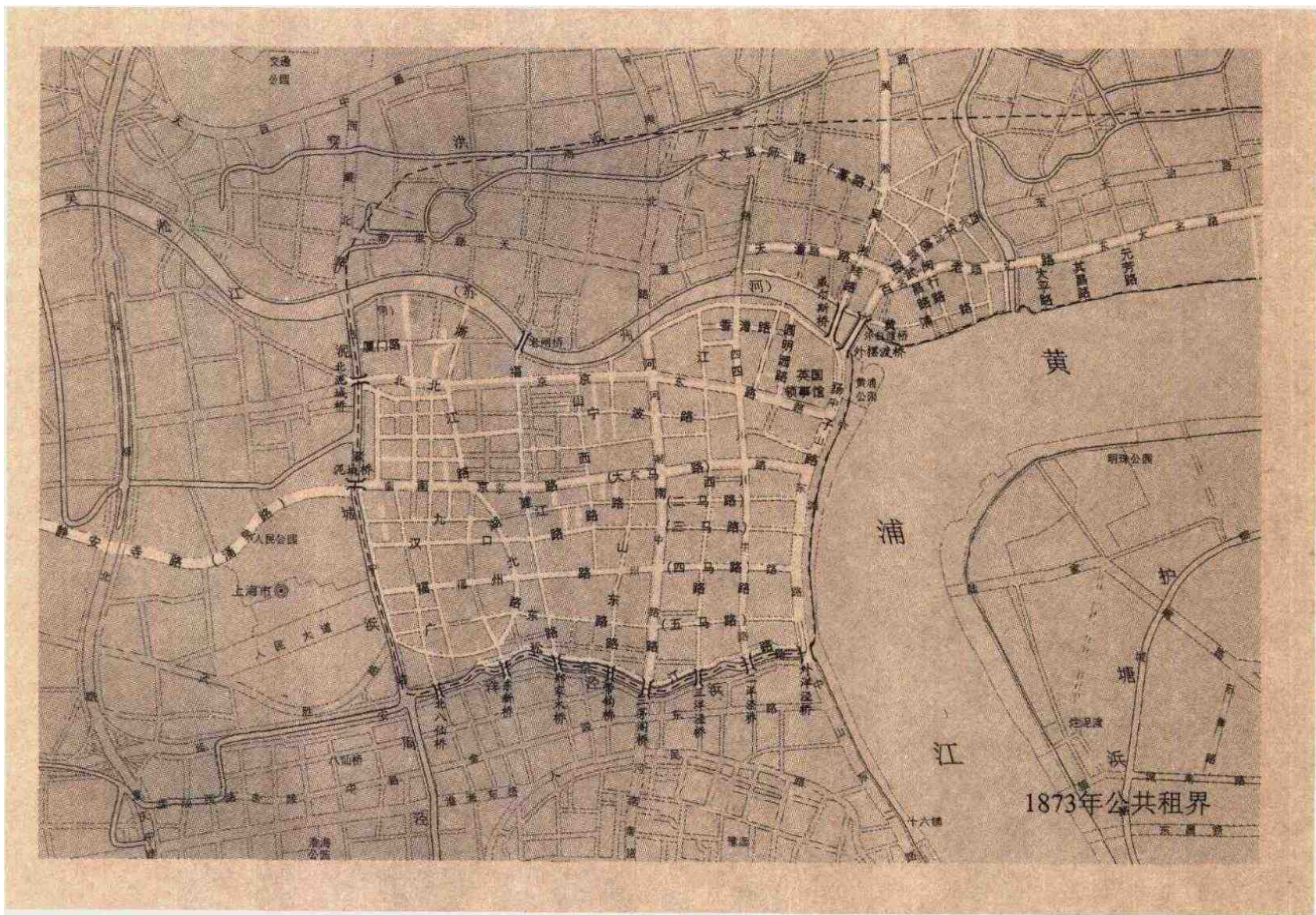


图 2-1-6 上海《1873年公共租界》。原图载《上海历史地图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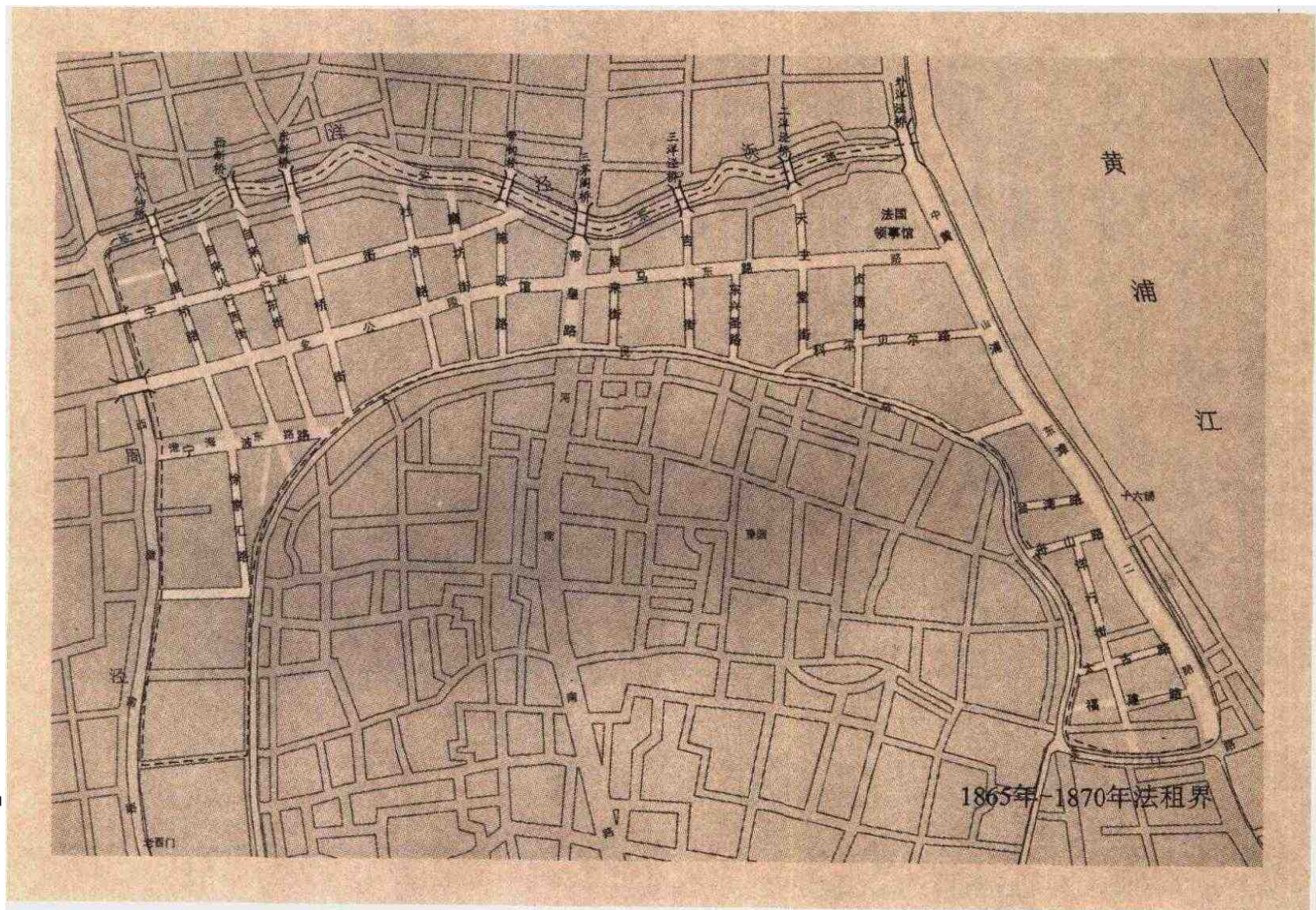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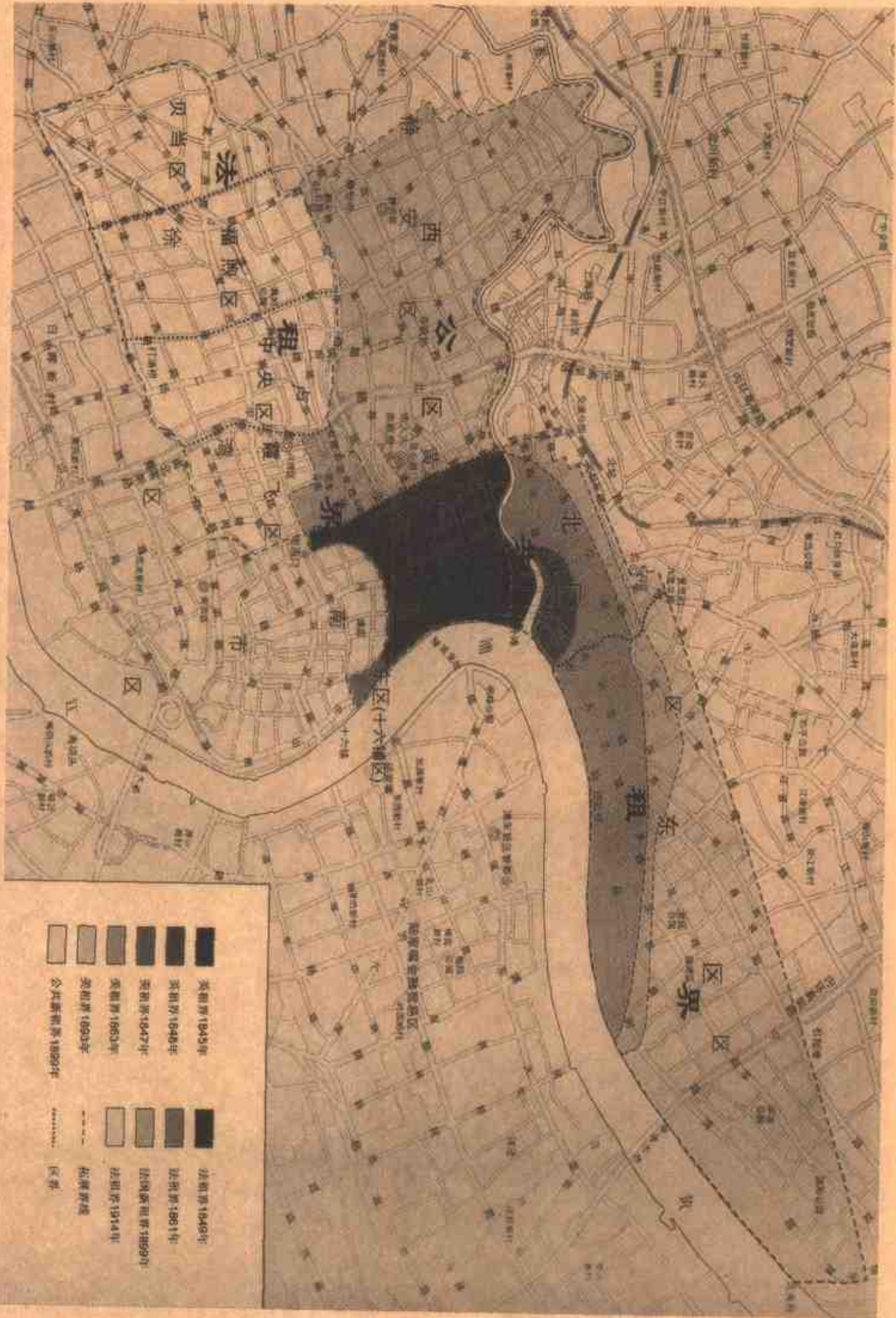


图 2-1-7 上海《1865年~1870年法租界》。原图载《上海历史地图集》。



1862年4月29日,法驻沪领事爱棠宣布上海法租界特设市政机构,使1854年以后维持了八年的行政统一的英、美、法租界解体,上海法租界成为独立的专管租界。^[15]同年3月31日,上海租界租地外人年会决定将虹口美租界并入英租界。1863年6月25日,美驻沪领事熙华德与署上海道黄芳议定了美租界的大致界址,但未具体勘定。同年9月21日,美租界租地人大会议决:“按照1862年3月31日英租界租地人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所提出的条件,立即将虹口地区的市政管理及其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移交给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16]至此,上海英、美租界合并,外人称为外人租界(Foreign Settlement),华人称为上海英美租界或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形成由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组成的租界区。(图2-1-6,图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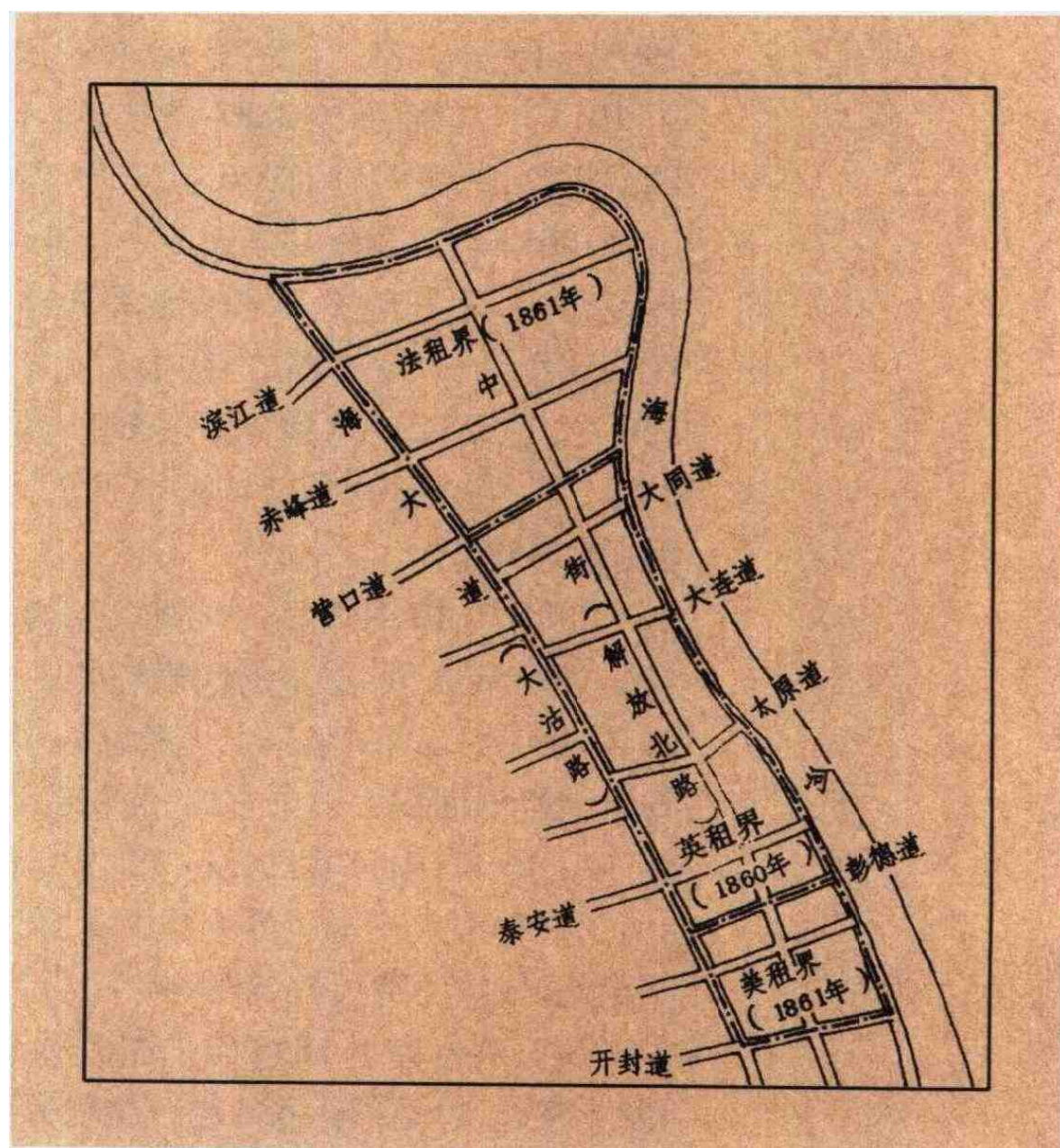
其后,上海租界区不断拓展范围。最早拓展范围的是英租界,上海英人居留地于1846年议定西界时面积为1080亩,1848年第一次拓展范围,面积达2800多亩。1893年已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的美租界也拓展范围,面积达7856亩,公共租界总面积增至10676亩。1899年,公共租界再次大规模拓展范围,总面积共达33503亩。1861年8月,上海法租界首次拓展范围,面积增至1023亩。1900年1月27日,法租界再次向西扩展,面积达2135亩。从1900年起,法租界当局陆续在租界以西地段越界筑路,1914年4月8日,北洋政府为要求法租界当局配合缉捕革命党人,与之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款》,同意法租界拓展到整个越界筑路地段,拓展面积13000亩,总面积达15150亩。至此,上海租界区的总面积已达48653亩。^[17](图2-1-8)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德都企图在上海开辟租界,但因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的势力已根深蒂固,不容他人染指而未得逞,因此上海始终只存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但其面积在以后的几次扩张后,已远远超出其他商埠城市的租界区,其近代城市的发展程度也遥遥居首位,成为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商埠城市。

1860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照会总理衙门,“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现勘得津地迤南二三里许,坐落紫竹林至下园地一方,约四顷有余,请查明津县地丁原册,立契永租,……并请转咨直隶总督,飭地方官办理。”^[18]要求在紫竹林至下园一带设立租界,即后经清廷批准开辟的天津英租界,这是天津开辟租界之始。1861年6月,法、美两国亦在天津开辟租界,计英租界面积460亩,法租界面积360亩,美租界面积131亩,三国租界在海河与京师通往海口的津塘大道(今大沽路)之间连成一片,当时称“紫竹林租界”。^[19](图2-1-9)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于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通商口岸,而此前未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德俄日三国也相继在中国开辟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全面入侵,从1900年至1902年的三年间,列强掀起一个在华开辟与扩张租界的狂潮。在此期间,俄、日、比、意、奥五国先后开辟了五个专管租界,清政府还在厦

图2-1-9 《天津早期租界区范围示意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门主动开辟了鼓浪屿公共地界。1902年正式签约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与天津租界是列强在中国最后开辟的租界。1895年10月30日中德订立《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在英租界以南海河边划定天津德租界地界，开辟天津德租界，面积1034亩。1898年9月29日，中日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开辟天津口租界，位于天津老城西南，法租界西北，东北至海河，南至墙子河，东至秋山街（今锦州道），西北界自海河边的横街河沿起直到海光寺东南角的墙子河畔，面积1667亩。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俄、比、意、奥四国借此机会，采用先军事占领，再胁迫清政府承认的方式先后在天津开辟了俄、比、意、奥四国租界。1900年12月30日，签订中俄《天津租界条款》，1901年5月正式划定俄租界，但因初时将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划入俄租界范围，引发英俄冲突，俄国将老龙头火车站及通往车站的大路让出，使位于海河北岸的俄租界分为两区，总面积5474亩。1902年2月6日，中比签订《天津比国租界合同》，在海河北岸俄租界以南开辟了比租界，面积740.5亩。1902年6月7日，中意签订《天津义国租界章程合同》，在俄租界以西沿海河开辟意租界，面积771亩。1902年12月27日，中奥签订《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在意租界以北沿海河开辟奥租界，面积1030亩。至此，奥、意、俄、比四国租界在海河北岸连成一片，加上海河西南岸的英、法、德、日四国租界，及已并入英租界的美租界，天津共有九国租界，成为外国租界最多的商埠城市。

天津最早拓展范围的也是英租界。1897年3月31日，英租界第一次拓展范围，拓展面积1630亩，总面积达2090亩。1902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称为英租界的“南扩充界”。1903年，英租界再次拓展范围，扩展到墙子河以外，称“墙外推广界”，面积3928亩，这样，几经拓展后，英租界总面积达6149亩。法租界于1900年11月20日将其西南越界筑路地段正式并入，面积约2000亩，总面积达2360亩。1931年，法租界还吞并了老西开土地476亩。日租界于1900年拓展约90亩，1903年拓展约400亩，总面积达2150亩。德租界于1901年拓展3166亩，总面积达4200亩。这样，从1897年至1903年，天津的英、法、日、德租界都大规模拓展范围，连同1900年至1902年间开辟的俄、意、比、奥四国租界，1903年，天津共有八国租界，总面积达22874.5亩。（天津存在八国租界的时间是1903年至1917年，总面积为22874.5亩，至1931年法租界吞并老西开土地476亩时，天津只有四国租界，总面积为11906亩。）^[20]（图2-1-10）

1861年初，英国驻华大使卜鲁斯派遣参赞巴夏礼至沿长江的新辟通商口岸勘定租界址，3月11日至汉口，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等人共同勘定，“汉口镇市以下街尾地方，自江边花楼巷（今江汉路口）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今合作路口）止，量得共长250丈，进深110丈（到今鄱阳街止）共合地基458亩零80弓，每年共租银92两6钱7分2厘1毫，将此地永租给英国。”^[21]3月21日订立《英国汉口租地原约》，开辟汉口英租界。面积约458亩。

1895年10月3日，中德订立《德国汉口租界条款》，划定汉口德租界地界，面积600亩。1896年由俄、法两国代表与湖北官府议定两国租界面积比例，然后于1896年6月2日，中俄签订《俄国汉口租地条款》，中法签订《法国汉口租地条款》，划定两国租界范围，规定俄租界面积占三分之二，面积约414亩，法租界面积占三分之一，面积187亩。1898年7月16日，中日签订《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开辟汉口日租界，面积约200亩。至此，汉口形成由五国租界组成的租界区，自今江汉路至黄浦路，沿长江江滨一字排开，从南至北，依次为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22]

汉口英租界于1898年扩充面积337亩，总面积达795亩。德租界于1898年扩充面积约40亩，总面积达630亩。法租界于1902年扩充面积约100亩，总面积达400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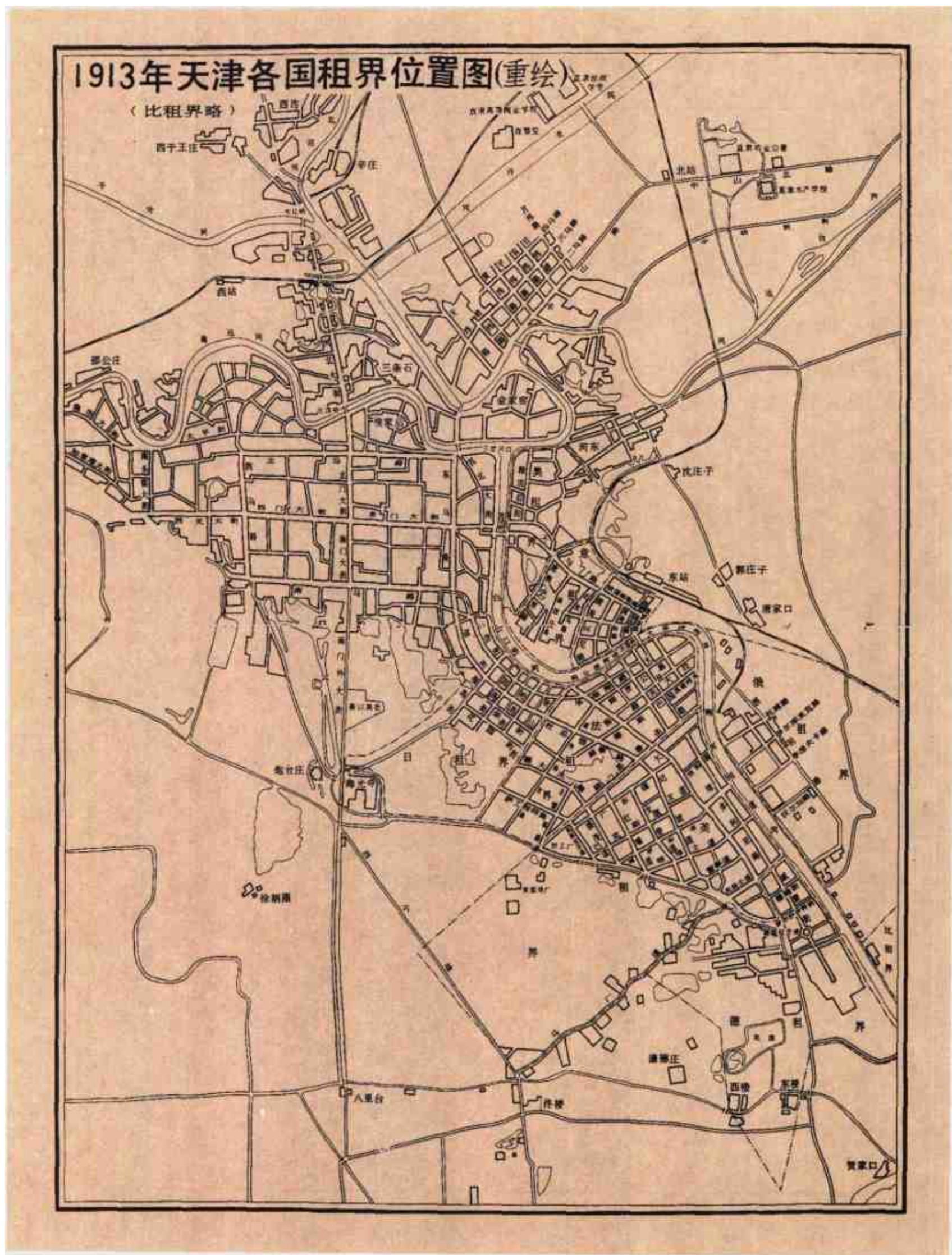


图 2-1-10 《1913 年天津各国租界位置图 (重绘)》。原图载《天津通志·附志·租界》。

租界于 1907 年扩充面积 375 亩,总面积达 622 亩。从 1898 年至 1907 年,汉口英、德、法、日四国租界共扩充面积八百余亩,此时汉口五国租界总面积约 2800 亩,已超过面积约 2000 亩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④(图 2-1-11)

与上海、天津、汉口相比,广州与厦门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与内地联系不便,其影响更多地局限于本地区范围之内,两城市租界区占地范围较小,而且其主体是与华界区完全隔开的两个小岛——广州沙面与厦门鼓浪屿,因而对整个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中国近代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广州沙面租界区为外人开发建设,人造小岛平坦规整,规划与建筑都体现了较为纯正的西方建筑风格。

汉口租界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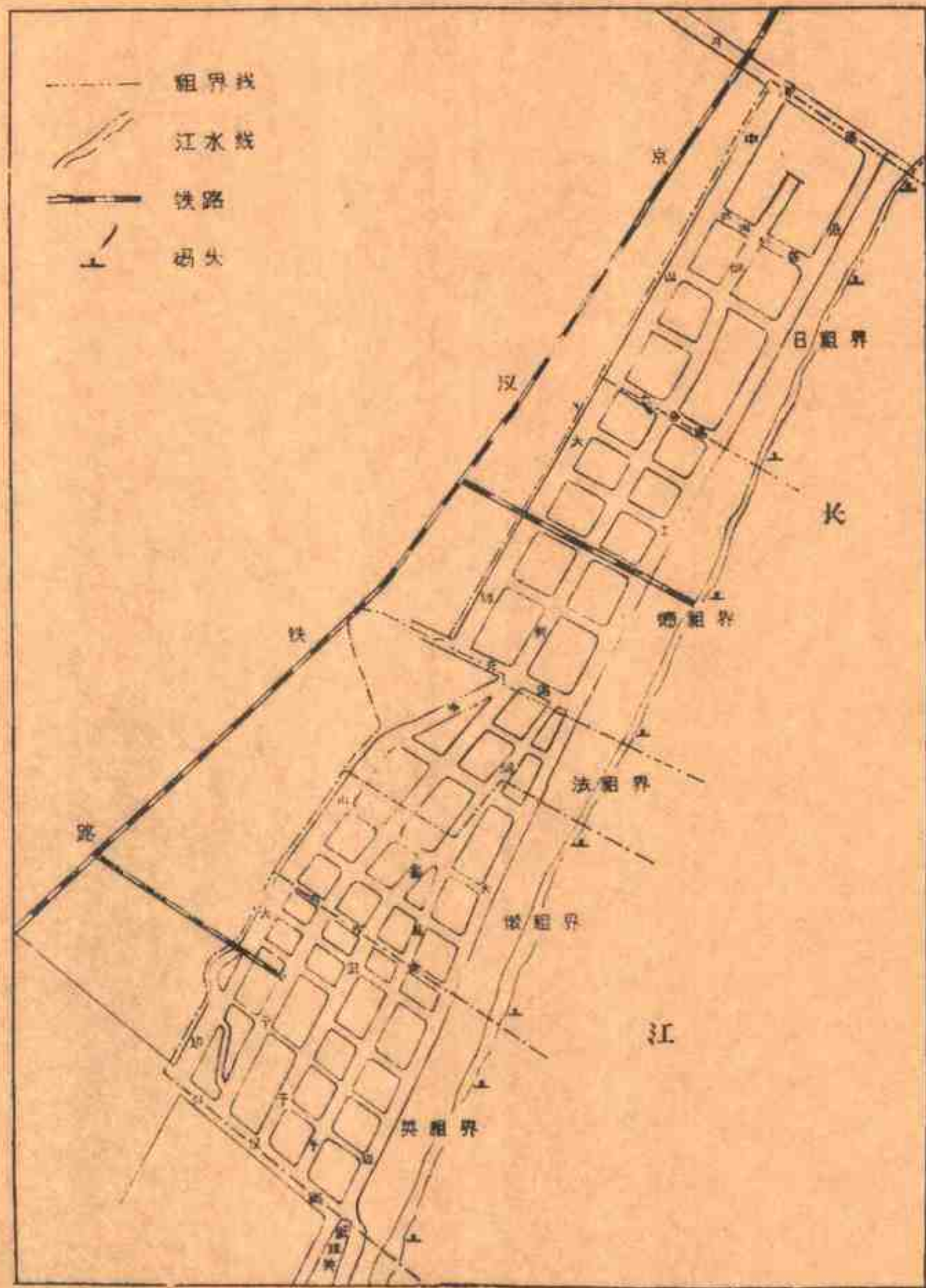


图 2-1-11 《汉口租界略图》。原图载《武汉文史资料·第一辑·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

厦门鼓浪屿四面环海,自然地形丰姿多变,岛上地势山丘起伏,规划结合地形地势,自然而生动;又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侨眷大量购地建房,除大量建造的西方建筑风格建筑外,也形成其特有的融合闽南地方建筑某些特征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在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一批熟悉对外贸易事务,也通晓外国语言的行商,前文提到的上海道吴健彰就是原广州十三行“同顺行”行商,称为“爽官”。所以广东地方政府“索性把接待外夷的差使交给一般熟悉洋务的十三行商人,既显自己尊贵,又省事。于是这些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便一跃而为中外交涉的中间人。负着对‘外人’的种种责任。”“鸦片战争以后,十三行行商虽然失去了

法律上的对外地位,不能再包办对外贸易,可是在对外关系上仍然占极重要的地位。”^[24] 1843年11月25日,英国驻广东首任领事李太郭就是与六名中国行商签订了租地合约,勘定紧邻原十三行商馆,东至西濠口,西至新豆沙街,北至十三行街,南至珠江边的土地租与外人,以后逐渐形成外商聚居的地区。^[25] 1854年12月,李文茂起义军围攻广州,英国公使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勘定十三行地区外人居留地的地界,“商人寓居地段内,宜限以西濠口为东界,以联兴街为西界,以河南为南界,以十三行街为北界。凡此界内,俱属各国商人室宇屋栈。”^[26]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十三行地区的外人居留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于1856年12月14日被焚毁。

《天津条约》签订后,已占领广州的英、法两国择定位于珠江白鹅潭畔的沙面辟为租界,以取代被焚的十三行地区外人居留地。沙面是从黄浦港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宽阔的白鹅潭可以停泊军舰,以此为基地可控制整个广州城,选择沙面与英人在上海选择黄浦江畔的英人居留地是同一个出发点——寻求在侵占的租界中得到武力保护的安全感。另一原因则是因为沙面是块水滨官地,划为租界没有业主纠纷。1859年7月12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同意英国租借沙面,并同意由广东政府承担沙面地基填埋工程,经费从《天津条约》规定的600万两广州“赎城费”中扣除,待地基填埋工程完成后再将沙面租与英、法两国。(图2-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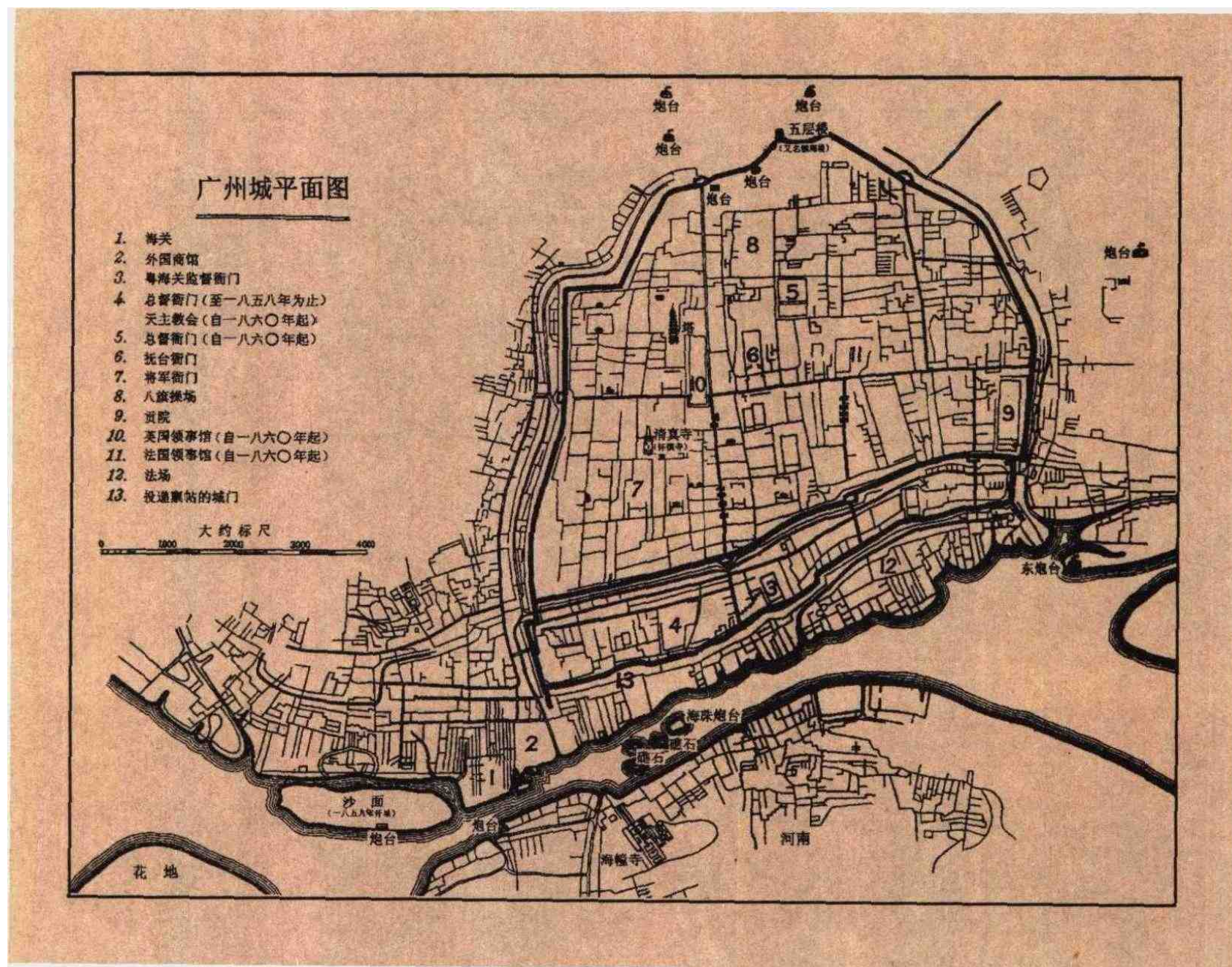


图2-1-12 《广州城平面图》,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1859年下半年,沙面地基填埋工程开工,迁走散居于沙洲上的寮民,拆毁两座城防炮台,然后在四周砌筑花岗石挡土墙,墙内填土至地基高出水面一丈余。北面开挖一条100英尺宽的人工河,亦以花岗石砌筑河岸,形成一个四面环水的人造小岛,东西长2850英尺,南北宽950英尺,面积55英亩(约330亩),小岛的东、西两端各建一桥为出入通道。整个工程耗资32.5万墨西哥元,英国分摊五分之四,法国分摊五分之一,与此相应,租界面

积英国占五分之四,约 264 亩,法国占五分之一,约 66 亩 1861 年 9 月 3 日,英、法两国官员分别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租约,从此沙面成为英、法租界。

沙面租界签订租约的次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即将英租界划为 82 区,按地段不同标价每区 3500 元至 9000 元不等,向所有在穗外人出售,共售出 52 区,获 24.8 万元。其余未售出地段由英国政府收购,用于建造领事馆、教堂等。至 1856 年,沙面英租界初具规模,英国领事馆亦于该年迁入沙面新馆

沙面法租界起步较晚。1863 年,法国正在原两广总督署的地皮上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即石室天主教堂,至 1888 年才告竣工。石室天主教堂竣工后,法人才开始沙面法租界的经营,在沙面建造领事馆及东方汇理商业银行广州分行 1889 年 11 月 6 日,法国政府亦拍卖沙面法租界土地。其后,沙面法租界也开始大规模建设。^[27]

沙面虽由英、法两国分占租界,但在建设之初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设置一条横贯全岛的东西主干道贯通全岛,又设五条南北道路,将全岛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十二区,每区又划分为若干的小区,共计 106 个小区。岛的南面临珠江的地段是公园与运动场,因此,整个沙面道路规整,绿地面积大,又得临江地利,环境十分优美。(图 2-1-13,2-1-14,2-1-15)

图 2-1-13 广州《沙面未租借前及被强据后之图形》。原图载《沙面特别区署成立纪念特辑》,转引自《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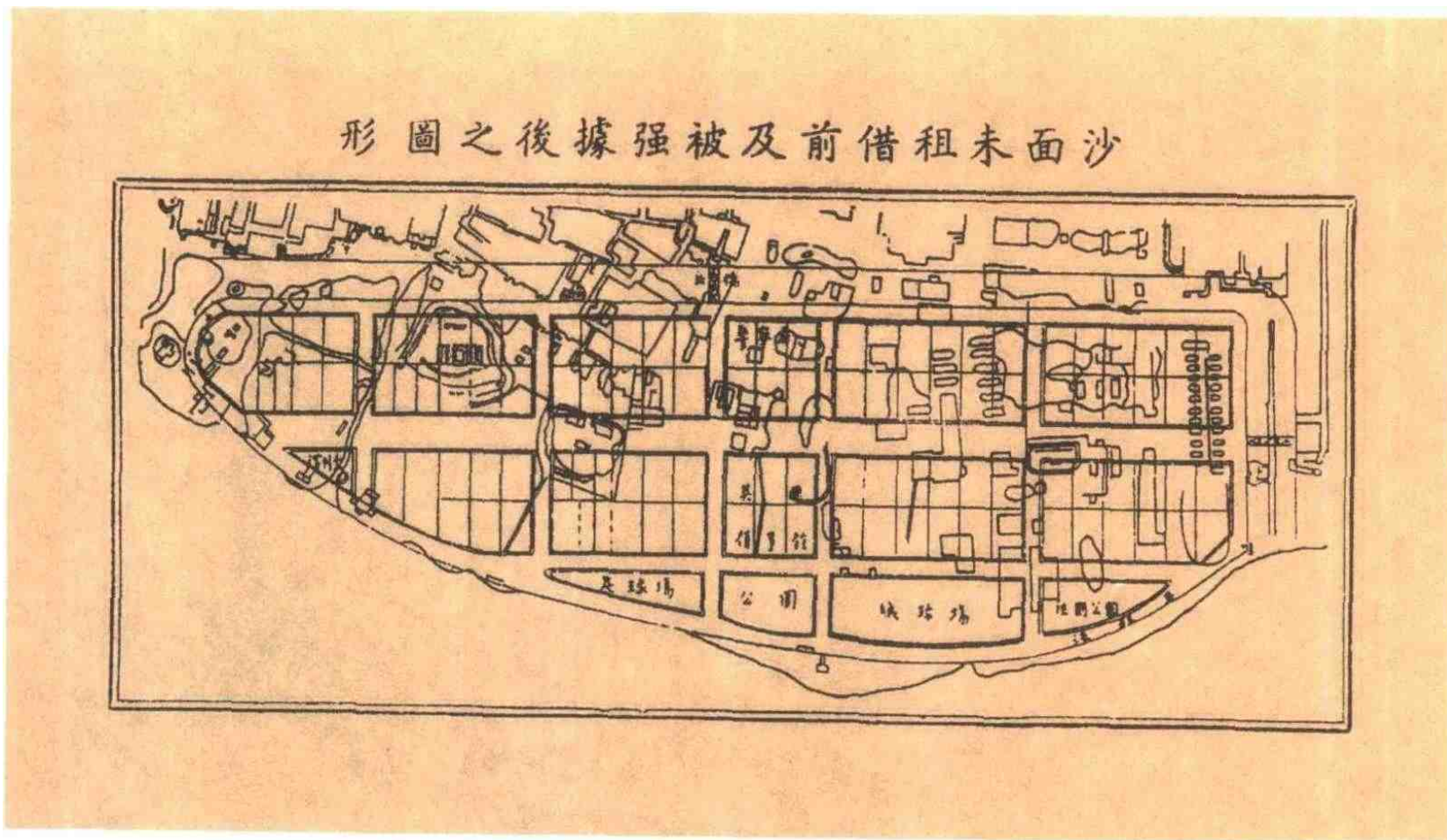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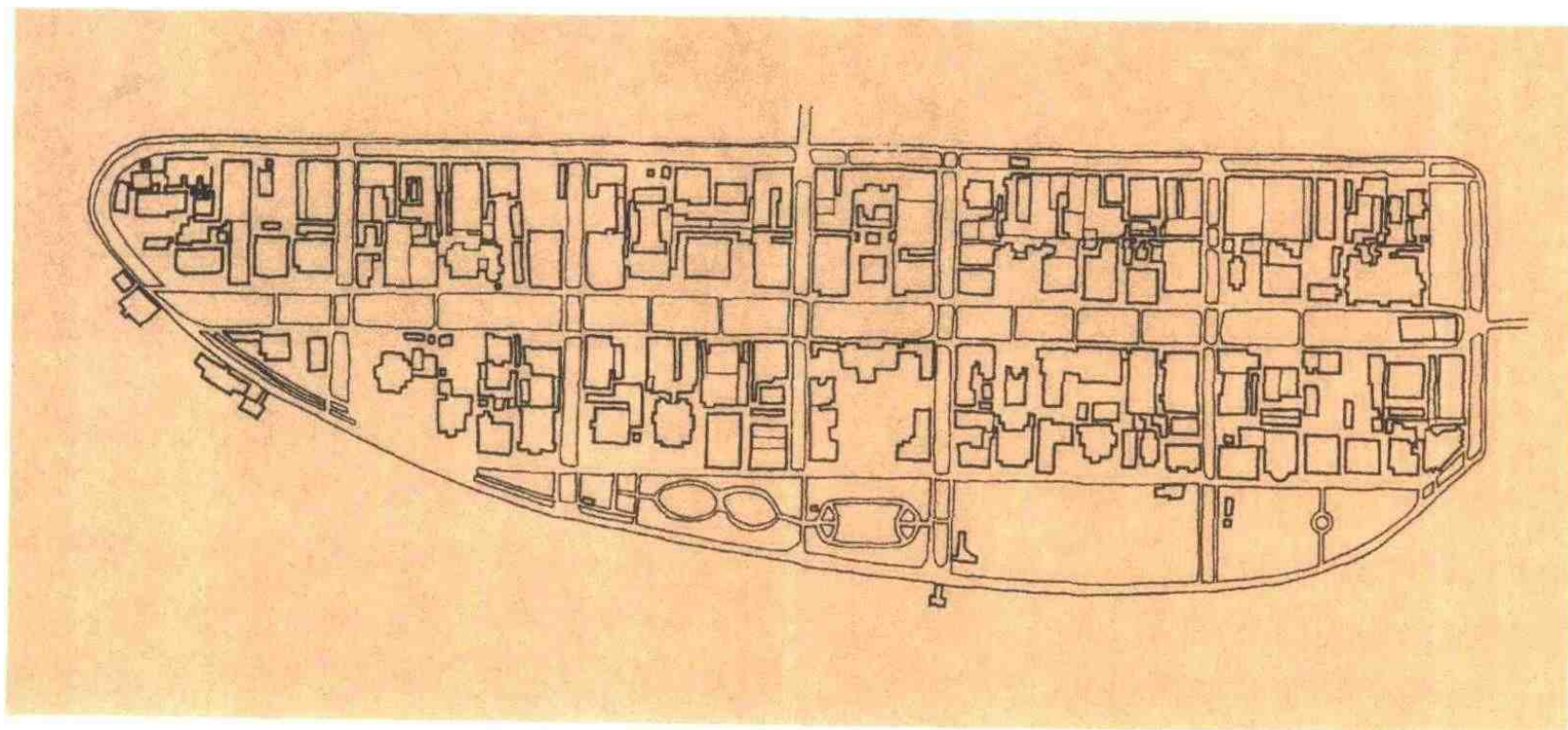


图 2-1-14 广州《沙面之地形图(根据 50 年代测绘图绘制)》。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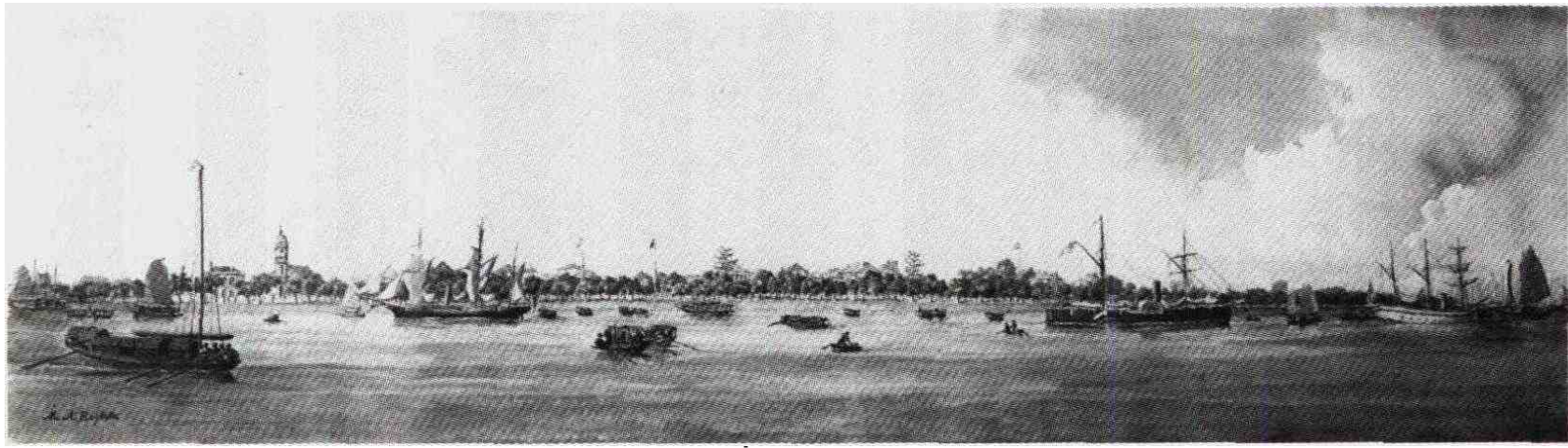


图 2-1-15 水彩画《沙面远眺》。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1843年11月厦门开埠后不久,因英领事记里布擅自入居当时为英军占领的鼓浪屿,清政府恐英人于1845年按约撤军后继续占据该岛,遂于1844年与英领择定城南较场及水操台废址为英人居留地基址。但此后英人并未在此租地建屋。至1852年,闽浙总督季芝昌令与英人交涉,于1852年2月9日签约另择乌空园至头巾礁一带的海滩为英人居留地。

1900年8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厦门登陆,这一侵略行径侵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从8月29日起,英、美等国军舰先后赶赴厦门,迫使日军从陆上撤退。美驻厦门领事巴詹声并向厦门中国驻军提供军饷一万元,以平息即将爆发的兵变。于是,闽浙总督许应骙接受巴詹声的建议,将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以杜绝日本独占厦门的野心。初时所拟条款尚保留清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警察权,至1902年1月10日厦门道延年与日、英、美、德、法、西班牙、丹麦、荷兰及瑞典挪威联盟等九国正式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后,全部由外人控制的鼓浪屿公共地界工部局成立,清政府对其主动开辟的鼓浪屿公共地界已无任何管理权,鼓浪屿公共地界已成为公共租界。^[20](图 2-1-16,2-1-17)

1861年2月,中英签定“永租地基”的批约,开辟镇江英租界,面积156亩。同年3月,中英签定《九江租地约》,开辟九江英租界,面积150亩。^[21]1895年以后,又在一些商埠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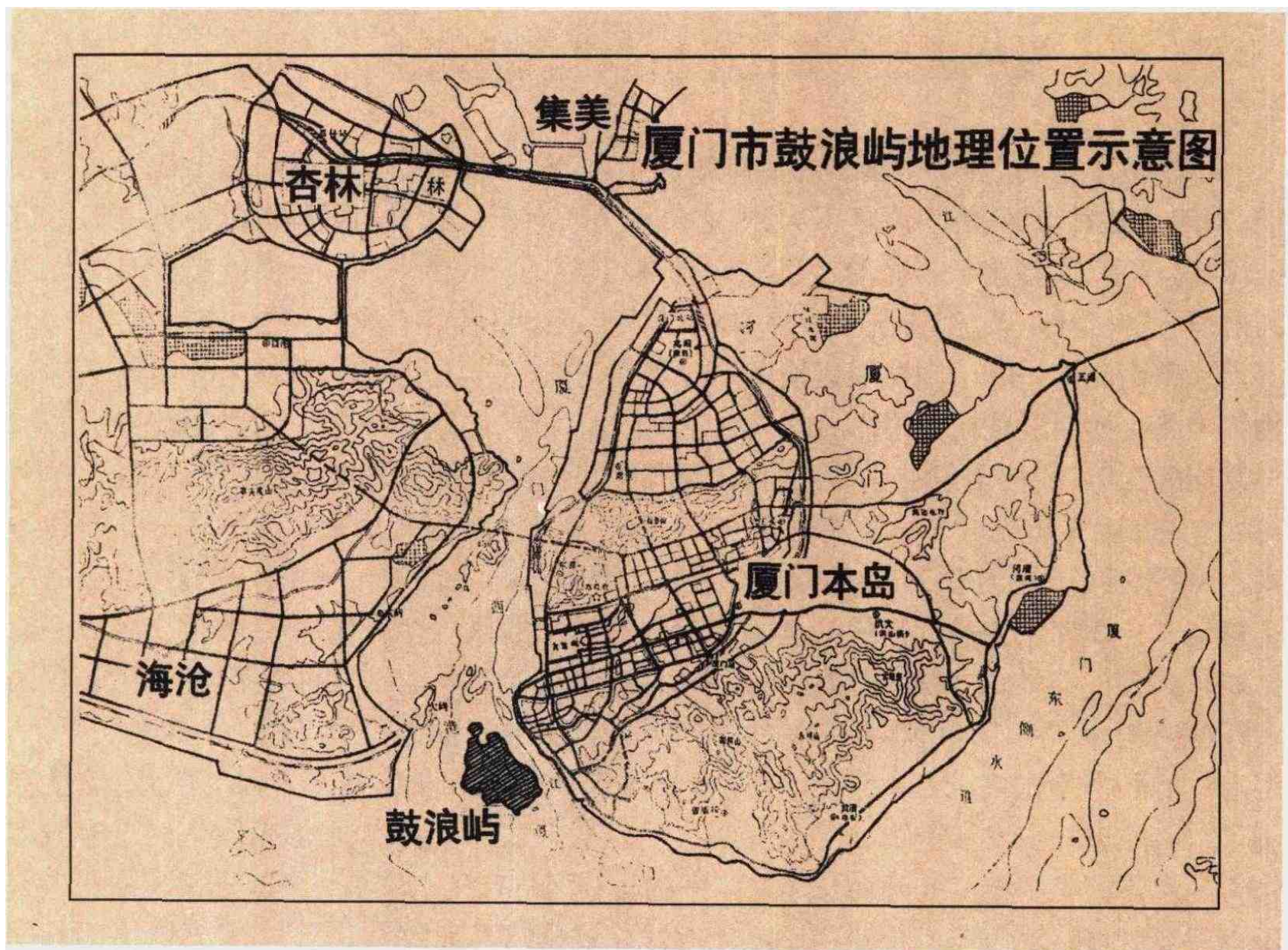


图 2-1-16 《厦门市鼓浪屿地理位置示意图》。原图载《鼓浪屿建筑艺术》。

市相继开辟租界,1897年3月5日,签订《苏州日本租界章程》,开辟苏州日租界,面积约483亩。同年5月13日,签订《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开辟杭州日租界,面积约900亩。1898年8月18日,签订《沙市口日本租界章程》,规定沙市日租界范围。1899年10月25



图 2-1-17 《鼓浪屿鸟瞰》。原图载《鼓浪屿建筑艺术》。

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规定厦门日租界范围。同年4月28日,签订《福州日本专用租界条款》,规定福州日租界范围。但沙市、厦门、福州日租界只签条款,实际上并未开辟这三处日租界。^[30]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约》,规定重庆辟为商埠,1891年重庆开埠,同年9月24日,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在长江边开辟重庆日租界,面积701.3亩。^[31]这些租界面积很小,发展也很不充分,对这些城市,及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影响不大。

第二节 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天津与武汉的发展

一、上海——以租界区为主体、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商埠城市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中国沿海海岸线的中点,长江入海处的南岸。城市扼守长江咽喉,黄浦江横贯市区,港口终年不冻,较之每年冬季有一二个月出现浮冰的北方港口城市天津、青岛等,及夏季台风频繁侵袭的南方港口城市广州、厦门等,上海港都具有更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上海是沿海贸易的天然中点。1843年,有一位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上海是来自南北港口的中国帆船运输业的分界点;它还充当了来自中国两个主要地区的货物集中和交换而设置在中国沿海的最主要集散地。”^[32]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带的顶点,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连,通过长江及其支流与整个长江流域紧密相连,从近代中国对外交往、对外开放——尽管是被动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实现的——的视角考察,上海无疑占据了最重要的地理位置。开埠之前,上海的这种潜在的地理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清代形成的全国性市场网络体系中,上海的货物吞吐量已居沿海港口城市之首。但是,当时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在苏州,上海只是苏州的外港,港口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苏州的米市服务的。而且,在清政府把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地的情况下,上海港只能服务于国内的商品流通,更富有发展前景的国际贸易基本上没有展开,这就限制了上海的进一步发展。”^[33]真正使上海发生巨变,使之从传统农业城市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型的主要因素是上海的开埠及随之而来的租界区的产生与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侵占租界的侵略动机与其促进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实际效果并不完全一致,正如马克

恩在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造成的印度社会革命时所言：“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4]正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帝国主义列强使开埠后的上海真正发挥了其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的优势。

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从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视角这样分析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原因：“世界其他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商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地都市化的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上海，除它本市范围以外，从未行使任何行政机能。作为上海贸易基础的中国经济体制，还不是一体化或商业化，而铁道呢，大概仍然是最值得注意的中国所缺乏的东西。但是上海位于靠近长江三角洲朝海的一边，属于一个大江体系的许多源远流长的水道就在这里汇集，中国的海岸也在这里向公海伸展到最远处。于是外国商人所要运销海外的远近不同地区所生产的物品，可以经由上海出口；另一方面，装运到中国的洋货可以经由上海分发到广大无边的地区。因此，上海实际上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而长江流域却拥有人口最为密集、物产最为富饶的半个中国。不但贸易经此个城市在川流不息地进行，而且上海也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各家银行为中国政府筹措资金，也为本市的经济活动，为遍布半个中国的上海商业后方基地，为所有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筹措资金。这些银行所控制的金融“照极保守的估计占华洋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九十”。（原书注：《费正清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况报告书》（R.C. Feethan, Report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第

叁卷，第306页）借助于在贸易上赚到的洋商和华商资本的累积，二十世纪制造工业在本市突飞猛进，随着制造工业的发展，尽管大多数工业原料为当地所没有，上海能够成效卓著地与其他工业制造中心竞争，因为来自远方的工业原料的水路运输便利，成本低廉。最后，上海的四百万人口的粮食，主要仰给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所生产的大米。”^[15]

开埠后不到一百年，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从一个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埠城市，这一过程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所以罗兹·墨菲说：“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16]近代上海是以租界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商埠城市，城市的发展也正是随租界区的开辟、拓展与建设，随殖民者将十九世纪西方流行的城市与建筑模式移植到上海而发展起来的。

上海城市发展的早期（1843~1900），正值西方列强各国处于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阶段，上海的城市发展也就建立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1844年，即开埠后的第二年，已有英商在英人居留地界内租借土地，至1844年5月，已有八家英国洋行——宝源（又称颠地洋行）、怡和、和记、仁记、义记、森和、裕记、李百里——租借了1至9号土地。^[17]这些商行大都是上海开埠后从广州迁至上海的，“第一批开设在黄浦滩边的外国商行大都就是以前开设在广州的商行，当中的大多数也就是至今闻名于上海的那几家老行。”^[18]十年后的1854年，上海的外商洋行已增至120余家，洋行建筑多半坐落于英租界外滩一带，至1876年前后，洋行总数已达200余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有

图 2-2-1 《1857 年上海黄浦滩全景》，根据悬挂在中日贸易公司 (China & Japan Trading Co.) 纽约办事处内的中国某画家的绘画印制。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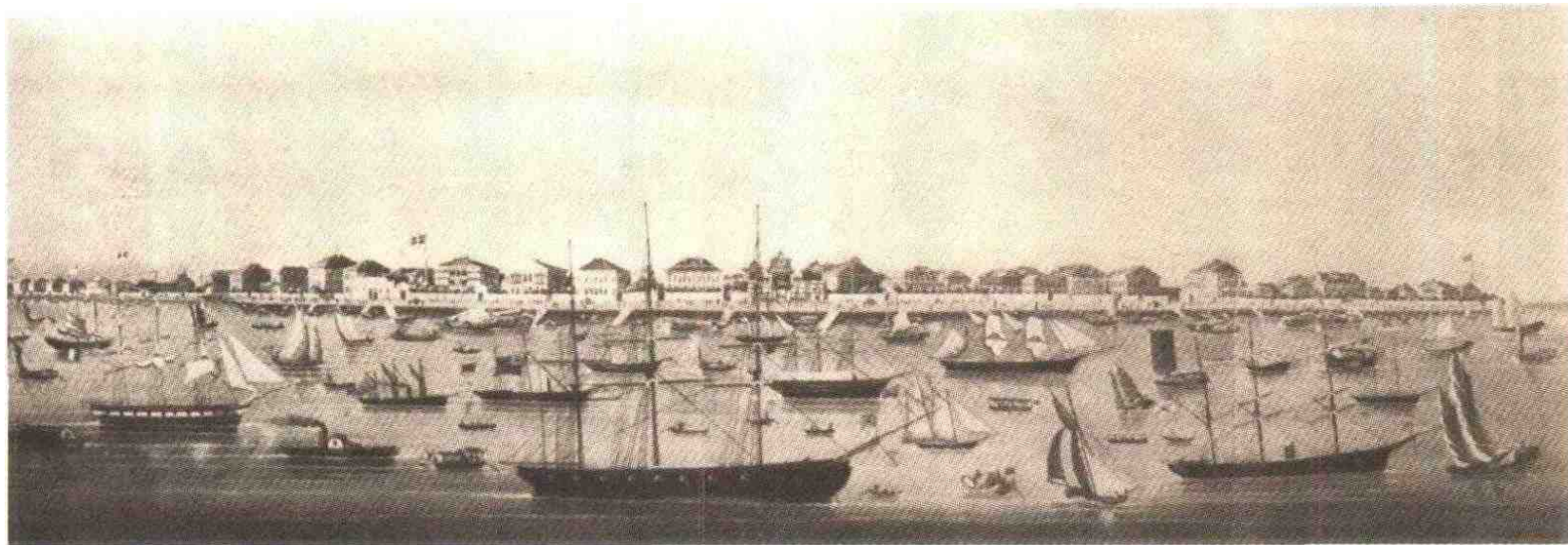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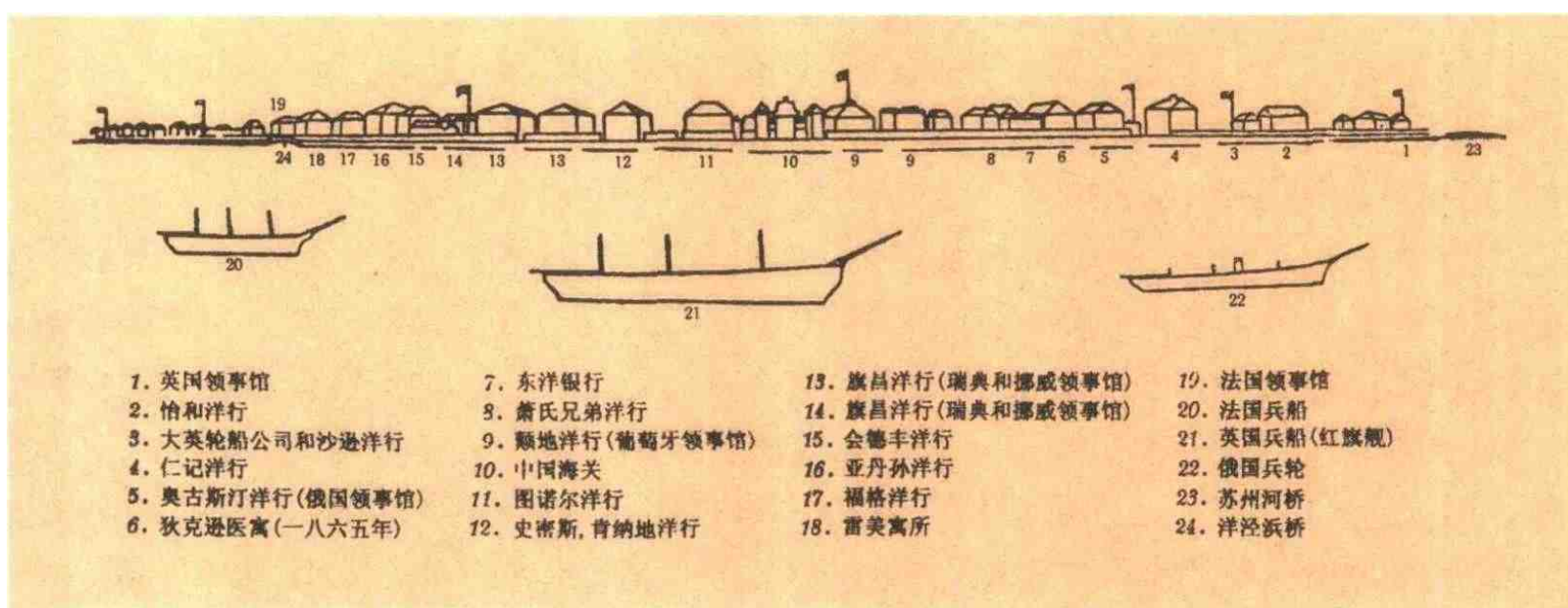


图 2-2-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所载《1857 年上海黄浦滩全景》图中的建筑、桥梁及外国兵船名称一览表图。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洋行 1145 家。^[39](图 2-2-1, 2-2-2)

随着外滩滩涂的改造、外滩沿江大道的修筑及最早的一批洋行与住宅的建设,上海英人居留地逐渐呈现早期仿西方城市的面貌。但促使城市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战争,是由战争引起的华人、华资大量进入英人居留地,及由此导致的英人居留地“华洋杂居”时代的开始。“从 1843 至 1853 年在这些小居留区内,除中国雇员仆役或服务行业外,一般不让中国人居住。中国居民在 1853 年初估计仅五百人,但到 3 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出现了大批难民。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立即在外滩露宿或住进码头边的小船上;席棚、店铺和廉价住宅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后春笋那样涌现,以容纳这些人;于是外国居留地很快变成了一个中外杂居的城市。逃避太平军的难民不仅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有钱有地位的地主和商人家庭。在以后十年中,被迫离开家乡的绅士加入到上海社会中来,从而加速了长江下游的地主家庭与外国的接触和贸易往来。这样,在西方商人和中国统治阶级分子之间便出现了某种利害与共的关系。在上海租有土地的西方人,现在通过把土地转租给不动产经营者和建筑业者而获利。到 1854 年年中,在一百五十栋外侨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约八千所(引者注:八千所应为八百所之误)中国住户。”^[40]战争造成的动乱局势促使大量华人、华资进入相对安定的、生命财产有保障的租界,这是中国近代建筑史阶段对上海及对其他商埠城市的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重演,这一次是太平天国及小刀会的战事,在以后的百年中则是其他种种战争。来到上海,来到其他商埠城市的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像上海这样最后发展至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不可能只靠少数外国人就能够发展起来,在商埠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华人、华资都起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罗兹·墨菲统计,1860 年上海的外国侨民尚不到 1000 人,至十九世纪末,外侨人数的增长都很缓慢,直到 1936 年,上海的外侨也只有 60000 人,而此时上海的总人口数已超过 300 万。^[41](表 1,表 2)1854 年华人进入英人居留地是

原书缺页

上海城市发展的转折点,这把促进上海城市发展的双刃剑也导致早期租界区西方田园式建筑模式的结束,及上海特有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石库门里弄住宅的诞生。早期英人居留地的建筑,其建筑密度很小,“当时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极其简单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种植各种花树。”^[42]但是随 1860~1865 年间中国难民的大量涌入,“上海先生们发觉从这片泥滩所能取得的利益比运货物到外国去更快并更大,地产交易便立刻异常发达,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以前没有人要的地皮,此刻都开辟起来,划为可以造屋的地盘。难民需要住屋,上海先生们便立刻加工赶造起来。租界范围以内的空地,不多几时便卖得分寸无存。到了后来实在没有地皮可卖,便把自己行址四周的墙垣拆去,将行屋以外的空地也一起卖掉,而地价也一天比一天涨上去。他们后来甚至跨出租界的界限,向乡下人买进空地,转卖出去,地价因此愈加高涨。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英国领事公馆也仿效着旁人的行为,将领事公馆里边的空地也卖了一部分出去。”“这就是贵族独占式的上海之末日,也就是成为一个未来的大都市的起点。以前一片荒芜的空地,现在已成为纵横界划的街道,密排着匆匆赶造起来的低次房屋。”^[43]此时租界区内大量建造的联排式简易木板房,首次将西方联排式住宅模式与住宅商品化经营模式带入中国,成为后来在上海、汉口、天津大量建造的里弄住宅的前身,而为谋利而变卖地产的商品化行为则成为早期租界区的田园风貌转化为拥挤的商埠城市景观的滥觞。

1858 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及 1860 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这使上海成为长江流域商品的集散地。“自从扬子江的航路开放,外国货物又顿时增加了许多的推销场地,而中国土货也能大批的运到上海,加入国际市场。上海则在两者之间坐收其利。”^[44]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上海的金融、工业、对外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兴起。开埠之后,为适应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上海。总部设在伦敦的英国丽如银行于 1845 年第一个在上海开设分行。随后,英国有利银行(1854)、麦加利银行(1858)、汇丰银行(1865)、德国德华银行(1890)、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893)等,都在上海开设分行。其中对后来中国金融具有重要影响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发展更是极为迅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形成由它统治的金融体制。^[45]交通运输业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轮船航运业。最早进入上海的是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其后又有法、美、日、德等国的轮船公司参与竞争,开辟了上海至世界各地的航线,把上海逐步纳入世界交通网络,使之成为对外、对内经济联系的枢纽城市。在航运业的带动下,上海的港口码头设施建设逐步展开,形成了北起虹口、南至法租界与上海县城交界处的沿江码头仓栈区。1890 年,进入上海港的船只增加到 5853 艘,吨位达 544.3 万吨。上海近代工业的兴起也与航运业相关,1853 年英商设立以修理船只为主要业务的董家渡船厂,以后又开设上海船坞、耶松船厂等。稍后,纺织、印刷、公用事业、制药、饮食、卷烟等工业也开始发展。到 1894 年,上海外资工业投资额为 975.2 万元,共 45 家企业。但总的来说,工业尚未成为外资投资的重点,其规模也不大。^[46]这一时期,上海也出现了中国资本的近代工业企业,官办工业有 1865 年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民族工业有 1869 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发昌号机器厂,1890 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机器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同时还创办了机器缫丝厂、造纸厂、面粉厂、火柴厂等企业;1873 年在上海正式开局的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轮船运输企业。

租界区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是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除修筑马路、建造桥梁外,还引进了各种近代公用设施。上海最早的近代公用事业是 1864 年建立的英商大英自来火房(后改名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与 1865 年建立的法商自来火房,1881 年上海

自来水厂、1882年上海电光公司(发电厂)也相继建立。1882年,上海开始使用电话。1871年,俄丹大北电报公司把横贯欧亚的海底电缆从日本长崎接至上海,又从上海接至香港,当年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营业通报。1882年,天津至上海的有线电报开通,1884年又有苏浙闽粤线、长江水底电缆两大干线开通,电报总局也随之迁至上海,使上海成为全国电报网的中枢。^[47]

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种类型的西方建筑也被移植到上海,早期上海近代建筑的主要建筑类型是洋行、银行建筑,教堂建筑,外人自住的独立式住宅建筑,及联排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建筑风格则以洋行、外人住宅等的殖民式(Colonial Style)建筑风格;教堂建筑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及石库门里弄住宅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为主。(图2-2-3,2-2-4)

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开设工厂、修建铁路。190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外商的大量投资使上海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上海的民族工业也有发展。其中公用事业和棉纺织等轻工业发展较为迅速,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也开始起步。1909年,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同年,沪杭铁路也建成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铁路的开通使上海的对内经济联系范围从长江流域扩展至华北地区。

1900年以后,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先后大规模拓展范围,租界区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至1914年法租界最后一次拓展范围为止,上海租界区的总面积已达48653亩(32.4平方公里)。1914年,华界区拆除上海县城城墙,修筑环城马路。此前,华界区已于1901年、1902年先后成立电灯公司与自来水公司,在租界区的影响下,华界区也开始加快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1900年以后,一批正宗的外国建筑师事务所活跃在上海建筑舞台,“其中最著名的有通和洋行、玛礼逊洋行、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新瑞和洋行、安利洋行、倍高洋行(Becker & Baedeker)、思九生洋行(Stewardson & Spence)、马海洋行(Moorhead & Halse)等,日本建筑师平野勇造和福井房一也十分活跃。”^[48]20世纪20年代,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也开始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但此时尚处创业初期,他们在建筑舞台上大展身手的时间是在1927年以后。

这一时期上海的工业建筑增多,豪华的银行建筑成为重要的建筑类型,高大的公共建筑——海关、办公楼、饭店、教堂等不断建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商业建筑的集中建造,在租界区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城市中心已从旧城区转移到租界区内。上海的外滩这一时期已高楼栉比,成为办公银行建筑集中建造的地区,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形式的汇丰银行(1923)、上海江海关大楼(1927)是这一时期建造的重要建筑。南京路上陆续建造大



图2-2-3 1880年的上海外滩街景。鸦片战争前,沿黄浦江岸从小东门直达吴淞江北岸的南北向道路,是黄浦江中航行的船只的纤夫通行的纤道。随租界区的设立,外滩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纤道重修,道路加宽。1874年以后,除行驶马车外,还出现了人力车。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2-2-4 1894年的上海南京路。图为上海万国商团轻骑队巡经南京路,摄于1894年。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2-2-5 1923 年的上海外滩。图中可见汇丰银行新楼正在建造之中。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2-2-6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型商业娱乐建筑,随着先施公司(1917)、永安公司(1918)、新新公司(1925)、大世界(1925)等商业娱乐建筑的陆续建成,南京路一带成为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图 2-2-5,2-2-6)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也是上海近代建筑发展的鼎盛期。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 7 月成立上海特别市。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中心南移。前者对天津、北京、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天津失去了“京师屏障”、首都门户及北洋政府“后台”的特殊政治地理地位,与上海相比城市发展势头减缓;北京从京城改为北平特别市,自此城市发展缓慢;南京则开始了大规模的首都建设,使之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发生巨大变化。后者则使上海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试看下表:^[49]

从表中可以看出,1925 年北洋政府时期首都在北京,所以有 23 家银行的总行

1934 年以前的中国银行行业地区分布情况

城 市	总行数	
	1925 年调查(1)	1934 年统计(2)
上 海	33	59
天 津	14	10
北 平	23	1
汉 口	7	2
重 庆	1	8
广 州	1	5

原书注:(1)参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 13 页表。(2)参见《1934 年全国银行年鉴》,A5 页表。

在北京,14 家在天津,合计达 37 家,上海为 33 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 1934 年,只有一家银行的总行在北京,天津则还有 10 家,上海已增至 59 家。“1928 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同年又将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行迁往上海。有些商业银行根据新的形势也将总行迁上海,如 1931 年的新华银行,1932 年的中国实业银行,1935 年的盐业、金城银行等。”“国民政府建立后的上海已确立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时的上海,资金的集散、吞吐作用进一步增强,同各地的金融联系越益广泛,承担金融服务的条件更加具备,金融的辐射功能十分显著。这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上海所不能比拟的。”^[50]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更促进了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1927 年至 1937 年,上海城市进入超常规发展的时期,外滩、南京路一带仍继续建造高大建筑。1928 年从北京南迁上海的中国银行总行筹资在外滩建造新楼,1937 年建成,原设计为 34 层、100 多米高的上海第一高楼,后改为 17 层、76 米高,总建筑面积已达 32548 平方米。沙逊大厦(1928)、华懋饭店(1929)、百老汇大厦

(1934)、大新公司大楼(1934)等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代表性建筑,1937年建造的永安公司新楼已高达21层,而四行储蓄会投资于1934年建成的国际饭店为24层钢结构高层建筑,全高86米,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在法租界西部与公共租界西部即今卢湾区西部与徐汇区、静安区一带逐渐形成高级住宅区,建造了大批新式里弄住宅及有产者自建的独院式花园洋房住宅。后者占地大、房间多、装修豪华,建筑形式则随业主爱好各异,如英国半木构建筑形式的沙逊别墅(1932)、现代主义建筑形式的北京西路333号住宅(1937)等。这一时期还建造了一批高层公寓,如十六层汉弥尔登大厦(1933)、十一层河滨大厦(1933)、十六层毕卡迪公寓(1934)及十八层峻岭公寓(1935)等,前面提到的百老汇大厦已高达二十一层。(图2-2-7,2-2-8,2-2-9,2-2-10)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建筑界亦掀起“吾国固有之建



图2-2-7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外滩。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图片。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图2-2-8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外滩。20世纪40年代外滩没有建造大型建筑,其时上海外滩的建筑风貌于1937年抗战前已基本形成。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2-2-9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其时大新公司尚未建造。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2-2-10 1936 年以后的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于 1936 年建成开业，至此，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公司均告建成开业，南京路商业中心区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筑形式”的探索热潮，此时，上海的中国建筑师队伍已经壮大成熟，他们就是这一探索的主力军。中国建筑师还于 1927 年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出版《中国建筑》杂志，上海建筑师亦于 1931 年成立上海市建筑协会，出版《建筑月刊》杂志。1927 年国民政府确定上海为特别市后，同年成立设计委员会，1929 年提出上海新市区都市计划，避开租界另辟新区，中心建筑群采用中国传统轴线对称的规划手法，并明确要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形式，但规划未能实施，只开辟了几条道路，建造了几幢行政建筑，如旧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等。（图 2-2-11, 2-2-12）

这一时期上海西方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仍有建造，如南京大戏院（1930）、三菱银行（1934）等。受西方建筑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沙逊大厦（1929）、国际饭店（1934）、大光明电影院（1928）、百老汇大厦（1934）等都是这种



图 2-2-11 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鸟瞰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六期,1933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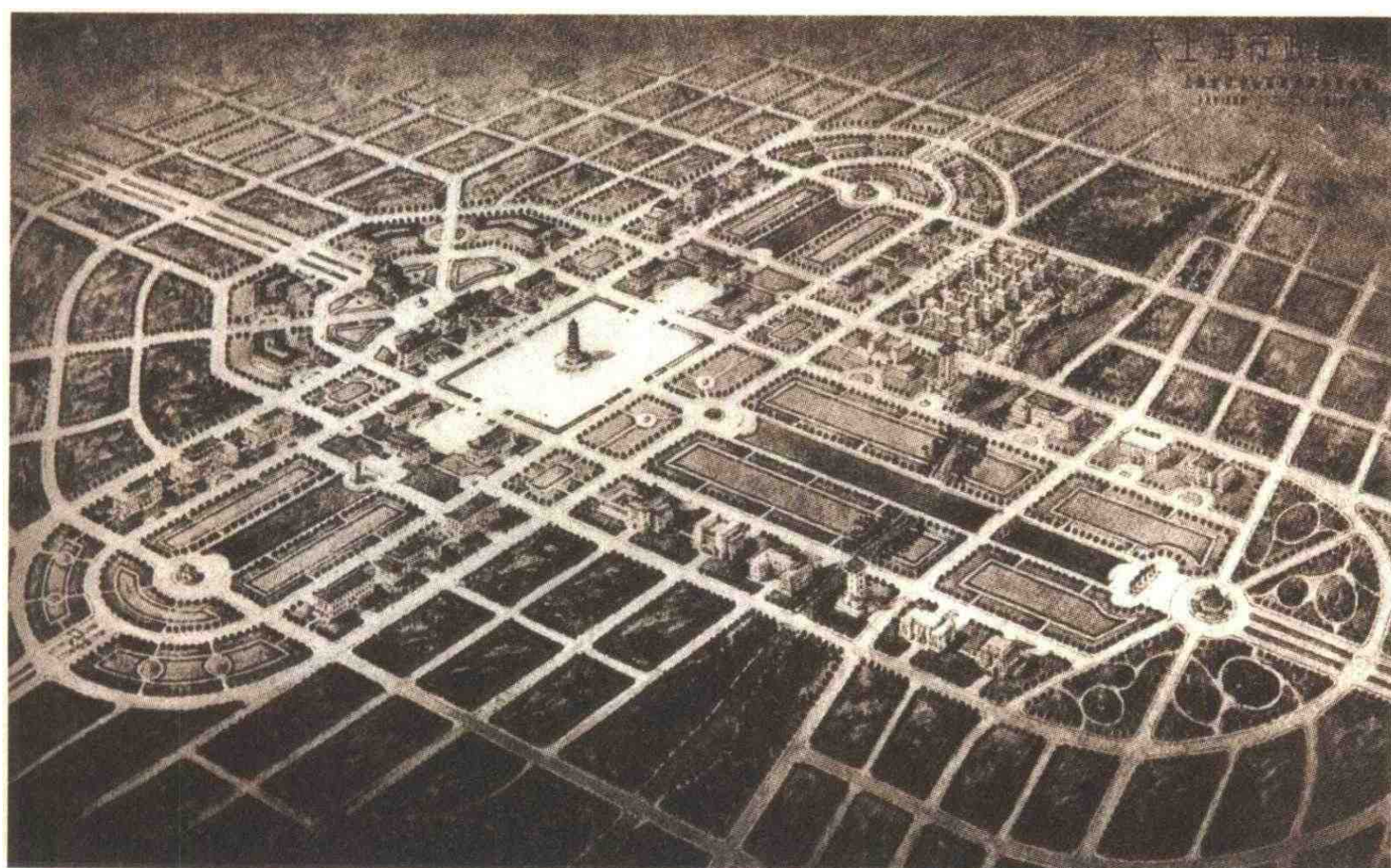


图 2-2-12 大上海行政区域规划鸟瞰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六期,1933年12月。

趋势的代表,但真正体现现代主义建筑精神的建筑作品并不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于当年11月12日沦陷。日军1937年8月13日进攻上海,对上海地区狂轰滥炸,当时上海五千多家工厂有两千多家全部被炸毁,许多学校、民居也被炸毁,总损失超过三十亿元。抗日战争前期,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沦陷区中的“孤岛”,有产者纷纷迁入租界区避祸,刺激了租界区内住宅建筑的建造。这一时期陆续建造了一些高级独院式花园洋房住宅与新式里弄住宅,也建造了少量公共建筑,如上方花园(1938)、美琪大戏院(1941)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各租界,上海全部在日军控制之下,租界区内的建筑活动就基本停止。

二、天津——以租界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北方沿海商埠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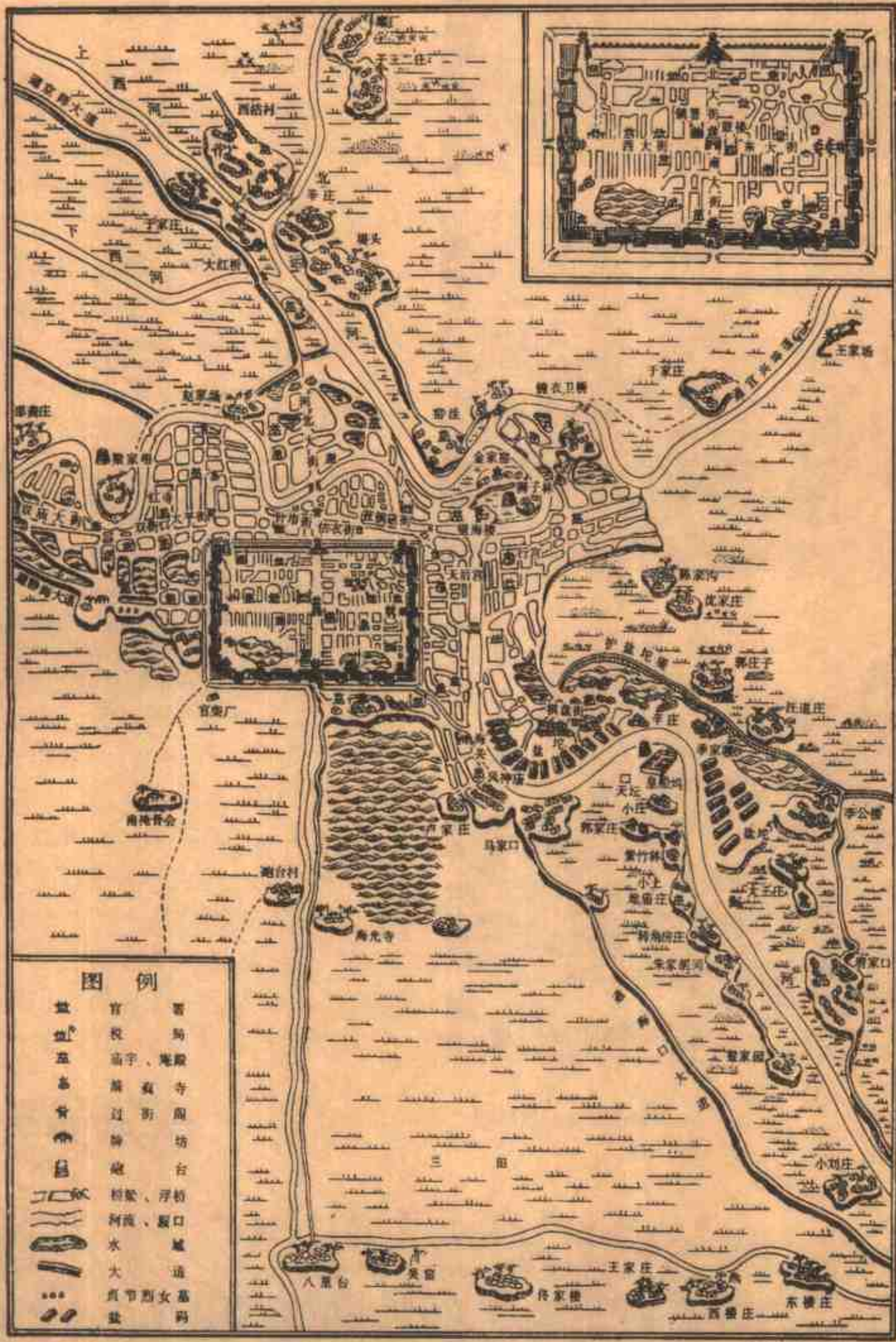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市中心东南距大沽海口约 70 公里,西北距政治中心北京约 110 公里。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在天津市区汇流,自今金刚桥以下称海河,海河河道蜿蜒曲折横贯市区,从东南方向经大沽口流入渤海。古代天津城市形成于南运河与北运河汇流成海河的三叉河口附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海河已可直接通行海船,后经几十年不断治理,保证了海运畅通,天津近代城市建设就沿海河两岸展开。

中国历史上元明清三代均建都北京,天津自明代筑城建卫,就成为封建王朝的“畿辅屏障”,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天津又是经大运河漕运或海运南粮进京的中转点,逐渐发展成为南北漕运的枢纽;随着渤海沿岸盐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天津也成为长芦盐的转运中心,这种“畿辅屏障”、盐、漕基地的地位就是古代天津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古代天津是作为军事重镇与交通枢纽而发展起来的城市。1840 年鸦片战争前夕,天津县境已有 44 万人口,城关一带近 20 万人,成为华北地区繁华商埠。(图 2-2-13)

正是这种“京师屏障”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天津成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重要目标,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都是先攻占天津,再进攻京城北京的。为巩固这个在中国北方地区输入商品(早期)及控制京城北京(后期)的桥头堡,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在天津开辟、扩张租界,使天津成为先后开辟了九国租界的商埠城市,租界数量最多的 1903 年至 1917 年,天津共有八国租界,总面积达 22874.5 亩(15.2 平方公里),居上海之后列第二位,大约是上海租界区总面积的一半。但天津八国租界中德奥租界于 1917 年、俄租界于 1924 年、比租界于 1929 年次第收回,四国租界存在时间不长,仅零星建造若干建筑,并未形成成片建造的城市街区。真正得到发展而形成天津近代城市的英、法、日、意四国租界区总面积为 11906 亩,只有上海租界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1860 年至 1900 年是天津城市发展的初始期。开埠初期,法、英、美三国租界在海河与京师通海口的津塘大道(今大沽路)之间连成一片,面积只有 951 亩,当时称“紫竹林租界”。早期来津的外国人很少,多居住在旧城区内东城墙与东浮桥一带,尤以官北大街为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大部分外国商人也在天津城里开业。

英租界开发较早,首先修筑码头,并填平沼地,建造房屋,“最显著的建筑物只是颠地洋行的。其它一些商人只要把他的土地钉上界桩,盖一个大货栈,几间暂时居住的小房子就心满意足了。”^[51]1864 年在法租界建造了老合众会堂(The Union Church)。^[52]此时英法租界仅零星建造少许建筑,美租界则一直没有建设,也无人管理。这种情况大约维持了十年,1870 年 6 月,天津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史称“天津教案”,刚刚于前一年建成的望海楼天主教堂(即胜利圣母堂 Notre Dames des Victories)被焚毁。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迁入租界居住,租界区建设速度加快。沿海河西岸修筑了河坝及平坦的沿河大道,建造码头,修筑与海河垂直的“长长而笔直的中街,路面平坦,两旁有双排的榆树”^[53](中街即今解放北路)。海河沿岸及中街两侧陆续建造了一些殖民式建筑,因不适应天津的气候条件后来逐渐停止建造。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建筑是英租界的市政厅——戈登堂。戈登堂于 1890 年建成,是青砖砌筑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风格模仿哥特式城堡建筑。“戈登堂的计划草图是由昌布尔(Chambers)先生设计的,后来又经过‘一位像达·芬奇一样多才多艺的’第一任工部局秘书长斯密思先生和在年青时做石匠而懂得各种建筑知识的德国面包师弗朗才本赫(Franzenbach)先生的修改。”^[54]建筑带有随意性,所以雷穆森说:“谢天



天津城乡图（1846年）

编制下德恩 磨石父
原绘 黄仁涛
改绘 赵德普

图 2-2-13 1846 年天津城乡图。原图载《天津简史》。

图 2-2-14 天津英租界中街 (Victoria Road) 街景, 图中左侧是戈登堂, 右侧是利顺德饭店。原图载《明信片中的老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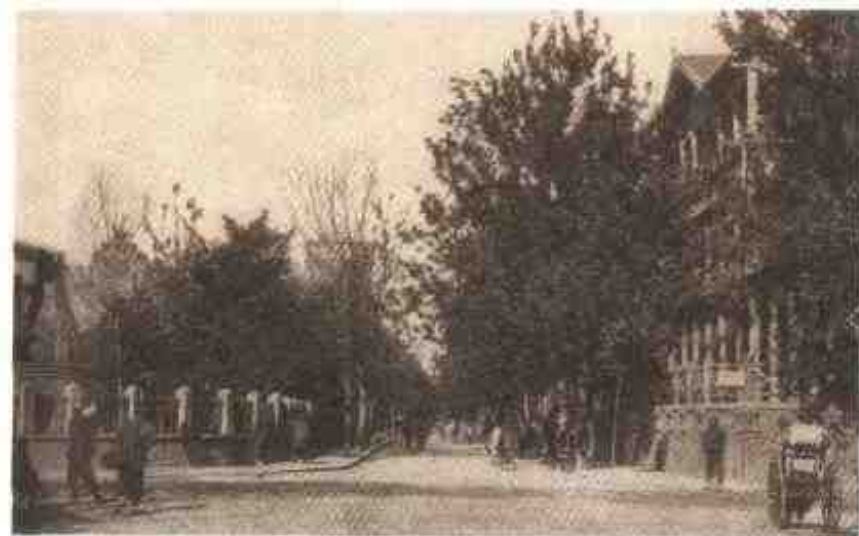


图 2-2-15 天津英租界的市政厅——戈登堂。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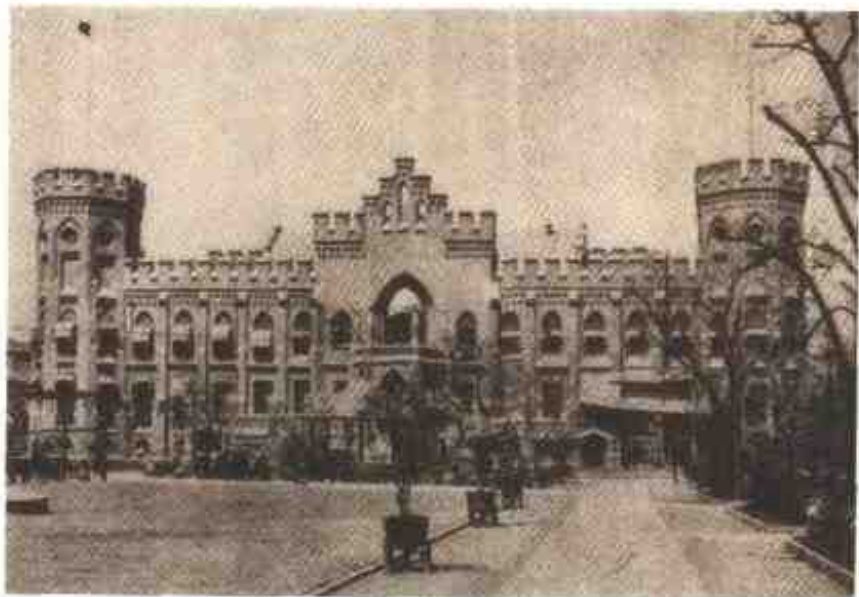


图 2-2-16 戈登堂于 1985 年拆除后留存的建筑局部。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谢地, 拉斯金(Ruskin)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市政大厦, 然而尽管它在艺术上有大错……它从适用方面来说还是不错的。”^[55]这反映了早期天津租界内由外人中的非建筑师凭记忆与经验建造建筑, 包括戈登堂这样重要的市政建筑的情况。与戈登堂隔中街相望的利顺德饭店建于 1886 年, 这幢三层建筑已是当时天津层数最多的建筑。(图 2-2-14, 2-2-15, 2-2-16, 2-2-17)

1870 年至 1895 年间,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以天津为基地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 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洋务运动中心。洋务运动期间, 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与大沽船坞, 并转向民用工业, 开办轮船招商局津局; 创办开平矿务局; 1878 年在英租界设立“华洋书信馆”。(次年改称“拨驷达”信局) 1879 年试办电报, 1880 年设立电报总局; 1881 年, 为运输煤炭, 建成唐(山)胥(各庄)铁路, 1887 年延伸至芦台, 为海防需要又于 1888 年延伸至天津, 即唐津铁路, 时称北洋铁路, 天津最早的火车站亦于 1888 年建成。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 进城后公开行抢三日, 天津旧城区内的衙门、银库、商店、当铺、钱庄及大户人家均被抢掠一空。侵略军轮番抢劫后又纵火烧城, “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 城外大街虽未十分毁坏, 然已十去

Astor House Hot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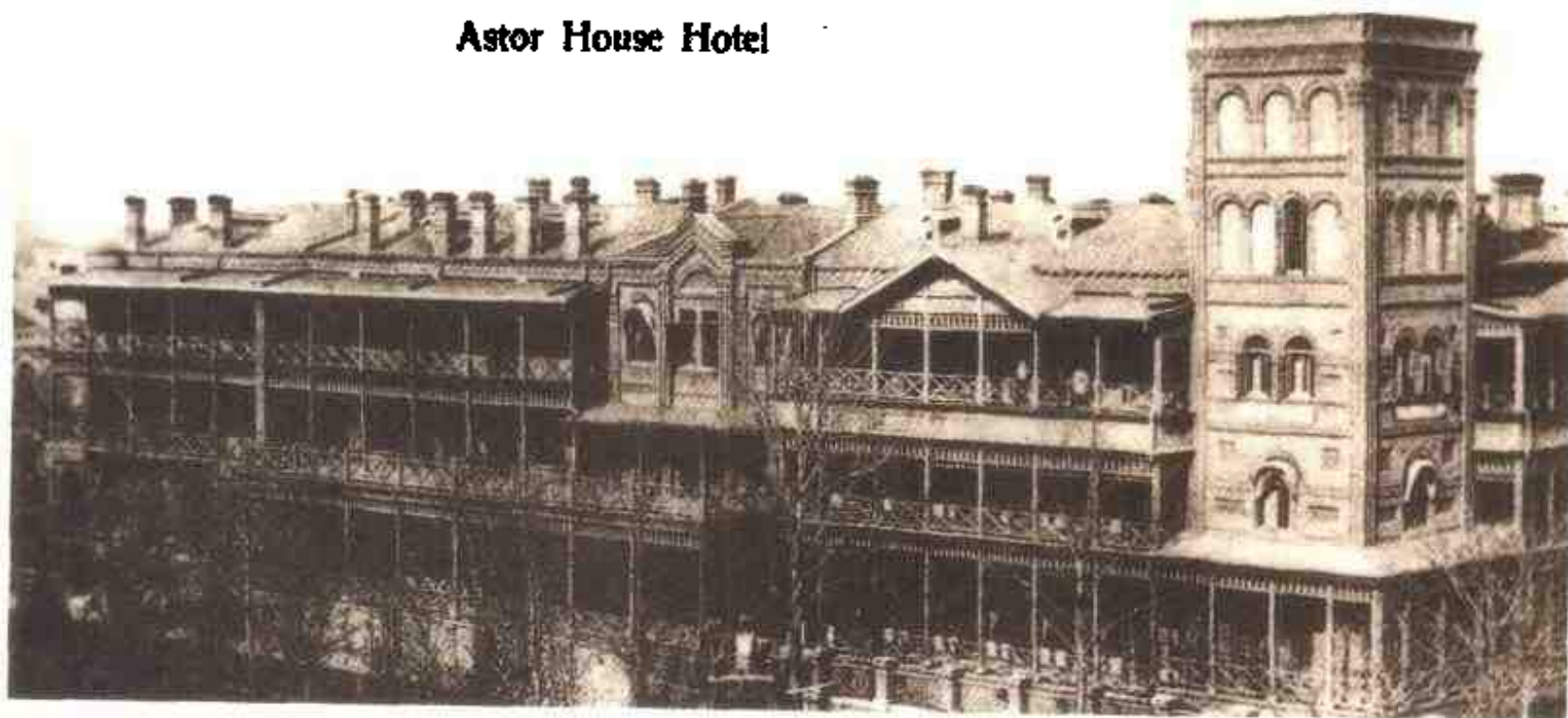


图 2-2-17 天津利顺德饭店。原图载《近代天津图志》。

其四。”^[56]这次劫难使旧城区元气大伤,此后逐渐走向衰落。1900年的庚子劫难是旧城区走向衰落的转折点。1901年,天津旧城区城墙被八国联军强行拆除,在城墙遗址上修筑了环城马路。(图2-2-18)



图2-2-18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侵略军轮番抢劫后又纵火烧城,“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城外大街虽未十分毁坏,然已十去其四。”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1912年2月,袁世凯为拒绝南下任大总统职,在北京制造兵变,天津驻军如法炮制,于3月2日制造兵变,抢劫焚烧了旧城区商业区及天津造币厂,史称“壬子兵变”,又一次给旧城区造成破坏。过了十年,旧城区略有复苏,1922年、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大关及官南官北大街一带又遭兵燹掳掠。几番劫难,旧城区遭受了巨大损失,有产者陆续迁入租界居住,在旧城区经营的商人认为“华界”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纷纷迁入租界区及南市区营业,旧城区商业中心日趋衰落,天津的商业中心逐渐转移到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图2-2-19)



图2-2-19 1912年“壬子兵变”时天津旧城被焚毁的街道。原图载《近代天津图志》。

1901年至1907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在天津推行新政,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兴办巡警、考核吏治、创办学堂、改革司法,并任用周学熙大力创办实业,使直隶省成为当时推行新政最活跃的省分。袁世凯与周学熙在天津、直隶兴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后来被泛称为“北洋实业”。

当时,租界区大肆扩张,旧城区已无发展余地,袁世凯遂决定在新开河一带开发河北新区。19世纪末,天津至山海关、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先后通车,但从当时的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至北洋通商大臣衙门须通过俄、意、奥三国租界,使用十分不便,为摆脱这种局面,袁世凯饬令天津道于1903年在新开河购地建成新火车站(今天津北站),称天津总站,并在北洋通商大臣衙门与新火车站之间开辟大经路(今中山路),又开辟若干条与经路垂直的纬路,形成河北新区规整的道路网。举办新政期间建造的工厂、学堂、劝工所等多在河北新区范围内,此外还建造了一些衙署、会所等,军阀官僚也在这一带经营私宅。辛亥革命后,河北新区是政府所在地,加以铁路运输事业发展,居住在河北新区的政府机关职员与铁路职工逐渐增多,军阀官僚纷纷在这一带购买地皮建造平房里弄住宅出租牟利,从20世纪初至20年代后期,河北新区得到迅速发展。

天津旧城以南今南马路至多伦道、和平路至南门外大街之间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南市”。南市原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地势低洼、污水漫溢、芦苇丛生,当时称为“城南洼”。1903年正式划定日租界时,日本人声称该地区是日本的“预备居留地”,致使中国官员长期不敢管理,而日租界当局与附近的法租界当局也不加管理,因有“三不管”地带之称,直至1912年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南市派驻巡警实施管理。

南市位于天津旧城与日租界之间,1901年旧城拆除城墙修筑环城马路,后日租界建成旭街(今和平路北段),这一带就成为城市繁华区边缘的空地。许多军阀官僚在此购买土地经营房产,先后有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岳父荣源与盐业银行经理岳荣堃等在此购买廉价地皮,成立房产公司填地建房出租牟利,其中以李纯开设的东兴房产公司及荣源与岳荣堃开设的荣业房产公司规模最大,所建房屋约占南市房产的80%。从20世纪初至20年代,南市区由无人居住的荒地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先后建造了二十五条街道,陆续建造许多商店、饭庄、旅店、澡堂及许多简陋平房住宅,各种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如茶园、戏院、烟馆、赌场、妓院等也都集中建造在南市区。

南市区的建筑多数是砖木结构,受租界区建筑的影响,往往加上不中不西的洋式门脸,反映了当时租界区的西洋建筑形式对民间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南市建造了一些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天津俗称锁头式住宅,如南市永安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德、日、意、俄、奥、比诸国相继在天津设立租界,英、法租界与后设立的德、日租界几次扩张,美租界则于1902年并入英租界,至1903年天津形成八国租界,总面积为22874.5亩。天津租界区的最后形成与全面发展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之后。

英、法、日租界存在时间长,建设规模大,三国租界在海河西岸连成一片,形成天津近代城市的主体。1900年以后,租界区内陆续进行市政建设,建筑活动频繁。1903年建造的天津英国教会(圣公会)教堂是英租界较早建造的教堂;1900年法租界扩张至墙子河后,于1913年在墙子河外老西开地区建造教堂、主教府与教会学校法汉中学,1916年教堂竣工,法租界当局即以保护教堂为名派军警强占老西开地区,激起天津人民抗议而爆发“老西开事件”,法租界当局被迫暂时收敛租界扩张活动,直至1931年日本在天津策划“便衣队”暴乱,法租界当局才趁乱侵占了老西开地区。

英租界马场道由主楼(1926)、主楼两侧的两幢办公楼、两幢学生宿舍及几幢高级住宅组成的天津工商学院;湖北路英文学校(Grammar School)(1928);哈尔滨道圣约瑟女校;哈尔滨道大陆银行(1921);张自忠路中国银行货栈(1928);马场道西湖饭店与天和医院(1925);法租界花园路久大精盐公司大楼(1924);日租界锦州道三井洋行大楼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

成的。津浦铁路于1908年动工修建，北段天津——济南府——韩庄390英里由德国人监修，1910年通车，1902年建造的津浦铁路天津西站具德国中古时期建筑风格。(图2-2-20)

辛亥革命后，军阀官僚及逊清贵族多迁至天津租界居住，除自建豪华的独院花园洋房住宅外，也建造许多供出租用的成片里弄住宅。早期建造的住宅多集中在法租界，许多军阀在法租界丰领事路(今赤峰道)两侧营造私宅，因有“督军衙”之称，环法国花园(今中心公园)的霞飞路(今花园路)环境幽雅，四周全是豪华的花园洋房，一些亲日派军阀如张彪、段祺瑞等则在日租界营造私宅。花园路庄乐峰宅(1926)，李吉甫住宅(1918)，章瑞庭住宅(1922)等，都是规模宏大，装修豪华的大型住宅。日租界官岛街(今鞍山道)有张彪的私宅张园(1916)；段祺瑞宅(约建于1920年代)；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天津的第二处“行在”(1929年1月至1931年11月)静园(原名乾园)等。(图2-2-21)



图2-2-20 津浦铁路天津火车西站。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图2-2-21 天津租界区内军阀官僚富商的豪华私宅。上左：日租界张园(张彪宅)；上右：法租界章瑞庭宅；下左：法租界李吉甫宅；下右：日租界段祺瑞宅。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是租界区最早形成的街道，因集中建造了许多银行建筑而有“银行街”之称。早期建造的银行建筑比较简朴，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陆续建造许多豪华的银行大楼。这些银行建筑多为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使用古典柱式，讲求对称，突出轴线，强调构图中的主从关系，形成规整对称，主次分明，比例严谨的立面构图，但亦能根据具体地形作灵活处理。建筑用材讲究，多使用花岗岩贴面，花岗岩柱式或作水刷石面层，昂贵的进口钢窗，精制的黄铜大门，内部也作大理石地面、柜台与大理石柱式，坚固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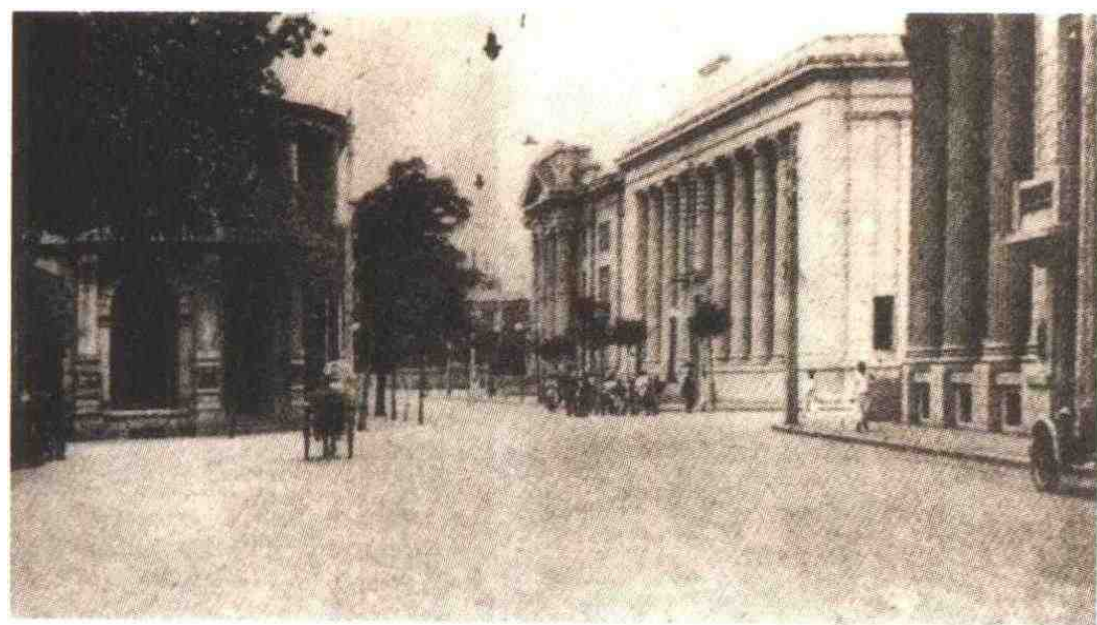


图 2-2-22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天津英法租界中街。原图载《近代天津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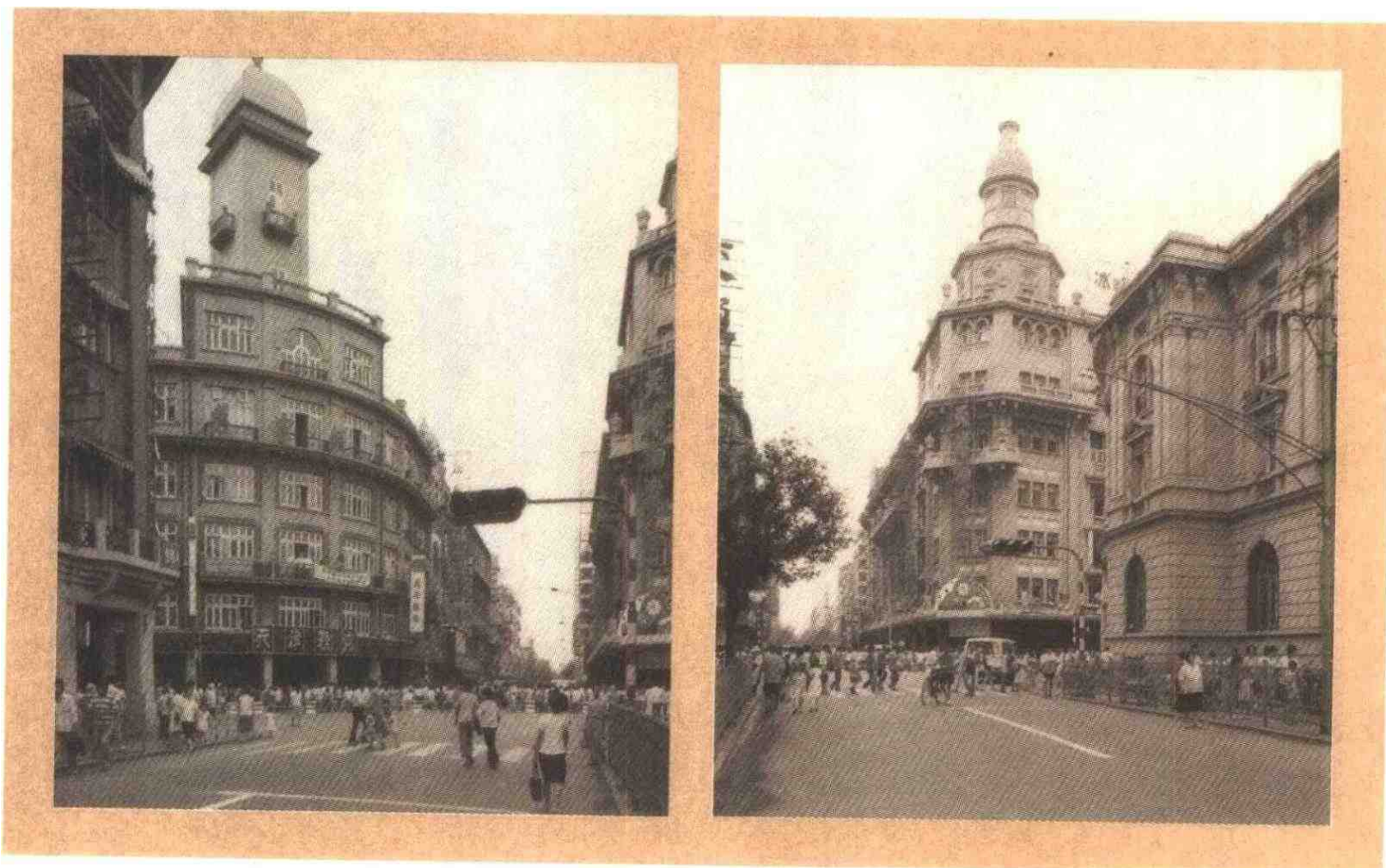
久,典雅华贵,正符合当时银行界追求豪华,显示财富以求扩充业务的商业要求。华俄道胜银行(1900年前后),是中街建造较早的银行建筑。中街两侧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银行建筑还有:英商汇丰银行(1924);英商麦加利银行(1925);东陆银行;美商花旗银行(1921);日商横滨正金银行(1926);华信工程司沈理源设计的盐业银行(1929)等,但盐业银行外檐科林新巨柱式柱身不作凹槽,柱头变形,增添了中国古典回形纹饰,已经有折衷主义的成分了。中街附近 1919 年开始建造,1921 年建成的开滦矿务

局大楼也是典型的古典主义建筑。(图 2-2-22)

1900 年以后天津的商业中心由旧城区逐渐转移到法租界劝业场一带,这一地区位于法租界 1900 年扩张界范围内,当时泛称“梨栈”,多是空地、水塘与坟地,只有—些平房与零散的小商店。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后,这一带仍有许多空地,建筑也以平房为主,但投机地产者已觉察到这一地区的发展前途,土地投机活动日益兴盛。1900 年以前,劝业场一带的地价仅每亩三四两至十两银子,1911 年涨至每亩三四十两,至二十年代初已涨至每亩千两,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涨至每亩万两,而 1928 年建造的劝业场的地价竟达每亩两万两,正所谓“寸七寸金”,^[57]20 世纪 20 年代劝业场一带商业迅速发展,商店、旅馆、饭庄、影剧院等商业娱乐建筑大量建造,不到十年就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

劝业场一带的商业建筑与中街的银行建筑基本上是同时建造的,这些商业建筑与严谨的古典主义银行建筑不同,体型富于变化,多种建筑处理手法并用,争相耸起的高高的塔楼追求的不是某种建筑风格而是商业广告性质的争奇斗富,这批建筑属于折衷主义建筑范畴,因建造于 20 世纪 20 年代,已受到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和平路滨江道十字路口首先建造的是 1923 年开始建造,1925 年建成的浙江兴业银行,随后,惠中饭店(1926);劝业商场(1928)陆续建成,劝业场的建成是天津法租界商业中心形成的标志,劝业场也成为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图 2-2-23)

图 2-2-23 1989 年仍大致保持原貌的天津劝业场附近今滨江道和平路一带的商业区街景。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这一时期劝业场一带陆续建造的商业娱乐建筑很多,较典型的有:与劝业场只隔一条防火道的天祥商场(1924);泰康商场(1927);国民饭店(1923);基泰大楼(1928);光明社电影院(今光明电影院,1922)等。建于日租界租界街(今和平路)的中原公司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商业建筑,1927年建成,1940年8月毁于火灾后加固重修,1941年竣工,增添了中二层,改为现代建筑形式,竖向线条主宰立面,高塔层层收分,挺拔俊秀。

意租界占地仅771亩,在海河东岸自成体系。1902年设立租界时“该租界的平均地平面比天津任何租界都低,在某些地方甚至比目前地面低20英尺。”⁵⁸因此意租界建设的第一步是“立刻开始垫平低洼地的工程,土是从海河岸旁用人力拉来的。”⁵⁹然后铺设道路,开展市政建设,“在1914年即与纽约美孚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在大马路一带进行一段沥青路的实验,”⁶⁰并于1924年在各国租界中最早将所有道路都铺设了沥青路面。喜欢户外活动的意大利人也把广场带到中国,在意租界今白市路与民生路、民族路交叉口处建设了两个圆形广场,其中民族路广场较大,中心立有纪念柱。意租界街道规整,无影院剧场也无娼寮妓院,环境幽静,实际是一个高级住宅区,先后建造了一些新式里弄住宅与许多高级花园洋房住宅。

德奥租界于1917年、俄租界于1924年、比租界于1929年次第收回,四国租界存在时间不长,仅零星建造若干建筑,并未形成成片建造的城市街区。

天津是华北的内外贸中心,它的发展与天津入海通道海河密切相关,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原可直接通行海船的海河已逐渐淤塞,1897年成立了海河工程局,自1902年开始全面整治海河。因河道弯曲不利泥沙宣泄,在1902年至1923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完成了治本性的六次裁弯取直工程,裁弯后河道缩短,上下游河床普遍刷深拓宽,至1924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航运年”,“到1927年前,2000吨级的轮船均直航天津市区,”⁶¹大大促进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从海河挖出的大量泥沙则用铁管输送到市区低洼地带填平沼泽地,当时称为“吹泥填地”,“吹填于旧英租界达520万立方米,平均垫高1.40米;旧德租界为181万立方米,垫高约2.60米,解放前,吹填量占挖泥量的90%,即有1500万立方米之多。”⁶²大面积低洼沼泽地的填平为天津近代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903年扩充的英租界推广界又称墙外推广界,范围在今南京路(墙子河)至西康路,营口道至马场道之间,占地3928亩,约占整个英租界面积的三分之二。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也是“吹泥填地”的主要目标,英租界推广界填地工程至1923年完成三分之一,至1928年基本完成,租界当局在私人占有土地的前提下作了统一规划,“为了遵从英国工部局的道路与公园计划而征用土地的方案,每一个地段业主必须交出不少于20%的地产。由于是历年从中国人处购买的,这些地段通常极不规则……这种情况迫使工部局改变成目前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道路是笔直地开辟的,道路越过的地段,或者被道路分割为两部分的地段都加以测量,在减去20%以后,就在路的这边或那一边,重新分拨一块成长方形的相等的土地。”⁶³因此墙子河外英租界新区布局合理,20世纪20年代陆续修筑了沥青混凝土道路,铺设了城市下水系统,安装路灯,还设置了电钟,水电供应都有保障,有较完善的市政设施,英租界当局还规定不许公交车辆进入该区。这一地区安静舒适,环境幽雅,在此购地建造住宅者日益增多,1923年“墙外租界地的地价突飞猛涨,十年前300两一亩的土地,现在已值3000两了”。⁶⁴但1928年以前英租界新区尚处于前期市政建设阶段,它飞速发展成为大面积高级住宅区是在1928年以后。

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天津定为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管辖。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政策,各国特别是日本资本大量输入天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与经济势力也逐渐渗入天津银行界与工商

界,天津的民族工业则相对衰落,但也有少数民族资本企业如仁立、东亚、永利、久大等得到发展,还出现了一些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1928年至1937年间,天津的经济得到发展,达到历史上的高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建筑活动的发展,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后,军阀官僚携带巨资避进天津租界,这些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房地产事业,更助长了建筑活动的兴盛。20世纪20年代历经战乱,投资者多托庇于租界区的治外法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全面侵华风声日紧,当年11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制造了“便衣队”暴乱事件,更加剧了天津局势的紧张。旧城区、南市区与河北新区的建筑活动大幅度减少,只建造了少量建筑,主要建筑活动都集中在租界区内,天津租界区建筑活动进入高潮期。但这一时期天津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银行街”的银行建筑却很少换代重建,没有出现上海中国银行那样的高层银行建筑,这当然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南迁上海的结果。

这一时期天津只有四国租界即海河西岸的英、法、日租界与海河东岸的意租界。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商业中心仍继续建造高大公共建筑,租界区内其他地区也陆续建造许多公共建筑。进入20世纪30年代,新建筑运动影响所及,已改变了天津近代建筑的面貌,一方面,繁琐的古典建筑形式耗资费时,投资者常感财力不支;另一方面,当时有产者多崇尚欧美,对欧美流行的现代建筑自然乐于仿效。这一时期,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成为这一时期天津近代建筑的主流。

和平路赤峰道口的渤海大楼建于1935年,是当时天津的最高建筑,设计者仍是劝业场的设计者慕乐建筑师,但时过七年,已完全抛弃了古典建筑形式。哈尔滨道中国戏院(1930);大沽路英国菜市;唐山道兴隆洋行大楼(1929);解放北路法国俱乐部(1931)与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4);南京路耀华学校(1929~1935);日租界鞍山道第一日语学校(1934);意租界回力球场(“天津意商运动场”,1935)等都已趋向现代建筑形式。

墙子河外英租界新区经20世纪20年代“吹泥填地”填平沼地并建设了较完善的市政设施,形成舒适幽雅的生活环境,至20世纪30年代,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大批住宅建筑,包括独院花园洋房住宅、新式里弄住宅与公寓住宅,形成了大面积高级住宅区。相对于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功能单纯,体量不大,耗资较少,其中独院花园洋房住宅供业主家庭自用,更多地反映了业主的爱好与要求,因而英租界新区的住宅建筑形式丰富多样,街道空间尺度亲切,绿树成荫,街道整洁,景观是很优美的。(图2-2-24)

图2-2-24 1989年仍基本保持原貌的天津马场道(原墙子河外英租界新区)街景。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这一时期还建造了一些多层公寓住宅,这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新的住宅类型,适合于中等生活水平的小资产阶级居住,因此功能与经济成为主导因素,马场道香港大楼与大理道民园大楼都是简洁实用的四层公寓住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沦陷初期,英法租界不在日军控制范围之内,仍有少量建筑活动。如解放北路利华大楼(1939);英租界建设路开封道口的维格多利(Victory)餐厅(1940)。此时有产者大批避入英法租界,租界区内住房紧张,墙子河外英租界新区仍继续建造住宅建筑。常德道民园西里

(1939);桂林路桂林里(1940);马场道友爱里(1941)都是较高级的新式里弄住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英租界,法意租界实际上亦在日军控制之下,至1943年意大利政府与法国维希政权宣布将意法租界交还汪精卫伪政权,在形式上结束了两国租界的历史,天津全部在日军控制之下,租界区的建筑活动也告结束。

三、武汉——租界区与华界区同步发展的长江沿岸商埠城市

武汉位于汉水与长江汇流处,地扼江汉门口,素有长江航运,后通京汉、粤汉铁路,交通便利,有九省通衢之称,但因是内陆城市,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就逊于沿海城市上海与天津。这对武汉近代城市的早期发展有很大影响,如前所述,1895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尚处于商品输出阶段,对外贸易的交通运输条件成为促进早期商埠城市租界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上海、天津、汉口三处通商口岸相比,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与经济性稍差的汉口,租界区的发展,及由此引发的近代城市的发展也就相对滞后。

武汉城市的一大特征是长江、汉水两江分隔,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分立。历史上至隋代已形成双城格局,即武昌、汉阳两个市镇分立。明代成化年间演变出汉口镇,开始形成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并立的新格局,“经过明末清初的演变,终于形成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鼎立的格局。汉口虽晚出,但驾武昌、汉阳而先之。通过漫长发展,武昌演化成以政治和文化为中心的市镇,汉阳成为政治和手工业著称的市镇,汉口成为商务和交通繁荣的市镇。武汉三镇则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深处内陆的著名镇团。”^[66]武汉的这种城市格局与三镇城市功能分工一直延续到近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即规定增开武汉三镇中商务与交通发达的汉口为通商口岸。1861年开辟汉口英租界,但规模甚小,面积仅四百五十余亩。直到1895年以后,德、俄、法、日各国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英、法、日三国租界又先后拓展范围,才逐渐形成面积约2800亩的五国租界区,面积与汉口旧城区大致相等。汉口租界区面积比上海(48653亩)、天津(22874.5亩)要小得多,只略大于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2000多亩)。美国学者罗威(William T. Rowe)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研究从十八世纪末至1890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前近百年的汉口城市,认为“从明代后期开始,先是通过粮食贸易,其后通过盐、茶贸易,汉口逐步从一个地方大市场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城市。汉口通过与其直接关联的五条商路,与全国各地进行着广泛的商品贸易,作为一个全国性商业中心城市,汉口是长江中游地区与其它地区贸易往来的孔道,作为一个地方性商业中心城市,汉口又是长江中游地区区域内贸易的枢纽。汉口市场具有联结各地市场、集中和分销各地产品以及生产和消费三种功能。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西方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却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汉口的商业格局并未产生重大的变化,商业的主体仍是国内贸易。”^[66]对1900年以前汉口近代城市的发展,这一评价也大体是正确的,在上海、天津、汉口这三个主要通商口岸中,汉口租界区规模最小,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导致汉口近代城市发展亦较上海、天津滞后,但与其他商埠城市,如广州、厦门等相比,1900年以后汉口近代城市的发展则更为充分,因此,本书仍将汉口与上海、天津并列为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影响最大的商埠城市。

汉口租界区沿长江西北岸一字排开,五国租界连成一片,位置集中,一面临黄金水道长江,一面临京汉铁路,水陆交通都很方便。1900年以后,开辟较早的英租界已形成近代城市基本格局,后设立的四国租界在地理位置上与英租界连成一片,并沿袭英租界道路网的基本构架,形成较合理的城市格局;沿长江西北岸开辟码头、建设仓库、货场,利于水

路运输与货物集散;开辟沿江大道,沿街建设大型公共建筑,形成沿江城市景观;在五国租界西界开辟商业街(今中山大道),沿江大道与商业街之间,英、俄租界进深较大,开辟三条纵向道路,德、日租界进深较小,开辟一条纵向道路,法租界则是俄租界与德租界之间城市道路的过渡区,这样,五国租界区形成纵贯南北的主干道,各租界区又均匀开辟东西向道路,形成较均衡的城市街区,运输干道(沿江大道)与商业街(今中山大道)居外侧,办公、居住街区居中,城市功能分区相对合理。受较早开发的汉口英租界的影响,汉口租界区维持了类似上海早期英租界受工业革命后西方近代城市结构模式影响而形成的城市结构模式,由于汉口租界区的规模始终没有像上海、天津那样大规模拓展范围,所以这种模式就成为汉口租界区的最终城市结构模式,并影响到汉口华界区,如1917年华商资本家开辟的“模范区”。1900年以后,汉口租界区发展较快,迅速形成近代城市新区,其中尤以与华界区毗邻的英租界发展最快,稍后,俄、法租界的建设也进入高潮期。

开埠前,汉口旧城区集中于汉水沿岸至大江口一带,即今中山路以南,江汉路至硃口之间的地区。1898年,改夏口镇为夏口厅,与汉阳县分治,使夏口厅成为县级行政机构,辖区扩大,为汉口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1904年,修筑汉口后湖长堤(后称张公堤),治理后湖地区水患。汉口后湖原为废襄河,“范白舫汉口丛谈,曾谓:‘后湖即废襄河旧址,北距黄陂孝感境三十余里,东西数十里,平畴旷野,弥望无垠。春时丛树扶疏,芳草鲜美,覆云在地,流霭接天。浪翻麦垄之风,香挹菜畦之露,后有茶肆罗列,歌管纷喧。百鸟鸣笼,时花当户。于是仕女出游,咸偃坐啜茗而留览焉……’”^[67]筑张公堤后,堤内后湖填平,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新区。1905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906年,拆汉口旧城城墙,在城墙基址修筑后城马路,西起硃口,东至一码头英租界。1906年初,张之洞令夏口厅及江夏汉阳两县拓宽街道,新建房屋须从原线后退三尺,以便救火。几年之内,汉口旧城区逐渐发展繁盛,“从前为人迹罕到之处,近则轮轨交通,店铺林立,几令人不可思议矣。”(《夏口县志》卷9,交通志)“20世纪初年,汉口兴起了购置土地,填土筑路建房的热潮。今天江汉路以下直到华清街一带,铁路与租界之间的大片低洼地区平均填高了20英尺,与租界齐平,相继修建了许多条新的马路,如歆生路、大智路、车站街、海寿路、华景街等。街道的两侧,当街兴建的都是高级优质铺面楼房,街后则建造了大量二至三层楼的住宅,形成了一批新式楼房构成的新里份,(引者注:汉口称里弄住宅为里分住宅,或里份住宅)如海寿里、长兴里、长清里、三德里、泰兴里、生成里、通德里、永福里、永广里等。正如海关报告所指出的:‘在所有这些街道旁,许多洋式的半洋式的房子跟着建造起来了。’”^[68]

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已有定评的反面人物,但袁氏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举办新政,对天津近代社会发展却有积极意义,反映在近代建筑史上就是天津“河北新区”的开辟与因兴办“北洋实业”而建造的一批工商业建筑。横向对比,张之洞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湖北举办新政,兴办实业,亦多有作为,反映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政绩是汉口旧城的发展。天津因租界区面积很大,发展充分,所以“河北新区”的建设在天津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不是太大,汉口租界区面积与扩展后的旧城区大致相当,其发展程度与天津租界区相比相对滞后,而汉口旧城区与天津“河北新区”相比,则发展更为充分。所以汉口与上海、天津不同,出现租界区与旧城区平行发展的二元城市发展格局,华商时时要与外商争雄。典型实例如:从1901年起,英人在汉口租界区以外,京汉铁路以西陆续购地八百余亩(范围为今解放大道至惠济路,永清路至解放公园路之间的地段),于1905年建成西商跑马场。因西商跑马场歧视中国观众,由华商刘歆生、周星棠、梁俊华、韦紫封等36人发起组织华商体育运动会,集

资购买由义门铁路外地皮(今航空路一带),修建华商跑马场,于1908年建成。罗汉《汉口竹枝词》有《西人跑马场》一首云:“分道扬镳各自由,此风原是创西欧。莫轻驰骤夸先进,合算华人胜一筹。”(原注:每届中西合赛,华人多占胜者)又有《华人跑马场》一首云:“络绎香车去马场,春秋两赛竞华商。先鞭一着齐呼彩,赢得佳人为捧觞。”(原注:胜者有女士酌以香槟酒,示荣宠)¹⁹这种华商与外商争雄对峙的局面,只有在汉口的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究其源头,张之洞开发汉口旧城区有首创之功。所以汉口竹枝词云:“后湖堤岸枕江湄,田海沧桑一瞬移。他日造成新汉口,大家都要感南皮。”²⁰(张之洞为直隶南皮县人,时人尊称“张南皮”),指的是筑张公堤后,堤内后湖形成的汉口旧城新区。(图2-2-25)



图2-2-25 《武汉三镇略图(1915年)》。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汉口租界区与旧城区的市政建设较上海、天津也滞后三十至四十年。汉口电报局(1885)、汉口邮政总局(1897)、汉口电话局(1900)先后成立,1904年汉口电话局改为商办,成立汉口商办电话公司。1900年以后,成立英商汉口电灯公司,1905年建成,供英、法、俄三国租界用电。此外,德租界开办“美最时电灯公司”,日租界开办“汉口电灯厂”。汉口旧城区亦于1900年以后开始建造水厂电厂。“商办汉镇既济水电公司水电厂,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水厂设在硃口宗关,电厂设于大王庙,水塔设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张之洞督鄂时筹办水电事业,各国洋商恳请揽办者颇众,有巨商宋炜臣等十余人稟请承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并允附官股,以资提倡。”^[71]汉口旧城区的水、电事业几乎与租界区同时起步。

1911年辛亥革命,武汉是首义之区,武汉三镇克复后,清廷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调北洋新军进攻武汉。10月30日,清军放火焚烧汉口旧城区。“汉口最繁华的市街烟雾蔽天,成了一片火海。在大火中,革命军继续英勇抵抗。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说:‘匪炮向街市猛击,徒步匪人顽强抵抗,汉镇火愈猛,相持竟日。’‘十一日黎明,西北风暴作,汉镇火愈烈,我军接续攻扫,节节巷战,每攻一段,冒火蹈险,又为匪暗击,艰苦不可言状。’他丧心病狂地宣称:‘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毁。’”^[72]“汉口的大火一直延烧到11月4日,市区五分之一被毁。清军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在奏折中说:‘十三日(11月3日)接南省各团体电称,汉口并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73]清军焚烧汉口旧城区,造成巨大损失,对旧城区的工商业打击尤大,

除房屋资产被焚外,“工厂、商店、作坊、票号及钱庄的账册多被焚毁。战事平息后,市面上各处的债权债务纠纷迭起,像一团乱麻难于理清。当时汉口商务总会拟具清理章程,呈请省署咨部核准,创设了史无前例的理债处,由该会公举素孚众望的评议员会同审查清理,进行调解,以昭公允。”^[74]罗汉《汉口竹枝词·理债处》云:“劫后商家几变更,债权债务互相争。乱如麻缕棼如绪,试问何人理得清。”^[75]这种灾祸严重打击了汉口旧城区的工商业,更严重打击了工商业主的心态。其时“列强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于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76]汉口各国领事及列强驻华公使分别于10月17日、18日宣布汉口租界中立,禁止双方军队入内。因此,交战期间虽有炮弹落入租界区,但损失很小。此次旧城区火焚之劫使汉口城市发展格局发生变化,旧城区元气大伤,华商为安全计,纷纷迁入租界区

图 2-2-26 1911 年辛亥革命期间,清军放火焚烧汉口旧城区,从日租界眺望汉口大火的照片。原图载《大革命写真画》第一集,转引自《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



图 2-2-27 汉口旧城区被焚后的惨状。原图载《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



及邻近租界区的华界区营业，华商资本向租界区集中，重演了因 1853 年小刀会战事及 1864 年太平天国战事使华人、华商、华资进入上海租界区，及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公开行抢三日的庚子劫难使天津旧城区华商迁入租界区营业的历史。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战争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图 2-2-26, 2-2-27)

此后，汉口租界区，主要是英、俄、法租界区及邻近英租界的歆生路一带发展很快。早在 1901 年，“英租界自订约扩界以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所购地皮首当其冲(刘原为天主教徒，购买地皮约在今日的江汉路自鄱阳街口起的西段，以及扬子街以西一直延伸到京汉路西北)，遂由英租界当局指使，修建马路，并由英租界当局呈准英皇，定这条路名为歆生路以示奖励(即今江汉路之前身)。这样，与英国租界毗连的这段歆生路(即今日的江汉路自鄱阳街口起至中山大道的一段)，就无形地成了英国租界，由租界当局修建马路，派遣巡捕站岗，收取巡捕捐。甚至在前花楼街口(即今河街、黄陂街、花楼街三个街口)也由英国租界当局建立三道铁门，一遇发生内战或其他变乱，英人就将铁门关闭，断绝交通。”^[79]辛亥之后几年时间，与华界区相邻的英租界迅速发展繁盛。1921 年在今沿江大道江汉路口开工兴建江汉关大楼，1924 年建成，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电话局大楼(1915)、英商汇丰银行(1920)、景明洋行(1921)、美商花旗银行(1921)等也都陆续建成。这一时期，法租界城市发展也很快。五国租界之中，德租界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即由盛转衰。不久，于 1917 年由中国政府收回；日租界则因地理位置偏僻，始终没有得到发展。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自愿放弃在华一切特权，俄租界于 1923 年收回；大革命时期，北伐军占领武汉，英租界于 1927 年收回；抗日战争爆发后，日租界于 1937 年收回；只有法租界迟至 1945 年才从日本手中收回。与上海、天津相比，汉口租界区存在时间较短，1927 年发展最充分的英租界收回后，只余面积较小的法租界与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的日租界，在 1927 年至 1937 年的汉口近代城市发展兴盛期，汉口华界区已成为汉口近代城市的主体。(图 2-2-28, 2-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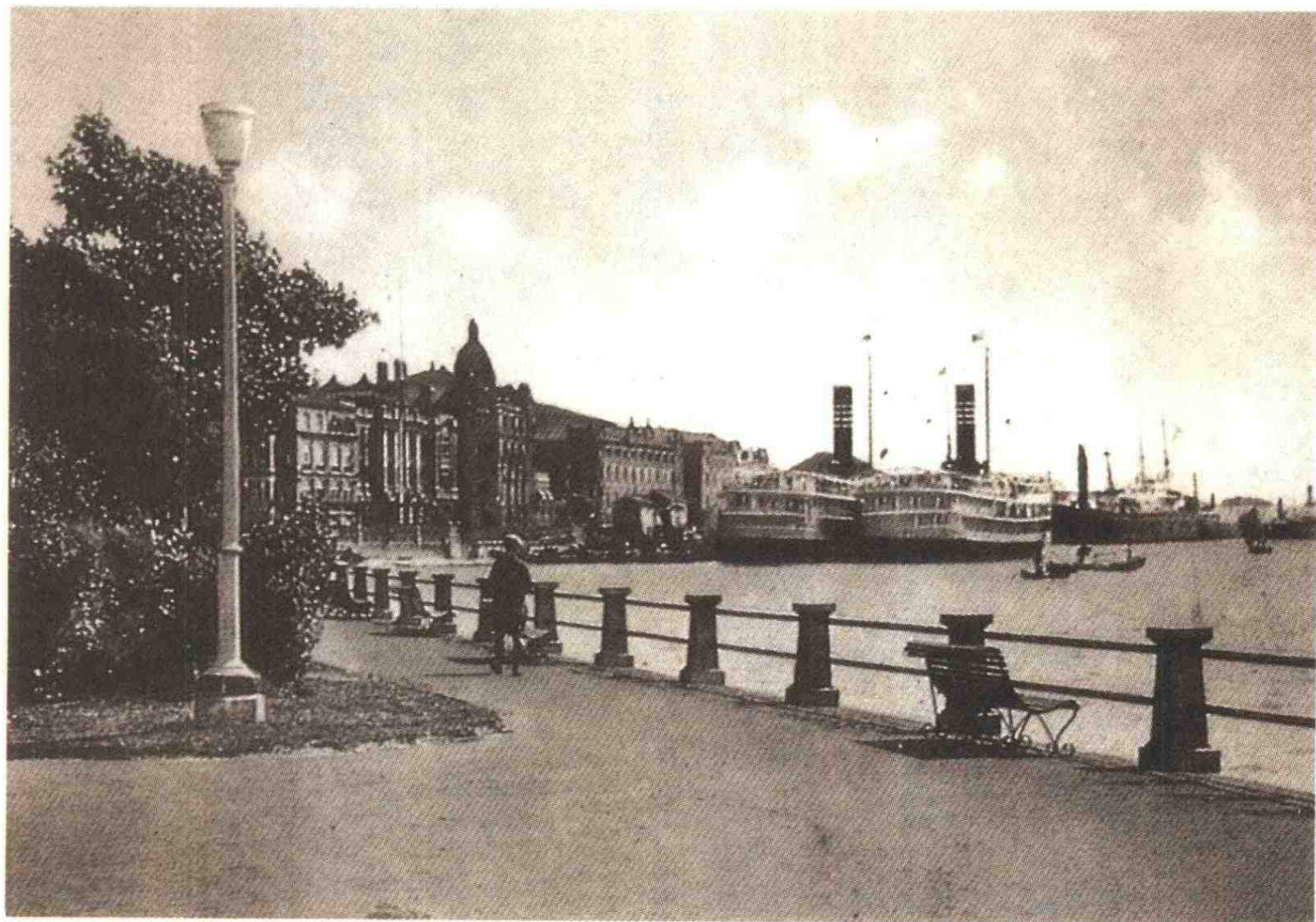


图 2-2-28 明信片中所载租界区沿江大道汉口港码头的街景照片。原图载《老明信片·建筑篇》。



图 2-2-29 明信片中所载租界区沿江大道街景照片。原图载《老明信片·建筑篇》。

汉口旧城区自辛亥大火后，元气大伤，至 1917 年才有再度兴盛之举。是年以华商总会名义开展了开辟“模范区”的城市营建活动，在今中山大道至铁道，保成路至大智路之间的地区集中购地，成片开发，较短时间内形成城市新区。1923 年，又有汉口军阀集团即当时所谓“将军团”与华商组成“济生地产公司”，低价购买今中山大道至铁道，友谊路至前进一路之间的地皮，以后分片转卖，在 1923 年至 1926 年间建造了一批里弄住宅。1926 年，汉口官钱局倒闭，发行的铜元券成为废纸，使汉口工商界受到沉重打击，1928 年前后，武汉政局动荡，至 20 世纪 30 年代，汉口城市发展才进入兴盛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短短几年中，歆生路（今江汉路）一带的建筑活动进入全盛时期。上海联保水火公司投资兴建的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于 1928 年开工，1931 年建成，是集商场、娱乐、旅馆于一身的综合性建筑。随后，歆生路两侧四明银行（1936）、中国实业银行（1936）先后建成，聚兴诚银行于 1936 年开工，1937 年抗战爆发时未能竣工。这一时期华商银行建筑建造很多，中山大道两侧即建有金城银行（1930）、大陆银行（1931）、中央信托大楼（1936）等。还有建于胜利街南京路口的汉口商业银行（今武汉图书馆，1931），建于胜利街的四川美丰银行（1934）等。（图 2-2-30）

图 2-2-30 1988 年仍基本保持原状的汉口江汉路（原歆生路）街景。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武汉三镇并立，尽管联系密切，毕竟受江河阻隔，只能各自为政。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在汉口设夏口厅，并移汉黄德道于汉口，使汉口的行政地位提升。民国时期，三镇建置多有变动，但三镇之间的联系则不断加强，1927 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首次将三镇合为统一的武汉市。

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建武昌铁政局，在汉阳龟山之北建汉阳钢铁厂，于 1893 年建成投产。1894 年建成湖北枪炮厂，1903 年改名为汉阳兵工厂。1908 年，盛宣怀将汉阳钢铁厂与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并为

商办的“汉冶萍煤矿有限公司”,使之进入发展盛期,汉阳逐渐发展成为武汉的工业区。

自1898年开始,在武昌城北修筑武丰堤,城南修筑武金堤,二年后建成。又改造武昌沿江江堤,使武昌水患减轻。1900年,张之洞还奏准武昌新河街一带为“自开商埠”,使武昌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昌阅马场建造的湖北咨议局,1908年筹建,1909年建成,是清廷为实行君主立宪而建,已采用西方建筑形式,山字形平面,红砖红瓦,二层建筑中央高耸钟楼,是当时官方行政建筑西化的典型实例。

1900年以后,武昌城内原有的书院陆续转办为各类新式高等学堂,又创建一批新式学堂,使武昌成为教育建筑集中的地区。1902年拨官地两千亩建农事实验场,1903年改为农业专科学堂;1898年设立湖北工艺学堂,1902年改制为工业专科,1907年更名为湖北工业学堂,成为一所高等工业学堂;1906年开设湖北军医学堂、省立女子师范学堂、湖北陆军特别学堂;又在原“两湖书院”基础上建立两湖总师范学堂。1901年,美国圣公会1871年创建的“文华书院”在武昌昙华林原校址西南购地,扩建校舍,1909年改名为文华大学,附设文华中学。1907年,博文书院迁至武昌城外,重建新校舍。1924年,英美教会将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博学书院及长沙雅礼大学合并,组成综合性大学华中大学,校址在武昌昙华林原文华大学校园。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李四光领导的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在武昌东湖之滨的落驾山(后改珞珈山)一带勘定校址,聘美国建筑师凯尔斯(F. H. Kales)为新校舍总设计师,武汉大学新校舍于1929年动工,1935年基本建成。凯尔斯规划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园建筑,因山就势,环境幽雅,单体设计采用中国民族建筑形式,是西方建筑师创作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之一。

第三节 济南与芜湖——商埠城市影响的扩散 及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转型与发展

一、自开通商场——黄河下游的历史文化 名城济南的转型与发展

济南是黄河下游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临黄河,南依泰山,城区周围有千佛山等山峰环绕,形成“古千佛屏障于南,其他环城而峙”的盆地地形。济南地下水源丰富,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旧城内形成众多泉群,“家家泉水,户户垂杨”,“齐多甘泉,甲于天下”,有泉城之称。城内泉水经护城河汇于大明湖,向北经泺水、小清河入海,战国时,齐国在此设历下城,307—312年(晋永嘉年间),济南郡治设于历城,此后历城一直是山东地区的行政中心。1368年(明洪武元年),置山东行省,治所设于历城。1666年(清康熙五年),以明代世德王府为基础建巡抚衙门,并以此为中心扩建城池,城垣略呈方形,是典型的中国北方传统城市。清代以来,济南商业繁荣,旧城区逐渐扩展至府城外的关厢及厢外一带。(图2-3-1)

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近代化的进程非常缓慢。1900年以前只有零散建造的教会建筑如将军庙街天主堂,及洋务运动期间“建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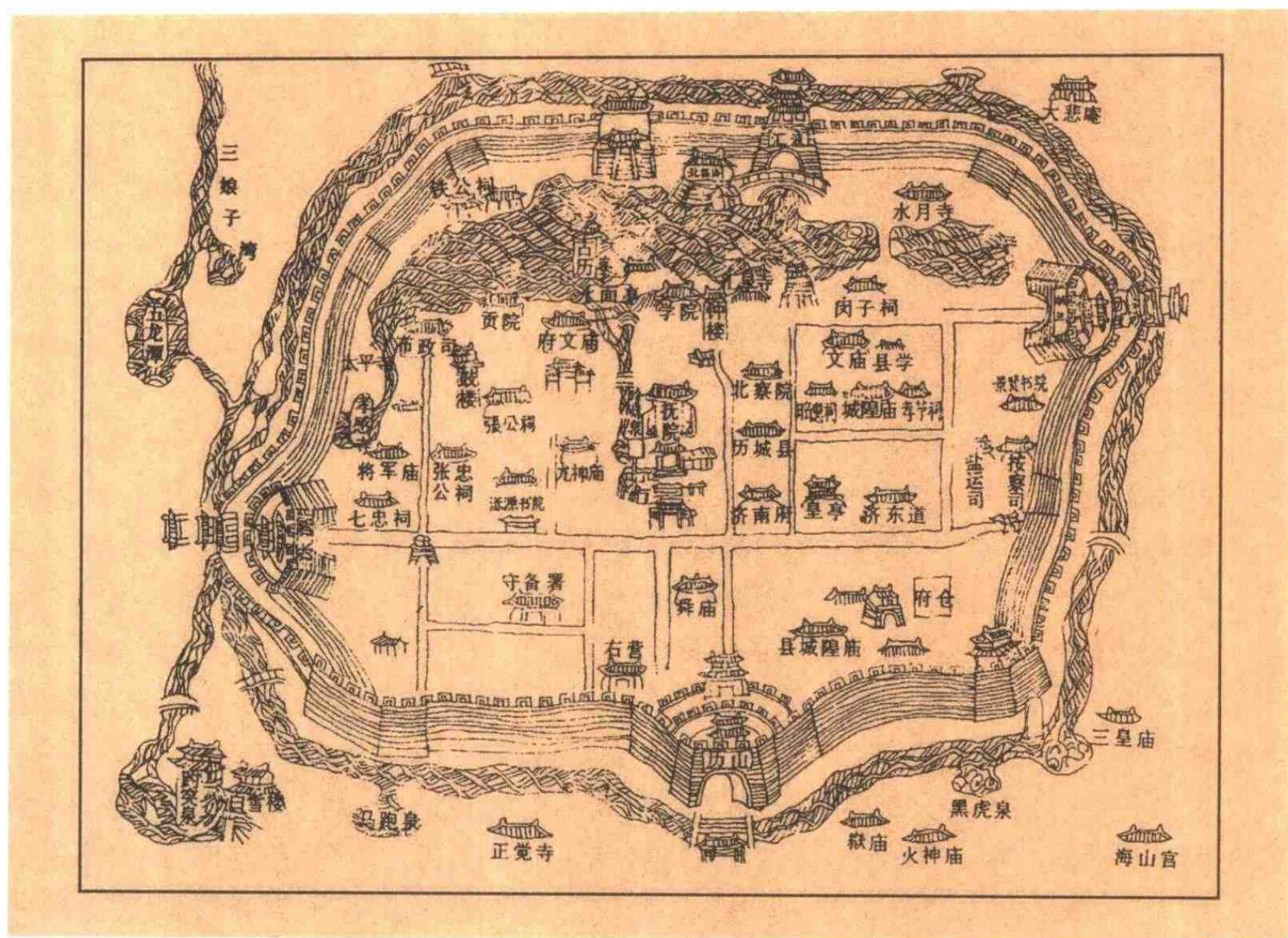


图 2-3-1 《济南府城并各衙门总图》。根据清《济南府志》编绘。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郑兴昌、亓育岱稿)。

局于城北赵家庄”(续修历城县志),在北郊建设的山东机器局等。济南城市真正迈出近代化的步伐是在 1900 年以后。1904 年,山东巡抚周馥奏请清廷在济南、周村、潍县三处开辟通商场,5 月 15 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一日)获准,“准各国洋商并华商于划定界内租地杂居,”并由济东泰武临道衙门监督开设商埠总局,制定商埠租建章程十五条,开始商埠区的建设。早在 1904 年,胶济铁路已竣工通车,1911 年,胶济铁路铺轨至商埠区,1912 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黄河铁路桥建成,济南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商埠区亦逐渐发展繁盛。这一时期济南自开通商场即商埠区的范围,北以铁路为界,南至长清大道,东起津浦铁路宾馆(俗称“十王殿”),西至北大槐树,称为旧商埠。旧商埠规划面积约 3000 亩(2 平方公里),已超过汉口五国租界区(2800 亩)的面积。道路规划以胶济铁路为参照物,出与铁路平行的经路及与铁路垂直的纬路构成棋盘格式道路系统,组成大小不等的矩形街坊,道路间距约 200 米,间距较密。商埠区只有经一路人行道用花岗石铺砌,设有定型雨水斗,沿道路中心有砖砌拱形下水道,采用雨污合流制下水系统。其他道路路面质量较差,多为碎石路与泥土路,人行道没有铺砌,尚未建设统一规划的下水系统,只在路边留有土明沟或砖砌方涵。自来水则迟至 1934 至 1936 年间才开始创办。虽然起步较晚,济南商埠区受商埠城市的影响,也以自开通商场的形式开始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图 2-3-2)

商埠区与旧城区相距不远,但与旧城区脱离,是独立的城市新区,形成二元并列的城市格局。商埠区与旧城区之间通过普利街、馆驿街、经一路相互联系,后期这些街道两侧逐渐形成商业区,使旧城区与商埠区连成一片。

商埠区的发展使早期规划区域不敷使用,因此济南市政厅先后于 1918 年、1927 年呈请拓展商埠区,使商埠区面积拓展到 3700 余亩。1925 年还有在旧商埠区至洛口码头之间开辟“北商埠”的设想,但未能实施,1937 年日军占领济南后,北商埠才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区。1939 年,日本侵略者将经七路以南,四里山以北,齐鲁大学以西,岔路街以东地段划为南郊新市区,当年强征土地二千余亩,辟为日本人的居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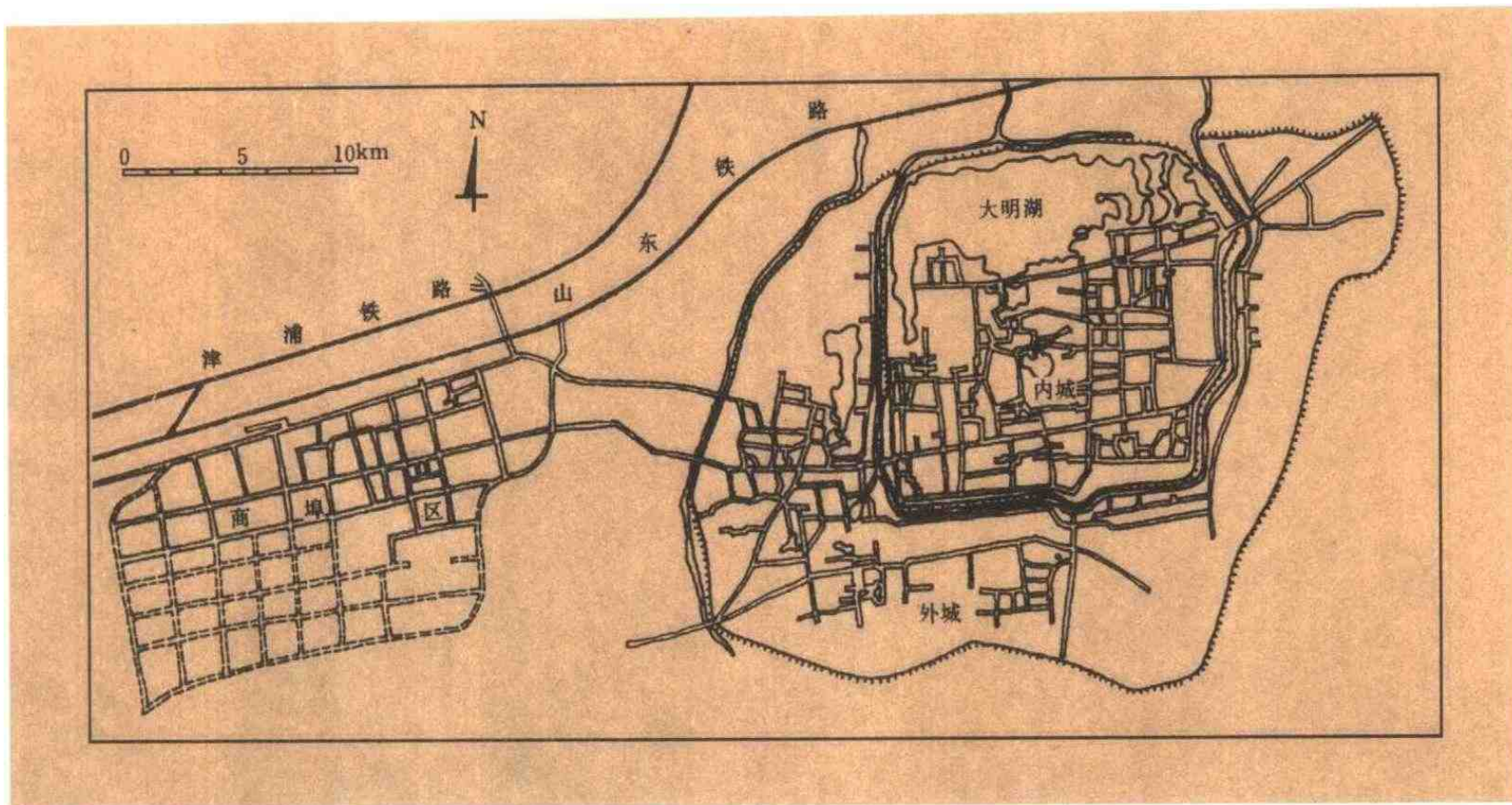


图 2-3-2 1904 年济南自辟通商场后的《商埠区与旧城区地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郑兴昌、元育岱稿)。

济南商埠区设立之前,在这一地区于 1901 年已建成一所为修建津浦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建造的住宅兼办公楼,后改为德华银行;同年还建造了由东、西两楼组成的德国领事馆。1909 年津浦铁路济南站建成,1911 年胶济铁路济南站建成,1937 年,日军占领济南后将胶济铁路济南站与津浦铁路济南站合并,津浦铁路济南站仍为火车站,胶济铁路济南站则改为路局机关大楼。与津浦铁路济南站同时建造的还有津浦路铁路局管理大厦(1909),后改为津浦铁路宾馆。其后,商埠区陆续建造公共建筑,如山东邮务管理大厦(1921 年毁于火灾,1923 年重建)、经四路基督教自立会礼拜堂(1924)、济南交通银行(1925)、瑞蚨祥鸿记布店(1923)、隆祥西记布店(1935),及西市场、新市场、大观园商场等。“铭新池”浴室是由中国建筑师张景文设计,1933 年建成的大型浴室。(图 2-3-3,2-3-4)



图 2-3-3 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已拆除,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2 年。



图 2-3-4 明信片中所载济南商埠区街景照片。图中塔楼高耸的建筑是山东邮务管理大厦。原图载《老明信片·建筑篇》。

1928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击溃张宗昌、孙传芳两军后,于5月1日进入济南。“当北伐部队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4月19日,日本紧急临时内阁会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案》。同日,急令第六师团五千人海运青岛;并电令天津日本驻屯军三个中队,沿津浦路南下。”^[77]于是,5月3日,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军向刚进入济南的北伐部队挑衅,公然破坏国际外交惯例,进入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将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残杀。8日,日军炮击济南城,北伐军李延年等部被迫自卫反击,奋战三昼夜,5月11日济南陷落。^[78]“五三”惨案日军暴行使济南旧城区受到严重破坏,老东门(齐川门)、西北角楼、西门(泺源门)、旧东门内楼、汇波桥及角楼城墙等均遭炸毁,旧城顺城街整条街及城内外许多民房被焚毁,黄河铁路桥被炸毁,直至1929年5月,日军才撤出济南。

1929年,津浦铁路恢复通车,济南旧城区逐渐复苏。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将府城的泺源、齐川、历山三门拆除,拓宽马路,并修筑从东门向北经北城至西门的马路。此后,旧城区内亦建有少量近代公共建筑,如隆祥布店(1935)、奎虚书藏楼(1936)等。旧城与商埠区之外,在旧城之东建有洪家楼主教大堂(1909),旧城与商埠区之间建有陈家楼天主分堂(1909)。另在南新街建共和医院,在新建门外建齐鲁大学,占地500亩,1910年开始招生,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教育区。^[79]

二、商埠城市影响的扩散——长江中下游的中等城市芜湖的转型与发展

商埠城市的影响也波及一些中小城市,芜湖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添开通商口岸”,芜湖辟为商埠。芜湖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长江与长河(现名青弋江)汇流处,是长江沿岸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元明两代芜湖已成为皖南山区、巢湖地区及淮河流域的传统商品集散中心。芜湖开埠的次年,“1877年英国首先在芜湖范罗山建立了领事馆。当年4月又同清政府官吏订立了《租界约》,决定在芜湖设立‘租界’(实为租地),划出陶沟至弋矶山麓沿江一带719亩土

地为租界区”^[18]1904年,芜湖关道台童德璋与美国领事柯黠良议定《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十条,章程第二条规定“界内地基准各国正股实商民选择合宜之地租赁”各国商民在界内租地时“由领事官知照地方官委员会同查勘明妥出租,俟将租价及一年地稅如数缴清,地方官即行印发租契三纸”章程第六条规定“所有巡捕事宜由地方官设立办理。”^[19]这些规定,明确了界内的行政司法权均归中国地方政府,这是清代地方官吏所称之芜湖各国“公共租界”与上海公共租界的本质区别。所以,虽然由于清政府官员昧于国际法,分不清“租界”与“通商场”的区别,而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将芜湖“公共通商场”称为“公共租界”,后来民国芜湖县志所载之图亦称为芜湖“租界图”,并以各外国洋行行名命名为“怡和租界”、“太古租界”等(这连租界是国家行为而不是商行私家行为的基本原则都不明白)这些都不能证明芜湖存在外国租界,判定通商口岸租界存在与否的标准,不是官方文书中的名称,而是中外条约中的实质性内容,即行政司法权的归属。(这在本章第五节有详细论述)所以芜湖并不存在外国租界,而只存在由中国官府管辖的公共通商场。

芜湖公共通商场的范围,“从西门外南至陶家沟起,北抵弋矶山脚下,东至普通山(又名桐家祠)脚新安普渡塔起,西抵大江水边上。”^[20]在这一范围内,开辟三条南北向道路:西面与江边纤路并行的沿江大马路,中部的中马路及东面的后马路(中埂),又开辟五条东西向道路,自南至北依次为: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并将土地划分为一区,由各洋行分租,民国芜湖县志所载芜湖“租界图”称为:费理伯租界、怡和租界、太古租界、瑞记租界、鸿安租界与和记租界。(图2-3-5)

芜湖开埠后,1877年李鸿章奏准将镇江米市迁至芜湖,至1882年芜湖已成为四大米市(芜湖、无锡、长沙、九江)之首,形成巨大的米市市场,“鼎盛时期(1918~1929)米粮出口每年多达八百余万担。经营米粮采运业的大米号有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大帮,近四十号,米行近五十户,小市行增至百家,磨坊多达七十户,机器碾米厂八家,整个米市从业人员曾多达七千余人,以长途载运粮食为业的船民约有二十万人。”^[21]米市兴盛,芜湖传统商业发展,旧城区亦不断得到发展。始于宋代,形成于明代中叶的古商业街“长街”得以复兴。1894年起在长街以北开辟与之平行的二街,1902年开辟与长街垂直的南北向道路大马路(1925年改名中山路),20世纪20年代开辟东西向道路二马路(1943年改名中正路,今新芜路)。二街、大马路和二马路逐渐形成商业街区,抗战以后取代长街成为新的商业中心。^[22](图2-3-6)

纵观芜湖开埠后城市发展的历史,公共通商场远离旧城区,面积不大,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米市兴盛而得到发展的则是旧城区。芜湖近代城市的发展,只是在传统物资集散中心(米市)的基础上使旧城区得到发展,与上海、天津、汉口等商埠城市因租界区的发展而使城市近代化进程快速进展,城市发生巨变的情况完全不同,芜湖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是缓慢的,属于受商埠城市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边缘城市,但在安徽省内仍是发展最快的城市。芜湖于1883年设立省内最早的电报局,1876年开设“民信局”,1894年开设电信馆(地方邮局),1896年试办邮政局,1904年正式设立邮政总局。1900年以后,芜湖于1906年开办明远电厂,1908年建成发电,1915年创办电话公司,1920年设立电话局。此外,1902年芜湖设立马路工程局,开始修筑以碎石路面为主的马路,1932年拓宽重建民国初年拆除老城墙修筑的环城马路,并重修了长街条石路面。

芜湖近代建筑并未形成成片建造的规模,只是在公共通商场、旧城区及城外风景优美的山上零星建造了一些行政建筑、教堂、教会学校、医院及一些公共建筑。除前述开埠初期建造的英国驻芜领事馆(1877)、芜湖海关税务司署(1877)外,早期在青弋江口北岸租用民房办公的芜湖海关于1919年建成海关关廨大楼,位于长江之滨鹤儿山麓的芜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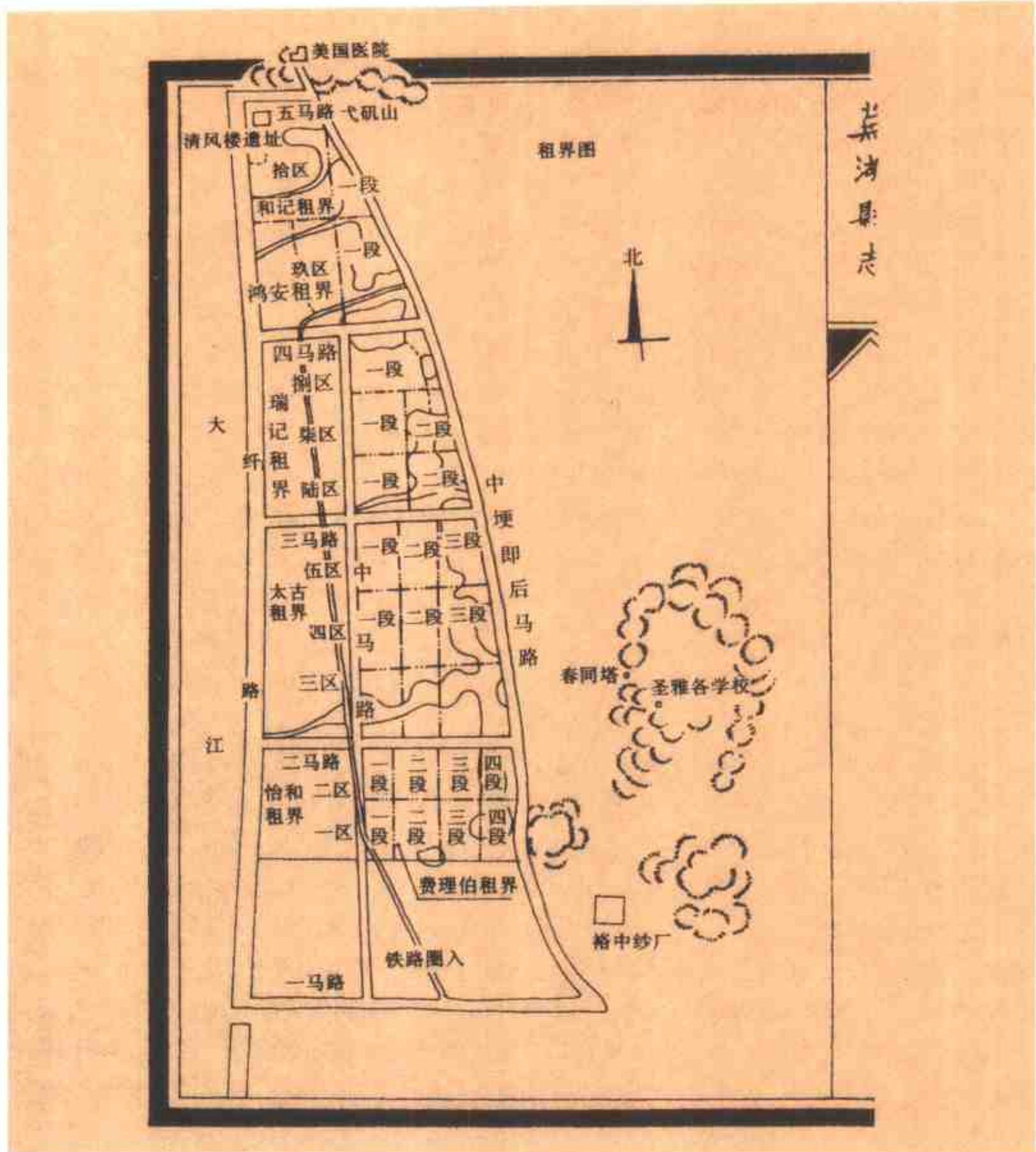


图 2-3-5 并非租界的《芜湖租界图》。原图载民国《芜湖县志》，转引自《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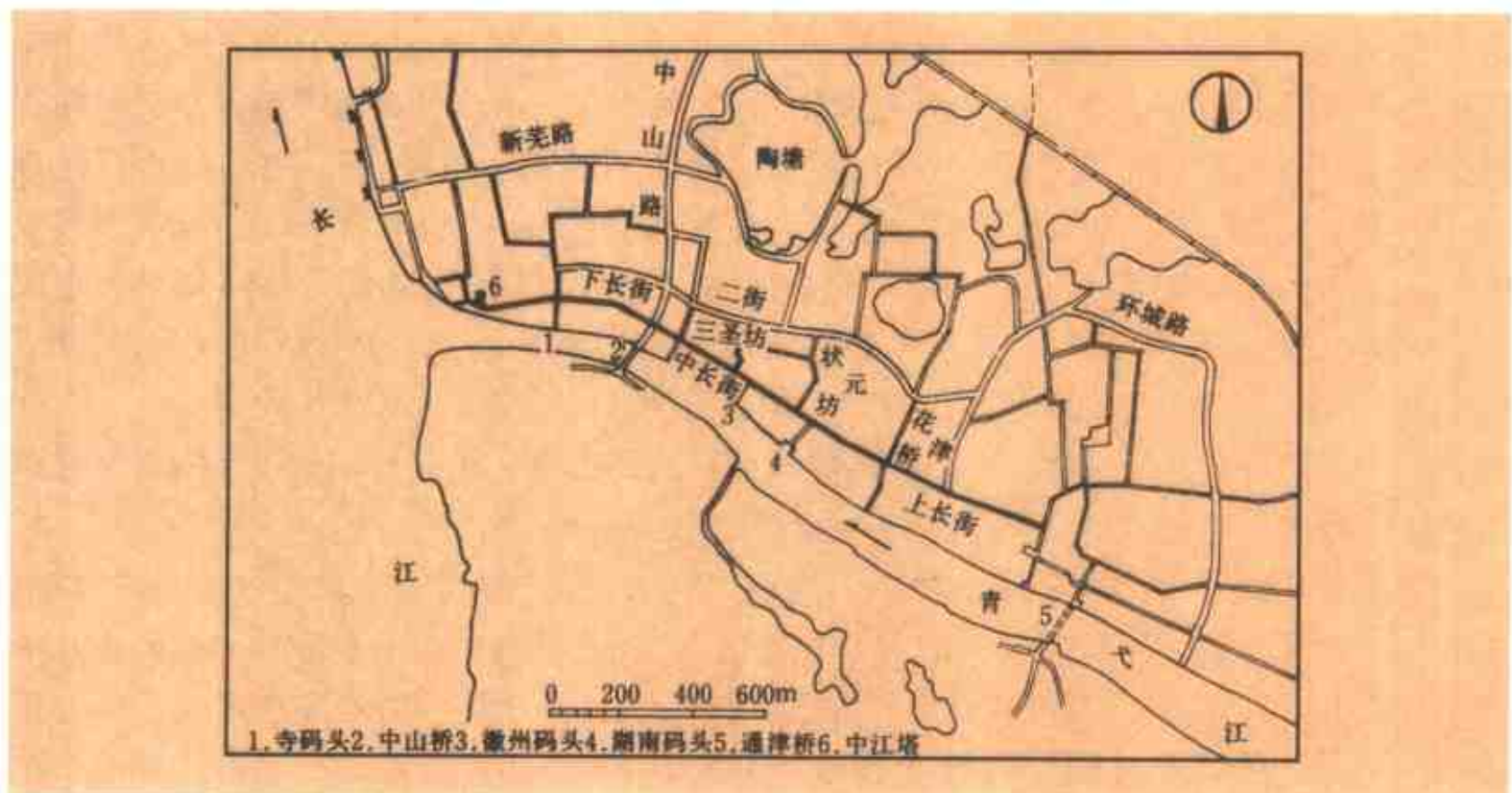


图 2-3-6 《芜湖十里长街示意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天主堂,依山而筑,坐东朝西,面对长江,1883年,天主教耶稣会法籍神父金式玉(Joseph Seckinger)在此购地设堂,1887年建造住院,1889年始建教堂。1891年5月,“芜湖教案”爆发,即将竣工的教堂被焚毁。后由清政府与上海法国领事馆议决赔款十二万余两白银,在原址扩大规模重建,至1895年6月落成。此后在芜湖城外山上陆续建造的教会建筑有:狮子山圣雅各学校“博仁堂”(1910)、弋矶山芜湖医院病房楼(前期1927年、后期1937年)、雨耕山内思工业职业学校教学楼(1934)等。此外,芜湖的教会学校还有凤凰山萃文中学、狮子山培德中学、鸡毛山崇志中学等。在旧城区二街,建造了中国银行芜湖分行大楼(1927),它是使用西方古典柱式的折衷主义西式建筑,由上海中南建筑公司建造。此时上海的建筑公司已有能力在周边省份承建西式建筑,而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85]

第四节 北京与南京——都城的更迭与兴衰

一、古都北京——天子脚下也开始大规模地 主动接纳西方建筑文化

封建都城北京,至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仍是首都所在地,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于1928年改为北平特别市,才失去都城地位。作为封建王朝的心脏,都城北京对西方近代建筑文化的抵制比其他城市更为强烈,这使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进程相对滞后。从鸦片战争后至1900年以前,北京虽有外国使馆的设立,及几座教堂的建设,但西方建筑文化对城市整体上没有多大影响,封建都城仍继续维持原有的运行机制与基本格局。(图2-4-1)

堤防的崩溃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此时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已开始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腐朽的清王朝也被迫有所反应,1901年慈禧在流亡之地西安发布谕旨,宣布变法;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观念的转变促成学习西方的热潮,一时学习西方成为举国上下,也成为京城上下的中心议题。这在思想观念上为西方建筑文化融入古都打开了突破口,封建都城终于产生了主动引进西方建筑文化的动力,这是这一时期影响北京城市近代化进程的精神要素。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1900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则进一步规定在北京正式划定使馆区,就在清廷的皇宫之侧,天安门前,北至东长安街,南至内城城墙,东至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兵部街,划出一片清政府无权过问的地域,俗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设立及区内西式建筑的陆续建造,还有庚子之后因重建教堂而形成的几个教会小区,在京城形成在物质形态上直接展示西方建筑文化的窗口,虽然在建设规模上无法与上海、天津、汉口的租界区相比,却也成为直接影响北京城市近代化进程的物质要素。(图2-4-2)

明清北京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城市,“整个都城以皇城为主,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占城市中心部分。从大清门起,经皇城和它的核心部分宫城(紫禁城)直达地安门,这一轴线完全为帝王宫廷建筑所占有。”“因为皇城居中,实际上宫殿把城市划为东西两部分,给城市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86]作为封建都城,北京城的整体规划更注重封建宗法礼制及帝王权威的象征作用,城市使用功能退居次位。1900年以后,拆除皇城城墙,开通道路,才使北京城市真正迈开近代化的步伐。“城墙城门是皇都的象征,1900年以后首先被铁路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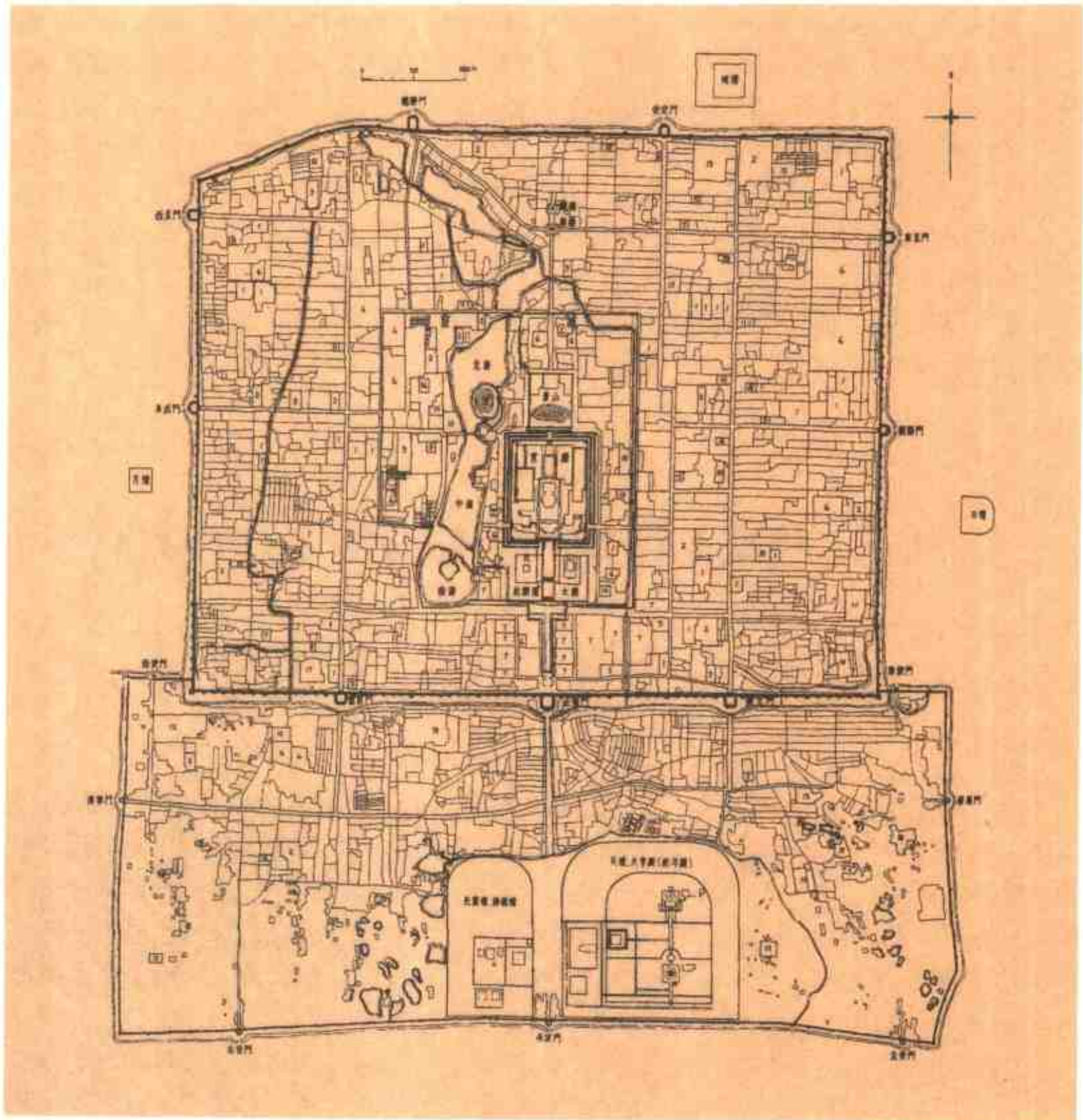


图 2-4-1 《清代北京城平面图（乾隆时期）》。原图载《中国古代建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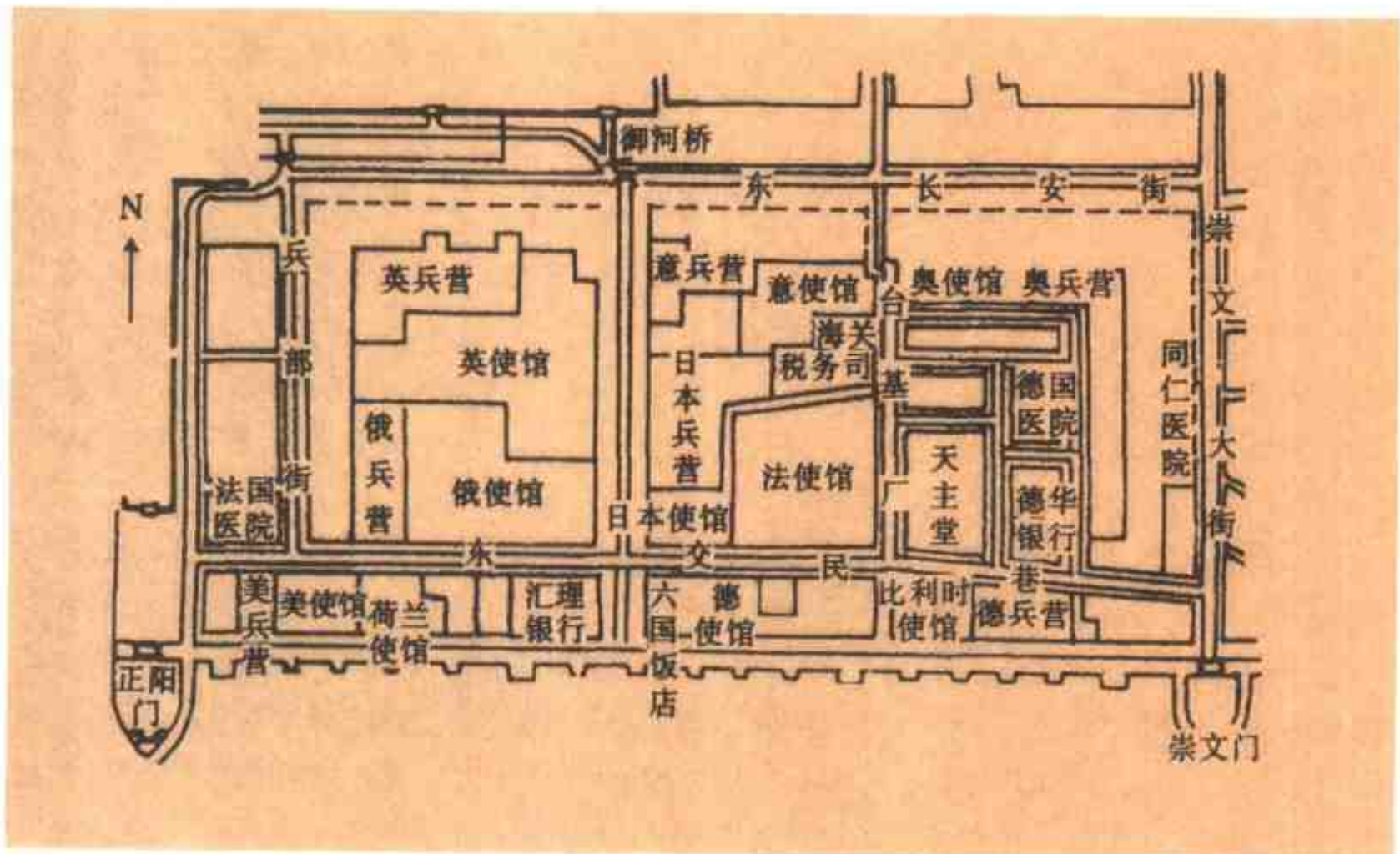


图 2-4-2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沈阳稿)。

破,至 1915 年修筑环城铁路,北京的城墙被拆出七八个豁口。皇城是第二道禁区,民国以后十几年内东、西、北三面拆去,改为大道。更大的变化是 1915 年拆除了正阳门瓮城,1913 年打通了长安街,同时打开了神武门后景山前街,又开辟了南北长街、南北池子。”“民国以后,乾清门以南的故宫和皇家坛庙,全部辟为公园或博物馆。1928 年以后,颐和园等所有禁苑全部收归民国,公开开放。光绪末年开始兴办近代市政,1914 年正式成立市政公所,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建设。”^[87]皇城禁区内公共道路的开通,尤其是长安街与景山前街的开通,是北京城市从古代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重要举措。

1900 年以前,北京“商业区分布在城市的各区,如外城的前门(正阳门)外与内城的地安门外一带作为主要商品集中供应地。同时在交通干道中心的東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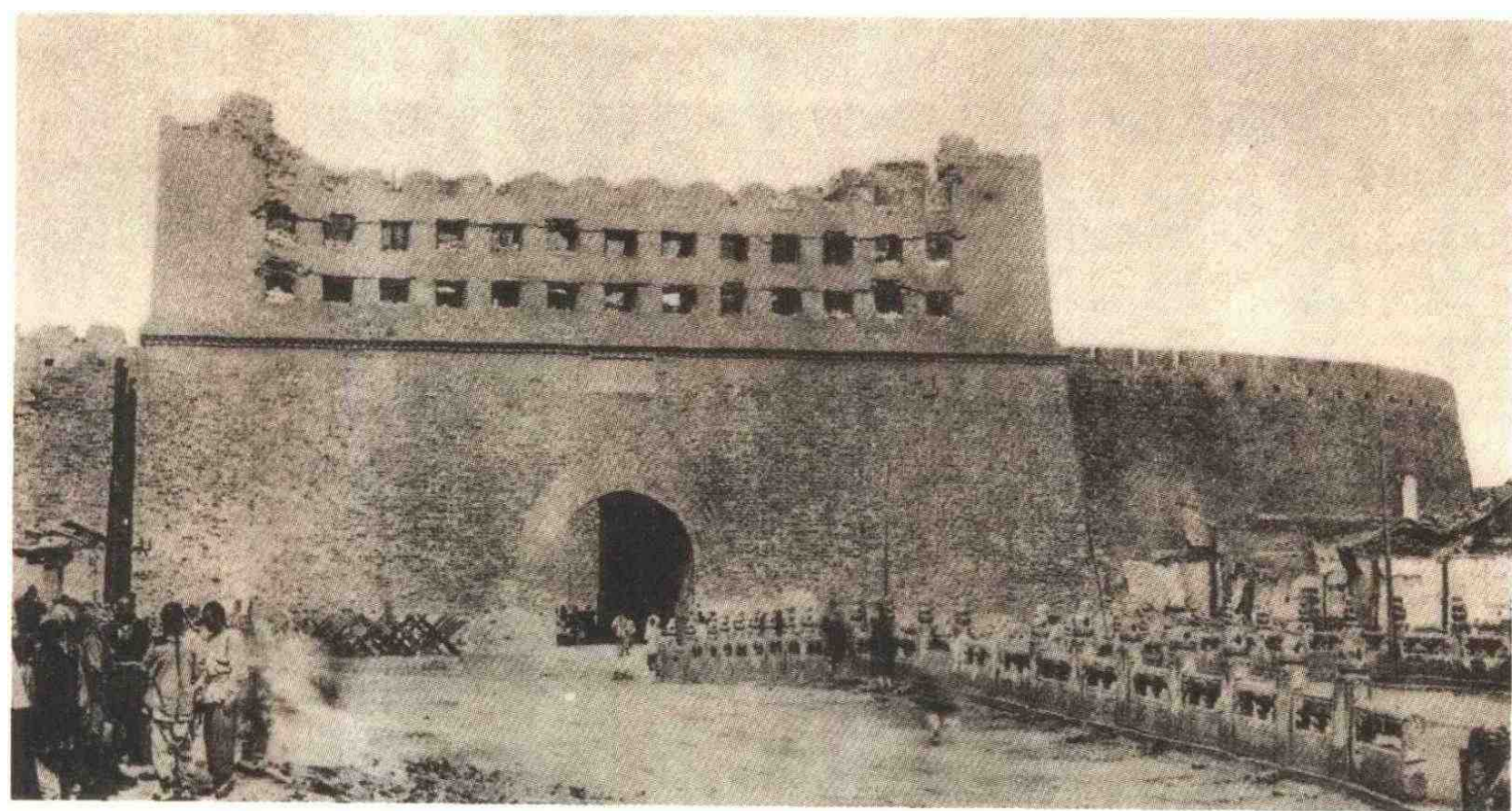


图 2-4-3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图为被八国联军焚毁的正阳门(前门)城楼。原图载山本诚阳编《北清事变写真帖》,转引自《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

亦有次要的商业区。”^[88]其中外城的前门外商业区起因于清初令北京内城汉族居民迁居外城,后来前门外一带逐渐繁盛,形成传统商业区。1900 年,前门外商业区遭受劫难,店铺被抢劫一空,房屋被焚,连正阳门城楼也被焚毁。(图 2-4-3)1900 年以后,前门外商业区逐渐复苏,与使馆区相邻的崇文门内大街、王府井大街一带亦形成近代商业街,北京的商业区格局发生变化,“在内城,以王府井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为代表,形成东西两处新式商业区。而变化更大,更有代表性的是在南城,即前门大街西侧西河沿至大栅栏,东侧打磨厂至鲜鱼口一带,再向南则是先农坛东、北两面。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几年间,这一带出现了一大批最有时代特色的仿洋式建筑。”^[89](图 2-4-4)

1900 年以后,在北京直接传播西方



图 2-4-4 北京大栅栏 1900 年以后重建的洋式门面店铺瑞蚨祥。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沈阳稿)。

建筑文化,成为西方近代建筑文化展示窗口的是使馆区与城内的教堂小区。北京的使馆区面积约 1000 余亩,1914 年以前,分为两个共管区及一个专管区,即包括日、意、西、法、德、奥、比等国使馆的东使馆区,包括美、荷、俄等国使馆的西使馆区,及独自为政的英国使馆区。1914 年,列强各国订立《北京公使馆区域规则》,成立行政委员会,管理该区包括警察事务在内的行政事务。使馆区成为北京城内不受中国政府管辖,驻有外国军队,有如公共租界的特殊地区。1900 年以后的使馆区与 1900 年以前仍由中国官府管辖、巷内设有官兵值班的官厅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本质区别就是行政司法权的归属,1900 年以后的北京使馆区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违背国际惯例的非法侵占行为。使馆区南临城墙,东、北、西三面建高墙围绕,界内中国官署、王府及皇室祭祀的满州堂子都拆除迁出,民宅私产作价拆毁,并规定中国人不许在界内居住。^[9]使馆区内的建筑,1900 年以前多沿用中国传统旧屋加以改造,有少量是新建的单层外廊样式建筑。1900 年以后,除改建、扩建使馆,新建兵营外,陆续建起 7 座银行、3 家邮电局、两所医院、两处俱乐部、两座教堂、一家饭店和一批洋行。至民国初年,这批新型公共建筑已达 90 余座,形成了一处全新的欧式街区。这些建筑连同使馆建筑,绝大多数都是 20 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风格,有的夹杂着中国建筑的细部装饰。^[10](图 2-4-5)除使馆区外,1900 年以后,被焚毁的京城教堂由清廷赔款修复或重建,北堂于 1901 年修复,南堂(1904)、东堂(1905)、西堂(1912)陆续重建,同时以教堂为中心建造了一批教会建筑,形成教会建筑小区。北京城内的这些西方建筑,对北京近代建筑产生影响,主要体现于商业建筑的西化,如前门外商业区洋式门面的市井建筑与仿洋式建筑。

图 2-4-5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东入口。原图载《旧京大观》。



1906 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新政”时期在北京建造了一批政府投资建造的新式官署建筑,如陆军部(1907)、大清银行(1908)、贵胄学堂(海军部,1909)、大理院(1910)、外务部迎宾馆(1910)、邮传部(1910)、军咨府(1911)、资政院(民国国会,1912)等,这些官署建筑已经全部西化,这是“新政”期间思想观念转变带来的学习西方的思潮的必然产物,这种新式官署建筑在北京建造最多,全国各主要城市亦有建造。这种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将在本书第六章专节详论。

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于 1928 年改为北平特别市。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

从首都降为普通的文化古城,如前文所述,此后中国的金融中心转移至上海,而政治中心则转移至南京。不再有中央政府财政投入与政府行为建设项目,北京的城市建设亦相应进入缓慢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初叶,近代建筑的大规模建设造成北京的局部繁荣,这里似乎真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这种繁荣是暂时的、表面的,一旦政府南迁,北京便迅速衰败、整体颓落。”^[92]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上海、天津、汉口等商埠城市迅速发展,济南、芜湖等边缘城市亦有发展,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建设却由盛转衰。这再一次证明,在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城市与建筑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政权更迭与战争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特定条件下,如1928年以后的北京,及下文所述1927年以后的南京,政权更迭就成为影响这两个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因国民政府迁都,前者衰,后者盛,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学界前辈谭其骧从1930年起,在北京度过十年时光,他的回忆是这一时期北京城市发展停滞状态的最好旁证:“北洋时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都已不复存在,只是一个华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首都的富贵荣华,已烟消云散。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商店店员、服务性行业人士的态度之好,无以复加。”^[93]1928年至1937年间,北京只有少量建筑零星建造,如北京图书馆(1931)、交通银行(1931)等,城市整体处于发展停滞状态。

纵观封建都城北京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有如下结论:北京近代城市与建筑的发展时间很短,主要集中在1900年至1928年,尤其是1900年至1911年间,发展程度也极不充分。近代北京的发展变化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意义,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终于波及最顽固的堡垒,天子脚下也开始主动接纳西方建筑文化。

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27~1949)

——《首都计划》与都城十年建设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东距长江入海口约300公里,西为皖南丘陵区,境内绵亘着宁镇山脉的西段,长江横贯于北,秦淮蜿蜒于南,形成了古人所称“龙蟠虎踞”之势。所以历代自东吴起,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明[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至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及太平天国都建都于此。

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开辟南京为通商口岸,其时,太平军已于1853年攻占南京,并于当年定都南京,开埠之约并未实施。直至1899年,才在南京下关开辟商埠,并设金陵关,但南京始终没有开辟外国租界。

1900年以前,与北京一样,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与上海、天津、汉口等辟有租界的商埠城市相比远远滞后,但也受商埠城市,主要是受上海的影响而有近代城市建设举措。“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还主持修建了穿越南京城区、路幅有6至9米宽的江宁马路。”“张之洞提出修建的江宁马路,就是参照了上海租界的马路技术结构标准。除个别路段属高级路面的木块路外,大部分是石铺路面,或者在路基做成后,略铺砂石,稍好的是加铺煤渣或碎砖,不少路段仍然是晴通雨阻。”^[94]江宁马路建城后成为贯通南京城区南北的主要干道。1899年,还在下关修建了商埠街和大马路、二马路,城内亦改建了部分传统道路。这一时期南京只有零星建造的少量近代建筑,一是洋务运动时期建造的金陵机器局(1865年起陆续建造)、金陵船厂(1866)、金陵官书局(1868)、金陵火药局(1884)等工业建筑。二是外国传教士来到南京后建造的教会建筑,如“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今石鼓路天

主堂,1870)、汇文书院(1888年至1898年陆续建造)等。

1900年至1927年,北京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南京则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仍属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边缘城市行列。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因失去首都地位而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1927~1937)脱离主流城市地位,成为发展缓慢的边缘城市。南京则恰恰相反,于1927年以后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城市的行列,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潮流同步,在1927~1937年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府行为,迎来了历时十年的快速发展时期。正是这短短的十年,奠定了南京近代城市的基本格局,更重要的是,以政府行为及政府财政为依托,一批中国建筑师创作的“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建筑,即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在南京陆续建成,写下了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1900~1927年间,下关大马路、二马路、永宁街一带的商业区得到发展,市区划基本维持旧貌,所以1927年建都初期南京的媒体这样评述当时南京的城市状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旧有的道路,不能名为何种网状,鼓楼以北,几乎无道路可言;鼓楼以南的所谓城南繁盛区,路向不定,路幅狭小,完全是些陋巷,商店林立的街衢,没有一面是整齐的。”“最繁盛的街道,要算是花牌楼、府东街、三山街、北门桥、夫子庙、东牌楼,可是这几处路面,仅几尺宽,来往行人,肩摩踵接,拥挤不堪。一条通达下关的泥道,算是南京唯一的交通大道,其宽度也不过十二三尺而已。”^[95]

这一时期建造的重要建筑是清末实行“新政”期间,于1909年建成的江苏省咨议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各省相继建造“咨议局”建筑,与北京这一时期建造的新式官署建筑一样,这批“咨议局”建筑亦取西式建筑风格,又融入少量中国传统建筑纹饰,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有其特定的价值。1900~1927年间还建造了南洋劝业会场(1910)、扬子饭店(1914)、下关中国银行、江苏邮政管理局(1918)等,中国银行与江苏邮政管理局已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真正对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产生本质性影响的,是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首都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于同一天在丁家桥江苏省议会举行定都南京庆典。1928年1月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由委员会下属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负责制定《首都计划》,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Murphy Henry Killam)与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任顾问。《首都计划》于1929年12月31日正式公布,这一计划涉及范围很广,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南京史地概略,南京今后百年内人口推测,首都的范围,中央政治区与市行政区的位置,道路系统规划,公园与林荫大道规划等。计划对建筑形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一,所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其二,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也。其三,光线空气最为充足也。其四,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96]其中“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一条成为此后至1937年间,中国建筑师掀起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热潮的极有号召力的口号,后来发展为“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首都计划》还涉及市郊公路,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规划,港口规划,机场规划,市政设施(自来水、电厂、下水、路灯等)规划,公交设施规划,住宅区规划,文教区规划,工业区规划及浦口规划等诸多方面。此外,为保证计划的实施,还规定了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以及计划实施程序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的计划。

《首都计划》聘墨菲、古力治为顾问,很大程度上以当时欧美,特别是美国城市为参照标准,是当时中国城市规划受西方影响的普遍潮流的反映。对这一计划的评价似可概括为:西方最新城市规划模式与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模式结合,城市整体格局走世界城市近代化的共同道路,体现了当时流行于欧美,1933年总结为“雅典宪章”的城市规划基本原

则,即城市应具备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而具体的建筑形式则强调“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追求城市功能国际化与城市形象民族化的结合,这一至今仍困扰中国城市发展的难题,第一次在南京《首都计划》中得到体现,这也许就是《首都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图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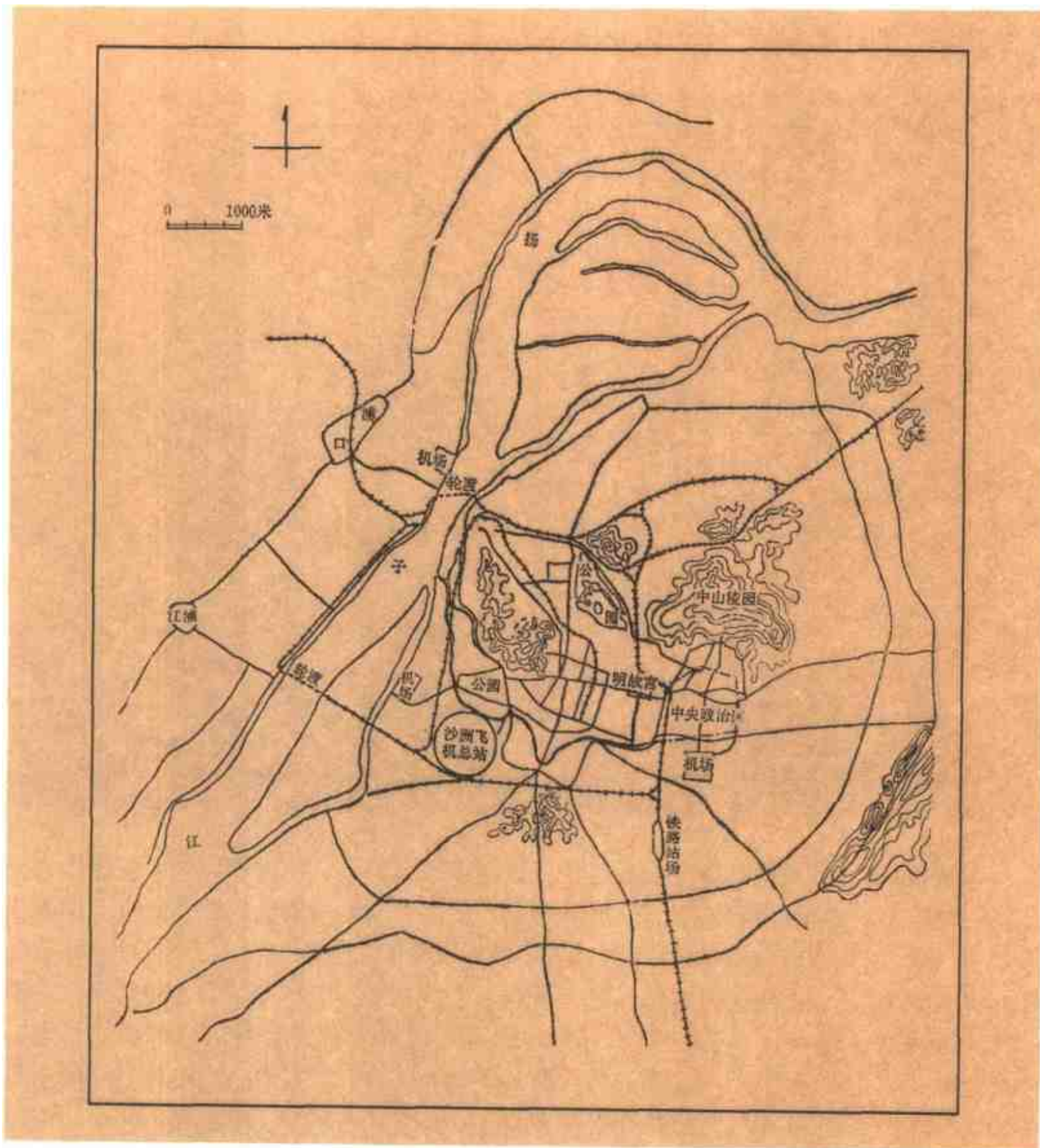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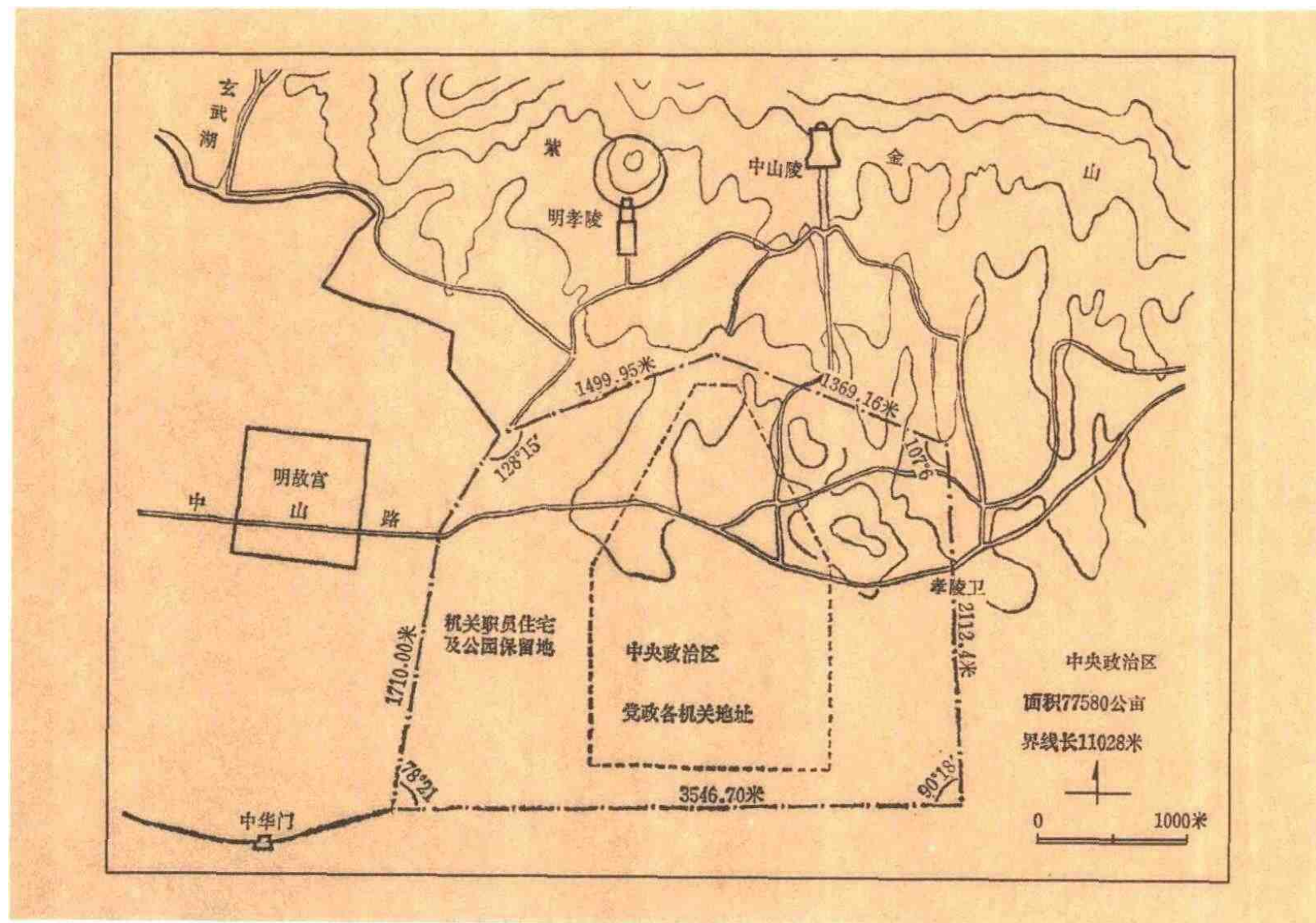


图 2-4-6 《“首都计划”(南京)城市总图(1929年)》。原图载《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但规划与实施的距离是遥远的。影响《首都计划》实施的障碍之一是规划脱离现实,对城市现状及当时首都特有的人文条件缺少正确的评估与相应的对策,因而导致计划难以实施。“《首都计划》规定城市分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和住宅区等,其中以中央政治区为重点,计划设在中山门外紫金山的南麓,其结果是纸上谈兵,各政府机关根本没有照计划进行,而且大都各行所好,到处乱建房子,主要集中在中山路沿线,如铁道部、交通部、外交部、立法院均建在中山北路,司法部建在中山中路,财政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建在中山东路。因此,后来不得不把中央行政区计划改在中山门内明故宫一带。”“旧南京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如《首都计划》所宣传的那样实现,因为分区的新计划完全舍弃了原有城市基础而重新建设,一方面需

要巨大经济力量方能实现,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本身不可能按计划执行,因为许多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房地产大都在已建成的街道两旁,希望新的建设能在这些地段发展,随之可以提高地产价格。由于上述种种社会与经济原因,各项规划很难完全实现。”^[97]障碍之二是巨大的资金缺口,因近百年的动乱、战争、帝国主义的掠夺,使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很弱,以政府行为在短时期内筹措巨额资金,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是不可能的,所以建设南京的《首都计划》只能局部实施。(图 2-4-7)

图 2-4-7 《“首都计划”(南京)中央政治区图》。原图载《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尽管《首都计划》只能局部实施,还是促使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迈开了关键性的步伐,系统的、在城市规划指导下进行的旧城改造,使南京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旧城改造的最具代表性、最有成效的城市,这种成就主要体现于城市道路与市政工程建设,城市公园与绿化建设,及一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建造三个方面。“1928年8月12日,南京的第一条柏油马路——中山大道破土动工,至1929年5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当时,这条干道主要是为孙中山灵柩奉安中山陵而建,故原名迎榱(chèn)大道。中山大道是当时南京市内最长的主干道,全长12公里,设计宽度40米,中部快车道10米,慢车道6米,人行道5米。它北起江岸,东出中山门与陵园大道衔接。全线工程各路段及配套工程的命名均冠以‘中山’之名,以作永久性纪念。”“南京以辟建干道系统,拓宽路面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历经数年,建成了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太平路、朱雀路、白下路、汉中路、中华路、雨花路、山西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热河路、大光路等48条干道;新筑和拓宽联络干道、贯通各区域的次要道路33条。至1934年10月,干道和次要道路竣工61公里。后来,又有珠江路、广州路、莫愁路、上海路、昇州路等27条道路建成。至抗战前夕,市区竣工各线道路总长达119.3公里。这些道路在设计上突破了历史上简陋守旧的道路格局,辟成以新街口环形交通广场为市区中心,以中山东路、汉中路、中正路、中山路为东西南北中轴线的道路系统。该系统主干道宽40米,分设快慢道,并以游憩岛(后称安全岛)分隔,从而形成较现代化的城市道路系统。”^[98]在修建城区道路的同时,也注意到城市绿化,在《首都计划》中包

括了林荫大道的建设。“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之前,曾留学法国的东南大学教授常宗惠奉命从上海法租界购得法国梧桐树(学名悬铃木)数千株,抢种在陵园大道和中山大道上,成为南京最早的一批行道树。当时抢种在陵园大道上的就有1007株,每株高3.4米左右,株距为6.6米,余下的树木种植在江苏路和长江路等处。以后,南京市政当局又在紫金山新设苗圃5处,每年可供树苗500万株,林木800万株。”^[9]1928~1937年,南京的道路及市政建设与绿化建设形成的南京城市近代化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今天。(图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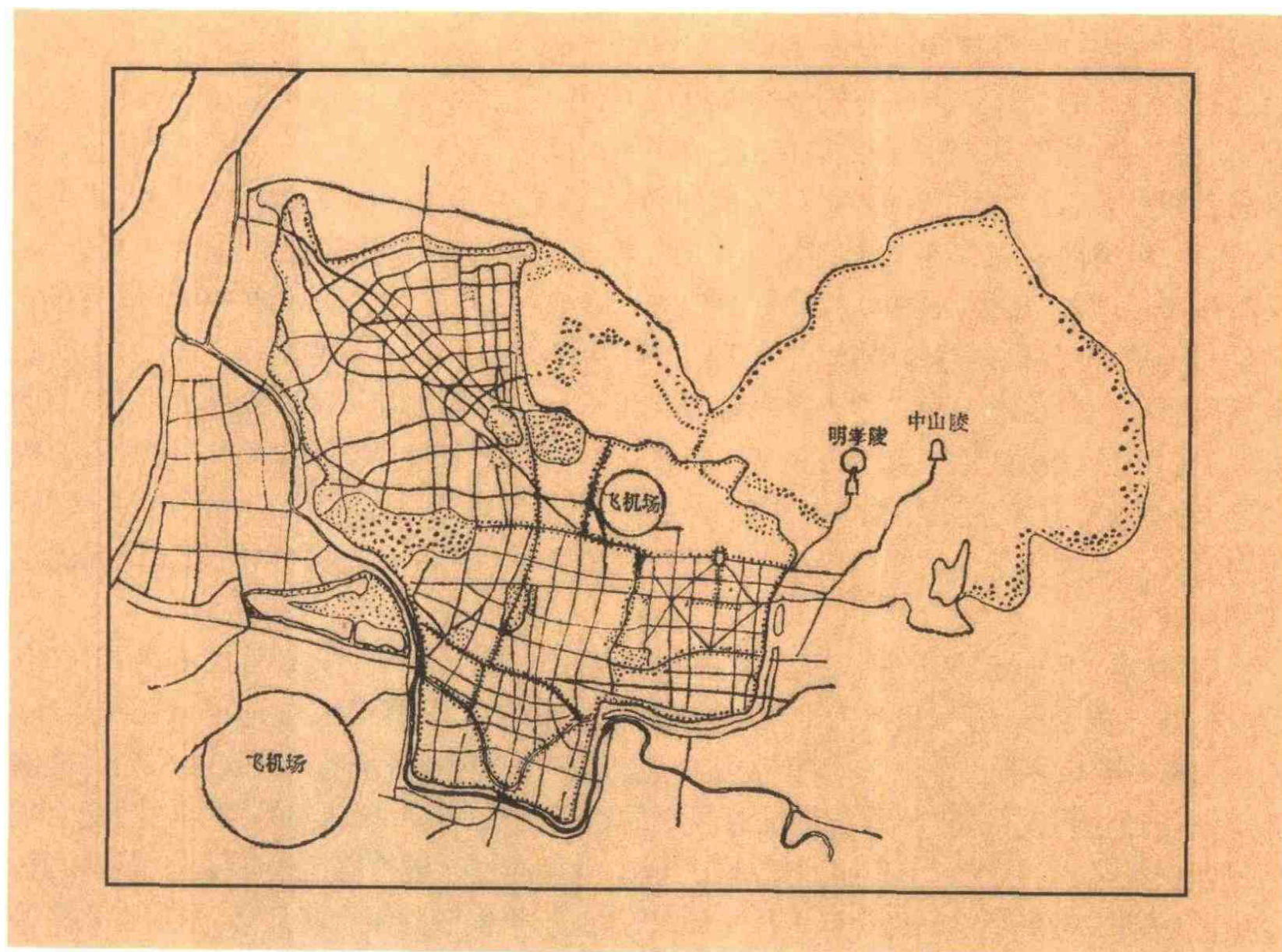


图2-4-8 《“首都计划”(南京)林荫大道系统图》。原图载《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这一时期南京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建筑,如中山陵、中山陵园音乐台、国民党中央博物馆、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等更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将在本书第六章专节论述。

第五节 租借地与铁路附属地及租借地城市与铁路附属地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一、租借地与铁路附属地的产生

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租借的大片战略要地,与租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租借地占地面积很大,往往达上千平方公里,在其与中国内地的毗邻处往

往还设有称为“隙地”的军事缓冲地带；租借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多是租借国政府直接任命的总督；租借地的司法制度与租界、华界都不相同，所有中外居民都受租借地当局的司法管辖；租借地的租借国政府也不交纳地价、地税。此外，当侵占租界或租借地的列强各国与第三国宣战后，该国租界作为中立区置身于战事之外，而租借地作为军事基地，不但不能视为中立区，反而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总之，较之租界，中国在租借地丧失了更多的国家主权，殖民化程度更甚，除了在名义上仍是中国领土外，与被割占的领土已没有什么区别。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不可将租界与租借地混为一谈，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史料及前人著述中此种错误比比皆是，不可引以为据，以讹传讹。关于这一点，费成康有较为精辟的论述：“列强在向清政府强租这些海军基地时，就认识到它们与租界的区别，因而在有关约章的外文文本中它们被称为租借地，在英文中即作 *Leased Territory*，在德文、俄文、法文中也择用相应的词汇，在日文中即使用汉字‘租借地’三字。但是，昧于国际法的清朝官员一直没有注意租界与租借地的异同，在有关条约的中文文本中，一直并用租界、租地、租借地等词，将租借地等同于租界。因此，当时也有胶州湾租界、旅大租界之称。民国初年，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中国外交官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分别将‘归还租借地’与‘归还租界’列为‘希望条件’中的两项。此后，中国的政治家、外交官、法学家和史学家几乎都未将租借地与租界混为一谈，反映出民国初期世人的见识已比清朝统治者高出了一筹。”^[100]下文中的《胶澳租界条约》及《广州湾租界条约》即为晚清官方在有关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将租借地等同于租界的例证。而直至今日，建筑类论文中此种将租借地与租界混为一谈的现象仍时有出现，这是应当引起建筑界的学者们注意的。

《马关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满，于是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后，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此后，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到达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的修筑与经营由中国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并规定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通过这条铁路运送军队与军用物资，这就是后来的中东铁路。1896年9月8日，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设立名为中俄合办，实为俄国独揽大权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与经营中东铁路，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可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及兴办其他工矿企业，从而将这些地区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101]

1897年11月4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当年12月，俄国亦出兵占领旅顺口与大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给德国，租期99年，并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由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至济南，再至山东边界的铁路，及由胶州湾经沂州、莱芜至济南的铁路。同年3月27日，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又于5月7日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租期25年，并允许中东铁路公司修筑从中东铁路通往旅顺口、大连湾的铁路支线。1897年7月1日，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连同刘公岛及威海卫沿岸十里宽的地区租给英国，租期25年。1898年11月6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连同其附近水面租给法国，租期99年。1898年6月9日，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同意英国租借北九龙及香港周围的海面与海岛，租期99年。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在中国开辟了五处租借地。^[102](图2-5-1)

随着中东铁路相关条约的签订及铁路的修建，产生了铁路附属地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随着租借地的开辟，产生了租借地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城市在中国近代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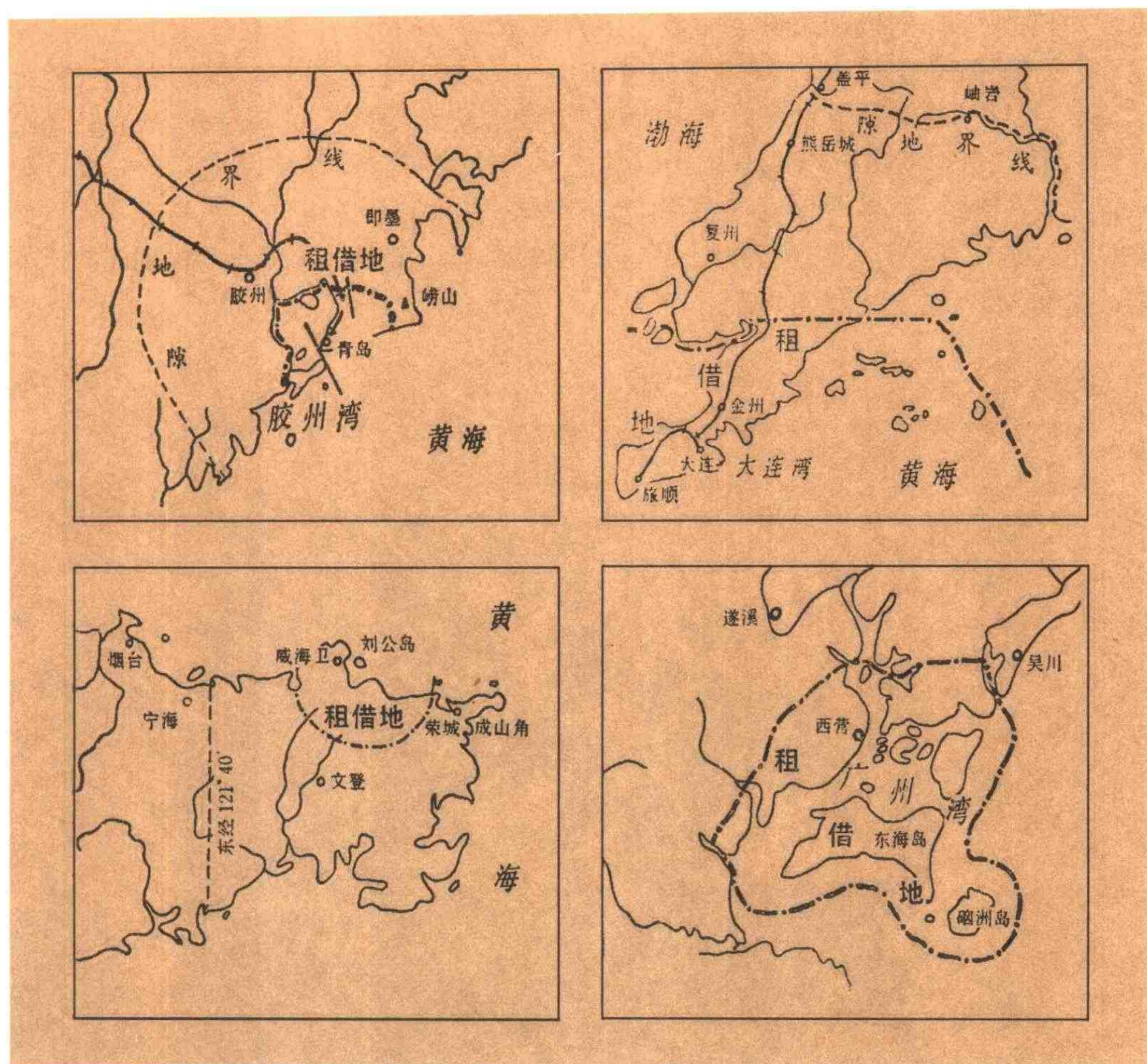


图 2-5-1 租借地地图。上左：胶州湾租借地地图；上右：旅大租借地地图；下左：威海卫租借地地图；下右：广州湾租借地地图。原图载《中国租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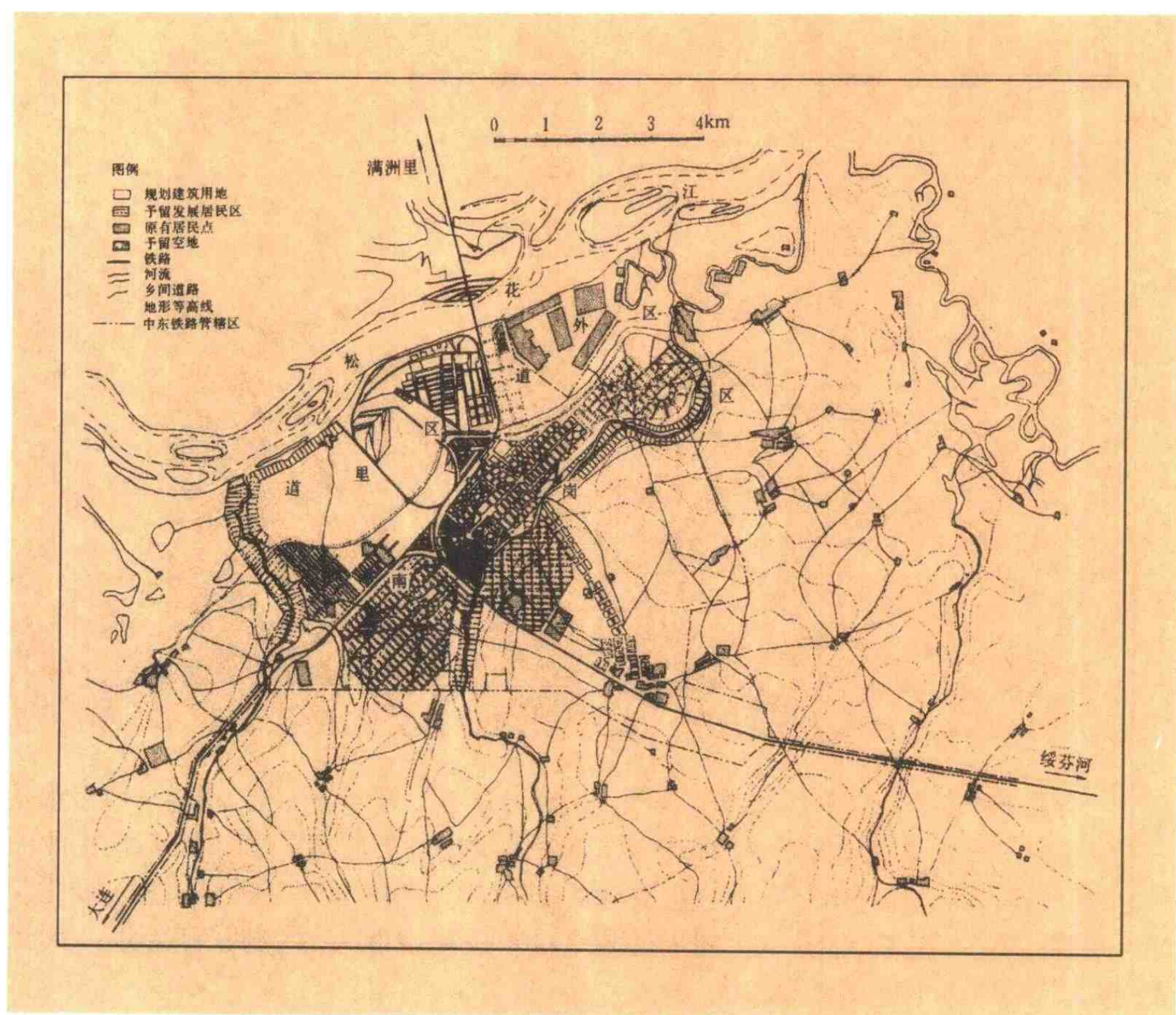
筑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尤其是哈尔滨、大连、青岛这三个城市更为典型，三个城市都是由某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侵占铁路附属地或租借地，为经济侵略或军事占领的目的而平地建设的新兴城市，在城市建设的初始阶段就按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城市规划模式制定初期城市规划，并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基本按初期城市规划实施城市建设，从而形成具有租借国建筑特色的近代城市。

二、铁路附属地城市——新兴城市哈尔滨的产生与发展

1898年，中东铁路建设工程总局从海参崴迁至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交汇枢纽与中东铁路局的大本营，哈尔滨开始形成近代城市。1899年，由中东铁路建设工程总局制定哈尔滨建城规划。哈尔滨地势丘陵起伏，南高北低，南依马家沟河，北临松花江，中间是一条带状高岗地，北至满洲里，南至大连，东至绥芬河，三条铁路交汇于市区。规划顺应地势，沿高岗地峰脊布置城市主干道，地势最高的南岗为铁路行政区；北面临松花江的埠头区（今道里区）临江建设水运码头，垂直于松花江的中国大街、新城大街与横街构成商业街区与居住街坊；西面偏脸子地区为铁路工厂区。这一规划确定了哈尔滨作为铁路交通枢纽城市的基本构架。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俄于1905年9月25日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其从中国获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所有权利转让给日本，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支线，连同铁路区内的所有权利、财产转让给日本，从此形成日

本控制“南满”，俄国控制“北满”的局面。1905年12月22日，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哈尔滨等东三省十六个城市辟为商埠。开埠后的哈尔滨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的近代城市，1917年以前的哈尔滨，已形成新市街（南岗）、埠头（道里）、傅家甸（道外）、老城（香坊）四区，其中新市街（南岗）与埠头（道里）按初期城市规划建设，奠定了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哈尔滨特有的近代建筑风格，在西方折衷主义风格建筑的洪流中，俄罗斯风格建筑与几乎与欧洲国家同步出现的新艺术运动建筑成为哈尔滨近代建筑文化的突出特征。（图2-5-2）

图2-5-2 《1906年哈尔滨的城市规划简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于1920年收回俄国在东北侵占的权益，成立东省特别区，哈尔滨为东省特别第一区，但迟至1926年，才解散俄国人控制的市公议会与董事会，成立哈尔滨特别市。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难民进入哈尔滨，为此，哈尔滨建造了偏脸子的“纳哈罗夫卡”村，正阳河的“沃斯特罗乌莫夫”村等新住宅区和商业点，市内修复、改建、新建了一批宗教建筑，以东正教宗教建筑居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于1932年2月占领哈尔滨，1933年7月成立哈尔滨特别市，1937年改为滨江省直辖市，日本占领哈尔滨后着手制定并实施哈尔滨都市建设规划，扩大城市范围，将邻县划归哈尔滨市，新规划仍维持沙俄时期规划特点，建筑风格呈现哈尔滨早期建筑风格的延续与20世纪30年代日本流行的简洁形体、面砖饰面的东洋建筑风格并存的格局。此时期日本人聚居的道里区石头道街、地段街、买卖街、透笼街、新城大街与中央大街一带迅速发展。经过四十几年发展，经历了沙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收回与日本殖民统治三个发展阶段，至1945年日本投降，哈尔滨已基本完成了近代城市的发展进程。^[103]（图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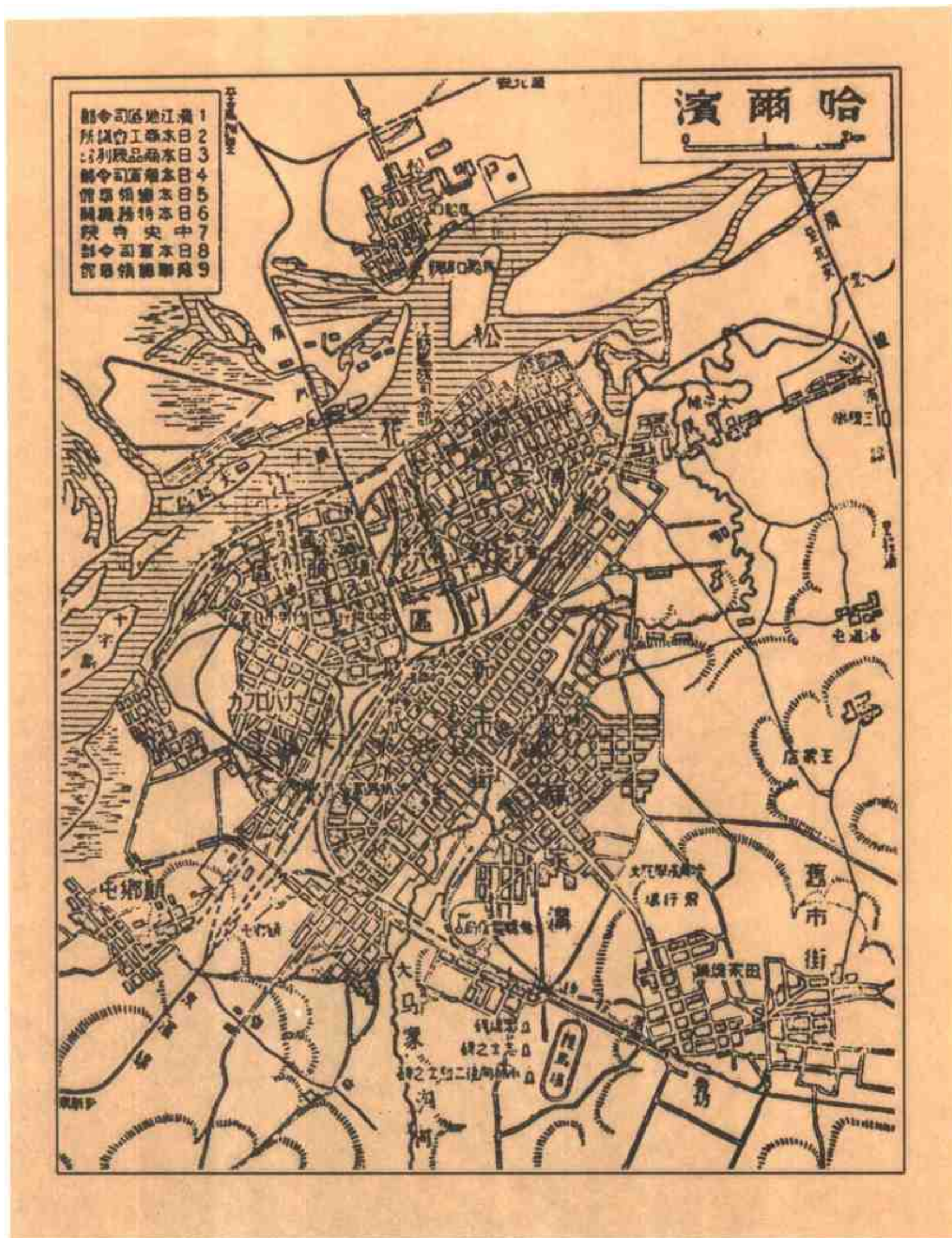


图 2-5-3 《哈尔滨城市平面图(1937年)》。原图载《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三、租借地城市——新兴城市大连的产生与发展

1898 年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与《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后,沙俄当局将旅大地区划为俄国的一个州——关东州。1898 年编制大连城市规划,将市区分为三区:行政市区、欧洲市区与中国市区。规划采用广场加放射形道路系统模式,市中心位于欧洲市区,中央是 200 余米直径的尼古拉广场(今中山广场),以广场为中心规划十条放射形道路,其中东西贯通的主要道路是 33 米宽的莫斯科大街(今斯大林路)。中央广场之外,又规划了几个不同形态的广场与放射形道路系统,道路相连,形成仿欧洲工业革命后,L.贝纳沃罗所称的

“自由资本主义后”的城市规划模式,构成大连早期城市的基本骨架,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础。^[104](图 2-5-4)此后的四五年间,大连城市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完成,行政市区与欧洲市区初具规模。1904 年日俄战争打断了沙俄的大连城市建设计划,但城市的基本形态已经形成。(图 2-5-5)

图 2-5-4 《1901 年大连市规划图》。原图注:商业、绅士、平民三街区总称欧洲区。原图载《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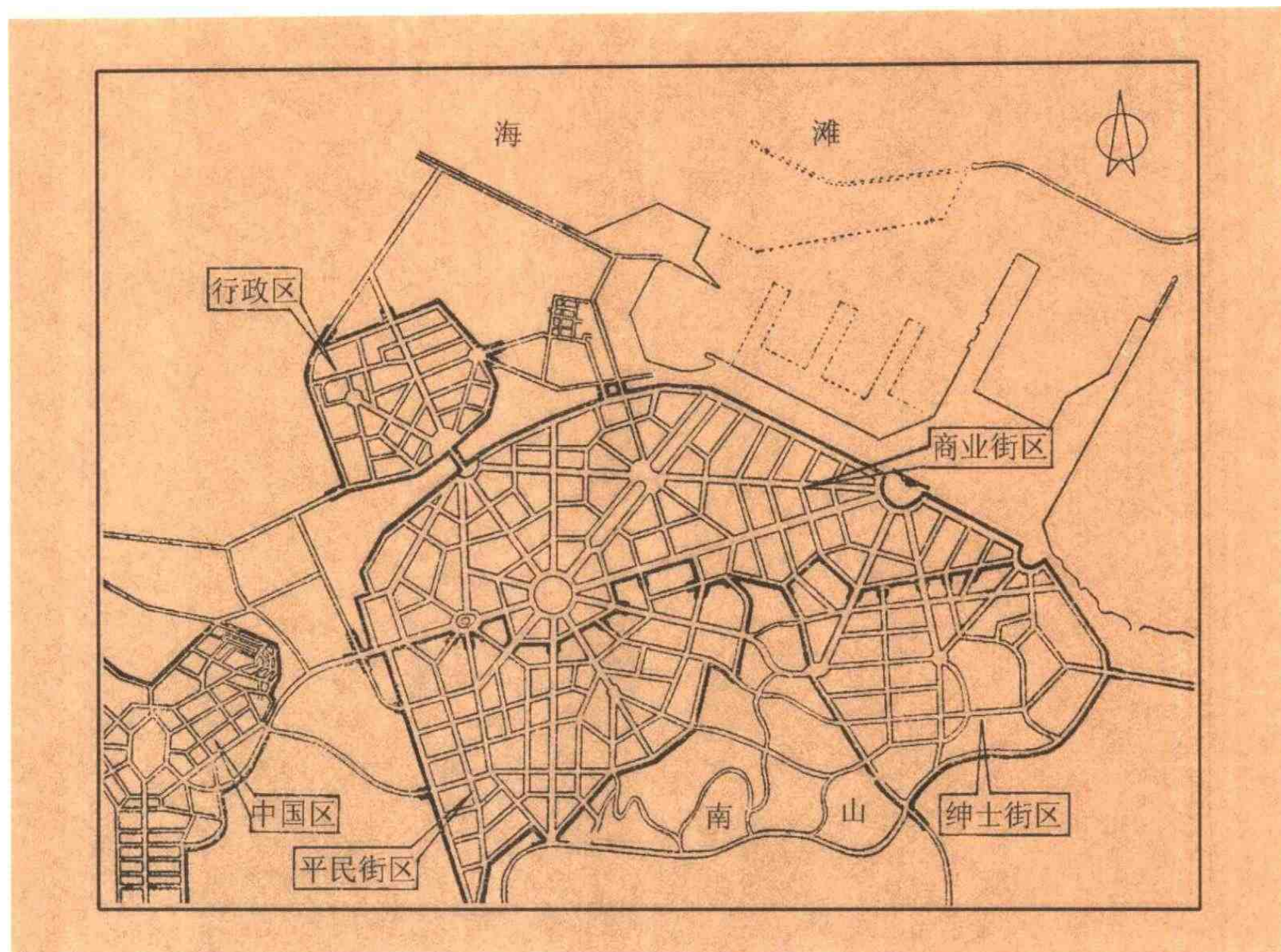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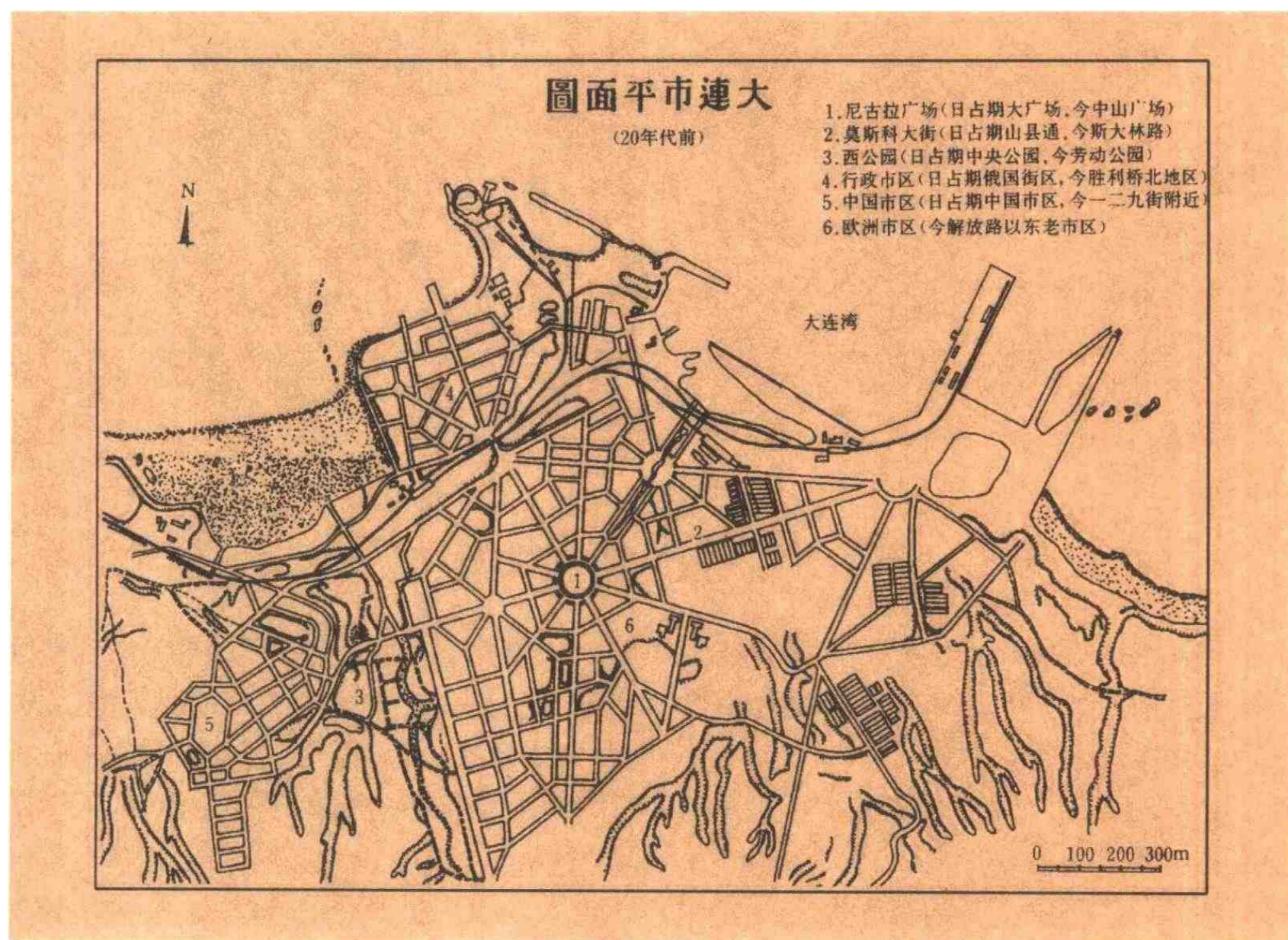


图 2-5-5 《沙俄时期大连市区规划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伟伟稿)。



1905年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大连,1906年在大连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外,还经营铁路两旁三十公里以内的矿区、航运、土木等多项事业,对此后几十年大连的城市建设,满铁所属业务部门,包括满铁设计课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侵占大连之初,即决定按沙俄时期的城市规划开展城市建设,并于1905年编制大连市房屋建设管理规划,作为最初的城市建设法规。1907年在沙俄时期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调整规划,并开始修筑道路及上下水设施,建设市中心公共建筑,主要是大广场(沙俄时期尼古拉广场)及广场周围的公共建筑。至20世纪20年代,大广场地区基本建成,环绕广场的建筑风格协调、体量均衡,建筑均取朝向广场的向心布局,广场周围的环形道路与城市放射形道路系统相连,构成大连近代城市的中心区。

至三十年代,大连人口已达30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成立大连城市规划委员会,决定以常盘桥(今青泥洼桥)为中心向外发展,包括甘井子工业区、老虎滩、傅家庄及夏家河子游览地,并保留了一部分山地、丘陵作为公园与绿地。还在沙俄时期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发展了广场加放射形道路系统模式,主要街道及街道两旁的建筑都已建成,并建成了大广场(沙俄时期尼古拉广场,今中山广场)、日本桥广场(今胜利桥广场)、港桥广场(今港湾桥广场)、驿前广场(今胜利广场)、西广场(今友好广场)、敷岛广场(今民主广场)、朝日广场(今三八广场)、千代田广场(今二七广场)、大正广场(今解放广场)、黄金广场(今五四广场)、花园广场(今花园广场)及长者广场(今斯大林广场)。其中长者广场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随市区向西发展而规划建设的行政中心,是位于城市街道一侧的矩形广场,与大广场风格完全不同,面积很大,北面南北中轴线上的关东州厅舍及东西两侧东西轴线上的警察署大楼与关东厅地方法院都只有三层,与广场相比体量较小,广场显得空旷,体现了军国主义者追求“宏伟建筑”的虚张声势的心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陆续从本土向中国东北迁移了一部分工厂企业,1938年将大连湾沿岸50多公顷土地划为工业用地,1939年规划香炉礁至甘井子984公顷土地为工业用地,并在香炉礁半岛建造码头,于1940年建成。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已无力建设,大连城市建设迅速走向衰落。

大连是先后由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侵占而按较完整而连续的城市规划,进行了四十多年长时间的城市建设后形成的新兴的近代城市,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大连建筑文化的主体。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大连的现代主义建筑在设计思想上已与欧洲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同步。^[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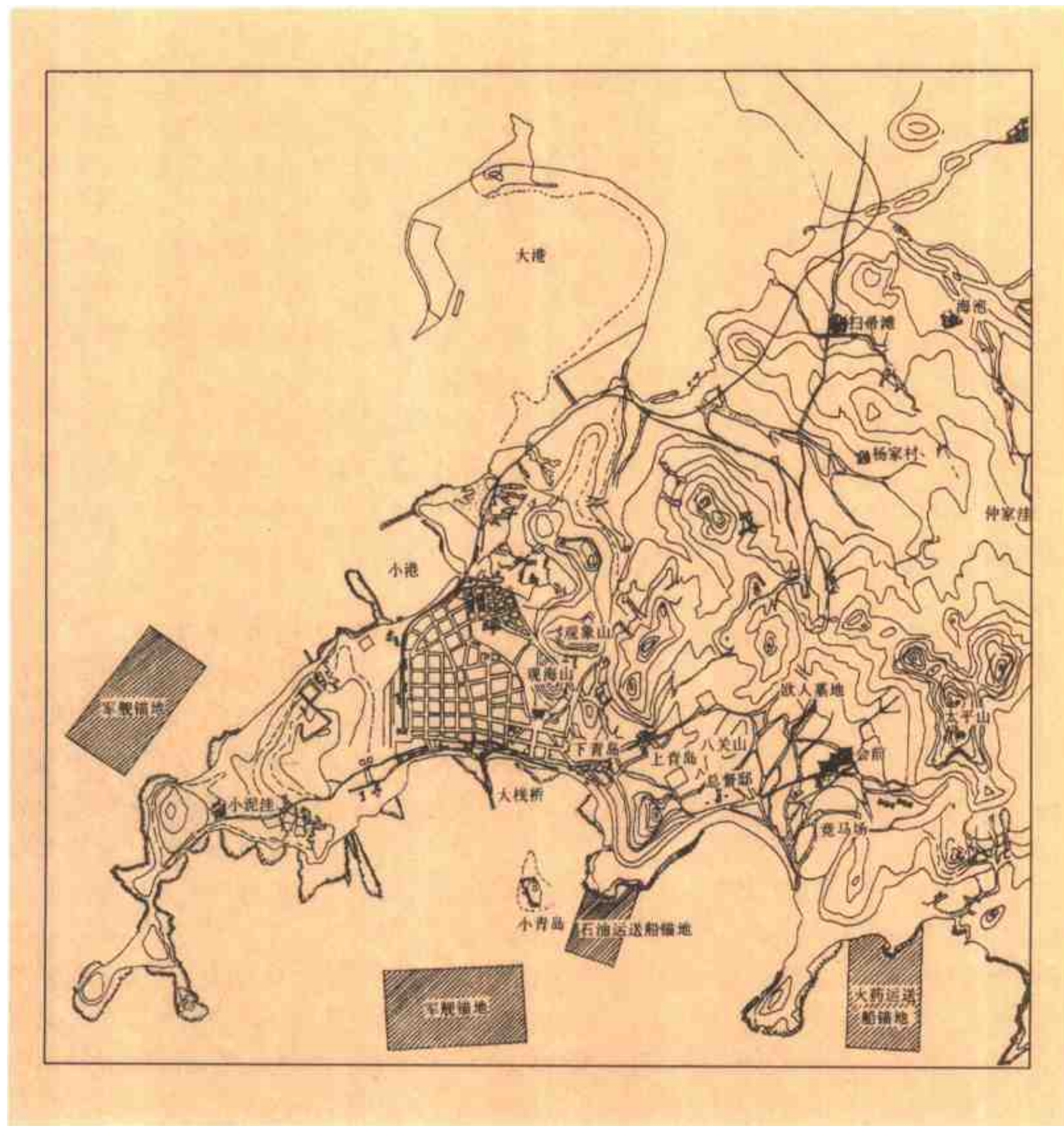
四、租借地城市——新兴城市青岛的产生与发展

1898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后,德国于1899年10月12日宣布“将胶州湾保护地的新市区命名为青岛”,这是青岛作为一个城市名称首次出现。1900年,德国殖民当局制订了青岛城市规划,并立即付诸实施,规划结合地理气候条件合理布置城市中心区、别墅居住区、工业区、港口及铁路,分别形成游览性海岸与生产运输性海岸。这一规划受当时欧洲流行的“带形城市”与“花园住宅”规划思想的影响,道路系统规划充分结合地形地势,城市空间构图十分完美。(图2-5-6)在1898年至1910年的十二年间,铁路通车,港口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并建造了最早的一批建筑,城市基本格局与建筑风貌都已形成。1910年在原规划基础上制定青岛市区扩张规划,规划面积比原市区扩大约四倍,规划取消了欧华分区居住的规定,在大港北侧填海建设新港,并从胶济铁路引出一条支线直通码头,市区沿西海岸向北与向西扩展,在码头区与鲍岛区之间直

至贮水山下的平坦地段规划新的商业中心区,并对 1900 年规划的道路作局部调整。此次规划市区面积扩大,城市商业功能增强,港口吞吐能力与铁路联运能力大增,但城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图 2-5-7)德国统治时期建造的胶澳总督府是这一时期最宏伟的建筑,同时建成的还有德国总督官邸。此外,德国福音堂、火车站、警察署与亨利王子饭店等一批公共建筑,及青岛区建造的一批独立式住宅,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习用塔楼、蒙莎式屋顶及老虎窗,取法自然,采用天然材料:红陶瓦坡屋顶、黄色粉墙与自然形态的蘑菇石,建造精致的德国古典风格建筑成为青岛近代建筑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年 8 月日本对德宣战,并于 11 月 7 日占领青岛。日本占领青岛后,城市建设基本按德国 1910 年规划进行。八年之后,北洋政府收回青岛,改名为胶澳商埠。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称青岛特别市。1931 年至 1937 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期间,是青岛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沈氏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市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城市建设的相关法规,1932 年颁布“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划”,规定了建筑密度、道路宽度与两侧建筑高度之比,又规定商业区不得建造平房等。在“特别区域建筑”一章中规定建筑密度最大不得超过 50%,并有保护绿地、限制层数、要求采用透空围墙等规定。1932 年还成立“建筑审美委员会”以控制城市景观。

图 2-5-6 《1900 年青
岛城市规划图》。原图
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
筑》(唐学易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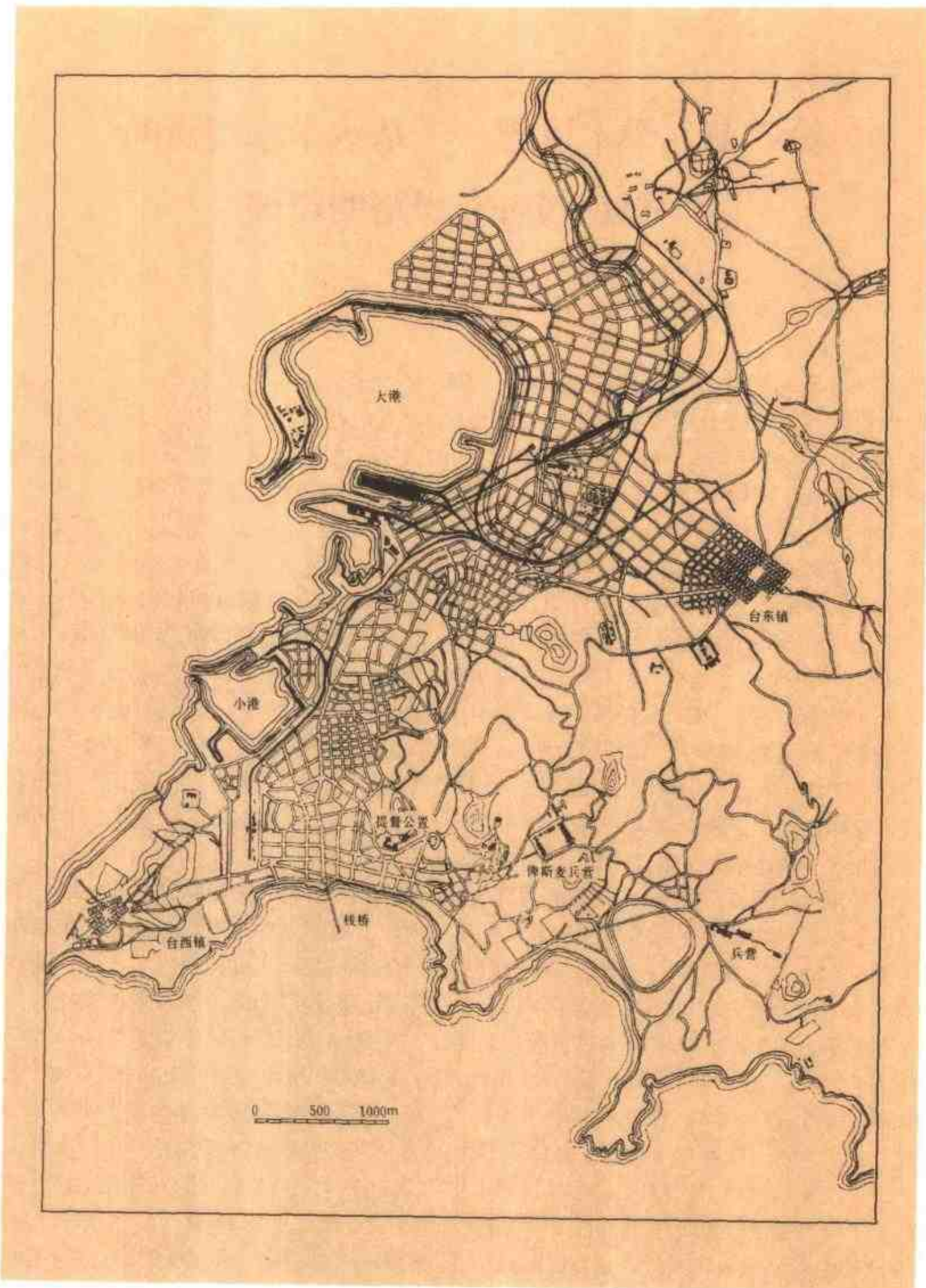


图 2-5-7 《1910 年青
岛市区扩张规划图》。
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
与建筑》(唐学易稿)。

1938 年 1 月日军占领青岛,1939 年改称青岛特别市公署,同年将即墨、胶县划入青
岛地区,称大青岛市。1940 年提出“青岛特别市地方计划”与“母市计划”,前者规定使青岛
成为华北门户、水陆交通要道、华北军事基地、工业基地与观光地。后者要求把青岛市区
扩大至白沙河,使之成为一个长 25 公里,宽 4 至 5 公里的带状城市。但仅仅五年之后,
1945 年日本投降,这些规划多是纸上谈兵。^[100]

第六节 学术反思——基本学术观点的 提炼与研究思路的整理

1990年,在对中国近代建筑史开展了为时十年的研究工作之后,作者提出以下基本学术观点:将中国近代建筑史置于近代中国剧烈变化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中,把中国近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将中国近代城市与城市中新建筑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论述近代城市发展脉络的同时论述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方案。这一成果体现于作者1990年在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上宣读的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研究》;1990年完稿,1993年出版,由作者主编的学术专著《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及后来发表于《建筑学报》1998年第9期的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研究》。从1990年提出这一学术观点至今,已过去十二年时光,阅历渐深,学识略长,在多次亲身考察中国主要近代城市,遍览作者所能找到的有关典籍资料之后,借撰本书之机,反思这一段学术经历,令人欣慰的是,作者1990年以后的研究工作在更深的层次上论证了这一学术观点,而这一学术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本书的撰写就在这一基本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展开。因此,将历年发表的有关论述略作文字修订及少量内容增补,作为本章的结尾。

1954年,《历史研究》杂志创刊,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检讨了以往中国近代史论著中或机械地按政权更迭分期,或放弃分期逐一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两种有缺陷的编写方法,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分期问题就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联起来,因此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关键。”^[107]从那时起至20世纪90年代,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是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还是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断限问题在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正是这场持久的学术争论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进展。中国近现代史是否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领域转化为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断限范围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除少数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陆续提出新的、有独特见解的学术观点外,在建筑界几成定论,作者在《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本书不再重复。^[108]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由于受中国近现代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观点的影响,自1962年出版《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以来,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论述以1919年为一个重要的分期年代,从而形成划分四个发展时期的分期方案。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第二阶段: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至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四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这个分期方案有两点是值得重新讨论的,即以 1895 年为第一、二阶段的分界线及以 1919 年为第二、三阶段的分界线。1895 年至 1900 年是中国近代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剧变阶段,短短的五年中风云激变,马关条约签订、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其对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影响则在 1900 年以后才逐渐体现,1901 年清廷宣布“变法”对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影响是有突变性质的,例证之一就是本章所述 1900 年以后都城北京城市与建筑的变化,及本书第六章将要论述的清末民初官方建筑的全盘西化趋势等。取这一剧烈变化时期的终结年分 1900 年为两个发展阶段的分界线更符合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规律。以 1919 年为第二、三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沿袭中国近现代史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理论,也同时将其显而易见的弊病带到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来。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但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建筑活动并无明显的影响,这一分界线腰斩了 1912 年至 1927 年这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使其论述脉络不清。分期问题是确立整部历史结构框架的重要问题,只有在正确划分发展时期的基础上,才能从中国近代建筑史“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一条线索”,提纲挈领,据此线索把历史现象串联起来,从而建立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部建筑史似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建筑活动的进展取决于左右社会发展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把建筑的发展作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这是建筑史的基本内容之一,作者试称之为人文建筑史;建筑又是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建筑史研究的另外两部分内容是建筑风格演变史与建筑技术发展史。

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的西方建筑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建筑风格演变的历史,各种风格的建筑“各领风骚数百年”,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西方建筑史;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近现代建筑史则是现代建筑运动酝酿、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建筑史却不是这样,一方面,中国近代建筑史时间跨度短,只有一百一十年,发展又很不均衡,近代城市与建筑的发展主要集中在 1900 年至 1937 年短短的三十七年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各个国家、各种风格流派的建筑几乎同时涌入中国,更多的是空间上的同时展现而不是时间上的前后更替,几乎不可能,或者说来不及形成某种相对固定的、有影响的建筑风格或流派。此外,除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外,其他建筑形式都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固有的建筑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缺乏生存、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形成中国近代城市中各种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杂陈并列的现象,也就是近年来许多媒体,也包括一些学者经常提到的“万国建筑博览会”现象。面对这样一种建筑发展现状,可以横向论述存在于各个近代城市中的各种建筑风格,却无法理出根本不存在的建筑风格演变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上现代建筑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重演,中国近代建筑只是被动地接受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出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而这个过程也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这样,我们自然无法按建筑自身发展的特征,即建筑风格的演变或现代建筑运动的发展进程来划分发展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更多地取决于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在政治风云多变、内外战争频繁的近代史时期,对建筑活动影响最大,往往使之产生突变的主要因素就是政权更迭、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把中国近代建筑史置于近代中国剧烈变化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中,将中国近代建筑及近代建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这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学术观点,也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基本学术观点。

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方案

<p>初始期 (1840—1900)</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最早开放为通商口岸的广州、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陆续开辟租界区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新区。西方建筑随殖民者主要在租界区内及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建筑活动传入中国,新建筑体系初具雏形。 ·西方建筑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教会传教渠道、早期通商渠道与民间传播渠道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 ·后期西方建筑的影响逐渐扩散到中国各地。 ·洋务运动期间建造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业建筑。
<p>发展兴盛期(1900—1937)</p>	<p>发展前期 (1900—1912)</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海、天津、汉口租界区大肆扩展范围并进一步发展。 ·哈尔滨、大连、青岛等新兴城市建城并形成近代城市,陆续制定初期城市规划并付诸实施。 ·古都北京在清廷实行“新政”期间开始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近代建筑的先驱城市广州;上海、天津、汉口等商埠城市;哈尔滨、大连、青岛等新兴城市及古都北京构成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群。 ·清末新式官方建筑全盘西化,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民初。 ·西方建筑师首先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 ·西方建筑的影响进一步扩散,新建筑体系逐渐形成。
	<p>发展中期 (1912—1927)</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海、天津、汉口租界区迅速发展成为城市的主体,租界区内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建筑活动频繁。 ·广州城市得到发展。 ·哈尔滨、大连、青岛等新兴城市得到发展,大的格局仍不脱离初期城市规划。 ·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影响迅速扩散,济南、厦门、烟台、成都、重庆、芜湖等中国近代边缘城市都有程度不等的发展。 ·古都北京继续发展。 ·新建筑体系基本形成,建筑类型齐全,建筑技术发展,建筑形式则以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为主。
	<p>发展后期 (1927—1937)</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国近代主流城市迅速发展,建筑活动进入鼎盛时期。 ·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得到发展,建筑活动相对兴盛。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实施《首都计划》,南京城市发展进入兴盛期。南京取代北平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 ·新建筑体系进一步发展。 ·现代建筑运动波及中国,中国近代建筑出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 ·第一代中国建筑师队伍形成。 ·中国建筑师群体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的第一次高潮期。 ·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起步。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作出杰出贡献。
<p>凋零期 (1937—1949)</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整体上建筑活动停滞,许多城市遭受战争破坏。 ·战时内地城市成都、重庆有所发展。 ·抗战前期上海、天津租界区内仍有少量建筑活动。 ·1931年以后在东北城市,尤其是长春日本侵略者开展了一些建筑活动。

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建筑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新建筑体系的产生、发展与旧建筑体系的延续、变化。中国固有的旧建筑体系在这一时期虽然受到新建筑体系的影响而有局部变化,但仍基本维持旧貌,在遍布全国的中小城市、集镇、农村中仍是这一时期建筑的主体。这类建筑建造数量大、分布范围广,但终究不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与方向,只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而产生的一种滞后现象,不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与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新建筑体系不是由中国古代建筑即旧建筑体系渐次演变而成,而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直接由西方国家传入。换言之,新建筑体系的产生是在特定条件下由外来因素引起的突变,这种突变使中国建筑由以传统木构架体系为主体的旧建筑体系直接转化为具备近代建筑类型、近代建筑功能、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体系,因此亦产生了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中国近代建筑文化。新建筑体系建筑主要分布在中国为数不多的近代城市,尤其是辟有租界的商埠城市中,虽然建造数量相对较少,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国土分布范围也不够广泛,但它代表着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与方向。新建筑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及同时形成的中国近代建筑与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也是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建筑体系首先在广州、上海、天津、汉口等辟有租界的商埠城市中产生,在上海、天津、汉口迅速发展而使这些城市成为以租界区为主体的商埠城市,这些城市首先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国近代建筑文化就从这些商埠城市,即中国近代主流城市逐渐向中国近代边缘城市,乃至边远的城镇乡村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新建筑体系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1900年以后,还诞生了一批新兴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就是这些城市及城市中新建筑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城市与建筑互为依托,两者的发展互相关联、密不可分,在论述近代城市发展脉络的同时论述近代建筑与近代建筑文化的发展,是论述中国近代建筑史,也是论述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一种可取的方式。这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就在这一基本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展开。

综上述,作者提出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方案如下表。在这个分期方案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密度概念。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一百一十年中,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在各个时期也是极不均衡的,大致的情况是:1900年以前及1937年以后建筑活动密度很小,主要的建筑活动集中在1900年至1937年的三十七年间,而在这三十七年中又以1927至1937年的十年最为集中。为了充分展开论述这一时期的建筑活动,分期方案将1900至1937年的发展兴盛期在第二个层次上又划分为发展前期、发展中期与发展后期,以使分期方案与建筑活动的密度相适应。

[1]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30页。

[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第31页。

[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第35页。

[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第54页。

[5]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8页。

[6] 郑祖安《百年上海城》第202—215页载有《上海土地章程》中文本的发现过程,并刊有中文本《上海土地章程》全文,较之以往学者引用之翻译本更准确权威,本节所引《上海土地章程》有关内容均引自此书,以下不再一一加注。

- [7] 有关土地“永租制”的论述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三章。
- [8] 吴馨等修,姚文枬纂,《民国上海县志》,1936年刊本,第14卷,第3页,转引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17页。
- [9]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第121页。
- [10]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39页。
- [11]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32页,第33页。
- [1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第198页。
- [13]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391页。
- [14]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13页。
- [15] 参见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326页。
- [16] 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第195页。
- [17] 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59—63页。
- [1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0卷,第2648页,转引自来新夏,《天津近代史》,第66页。
- [19] 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租界》。
- [20] 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租界》;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附志·租界》;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92—93页、第96页。
- [21] 参见徐焕斗,《汉口小志》下卷,《附外国人居留地》,第1—2页,转引自龚璋有,《浅谈汉口各国租界》,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117页。
- [22] 参见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扬铎,龙从启,《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附租界图)》;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35—37页。
- [23] 参见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扬铎,龙从启,《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附租界图)》;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70—73页。
- [24] 吴晗,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 [25] 参见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第283页。
- [26] 英国国家档案局《外交档案》,F O. 17/88,转引自王文全,袁东华,《广州沙面租界概述》,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253页。
- [27] 参见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第283—287页;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7—18页,谢少明文。
- [28] 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49—52页。
- [29] 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24—27页。
- [30] 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37—44页。
- [31] 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52—53页;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70—373页,杨嵩林文。
- [32]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60页。
- [33] 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478页。
-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8页。
- [35]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2—3页。
- [36]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4—5页。
- [37] 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14页;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32页。
- [38]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13页。
- [39] 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127—128页。

[40]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9—260页,引文中之“在一百五十栋外侨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约八千所中国住户。”八千所应为八百所之误,参见卞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47页,“一八五四年七月间(清咸丰四年六月初七日到七月初七日),所造华人居住的房屋约有八百所之多。”参见本书第五章注3。

[41] 参见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25—28页。

[42]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12页。

[43]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40页。

[44] 霍塞,《出卖上海滩》,第47页。

[45] 参见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第706页。

[46] 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481—482页。

[47]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近代中国报道》。

[48]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66页。

[49] 原表载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第907页。

[50]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近代金融史》,第291页,第292页。

[51]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21页。

[52]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22页。

[53]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23页。

[54]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36页。

[55]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36页。

[56] 佚名,《遇难日记》,从刊《义和团》,第177页,转引自《天津简史》第204页。

[57] 参见张高峰,《劝业场一带的变迁》,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58] 雷穆森,《天津的成长(租界)》,载《天津历史资料》第十辑,第69页。

[59] 雷穆森,《天津的成长(租界)》,载《天津历史资料》第十辑,第70页。

[60] 雷穆森,《天津的成长(租界)》,载《天津历史资料》第十辑,第71页。

[61] 《天津港史》编辑委员会,《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第190页。

[62] 冯国良,郭廷鑫,《解放前海河干流治理概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第34页。

[63] 雷穆森,《天津的成长(租界)》,载《天津历史资料》第十辑,第61页。

[64] 雷穆森,《天津的成长(租界)》,载《天津历史资料》第十辑,第60页。

[65] 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11—12页。

[66] 王永年,《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近代汉口城市》,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83页。

[67] 扬铎,《武汉沿革略识》,载《武汉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69页。

[68]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37页。

[69] 罗汉,《汉口竹枝词·西人跑马场》,《汉口竹枝词·华人跑马场》,载徐明庭,《武汉竹枝词》,第203页,第202页。

[70] 罗汉,《汉口竹枝词·后湖堤》,载徐明庭,《武汉竹枝词》,第200页。

[71] 范正国,张十哲,冯澄寰,王义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00页。作者附注:20世纪80年代初期,武汉市建筑总公司修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武汉近代建筑作了详尽调查,1988年7月在山东烟台有关建筑志编修的学术研讨会期间,其工作人员之一彭雪晴曾向作者详细介绍他们的工作情况,希望出版《武汉近代建筑300例》,并蒙惠寄打印本《武汉著名的近代建筑概况表(1861—1949)》。当时拜读,知其工作属普查性质,收集了大量基础资料,这正是修志的要求,但限于当时出版条件,联系出版一事未能成功。一年后,这批宝贵调查资料

终于得以出版,就是刊于《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的《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本书有关武汉近代建筑的建造年代、地点及设计、营建者等基础资料多引自此文,武汉近代建筑现状及汉口石库门里弄民居调查资料等则是作者自1980年开始多次在武汉查阅史书资料、走访有关人士及实地考察测绘的成果。

- [72]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第299页。
- [73] 罗汉,《汉口竹枝词·理债处·题解》,载徐明庭,《武汉竹枝词》,第211页。
- [74] 罗汉,《汉口竹枝词·理债处》,载徐明庭,《武汉竹枝词》,第212页。
- [75] 魏宏运,《民国纪事本末(一)》,第85页。
- [76] 扬铎,《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载《武汉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27页。
- [77]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336页。
- [78] 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335—337页。
- [79] 济南部分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16—328页,郑兴昌,并育岱文。
- [80] 俞正东,《芜湖的公共通商租界》,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400页。
- [81] 参见俞正东,《芜湖的公共通商租界》,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400—401页。
- [82] 俞正东,《芜湖的公共通商租界》,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401页。
- [83] 参见马永欣,《芜湖米市春秋》,载《芜湖文史资料》第二辑,转引自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94页,葛立三文。
- [84]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95页,葛立三文。
- [85]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96—403页,葛立三文。
- [86]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建筑简史·第一册·中国古代建筑简史》,第182页。
- [87] 王世仁,《中国近代历史的界标——对北京近代建筑的再认识》,载《王世仁建筑历史论文集》,第231页。
- [88]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建筑简史·第一册·中国古代建筑简史》,第182页。
- [89] 王世仁,《中国近代历史的界标——对北京近代建筑的再认识》,载《王世仁建筑历史论文集》,第232页。
- [90] 参见任志,《东交民巷北京使馆界》,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506—517页。
- [91]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316—317页,侯幼彬文。
- [92]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425页,沈阳文。
- [93] 转引自徐城北,《老北京·变奏前门》,第66页。
- [94] 沈嘉荣,《南京史话(下)》,第31页。
- [95] 沈嘉荣,《南京史话(下)》,第77页。
- [96]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第33页。
- [97] 刘先觉,杨维菊,《南京近代建筑概说》,载刘先觉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第11页,第12页。
- [98] 沈嘉荣,《南京史话(下)》,第77—78页。
- [99] 沈嘉荣,《南京史话(下)》,第79—80页。
- [100]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317页。
- [101] 参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第216—224页。
- [102] 参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第216—224页;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309—318页。

[103] 参见侯幼彬,刘松伏,《哈尔滨近代建筑概说》,载侯幼彬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哈尔滨篇》;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90—205页,常怀生文。

[104] 参见I.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第813—871页。

[105]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225—234页,李伟伟文。

[106]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280—294页,唐学易文。

[107]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7页。

[108] 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陆续提出的有独特见解的学术观点如:

1.赵国文《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断限方案是1840—1977年,提出可考虑取消中国现代建筑史。

2.陈纲伦《从“殖民输入”到“古典复兴”——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分期与设计思想》一文提出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断限方案是19世纪中叶—1933年。

3.邹德侗《中国现代建筑史》一书提出中国现代建筑史的断限方案是1920年代末—1990年代末。

[109] 参见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概说》,载《建筑师》第28期,1987年10月。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第三章

历史回溯——前近代时期
进入中国的西方建筑

“前近代时期”指明代后期至鸦片战争前的这一段时期,其时西方文化加速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真正开始受到从“天上”到“万国”的震撼。“直到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中国才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明神宗万历十一年,也就是西历 1583 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Pompilio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进入中国南方的肇庆并且在那里定居,他们用汉字印刷了《天主圣教实录》、《天主实义》等书,翻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书,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稍后的金尼阁又携带七千西书入中国,这才标志着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全面进入中国。”^[1]这一时期西方知识、思想与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是震撼,并未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导致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瓦解,则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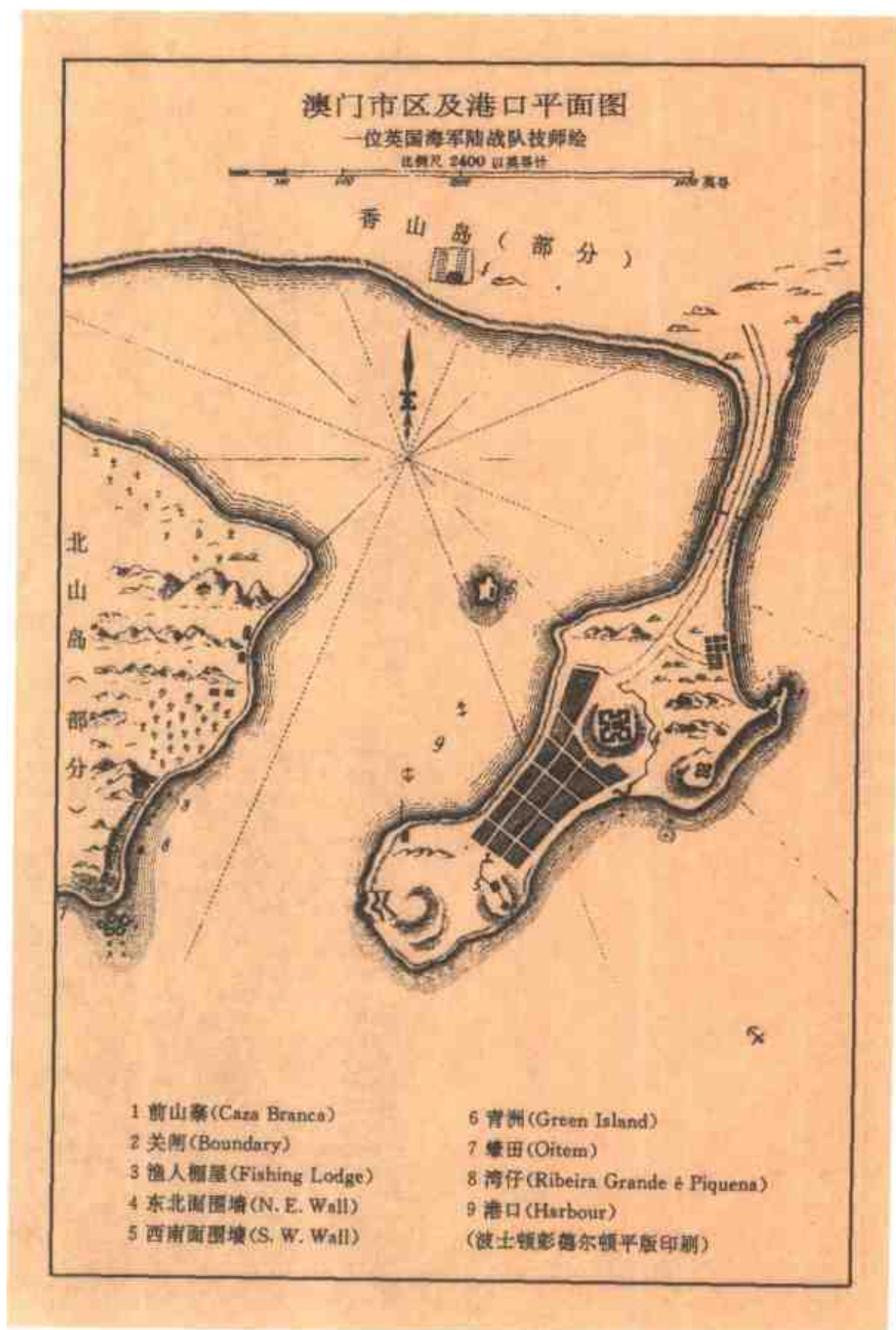
童寯用简练而概括的语言这样论述鸦片战争以前进入中国的西方建筑:“中国建筑艺术自从汉魏六朝受佛教影响以后,到唐朝开始受西域影响,元朝又受欧洲影响。欧洲影响最早见于元初(13 世纪末)建在北京的耶稣教堂。[童寯原注: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于 1321 年派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1247~1328 年)来中国传教,1299 年在北京建教堂一所,有钟楼。1305 年又建一堂“屋宇奂新,红十字架高立房顶”,原址在今东长安街,肇西洋建筑在华出现之始(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28 年刊印。)]再见于明末澳门葡萄牙宗教与民用建筑,以至清初广州‘十三行’西洋工商业建筑;随后就波及园林营造:清初扬州私园厅堂,有的采用西式平面布置并安装玻璃窗。(童寯原注:见《扬州画舫录》有关怡性堂、澄碧堂、九峰园各段。)”^[2]前近代时期进入中国的西方建筑,包括 1557 年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建造的商馆及其他各类建筑;1685 年以后广州建造的十三行商馆建筑;及 1745 年至 1759 年建造的北京圆明园中的长春园西洋建筑。澳门与广州的十三行地区都在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与思想观念还不存在允许西方建筑广泛传播的条件,在限定区域内建造的这些西方建筑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建筑产生普遍的影响。而长春园西洋建筑则如同外国进贡的钟表,只是中国皇帝的玩物而已,皇家园囿森严的防卫措施更使西洋楼建筑只允许极少数皇室人员及大臣、外国使臣等有机会观赏,他人无缘一见,更谈不上影响了。数量很少,囿于一隅的特定区域,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前近代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其与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冲击性影响的西方建筑文化的本质区别。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澳门

“澳门本来是香山县所属的一个渔村。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成为对外贸易港口,但只许外国商船临时停泊,不许商人上岸居住,因此岛上居民不多。1557 年葡人开始定居澳门,当时岛上居民不过 400 人。此后人口陡增,1563 年,澳门人口已逾万,其中成年人约 5000 人。有明一代,大致保持这种状况。”^[3]清初,朝廷厉行海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其后又下迁海令,规定沿海居民内迁二十里至四十里,筑边墙为界。澳门虽不在迁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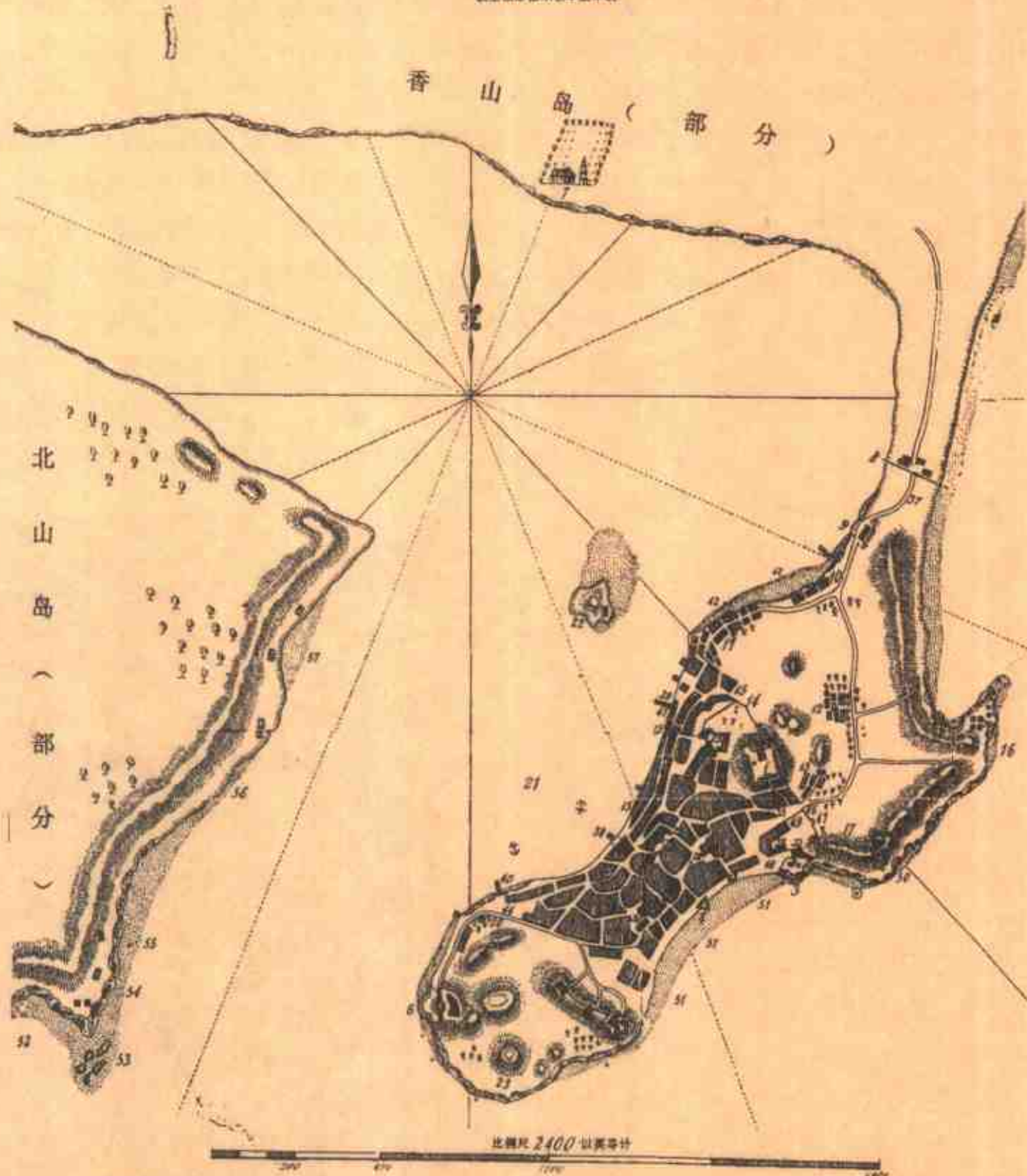
之列,但亦受影响而贸易衰落,人口减少。“1684年,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并于1685年开放4个对外贸易口岸,即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以及江南的云台山,粤海关则设于广州。根据有关史料,当时外国商船来广东后的贸易情况,大体是:商船泊于澳门,由粤海关派人自省城下澳查验,然后外商被引入省城,居住于指定的商馆内,一待商务结束,外商必须全部随船返回。如在中国尚有未了事宜则允许在澳门赁屋暂住。这可以说是来华贸易的外国人以澳门为居留地之始。”“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从‘天朝’的安全起见,宣布禁止外来的‘夷人’入澳居住,而葡萄牙人出于种种原因,也反对英、荷、法等国商人入住澳门。1746年葡萄牙国王竟然颁布了不许他们在澳贸易、居留的禁令。这样一来,来广东贸易需留华处理未了事务的外国商人,全部悄悄地从澳门转向广州,到十三行‘列屋居住’。”“这使广东地方当局感到不安,认为与其让外国商人到省城居住,不如让他们到澳门居住,遂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通知澳葡当局,允许中国官府特许的外国商人到澳门暂住。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朝廷,禁止外国商人在省城过冬,澳葡当局只得允许各国商人入澳居住。”“至18世纪末,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澳门已成为大批外国商民旅居、娱乐的场所。至19世纪初,每年来华的外国商船增至100多艘。至此,来华外国商人、船员及其家属人数便十分可观。按清政府的法令,外国妇女只能留在澳门,而不能进入广州。这样,进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渴望早日结束在广州商馆的‘圈禁’生活,到澳门与眷属团聚。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为数众多的外国商民及其眷属在澳门旅居,包括英、美、普、法、荷、瑞典、丹麦等任命的总领事、领事和副领事。旅居人数的猛增,刺激了澳门房地产业的发展。”“至鸦片战争前夕,澳门人口已逾二万。”“1839年林则徐莅澳禁烟,清查澳门户口。查实当时有中国居民7033人,外国居民1.3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人为5612人,英国人57户。”“今天的澳门由三岛组成:澳门半岛、路环岛与氹仔岛,鸦片战争以前澳门地域则只限于澳门半岛范围之内。1557年葡萄牙人用贿赂手段获准在澳门居留,随后大兴土木,“高栋飞甍,栉比相望”(《明史》卷325·《佛郎机传》),在半岛南面海岸形成一条街,俗称澳门街。1605年,葡人私自筑城,被清政府下令拆除,1622年葡人筑城又被拆除。至明清之交,葡人乘中国动乱之际再次筑城,澳门发展成为一个城镇。“到了乾隆年间,澳门已经‘城固而痺’,共有四道城门,即大三巴门、小三巴门、沙梨头门和花王庙门。这时澳门的区域情况是这样的,‘由望厦而西三里为澳门,其地周一千百八十余丈’。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城的面积仍没有变化。”(图3-1-1,图3-1-2)

图3-1-1 《澳门市区及港口平面图》,原图载龙思泰,《早期澳门史》。



澳门市区及港口图

英国海军绘 布拉姆斯顿增改
波士顿斯图尔干墨印就



- 1 三巴炮台 (Fort of St. Paul or Monte)
- 2 东望洋炮台 (Fort of Guia)
- 3 耶稣圣像台 (Fort of S. Francis)
- 4 总督府前小炮台 (Fort of S. Peter, front of Governor's house)
- 5 南湾炮台 (Fort of Bomparto)
- 6 娘姆角炮台 (Fort of Bar)
- 7 碧山寨, 一位清朝官员的驻地 (Casa Branca, residence of a Mandarin)
- 8 关前 (Boundary)
- 9 新庙 (Pagoda Nova)
- 10 卢克村 (Chinese Village of Monchion)
- 11 沙梨头村 (Chinese Village of Patine)
- 12 蓬厦村 (Chinese Village of Mongha)
- 13 麻疯寨 (Village of S. Lazarus)
- 14 东北面城墙 (N. E. Wall)
- 15 市场 (Bazaar)
- 16 葡海环 (Bay of Cassilha)
- 17 板球场 (Cricket Ground)
- 18 西望洋山和教堂 (Penha Hill & Church)
- 19 西南面城墙 (S. W. Wall)
- 20 妈祖庙 (Bar Pagoda)
- 21 内港 (Inner Harbour)
- 22 青洲 (Green Island)

- 23 山水园 (Mato de Bom JESUS)
- 24 花王庙 (Church of S. Antonio)
- 25 三巴寺 (Church of S. Paul)
- 26 板樟堂 (Church of S. Domingos)
- 27 支楼庙 (Church of Sta. Casa de Misericordias)
- 28 大庙 (Church of S. Peter of St. the Cathedral)
- 29 龙松庙 (Church of S. Augustin)
- 30 风顺堂 (Church of S. Lawrence)
- 31 小三巴 (Church of S. Joseph)
- 32 尼姑庙 (Church of Sta. Clara)
- 33 耶稣圣像 (Church of S. Francis)
- 34 议事会 (Senate House)
- 35 医人庙 (Hospital)
- 36 渔人棚 (Fishing Lodge)
- 37 跑马场 (Racing Ground)
- 38 澳夷抽分馆 (Custom House)
- 39 大码头税馆 (Chinese Custom House)
- 40 野模石 (Prays Manduco)
- 41 大码头 (Prays Fiquena)
- 42 沙梨头海旗 (Prays Panones)
- 43 曹法官 (Judge's House)
- 44 妈祖街 (Road of the Bar)
- 45 三巴门 (Gate of S. Antonio)
- 46 水坑尾门 (Gate of S. Lazarus of Campo)

- 47 炮兵营 (BATTERY of S. John)
- 48 耶稣圣像前地 (Campo of S. Francis)
- 49 主教花园 (Bishop Garden)
- 50 东望洋海旗 (Prays of Guia)
- 51 南湾 (Prays Grande)
- 52 塔田 (Oittem)
- 53 马棚 (Monkey Isles)
- 54 横坑 (Ribeira Grande)
- 55 博仔 (Ribeira Fiquena)
- 56 狭北 (Lappa)
- 57 北山 (Pacoun)

各炮台配备大炮门数 (1634年)

	铜炮	铁炮
1. 三巴炮台	13	34
2. 东望洋炮台	5	13
3. 耶稣圣像台	7	11
4. 小炮台	2	3
5. 南湾炮台	6	7
6. 娘姆角炮台	13	16

布拉姆斯顿 1834 年于中国澳门

图 3-1-2 《澳门市区及港口图》, 原图载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明代,澳门在行政系统上由香山县主管,并无自己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作为澳口,澳门又受负责广东海防管理的海道副使管辖。明代在澳门设有守澳官。清代,管理澳门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并形成独立系统,1730年(清雍正八年),在澳门前山寨设立县政府衙门,作为县政府驻望厦村的派出机构,1734年在县丞一级机构之上再设“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集行政、司法、军事、治安等职于一身,以加强对澳门的治理。

“明清政府把澳门分为两个不同区域实行行政管理。对澳门城以北的华人村落之中国人,管理办法基本上与内地一致,即设立保甲制度,禁止中国人到葡人住宅区进行贸易及居住,严禁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对葡人区域的行政管理的办法,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控制,即要葡人承认中国官府之权威,澳门之行政属于广东地方政府。二是屡颁行政命令。如1606年香山知县蔡善继制定‘制澳十则’,1614年海道副使俞安性勒石《澳夷禁约五事》,1743年(引者按,应为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订《管理澳夷章程七条》等,责成葡人遵从中国官府管理。三是用外国人管理外国人办法。明朝政府于1583年授予澳门议事局民政长官职衔,称之为夷目,后称为‘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按中国政府授权管理澳门事务。”^[8](图3-1-3,图3-1-4,图3-1-5)

明清政府对澳门的土地建筑管理十分严格,从1573年起广东官府对居澳葡人征收地租,一直延续到1849年。同时严格控制土地房屋的买卖权与修造权,规定葡人不能买卖土地,不能随意建造房屋,也不能对房屋随意改建扩建。1614年的《澳夷禁约五事》的第五条就是:“禁擅自兴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此后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兴一土一木,定行拆毁焚烧,仍加重罪。”^[9]为了保证对葡人建屋修屋的控制,广东政府首先控制中国工匠。1744年颁布的《管理澳夷章程》七款之六就这样规定:“夷人寄寓澳门,凡成造船只房屋,必资内地匠作,恐有不肖奸匠,贪利教诱为非,请令在澳各色匠作,交县丞亲查造册,编甲约束,取具连环保结备案。如有违犯,甲邻连坐。递年岁底,列册通缴查核。如有事故新添,即于册内声明。”^[10]但是,经历了几百年时间,澳门的发展并不是官府公文所能控制的,居澳葡人不断用各种手段建造房屋,“1817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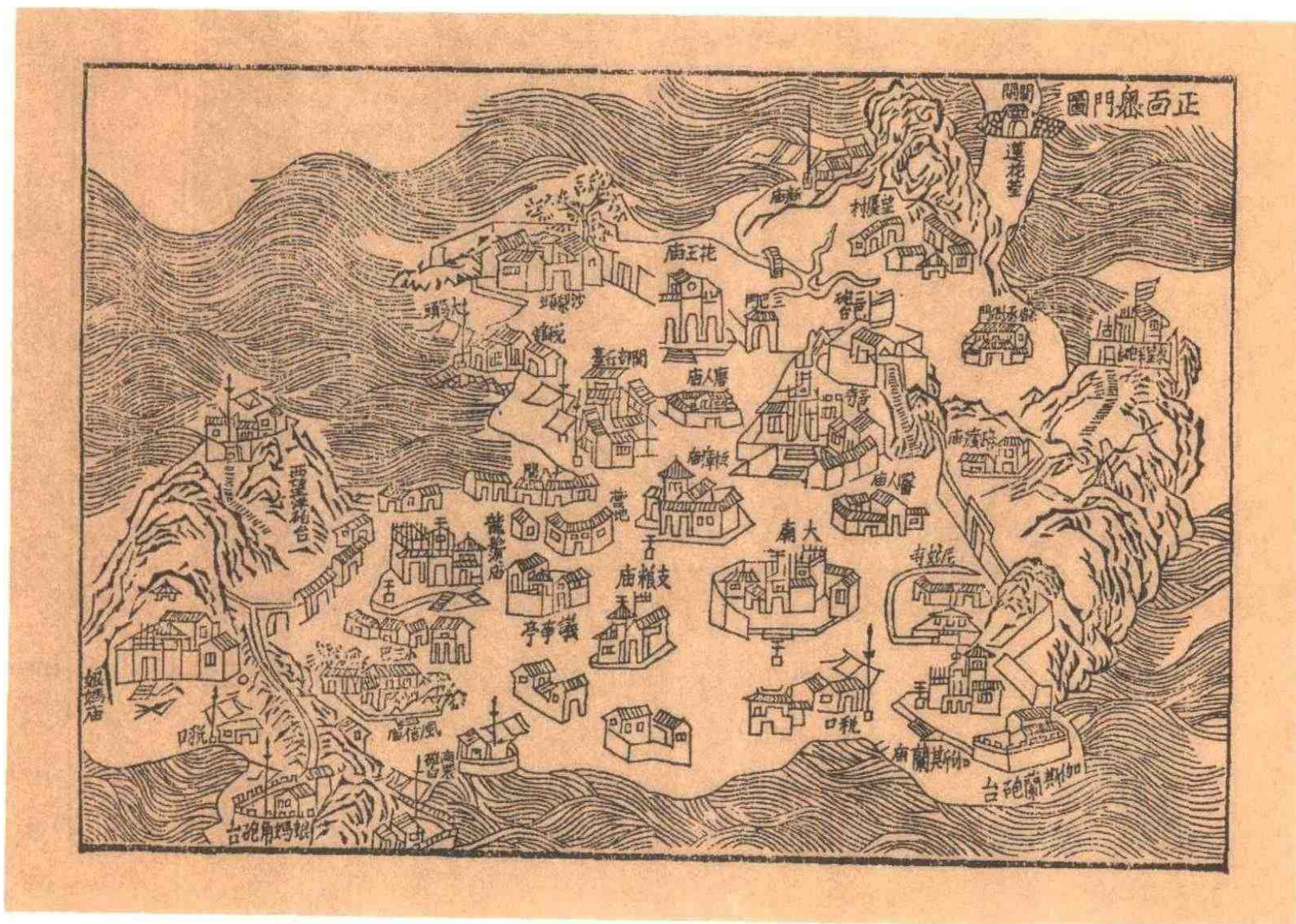


图3-1-3 《澳门记略》所载《正面澳门图》,转引自费成康《澳门四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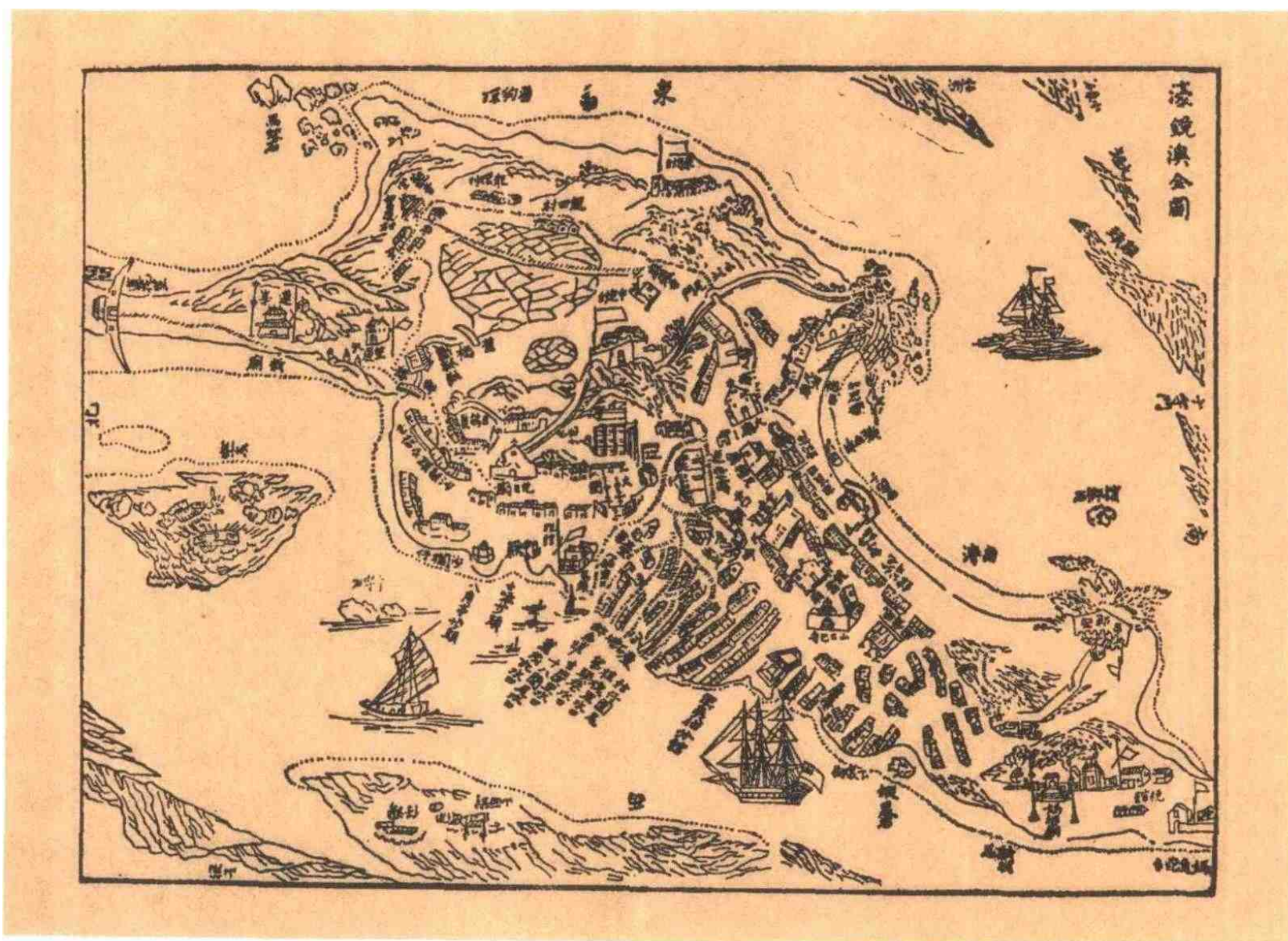


图 3-1-4 道光《香山县志》所载《澳門全圖》，转引自费成康《澳門四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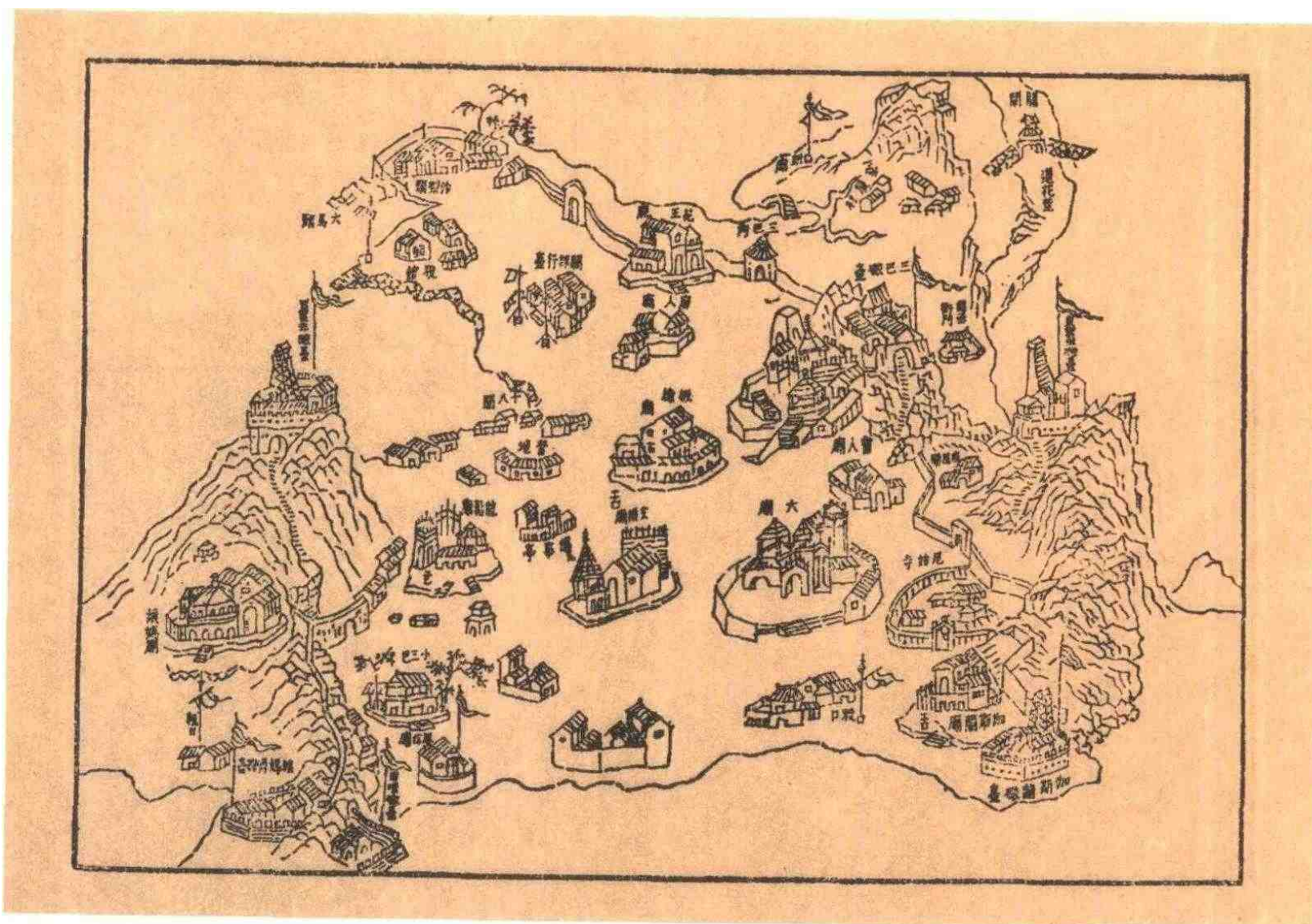


图 3-1-5 鴉片战争前不久广东官府绘制的《澳門圖》，转引自费成康《澳門四百年》。

2日，香山县官员派出举人赵允箐、监生叶恒澍前往澳门，会同地保清查澳葡私占官地的情况。根据他们回来所作的报告，‘澳门夷人历来添造，房屋俱系汉人瞒禀照旧修复，拼工包整，已照原界溢出数倍。’（原书注：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Chapas Sinicas ex·03，R. 13 ANTT. 0678.）”^①到鸦片战争前夕，澳门葡人居留地内房屋已增加几倍。（图 3-1-6，图 3-1-7，图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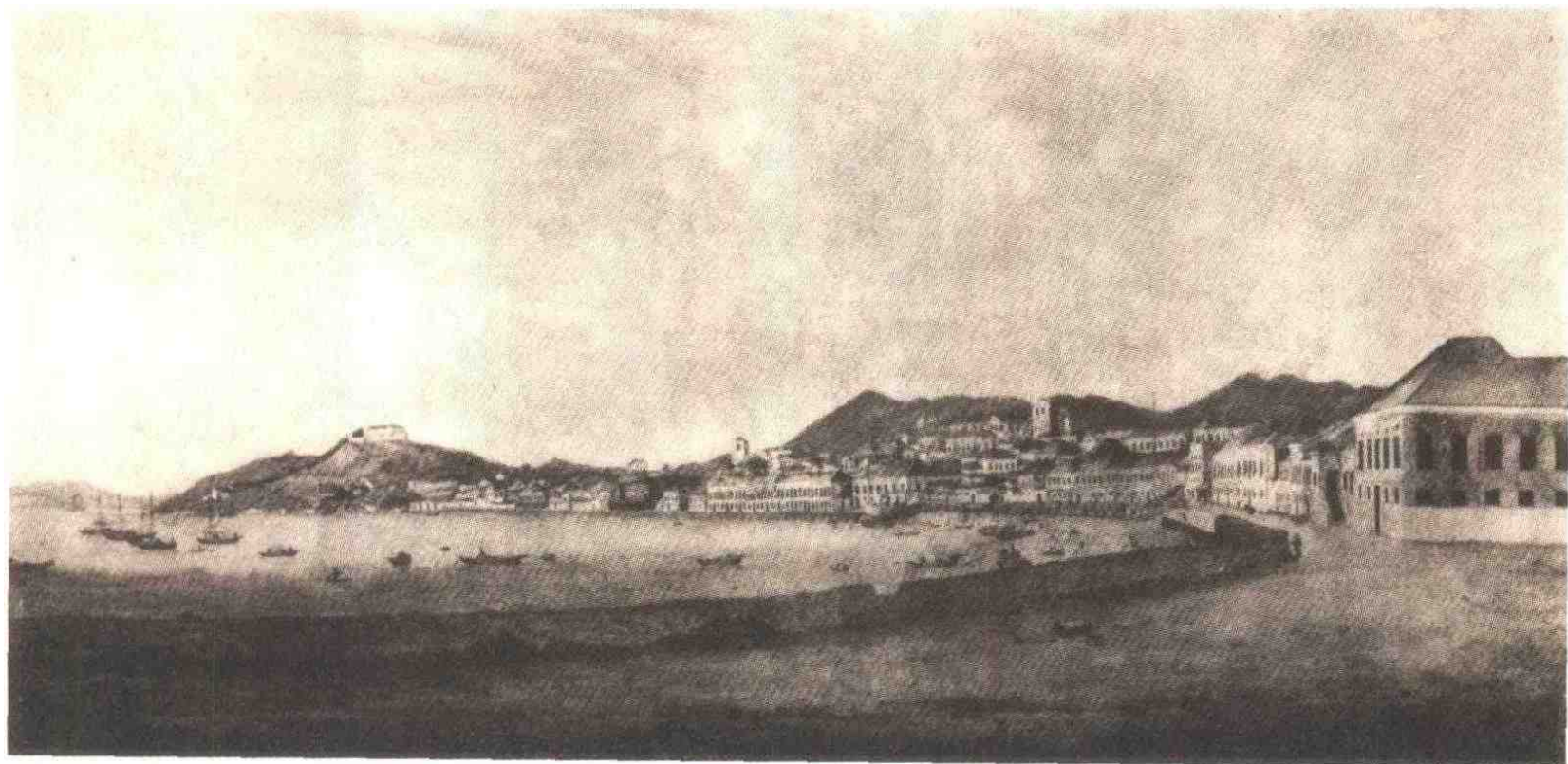


图 3-1-6 水彩画《南望澳门及南湾风光》，约 1830 年，画家佚名，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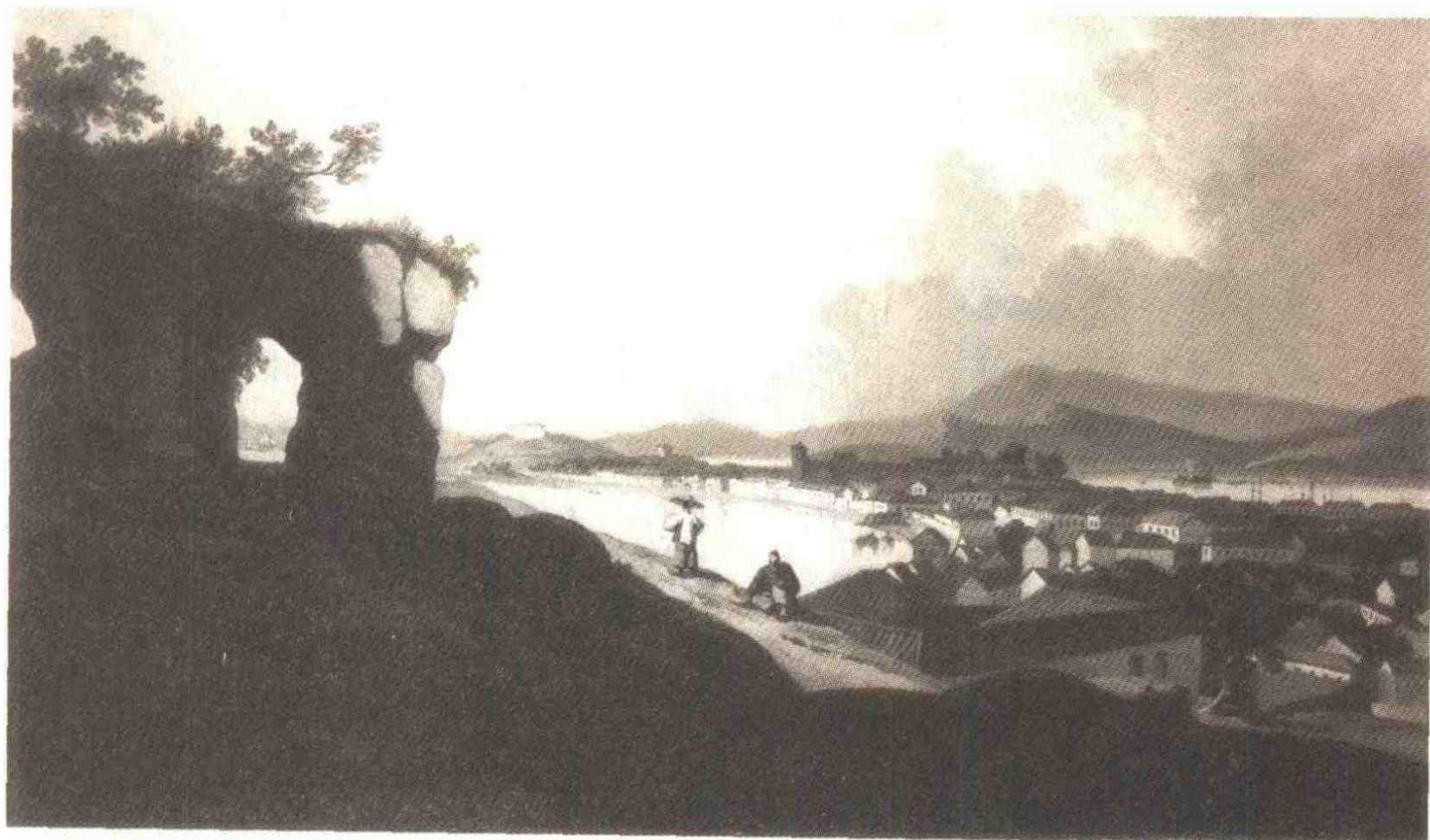


图 3-1-7 水彩画《晨曦中的澳门南湾风光》，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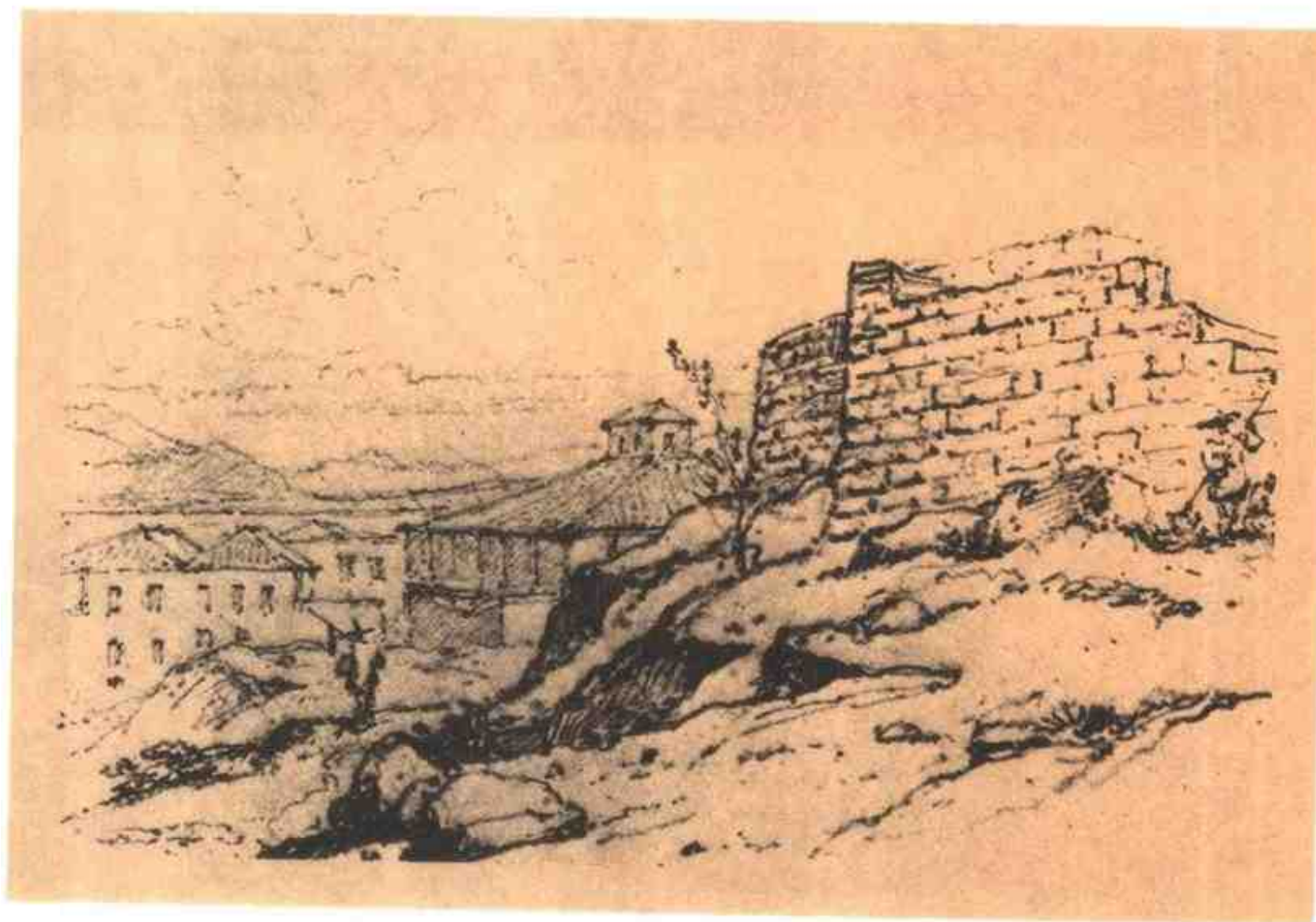
图 3-1-8 水彩画《晨曦中的澳门半山风光》，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澳门的外人住宅、商馆,按前人书中所载,“其居率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楼有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户以巧丽相尚。已居楼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为嫌。”^[12]“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牖于周垣,饰以堊。牖大如户,内闔双扉,外结琐窗,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启,历阶数十级而后入,窈窕诘屈。门外为院,院尽为外垣,门正启。又为土库,楼下以殖百货。”^[13]这些三层住宅兼商馆,楼上住家,一层贮货,平面形式有多种形状,已经使用玻璃窗(障以云母),“历阶数十级而后入”,应当是室外台阶直达二层,一层仓库另设人口的建筑形式。(图 3-1-9,图 3-1-10)

图 3-1-9 素描《19 世纪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办事处》,转引自黄鸿钊《澳门简史》。



图 3-1-10 素描《澳门山水园风光》,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对当时澳门的公共建筑,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他的著作《早期澳门史》中有较详尽的描述。龙思泰于1759年3月23日生于瑞典南部林雪平的一个平民家庭,十二岁才有上学机会,1781年到乌普萨拉,只读了几个月大学便辍学谋职,1784年到俄国当家庭教师,十年后回国,1797年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1798年到中国,任广州商馆瑞行的大班,龙思泰同时也经营自己的生意,很快成为富商。瑞典公司退出广州贸易后,他仍留在中国,1815年被任命为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总领事,并授瑞典皇家瓦萨爵士勋位,从此,长居澳门一直到逝世。龙思泰也从此开始了为期20年的对澳门史的研究工作,搜集史料,进行实地考察,特别对一些行将湮没的遗址现场踏勘。1832年在澳门出版第一部关于澳门史的英文著作,1834年在广州出版第二部关于澳门史的著作。其后,修订书稿,充实史实,订正错误,将两书汇为一书,上篇《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下篇《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又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jah Coleman Bridgman)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著《广州城概述》一书作为补篇收入,1836年由美国波士顿芒罗公司(James Munroe & Co.)出版,成为研究澳门史的必读书。^[4]该书1992年在香港再版,1997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按龙思泰书中记载,当时澳门的公共建筑包括教堂、修道院、隐修院等宗教建筑,还有政府的办公建筑“议事局”,其中以教堂影响最大,所以“澳门各区均以其界域内的区域性教堂而得名。纪念圣彼得的主教大堂(the cathedral),使这个主要区域得名为大堂区(Bairro da Sé)。这个教堂何时建成则不得而知。(译者原校注:大堂即大庙,为澳门主教座堂,在本书之西文全名为Church S. Peter or Sc. the Cathedral)。第二个也是最广大的区域称为风顺堂区(Bairro de St. Lourenco),因其区内教堂的守护神圣老楞佐(St. Lourenco)而得名,根据一段铭文,该教堂可能重建于1618年。(译者原校注:风顺堂又名风信堂、风信庙或圣老楞佐堂,面临南湾。守护神圣老楞佐为葡萄牙人的航海保护神。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船既出,商人日跂其归,祈风信于此’。风信堂或风信庙因此而得名)。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区域称为花王堂区(Bairro de St. Antonio),以花王堂(Church of St. Antony)而得名,该教堂于1809年焚毁,因罗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的基督教徒共同慷慨解囊,而得以重建。(原译者校注:花王堂又名花王庙或圣安多尼堂。《澳门纪略·澳蕃篇》称:‘北隅一庙,凡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庙。’)”^[5]

澳门最著名的教堂当属巴洛克风格的大三巴教堂。“三巴堂(Church of St. Paul),我们从一份私人文献得知,培莱思(Francis Peres)和几名耶稣会士,于1565年利用一所房舍接待取道澳门前往日本的其他耶稣会士。在他们来到中国的同时,也建起了一座教堂,后因故被焚。这座宏伟的建筑以圣保禄(St. Paul, St. Paolo)的名字命名,则建成于1602年,正如嵌入这座巨大建筑西侧的一块碑石上所刻的铭文表明的那样:‘敬献于伟大的童贞圣母,1602年,’这座古老的教堂是奉献给童贞圣母(nossa Senhora da madre de Deos)的,现在的一座也是。它的正面,全部由花岗石砌成,美轮美奂。天才的艺术家们设计,用一些纪念性的事物来使这座希腊式的建筑产生活力(引者注:应为巴洛克风格建筑)。在十根爱奥尼亚风格的柱子中间,是通向礼拜堂的三个门。然后排列十根科林斯风格的柱子,组成五个壁龛。中间的一个,在主门的上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塑像,将地球踩在脚下,作为人类爱国主义的象征,下面我们还看到‘圣母’(Mater Dei)字样。在这‘天国圣母’(Queen of Hearen)两边显眼的位置,是耶稣会四位圣者的塑像。在上方的位置,则是圣保禄的塑像,和一个象征圣灵的雕像。这座建筑还有一座大时钟,按时和刻发响,从其齿轮所刻的文字来看,是路易十四(Louis XIV)送给这所耶稣会神学院的。”^[6]大三巴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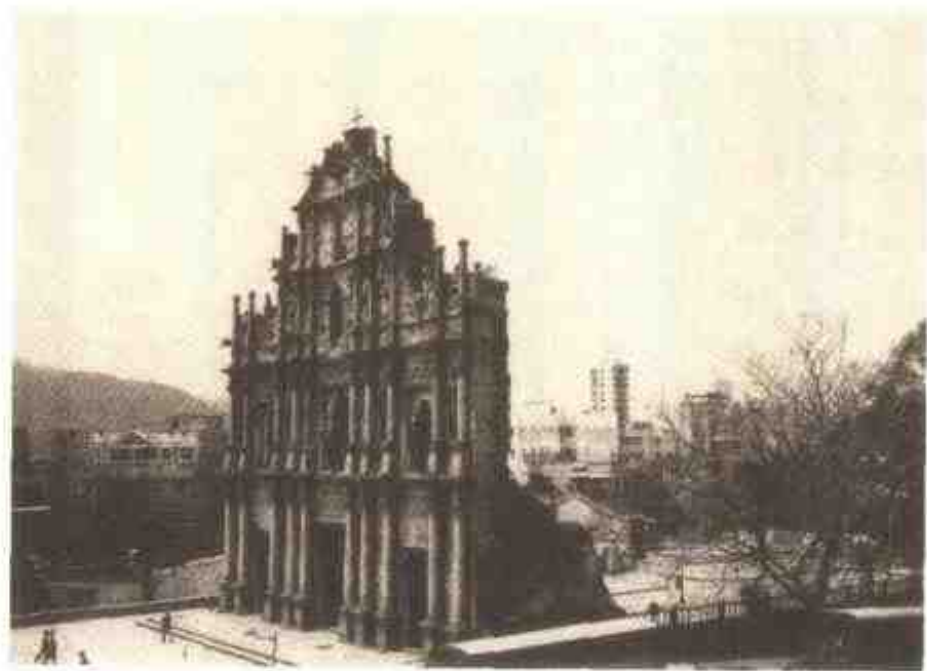


图 3-1-11 澳门大三巴教堂遗迹，原图载黄鸿钊《澳门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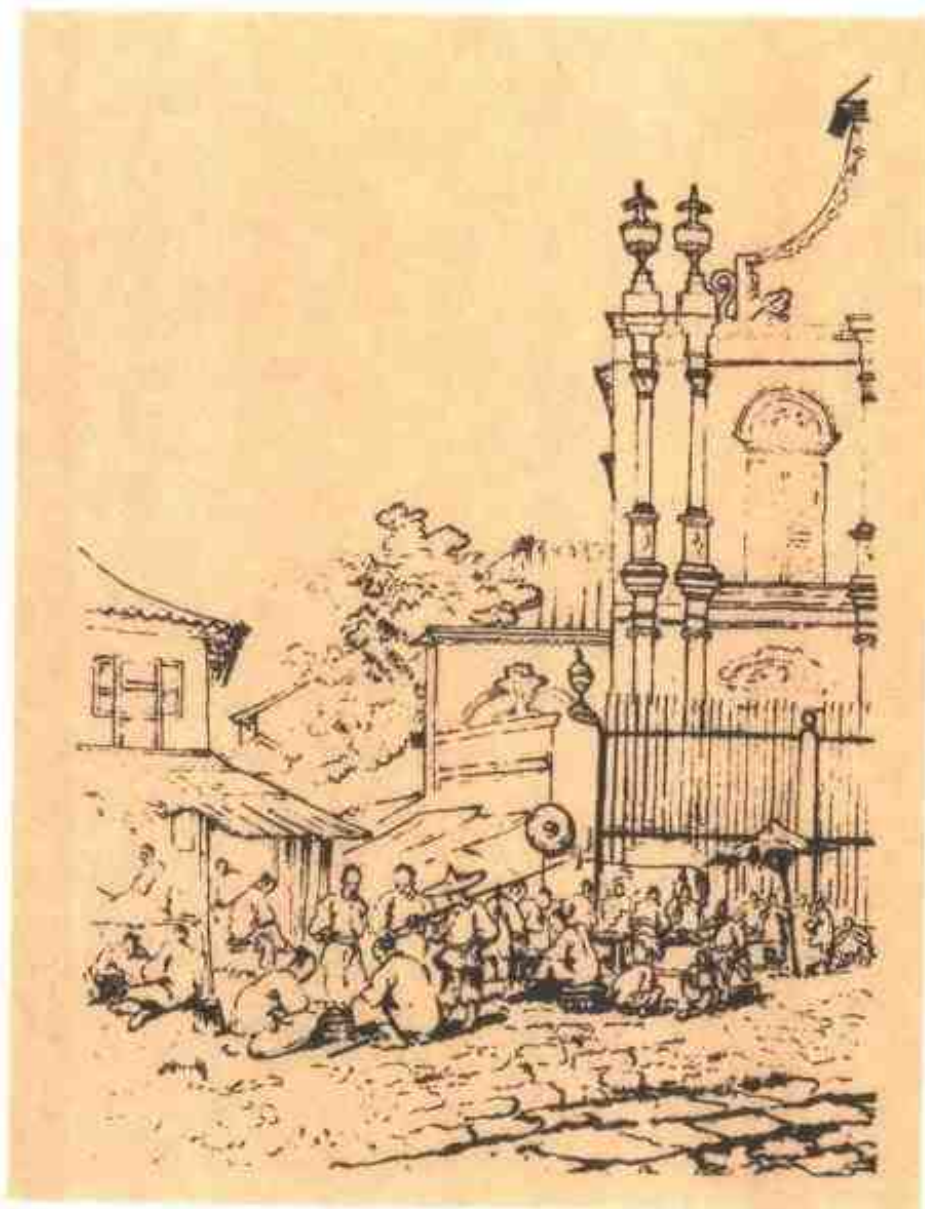


图 3-1-12 素描《板樟堂侧的摊档》，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堂的建造年代，龙思泰原书误为 1662 年，1992 年香港版本已指出 1662 年为 1602 年之误，中文版译者参照林家骏主教主编之《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一辑《澳门圣堂史略》确认为 1602 年。译者又据李鹏翥《澳门古今》所载，称大三巴教堂于 1602 年奠基，1637 年前门石壁竣工，1640 年添建堂前石级。童寯《巴洛克与洛可可》一文则称“澳门‘大三巴’教堂由耶稣会士神甫 Carlo Spinloa 设计，工程全部于 1687 年完成”。^[17]17 世纪正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风格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建造的大三巴教堂采用巴洛克建筑风格是很自然的。大三巴教堂于 1835 年 1 月 26 日傍晚毁于火灾，仅余正面残壁，至今依然屹立，是西方建筑在中国仅存的最早遗迹。(图 3-1-11)

大三巴教堂是属于神学院的教堂，圣若瑟教堂 (St. Joseph—“St. Jose”)，又称小三巴教堂或三巴仔教堂，筹建于 1657 年，始建于 1746 年，是属于另一所神学院——三巴仔修院，或称圣若瑟修院的教堂。“教堂相当小，但比例匀称。因圆穹形的屋顶和前面装有横窗栅的窗户，使教堂光线充足。在其外部两侧，有两个塔，一个里面有一座大钟，另一个在较低的位置，有一座时钟。”^[18]

澳门还建有一些修道院：天神后小堂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Angels—“nossa Senhora dos Anjos”)，即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亦即伽思兰教堂，在中国文献中称为伽思兰寺或伽思兰庙；圣奥斯定会修道院圣奥斯定堂 (the Convent of St. Augustine)，又名龙松寺或龙松庙；圣母玫瑰堂 (House of Our Lady of the Rosary—“Casa de nossa Senhora do Rosario”)，又名圣多明我堂 (St. Domingo)，中国文献称为板樟堂或板樟庙，(图 3-1-12) 还有女修道院圣嘉辣堂 (Monastery of St. Clare—“mosteiro de St. Clara”)。隐修院有望德圣母堂 (Our Lady of Hope—“nossa Senhora de esperanca”)，又名仁慈堂，华人称为支粮庙；还有东望洋山上的圣玛利亚 (St. Mary) 小教堂及西望洋山上的西望洋圣母堂。“在西望洋山的山丘上，奥斯定会修士于 1622 年开始创建西望洋圣母堂。信徒们于 1624 年将其扩建。葡萄牙船只在进港时，习惯上都向该隐修院鸣礼炮数响。它的收入依靠信徒的慷慨布施，和那些以航海为生的人，为了求得圣母玛利亚对他们生命财产的庇佑，在危难时刻所作的布施。”^[19](图 3-1-13，图 3-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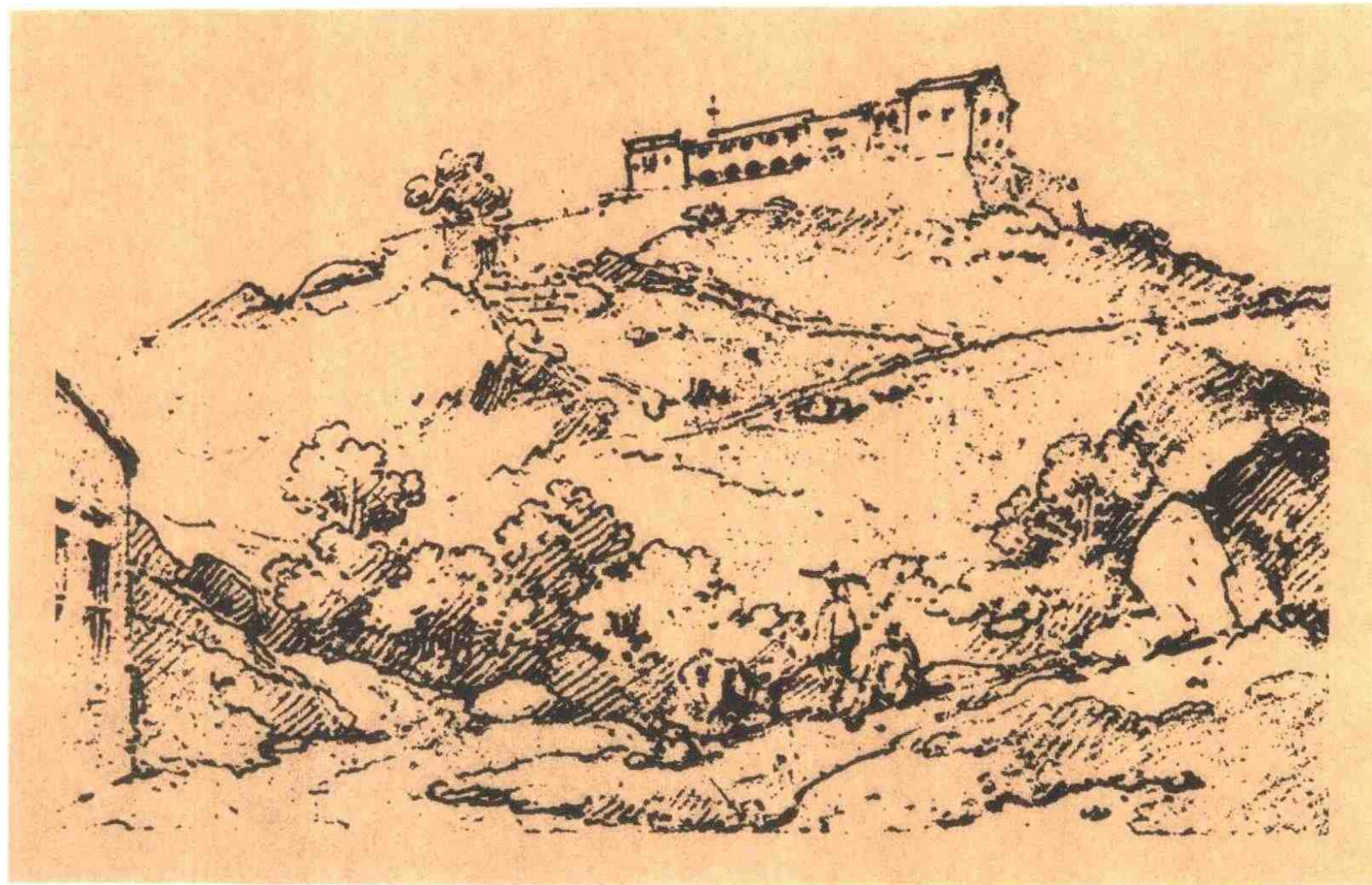


图 3-1-13 素描《西望洋山及教堂》，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图 3-1-14 水彩画《濠江渔歌》，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早期澳门居民主要是外国人，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下，1583年，澳门葡人举行选举，正式产生议事会(Senado)，负责居澳葡人的一切事宜。澳门的中国政府机构始建于明代，称议事亭，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香山县志：“澳门旧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三所，今惟议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议事亭上，彝目列坐进茶毕，有欲言则通事番(翻)译”(申良翰，《香山县志》卷十，《外志·澳彝》)，《澳门纪略》刊有“议事亭图”，是单层中国传统建筑。1784年在议事亭原址改建为两层西式建筑，称议事局，就是今天的澳门市政厅。“它有两层楼高，基础部分是花岗石，其余部分，包括壁柱在内，用灰浆和砖头砌成。”“屋顶由柱子支撑着，檐口饰有绿色彩釉花瓶。这座宽敞的建筑物建于1784年，共耗费了80000两银子。里面有一座‘无原罪圣母小堂’(a chapel consecrated to our Lady of Conception—‘nossa Senhora da Conceicao’)。”^[20]

鸦片战争以前,明清政府对澳门葡人居留地采取的是封闭政策,除前文所述禁止中国人到葡人住宅区贸易与居住外,也禁止外人出澳。1749年在澳门刻石颁布的《澳门治安条例》第十一条就规定:“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许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借打雀为名,或惊扰乡民,或调戏妇女,每滋事端,殊属违例。该夷目严行禁止,如敢抗违,许该保甲拿送,将本犯照违制律治罪,夷目分别失察、故纵定议。”中国官府行使司法主权的这一措施受到葡人抵制,中国官府刻石颁布《澳门治安条例》的中文版,葡人则在议事亭刻石颁布其葡文版,但内容已大加窜改,如上述第十一条即改为:“禁止运动员在中国领土内射击,违者将受重罚。”第十二条不许华人人教的条文干脆删去。^[21]但外人的建筑活动范围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澳门葡人居留地范围之内,中国人也很少能进入澳门葡人居留地,其时西人传教士志在传教,并不在意教堂的形式,所以鸦片战争以前澳门的西方建筑文化不能对中国内地的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影响,而西人利用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拓传教事业则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图 3-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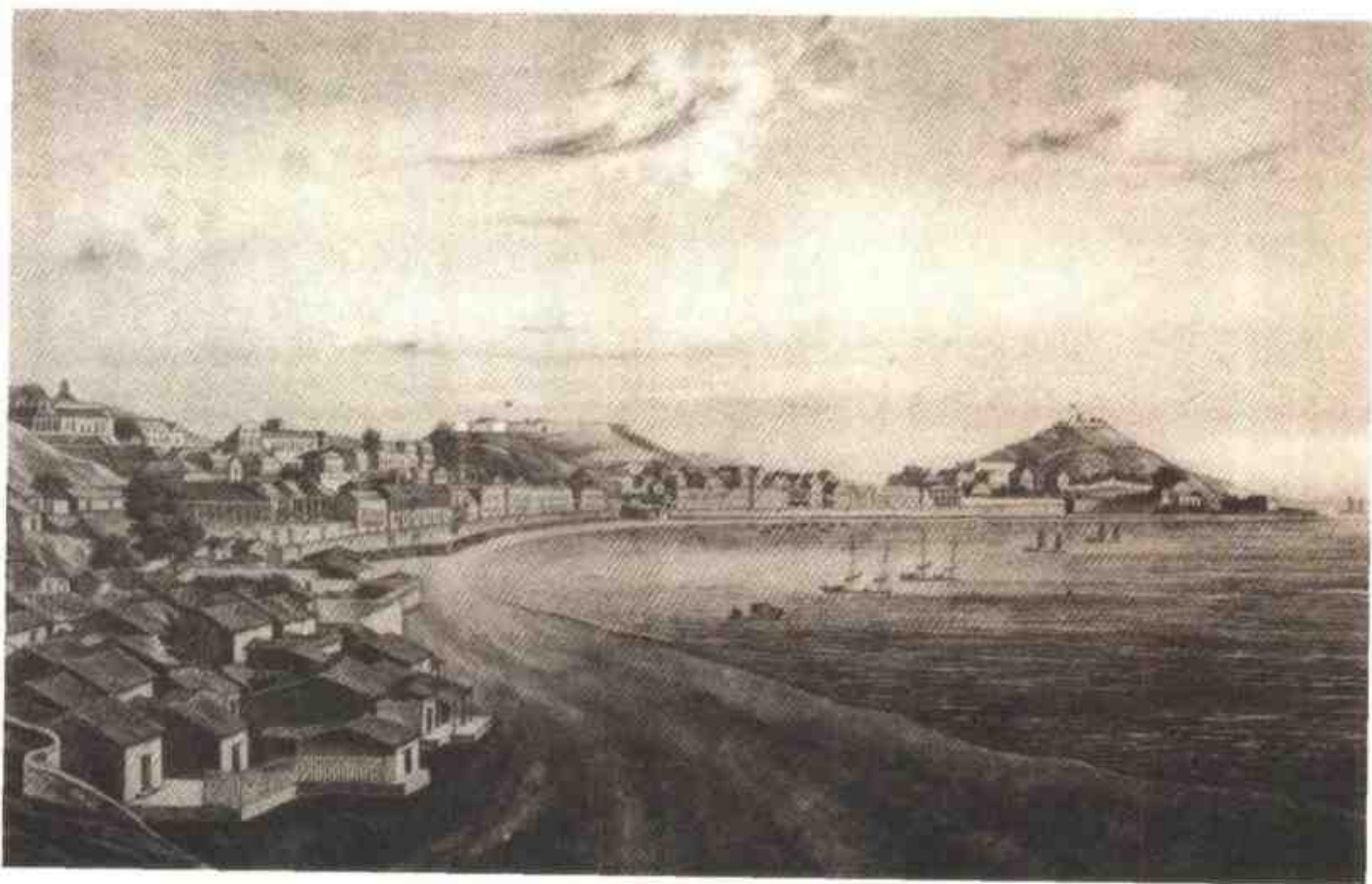


图 3-1-15 1843 年的澳门,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二节 广东十三行与十三夷馆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开放海禁,次年开放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处为对外贸易口岸。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据屈大均“银钱堆满十三行”诗^[22]及《澳门纪略》所载^[23],判定在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粤海设关之年已设有十三行。只是当时行数不过数家,之所以称十三行,按《粤海关志》所载是“沿明之习”。(《粤海关志》:“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

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后来十三行的行数通常为十三,但时有增减,并无定数,“十三行”只是一个惯用名称。

1685年设粤海关之后,对外贸易由“官商”垄断。官商所设之“行”称“牙行”,亦称“官行”、“官牙”。设关之初只准外商船舶停泊澳门,待粤海关官员查验认可后才可引入黄埔,在十三行贸易。此后这种由中国政府选任的“官商”多以“官”(Qua, quan, quin)称之,如怡和行行商伍秉鉴称浩官(Howqua)、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称经官(Kingqua)等。当时外商船舶贸易完毕,即限日出境,通常每年五、六月至广州,九、十月离开广州归国。只有葡萄牙商人白明末即常年居于澳门,不在十三行交易而单独与香山县牙行交易。

1757年开始清廷只限广州一口对外贸易。从此广州十三行行商处于独口通商的特殊地位,在全国对外联系几乎断绝的1757年至1842年间,惟有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范围内有所扩大和发展。其间,十三行的交易对象,由早期偏重于南洋各国发展到后期偏重于西洋各国;其性质亦由早期评定货价、承揽货税发展到后期兼及外交行政,十三行在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自有其特定的贡献。(图3-2-1)

行商是十三行的经营管理者,“行商,或者按中国人的称呼叫做‘洋行商人’,有十三家之数,经北京的帝国政府发给特别执照,准与外国人贸易,并要求管理监督他们,还要为他们‘担保’;不让他们违犯法律或不遵守‘老规矩’,所以又称为‘保商’。”^[24]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行商联合组成公行,规定共同遵守的公行行规。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设立专办欧西货税的公行,其后洋行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两广总督令撤消公行,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又重新组织公行,并规定:“外船驶入广东时,举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一人保证,是为‘保商’制度。‘公行’亦名‘官行’(Kwanhong),自再度组织后,姑无论欧西货税完全由其承揽,即中国官宪与外商之交涉及往来文件亦均以之为枢纽。关于关税及其他课税之缴纳并行员之支付等事,行商须负连带责任,同时对于用外商资本代外商购买之货物,行商得征收百分之三之值以为‘行用’(Gonsoofund, Codsoo charge),嗣后对于外商之管理更变本加厉,而行商权力亦日形扩张矣。”^[25]自此,公行成为一个权力很大的行会组织,但并不是一个经济实体。“有人以为公行是一种合伙的组织;恰恰相反,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账目,跟自己选择的任何人做生意。然而,他们联合起来的职能,是作为地方政府与广州外国侨民之间的一切事情,以及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媒介。”^[26]

作为对外贸易机构的十三行从官设牙行逐渐发展成为包办洋务——贸易与对外交涉——的机构,初期称洋货行,后来简称洋行。而作为建筑实体的十三行街则是广州珠江江畔的一座封闭的小城镇,人为地严格与外界隔离。十三夷馆是外国商人在这座城镇即十三行街的营业及居留场所,按清廷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不可自建房屋,只能租赁行商在十三行街为之专设的房屋,这种租赁给外国商人使用的建筑就是十三夷馆,即十三行街专供外国商人使用的部分。如同十三行一样,夷馆数目通常为十三,但同样有增有减,并非定数,十三夷馆也只是一个对应于十三行的惯用名称。“夷馆系‘夷人寓馆’之简称。当时在日本者名曰商馆,为外人所自设,在中国者则曰夷馆,系十三行行商所划出行地一部分赁居外人,而便于约束者。夷馆全在广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马路路南。外人之至粤者,不得逾越十三行街范围(十三行街为东西路,两头俱有关栏;内中除夷馆、洋行外,尚有无数小杂货店、钱店、故衣(刺绣)店之类,专为外人兑换银钱及购买零星物品而设。又有无数小街,将各夷馆隔离)。至洋行除有设于十三行街内如同文行(其故址为今同文大街)外,其他多在十三行街外;其分布系从靖海门外起迤邐而至十三行街东首。”^[27](图3-2-2,图3-2-3,图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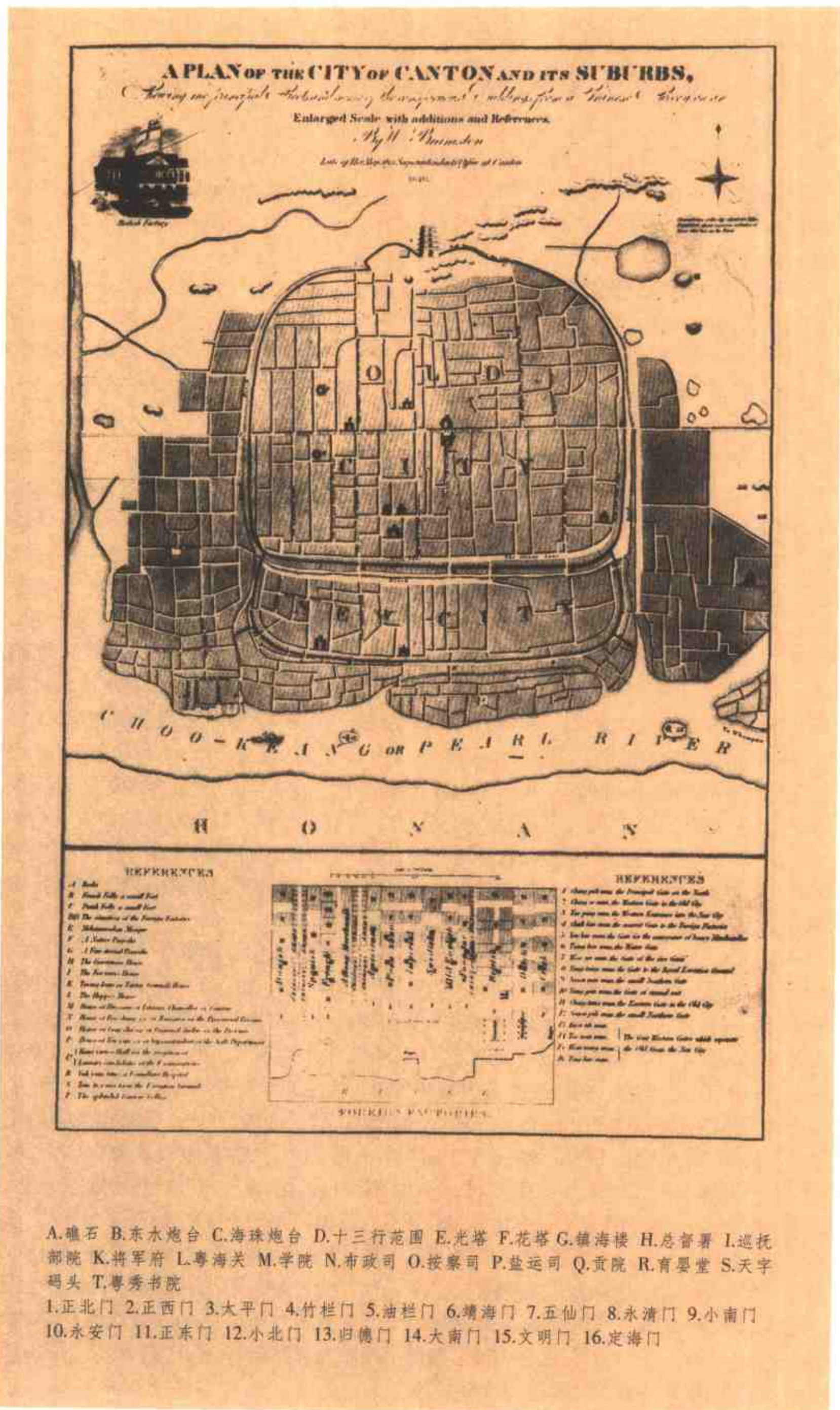


图 3-2-1 《广州地图》，1840 年，图中标明了十三行的位置，原图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

A. 礁石 B. 东水炮台 C. 海珠炮台 D. 十三行范围 E. 光塔 F. 花塔 G. 镇海楼 H. 总督署 I. 巡抚部院 K. 将军府 L. 粤海关 M. 学院 N. 布政司 O. 按察司 P. 盐运司 Q. 贡院 R. 育婴堂 S. 天字码头 T. 粤秀书院
 1. 正北门 2. 正西门 3. 太平门 4. 竹栏门 5. 油栏门 6. 靖海门 7. 五仙门 8. 永清门 9. 小南门 10. 永安门 11. 正东门 12. 小北门 13. 归德门 14. 大南门 15. 文明门 16. 定海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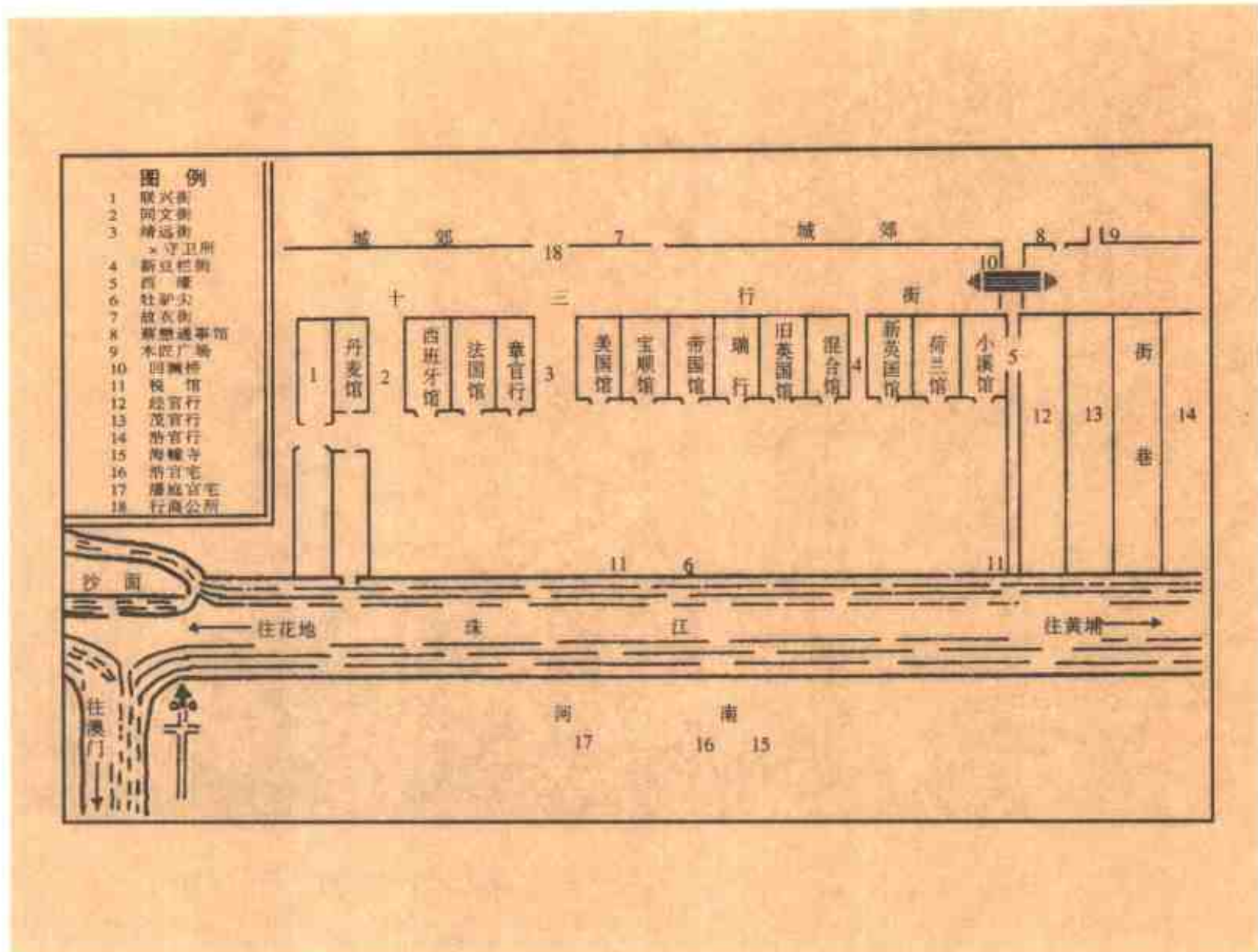


图 3-2-2 《十三行商馆平面图》，转引自《旧中国杂记》，图中文字由章文钦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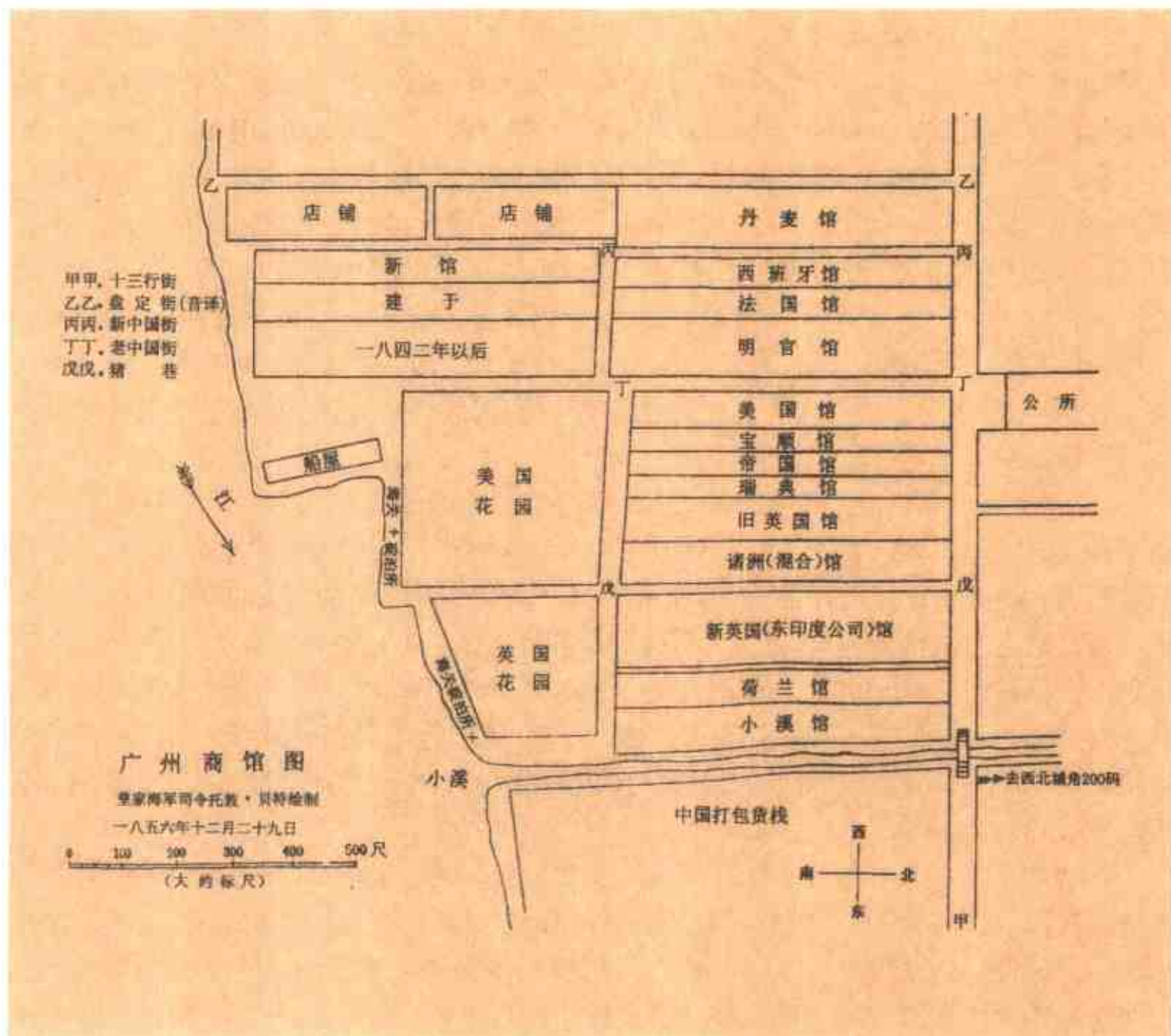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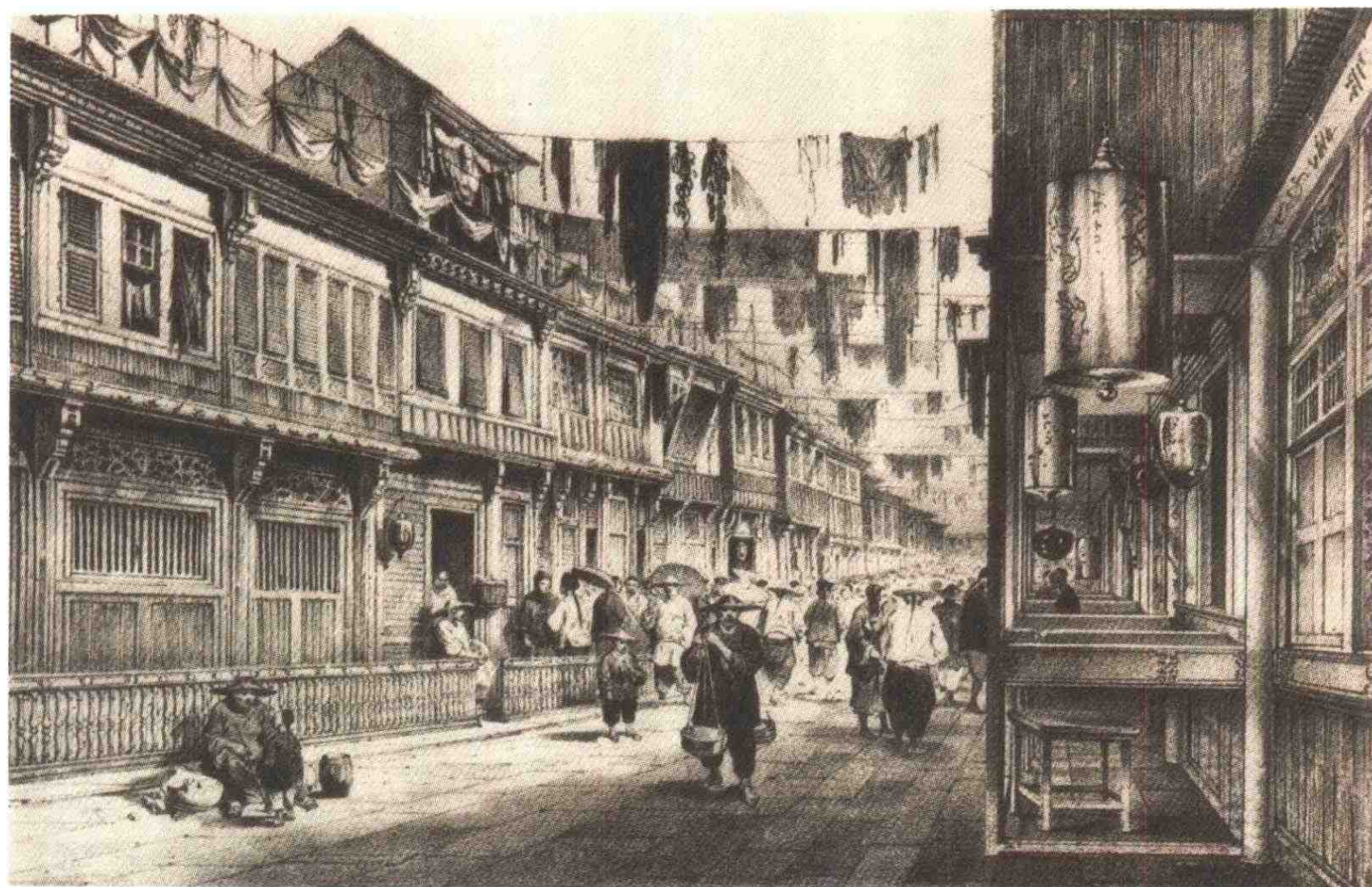


图 3-2-3 《广州商馆图》，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图 3-2-4 设色石版画《十三行同文街一景》，19 世纪，拉维涅画，比切博斯刻印，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原书注：同文街在十三行范围内，位于丹麦馆及西班牙馆之间，街道两旁均为中国人所开设的各类店铺，著名的画家庭呱（关联昌）的画店，便开设于该街十六号。



作为建筑实体的十三行夷馆与洋行是同一座建筑因所涵盖的范围不同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称呼，英文文献“夷馆”译为“Factory”，“洋行”音译为“Hong”，“Factory 与 Hong 两字，虽非同一意义，但可更迭为用。前者包括寓所及公室两义；后者不但包含为雇员、厨役、报信人、‘过重工头’等设备之各种部分，且为广袤足以收容全船进口货物与同量出口茶丝之甚大场所。外人提及其各自寓所，则称为 Factories；提及其与行商交易地点，则称为 Hong。但瑞典夷馆(Swedish Factory)似系独享中国称呼，被称瑞行(Suy-Hong)。”^[29]《广东十三行考》特别指出：“夷馆亦即洋行之一部分，例如：同文行就其洋行本身而论，面积甚小，但若连其所有之夷馆而论，则其面积甚大。”^[30]又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数年广东出版的“Chinese Repository”卷一 Osbeck 所著“Description of Factories”(《夷馆概述》)一文的论述指出，十三行的用地范围始终保持不变，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谓夷馆之外观，虽较其为纯粹中国行时远胜，然其所占基地，视前(即当罕有或绝无外商居留，每年进口船仅十八艘，而每船又常各自独赁其馆舍之时)毫无扩展。”^[31]这当然是清廷严格限制十三行商馆扩展的结果。(图 3-2-5, 图 3-2-6)

十三行还建有洋行会馆 (Consoo house)，会馆位于靖远街北面尽头处，“其建筑之规模不甚大，亦不算堂皇；然而，此建筑物似乎相当宽敞，足以应付公行之全部公共业务，偶然地还用于其他用途。1827 年 Navigateur(‘航海家号’)船员被谋杀一案的审讯便在此处进行。每月的逢八之日，还可以见到一群孩子及其他人聚集在此处种牛痘……”^[32]

十三行建筑密集，1822 年(清道光二年)，因邻街饼店失火，祸及十三行，大火延烧两日，洋行、夷馆多被焚毁，行商、外商损失极大，十一家洋行中只有五家幸免。而外商历年存货与本年贩到的货物，及行商的房屋货栈都化为灰烬。附近店铺被毁者亦有千余家。(图 3-2-7)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十三行改称茶行，专营丝茶等大宗生意，十三行行商包揽对外贸易的制度虽然废止，行商本身并未停止营业。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再攻广州，十三行全部焚毁成为焦土。几年后，各洋行将行地改开为街道，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十三行遗存除有关文字记载及历史图照外，就只有以行名命名的街道了。十三行行地改开为街

道的情况,《广东十三行考》引梁嘉彬先生曾为行商的先祖的遗札云:“十三行行地初称十三行街,自 1926 年拆修马路后,改称十三行马路,距十七甫马路怀远驿街约一里。附近有白米街、故衣街、油栏直街、豆栏直街、盐亭街,想皆当年交易米、油、豆、盐、故衣之场所。又十三行马路附近有怡和大街,为伍怡和行故址,同文大街为潘同文行故址,宝顺大街为梁天宝行故址,普安街为卢广利行故址,其十三行馆会馆则正对靖远路,面海,1927 年至 1928 年间,始由各行业主子孙公议,售与大信银行,又展转为东亚银行、华益银行矣(1930 年先祖遗札)。”^[32](图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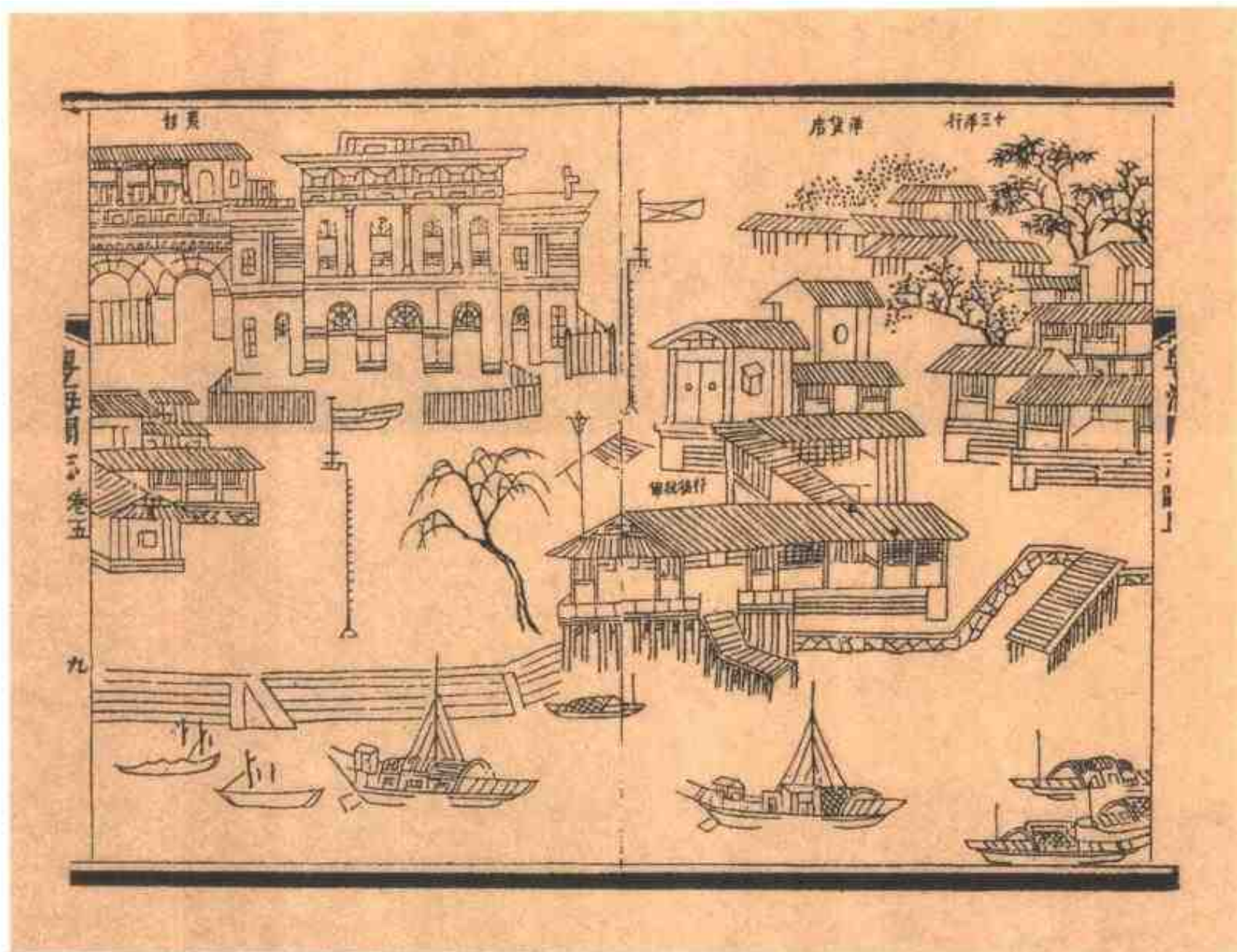


图 3-2-5 《粤海关志》所载《商馆及洋货店图》,转引自《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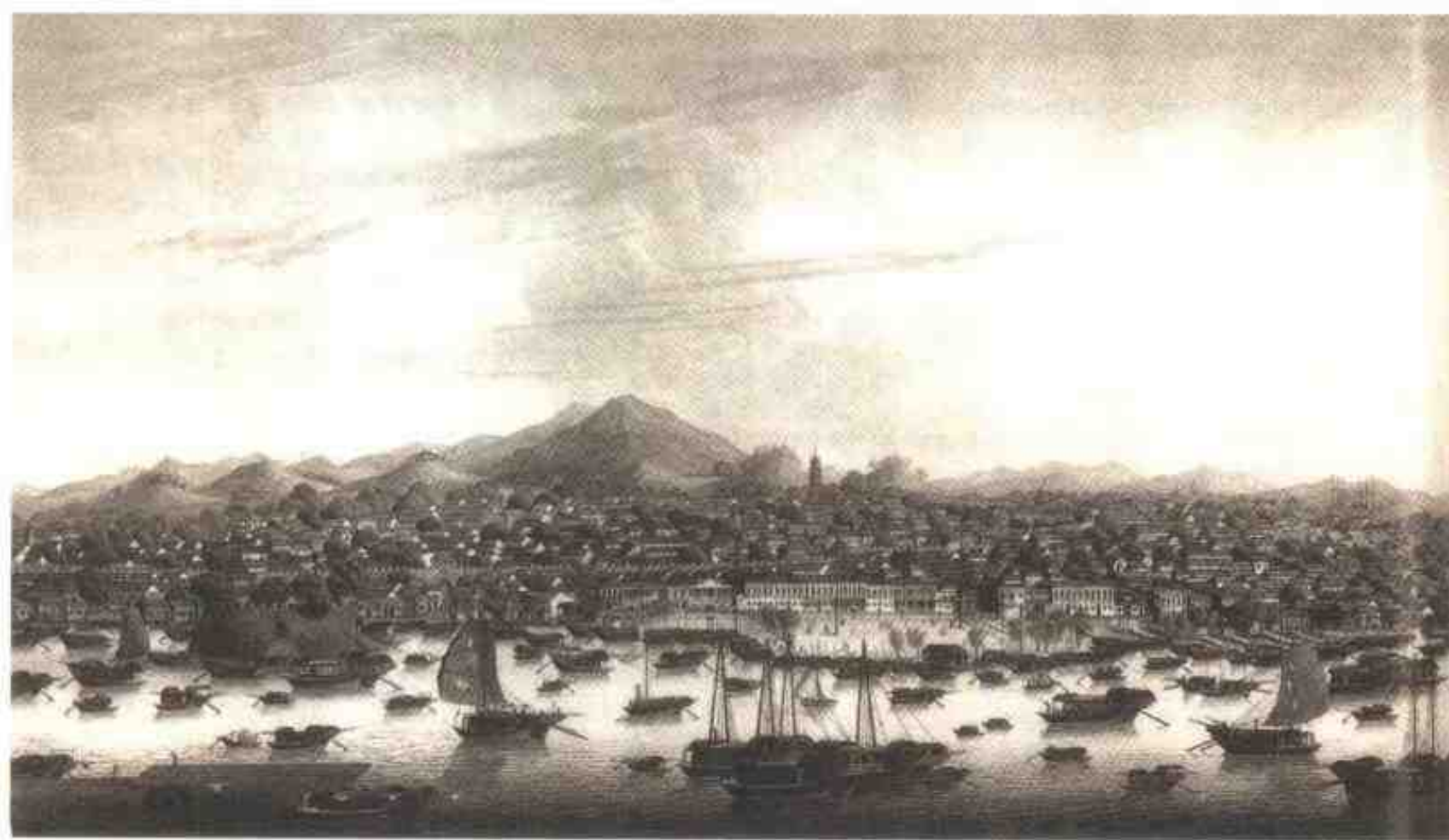


图 3-2-6 画家笔下的广州十三商馆及广州市区全景,原画载《剑桥插图中国史》。

图 3-2-7 油画《广州十三商馆大火》，1822年，画家佚名，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原书注：1822年9月，广州十三行商馆被邻街饼店失火所波及，焚烧两天，洋行多被焚毁，损失甚巨。



图 3-2-8 油画《广州的新十三商馆》，约1850年，画家新呱（签名），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原书注：此为十三商馆在1941年被焚后重建之貌，画中所见教堂，乃1847年前后所建。



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是《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与《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两书的作者。亨特于1825年年仅13岁时来到广州，随即被派赴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次年返回广州。1829年在广州加入美商旗昌洋行，1837年成为该行合伙人。1842年退休，1844年返回美国。其后又回到中国，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活动达20年，并创设亨特洋行。晚年旅居法国，1891年去世。

《旧中国杂记》描述十三行的整体格局及其建筑，因系作者亲身经历，虽然琐碎，却很生动真实。书前附十三行商馆平面图，虽然只是一张示意图，对照书中文字描述，及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第一卷所载广州十三夷馆图，还有当时画家所绘有关十三行的风景画，可使我们对已荡然无存的十三行建筑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旧广州’的‘外国’行号数目是十二座。它们主要是浩官和潘启官的财产，外国人向他们租用。租金价钱公道，每年交租一次。在我居住广州的长时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为租赁这些房子而订立正式的契约。它们的地点可以在本书所附的平面图上看到。整体来说，

它们被称为‘行’。每座行都包含有独立的住所,包括会计室;一座挨着一座地南北向排列,每两座中间有露天的小庭院或空地隔开。这便是商馆。在中间的六座商馆前面,直到约 300 英尺远的江边,是一个开阔的‘广场’,是经双方认可,专门划出来归外国侨民使用的。广场的四周起初围着设有石头地基的坚固的木栏杆。每座商馆都有门通向广场,广场的另一边又有门对着江边。因而每座商馆都有自己的码头。靠东边的三个‘行’和靠西边的三个‘行’,通过各自前边的围栏保持到江边的交通。围栏的宽度与每一个‘行’的宽度相等,大门设在每个围栏的尽头。”^[33](图 3-2-9,图 3-2-10,图 3-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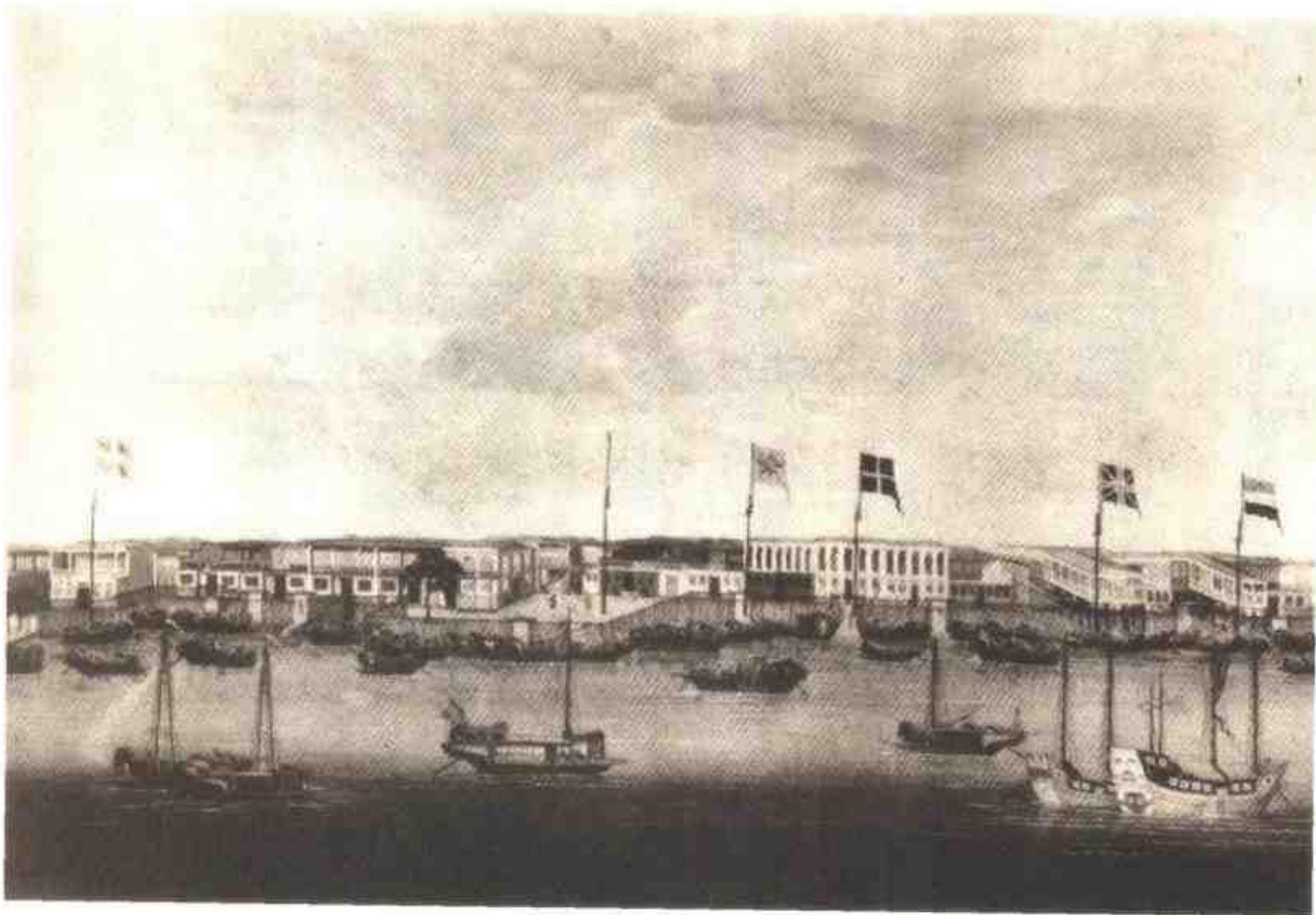


图 3-2-9 油画《广州的十三商馆》,约 1800 年,画家佚名,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原书注:画中从左至右旗杆上悬挂的分别为丹麦、奥地利、瑞典、英国及荷兰旗。岸边围上栅栏,其时旧英国商馆前一带尚未填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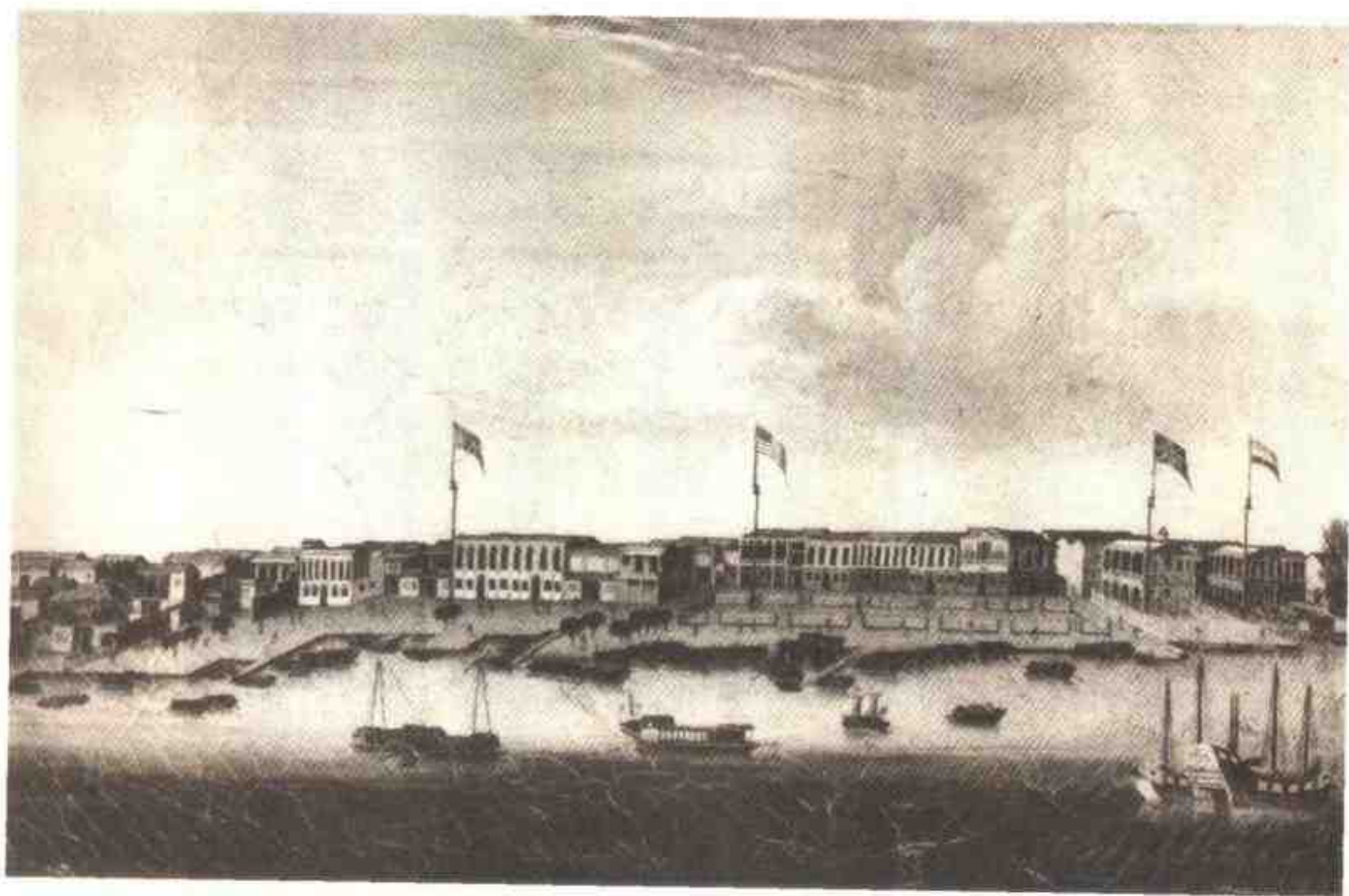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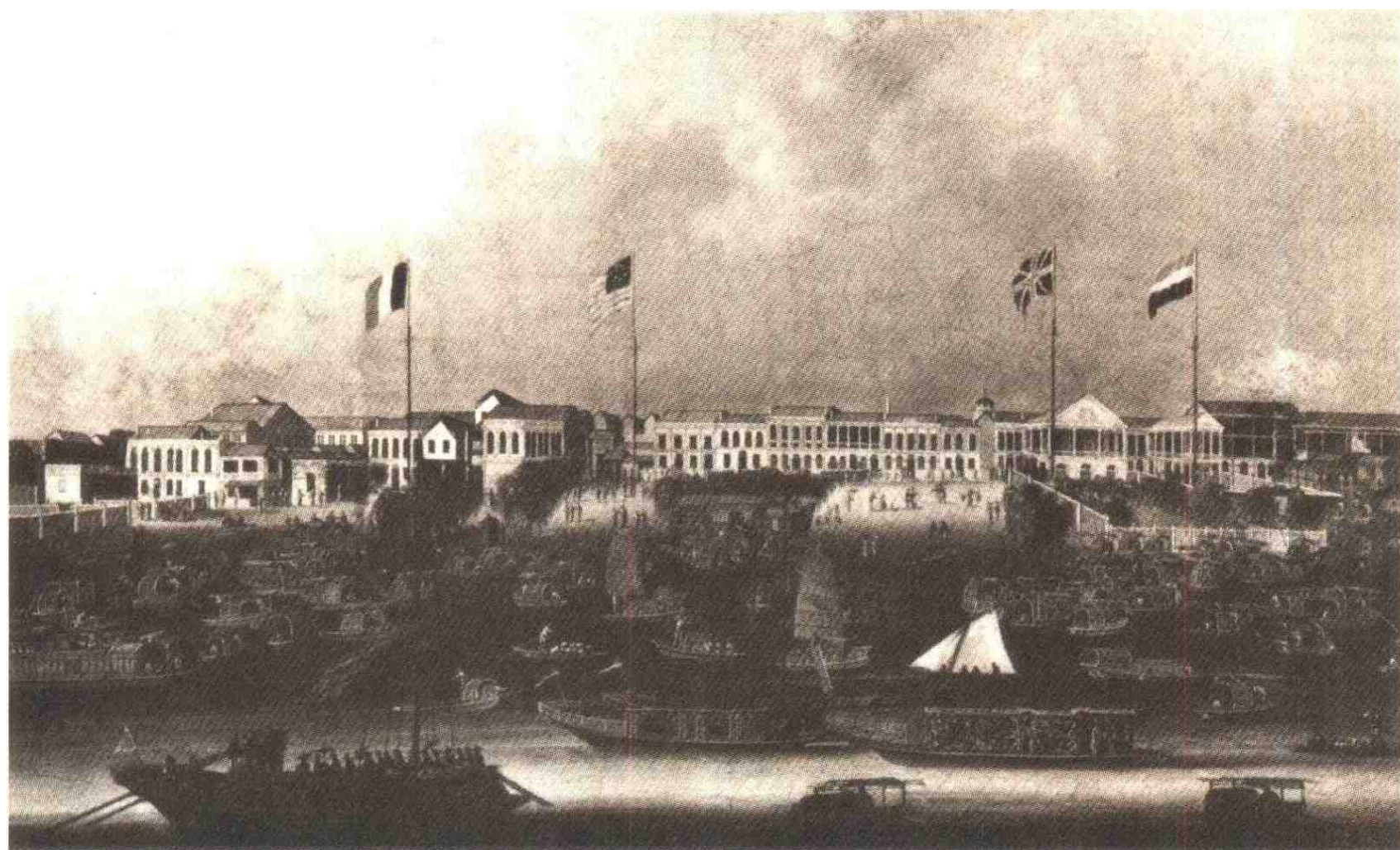


图 3-2-10 油画《广州的十三商馆》,约 1815 年,画家佚名,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原书注:画中从左至右所悬挂的分别是西班牙、美国、英国及荷兰旗;所属商馆分别位于本国旗杆之后,商馆前已填海并辟为广场,四面围以铁栏,并于每一商馆前设出入口。

图 3-2-11 油画《广州的十三商馆》，1830 年代，画家新呱（签名），原画载《珠江十九世纪风貌》。原书注：此为 1822 年大火后局部重建之十三商馆，昔日广场所围的铁栏已不复见。



“对若干商馆的居住者提供膳宿的方便，也是这种为所有居住的‘番鬼’提供方便的总秩序和制度的一个特色。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到，行商章官的行号，是跟十二座外国商馆并排建在一起的。它们合起来使后面那条东西走向的街得名为‘十三行街’。在这些围栏和广场按照原来的样子存在的长达 80 年的时期里，陌生的中国人都不许通过这里。只是在 1822 年的大火中，西郊‘烧毁 12000 座房舍、庙宇和店铺’，也几乎烧毁了所有原来的外国商馆，同时毁掉了公共广场和专用围栏的界线。只有丹麦、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公司的商馆保存下来。中国行号跟外国行号彼此靠近，有利于迅速办理交易事务。不用说，那都是大规模的生意。这样办交易是最愉快不过的，各项手续都十分容易和方便。”^[34]

“在中文里‘行’(Hong)这个字，只表示一个商人和他的所有雇员做生意的地方(所以有‘行商’这个称呼)。一个行可以包括几个商号，各有自己的职员、苦力、仆人、厨子等等。重要的行占着一大片地方，中间有空地隔开，分成几个部分；各处都明亮通敞，而且极其清洁，井然有序。入口的大门夜间关闭，由一个或更多的守门人住在大门近旁负责看守。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下，譬如商务繁忙的时候，行商也会日夜呆在行里。为了应付这种商务繁忙的状况，行号设有舒适的房间和厨房。房间里装饰着木雕，灯笼从屋顶上垂吊下来(很少有天花板的)，墙上挂着字画的条幅。实际上，它们是按私人住宅的套房那样，布置得雅洁宜人。用红色方砖砌成的地板，通常无论冬夏都铺着藤或草编成的垫子。如果冬天很冷(这在广州是很少有的)，屋子里就用火盆取暖，盆里几乎完全没有烟，因为中国人的房屋是没有烟囱的。”^[35]

亨特描述了夷行的平面组合：包括会计室在内的房间组成独立的住所，这些住所一座一座南北向排列，每两座中间有露天的小庭院或空地隔开。只有这种平面格局的建筑才可以如书前所附十三行商馆平面图所示，一座座东西并列而其间不留道路。文中所叙夷行的建筑到江岸之间有约 300 英尺即约 90 米宽的广场，广场四周围有坚固的木栏杆，中间六座夷馆共同拥有一个开阔的广场，东西各三馆则拥有各自用木栏杆分隔开的小广场，沿江是并列着的各个洋行的码头，这些在留存的十三商馆绘画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图印证，当知书中所叙不谬。画中所见建筑外观是二层坡屋顶的西式建筑，而文中

所描述的洋行的室内装修,包括悬挂着灯笼的没有吊顶的屋顶,红色方砖砌成的地板,室内木雕装饰及墙上挂着的字画,却又有广东民居的影响,是局部中西合璧的西式建筑,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建筑的面貌可见一斑。(图 3-2-12,图 3-2-13,图 3-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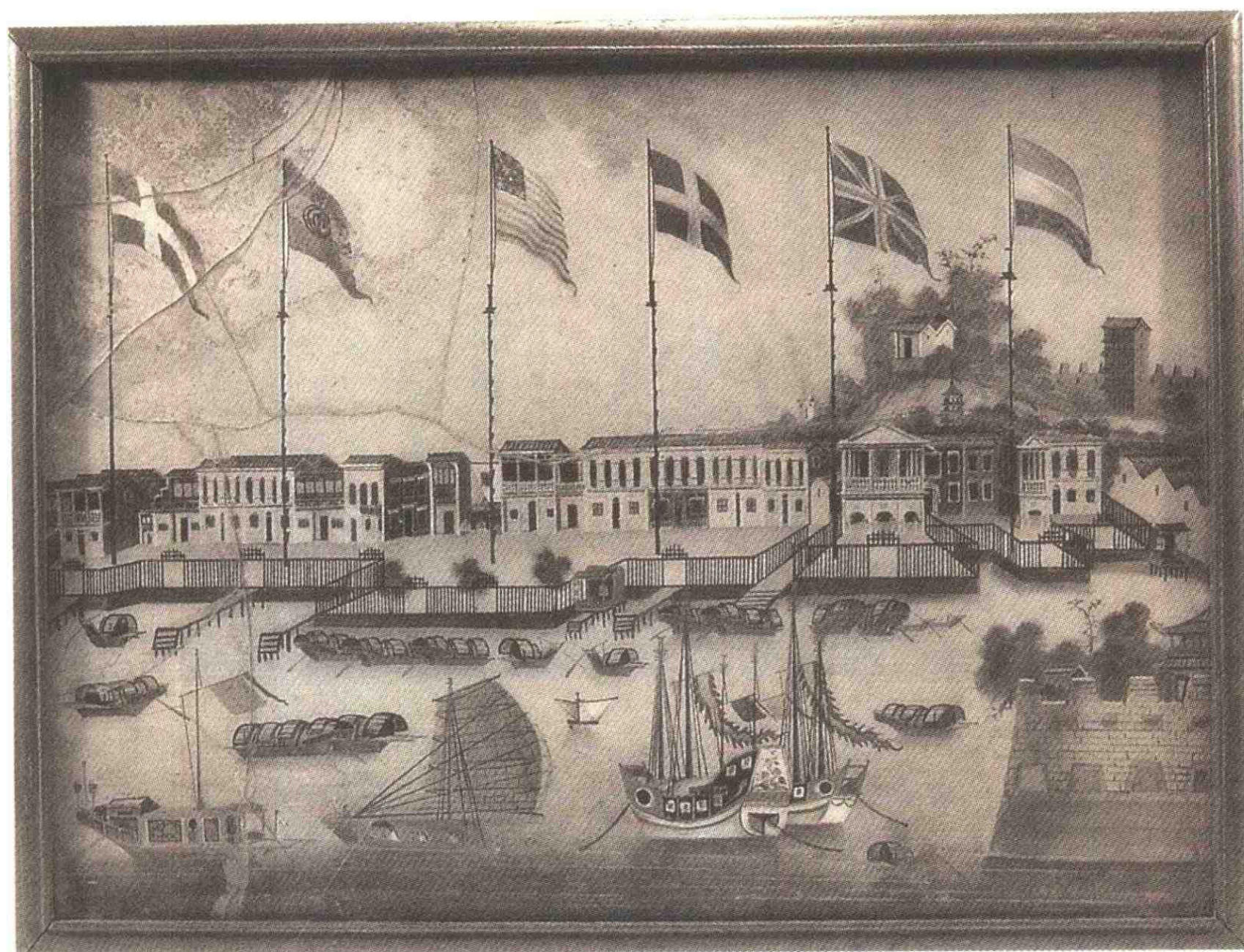


图 3-2-12 玻璃画《广州十三商馆》,画中 1822 年大火前广场所围的铁栏清晰可见,原画载《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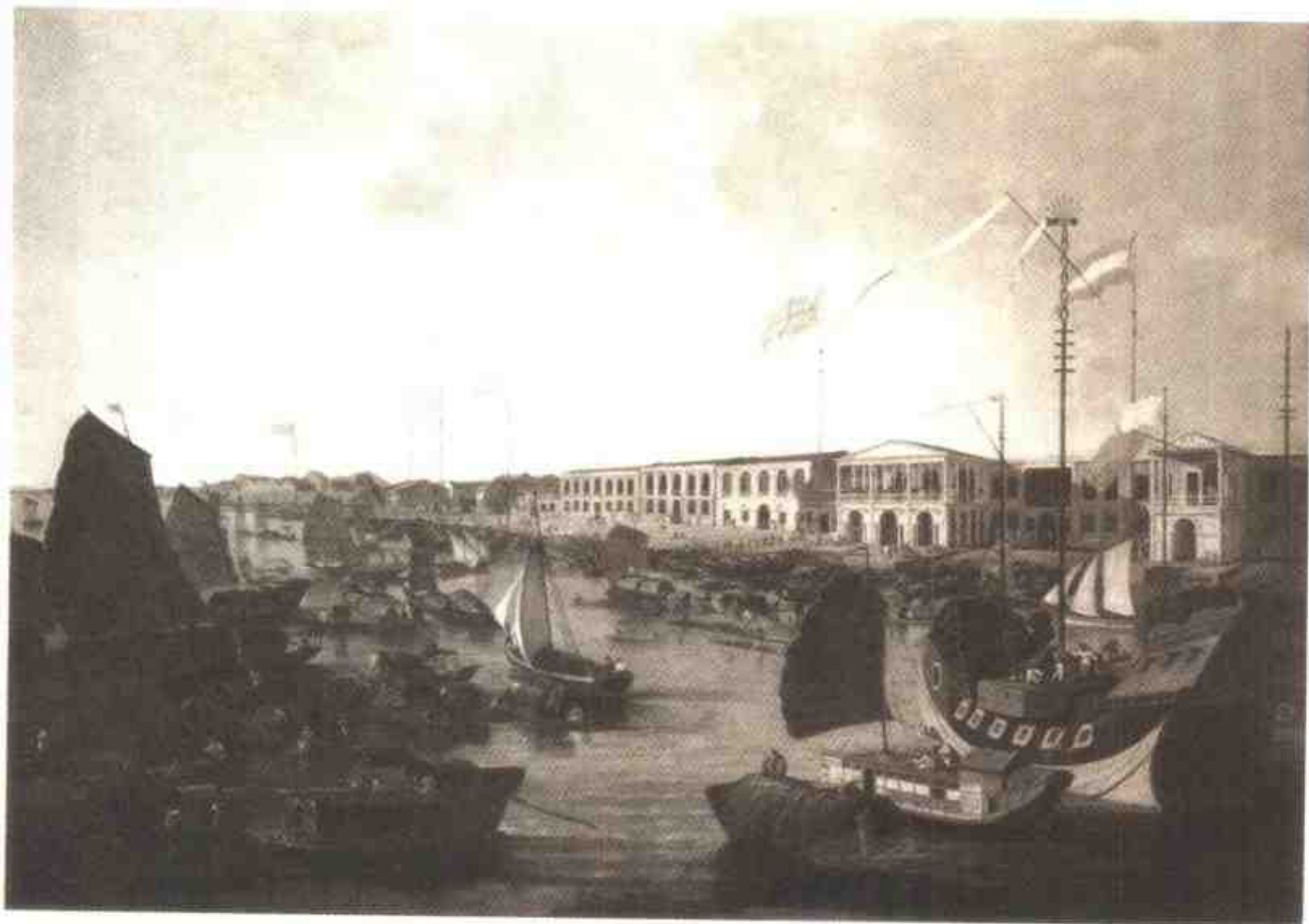
图 3-2-13 画家笔下的广州十三商馆近景,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图 3-2-14 画家笔下的广州十三商馆近景,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清沈復《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这样描述十三行及其时允许外人每月两次前往游览散心的花棣与海幢寺：“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对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处也。……海幢寺规模极大。山门内植榕树大可十余抱,阴浓如盖,秋冬不凋。柱槛窗栏皆以铁梨木为之。”^[6]沈復所称十三洋行是指包括洋行与夷馆建筑在内的十三行建筑,证之以留存的十三商馆绘画作品,十三行已满布西式建筑,所以沈復云“结构与洋画同”。(图 3-2-15,图 3-2-16)

图 3-2-15 画家笔下的广州十三商馆,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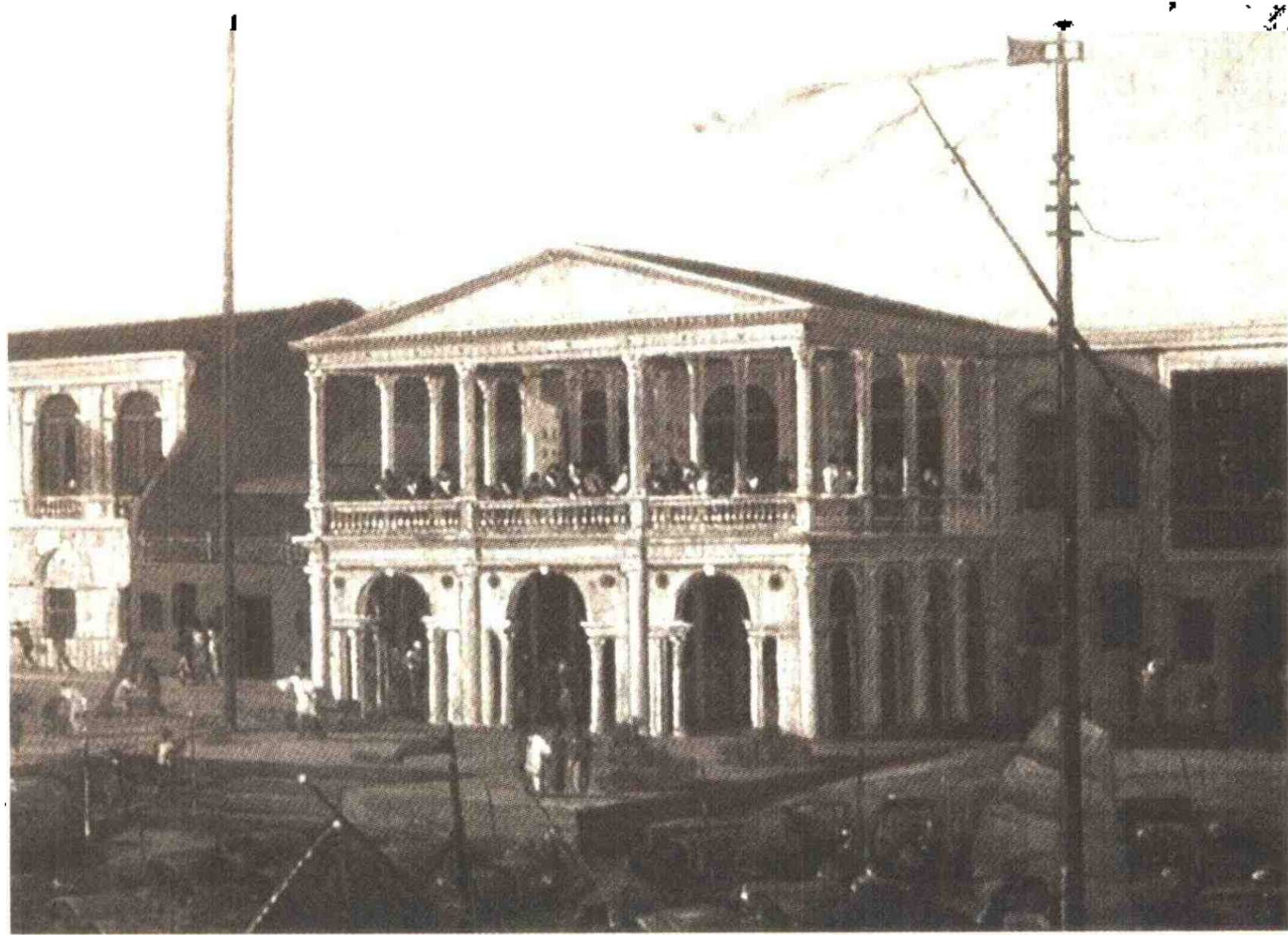


图 3-2-16 图 3-2-14 之局部, 可以清楚见到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建筑大师帕拉第奥所创之“帕拉第奥母题”(Palladian Motif)的西方古典建筑细部。

为避免外商的影响扩散,使之与中国社会隔离,当时清廷对前来贸易的外商限制极严,后期管理逐渐松懈,但“夷夏之防”还是很严格的。“至外人抵步后,即须迳入居夷馆,盖乾隆以前,外人颇有自赁民房,或就已倒闭之洋行加以改造纳租居住者;其后定制愈严,除赁居行商所建夷馆外,不许私赁民房,而一切行动,遂完全受行商约束矣。乾隆末年,始准外人每月二次(初三、十八两日)往游隔海之陈家花园及海幢寺,以资舒展;其后陈家花园废圮,至嘉庆二十一年,始改令往花棣及海幢寺两处。又外人在夷馆内不许私自多添一房宇,一柱一石;在夷馆外不许私添一马头;违者动辄受政府及行商干涉。但其后往往不遵约束,且有在馆内开设旅馆者。其初外人谒见行商,晤谈之时间甚短,面递货单后即便告退;其后行商且有与外商同居止者。又外人往谒行商,初亦只可徒步,行商至夷馆则必循例乘轿;道光十年,东裕行司事谢五为外人雇轿,竟被‘革去职衔,照结交外国诓骗财物发边远充军例,从重改发伊犁’,未及发遣而已瘐死狱中矣。”^[37]

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行商就官府的查问回复巡抚李湖云:“查夷商到广,现在俱已遵照定例,在于商等行馆寓歇居住;并于行馆适中之处,开辟新街一条(按此或即十三行街),以作范围。街内两傍盖筑小铺,列市其间,凡夷人等水梢等所需零星什物,以便就近买用,免其外出滋事。其新街及总要路口俱派拨行丁数十名,常川把守;一切夷人行走概不许越出范围之外。其闲杂人等,亦不许混行人内。至各该夷馆如搬运起下货物,及看守行门等项,系责成通事选派管店数人料理。其逐日所需菜蔬食物,亦系通事结保买办数名代为购买。一切管店买办人等,俱系慎择老成信用之人充当,不敢从中引诱。夷人并无自雇内地民人服役;倘有其事,商等随时查知,立即驱斥,毋任容留。”^[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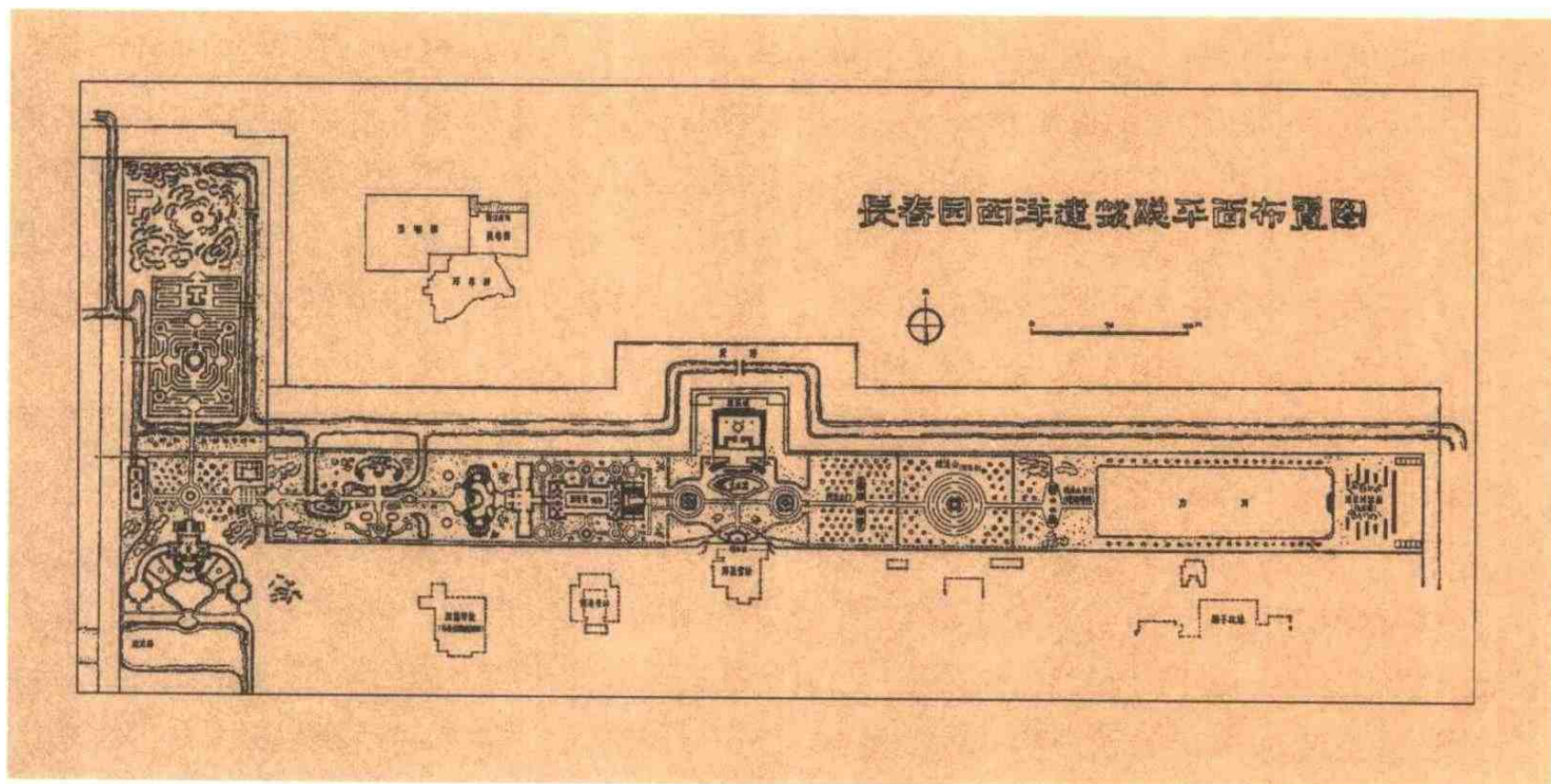
这种严格限制外商与华人交往的政策,使十三行商馆的西方建筑文化只能局限于十三行街限定的区域之内,没有对中国内地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广泛的影响,倒是十三行商馆建筑掺杂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某些要素,如室内装修与家具等,呈局部中西合璧之势。

第三节 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

清代自康熙朝开始,在北京西北郊营造皇家园林区,形成通常所称“三山五园”离宫园林建筑群,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与畅春园、圆明园。其中圆明园自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开始建造,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营造,至乾隆朝已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区。1745年(清乾隆十年)至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在圆明园东面建长春园,又将圆明园东南方的春和园等扩建成绮春园。至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全部建成,合称圆明三园,因为长春园与绮春园是圆明园的附园,所以三园亦总称为圆明园。盛期的圆明园,总面积达350余公顷。

长春园北侧建有一组西洋园林建筑群,位于长春园最北面,可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东西宽约90米,南北进深约350米,自南至北建有线法桥、谐奇趣、蓄水池、养雀笼及万花阵;西部东西宽约750米,南北进深约70米,自西至东依次建有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线法山西门、线法山、线法山东门、方河及线法墙。西洋园林建筑群以西式人工喷泉景观为主,与长春园其它景区之间有东西走向的“界山”隔开,一为“夷夏之别”,二为单独隔离以避免与其他景区景观不协调。长春园西洋景区始建于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基本建成。二十多年后,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又建成远瀛观,是西洋楼景区建造的最后一幢建筑。(图3-3-1)

图3-3-1 《长春园西洋建筑总图》,原图载童寯,《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



圆明园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被侵略者焚毁,长春园西洋建筑也未能幸免。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圆明园再遭劫难,至今只余遗址,西洋楼也只留存若干柱式等石构构件。除文字记载外,可供研究长春园西洋建筑的资料,一是满人伊兰泰绘制的二十幅铜版画。^[9]“西洋楼铜版图,绘制的是各座欧式建筑、庭院的立面透视图像;共20幅。即:第一至第三幅为谐奇趣(南面、北面、蓄水楼),第四、五幅为花园即黄花阵(南门、花

园),第六、七幅为养雀笼(西面、东面),第八幅为方外观,第九幅为五竹亭,第十至十三幅为海晏堂(西面、后蓄水楼北面、东面、南面),第十四幅为远瀛观,第十五幅为大水法,第十六幅为观水法,第十七至十九幅为线法山(西门、山、东门),第二十幅为湖东线法画即方河线法墙。这样,当年西洋楼的主要园林景观,除最西端‘线法桥’一景外,铜版图都留有比较形象的图影。”^[40]二是西方学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圆明园遗址拍摄的照片,因西洋楼建筑是砖石结构,遗迹保留时间较长,将这些照片与铜版画对照,尚可略窥当年西洋楼风采。(图 3-3-2,图 3-3-3)



图 3-3-2 圆明园的一处大门,根据约在 1875 年摄制的照片印刷,由潘尔来先生(M.A. Théophile Piry)摄,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I)。



图 3-3-3 圆明园遗址中的一处楼阁,根据约在 1875 年摄制的照片印刷,由贾尔德先生(Mr. Thomas Child)摄,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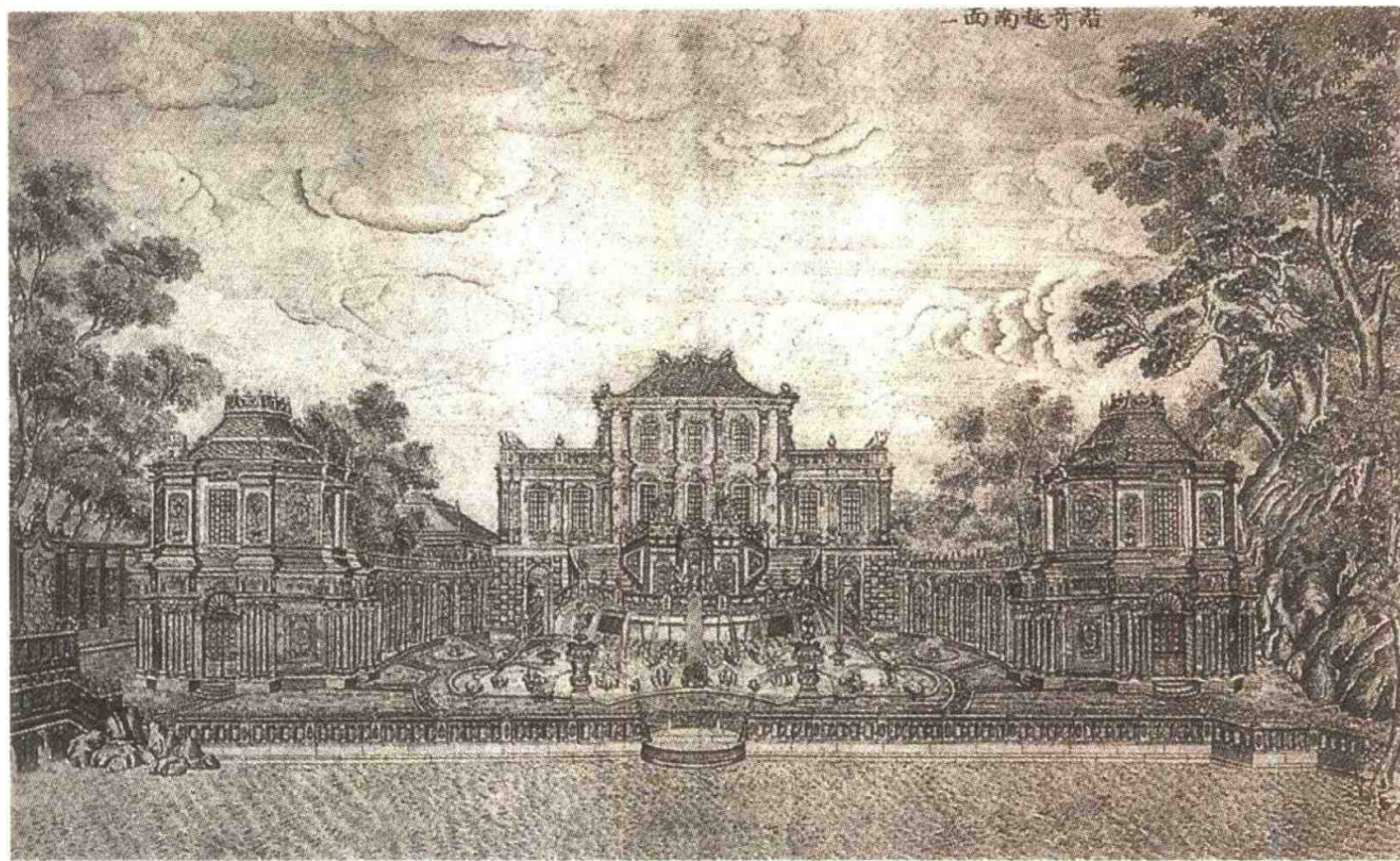
谐奇趣是长春园中最早建造的西洋楼,它的建造有偶然性,是因乾隆观西画人工喷泉而生仿造之念;它的建造也有必然性,因 1747 年(清乾隆十二年)开始建造谐奇趣时,西方传教士郎世宁(F.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意大利人),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 法国人),艾启蒙(P. Ignace Sichelbarth, 1708~1780, 波希米亚人)蒋友仁(P. Michael Benoist, 1715~1774, 法国人)等都已在宫中为皇帝服务,其中郎世宁 1715 年 8 月来华,当年 12 月到达北京,在皇宫内绘画,至 1747 年已在宫中服务 32 年,深得乾隆信任,蒋友仁亦已于 1744 年抵澳门,旋至北京,此时亦已在北京三年,所以郎世宁才推荐蒋友仁当此重任。“此时临朝之清帝(按即乾隆)乃一天才洋溢之君王,且求知之心极热。一七四七年时,见一喷水机之画图,即征教士郎世宁为之解说,且询朝廷中,是否有三数欧人,能作一与此相类似之机。此教士而兼艺术家者,其谦让冲虚之态度,更足以增光其才能,立即作一坚决之答复,小心翼翼,敬告清帝,彼将赴田野乡村,讲道于各教堂。但清帝甫退入私殿,一内侍出而告彼,若有欧洲人,能担任制造喷水池者,明日彼应即使其高升。末后数语,乃朝廷官话,即命令彼,任意出价,寻觅能办此事之人。任何教士,均不至误解此令之用意,于是大众全注目于神父蒋友仁。彼遂致力于此工作,旋即谒见清帝,谓

彼以书籍之助,能指导工人,制造水法或喷水机。清帝大为喜悦,蔼然与彼交谈,极示恩宠之意,且谓即将颁发命令,凡彼调遣工人所为之事,均须遵照实行。”^[41]

蒋氏并非建筑师,也不是机器制造专家,只凭来中国前在欧洲研究学习所得的知识及书本所载相关资料设计建造谐奇趣西洋楼喷水设施。“当其在欧洲,研究物理学时,彼曾解释,模仿,并模拟各种引水机器。当时从事于此,盖为学术之精研,或冀生活之改进。而孰知一至中国,便须制造喷水机,而已早为之备哉?彼所呈献之第一件,极合清帝之心意,清帝命人,将其送至私室,以便暇时熟观谛审。因此且决意建筑一欧式之宫殿,亲自于花园中,择定地址,且命教士郎世宁与神父蒋友仁协力合作,绘一结构大略之总图。”^[42]

蒋友仁工作的困难,一是本人并非此方面专家而须设计并指导从未从事过此种工作的中国工匠施工;二是因宫中种种规章使蒋氏工作受到束缚,这些困难因蒋氏的才华与勤奋及乾隆的支持而获解决。谐奇趣的建筑则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负责,并由耶稣会传教士汤执中主持绿化。^[43]工程于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秋末建成。(图3-3-4)

图3-3-4 清人绘铜版画,《长春园谐奇趣图》,原画载《圆明大观话盛衰》。



谐奇趣主楼是三层建筑,一、二层七开间,三层缩至三开间,四坡屋顶,室外台阶直达二层,以壮气势,亦可在台阶上观赏水景。主楼两侧各建一座两层六边形塔楼,与主楼之间用弧形连廊联结,主楼、两侧塔楼与连廊环抱中央海棠形喷水池,池中有口中喷水的石雕大鱼及铜雕——铜雁与铜羊。谐奇趣主楼北面台阶前亦建有喷水池。这是中国第一次建造西式人工雕塑喷泉。

谐奇趣的北面,建有欧式迷宫黄花阵,时称花园,用高约四尺的砖墙构成迷阵,人在其中不易辨明路径。黄花阵中央建有圆亭一座,中秋之夜皇帝在亭中观看宫女提灯在迷阵中觅路行走,引为乐事,所以也称黄花灯。(图3-3-5)

谐奇趣与黄花阵之间,建有为喷水池供水的二层蓄水楼,及饲养珍奇鸟类的,用黄铜丝编成的大笼子“养雀笼”。黄花阵以北,还有一组小喷泉。这批工程完工后,形成以谐奇趣中轴线为南北中轴线的西洋园林建筑群,已自成体系,形成较完整的西洋园林建筑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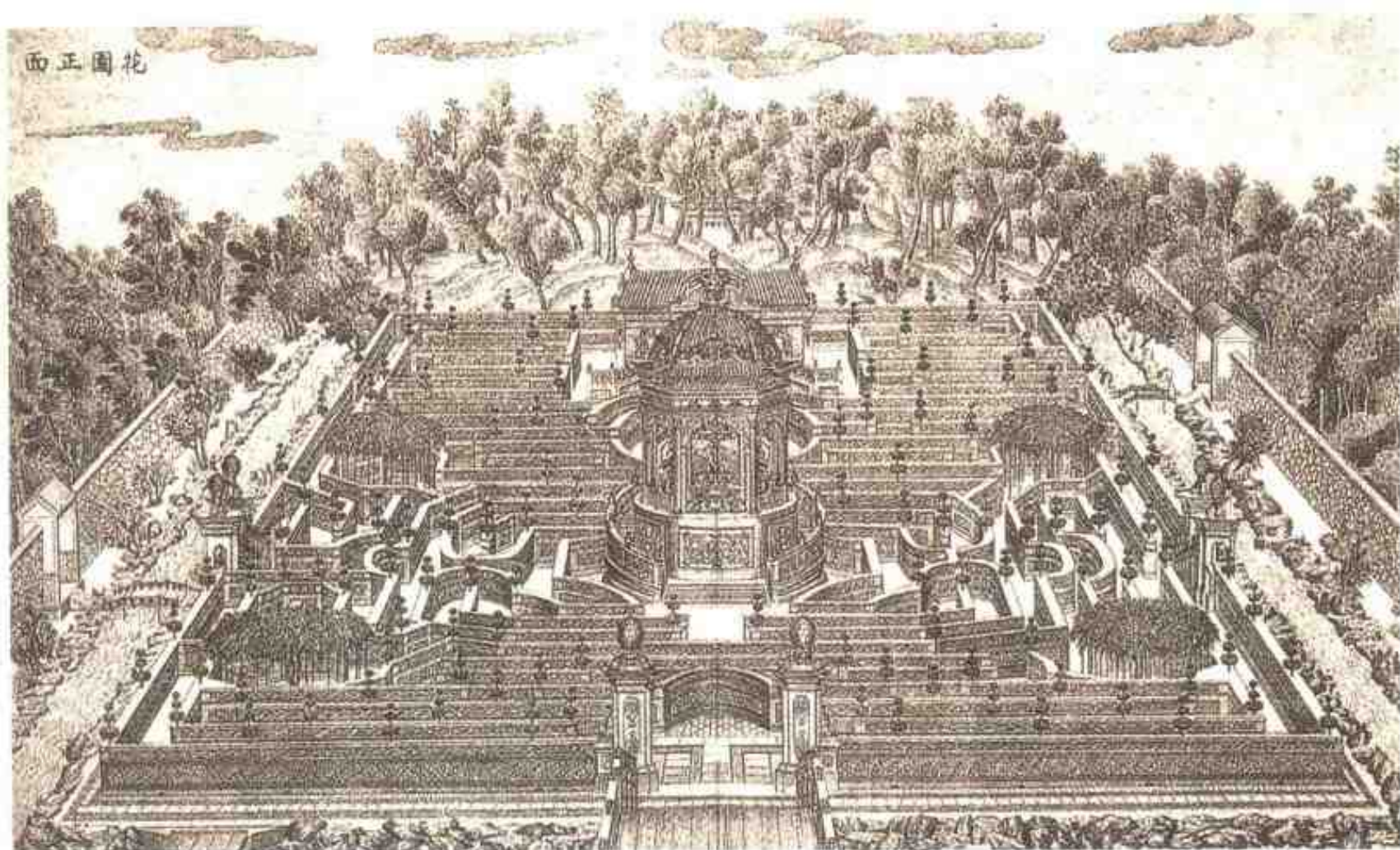


图 3-3-5 清人绘铜版画,《长春园黄花阵图》,原画载《圆明大观话盛衰》。

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由于西洋楼第一期工程非常成功,乾隆皇帝后来又降旨在其东边继续新建西洋式花园,包括方外观(时称三间水法楼)、海晏堂(时称十一间水法楼)和大水法、观水法等。这第二期工程量较大,由郎世宁设计的‘地盘样稿’是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奉旨照准的,蒋友仁设计的水法仪器则是次年七月奉旨照样准做的。前后历时三载,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工程基本告竣。”^[44]

海晏堂是园中最大的西洋楼建筑,其西楼东西向,两层十一开间,对称构图,西立面中部设大门,门外两侧有弧形室外楼梯直达二层,楼梯两侧均设计了跌水(水扶梯),水流沿跌水逐级跌落,流至楼前水池。楼前喷水池最有特色,设计制造难度也很高,“但最使蒋氏感觉繁苦者,即此第二座宫殿脚下之喷水管口,因华人以十二兽类分别代表一日十二时辰,彼遂拟制一时计,继续喷射清泉,无时或断,每二小时之内,有一兽口中涌射喷泉,他兽继之,轮流如此,周而复始。”^[45]用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兽面人身铜雕代替西洋惯用的裸体人像雕塑,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依次排列,依次轮流喷水,每兽各喷一个时辰(两小时),至午时(正午十二时)十二生肖同时喷水,当时称为“水力钟”。此时蒋友仁已有建造谐奇趣喷水池的经验,但十二生肖铜雕轮流喷水的“时控”装置仍是一道难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蒋友仁独处中国,仅凭书本知识及以前学习所得,能设计出这种复杂的“时控”装置,而中国工匠竟能按蒋氏要求成功制造安装,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十二生肖铜雕喷水构思将中国民俗文化融于西洋喷泉,是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等身为西人,又长居中国宫廷,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可称是早期中西文化交融的成功范例。(图 3-3-6)

与西楼用连廊相连的海晏堂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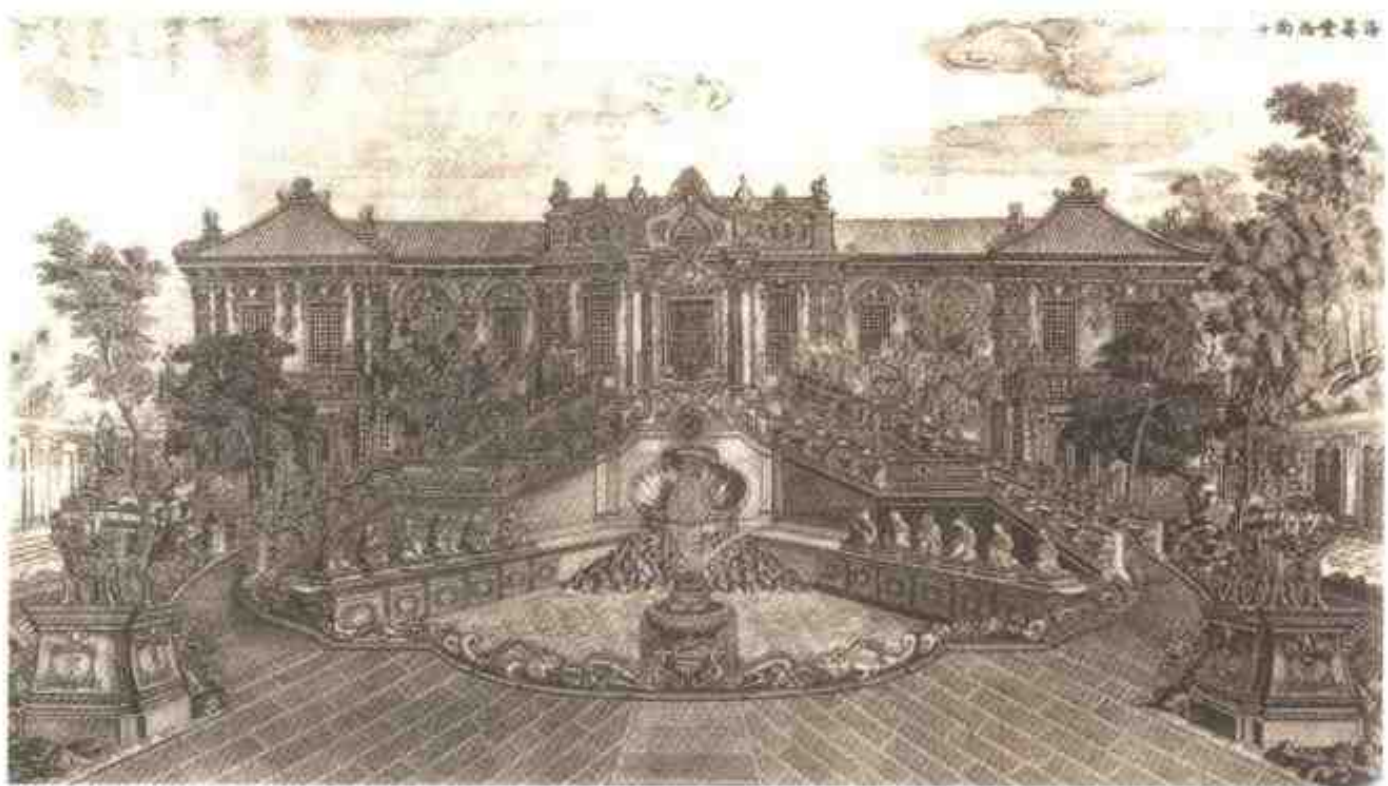


图 3-3-6 清人绘铜版画,《长春园海宴堂图》,原画载《剑桥插图中国史》。

楼是南北向工字形楼，十一开间，中部用砖砌筑高台，台上是蓄水池，称“养水池”，两翼是东、西水车房，用龙尾车提水至蓄水池。

海晏堂以西建有大水法喷水池，“是西洋楼最壮观的喷泉群。在石龕式的门洞下边有一大型喷水狮子头，形成七级水帘。前下方为椭圆形菊花式喷水池，池中心有一只铜梅花鹿，从鹿角喷水 8 道，两侧有 10 只铜狗，从口中喷出水柱直射鹿身，溅起层层浪花，俗称‘猎狗逐鹿’。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一座巨大的方形喷水塔，高 13 层，塔顶喷出水柱，塔的四周有 88 根铜管子，也都一齐喷水。”^[46]大水法的南面建观水法，石雕屏风宝座，是皇帝观赏大水法喷水景观之处。(图 3-3-7,图 3-3-8,图 3-3-9)

图 3-3-7 清人绘铜版画,《长春园远瀛观大水法图》,原画载《圆明大观话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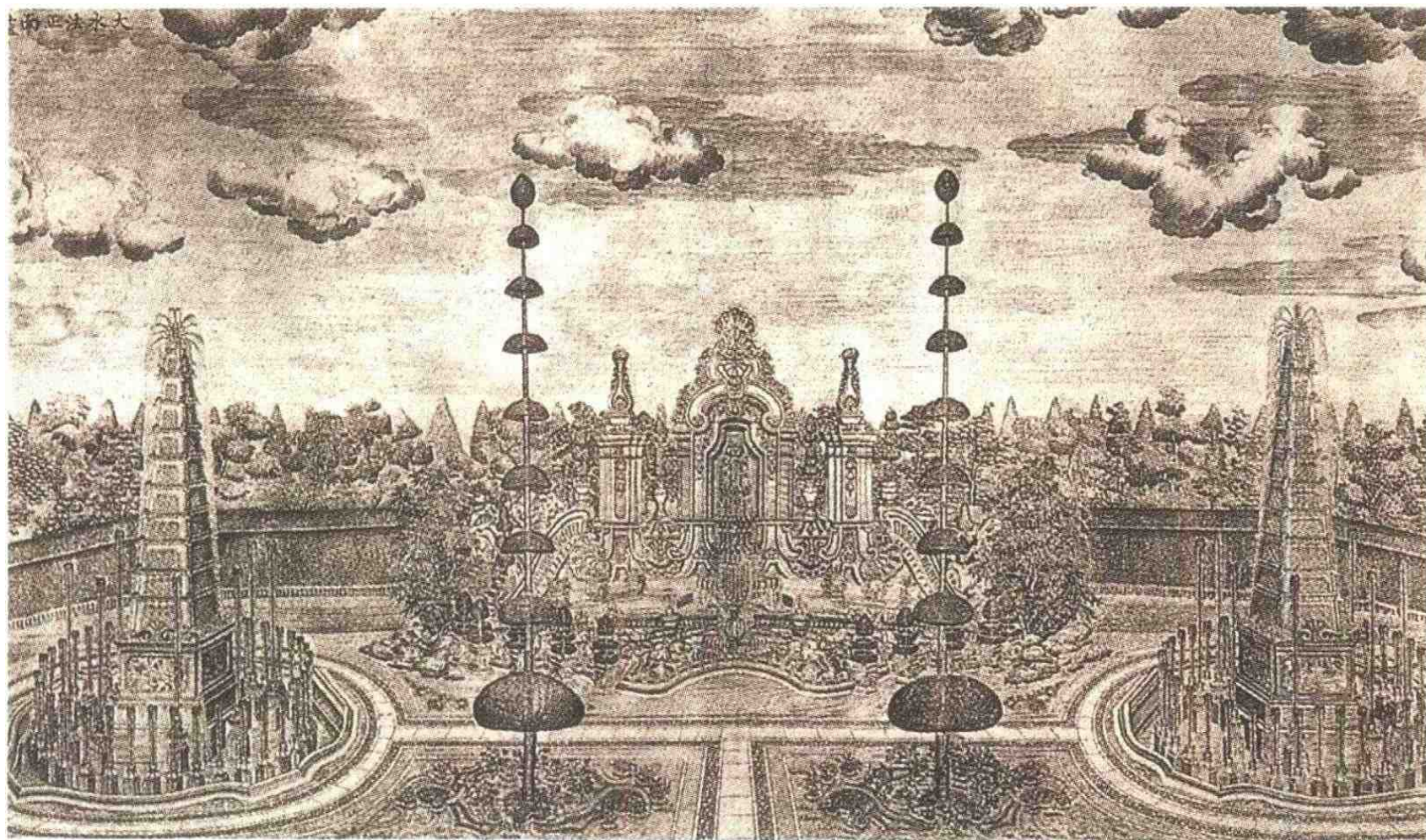


图 3-3-8 长春园远瀛观大水法遗址现状,原图载《圆明大观话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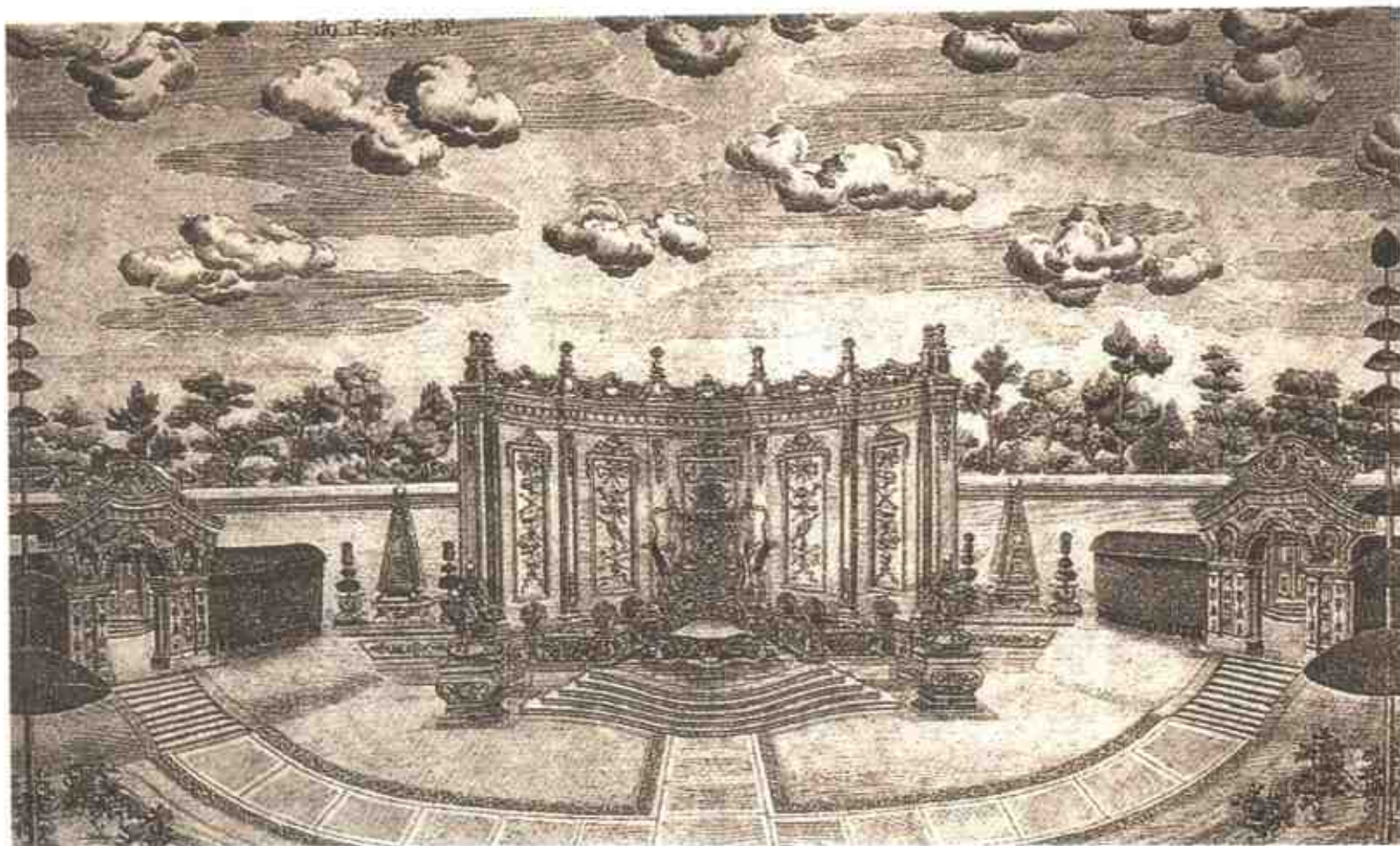


图 3-3-9 清人绘铜版画,《长春园远瀛观水法图》,原画载《圆明大观话盛衰》。



图 3-3-10 长春园远瀛观遗址现状,原图载《圆明大观话盛衰》。

大水法以东的线法山也称“转马台”，山上有八角亭，是皇帝绕山跑马之处。最东面方河（方形水池）以东的线法墙是五列平行的南北向砖墙，墙上张挂西洋油画，产生透视幻觉，增加园林纵深感，背后衬以蓝天作为天幕背景，已经有些像现代舞台背景。

西洋楼景区基本建成二十多年后，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建成西洋楼景区的最后一幢建筑远瀛观，至此，西洋楼园林建筑群全部建成。远瀛观建于大水法北面，位于大水法南北中轴线上，平面接近方形，中央部分重檐四坡顶，两侧翼建有小塔楼。远瀛观建成后，与大水法、观水法共同构成长春园西洋园林建筑景区的中心景观区。（图3-3-10）

长春园西洋建筑景区的价值在于其在中国前近代时期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先行者地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远大与在建筑史上的意义，或者说，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远大于在建筑史上的影响，因此，对长春园西洋建筑景区建筑创作的评价不宜过高。其一，西洋建筑景区由传教士郎世宁等人规划设计，蒋友仁设计喷水设备，这些传教士都不是专业人员，仅凭其在西方所见及书本所载模仿设计这一景区，建造过程中又须时时迎合乾隆旨意，类似，或更甚于今日所称之“长官意志”，设计水平当然不会太高，所以西人这样评价：“假若猜想中国所建造的欧式宫殿，是建筑中的名作，真要算做不公平了，因为它们简直差得远呢。工艺的技术，并不算十分佳妙，但许许多多用作装饰的欧式雕刻，和建筑的细点，仅由几位教士指导，中国工匠就能作得出来，还是值得注意的。”^[49]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与当时正宗的西方巴洛克建筑相比，西洋楼建筑设计水平不算高，而蒋友仁设计的供水设施，“在建成后不几年，由于水车轮盘不时损坏，铜管也汲水不急，而且‘糜费实多’，于是就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遵照弘历的旨意都一律改为人力戽水，即改安轱辘，每天雇用8名壮工用大罐打上楼。”^[49]这固然有乾隆只为享乐，对引进“西艺”并不重视的原因，蒋友仁以略通原理的外行设计这种复杂机械，技艺不精也应当是原因之一。

其二，长春园西洋建筑景区是乾隆因一时兴趣而兴建，并无全盘规划，又无先例可循，后来随皇帝兴致随时添造，因此总体布局全无章法，与圆明园其他景区深思熟虑、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之大成完全不同。最早建造的谐奇趣、万花阵景区稍有章法，其后陆续向东添建，形成松散的多元布局，结构散乱，空间序列混杂，没有太多可取之处。这只要将西洋楼景区总平面图与圆明三园总平面图作一对比，高下之分是很明显的。

最后要谈到长春园西洋建筑园林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1962年出版的《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这样论述：“如长春园西洋楼，后来导引出清末北京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大门和颐和园石舫的造型；还形成了北京的所谓‘圆明园式’的特有构图，而流传于一般店面和某些民间建筑之中。”^[49]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慈禧重建清漪园（1888年改名颐和园）时，将园内昆明湖西北岸原有的上部为中国式木构舱楼，船体为大理石的石舫，改建为仿洋式火轮舱楼，并在船体两侧加石刻机轮，于1893年建成，名曰“清晏舫”。这是长春园西洋建筑在皇宫内苑的重演，与康熙建造长春园西洋建筑时的猎奇心态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跨越皇家园囿范围，不能说是长春园西洋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了影响。至于清末的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建造时间已是1906年，其时上海、天津、汉口租界区的西方建筑已成片建造，北京亦已开辟使馆区，建造了一批西式使馆建筑，并已大量建造西式官方建筑。这个大门与其说是受已焚毁四十多年的长春园西洋建筑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当时已广泛传播的西方建筑的影响更为确切。北京的民间建筑，如北京四合院的外门，包括大门与随墙门，都有外檐做西式装修的特例，女儿墙、拱券、西方古典柱式俱全，北京百姓称之为“圆明园式”门。这种四合院外门的建造年代无考，大致也应当是1900年以后所建，与上述农事试验场大门一样，应当是受当时已大量建造的西方建筑的影响，而不是受早已无存的长春园西洋建筑的影响。

清代圆明园的重要性仅次于紫禁城，“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如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不仅在园中长期居住，而且在园中还设有朝署值衙，举行朝政、宴会等重大活动。这样，圆明园的重要性便超出了一般的离宫，而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活动中心。”^[1]当时的圆明园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乾隆朝在宫中任宫廷画师的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在1743年致友人的信中如是说：“那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一切都为了他。这个优美的别宫里只有皇上、他的后妃和太监。他很少让亲王们、大臣们到他的官中或园中来，他们只能在会客厅候见皇上。这里的欧洲人中只有画家和钟表匠能够到处走走，因为需要他们。”^[2]正因为如此，圆明园门禁森严，“大宫门内、奏事门外，各处门禁都照紫禁城乾清门外一样办理。出入禁门，官员有门籍，匠役（园户）有腰牌，跟随有定数，既不准滥行出入，亦不得掺杂混淆。”^[3]其时，对入园人员管理极严，“嘉庆十三年某一天，嘉庆皇帝到长春园一处新工地查看工程，正好遇见刑部一名司员带着家人进入园内。嘉庆帝非常恼火，除降旨严惩此人外，还对官员带人进园作了严格规定：嗣后王大臣需进园查看工程者，必须提前一天奏闻皇帝。进园随带人数，亲王准随二人，或太监或家人均可；各部院大臣只准带家人一名；郎中以下官员，均不准随带家人进园，‘无论查工或寻常之日进内，皆照此例’。”^[4]如此森严的门禁，王公大臣入内都很不容易，寻常百姓更无缘进园一睹长春园西洋建筑面貌。所以长春园西洋建筑是不会对宫外的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影响的。1900年以后，北京的西式建筑建造渐多，对北京的民间建筑产生影响，因而出现一些中西建筑形式混杂的建筑。北京百姓所云“圆明园式”，不过是百姓对北京这种中西混杂的建筑形式借圆明园之名所起的名称，不足为据，并不能因此判定是受圆明园内长春园西洋建筑的影响。

[1]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441页，原书注：当然，实际比他们更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 1506—1522），但是他只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进入了中国国境，很快就在上川岛去世，没有在中国文明史上有太大的影响。

[2] 童寯，《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载童寯，《最后的论述》，第64页。

[3] 黄鸿钊，《澳门简史》，第9页。

[4]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18页。

[5]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19—20页。

[6] 黄鸿钊，《澳门简史》，第9页。

[7] 黄鸿钊，《澳门简史》，第13—14页。

[8]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14—15页。

[9]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转引自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13页。

[10]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转引自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239页。

[11] 黄鸿钊，《澳门简史》，第79页。

[12] 屈大钧，《广东新语》（上），第33页，转引自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5页，谢少明文。

[13]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转引自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5页，谢少明文。

[14] 参见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4—26页。

[15]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上篇·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第22—23页。

[16]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上篇·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第23—24页。

[17] 童寯,《巴洛克与洛可可》,载童寯,《最后的论述》,第13页,注1。

[18]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上篇·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第24页。

[19] 参见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上篇·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第24—28页。

[20]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上篇·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第28—29页。

[21] 参见黄鸿钊,《澳门简史》,第92—96页。

[2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第二十九页《纱缎》条:“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47页注10。

[23] 《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1685年后粤海关与外人贸易“岁以二十余枪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命曰:‘十三行’。皆为重楼崇台。舶长曰大班,次日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即明于驿(按即怀远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番人之遗制也。”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63页注32。

[24]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41页。

[25]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43页。

[26]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42页。

[27]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49—350页。

[28]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53—354页。

[29]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51页。

[30]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51页。

[31]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55页。

[32]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55—56页,注21。

[33]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44—245页。

[34]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45页。

[35]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40—241页。

[36] 沈復,《浮牛六记》,第51页。

[37]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50—351页。

[38]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49页。

[39] 长春园西洋建筑二十幅铜版画的作者,许多论著都误称出自郎世宁之手,其主画师实为满族画师伊兰泰,关于铜版画的作者及其绘制、刻版、压印、收藏、丢失直至1983年法国学者赠送复制纸图的全过程,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一书有详尽论述,见该书第158—160页,兹原文照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如意馆奉旨绘制20页西洋楼铜版图,从起稿小样,到全部誊绘并雕成铜版,整整用了5年时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终于印刷成图,就在成图这年10月,一位居住北京的西欧传教士在致巴黎友人函中,即将此事披露于世,这在西方建筑界引起不小震动,但是,多年来却盛传该铜版图出自郎世宁之手,其实这是误会。因为郎世宁早在1766年就已辞世,实际上,这套西洋楼铜版图,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主要画师就是满族人伊兰泰。

在乾隆画院如意馆供职的西洋画师,都是当时京师四堂(即天主教会建的东、西、南、北四座教堂)的欧洲传教士。其中最有名望的就是郎世宁(意大利人)和王致诚(法国人),另外还有个艾启蒙(波希米亚人)画技也较好,但他们都没有赶上绘制西洋楼图。在伊兰泰绘制西洋楼铜版图期间,还有一批宫廷画匠参与了誊稿、过粉、落墨等绘事(每幅图为155个工),其中也包括西洋人贺清泰(法国)和潘廷璋(意大利),但他们皆属辅助伊兰泰而已。

关于伊兰泰其人,由于史料较少,名字又似乎有点洋味(其实康熙朝就有位大臣叫阿兰泰),所以近

年有文章误作西洋人。实际上他是土生土长的满族人。伊兰泰大约在乾隆十年前进入画院,师从郎世宁,学过西洋线法画(即焦点透视画法),但长期未见有何力作。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弘历传旨如意馆为长春园等处创作79幅白绢斗方(绘在白绢上的正方形画作)、横披和条画,当时奉旨按数目、尺寸作画者有郎世宁、毛致诚、艾启蒙、丁观鹏、周鲲、张维邦、姚文翰等16人,伊兰泰名列第十三位。经他长期刻苦提高画技,终于成为乾隆画院西式画法的领衔画师。远瀛观建成后,其明间、次间、后苑殿、两廊各棚顶装饰有10余幅西洋人物故事通景画,均系伊兰泰起稿,尔后由西洋人潘廷璋、贺清泰等共同过绢成画。

西洋楼的20块铜版图,是伊兰泰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从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起稿小样的。后经一年时间才画出6幅图稿,并刻铜版小样一块,印成样图一并呈览,奉旨照样接续成造。又经过两年半,造办处工匠正式刻得铜版4块。铜版印刷术源于欧洲,乾隆中叶的《平定西域得胜图》,是在国内绘成画稿后送往法国刻制印刷成铜版图的。此次则由我国自己刻版(每块用工480个)印刷。此后又接着一块一块地抓紧绘,细雕琢,直至五十一年二月终将20块铜版全部刻竣,每块铜版用红铜26公斤多,图幅约为93×57厘米。接着压印成白露纸图100套,时称《谐奇趣图》。这年四月初,乾隆皇帝从圆明园回到故宫斋居时,有关官员就将全部20块铜版及100套纸图,安设在斋宫早览,颇得弘历赏识。随后又续印了100套纸图。弘历降旨将《谐奇趣图》的20块铜版收藏在水法殿(谐奇趣)里,所印纸图陈设在水法殿40套(配匣盛装)、热河20套、盘山5套,凤明园、长春园凡安设《重刻淳化阁帖》的11处殿宇,也各贮1套《谐奇趣图》。其他各处凡陈设《伊犁得胜图》、《金川得胜图》者,也都安设1套《谐奇趣图》。此外《谐奇趣图》除赏给皇子、皇孙外,还加恩赏给军机大臣阿桂、和坤、福康安、福长安、王杰、董浩各1套。

不幸的是,圆明园罹劫时,收贮在园内的50多套西洋楼铜版图都未能幸免于难,尤其是那套凝聚着众多画师、工匠5年心血雕刻而成的20块铜版,至今下落不明,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损失。

1983年,法国政府对外关系部派遣3位学者来北京,与中国圆明园学会进行为期一周的圆明园学术交流活动。来访者赠给中方一套20幅《中国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纸图,表达了当代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法方所赠西洋楼图,非常精致美观,图幅为100厘米×60厘米。据说此图是法国复制的但依笔者之见,压印该图的铜版,可能就是当年收藏于谐奇趣大殿的那套原版。”

[40]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158页。

[41] 欧阳采薇译,《西书所记圆明园中之西洋楼·(二)·中国一位教士陈述教士蒋友仁逝世之函》[原文见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me IV, pp.225—233, (Paul Daffis Libraire éditeur, Paris, 1877)*], 载张恩荫,杨来运,《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第121页。

[42] 欧阳采薇译,《西书所记圆明园中之西洋楼·(一)·中国一位教士陈述教士蒋友仁逝世之函》[原文见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me IV, pp.225—233, (Paul Daffis Libraire éditeur, Paris, 1877)*], 载张恩荫,杨来运,《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第122页。

[43] 参见童寯,《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载童寯,《最后的论述》,第66页。

[44]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156页。

[45] 欧阳采薇译,《西书所记圆明园中之西洋楼·(二)·中国一位教士陈述教士蒋友仁逝世之函》[原文见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me IV, pp.225—233, (Paul Daffis Libraire éditeur, Paris, 1877)*], 载张恩荫,杨来运,《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第130页。

[46]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156页。

[47] 欧阳采薇译,《西书所记圆明园中之西洋楼·(四)·圆明园纪事》,(译自 *Osvold Siren; 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Part 1, pp.44—45*),载张恩荫,杨来运,《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第144页。

[48]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162—163页。

[49] 建筑工业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第151页。

[50] 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第148页。

[51] 《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家耶稣会上丁致诚教士给达索先生的信(1743年11月1日写于北京)》，载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99页。

[52]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38页。

[53]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40页。

中國近代中西建築文化交融史

第四章

主流趨勢——西方建築文化
在中國的克隆、傳播與變異

文化学上有一个概念谓之“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现象,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时,因其所依存的社会、人文、历史、地理等诸方面条件的差异,两种文化都不能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从而出现主客体文化相互接受对方的文化特质,使两种文化逐渐接近的趋势,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涵化。主体文化在与客体文化接触、继而涵化的过程中,融会客体文化特质,更新自身文化传统,使主体文化在维持其基本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这是文化涵化的进步意义。

完整的文化涵化过程应当包括文化的传播、融合与更新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虽互有联系,互相叠合,不能截然分开,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按这一顺序相继发生的。文化涵化的过程包括文化交融过程中被动的自然演变过程,也包括主客体文化自觉的、有目的的主动选择、融会与创新的过程,而这也是互有联系,互相叠合,不能截然分开的。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正是这样一部建筑文化涵化的历史。从早期西方建筑在商埠城市租界区中的大量克隆开始,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逐渐进入文化涵化的第一阶段:西方近代建筑文化在中国克隆与传播的阶段,西方近代建筑文化的影响从商埠城市的租界区波及华界区,从商埠城市波及传统城市,从沿海城市波及内地城市,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波及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影响所及,甚至波及边远的城镇乡村。这一建筑文化涵化的初始过程,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进展较为缓慢,影响范围有限;在其发展兴盛期(1900~1937)进展速度加快,影响范围也大大扩展,遍及中国的许多城市,甚至一些城镇乡村。1900年以后,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从初始期无意识地被动接受阶段逐渐转入第二阶段,即主体建筑文化有意识地主动融会客体建筑文化的阶段。而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建筑文化重构与再生的文化创新阶段,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1840~1949)刚刚起步,只是作了初步的尝试,这种状况也一直延续到今天。立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人文、历史、地理条件,继承中华建筑文化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融会中西建筑文化特质,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中华建筑文化的历程是漫长的,任重而道远,需要许多代人不懈的努力。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研究工作,正是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而进行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一。

本章论述中国近代建筑文化涵化过程第一阶段的历史进程,即西方近代建筑文化在中国克隆、传播与变异的进程,这一论述首先涉及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

第一节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 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

一、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

日本学者藤森照信在《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之说,称“在中国近代建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决不像后来所表现的那样多姿多彩,而只有一种样式,这就是本文要论及的‘外廊样式’。”^[1]这种“在中国近代建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有一种样式”的“原点”论,是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缺乏全面深入研

究的片面结论,这一论述不符合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忽视了同时或先后得到发展,并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建筑类型,以偏概全,立论失之偏颇。中国近代建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一种样式”,早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也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仅仅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建筑类型的“原点”。早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是一种建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紧密相关,多种建筑类型交错产生、同步进展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进程,不宜简单化地仅仅将其中的一种建筑类型——殖民式建筑[Colonial Style,即日本学者所称“外廊样式”(Veranda Style)]判定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研究这一段历史,应当立足于纵向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建筑发展历程有全面的认识与理解,横向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作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与研究,才能对中国近代建筑史自身发展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及其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关联性有深层次的、较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本书试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置于中国社会发展与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横向比较早期先后进入中国的三种重要的建筑类型的发展进程。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建筑从鸦片战争以前随传教士与商人的进入在有严格限制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进而在中国的商埠城市中大量克隆、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通过以下三条渠道:教会传教渠道——随基督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教会建筑;早期通商渠道——随早期中西通商事业的发展首先在澳门,然后在广东十三行地区,然后主要在各商埠城市中大量建造的殖民式建筑;民间传播渠道——1853年在上海英人居留地首先产生其雏形,1870年前后在上海租界区产生,其后在上海、汉口、天津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大量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民间传播渠道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广东、福建的侨乡建筑就是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作者研究范畴所限,本书仅以石库门里弄民居为例论述之。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教会传教渠道——教会建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唐代,元代较为兴盛,明清两代虽时弛时禁,在清嘉庆禁教之前仍略有进展,鸦片战争以后从1845年天主教弛禁至1949年中国近代建筑史结束,教会建筑始终与中国近代建筑同步发展,也始终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最大,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建筑类型之一,也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早期通商渠道——殖民式建筑只存在于1900年以前,即西方列强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商品输出阶段的前近代时期及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在这一时期已由兴盛而趋式微,乃至消失。这是其单一的建筑模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中国近代建筑复杂的功能要求,及其产生于热带地区,特别注重通风避热的建筑模式不适应中国各地不同的气候条件的必然结果。殖民式建筑存在时间较短,在190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1900~1937)已经消失,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建筑模式,对中国近代建筑史只有阶段性的影响,时限为1900年以前。民间传播渠道——石库门里弄民居是西方联排式住宅与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汉口大量建造,在天津亦有建造,1927年以前成为上海与汉口主要的住宅建筑类型。它所代表的主要出自民间工匠之手的特殊的中西交融建筑文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尤其是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有其特定的价值。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二条渠道,以教会建筑持续的时间最长,其发展进程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最大,石库门里弄民居与殖民式建筑次之。石库门里弄民居将在本书第五章专章论述,本

节试对教会建筑(以教堂建筑为例,同样重要的教会大学建筑将在本书第六章论述)与殖民式建筑作一比较研究,分别论述其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与发展脉络,研究其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嬗变及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影响,确定其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也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基督教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以教堂建筑为例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据明代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记载是在635年(唐贞观九年)。^[1]当时基督教东派教会的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向东方发展,经波斯辗转传入中国,称为“景教”。635年(唐贞观九年)大秦国(波斯)大德(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贞观年间,政局已经稳定,唐太宗执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对各民族文化及海外文化兼收并蓄,这为景教提供了传播的机遇,景教得以

在京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太宗还“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表示对景教的认可与支持。^[2]景教碑记述了景教从635年(唐贞观九年)至781年(唐建中二年)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太宗之后,自高宗至文宗(650~841)近二百年间,除武则天执政时期尊崇佛教,使景教的发展受挫外,景教一直是得到朝廷支持的,武则天之后,玄宗时期又恢复了对景教的支持,使景教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教。^[3]直至845年(唐会昌五年),唐武宗下诏灭佛,景教也受株连而绝迹于中原。

景教虽于635年(唐贞观九年)才传入长安,但在此之前必然已有传教基础,才可由主教亲至长安,得太宗礼遇。所以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一书中指出:“如此异数,殆必有人为之先容;故其教传入我国必在贞观九年(635)前;阿罗本本人或其他教士,在未入长安前,亦必早在甘肃、新疆一带有所活动。”^[4]1996年,作者至洛阳龙门石窟考察,见到宾阳中洞券面残存的爱奥尼克柱式与仿中国传统木结构的石雕屋顶并置,这是作者所知最早的中西建筑文化共存的例证。宾阳中洞完工于515年至517年前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至三年),^[5]比景教传入长安的635年(唐贞观九年)还早约120年,其时,西方古典建筑的经典柱式已在我国的佛教石窟建筑艺术中留下西方建筑文化的印迹。(图4-1-1,4-1-2)

图4-1-1 与仿中国传统木结构的石雕屋顶并置的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券面残存的爱奥尼克柱式,这是作者所知最早的中西建筑文化共存的例证。照片由作者摄于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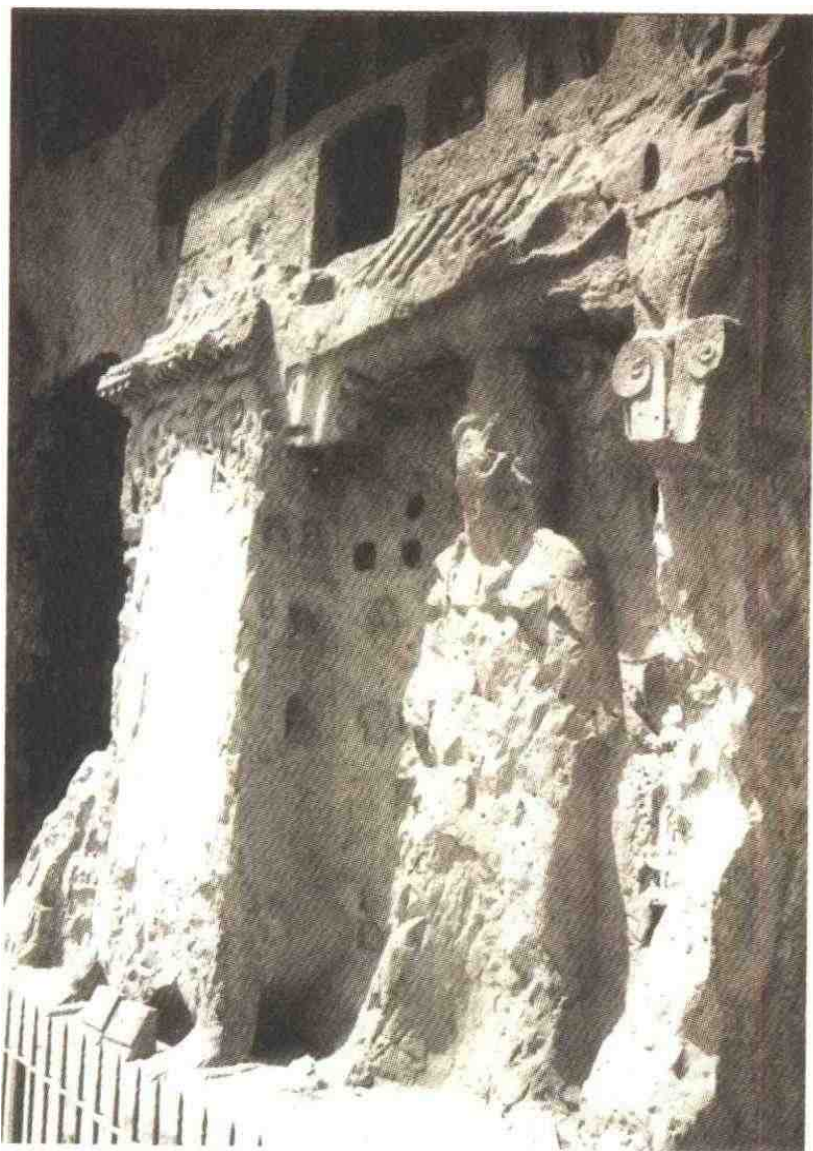


图4-1-2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券面残存的爱奥尼克柱式。照片由作者摄于1996年。



景教碑称“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洞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说，是用文人笔法形容景寺遍布全国，按史籍所载，“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四十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明显外国之教，劝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唐会要》卷四十九）与二十六万僧尼相比，大秦、穆护、袄三教总计还俗二千或三千人，可知与佛教相比，当时这些外来宗教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唐代的景教教堂，按中国习俗仍称寺，景教碑中称道肃宗朝的景教教堂“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引《诗经·小雅·斯干》赞美宫室之句“如翬斯飞”，景教教堂可能仍是中式传统建筑模式。

唐末至北宋，景教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但在北方边疆地区仍绵延不断。“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的统治横跨欧亚两洲，由于东西交通的贯通，使流行在西亚的景教又恢复了在我国境内的活动，并且引进了罗马天主教。元朝蒙古统治者把这些基督教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蒙古语，有‘福缘之人’的意思。在蒙古统治的九十八年中，元帝国和罗马教廷一直有信使往来，元朝还设有专管基督徒的宗教行政机构——‘崇福司’，‘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甘州、宁夏、镇江、扬州、泉州等地都设有教堂，但信奉该教的多半是蒙古人或迁居中国的西亚人，随着元朝的灭亡，它也就消亡了。”^[11]元代因也里可温教以十字架为标志，所以称其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其时也里可温教较为兴盛，各地都建有“十字寺”，朝廷特设崇福司管理之。《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之元代基督教堂，甘州“基督教徒在此城中有北丽教堂三所。”^[12]镇江府城“其地且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两所，建于基督诞生后之1278年。”^[13]杭州“城中仅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一所。”^[14]当时宗教教派之争也很激烈，《至顺镇江志》卷十记载：“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頫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15]因教派之争，可将十字寺改为佛寺，亦可证当时的基督教堂十字寺仍取中国传统建筑模式，只是内部的宗教陈设不同。

元代天主教亦已传入中国，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东方传教，1294年到大都，获准在大都传教。“孟德高维诺在大都传教孤军奋战了十年，克服了景教徒的干扰，先后建立了三座教堂。”^[16]

明代基督教在中国销声匿迹二百多年，直至16世纪末，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进入中国，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才开始了新的一页。利玛窦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记述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重要文献，该书中所称基督教指天主教。本书论述则按中国多数学者的习惯，将基督教作为天主教、新教及东正教的总称，具体论述时分别称为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引文则仍按原文照录。^[17]

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前，有耶稣会上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企图进入中国未果，1552年12月3日死于荒凉的上川岛。会讲汉语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是第一位获准在中国内地居留的传教士，他于1582年第一次进入肇庆，当年返回澳门。“利玛窦于1582年8月抵达澳门，这个小小的半岛位于中国东海岸。他一到达就立即学习汉语。次年，罗明坚和利玛窦获准在肇庆居住，肇庆当时是广东省的首府。罗明坚走后，利玛窦于1589年从肇庆迁居韶州，并在那里成了儒生瞿太素的好友。瞿太素发

现利玛窦身着僧服,便建议他最好还是穿儒服。利玛窦于1593年离开广东后,马上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利玛窦打算前往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当他抵达南都南京时,就被迫离去,因为中日之间在朝鲜引起的争端使所有的外国人都成了可疑分子。他只好暂避到现今江西省的南昌。1595年,他重返南京,最后于1601年元月抵达北京。利玛窦进京时,由他的西班牙籍青年会友庞迪我(1571~1618)陪同。利玛窦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离开北京,1610年,卒于北京。^[14]耶稣会在中国先后有五处驻地: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与北京,这五处驻地的教堂建筑分为两类:购买旧屋或新建教堂,而新建教堂亦有西式建筑与中式建筑两种。利玛窦在中国读儒家文献、着儒服,注重与上层人物交往,对布教事业的发展则小心翼翼,“利玛窦到中国不久,就采用儒冠儒服,一面介绍西学,一面学习中国语文,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宗教和习俗,极力糅合(或者说附会)中国的儒家学说,进行他的‘合儒’、‘补儒’,最后是‘超儒’的工作。”^[15]在这种传教思想的指导下,对于教堂的建筑形式自然不会斤斤计较。

在肇庆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是西式二层建筑,“传教士们获得了靠西江西郊的一块土地,紧靠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花塔”的塔下,它的字面的意义就是像花一样的塔。他们所修造的房屋每侧由两间组成,中间是一个敞开的大厅,作为礼拜堂用,正中祭坛的上面挂一幅画,是怀抱婴儿耶稣的圣母像。本城的知府为他们送来了两块匾,一块挂在礼拜堂的进口处,另一块则在内部。第一块匾上刻有“仙花寺”,另一块上有“西来净土”。^[16]“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17]如果说,传教士们在肇庆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因初次建堂而取西方建筑模式,那么,在被迫离开肇庆赴韶州时,为缓和与中方的冲突,传教士们在韶州建造的教堂就已经是中式建筑:“为避免敌意的指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犹如他们在寺院里所做的那样,所以这所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18]在南京,则直接购买了一所据房主所称闹鬼的官邸,在厅里设立一座神坛充作教堂。^[19]在南昌也是购买房屋设立祭坛当做教堂,“有一所好房子出售,很适合他们当时使用,地点也不错。这离知府衙门不远,价钱也不算太高,用60个金币就可以买下,……于是他们就把买卖做成,搬进了新居。”^[20]后来在南昌卖掉小房买了大房。^[21]利玛窦去世之前,正在北京建造一座教堂,去世的前一天,“在当天晚间和次日,他常常谈到教徒,谈到他正在修建的教堂。”^[22]利玛窦去世后,按中国官员中的一位教徒的建议,神父们申请赐利玛窦一块墓地并得到皇帝的批准,所赐墓地是已判死刑的宦官杨内官的郊区私宅,此前杨内官已将私宅改为寺庙,名仁恩寺。神父们在这里按照教会的规定建造基地和教堂,“整个传教团的监督龙华民神父在移灵后不久来到这里,葬礼推延就是要等他到来。在他的指导之下设计出中国第一座基督教的墓地。在花园的一端用砖修建了一座六角形带拱顶的小教堂。小教堂的每一边伸延着半圆形的墙圈出一块地方作为教会成员的墓地。”^[23]这样,利玛窦的墓地成为原有的中式宅院与新建的西式墓地及教堂中西混杂并置的建筑群。

利玛窦去世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发生“南京教案”,明神宗下诏令外国传教士归其本国。直至天启年间,传教士奉旨进京协助制造火炮,崇祯二年又召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各等译书修历,耶稣会士才重获传教的机会。

1644年,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将北京内城划为旗人居住区,令在内城居住的汉人三日内迁到外城居住。但汤若望上书摄政王多尔袞请求位于内城宣武门的教堂不迁外城却获准许,汤若望等传教士一开始就与清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利玛窦所确立的传教方略,后世称为耶稣会的知识传教政策,除以结纳文士、朝臣和官室,自上而下地传教以外,尤

其注重以数学、天文学、舆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和军事技术等科学的理念和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24]后来汤若望等传教士仍遵循这一传教方略,清初召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此后来华的传教士亦多以天文历算为晋身之阶。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声望与影响,使天主教的传教事业进展顺利,“据统计:1650年(顺治七年),全国耶稣会所属教友即达十五万人,约为1636年(崇祯九年)的4倍。”^[25]康熙初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发生1664年(清康熙三年)杨光先发动的以修历之争为导火线的排教风潮,史称“历狱”,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入狱,汤若望获释后于次年去世。1669年(清康熙八年),康熙亲政,为汤若望平反,南怀仁再入钦天监,任钦天监监副。康熙朝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解除对天主教的禁令,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患疟疾,太医久治不愈;教士张诚献奎宁,一服而愈,康熙赐地建天主堂一所,名为“救世主堂”,即今日北京北堂的前身。至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全国总计已有住院修士120人,教堂229座,教士103人。^[26]17世纪30年代,教会内部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史称“中国礼仪之争”,礼仪之争涉及西方传教士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及相应的传教方针。^[27]争论双方的分歧可以说是文化适应与文化征服,和平传教与军事征服传教方针的分歧,这场传教士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39年,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中国近代教会建筑产生重大影响。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禁止入教者祀孔祭祖,并派使臣来华。这使康熙改变了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宽容态度,于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下诏令在华传教士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领取内务部的“印票”(传教许可证),否则驱逐出境。但在京的一些传教士仍然得到康熙的重用与信任。1723年雍正继位后下诏严厉禁教,各省官员纷纷实施禁教措施,数年之中,除北京外全国的天主堂尽被废毁。乾隆朝采取闭关政策,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开始只限广州一口通商。1805年(清嘉庆十年),颁布取缔天主教章程,规定北京“四堂附近之诸堂着即行拍卖。”“官吏信奉天主教者免职,旗人加刑,余人则判徒刑。”^[28]这种严厉的禁教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

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十八世纪末叶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都漠不关心。但是英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之来华。(不算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由于新教活动被限制在广州和葡属澳门两地,又没有从前在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后来几十年福音的传布受到了严格限制。到1840年,传教士增加到二十人以上,代表六个不同的差会。不过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一百人(马礼逊直到1814年才给他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其中大多数或者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教会的雇员。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29]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禁教政策结束。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使清政府承担了保护法人教堂的义务,自此外人在华的传教事业都受到保护。其后法使拉萼尼要求两广总督耆英上奏道光帝弛禁天主教,于1845年获准后,又要求清政府发还被查封的天主教教产,1846年2月20日,道光发布上谕同意这一要求:“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30]因这道上谕只指天主教,并未包括新教,所以新教的文惠廉与麦都思两位传教士请美领事福布斯与中国官府交涉,耆英于

1845年12月22日答复：“本大臣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知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至规矩之或异或同，断无分拒之理。”^[131]于是，新教也获得与天主教同样的权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1860年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更规定清政府“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札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32]1846年道光上谕的内容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用条约形式予以规定，而其中“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只见于中文本，法文本并无此句，据学者研究，是议约时担任翻译的传教士私自增添。^[133]“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础。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旧两派传教士像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134]

此后至1900年以前，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他们的传教事业依托的财政来源已从教廷与本土教徒供给转为大部分直接从中国索取，教会建筑就在这种取自中国的财政支持下大量建造起来。“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到1870年，大约有了二百五十名欧洲神甫。十五年后，又上升到四百八十八名（包括三十五名主教），而到1900年达到了八百八十六名。这样巨大的事业（具体地表现在到1900年时在中国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几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关），都是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的。在新时代开始时，这种资助大部分来自教廷传信部和其他欧洲来源。但是在1860年至1900年期间，中国教会开始越来越少依靠欧洲的资助，不过，有些修会依靠的程度大一些。新的条约允许教会拥有土地，到十九世纪末叶，在清帝国某些地区教会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多很多，最突出的是四川省和天津、上海及南京等通商口岸。”^[135]

“和天主教徒不一样，新教徒在1860年以后要深入中国内地，必须从零开始。最初，进展是缓慢的。但是自经戴德生的组织带了头，到1877年新教徒能够在内地三个省立下脚跟，到1890年他们已经遍布于中国各省，可能湖南省是个例外。十年以后，新教布道站（有外国传教士的直接经管）的数目约五百个，而分站（由中国人照管）的总数达数千之多。”^[136]

基督教进入中国，必然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在利玛窦时代，由于传教士采用与中国传统文化“调适”的传教方针，矛盾相对缓和，后来发生传教士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教廷企图将西方基督教文化强加于中国，就引起反感而促使中国政府断然采取禁教措施。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随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卷土重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又增添了一层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其冲突的激烈程度就远远超出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全都有这种信念。他们的区别不在最终目标，而在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不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137]“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徒——是受物质利益的驱使的，传教士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人陷入了世俗尘网之中而不能自拔。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迷信，中国人则对传教士最钟爱的信仰采取疑而不信的态度。每一方对另一方都感到莫测高深。每一方认为另一方属于低级文明。实际上很难设想不发生更激烈的思

想交锋。”^[38]基督教不能容忍中国文化,公然向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挑战,这是思想观念层面的激烈冲突。物质层面的冲突则更直接地增加了中国百姓对基督教的反感。传教士借归还教产之机霸占勒索,又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土地,除用于建造教会建筑外,还用于租赁牟利,英人必克说:“教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蓄息,川至云兴。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39]传教士中洁身自好,怀着虔诚的宗教热忱,为中国人民作过贡献者有之,借侵略者淫威,作威作福,牟利发财者亦有之;学识渊博,富有教养者有之,不学无术,招摇撞骗者亦有之。传教士良莠不一,教民也是良莠不一,有真心信教的善信男女,有为养家糊口“依教”的善良百姓,有以“吃教”为生的地痞流氓,更有依仗教会势力作恶乡里的“投教”的恶霸恶棍。文化冲突及物质利益的冲突,与侵略和反侵略的国家大局冲突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无数桩“教案”。从1861年贵州巡抚与提督发起“灭教”运动,贵州教会学堂被焚毁始,直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反洋教运动持续不断,遍及全国。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山东,教堂几乎全被焚毁,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各省都有打毁教堂的事件。”^[40]这一时期,教会建筑就始终在建造与焚毁的交替中发展。教案之中,影响最大的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在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被焚毁、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再次被焚毁,成为与教案相关而有“一毁三建”历史的教堂建筑。回顾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史与教会建筑发展史,在严酷的历史面前,谁能否认建筑与社会、建筑与战争、建筑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呢?

早期来华的外人中,传教士的文化素养比商人要高得多,“根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1855年7月的统计,在此前来华的110名美国传教士中,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23人,约占总数的20%多。”^[41]所以早期教会建筑有许多由传教士中的熟悉建筑者主持设计及建造,开埠初期来到上海的范廷佐(Ferrand Jean)是其中一例。“范廷佐是西班牙人,其父是埃斯库里亚尔王宫的宫廷艺术家、杰出的雕刻家。他于1847年来华,先后设计了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和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sis Xavier)教堂。”^[42]

上海开埠初期建造的教堂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最早建造的一批教堂建筑。圣·依纳爵(St. Ignace)教堂于1851年3月23日举行奠基典礼,同年7月31日竣工,工期仅四个月,规模不会太大。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于1847年11月21日奠基,1853年竣工,又称董家渡天主堂,至今仍保存完好,教堂以第一个来到远东,但始终未能进入中国而死于上川岛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的名字命名。此时传教士已经是征服者的姿态随侵略者的炮舰进入中国,因此不再执行利玛窦时代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针,而是直言要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反映在教堂建筑上,是西式教堂在中国的克隆。董家渡天主堂就是仿照罗马耶稣会大学圣·依纳爵大教堂设计的,只是资金不足,设计意图并未完全实现。“此堂是罗马风式的砖石结构,平面呈长十字形,是中廊高侧廊低的三廊型巴雪利卡式(basilica),天花顶是由半



图 4-1-3 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姜承浩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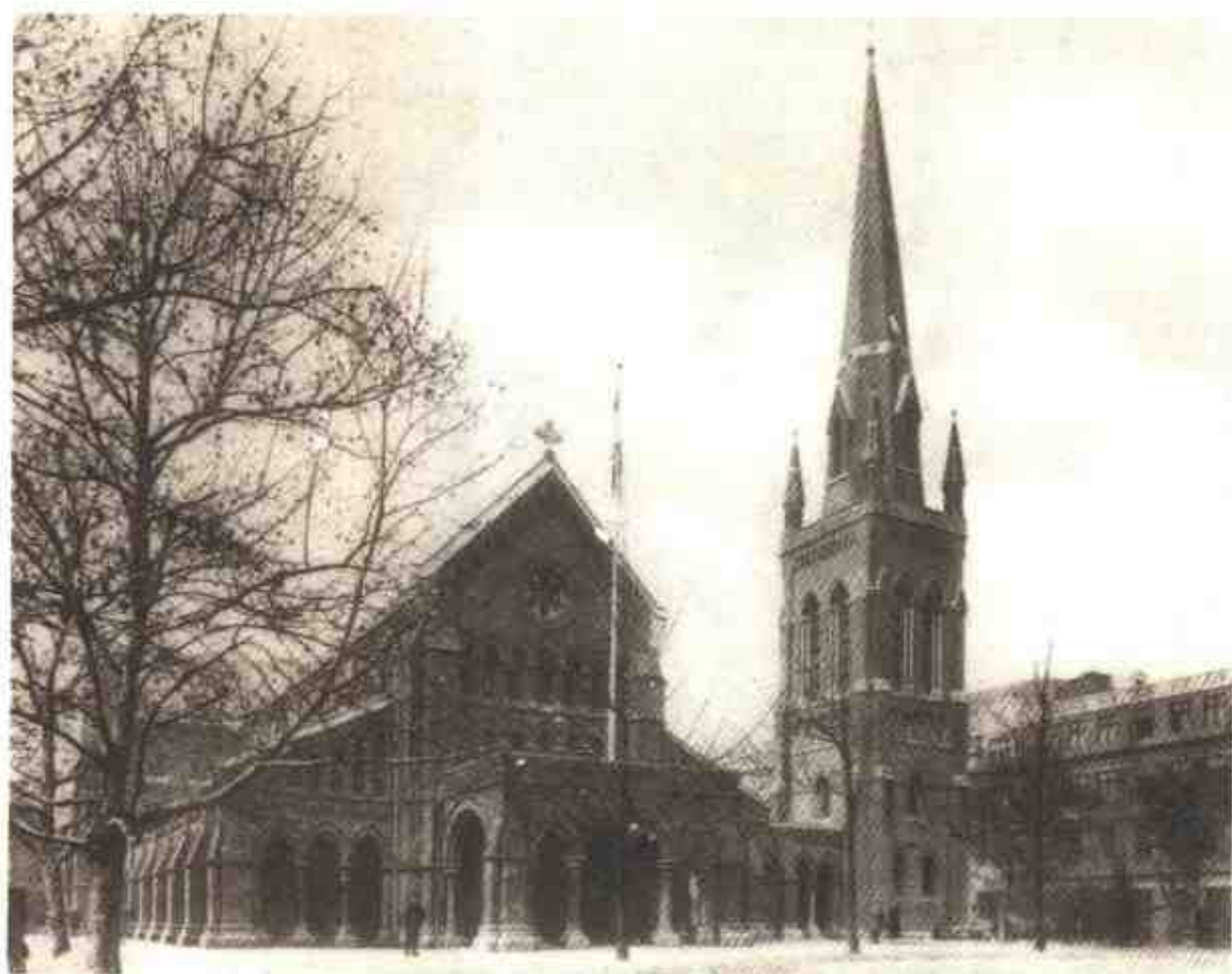


图 4-1-4 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内景。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4-1-5 上海洋泾浜天主堂(即圣约瑟教堂)。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4-1-6 上海圣三一教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 娄承浩稿)。



圆形拱券和交叉拱券组成。半圆形拱券是建筑构图的基本要素,门、窗洞口,建筑饰券、墙面,连廊等均以半圆券来表现。但这一系列的拱券并非是石造,而是木骨之外用灰泥粉饰成的,因此门、窗开口相当大,堂内一点也不昏暗。屋顶也是较轻的木结构,没有过大的侧压力,因此在外墙上也无需设置扶壁(buttress)。其中砖砌内柱特别大,方形断面,每边宽二米余,等于一个小房间,如此巨大的砖柱是很少见的,外墙也很厚。北端设半圆形的祭室,南端为二层,设阶梯形唱诗台。立面是左右对称式,正中三角形的山花墙上设大自鸣钟,两侧有钟楼。”^[43](图 4-1-3,4-1-4)

上海洋泾浜天主堂,即圣约瑟教堂,由天主教神父罗礼思设计,1860年奠基,1861年建成,拉丁十字形平面,单钟塔式立面构图,虽然采用了哥特式尖塔、玫瑰窗及在正立面中部大门之上饰以哥特式尖形眉饰,门窗却不使用尖券而使用半圆拱券,由业余的传教士建筑师设计的教堂是不能苛求其建筑风格的纯正的。(图 4-1-5)此时的教堂再也不是鸦片战争之前的那种随时可以改为佛寺或其它用途的中式教堂,虽然建筑风格很不纯正,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些教堂在他们的眼中统统是“洋教堂”。这一时期上海重要的教堂建筑还有佘山圣母堂与第一代圣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佘山圣母堂建于1873年,后于1925年拆除,在其基址建造了佘山天主堂。圣三一教堂于1866年奠基,1869年建成,由英国建筑师司各特爵士设计,室内外均为清水红砖墙,俗称“红礼拜堂”。教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有一个主堂,两个耳堂,室外两侧设有连拱外廊。初建时仅建教堂的主体部分,1893年在教堂北侧增建一座正方形平面,顶部是尖锥顶的钟楼,钟楼被毁于1966年。圣三一教堂属哥特式建筑风格,局部受罗马风格建筑的影响。^[44](图 4-1-6,4-1-7)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建造的教堂与发展兴盛(1900~1937)建造的教堂相比,一般来讲规模较小,许多在1900年以前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毁,广州的石室天主教堂则是例外。石室天主教堂的正式名称是天主教圣心堂,因完全用花岗石砌筑而成,广州百姓称为石室。石室天主教堂的基址是清两广总督府旧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联军炮舰轰毁,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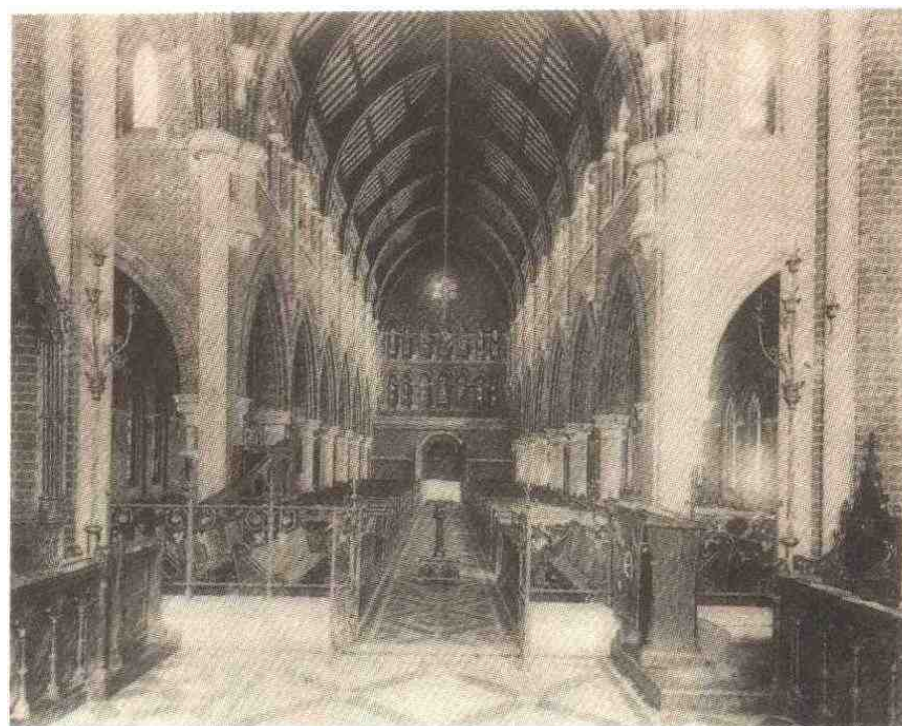


图 4-1-7 上海圣三一堂内景。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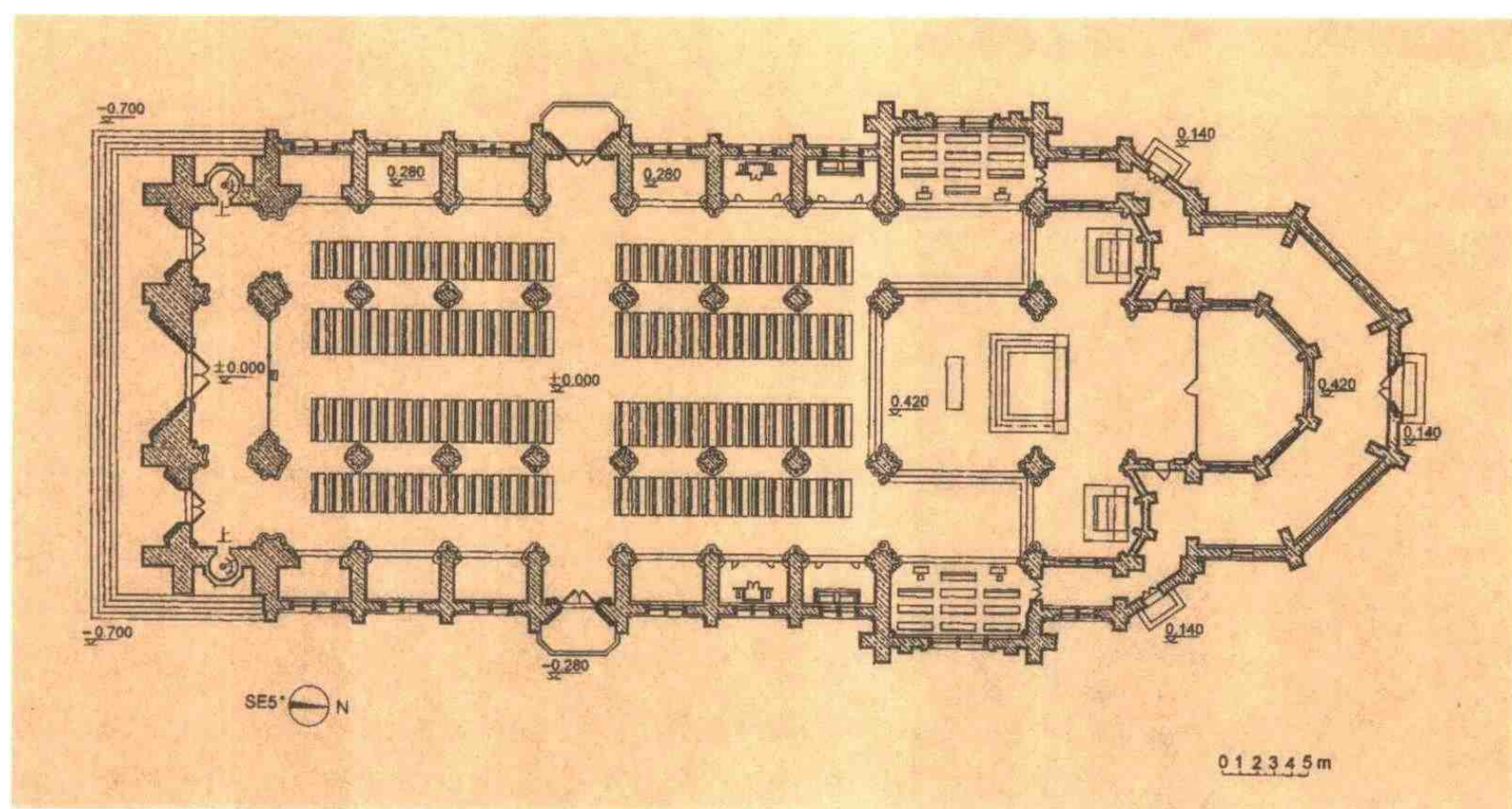


图 4-1-8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首层平面图。原图载《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一)》。

法人按条约规定,要求赔还禁教时期充公的大主教教产,借机租借两广总督府地皮建造教堂。工程于1863年6月28日奠基,1888年建成,历时25年,费资40万金法郎。石室天主教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长77.17米,宽32.85米,塔尖至现室外地坪高52.86米(不计避雷针高),是中国最大的石结构天主教堂建筑,闻名东南亚。石室的朝向一反西方天主教堂门口向西的习惯,改为向南偏东5°。”^[45](图4-1-8,4-1-9)

“教堂由法国工程师设计,曾做有木作模型;施工总管是揭西工匠蔡孝,石工多来自五华,石料全由九龙采凿,加工分件,船运来广州打磨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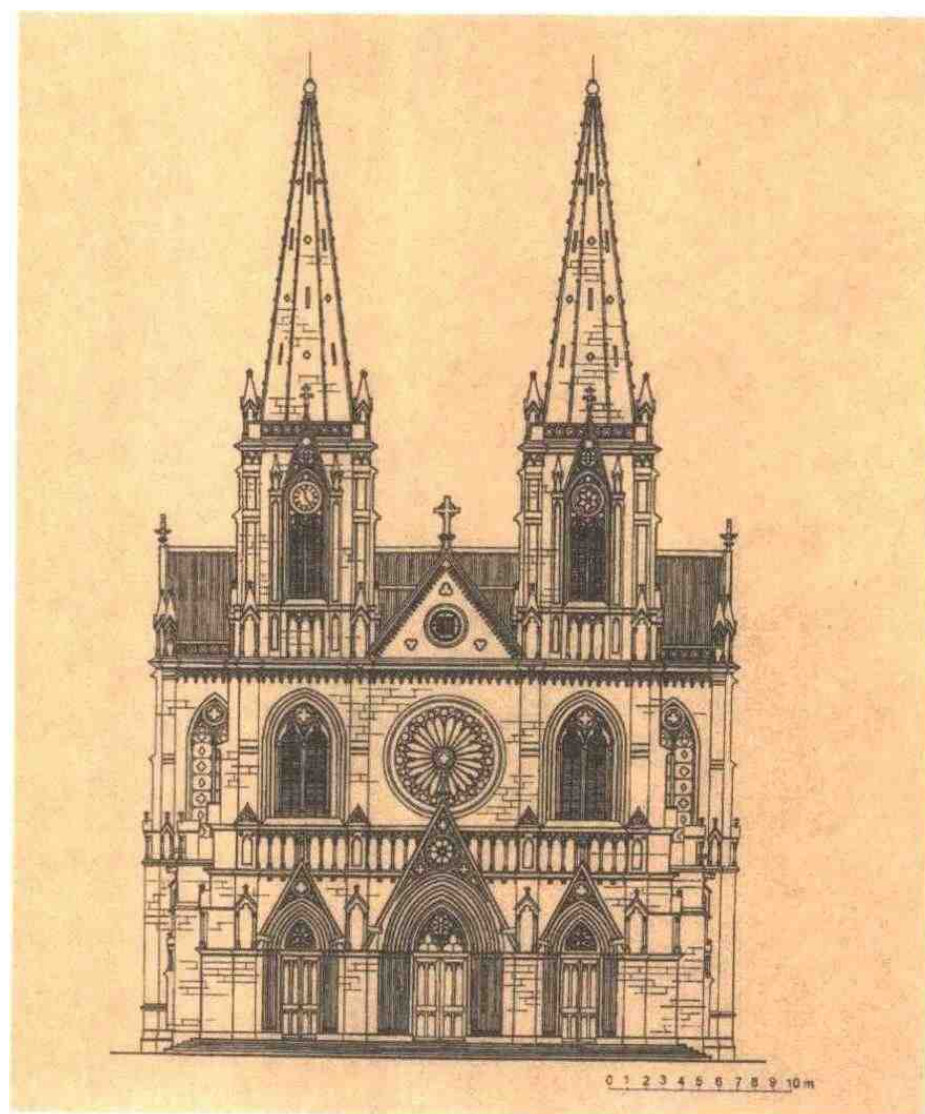


图 4-1-9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正立面图。原图载《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一)》。

图 4-1-10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4 年。



图 4-1-11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极富哥特式教堂特色的“透视门”。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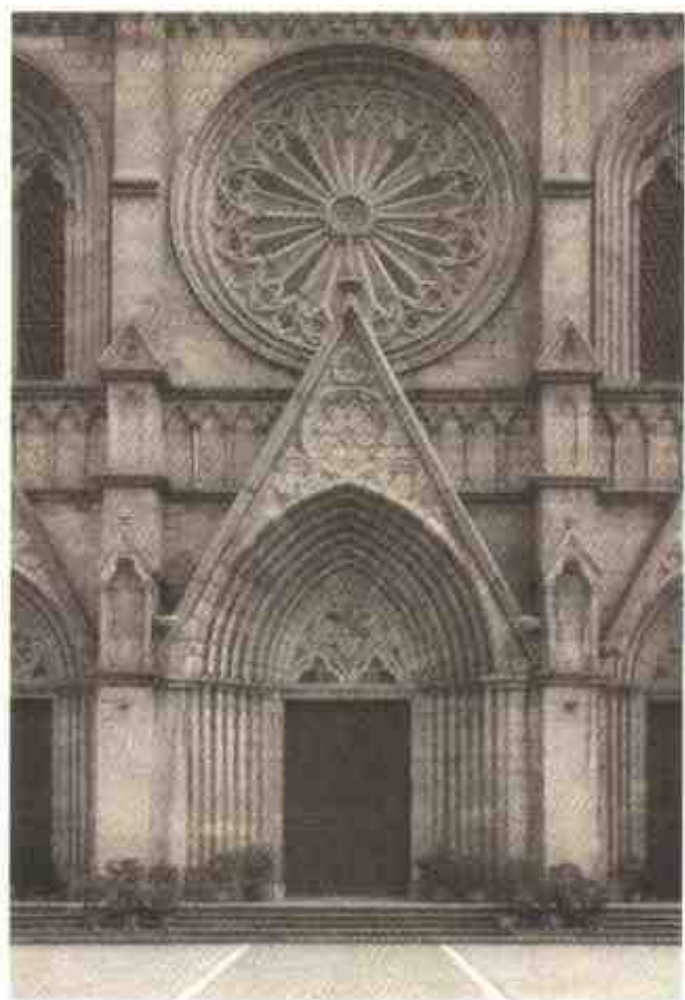


图 4-1-12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背面。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4 年。



配。”^[46]石室天主教堂是由法人设计的法国哥特式教堂,是中国近代教堂建筑中建筑形制最正宗、施工建造最精细的教堂建筑之一。教堂正立面分为三层,下部开三樘雕饰精美的大门,门框外层层退人的七对柱线与门上方七层尖拱肋构成极富哥特式教堂特色的“透视门”,中层正中有直径 6 米、石雕镂空的玫瑰窗,顶部是一对哥特式钟塔。石室天主教堂原由法人担任施工指挥,后改由广东揭西工匠蔡孝担任“总管工”。砌筑石料的灰浆采用中国传统的桐油糯米石灰浆,屋顶结构已由西式木桁架改为中国的抬梁式木构架(1935 年维修时改为钢筋混凝土屋顶结构),是中国工匠创造性的发挥。西方建筑进入中国后,经中国工匠之手建成,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一批近代建筑施工管理人才与工匠。(图 4-1-10,4-1-11,4-1-12)

天津开埠之初,于 1864 年在法租界建造了老合众教堂(The Union Church)。^[47]1869 年 12 月,在租界区外的三叉河口北岸建成望海楼天主教堂(即胜利圣母堂,Notre Dames des Victories),这也是前文所述传教士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中私自添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内容的结果。教堂建成的次年 6 月,天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史称“天津教案”,望海楼天主教堂被焚毁。此后,法国公使于 1873 年与 1881 年两次要求重建都未获允,而清政府在 1883 年至 1884 年间要求铲平教堂的废墟也无结果,相持之下,教堂的遗迹一直保存了 27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乘中国战败之机,教堂于 1897 年按原状修复,但仅仅过了三年,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教堂又再次被焚。(图 4-1-13,4-1-14) 1903 年第二次重修仍基本保持原貌,仅增加后部小角楼,面积与高度也略有增加。望海楼天主教堂是青砖砌筑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人口处设门廊,三通廊长方形平面大厅,中廊较宽,祭坛在大厅后部,与中廊等宽,并与其后层高很低的神父更衣室相连,平面形制有很大的随意性。立面处理有哥特式建筑特征,正立面竖向大致划分为三段,门廊部分耸起三座塔楼,中部高塔大门两侧的砖砌扶臂直达塔楼顶部,左右是一对八角形小塔楼,突出了竖向构图要素。门窗为尖券式,侧立面通顶的砖砌扶臂与尖券窗也使横向展开的立面形成竖向构图。(图 4-1-15)

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是与教案相关而有二毁一建历史的教堂建筑，它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有着特定的人文历史价值。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教堂，叙说的是作为首都门户的天津，因帝国主义屡次侵占而引发的民间强烈的反侵略情结，与因传教士强行推销西方基督教文化而引发的中西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有着典型意义的人文背景及其建筑表现。

早期武汉的教堂建筑分布在武昌、汉口旧城区及汉口英租界。“1862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明位笃(Eustachius Zanoli)时任湖北代牧区主教，他通过法国驻北京公使索回教会三十年来在武汉的房产赔款三万银元，购得武昌花园山大片土地，将主教署、教堂、大修院由湖北乡村应城县迁往武昌，委托他的继承人江德成主教(Epiphanus Caitassace, 建筑师)设计并修建规模宏大的鄂东代牧区主教公署。1889年，江德成又在公署右侧设计建造武昌主教座堂(又名花园山圣家堂)。此堂为三廊型巴西利卡式，侧廊为方形砖柱，堂内装饰华丽，天花板上饰以贴金雕花图案，刻工精细。内部设祭台七座，堂身长36米、宽18米、高20米，可容五百余人。堂正面装有日晷一具，用以观察日影，代替时钟，颇具特色。”^[49](图4-1-16)1866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购英租界地皮，于1874年建鄂东代牧区经理处(今主教府大楼，已多次改建)。1875年开始建造汉口主教座堂，1876年建成，耗资十二万法郎，名为“圣若瑟堂”。教堂紧靠经理处，砖木结构，拉丁十字形平面，三廊型巴西利卡式，内部柱廊为方形砖柱，由半圆拱顶和交叉拱顶组成屋顶天花。教堂长约40米，十字横头处宽26米，山墙面十字架至地坪高度为22米，正堂后侧左右各建圆形钟塔一座。总建筑面积1024平方米，可容千人。^[49](图4-1-17)新教最早在武汉建造的教堂是武昌戈甲营崇真堂，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创建于1864年，西式教堂却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马头山墙与人口处的中式披檐，早期教堂建筑中西混杂的状况可见一斑。(图4-1-18)这种现象也见于1880年在汉口旧城区花楼街建造的基督教总堂。(图4-1-19)



图4-1-13 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被焚毁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1871年拍摄。原图载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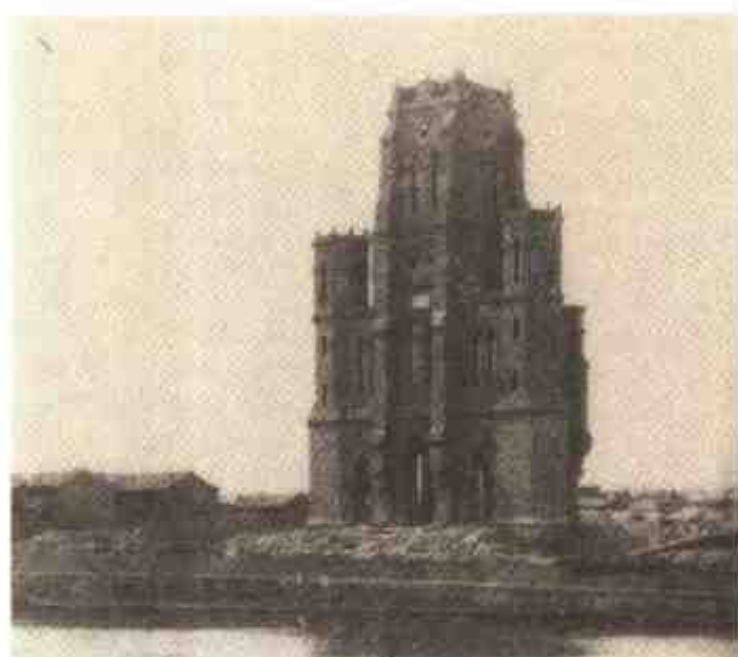


图4-1-14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再次被焚毁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原图载《近代天津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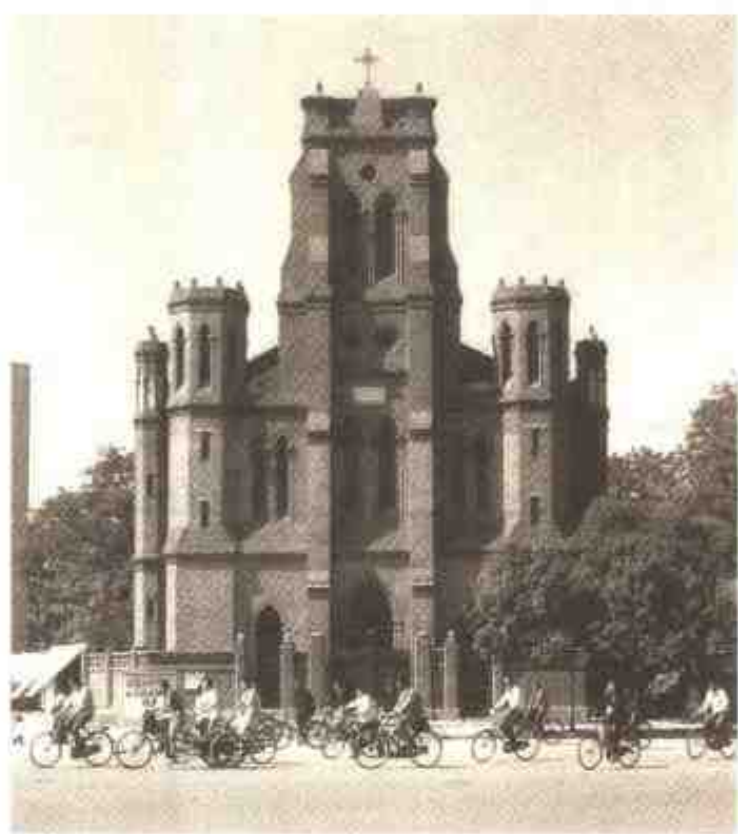


图4-1-15 基本保持原状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图4-1-16 武昌鄂东代牧区主教座堂(又名花园山圣家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图 4-1-17 汉口圣若瑟天主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图 4-1-18 武昌戈甲营崇真堂。原图载 1930 年《武汉教会月刊》，转引自《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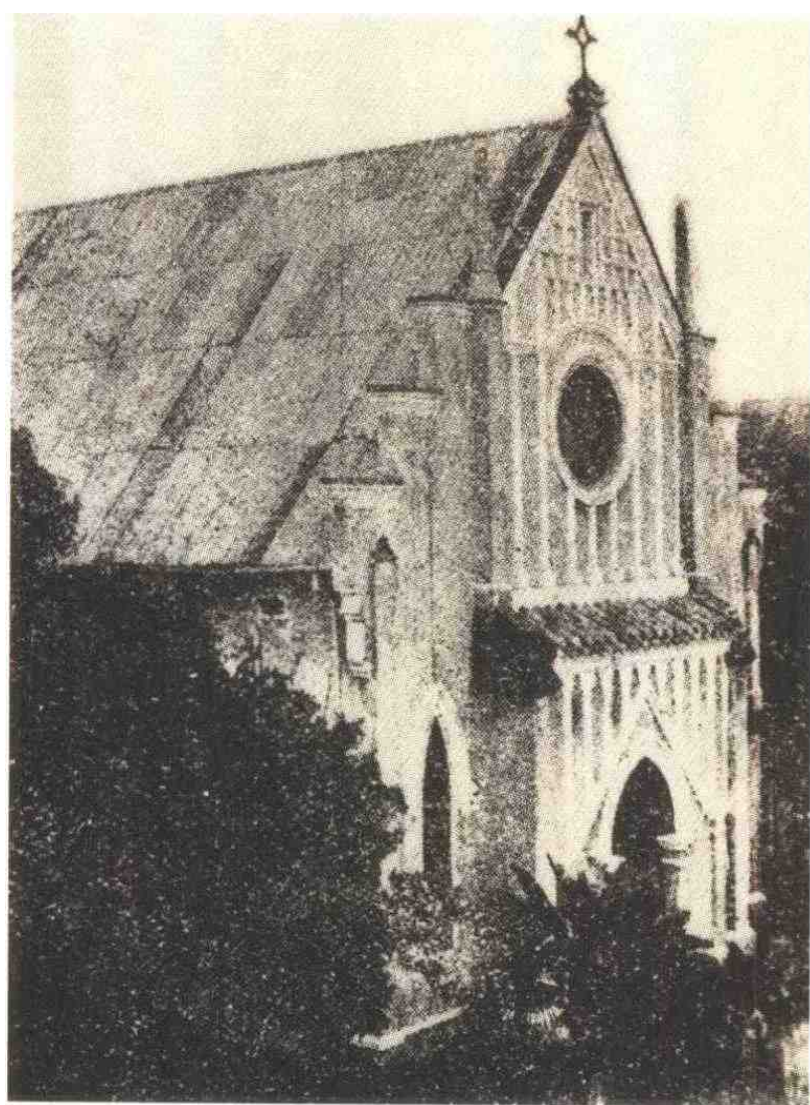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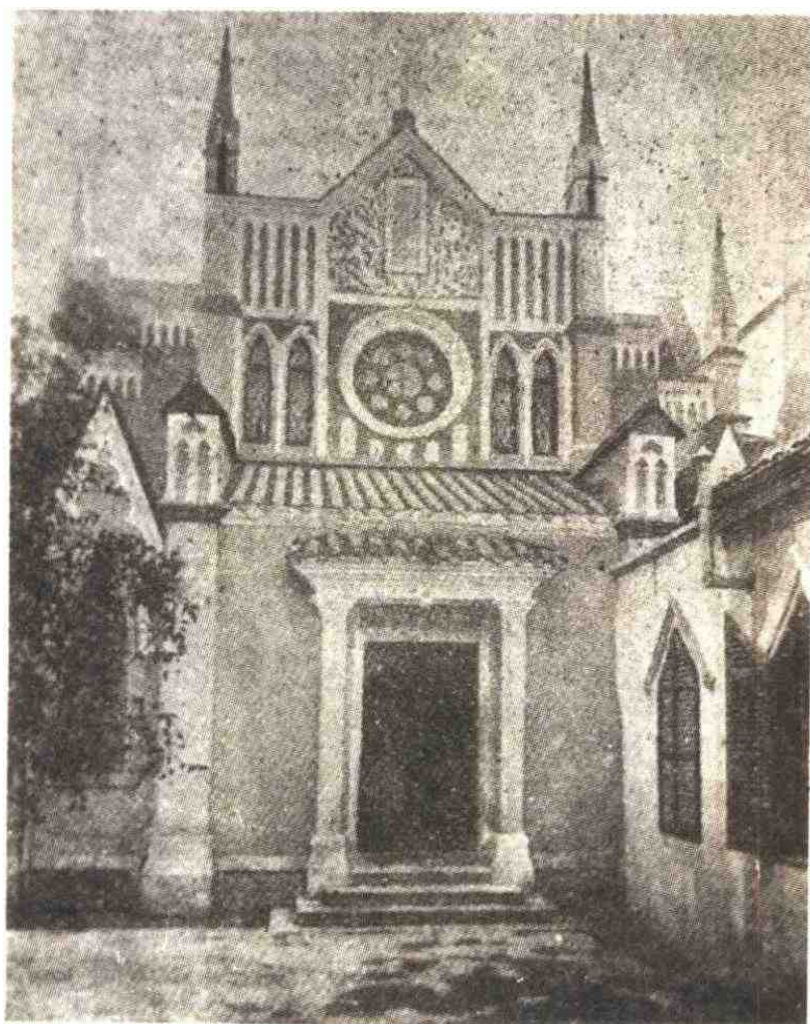


图 4-1-19 1880 年在汉口旧城区花楼街建造的基督教总堂。原图载 1930 年《武汉教会月刊》，转引自《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1860 年 10 月 25 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使于十天之后的 11 月 4 日即照会恭亲王奕訢索要北京南堂、北堂两座天主教堂,次日奕訢答应先交南堂,北堂因有居民,一月后移交。11 月 7 日,法使又照会奕訢催索东堂、西堂。12 月 17 日,奕訢奏称:“……所有东、西两堂地基房屋,臣等现饬地方官逐处查明。查有东安门外干鱼胡同,旧有东堂地基一处,外房六十间,现系户部学习郎中陆调阳接买之业。兹据该员呈称,系道光二十四年伊祖陆有恒置买,计价京钱一万吊,声称自愿报效,不敢领价。又查有西直门内横[桥]地方旧有西堂基外房十一间,现系正黄旗汉军举人庄福接买之业。据该举人呈称,系伊父正黄旗汉军马甲长青置买,计价京钱二千四百吊,声称亦愿报效,……”^[5]这样,北京四堂在很短时间内就全部移交教会,东堂、西堂都已几经转卖,当时的产权所有者无辜受害,只得“自愿报效”。京师以外,传教士更是随意勒索,1871 年,清廷总理衙门述及当时“给还旧址交涉”情况时云:“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闾境绅民所最尊最敬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况各省房屋,即属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重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6]传教士借给还教堂旧址之机强行勒索,更肆无忌惮地强占各地的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是当时激化教会与中国百姓冲突的极重要因素。

1860 年,北京重修南堂,1867 年重建西堂,1880 年重建东堂,1884 年再次改建东堂,1888 年建成西什库教堂,即北堂,至此,四堂都已重建。重建的教堂都采用西方建筑形式,但由于采用中国本地建筑材料,并由中国工匠施工,所以教堂的木雕、砖雕及石刻都已略具中国风韵。四堂之中,南堂、东堂于 1900 年被焚,西堂被毁,北堂也被毁损。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1900 年以后

重建的四堂。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足迹所至，不仅仅是辟有租界的商埠城市，也不仅仅是繁华的省城，而是一直延伸到边远地区的城市，乃至城镇与乡村。由此带来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广泛影响是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另外两条渠道——石库门里弄民居与殖民式建筑难以比拟的。

1650年，最早至济南传教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西班牙传教士嘉伯乐在城里将军庙街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堂。1866年，意大利传教士顾立爵在将军庙街重建教堂。教堂很小，约可容百余入，虽已初具西方教堂建筑形态，却采用青砖墙，硬山筒瓦卷棚顶，塔楼也作四坡攒尖顶，门窗半圆拱券及圆窗则已略具西方建筑形态，仍是一座西化的中国传统建筑。^[52](图4-1-20)

长江沿岸的中等城市芜湖也有许多教士前往，使之成为安徽省的一处传教中心。据1908年统计，全县已有大小教堂23所，其中位于长江之滨鹤儿山麓的芜湖天主堂于1889年开始建造，1891年5月，“芜湖教案”爆发，即将竣工的教堂被焚毁，后由清政府赔款十二万余两白银，在原址扩大规模重建，于1895年6月落成。教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巴西利卡式，局部两层，钟楼四层，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这座罗马风教堂比例恰当、构图严谨，左右有两座29米高的塔式钟楼（顶层为1931年添建），高耸挺拔，塔顶有透空的巨型铁十字架。教堂正中的山花顶端，矗立着一座近5米高的汉白玉耶稣塑像（“芜湖教案”前原为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青铜塑像），塑像直立的身躯和平伸的双臂如同“十”字。教堂的墙柱采用花岗石，用“糯米稀”砌筑，木屋架，红瓦屋面，室内天花的筒拱由半圆形拱券与交叉拱券组成。^[53](图4-1-21, 4-1-22, 4-1-23)

传教士的足迹也进入了中国的内地城市，陈重庆撰《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成都一章，以“洋教堂开风气之先”开篇，确是道出



图4-1-20 济南将军庙街天主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郑兴昌、齐育岱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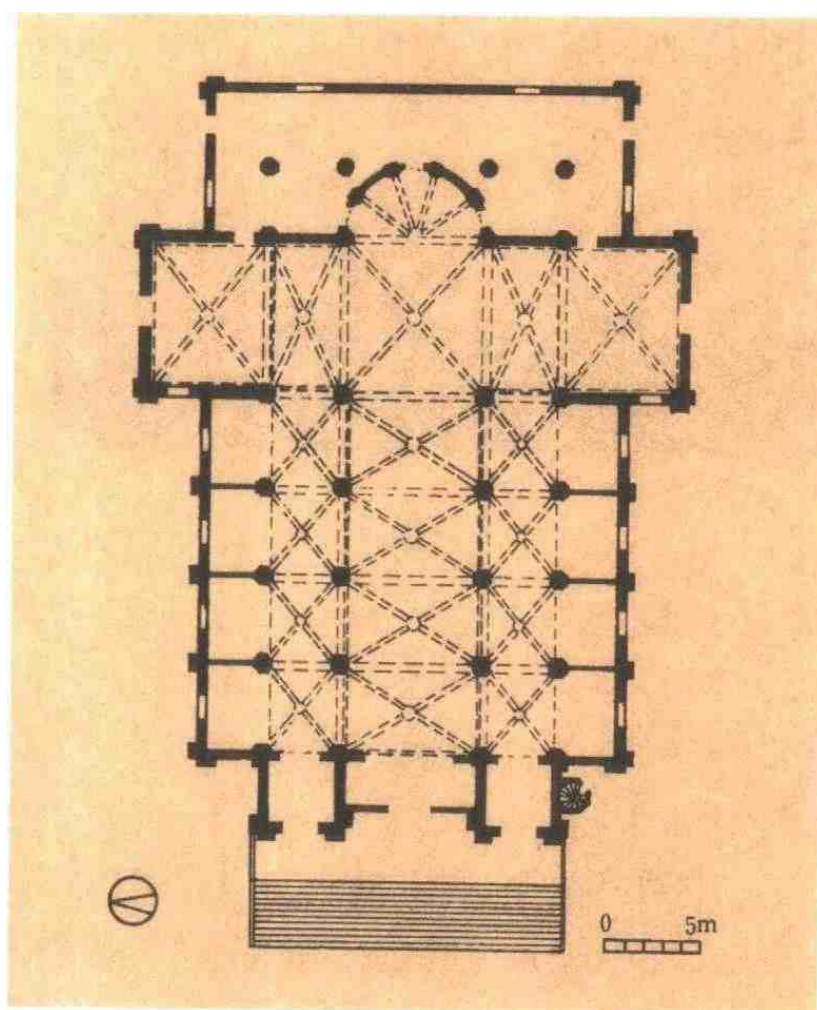


图4-1-21 芜湖天主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图4-1-22 芜湖天主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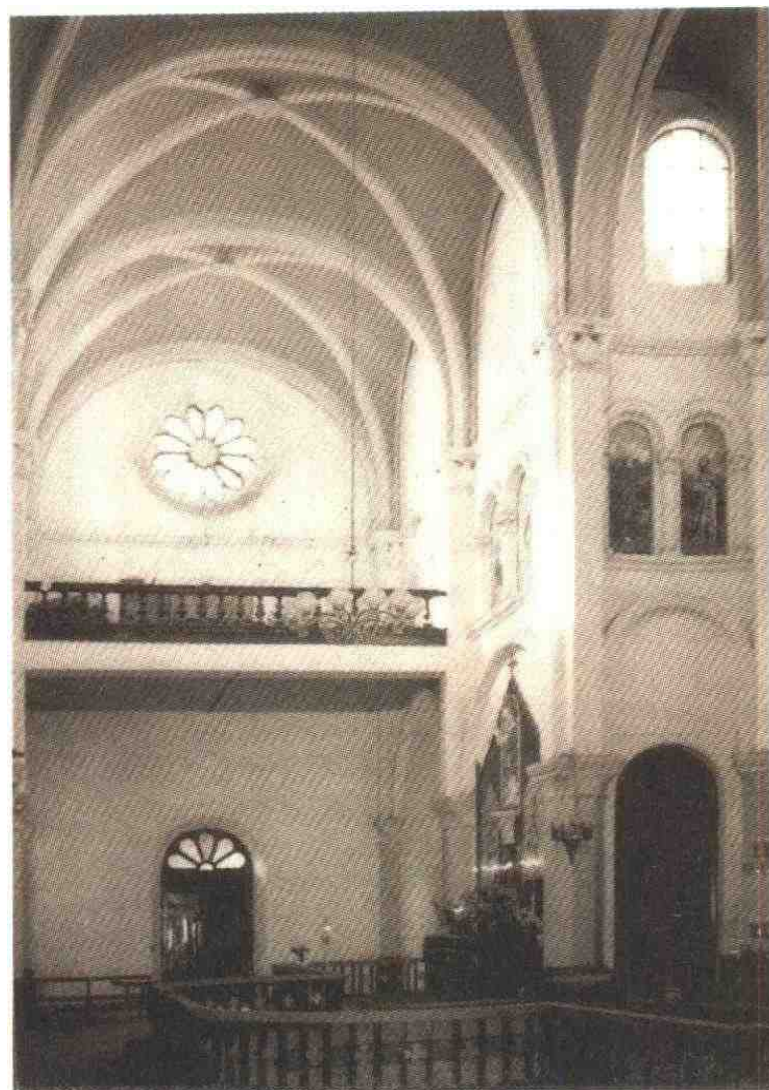


图 4-1-23 芜湖天主堂内景。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了成都近代建筑史,也是中国近代建筑中的发展规律。明末崇祯朝已有耶稣会士入川,至成都布道。鸦片战争之后,四川教务发展迅速,“据 1910 年四川洋务局的统计,当时全省从教人员十八万余,教会势力达到 129 个厅州县。四川总从教人数列直隶、江苏之后,居全国第三位。教会拥有大量房地产,所建教堂自省会至州县几遍及,甚至连许多场镇也建有教堂。另外,教会还承办了各种文教医疗事业,加上中外籍教士的住宅,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教会建筑系统。这便是四川近代建筑的先河。”^[54]

成都早期建造的天主教堂有光大巷天主堂(1756 年,亦称一洞桥天主堂),桂王桥天主堂(建于 1895 年前),青莲街天主堂(1894 年)等。光大巷天主堂 1895 年毁于“成都教案”,后重建,现存院落一座;桂王桥天主堂已于 1989 年拆除;青莲街天主堂几经改动,已非原

貌。新教教堂则有 1894 年建成的可容百人的简易礼拜堂,一年之后毁于“成都教案”,后修复,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再次被毁,其后重建,规模扩大,约可容三百人。^[55]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京师一带教会建筑几乎全部毁坏,华北、东北一带教会建筑也多被捣毁,只有东南各省由于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实行“东南互保”政策,教会建筑未受损坏。

1900 年以后,清政府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动荡,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支持各派新老军阀割据一方,造成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教会势力借机大举进入中国各地发展。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之后,教会也对传教士的行为有所限制,训令传教士们不得介入人民教诉讼,并扩大慈善事业,增加这些机构的透明度,这一时期是教会势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已具有极大影响。革命家崇信基督教者不乏其人,如冯玉祥,甚至孙中山等。据王治心考,1921 年,中国已有天主教徒 2056338 人;1920 年有新教徒 1173453 人;总数达 320 多万人。”^[56] 1900 年以后,除勒索到大量“教案”赔款外,教会的其他经费也大大增加,有了较雄厚的资金来源。^[57] 因此,这一时期教会建筑有了很大的发展,数量增加,规模增大,建筑质量也大有提高。除修复、扩建旧有教堂外,还新建了许多教堂;除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及都城北京得到发展,并遍布中国近代边缘城市,乃至遍布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外,在 1900 年前后建城的新兴租借地城市与铁路附属地城市中,教会建筑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

自 1915 年开始,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入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阶段,新文化运动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对一切旧思想、旧伦理、旧制度、旧学说给予价值重估,对基督教也是如此,陈独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著《不朽》,蔡元培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表明了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重新审视的态度。但此时文化界的非基督教运动已不再是反对“洋教”,而是重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从此,非基督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庚子反教相比,其动机是明确的而非盲目的,其态度是冷静的而非狂躁的,其言论是说理的而非蛮横的,其方式是温和的而非暴力的,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

彩,但更具有文化、学术背景。”^[58]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4月9日闭幕。这次会议引发了1922~1927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接着,北京大学学生在蔡元培、李石曾的指导下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于4月4日发表《非宗教大同盟宪章》,4月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反宗教大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基督教组织,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非基督教运动。1924年,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发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次高潮。非基督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为反文化侵略运动,成果之一是“收回教育权”,另一个成果是促进了基督教“本色运动”,即将基督教会办成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的运动的开展。^[59]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产物,与从历史、宗教角度评价基督教不可混为一谈,廖仲恺在当时的演说中就说得非常明确:“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它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如果它放弃了这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的佛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反对它了。”^[60]

非基督教运动虽然在1927年以后趋于平静,却对中国基督教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于教会建筑,对教堂建筑的形制影响不大,对教会学校建筑的影响则是其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趋势的增强,但这种趋势早就存在,并非从此时始,可以一直回溯到十九世纪末,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只是增强了这一趋势。这是因为如上引廖仲恺所言,当时反对的只是基督教在政治上非法的、优越的势力,而不是反对基督教本身,这种理性的非基督教运动当然不会干预基督教建筑的形制。在此期间及以后,教会建筑的建造也并未停止。

1900年以后,北京的四堂陆续修复或重建。其中,1888年建造的北堂(西什库天主教堂)于1900年局部毁坏,1901年即已修复。教堂原来只有两层,尖券门窗、透视门、玫瑰窗及小尖塔等都具有明显的哥特式教堂的建筑特征,但钟楼因受清廷规定限制不得高出屋顶,所以二层之上只有四座象征性的小尖塔及三角形山墙,而且中部三角形山墙高,两侧较低,建筑整体形制非驴非马。修复后增高一层,形成左右双塔高度增高、超过中部三角形山墙高度很多的格局,就大大突出了哥特式教堂的建筑整体形制特征。(图4-1-24)北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入口前有中式月台和汉白玉栏板,并有两座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碑亭,用以供奉中国皇帝的封谕。北堂属整体西化,局部中西混杂的哥特式教堂建筑,1901年塔楼增高后哥特式建筑的特征更为明显。北堂使用石灰三合土基础,墙身用城砖砌筑,由于采用中国本地建筑材料,又由中国工匠施工,所以这座青砖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石雕、砖雕及木雕已掺杂一些中国传统建筑的细部做法。(图4-1-25)南堂(宣武门天主教堂)于1902年开始重建,1904年竣工。重建的南堂没有恢复被毁前的样式,而是仿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罗马耶稣会教堂样式建造,南北向长方形平面,祭台和讲经台在北端,入口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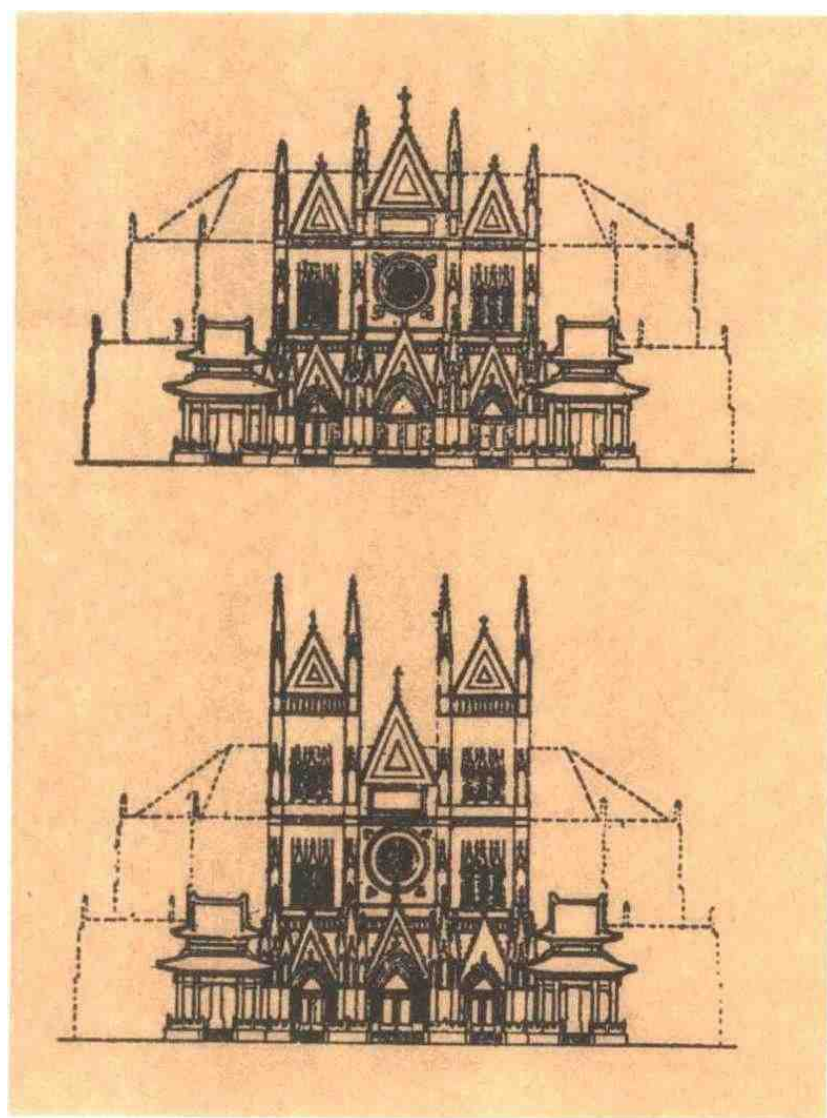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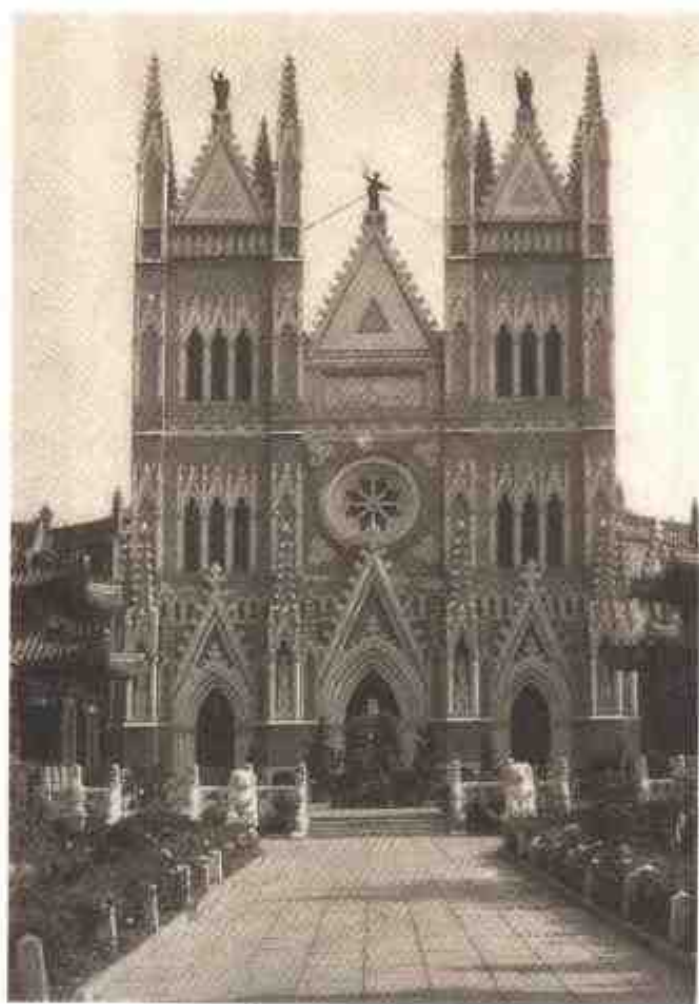


图4-1-24 北京北堂(西什库天主教堂)正立面图。上图:1888年建造的北堂正立面图;下图:1901年修复后增高一层的北堂正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4-1-25 北京北堂
(西什库天主教堂)。原
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
建筑》(沈阳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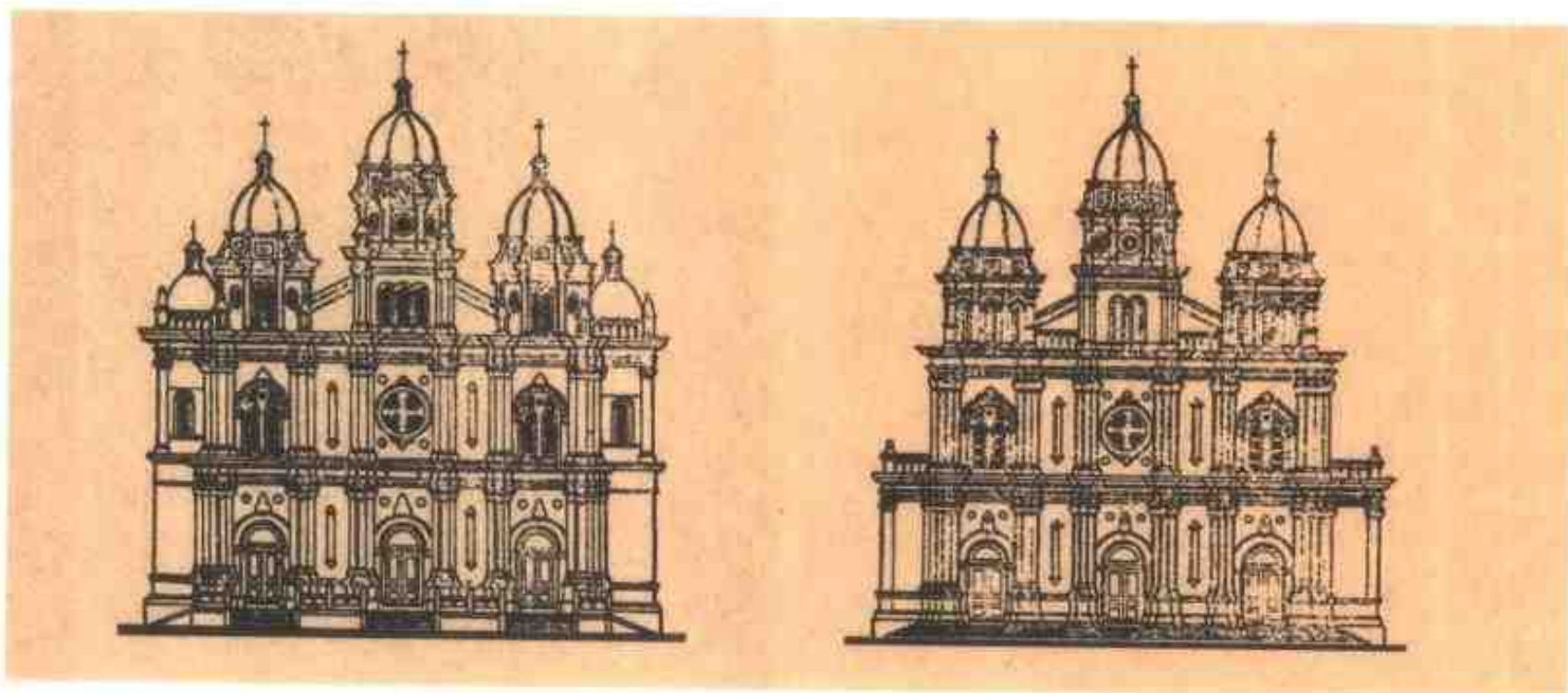
端,两侧有走廊。正立面是高出屋顶许多的高大山墙,山墙立面有通顶的壁柱,顶部是巨大的涡券形雕饰。(图 4-1-26) 东堂(八面槽天主教堂)于 1905 年重建竣工,虽有改动,基本维持 1884 年建造时的原样,青砖清水砖墙,砖木结构,仿文艺复兴教堂建筑风格。(图 4-1-27) 只有西堂迟至 1912 年才重建竣工。^[61]

上海 1900 年以后建造的教堂已具相当规模,典型作品是徐家汇天主堂与佘山天主堂。徐家汇天主堂于 1906 年开工,1910 年建成,建筑师道达(W. M. Dowdall)。教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五廊型巴西利卡,面宽 28 米,进深 79 米,最宽处 44 米,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门窗均为尖券,正立面朝东,正门两侧两座尖塔高高耸起,钟塔高度 57 米。教堂可容 2500 人,堂内有大小金山石楹柱 64

图 4-1-26 北京南堂
(宣武门天主教堂)。原
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
建筑》(沈阳稿)。



图 4-1-27 北京东堂
(八面槽天主教堂)正
立面图。左图:1884 年
建造的东堂正立面图;
右图:1905 年重建的
东堂正立面图。原图载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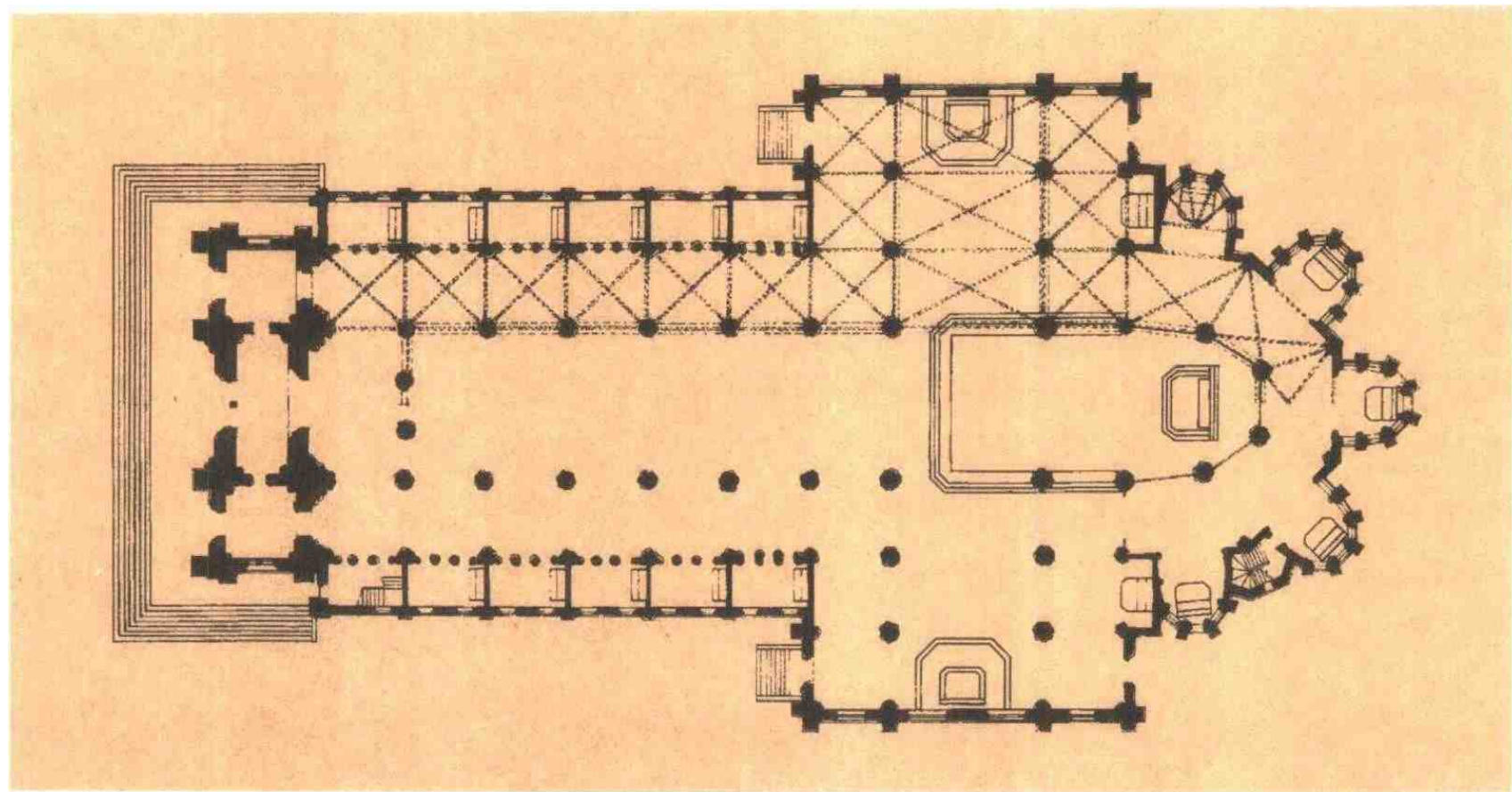


图 4-1-28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平面图。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根,一根大柱由十根小圆柱拼合而成,中厅和侧廊的天花均为四分尖券肋骨拱顶,木龙骨板条抹灰粉刷,拱顶下由木束柱支撑。建筑外墙为红砖砌筑,局部重点装饰部位采用石材雕成,细部处理已经简化。^[62](图 4-1-28,4-1-29)

佘山天主堂的正式名称是“进教之佑圣母大堂”,是拆除 1873 年建造的佘山圣母堂后在原址建造的新堂,1925 年奠基,1935 年建成,历时十年。佘山天主堂由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叶肇昌设计,建筑位于海拔 99 米的佘山顶峰,拉丁十字形平面,巴西利卡式,教堂坐东朝西,但两人口仅是象征性的入口,进入教堂的登山路线在教堂南侧,所以在南立面设有实际使用的主入口。教堂东西长 56 米,南北宽 25 米,连同耳堂宽 35 米,堂脊高 17 米,塔楼高 38 米,大堂内有座位 2500—3000 座。佘山天主堂属罗马风建筑风格,钟楼已有脱离主体建筑的趋势,钟楼形制也已非正宗,顶部为圆穹顶,穹顶之上原有高举圣子耶稣的圣母玛丽亚铜像,圣子耶稣两臂平伸,远望如十字。这一逾矩之构思使塔楼成为佘山天主堂的特有标志。惜雕像今已不存,穹顶上的十字架为后来所补。^[63](图 4-1-30)

1900 年以后天津建造的教堂建筑首推西开教堂。1900 年天津法租界扩张至墙子河后,又于 1913 年在墙子河外的老西开地区建造天主教堂、主教府与教会学校法汉中学。1916 年教堂竣工,法租界当局即以保护教堂的名义派军警强占老西开地区,激起天津人民的抗议而爆发“老西开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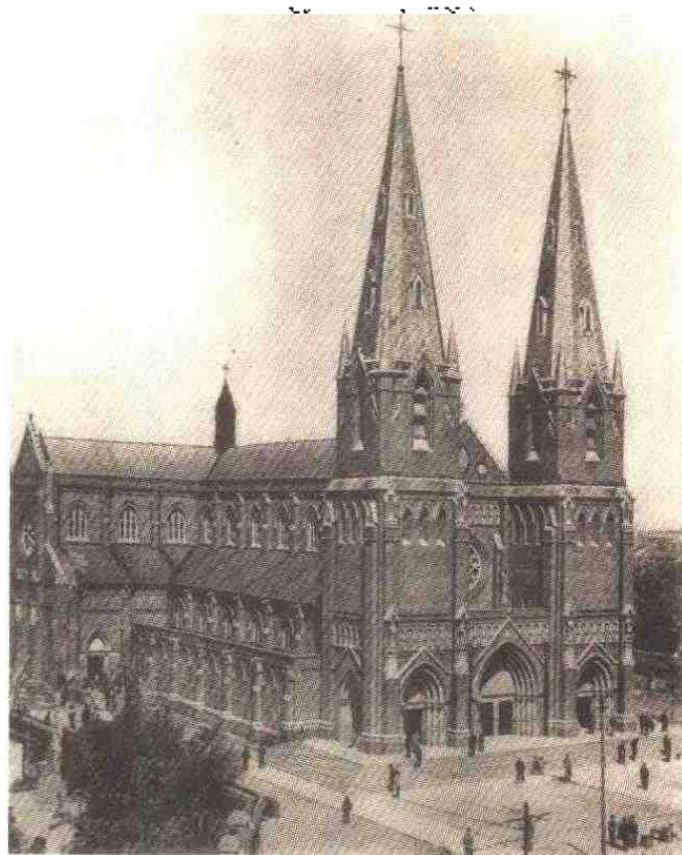


图 4-1-29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图 4-1-30 上海佘山天主堂。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法租界的中国工人、职员等全体罢工,使法租界停水、停电、商行歇业、工厂停工,陷入一片混乱,法租界当局被迫暂时收敛租界扩张活动。直至1931年,日本在天津策划“便衣队”暴乱,法租界当局才趁乱侵占了老西开地区。教堂因位于老西开地区而得名,称西开教堂。西开教堂属法国罗马风建筑风格,拉丁十字形平面,三廊式巴西利卡,半圆拱券门窗,正立面两侧耸立一对穹顶塔楼,十字形拱顶交叉处较大的穹顶立于八边形基座之上,穹顶为木结构,外覆铜板,年久呈铜绿色。正立面上部塔楼之下有半圆形连列券,入口处半圆拱券门洞上逐层向内凹进的带状装饰也是较典型的罗马风教堂处理手法。外墙为红黄两色清水砖墙,形成红黄相间的水平砖带。西开教堂正立面正对法租界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成为城市街道重要的对景建筑,使城市景观大为增色。(图4-1-31,4-1-32,4-1-33,4-1-34)法汉中学初名法国学堂,1895年创立,后几经更名迁址,1916年在西开教堂北侧新建三层校舍,定名为法汉中学。与教堂同时建造的主教府于1914年建成。

图4-1-31 天津西开教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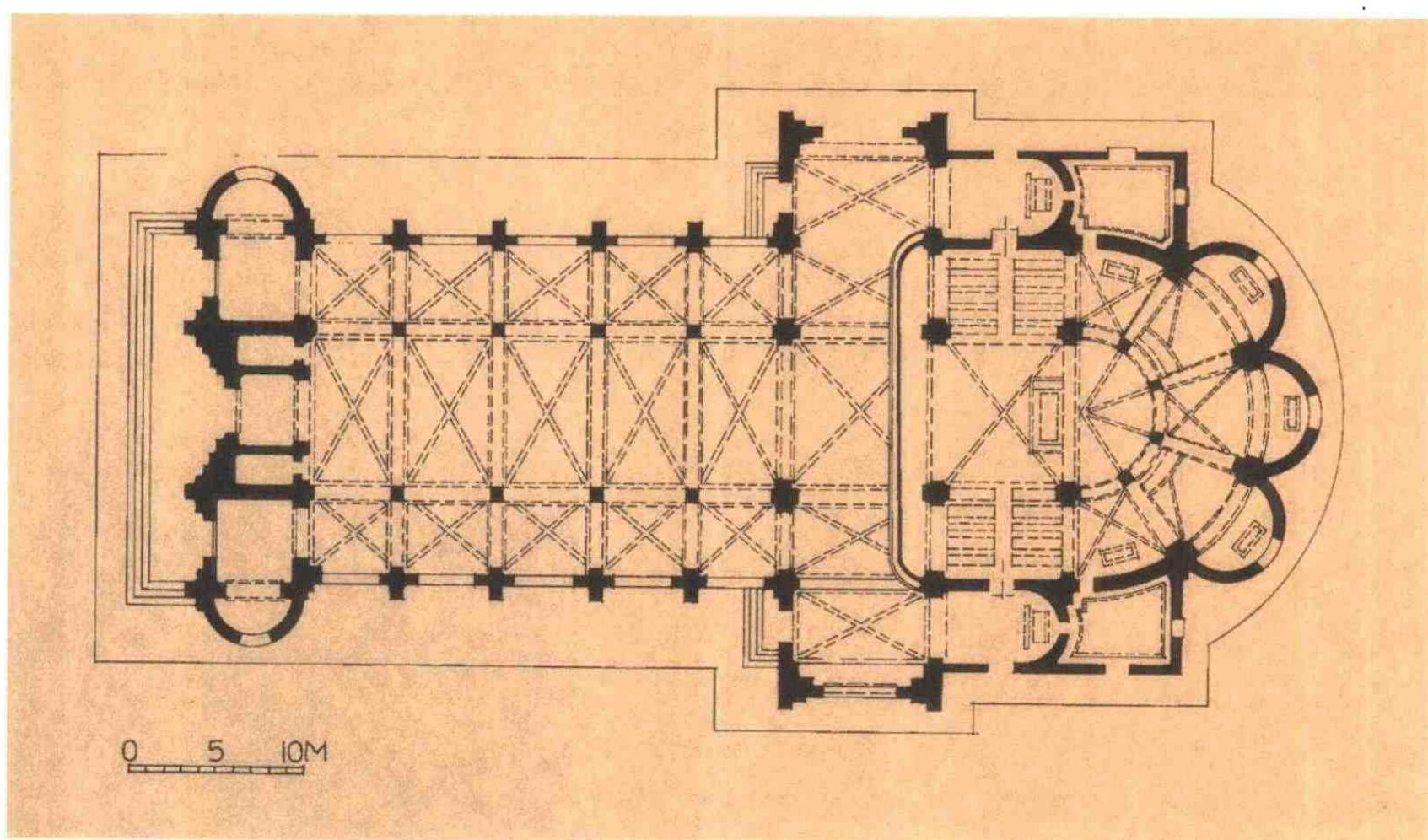


图4-1-32 天津西开教堂。左图:1986年拆除原法汉中学建造国际商场,将原在南京路上可以见到的西开教堂遮挡,仅留一条窄路,使天津南京路失去一处极佳的建筑文化景观,今天只有走到近处才可见西开教堂全貌。右图:近处拍摄的西开教堂。照片由作者摄于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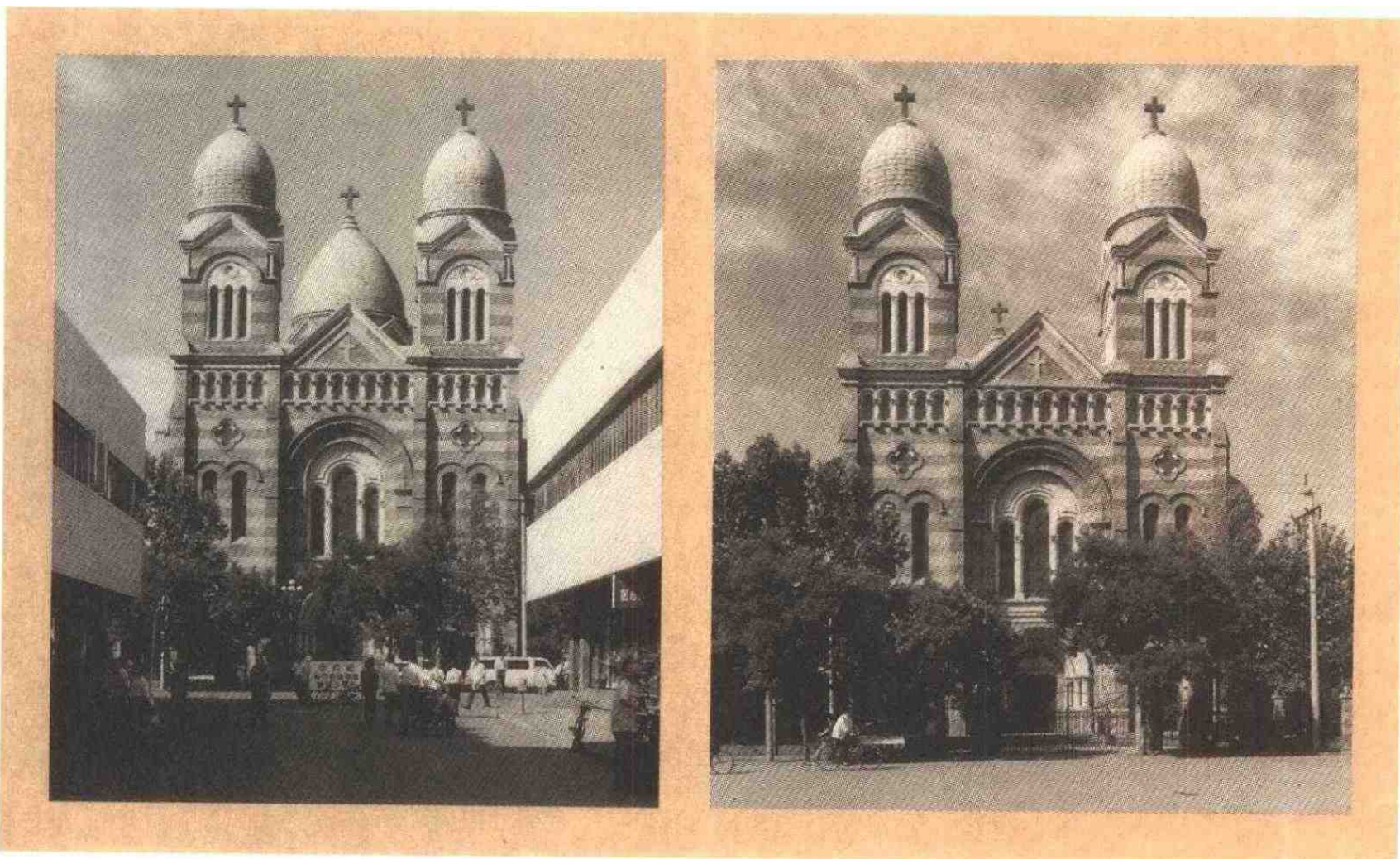




图 4-1-33 天津西开教堂正门。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1-34 天津西开教堂内景。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2 年。

如果说,1900年以后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教堂建筑虽有逾矩之处,并不是完全正宗的西方教堂建筑,但终究只是局部掺杂,形成有折衷主义趋势的风格混杂现象,其所宗之西方教堂建筑的基本风格还是可以分辨的。那么,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及边远城镇的教堂建筑就有着更加随意得多的建筑形式,中国传统建筑的塔、屋顶、牌坊、垂花门等种种建筑形式构成要素,与西方教堂建筑的塔楼、穹顶、柱式、拱券、玫瑰窗、

十字架等种种建筑形式构成要素随意组合,生成混杂而难以命名的独特建筑形式,生动活泼,充满野趣,应当是中国民间匠人按洋教上的大致意图随意创作而成,构成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01年建成的成都张家巷天主堂,面积约280平方米,长方形平面,室内有木柱将空间分成中厅与侧廊三部分,西端为圆形神坛,层高5米多。正门入口处山墙处理相当简朴,墙上抹灰镶嵌陶片作出圆窗及十字架图形,圆窗模拟玫瑰窗,十字架图形处山墙局部耸起,似为罗马风教堂建筑山墙的变形,虽为自创之形制,教堂标志倒也十分醒目。教堂

之后有一所三合院建筑,是神父居住之处,面貌与当时的民居无异。张家巷天主堂建筑群采用神父居所与教堂连体布置的平面布局,其前区在大开间的教堂左右设置院落,后区则在小尺度居所的中部设置院落,中西结合,颇具匠心。(图4-1-35,4-1-36)

更能体现1900年以后中国近代边缘城市教会建筑特征的一例是成都的平安桥主教座堂与主教公署。二者在平安桥街西连为一体,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占地面积约60343平方米,建筑面积5847平方米。1895年,因当时的主教座堂光大巷天主堂毁于教案,遂由四川代牧区主教法国人杜昂指派其当家神父法国人骆书雅负责修建平安桥新堂,设计、施工、监造均由骆书雅一手经办,于1904年建成,历时约九年,耗银20万两,资金来源是“成都教案”的赔款。

设计者骆书雅是中国通,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研究,因对“教案”心有余悸,遂将建筑总平面设计为中文的“悚”字,以示教会的自警自律。“悚”字的“忄”偏旁为主教座堂,另外半边的“束”为主教公署。(图4-1-37)整座建筑均为木结构,木材皆为成都附近所产优质楠木。因紧靠成都旧皇城,不得建楼建塔,所以建筑皆为单层。因主教公署中还建有一座主教的私人小教堂,主教座堂亦称“大教堂”。主教座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室内由两排木柱把空间分成三部分,中厅高达9米,两侧廊略低,均作拱形天棚,西端为半圆形神坛。与一般教堂不同的是,主教座堂除正面人口处外,其余三面都有外廊环绕,并可于主教公署四周环绕的外廊相通,是适应成都多雨气候的变通作法。主教座堂正立面山墙采用两层高科林新巨柱式壁柱与半圆拱券门窗,山墙顶部耸起巨大的半圆形山花,在这一局

图4-1-35 成都张家巷天主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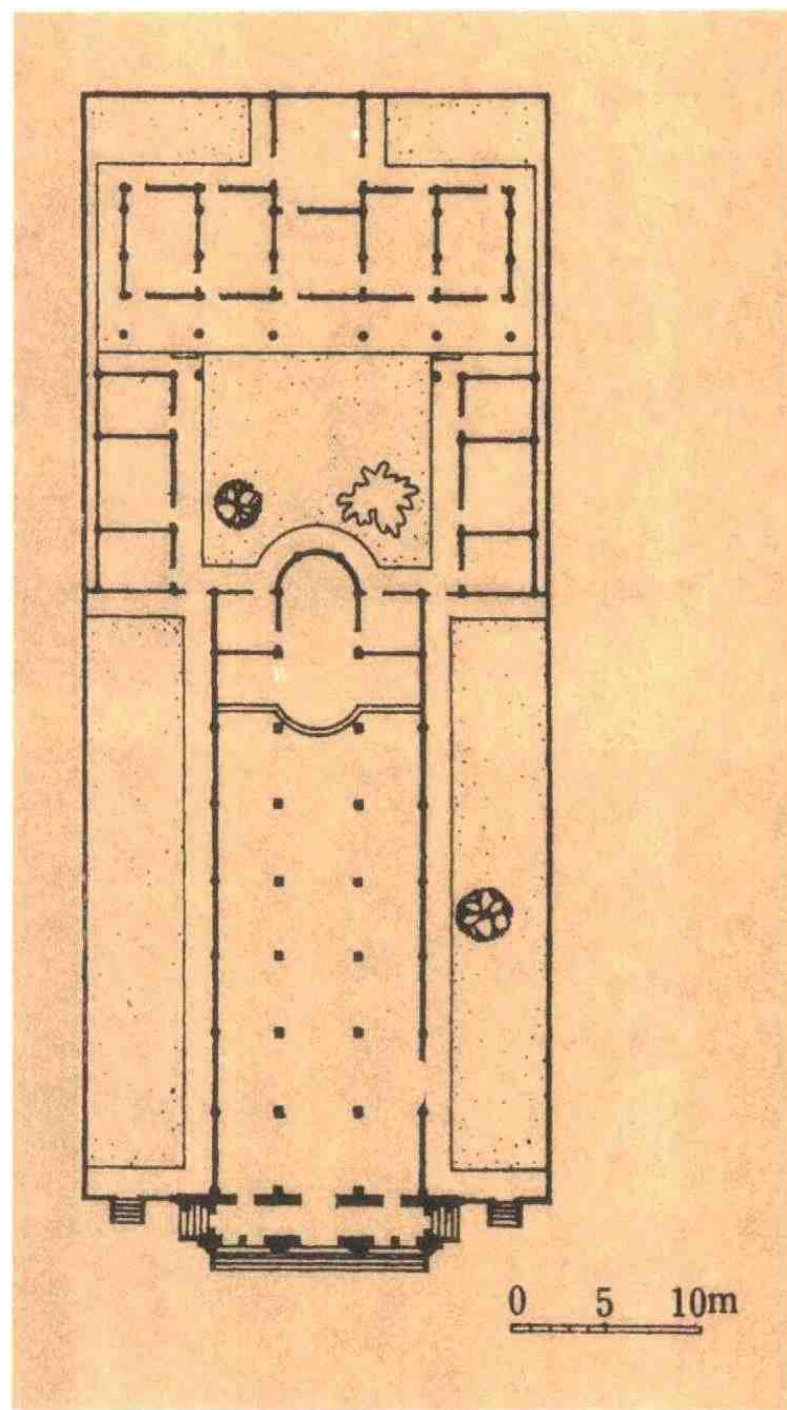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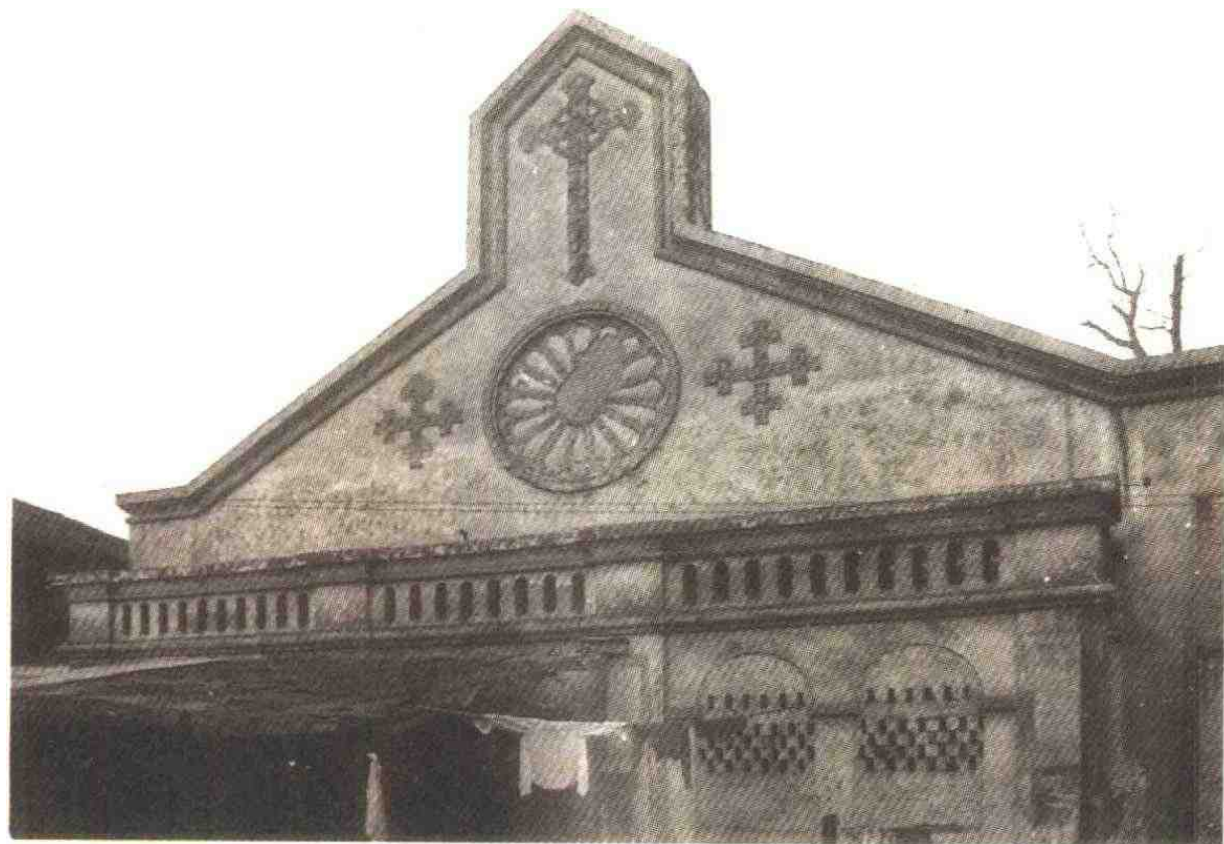


图4-1-36 成都张家巷天主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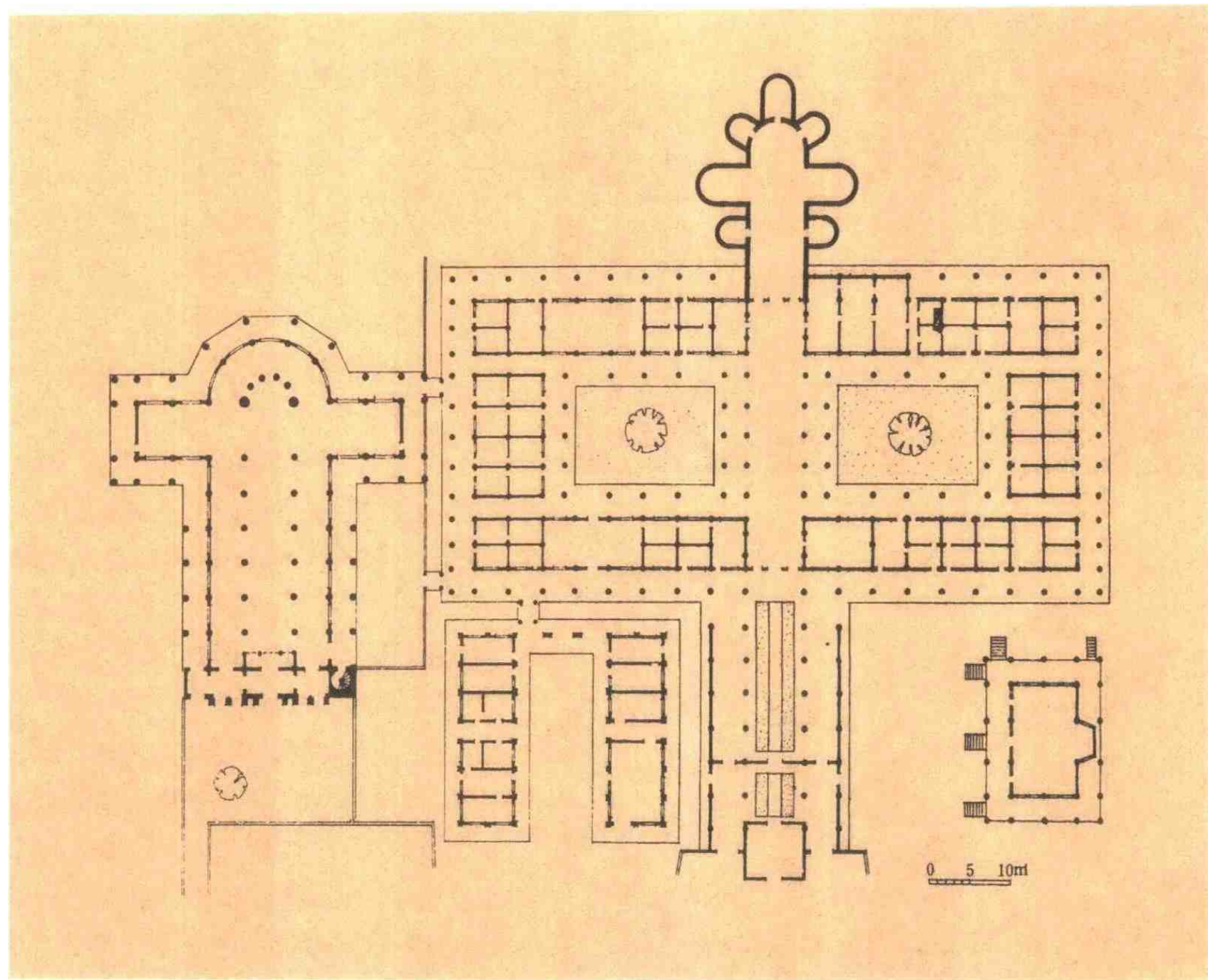


图 4-1-37 成都平安桥主教座堂及主教公署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部较多地呈现西方建筑风貌。与主教座堂相比,主教公署更接近中国传统建筑。大门做法极似中国旧式官署府第,甚至在街对面还作了照壁。大门内窄天井两边是高轩敞亮的廊道,进入二道门,空间更加宏敞,正中宽大的四排柱敞廊将主教署一分为二,形成左右两个内庭院,仍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格局。敞廊西端,过垂花门即为主教的私人小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装饰均为西洋风格。^[64](图 4-1-38,4-1-39,4-1-40)

中国传统建筑一直有从汉字字形的象征意义出发形成建筑平面构思的传统,如圆明园四十景之万方安和,就在水中建卍字形平面殿宇,雍正时称为“万字房”,寓“万方安和”之意;澹泊宁静一景,雍正年间称为“田字房”,主体建筑为田字形平面,建筑东临稻畦,又建“观稼轩”、“稻香亭”等,营造农家风貌以表达“淡泊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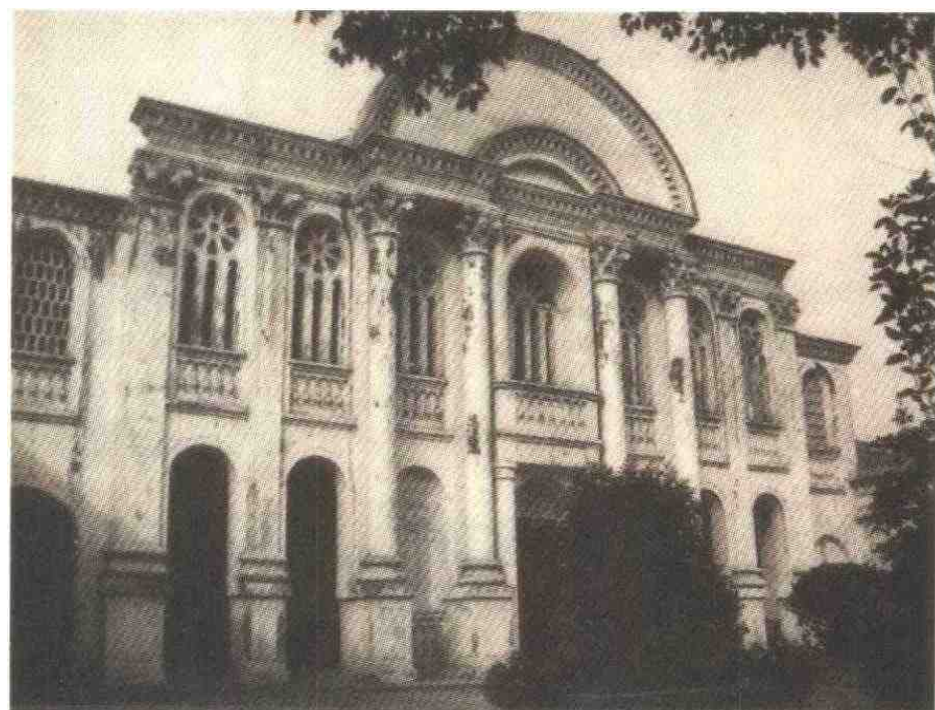


图 4-1-38 成都平安桥主教座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图 4-1-39 成都平安桥主教公署大门。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图 4-1-40 成都平安桥主教公署内庭院。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志、宁静以致远”之立意。作为外国神父的骆书雅,居然能以“悚”字为建筑平面构思之本,在教会建筑中使用中国传统的汉字文字象征手法,只有对中国文化有较深层次的理解,才能有此构思。能按这种思路设计建造教堂,姑不论其构思是否属于形式主义,已经在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道路上有所进展。

成都的教堂建筑中,中西建筑文化混杂的初级阶段作品还有陕西街福音堂。该堂于 1979 年拆除时从墙基中得一铁盒,在盒内发现“成都陕西街重建福音堂之形式”(正立面)、“成都陕西街重建福音堂之地图”(总图),及“重建成都美以美会福音堂略史”等文件,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陕西街福音堂于 1919 年圣诞节正式奠基动工,1921 年建成。新堂宽敞高大,可容千人。堂前有双塔对称而立,塔尖采用四角攒尖顶,很像中国亭子,与原设计图上的尖锥形塔不同。^[6] (图 4-1-41)成都近代建筑研究,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20 世纪 80 年代,陈重庆独力潜心研究,及时抢救了这笔宝贵建筑遗产,其功不可没。又有陈重庆 1968 年所绘“陕西街福音堂”水彩画,记录了该教堂中西建筑形式并存共处的建筑文化现象,今日建筑已经拆除,这种珍贵资料就更加宝贵。

图 4-1-41 水彩画《成都陕西街福音堂》,陈重庆 1968 年绘。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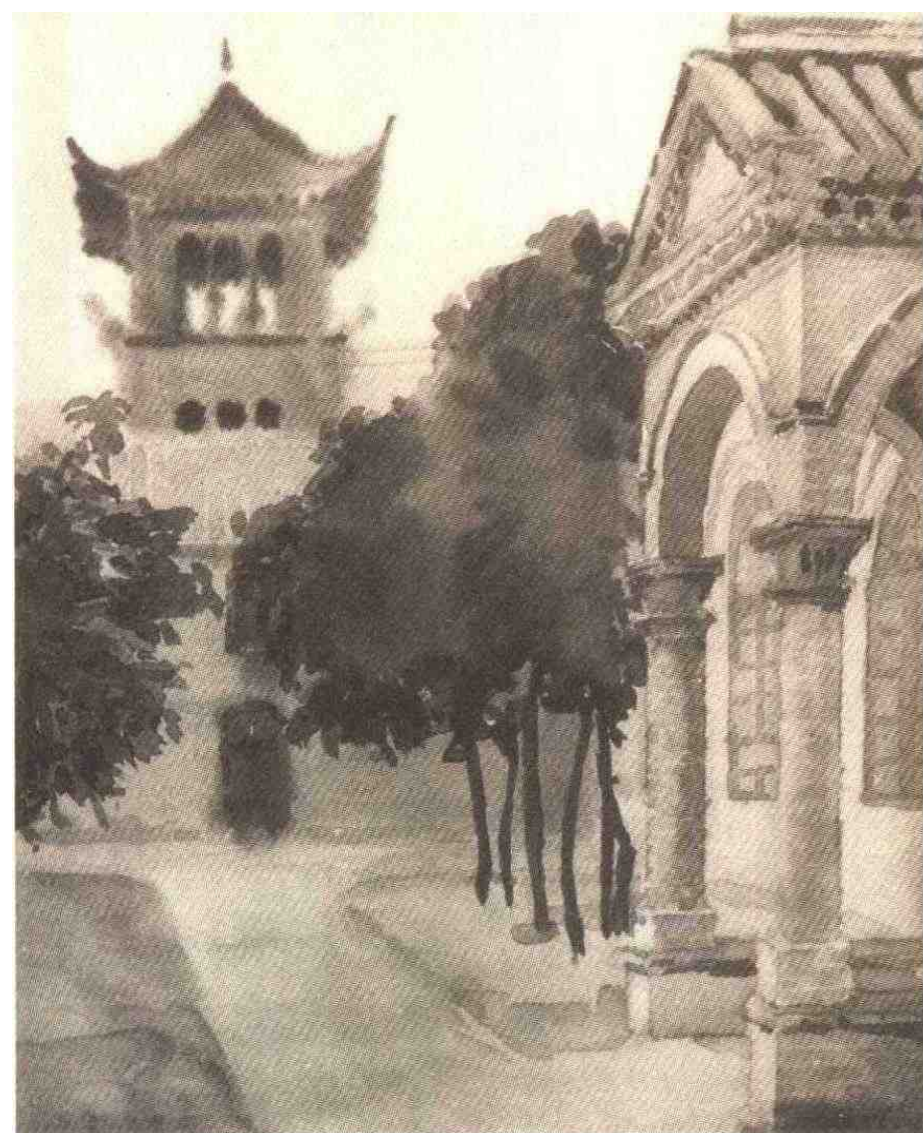


图 4-1-42 兰州天主教晋善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类似的实例,还有兰州天主教晋善堂,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形制依稀可辨,耸起的双塔却已换成变形的中国佛塔。(图 4-1-42)青海大通县天主教堂,十字架下是中国传统的歇山式屋顶,只有塔楼墙上的圆窗留下一丝哥特式教堂玫瑰窗的影子,但建筑的整体构图却分明是西方建筑构图模式。(图 4-1-43)宁夏银川天主教堂,已经是伊斯兰教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结合。(图 4-1-44)贵阳天主教

堂,教堂的正立面已变成中国的牌坊,但大大的圆窗与门的尖券还留有几分哥特式教堂风韵。(图4-1-45)贵阳的另一座天主教堂构图很美,将西南地区塔的造型与教堂建筑融合,真是妙不可言。(图4-1-46)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00年以后,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逐渐向中国近代边缘城市,乃至偏远的城镇、乡村扩散,无孔不入的传教士是这种建筑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无处不在的教堂建筑是这种建筑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边远偏僻的城镇、乡村,也可以看到孤零零的教堂,而并无其他近代西方建筑,这是其它建筑类型少有的建筑文化传播现象。如偏远的贵州青岩镇,就留下西方传教士的身影,也留下外来宗教的影响,居然形成一镇四教的局面。“青岩镇的佛教寺庙虽然谈不上规模宏大,但布局严谨,修缮一新的庙宇殿堂里,淡淡的青烟伴着呛人的芬芳,暮鼓晨钟给人以空灵的感受。……出庙门不远是基督教堂,教堂里居民们正在聚精会神的听课,课桌旁随意摆放着卖菜的背篓、新买的衣物。讲台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认真地讲解着圣经。我找到一空位坐下,摆放在讲台上的十字架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说那是外国传教士留下的宝贝。今天青岩镇许多人家里的堂屋正中仍挂着耶稣像。走入一户人家,主人热情接待了我,还向我介绍基督教的有关知识。他说青岩的教堂“文革”中曾被查封,百姓也一律不准信教,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信教自由。当问及天主教、基督教与佛教、道教的关系时,主人一脸堆笑地指着石板街对面说,这条街上信各种教的都有,平时各念各的经,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相安无事。”^[66]除了十字架外,今天青岩镇的教堂建筑已经没有西方建筑的印迹,但当年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图4-1-43 青海大通县天主教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4-1-44 宁夏银川天主教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4-1-45 贵阳天主教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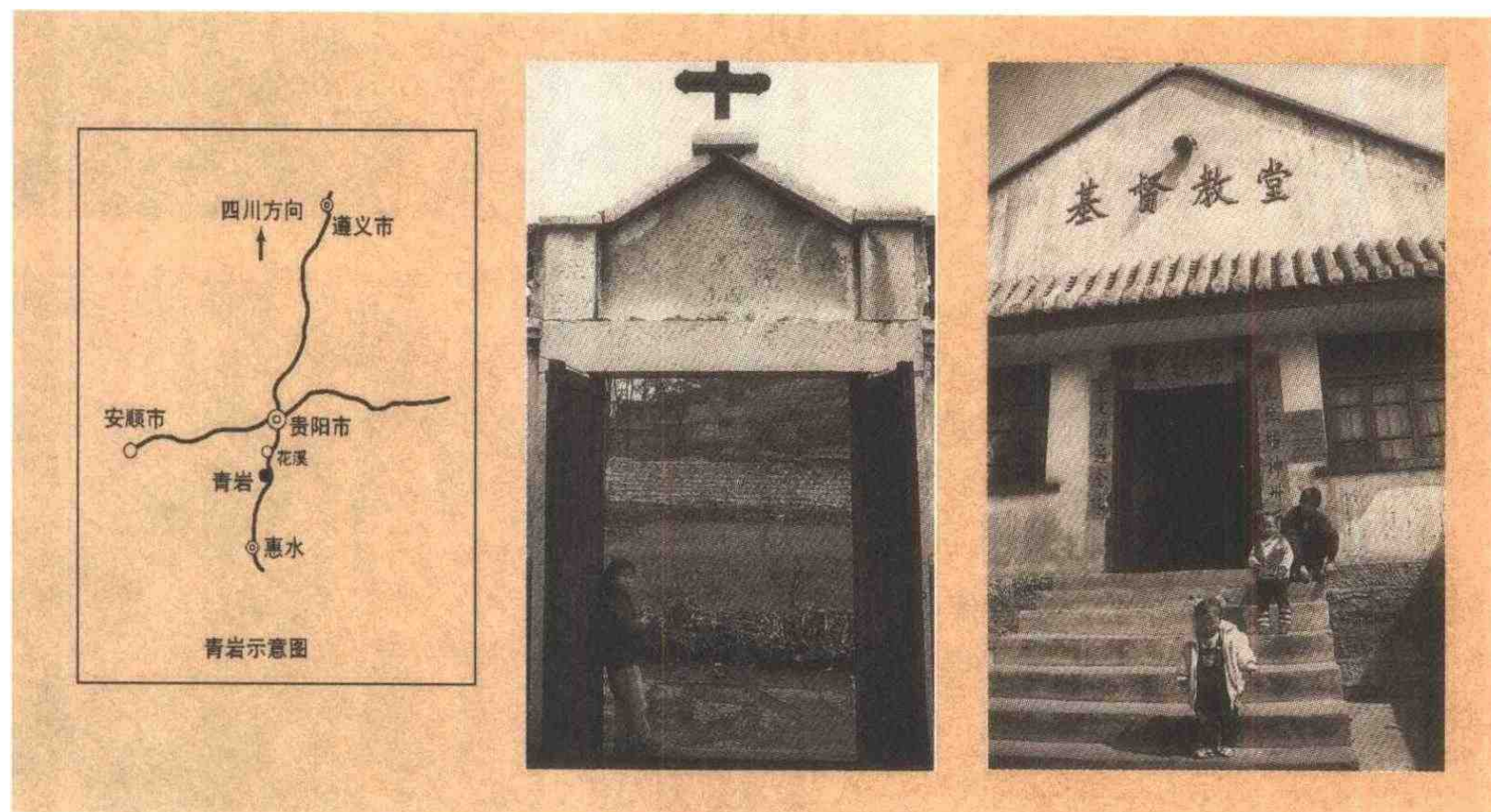


图 4-1-46 贵阳的另一座天主教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却是显而易见的。(图 4-1-47)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传教士的文化素质较高,教会财力较为充裕。如前文所述,或由其中颇具建筑素养之士担任教会建筑的业余建筑师,或者聘请正宗建筑师设计,所以体现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教会建筑的西方建筑文化也比较正宗。离这些中国近代主流城市愈远,传教士中文化素质较高者就愈少,教会财力也不够充裕,难以聘请正宗建筑师设计,此时中国工匠就愈有随意发挥的余地,这才为我们留下这些充满民间情趣,颇富创意,借教堂之名出现,早已脱离西方

教堂建筑模式的建筑作品。罗伯特·文丘里言:“我喜观基本要素混杂而不要‘纯粹’,折衷而不要‘干净’,扭曲而不要‘直率’,含糊而不要‘分明’,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又‘有趣’,宁要平凡的也不要‘造作的’,宁可迁就也不要排斥,宁可过多也不要简单,既要旧的也要创新,宁可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接的和明确的。我主张杂乱而有活力胜过明显的统一。”^[67]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民间建筑美学观,及其主要由民间工匠创作的,不正宗但充满民间情趣,风格混杂却颇富创意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建筑作品,在中国近代边缘城市中体现于这些中西混杂的教堂建筑,而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武汉、天津等则体现于石库门里弄民居,这将在本书的第五章专章论述。

图 4-1-47 贵州青岩镇的教堂。原图图名为:左图:青岩镇地理位置示意图;中图:天主教堂前的孩子;右图:基督教在青岩已有百年历史。朱林摄,原图载四川画报增刊《四川航空》,2001年。



让我们回过头来论述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另一类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之一——由德国侵占胶州湾租借地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租借地城市青岛的教堂建筑,青岛的教堂建筑与上海、天津、广州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一样比较正宗,但更具侵占国德国的建筑特色。

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青岛有着特别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青岛城市背山面海,地势起伏。建城初期,城市规划特别注意结合地形,注重城市空间构图,在地势较高处布

置重要建筑物,如观海山南麓胶澳总督府,信号山南麓德国总督官邸,黄海路总督别墅,还有教堂建筑江苏路福音教堂与浙江路圣爱弥尔教堂等。在青岛近代城市中,质量精良、多姿多态的建筑星罗棋布,错落起伏的屋顶与塔楼掩映在绿树丛中,构成丰富生动的城市天际轮廓线。青岛建筑塔楼特多,教堂建筑的塔楼是其中的佼佼者,江苏路福音教堂的钟塔脱离建筑独立,又与建筑融为一体,造型极美;圣爱弥尔教堂则在高地之上双塔耸立,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图 4-1-48)



图 4-1-48 青岛城市鸟瞰,远处圣爱弥尔教堂在高地之上双塔耸立,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0 年。

“在与府前广场相交的沂水路东端高约八米的台地上,立着一幢对景建筑——德国福音教堂(1908~1910)。巴西利卡平面,长轴南北向,根据所处环境在两个方向布置主要入口:一为从江苏路角拾阶而上,由钟楼下进入,一为从南面小广场经正门穿门厅进入礼拜堂。内部为拱形吊顶,廊柱为粗短的红花岗岩柱身加青花岗岩斗形柱头,花纹古朴有拜占庭遗风。红瓦屋面,粗条石檐口,黄色波纹墙面,粗犷的蘑菇石勒脚,转角处布置得体的粗石包角,显得分外粗犷浑朴。而其因地制宜的自由布局,无拘无束的立面造型,使得整个建筑更像一座与大地紧密相连的村镇教堂,雄踞于陡崖之上,成为周围环境的景观控制点。”^[60](图 4-1-49,4-1-50,4-1-51,4-1-52)

江苏路福音教堂建筑形式堪称完美,充分体现了德国建筑崇尚自然,追求精致完美的特征。建筑取不对称构图,自由布局,从各个方向观赏都形成完美的构图。建筑材质则取法自然,采用天然材料:红陶瓦、黄粉墙、自然形态的蘑菇石。尤其是石料的使用,自由活泼,不拘一格,粉墙之上点缀石料,往往构成一幅绝妙的抽象画,鬼斧神工,令人击节。相比之下,1934年建造的浙江路圣爱弥尔教堂在这方面就略逊一筹。圣爱弥尔教堂按青岛建城初期的城市规划要求建于观海山西小岭上,德人毕娄哈设计,拉丁十字形平面,正立面朝南,是哥特式教堂与罗马风教堂的混杂风格,主厅高 18 米,做井字假梁,两廊做十字拱吊顶,又混杂了文艺复兴建筑的设计手法,称为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应当是恰当的。圣爱弥尔教堂装修从简,细部处理的精致程度远逊于江苏路福音教堂。但圣爱弥尔教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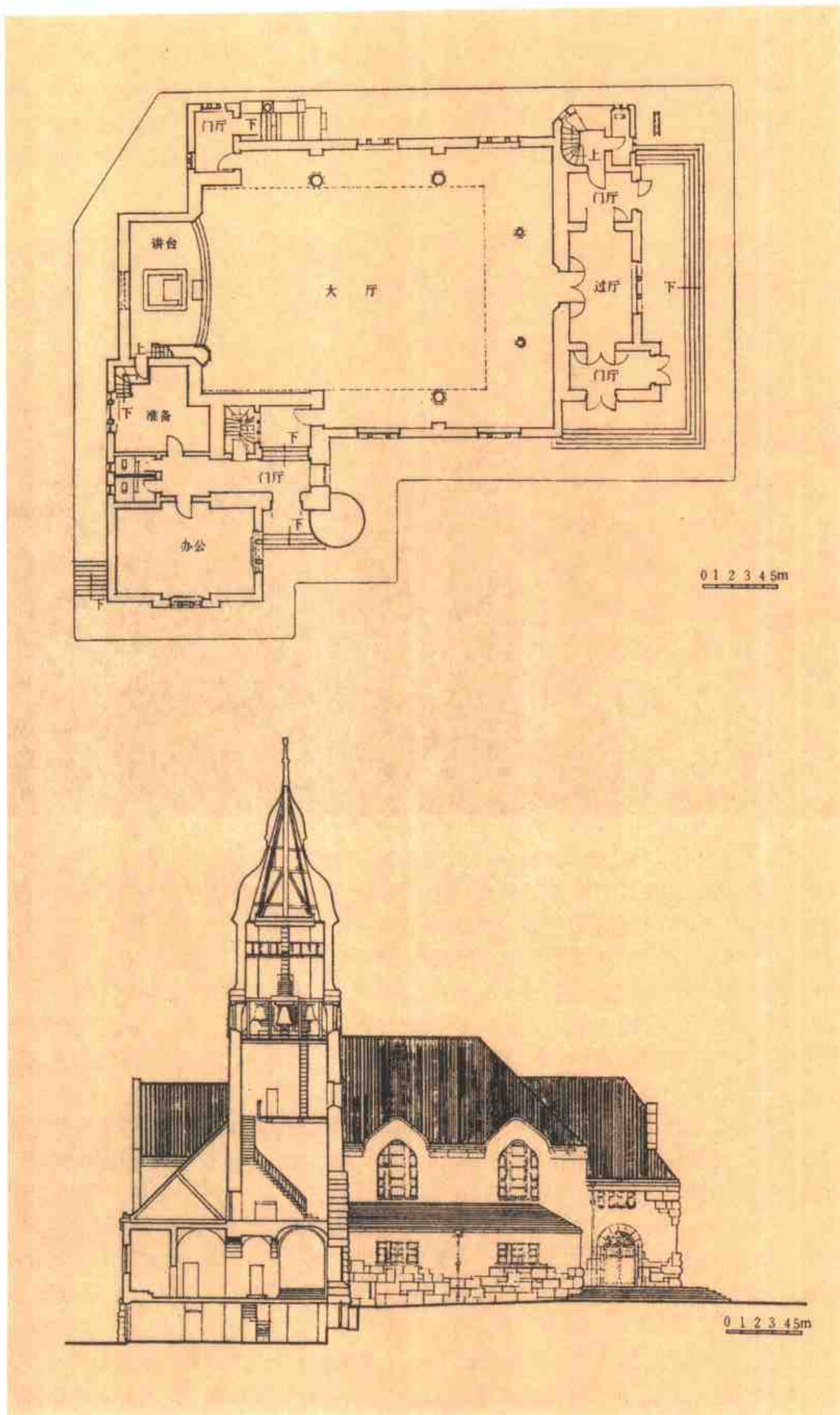


图 4-1-49 青岛江苏路福音教堂平、剖面图。上图：平面图，下图：剖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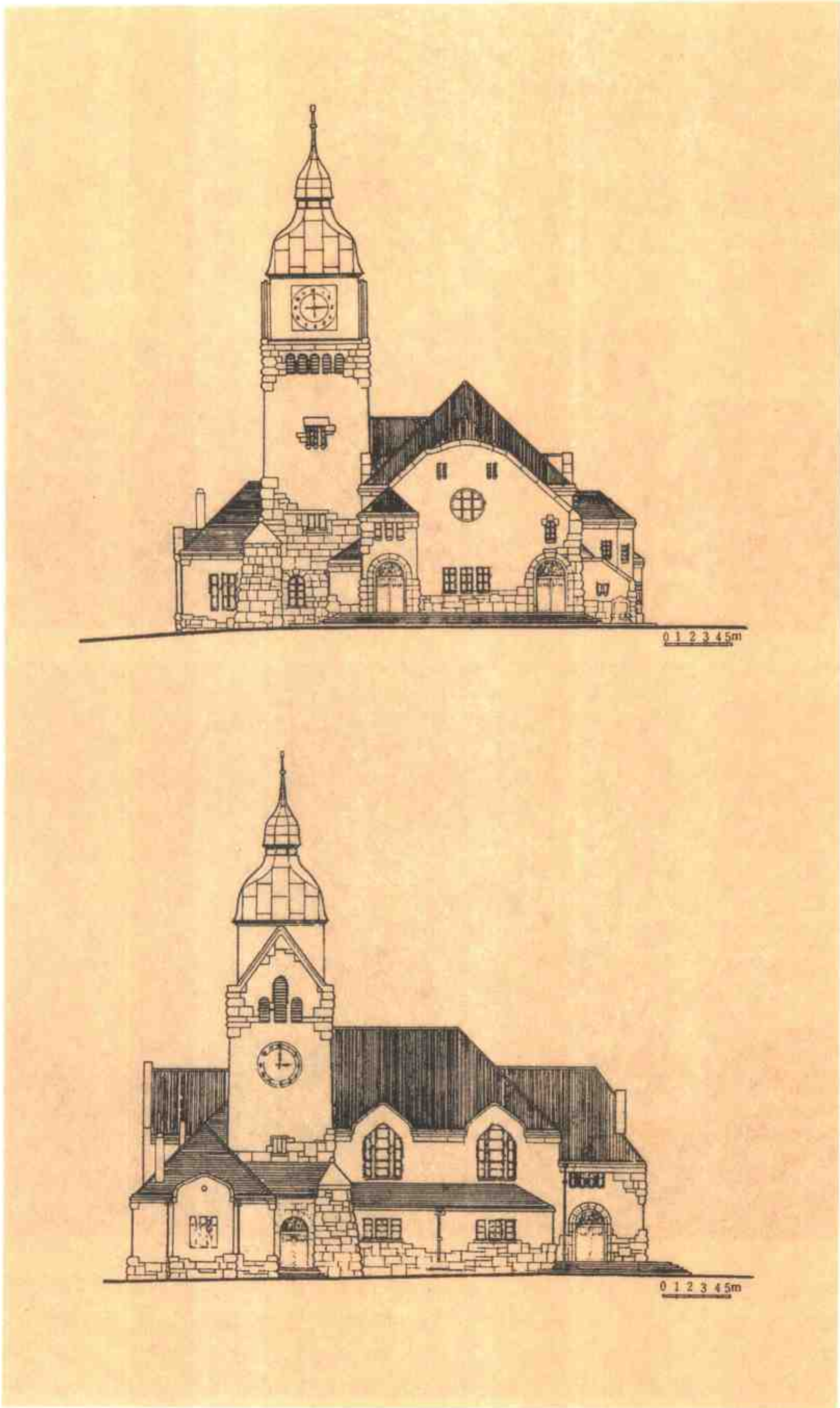


图 4-1-50 青岛江苏路福音教堂西、南立面图。上图：西立面图，下图：南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图 4-1-51 远望青岛江苏路福音教堂。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0 年。



图 4-1-52 青岛江苏路福音教堂近景。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0 年。

址甚佳,位于城市中心的制高点观海山西小岭上,教堂双塔耸起,高 89 米,因在早期城市规划中注意标志性建筑的对景处理,使之成为青岛近代城市空间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与山形地势融为一体,亦成为浙江路、肥城路的对景建筑,这使圣爱弥尔教堂成为城市景观的焦点,其建筑单体的风格混杂与细部处理的简略已退居次位。^[69](图 4-1-53,4-

1-54,4-1-55)圣爱弥尔教堂是中国近代城市中城市规划的成功导致单体建筑成功的典型实例,对一个城市来讲,城市的总体景观构成远比单体建筑的争奇斗艳要重要得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一城市建设的基本观念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与足够的重视。

最后,还要论述的是东正教的传入及东正教堂建筑。“东正教,又称正教或希腊正教,是在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正式分裂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称的,正教意为正宗的教会。十六世纪末莫斯科设立大主教后,逐渐形成俄罗斯正教,……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力,除主教外,一般教士可以结婚。东正教有自己的崇拜仪式,但在宗教的基本教义方面与天主教大致相同。”^[70]1685年,康熙出兵收复雅克萨,将战俘押回北京与盛京(今沈阳)。北京的战俘安置在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赐以旗人待遇,并将一座关帝庙赐给他们。战俘中的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将其改为东正教堂,称索菲亚教堂,又称尼古拉堂,北京百姓俗称“罗刹庙”。1716年,第一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到达北京,传教士团具有沙俄政府驻北京的外交机构与传教士团的双重身份。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为沙俄外交代表,并在东江米巷(后称东交民巷)拨地建“奉献节教堂”,又称俄罗斯“南馆”。这一时期传教士团的传教工作很少进展,“从1712—1860年近150年间中国东正教会只建立了13座教堂,总共有155名传教士来华工作。北京是惟一传教中心,信徒不满200名,其中还包括一些雅克萨战俘的后裔。”^[71]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可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同年,传教士团与俄国外交人员分离。但直至1900年以前,传教士团的工作仍以翻译《圣经》,研究汉学及收集情报为主。“到19世纪末,东正教在北京以外,只在汉口和张家口兴建了两座教堂,受洗的信徒不超过500人。”^[72]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与张家口的东正教堂全被焚毁。从1902年开始,东正教的传教事业有所进展,1916年全国东正教徒达5587人。但东正教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还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其时,大批白俄教徒



图 4-1-53 青岛圣爱弥尔教堂。照片由作者摄于1990年。



图 4-1-54 青岛圣爱弥尔教堂近景。照片由作者摄于1990年。



图 4-1-55 青岛圣爱弥尔教堂大门。照片由作者摄于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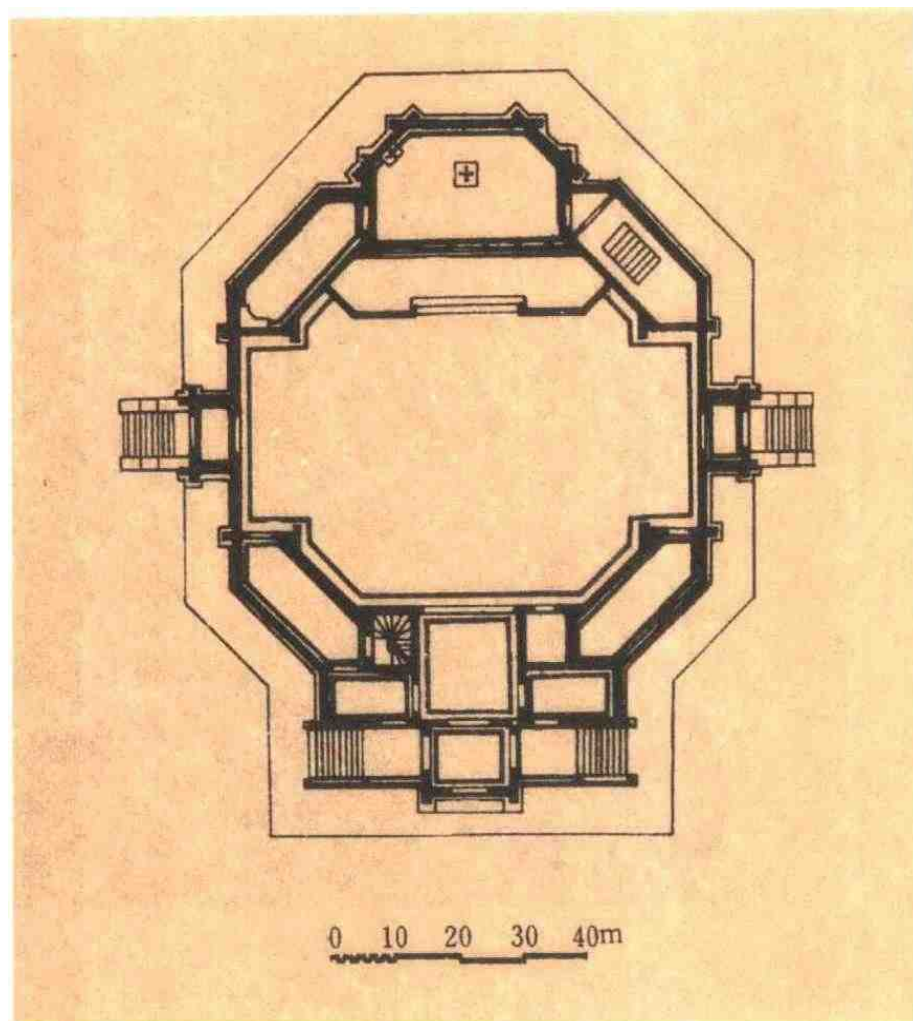


图 4-1-56 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流亡国外，中国东正教会接受和安排了流亡到中国的白俄教徒。1917年以后，中国的东正教徒猛增至30余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侨民，中国人很少，中国的东正教会基本上是一个侨民教会。这些俄国侨民多数居住在哈尔滨，也有一部分居住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满洲里、大连、青岛、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在这些城市中，陆续建造了一些东正教堂。

哈尔滨是东正教堂建造最多的城市。喇嘛台广场（今博物馆广场）地处南岗岗顶，在市区地势最高，是以教堂为中心的广场。哈尔滨建城初期，即于1901年在此建造圣·尼古拉教堂，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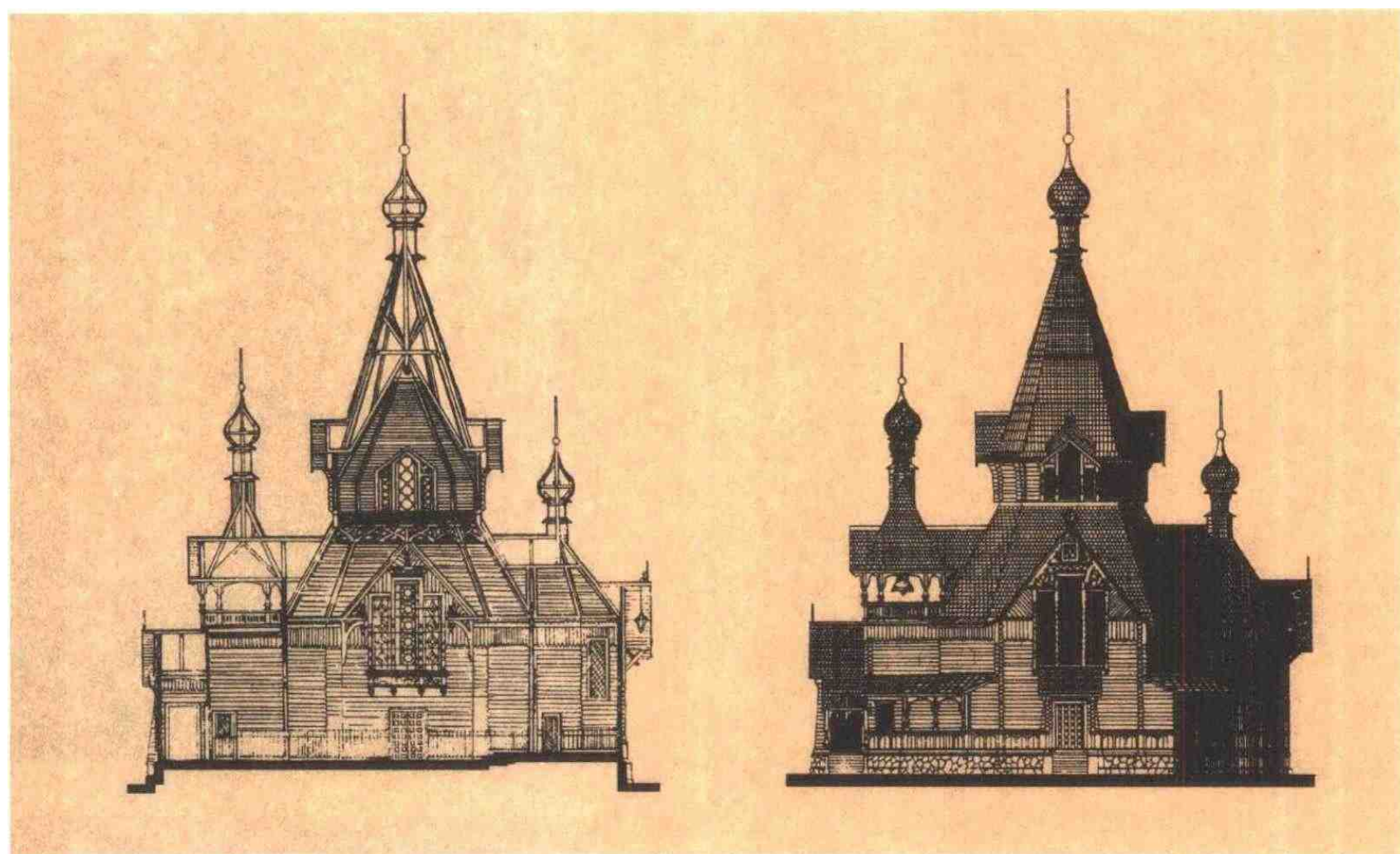


图 4-1-57 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剖面图、立面图。左图：剖面图，右图：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图 4-1-58 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历史照片。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边形平面，墙身为井干式原木墙，木结构，中央大厅之上是巨大的帐篷顶，顶上冠以洋葱头式穹顶，是仿十五六世纪俄罗斯木构教堂的俄罗斯风格教堂建筑。教堂建于城市的制高点，居于广场中心，成为城市重要的景观建筑，惜已拆毁。（图 4-1-56, 4-1-57, 4-1-58）同是木构东正教堂，1908年建造的乌斯平卡亚教堂则小巧精致，另有一种风韵。乌斯平卡亚教堂原为外侨公墓

圣母安息教堂,规模很小,但造型别致,细部处理精致而夸张,檐口与屋脊饰以镂空的木雕花饰,属俄罗斯民间木构建筑风格。建筑西面入口处及中厅顶部原来都冠以洋葱头式穹顶,今已不存。(图 4-1-59)除木构教堂外,俄罗斯建筑砖工精致,多用清水砖墙,并用砖砌成各种花饰,这一特征在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得到充分体现。“圣·索菲亚教堂原为沙俄侵华军队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的随军教堂。始建于



图 4-1-59 哈尔滨乌斯平卡亚教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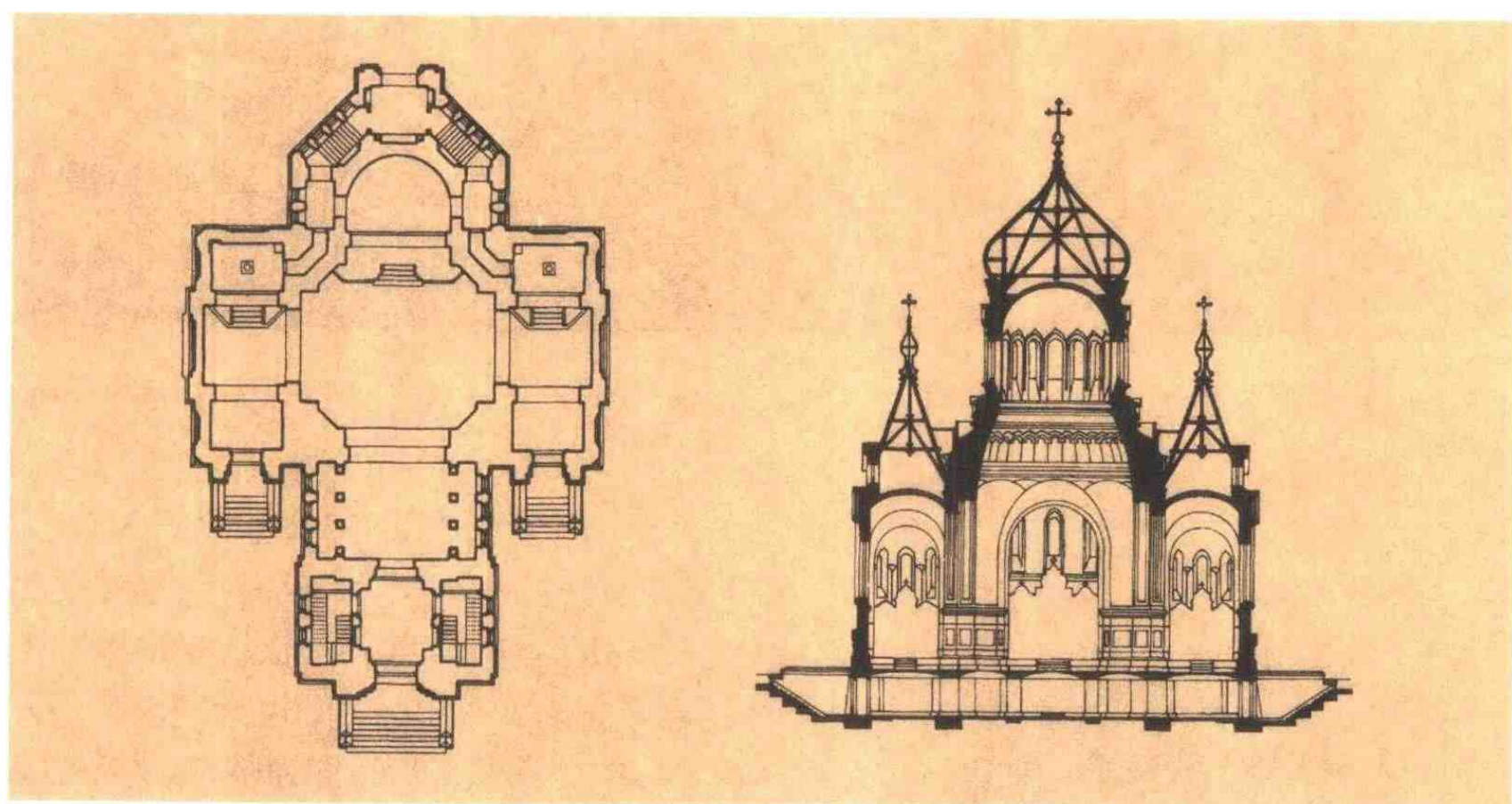


图 4-1-60 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平面图、剖面图,左图:平面图,右图:剖面图。原图载常怀生,李健红,《圣·索菲亚教堂——哈尔滨建筑艺术馆》,载《建筑学报》1998年3期。

1907年3月,位于今哈尔滨市道里区北麟街91号,原为随军简易小教堂,同年由俄国茶商伊·费·赤斯佳科夫出资,在随军小教堂基础上重新修建一座全木结构的教堂。1912年改建,仅在原教堂外缘包砌一皮砖,形成砖木结构教堂。军队撤离后,该教堂捐赠给哈尔滨俄罗斯东正教徒。1923年9月27日该教堂再次重建,并迁移至现址道里区透笼街北侧,由俄国建筑师考西亚科夫设计,历时10年于1932年11月25日落成。新落成的教堂为清水红砖砌筑的砖石结构,屋顶采用铁皮屋面刷绿色油漆,规模不算太大,但却是哈尔滨乃至远东地区影响最大的东正教教堂。”^[73]圣·索菲亚教堂为拉丁十字形平面,主入口朝西,南北两翼亦设西向耳门,南北宽约28米,东西长约42米,至穹顶高度48



图 4-1-61 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冯健摄,原图载《建筑学报》1998年3期。



图 4-1-62 哈尔滨布拉维音斯卡亚教堂历史照片。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图 4-1-63 上海亨利路(今新乐路)俄罗斯东正教堂。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图 4-1-64 上海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东正教分会教堂。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米。教堂内设三个礼拜厅,主厅居中,南北两翼各设一个小礼拜厅,方向亦坐东朝西,东部设小祭台。教堂建筑面积 721 平方米,可容 1500 人,全部用清水红砖砌筑,主体部分为纵横相交的筒拱结构,中央穹顶下由四个大砖垛支撑外径十米的圆形鼓座,鼓座之上是巨大的洋葱头式穹顶。正门之上有八边形砖砌钟楼,其上为帐篷顶尖塔,尖塔之上亦冠以洋葱头式穹顶。其余三门同样处理,只是尖塔与洋葱头式穹顶的高度低于正门,以突出主入口。圣·索菲亚教堂造型优美,形体丰富,砖工精致,是哈尔滨东正教堂建筑中的精品。^[74](图 4-1-60,4-1-61)

哈尔滨道里区友谊路还建有布拉维音斯卡亚教堂,是一座受拜占庭建筑影响的俄罗斯东正教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今已拆除。(图 4-1-62)

上海于 1931 年在亨利路(今新乐路)建造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平面为方形,墙身较厚,仅开小窗,四面塔楼都在圆形鼓座之上耸立洋葱头式铜皮穹顶,中央大厅圆形鼓座之上则是统率建筑整体构图的巨大的洋葱头式铜皮穹顶。(图 4-1-63)高乃依路(今皋兰路)还建有东正教分会教堂,也是较典型的俄罗斯风格教堂。^[75](图 4-1-64)

三、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另一条渠道——殖民式建筑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另一条渠道是早期通商渠道——随中西通商事业的发展进入中国的殖民式建筑(Colonial Style)

产生于北美洲的殖民式建筑源于早期来到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76] 他们把欧洲的文化带到这片新大陆,这种移民文化因新大陆完全不同于欧洲诸国的地理、人文条件而产生变异,并不完全是其母国文化的翻版。“新大陆在殖民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自然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植。诚然,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发生变化。文化不仅被采纳,也被改变。”^[77] 美国在独立以前,由不同国家的殖民者建造的房屋多沿袭欧洲样式,主要是英国样式,这是早期北美洲的移民文化在建筑领域的反映,称为殖民式建筑(Colonial Style)。关于北美洲的殖民地风格建筑(即殖民式建筑),陈志华如是论述:“英国的移民大多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他们熟悉的是中世纪以来民间的木构架房屋和简单的砖石建筑。在遍地密林的北美,他们起初也造木构架房屋,但当地冬季气候凛冽,为防风,渐渐流行在整个房屋外面钉上一层长条木板。木板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辉,温暖而愉快。于是,欧洲木构架房屋的风格失去了,形成了新的风格。18世纪,美洲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移民大大增加,并且发生了剧烈的阶级分化。当一些富裕的移民建造阔绰的府邸时,采用当时英国的古典主义和帕拉第奥主义。新的英国工匠和建筑图籍来到新英格兰。但是,这些房屋绝大多数还是用木材建造。起初,用木材一丝不苟地做古典的檐口、柱子、线脚、隅石和重块石,甚至用木板做成发券模样。但是木结构同古典外衣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后来,建筑样式终于发生了适合于木材特点的变化:柱子细了、小了,开间宽了,檐口和线脚薄了、简化了,一条贴边木板代替了隅石,墙面也有钉条板的了。于是,这类府邸又有了相当稳定、一贯而且特色鲜明的风格,得名为殖民地风格(Colonial Style)。它的极盛时期在18世纪中叶。”^[78]

欧洲殖民者侵入亚洲,也将欧洲样式的建筑带到亚洲,这些建筑同样在移植的过程中产生变异,融会了当地的建筑文化,已经是适应当时、当地条件的新的建筑类型,这就是产生于亚洲的殖民式建筑。亚洲的殖民式建筑首先产生于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但是按目前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很难对亚洲殖民式建筑的起源,及亚洲殖民式建筑与北美洲殖民式建筑的关系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姑存疑。18世纪的亚洲与北美洲完全不同,1763年以后,欧洲诸强国“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79] 在亚洲国家之中,中国是最后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广大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水平比西欧要落后,在近代化的暴风骤雨降临西欧时,它们受到殖民主义的侵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在重炮和商品的双重打击下,亚非各民族纷纷败下阵来,经历了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不相同,它距离西欧最遥远,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它是最后一个被西方殖民主义攻陷的封建堡垒。17世纪,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抵抗住了来自海上和陆路的殖民侵略,即中荷之战,郑成功驱逐荷兰出台湾;雅克萨之战,康熙把俄罗斯阻挡在黑龙江以外。两次战争,中国保持了领土、主权、尊严。18世纪,中国仍是统一的强大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均有长足的进步,西方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悄悄地插进中国,但无论哪一个尚不敢设想以武力征服中国。”^[80] 正是因为这个时间

差,西方殖民者首先进入印度及东南亚国家,殖民式建筑也首先在印度及东南亚国家产生。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炎热的气候与寒冷的北美洲完全不同,殖民式建筑也形成适应炎热气候条件的一面、两面、三面或四面都有外廊的建筑模式,外廊进深很大,可以作为室外起居室、客厅或餐厅使用,简单的或稍有变化的矩形平面,简单的西式四坡屋顶,与北美洲的殖民式建筑有很大差别。

将亚洲的殖民式建筑与北美洲的殖民式建筑作一比较,除建筑形式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建筑功能的差异。北美洲的殖民式建筑是移民的住宅,亚洲的殖民式建筑则大多数已经变成商务、政务办公与住宅建筑的综合体。早期中国近代建筑的各种建筑类型,以洋行为主,包括银行、俱乐部、领事馆等都采用了这种建筑模式,这与作为冒险家来到亚洲的早期殖民者快速发财的投机心态及因此形成的人员构成密切相关。早期来到亚洲的这些冒险家都是年轻人,身体健壮,大多数没有家庭,独身在外,在开埠初期的上海也是如此。“这时节上海的外国商业还在初创之时,一切都需要精神和气力去建立,此外则卫生方面的危险很多,不是身体十分强健的人,便不能抵抗疾病,所以不能不选一班年轻力壮、敢作敢为的人士来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们并且大都是独身未娶的人,因为这时的上海还不宜于西方妇人的居住。实则至今依旧是不宜的。其时各商行的助理职员年纪更轻,他们也都是由本国机关特加选拔的,在体格和才能上并不亚于那批大班,因为在紧急的当儿,他们须代替大班的职务,所以对于人选,不能不格外慎重。”^[81]一群年轻的单身汉,需要的只是集办公与居住功能于一体的建筑,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对建筑只求简单实用,殖民式建筑正是适宜的建筑模式。

中国早期标准模式的殖民式建筑,其基本特征是:简单的方形平面,单层或二三层建筑,多数是商务、政务办公与居住综合体建筑,有着宽敞的一面、两面、三面或四面外廊,简单的西式四坡屋顶,在总体环境上的特征则是占地面积很大,建筑居中,周围是空地。藤森照信将这类建筑称为“外廊样式”,突出的是建筑形式的外在特征——外廊,本书称为“殖民式建筑”,突出的则是建筑的社会人文内涵——包含于建筑形式之中的社会人文背景。同一种建筑的不同名称,见仁见智,代表了各自的学术观点与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观念,“殖民式建筑”这一名称,正是建立在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观念——把中国近代建筑史置于近代中国剧烈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中,把中国近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大背景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的人文建筑史观的基础之上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数十年,英美殖民者就开始利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培养熟悉中国语言,也熟知中国民俗文化的人才,《旧中国杂记》一书的作者美国人亨特 1825~1826 年就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亨特的书中多次提到“有游廊”的房子,也就是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式建筑,包括住宅,也包括商业公司。在新加坡,“向约翰逊公司(Messrs.A.L. Johnson & Co.)的办事处递交了我的介绍信之后,该公司的合伙人里德(Christopher Read)在他的有游廊的平房接待了我。”“约翰逊的私人住宅也在这里。……这些住宅都很宽敞,有两层楼,周围有宽阔的游廊;整个房子正好建在花园中间的位置。”^[82]“政府办公处是一座很大的平房,旁边竖着旗杆。房子宽敞而明亮。从这里望出去,景色迷人。……在它那宽敞的房间里用餐,地板铺着垫子,乐队在游廊上演奏,房顶上挂着布风扇。”^[83]亨特所描述的挂在房顶上的“布风扇”是一种人工拉动扇风的装置,上海人谓之“拉风”。^[84]在马六甲,亨特读书的英华书院“是一座两层楼的宽敞建筑物,周围有宽阔的游廊。它坐落在一个广阔的院落中间,院落前边有公路通过。”^[85]亨特在书中还这样从整体上描述马六甲的建筑:“古老的葡萄牙房屋几乎全部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他们的继承者荷兰人的宽敞方便的大房子,数量很多。这些房子有宽阔的门廊,可供全家晚上坐在那里纳凉。这些荷

兰家庭常在晚上招待客人,一些人在室内、一些人在门前的游廊里或者在可以俯瞰海湾的花园里。”^[86]“比较高级的房子里住的是荷兰人,这些房子在白天通常关着,不让阳光和热气直接进入。窗上遮着百页窗帘,门分为两截,上半部有‘牛眼睛’透入光线,就像纽约荷兰移民的后代的旧房子那种式样。有的房子还是用从荷兰运来的砖头建造的。”^[87]炎热的气候使白天遮阳,晚上通风成为建筑的基本功能,外廊与百叶窗都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建筑手段,亨特亲身经历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东南亚地区殖民式建筑真实的原始记录。

殖民式建筑在前近代时期进入中国,最早是在澳门。如本书第三章所述,葡萄牙人于1557年用贿赂手段获准在澳门居留,随后大兴土木,在半岛南面海岸建成一条街,俗称澳门街。广东十三行的设立,按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最早是在1685年,即1684年清廷开放海禁的次年——粤海设关之年,这已经比葡人获准居留澳门的1557年晚了128年。所以殖民式建筑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557年葡人获准居留之后的澳门,128年之后,1685年,广东十三行设立,广州珠江江畔的十三行街才开始建造殖民式建筑——十三夷馆。

亨特是经常到澳门去的,所以他记述从广州的十三行去澳门的手续很具体:“澳门自1762年以来,一直是广州的外国侨民的避暑胜地。这里也像在广州一样,按例要‘担保’,而且得讲明允许逗留多久;但如果要延长是不成问题的。我本人的‘保人’是巴雷托(Señor Bartolomeo Barretto),他的家族世代居住澳门,很有信誉。”^[88]亨特书中有关澳门建筑的记载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在澳门,“由于可以躲避猛烈的台风,内港是葡萄牙人最早的居住地。他们的许多宽敞的房屋一直保留到今天。(引者注:指亨特著书之时)。这些房屋很大,有两层:上面一层环以宽阔的阳台,以供家人居住之用;下层则适合于作商务办事处,用来贮存货物的货栈,或作仆役和苦力的住处。”^[89]文中言建筑的二层“环以宽阔的阳台”,既然环建筑都有阳台,那已经不是阳台而是外廊了。这与本书第三章所引屈大钧《广东新语》,及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中有关澳门外人住宅、商馆的记载大体相符,“己居楼上,而居唐人其下”,“又为土库,楼下以殖百货”,建筑是商务、住宅的综合体,商人家人居于楼上,一层供仆人居住与贮货。

广州的十三行商馆“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从一条纵穿底层的长廊通入。通常底层都作库房,华籍雇员办公室,仆役室,厨房,堆栈等之用;上一层包括账房间,客厅和饭厅;再上层是卧室。”^[90]“各商馆占的空地都有限,连花园和运动场在内,长约一千一百英尺,一般深度约七百英尺;但是每个商馆的房屋设备却都很宽敞,一个商馆的普通深度达四百英尺以上,房屋正面平均约八十五英尺。”^[91]十三行商馆房间面积很大,“1832年元旦的一次宴会中,在英国商馆的宽敞饭厅里,席面上坐了一百位客人。”^[92]与早期澳门的殖民式建筑相比,两者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但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受地形所限,每座商馆只能占用面宽很窄,进深却很大的一块基地,这使十三行商馆只能在面宽八十五英尺(约26米),进深四百英尺(约122米)的基地上建造商馆建筑,所以其总平面布局与前文所引亨特书中所述“整个房子正好建在花园中间的位置”的东南亚国家的殖民式建筑,及后来上海早期的殖民式建筑都不相同。十三行商馆的总平面布局是“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从一条纵穿底层的长廊通入。”这条纵向长廊解决了进深很大的商馆建筑的交通问题。亨特《旧中国杂记》如是记载:“有一年的贸易淡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番巴臣(Senn Van Basil)去了澳门。他的行号几乎没有人了,只有一名守门人住在一号的底层看着。由于这家行号有个日开夜闭的后门通着十三行街,外国人去拜访行商或者到木匠广场去,常常把这个门当作通道;这样可以不必白白走过差不多整整一条街——有名的新豆栏街。”^[93]与十三行商馆的平面图对照,可知十三行商馆中的小溪馆、荷兰馆与新英国馆连成一片,要从这几家商馆到十三行街东的木匠广场(外国商馆东面的一排两层楼的中国

店铺)去,走新豆栏街就要绕道,所以为走近道常有人从荷兰馆穿行。如上所述,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殖民式建筑是因用地限制已经产生变异的殖民式建筑。

鸦片战争以后殖民式建筑进入中国,首先是在1843年辟为商埠的上海。其时率先进入中国的是传教士与商人,前者的目的是将西方基督教文化强加于中国,后者的目的则是开辟中国市场。早期在上海英人居留地居住的外国人很少,最早建造的建筑由外国商人自行设计,中国工匠建造。“1843年,上海市区因驻有英国军队,外侨人数增至100名,1844年又下降到50名;但是1849年,侨居上海的外国商人、传教士、领事馆职员增加到175名。这些外国侨民沿着蜿蜒曲折的小河浜,筑造租界内最早的道路。最早的洋房,便是沿黄浦江外滩,靠陆地一边,面积约二三英亩的场地上的一所大宅院,其中仓库和住房集合在一起。没有外国建筑师可供利用;图样由外国侨商自行绘制;又为了适合就地取材和中国技术而由中国营造商加以修改,因而这样起造的房屋结构,图样极为单纯。这些场地靠黄浦江一边,有一所完全正方形的平顶房,其中包括卧室、食堂和办公室。为了挡住夏天的阳光,尽可能保持室内的阴凉,泥塑或本地砖砌的墙壁至少有三英尺厚,外面粉刷得雪白,底下两层楼外面周围是配置着大拱门的敞开游廊,挑出的屋檐掩盖着顶上的两层或三层。场地后面,通常有四五个仓库(为堆存各种货物之用),中国籍助理人员的寓所,买办(主要的中国助理或代理人)的住宅和办公室,还有若干马棚。过了几年,砖头开始从英国装载轮船运到上海,在面向外滩的游廊拱门上突出地展示的砖砌工事(引者注:原文如此),正提供了为外国货换取中国的大量茶丝而探索中国市场的一种象征。这种为十九世纪华中和华南的一切通商口岸所共有的建筑风格,被机智而适当地称作‘康百拉都式’(Compradoric),因为它必然是营造方法上的中西合璧。”^[9]罗兹·墨菲描述的上海开埠后英人居留地最早的洋房还是很不正宗的平屋顶带有外廊的建筑,很厚的上筑墙或本地青砖墙,几年后才从英国装载轮船运来英国砖,建造早期的殖民式建筑。开埠初期进入上海的商人不多,他们建造的洋行都是殖民式建筑,建在黄浦江边的外滩,“白种人的房屋都造在黄浦的岸边,不过都在沿边留出十余丈的空地以便苦力可以起卸船上的货物,并容民船上拉纤的人可以通过。当时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极其简单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种植各种花树。上海的泥土本来很肥沃,因此一种下去便十分繁盛,加以上海的天气很好,一年之中,晴朗的日子为多,所以环境非常之舒服。当时白种人所造的房子,其内容差不多是一律的:楼下大都是四间大房间,以供办公和会客之用,楼上则做卧室;房子的前面,上下层都有阳台,以便傍晚时可以闲坐着,喝喝威士忌,望望黄浦的景致。中国人对于这种房屋的式样都很称赞,不过以为前面何必装着那么许多窗户^[10]。”(图4-1-65,4-1-66,4-1-67)《上海近代建筑风格》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同一绘画作品的早期摹摄照片认定为1849年的上海外滩。图中后来江海北关位置处的中式建筑是早期江海北关的前身,原为1843年上海道宫慕久设立的西洋商船盘验所,1846年裁撤,但留下一栋中式建筑,顶部设一小塔楼以监视黄浦江上的船只。1857年江海北关迁入此楼时增建了两翼(参见《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34页,第46页)。此画中的江海北关前身建筑尚无两翼,仍保持1857年江海北关迁入此楼前的状况。画中沿黄浦江建造的多是早期的殖民式建筑,简单的方形平面,两层建筑,有着宽敞的外廊,占地面积很大,建筑居中,周围是空地。这些建筑多为简单的西式四坡屋顶,也有早期的平屋顶建筑,可证罗兹·墨菲的描述。甚至有采用中式歇山顶者,当是中国工匠的杰作。从放大的殖民式建筑局部图可见四坡顶二层殖民式建筑、平屋顶二层殖民式建筑及中式歇山顶二层中西合璧的“殖民式建筑”,早期上海的殖民式建筑要使用本地的工匠与本地的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并不是纯正的殖民式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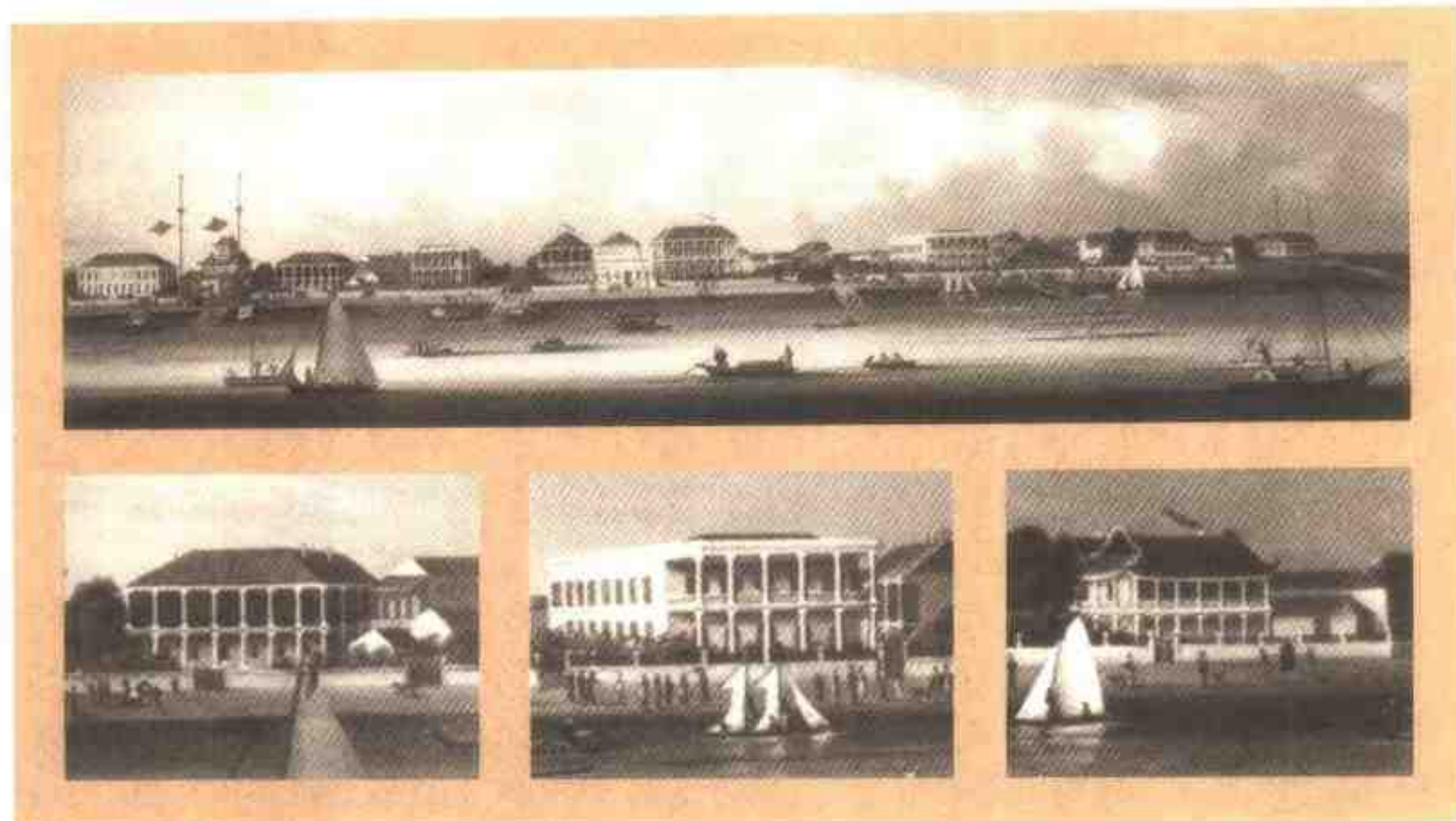


图 4-1-65 绘画作品《黄浦江上的赛艇》及放大的殖民式建筑局部图。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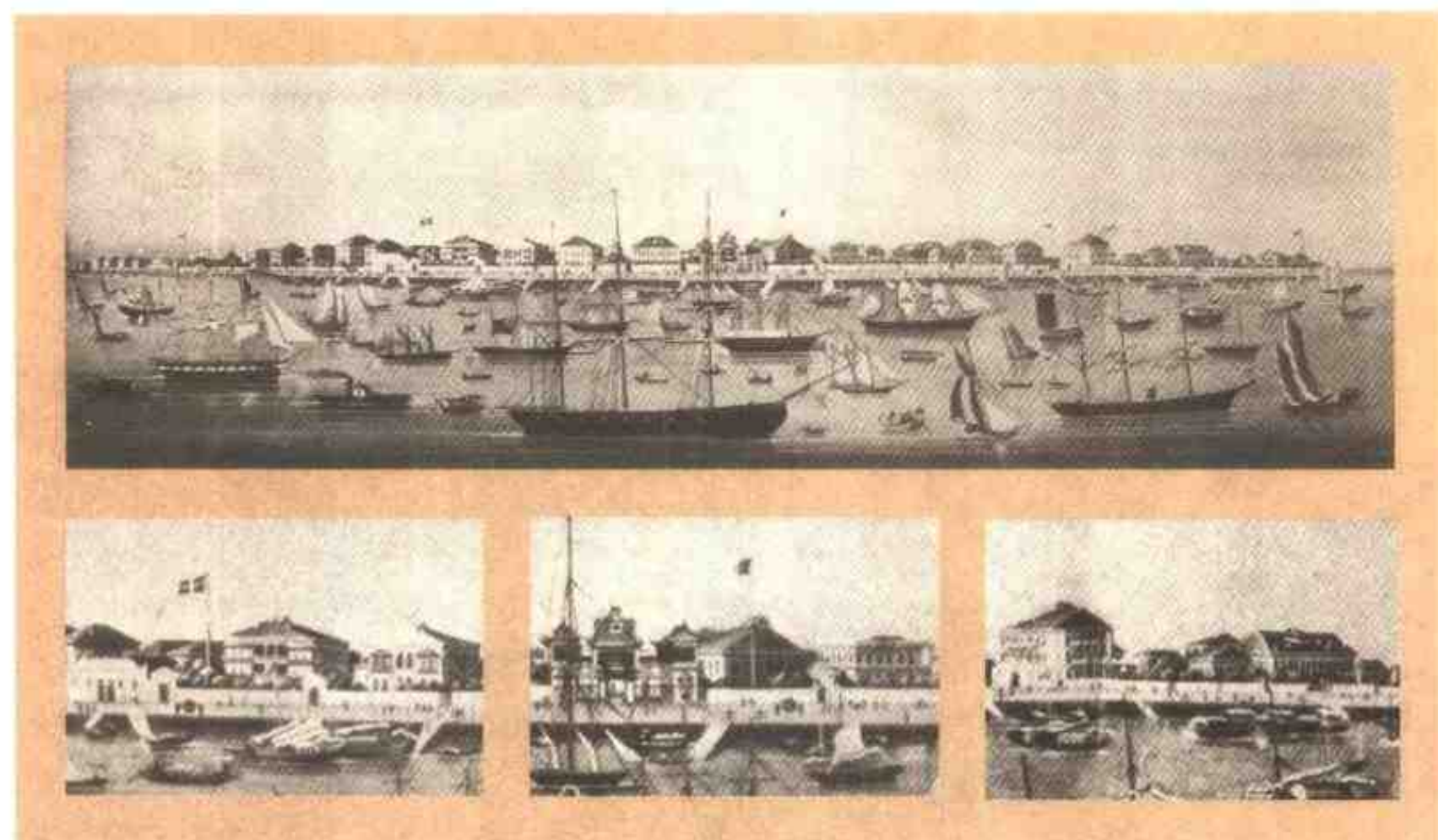


图 4-1-66 绘画作品《1857 年上海黄浦滩全景》及放大的殖民式建筑局部图。此图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之译者考证绘制的《1857 年上海黄浦滩全景》图中的建筑、桥梁及外国兵船名称一览表见本书第二章 原图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图中可见江海北关已增建了两翼，上海外滩已建有多栋三层殖民式建筑，中式歇山顶建筑已经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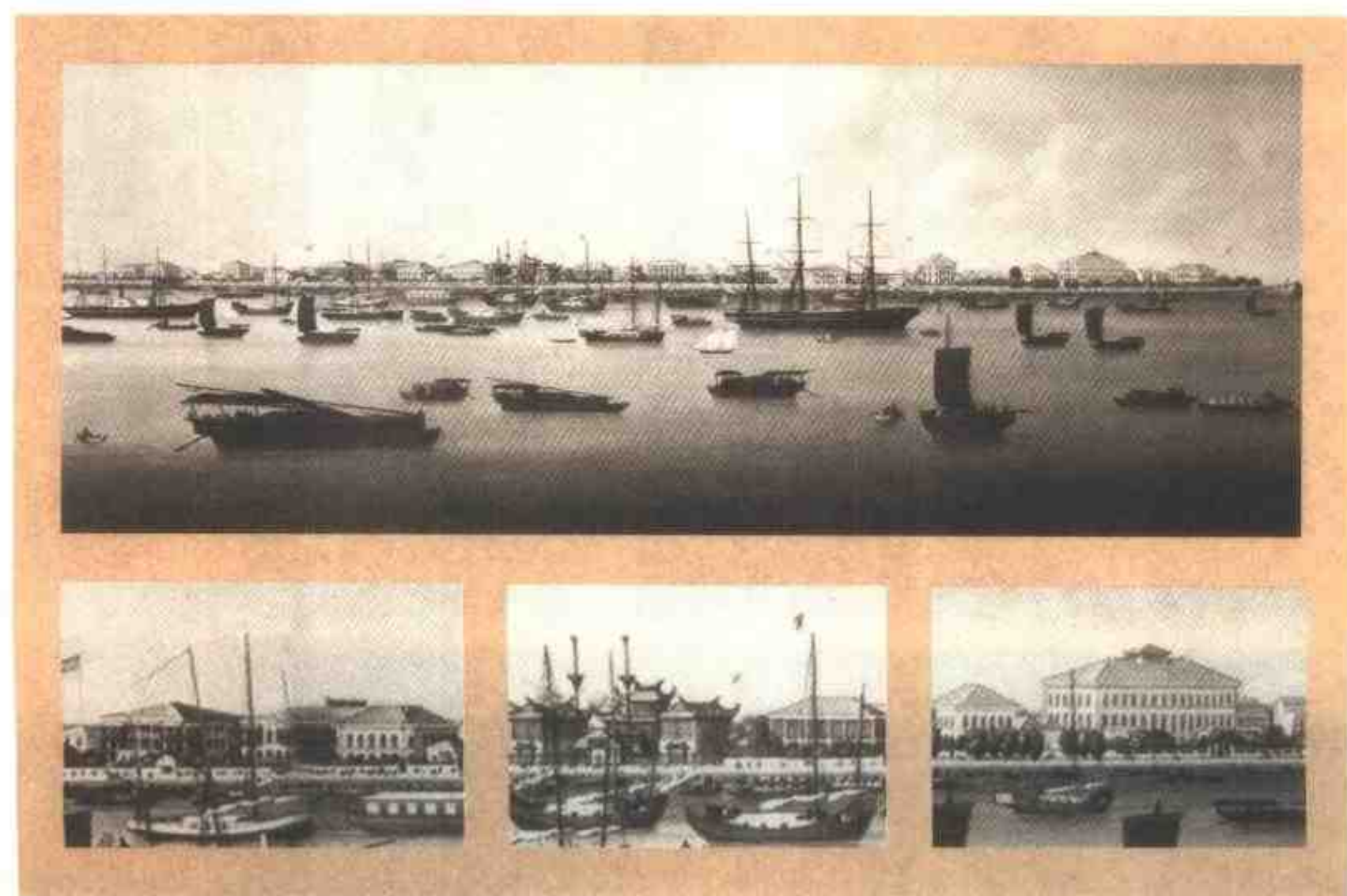


图 4-1-67 绘画作品《黄浦江外滩风光》及放大的殖民式建筑与江海北关局部图。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图中的江海北关已增建了两翼，应当是 1857 年江海北关迁入后的上海外滩，与上图一样，图中上海外滩已建有多栋三层殖民式建筑，中式歇山顶建筑已经消失。

开埠初期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将印度与东南亚一带的殖民式建筑搬到上海,但是这种建筑宜夏不宜冬,并不适应上海的气候条件。在纬度更高的北方商埠城市天津,开埠之初在租界区内建造的也是这种殖民式建筑。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迁人租界居住,租界区建设速度加快。沿海河西岸修筑了河坝及平坦的沿河大道,建造码头,修筑与海河垂直的中街(今解放北路)。海河沿岸及中街两侧陆续建造了一些建筑,这些建筑多已无存。据记载,当时“重要官员、领事及较大的洋行的房屋,通常都造得很坚固。这些房屋中一部分大抵模仿香港的,但是香港的建筑形式却是从印度传来的。结果常常是房屋内部宽敞,家具充裕,宜于夏天居住,但一到冬天,却使人一看就感到寒意。”^[16]这些房屋就是天津早期建造的殖民式建筑,与上海相比,天津冬天的气温要低得多,夏天需要在外廊上活动的时间很短,殖民式建筑的外廊已经完全失去原有的功能。

殖民式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普遍应用于洋行、银行及领事馆等建筑类型的建筑模式,随着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建筑类型逐渐齐全,各类建筑分工渐趋明确,早期殖民式建筑商务、政务办公与居住一体化的功能混杂现象也随之消失,1900年以前,殖民式建筑已逐渐为正宗的西方建筑所取代。殖民式建筑是仅仅存在于前近代时期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的一种过渡式的建筑类型,存在的时间很短,主要分布于最早开辟租界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城市,在一些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如厦门、芜湖、重庆、宜昌,烟台、汕头等也有少量建造。(图4-1-68,4-1-69,4-1-70)

广州的殖民式建筑集中建造于沙面租界区,其中英租界面积占沙面租界区的五分之四,起步较早,殖民式建筑建造较多;法租界面积只占沙面租界区的五分之一,起步很晚,殖民式建筑的建造要少一些。武汉的汉口租界区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只有英租界一国租界(1895年以前),面积很小,发展也不充分,所以殖民式建筑的建造也不多。天津是中国除

上海之外外国租界区面积最大、发展最充分的近代城市,但天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焦点城市,1860年与1900年两次被帝国主义侵占,早期建筑许多毁于战火,实地考察,寻访早期遗存的殖民式建筑是很困难的。(图4-1-71)上海开埠最早,殖民式建筑建造较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因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实行“东南互保”政策,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17]这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上海租界区没有受到战争影响,19世纪建造的建筑得以完整保留,除早期建造的殖民式建筑因更新换代多被拆除外,19世纪80、90年代的殖民式建筑保存要多一些。

图4-1-68 厦门鼓浪屿中华路2号原海关住宅。原图载《鼓浪屿建筑艺术》。



图4-1-69 宜昌遗存的殖民式建筑。照片由作者摄于1994年。





图 4-1-70 1879 年的绘画作品《从岩石眺望汕头港》及放大的殖民式建筑局部图。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画中可见二、三层殖民式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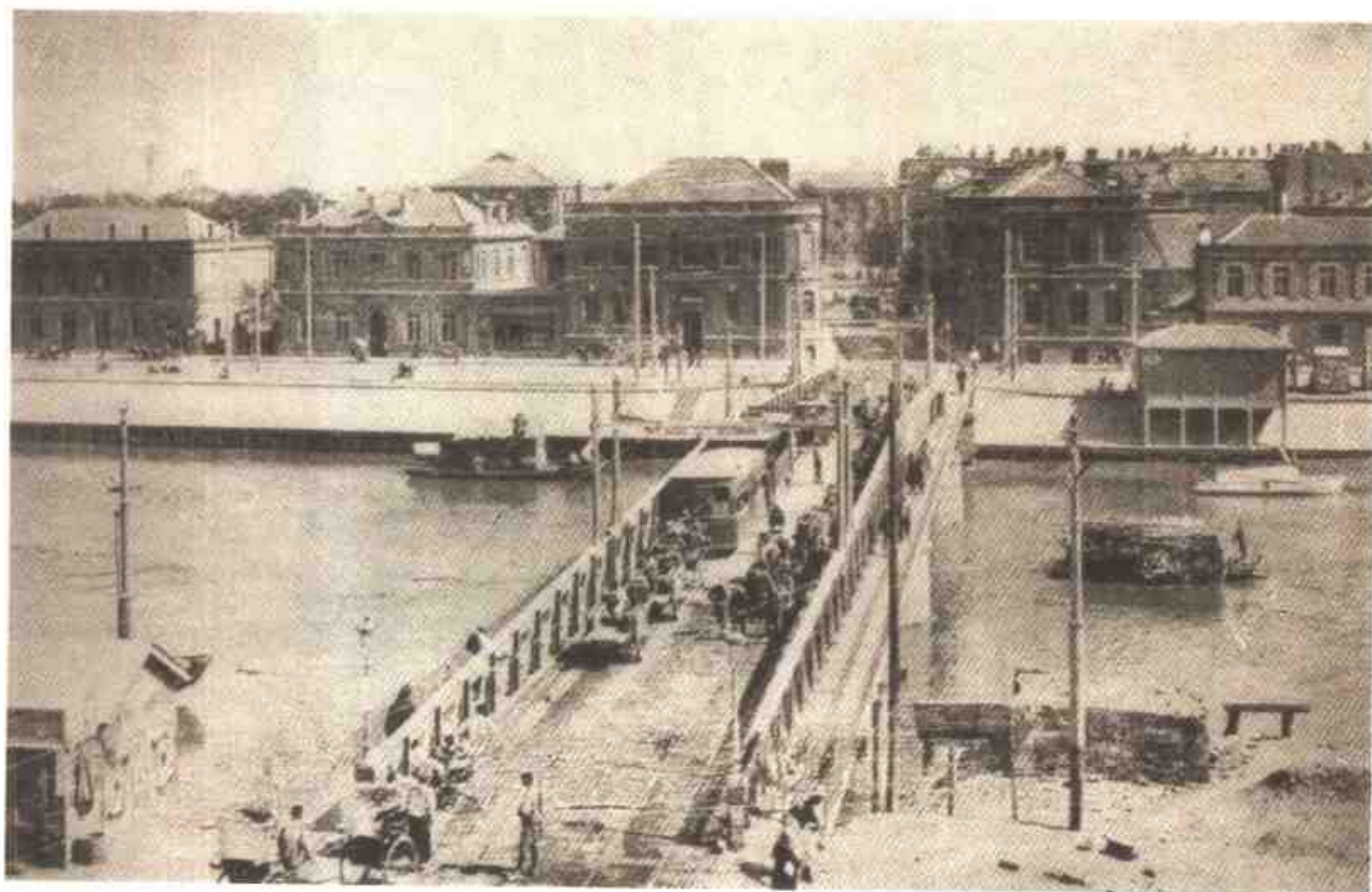


图 4-1-71 20 世纪初天津海河河畔的二三层建筑，为适应天津的气候条件，建筑已无外廊。这些建筑已不属殖民式建筑范畴。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上海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引者注:即殖民式建筑)主要受英国乔治王朝时代(英国乔治一世至四世时代,Georgian architecture,1714~1830)和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rchitecture,1837~1901)建筑风格的影响,有三个明显的风格演变阶段:开埠后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乔治时代的风格特征,以建筑立面整齐的柱式外廊构图为特征;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表现为维多利亚时代盛期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立面以连续半圆券为主要构图元素;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表现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安妮女王复兴风格(Queen Anne Style),这是一种由英国建筑师理查德·诺尔曼·肖(Richard Norman Shaw,1831~1912)创始的建筑风格,受到荷兰建筑的影响。红砖清水墙的处理手法大量出现,建筑立面由单纯的柱式或拱券式外廊效果转向追求华丽与丰富的装饰效果,装饰手法大量使用,外廊特征弱化。……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演变趋势是由简洁到丰富,由强调秩序感转向追求装饰效果。外廊的立面构成,由连续的列柱转化为连续券,进而发展为连续的券柱式构图,并出现了多种券式的混合使用。随着建筑立面的演变,建筑平面也由最初方形的简单分割渐趋于布置合理并有丰富的变化。”^[98]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上海近代城市与建筑的发展较为充分,因此殖民式建筑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早期的殖民式建筑,占地面积很大,建筑居中,周围是空地,仍保留着一种田园风光。但这种建筑格局很快就随租界区的迅速发展而消失。建筑用地减少,相邻的建筑彼此间的间距缩小,街道感增强,殖民式建筑也逐渐放弃了三面或四面外廊的格局,只在临街面设置外廊,突出的是建筑临街的主立面。促成这种改变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剧变引发的商埠城市构成模式的改变,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是由于战争引起的华人、华资大量流入商埠城市租界区的结果。上海开埠初期,由小刀会及太平天国战事引起的,从1853年开始,1860~1865年进入高潮期的华人难民涌入租界区的浪潮,使租界区的殖民式建筑很快丧失了“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种植各种花树”的田园格局,金钱的驱动促成了地皮买卖,如本书第二章所引霍塞《出卖上海滩》一书中的描述,商人们“到了后来实在没有地皮可卖,便把自己行址四周的墙垣拆去,将行屋以外的空地也一起卖掉。”“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英国领事公馆也仿效着旁人的行为,将领事公馆里边的空地也卖了一部分出去。”城市扩展,地价上涨,使殖民式建筑不能再维持原有的模式,势必形成临街面宽缩小,进深加大,四面或三面外廊转化为只有临街立面设置外廊的新模式,这是对社会变动引发的城市构成模式改变的反应。

早期的殖民式建筑,只能见之于文字记载与绘画、摄影作品。《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一书载有上海开埠初期殖民式建筑的几幅水彩画,有外国人的住宅,也有洋行与银行。住宅建筑都是简单的方形平面,正立面作列柱外廊,柱式简化,窗上有三角形窗楣,屋顶也很简单,似乎使用了中国传统的黑色蝴蝶瓦。双坡屋面的一幢受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较多,并已将二层外廊用窗封闭,四坡屋面的一幢是较正宗的殖民式建筑。^[99](图4-1-72,图4-1-73,图4-1-74,图4-1-75,图4-1-76)

上海的殖民式建筑在许多绘画作品与照片中都可以见到,引用率很高的一幅是从苏州河上的公园桥(外白渡桥,又称外摆渡桥)上拍摄的,二三层殖民式建筑与教堂建筑并列。公园桥是木桥,建成于1873年7月28日,1906年拆除改建为钢结构桥,次年12月29日建成,称外白渡桥。照片反映的是1873年以后苏州河畔的建筑状况。《挪威人在上海150年》一书引用这张照片时如是注释:“瑞典-挪威总领事馆原先位于教堂的左边,但是在世纪之交前后迁至大桥左边的第一幢建筑物,大桥系苏州河上的花园大桥(外白渡桥前身)。今天,除了教堂,这些建筑物都已不复存在。”^[100](图4-1-77)



图 4-1-72 绘画作品《从圣三一堂眺望黄浦江》。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图 4-1-73 绘画作品《上海滩的洋行》。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图 4-1-74 绘画作品《上海的有利洋行》。原画载《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图 4-1-75 绘画作品
《上海的外国人住宅》
之一。原画载《十八及
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
埠风貌》。



图 4-1-76 绘画作品
《上海的外国人住宅》
之二。原画载《十八及
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
埠风貌》。



图 4-1-77 从公园桥
(外白渡桥, 又称外摆
渡桥)看上海外滩。原
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1861年汉口设立英租界后,即于当年动工兴建英国领事馆。“设馆初期,馆区内建有领事官邸,办公及辅助用房共四栋(位于今天津路北)。这些建筑皆为两层砖木结构,四周一般建有露台式券廊,是汉口最早出现的殖民式建筑。”^[101]但从遗存的两幅原英国领事官邸的照片看,其中一栋(已毁)平面略有凹凸,正立面券式外廊中部耸起三角形山花,侧立面亦在平面两端凸出部分的屋顶作三角形山花。另一栋(今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则在正面入口处一层凸出门廊,与之呼应,屋顶亦在正立面中部做突出屋面的蒙莎式屋顶阁楼。与照片上所见上海的早期殖民式建筑相比已有变异。(图4-1-78,4-1-79)

芜湖于开埠后的次年(1877年)建成的英国驻芜领事署与芜湖海关税务司署都是较典型的殖民式建筑。英国驻芜领事署为方形平面,二层,三面设置外廊,外廊进深达3.5米,中部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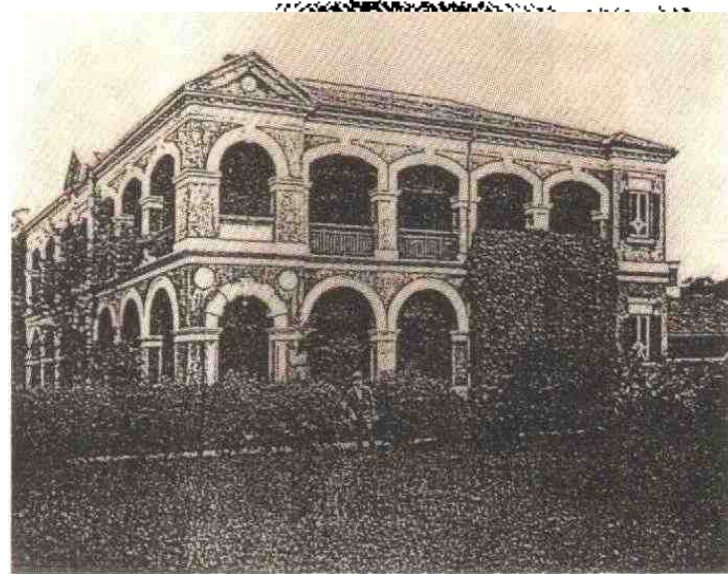


图4-1-78 汉口原英国领事官邸之一(已拆除)。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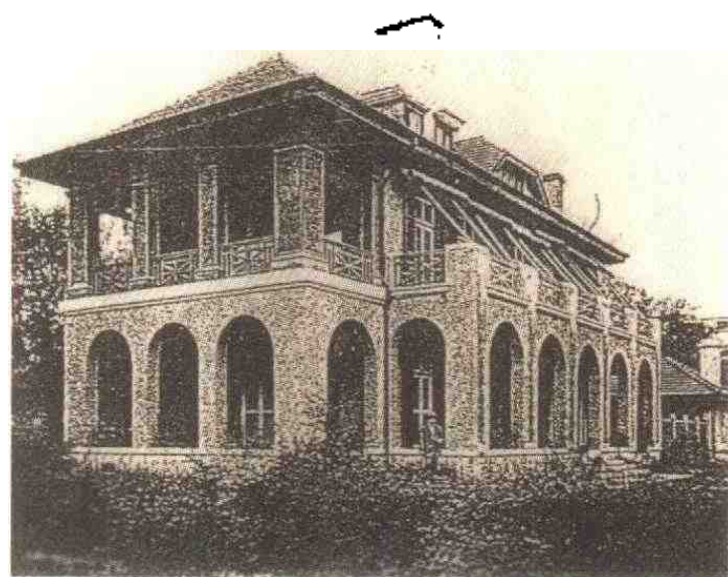


图4-1-79 汉口原英国领事官邸之二(今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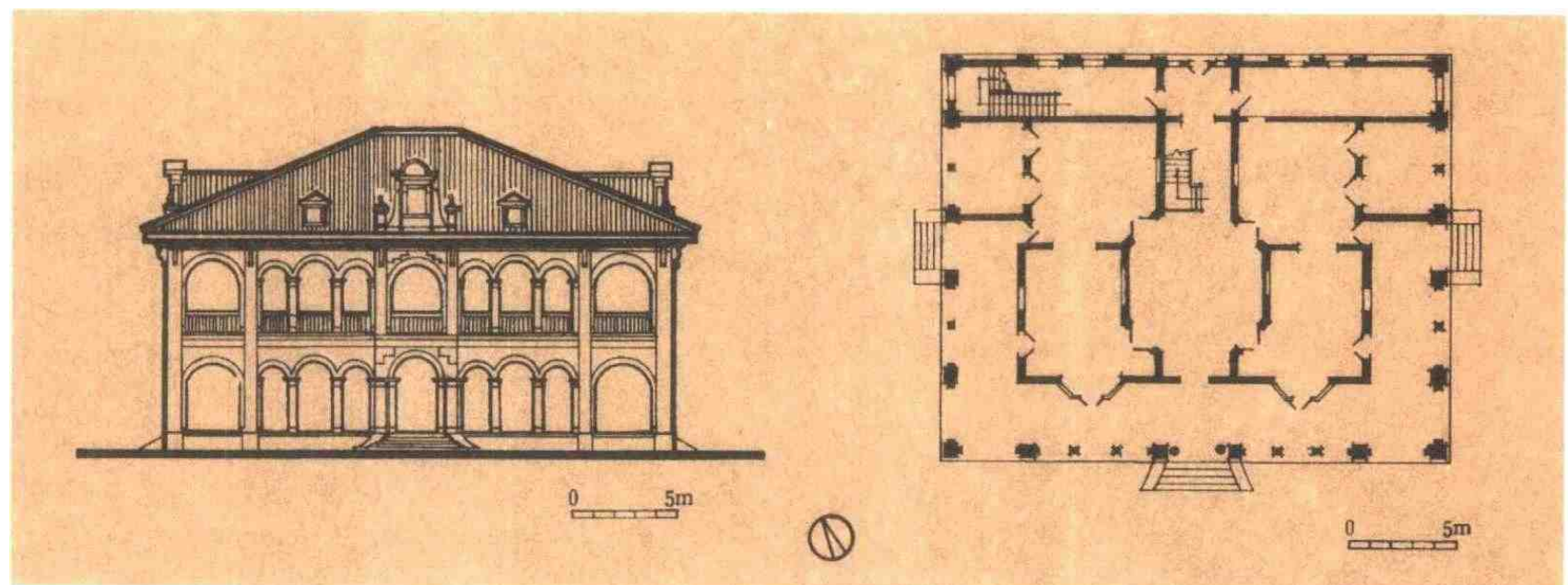


图4-1-80 芜湖英国驻芜领事署立面图、平面图,左图:立面图;右图: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八角形大厅,厅后楼梯间为三折木楼梯,后部另有辅助楼梯可登三层阁楼。建筑为砖木结构,石基座,清水红砖墙,木楼地面,木屋架,四坡瓦楞铁皮屋面,檐下有齿状花饰,拱券及砖柱夹砌青砖。此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并有葛立三测绘之平、立面图,是研究早期殖民式建筑难得的实例。(图4-1-80,4-1-81)芜湖海关税务司署与上述英国驻芜领事署平面布局与结构形式都很接近,但面积较小,装修标准也较低,而且只在南面设有外廊。^[102](图4-1-82)

殖民式建筑深入中国内地后,也如教堂建筑一样,已经产生变异,有了中西合璧的趋势。如在重庆,“法国领事馆是1895年建造的,设在



图4-1-81 芜湖英国驻芜领事署。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葛立三稿)。

图 4-1-82 芜湖海关
税务司署。原图载《中
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葛立三稿)。



领事巷下的二仙庵，斜对着英国领事馆，与法国仁爱堂修道院相通。这是一座具有殖民式风格的建筑，以券廊作为立面的主要造型手法，入口稍向前凸，并隆出屋顶，在正面山花下面是一简化了的西方教堂圆窗，在屋角上却作成如四川民居似的翘角，也许这是工匠的杰作。”^[10]殖民式建筑是西方各国领事馆偏爱的建筑形式，但是到了内地城市重庆，却已有中西合璧的趋势。(图 4-1-83, 4-1-84)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近代建筑的发展极不均衡，因此，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与中国近代边缘城市有着不同的近代建筑发展进程，即使是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也因其不同的地理、历史、社会背景而有着不同的近代建筑发展进程。所以在整体上论述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时，既要突出各个发展时期的主流发展趋势，也要兼及其非主流发展趋势，才能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状况，理清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脉络，这是由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所决定的。

图 4-1-83 重庆法国
领事馆总平面图(引自
《四川建筑史图集》)。
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
与建筑》(杨嵩林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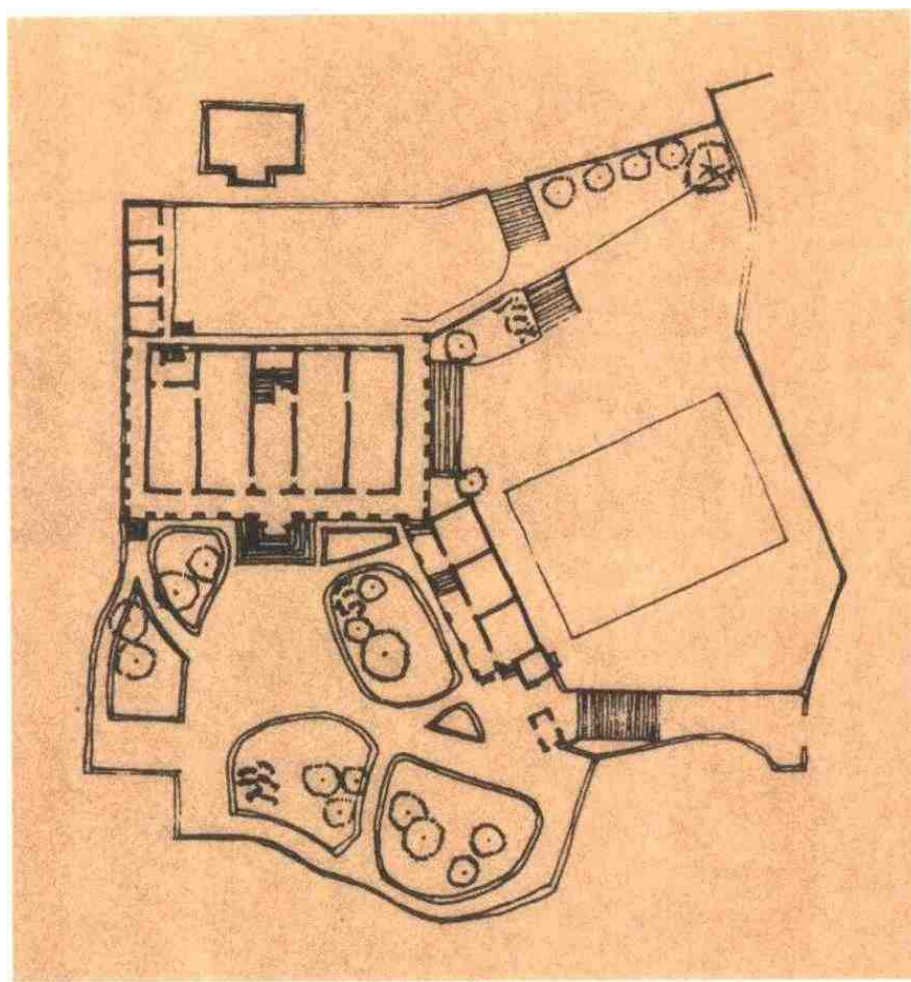


图 4-1-84 重庆法国
领事馆(引自《四川建
筑史图集》)。原图载
《中国近代城市与建
筑》(杨嵩林稿)。



在近代城市与建筑发展最为充分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后期的殖民式建筑就仍是沿着西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方向发展。“随着清水砖墙立面手法的普及，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西方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纯粹外廊式的立面构图大大减少，除了用不同颜色的砖产生出色彩效果外，为增强立面的装饰效果，又使用了多种手法，主要表现为：立面的连续券构图转变为连续的券柱式构图，檐口上设三角形山墙；柱式变化自由而多样；砖雕花饰大量出现，显示出安妮女王复兴样式的影响。”^[10]后期殖民式建筑的建筑形式渐趋丰富，外廊式立面构图逐渐弱化，实际上已经逐渐脱离了殖民式建筑的范畴，这正是这类建筑逐渐被正宗的西方建筑取代的标志之一。单一的建筑功能更使之无法适应日益完善的各种近代建筑类型的要求，只有外国领事馆一类功能相似的建筑还可适用。发展到这一步，殖民式建筑已经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进入 20 世纪，就被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所取代。(图 4-1-85, 4-1-86, 4-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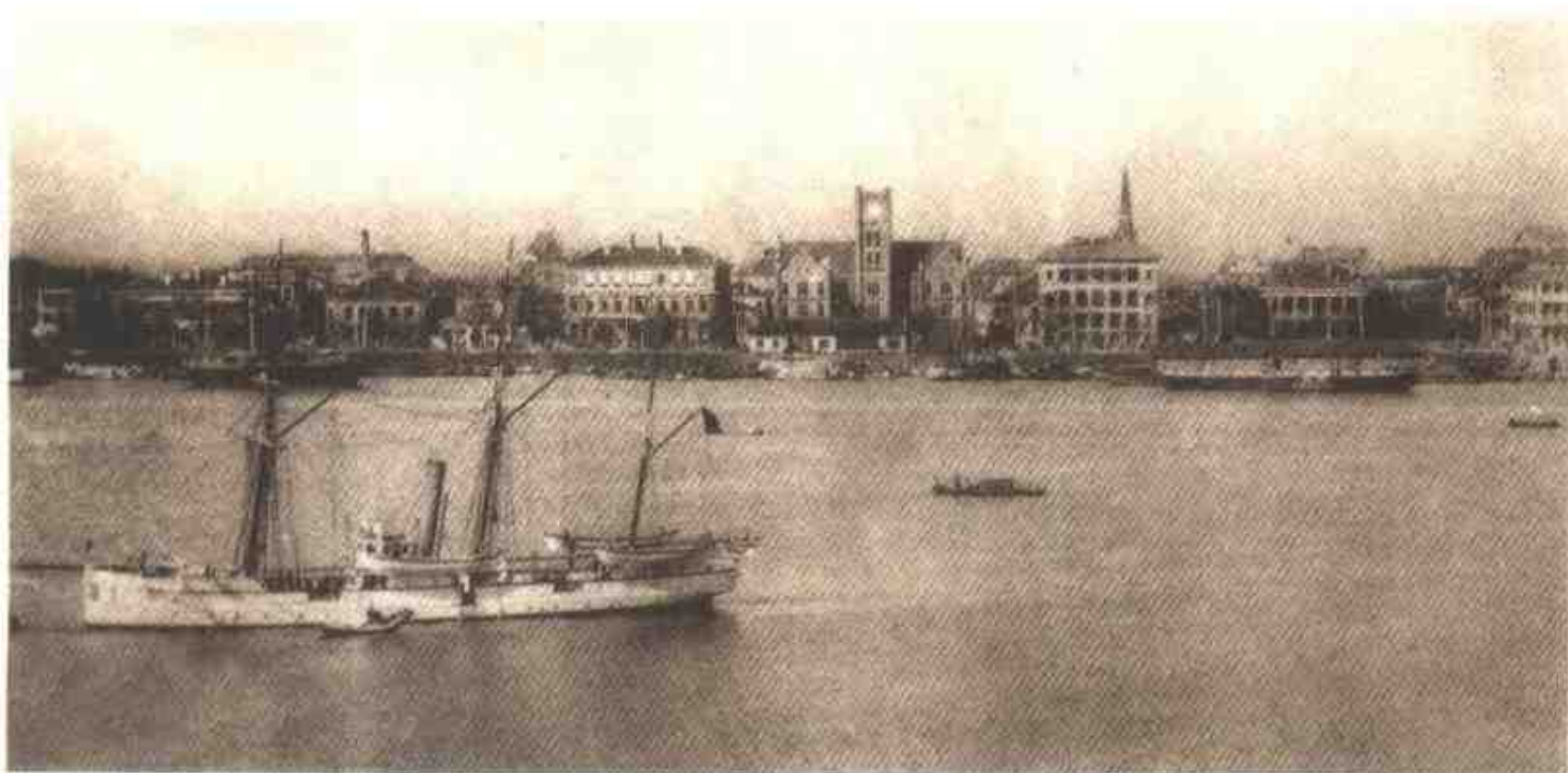


图 4-1-85 1900 年的上海外滩。江海北关已是拆除第一代江海北关后建造的第二代江海北关 (1891~1893), 外滩已建有四层殖民式建筑, 四层建筑之后远处是圣三一堂的尖塔。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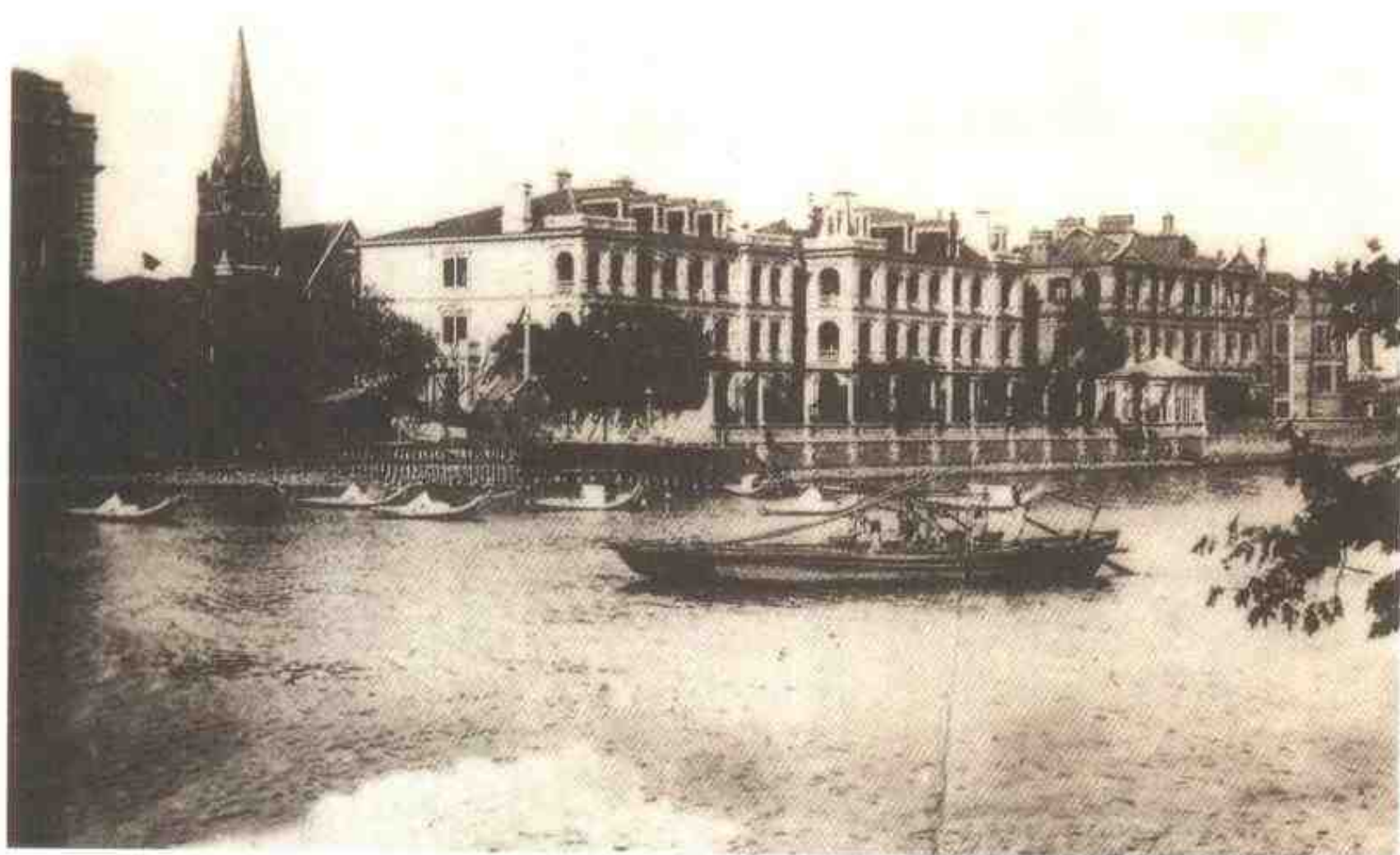


图 4-1-86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德、美等国领事馆, 殖民式建筑是西方各国领事馆偏爱的建筑形式。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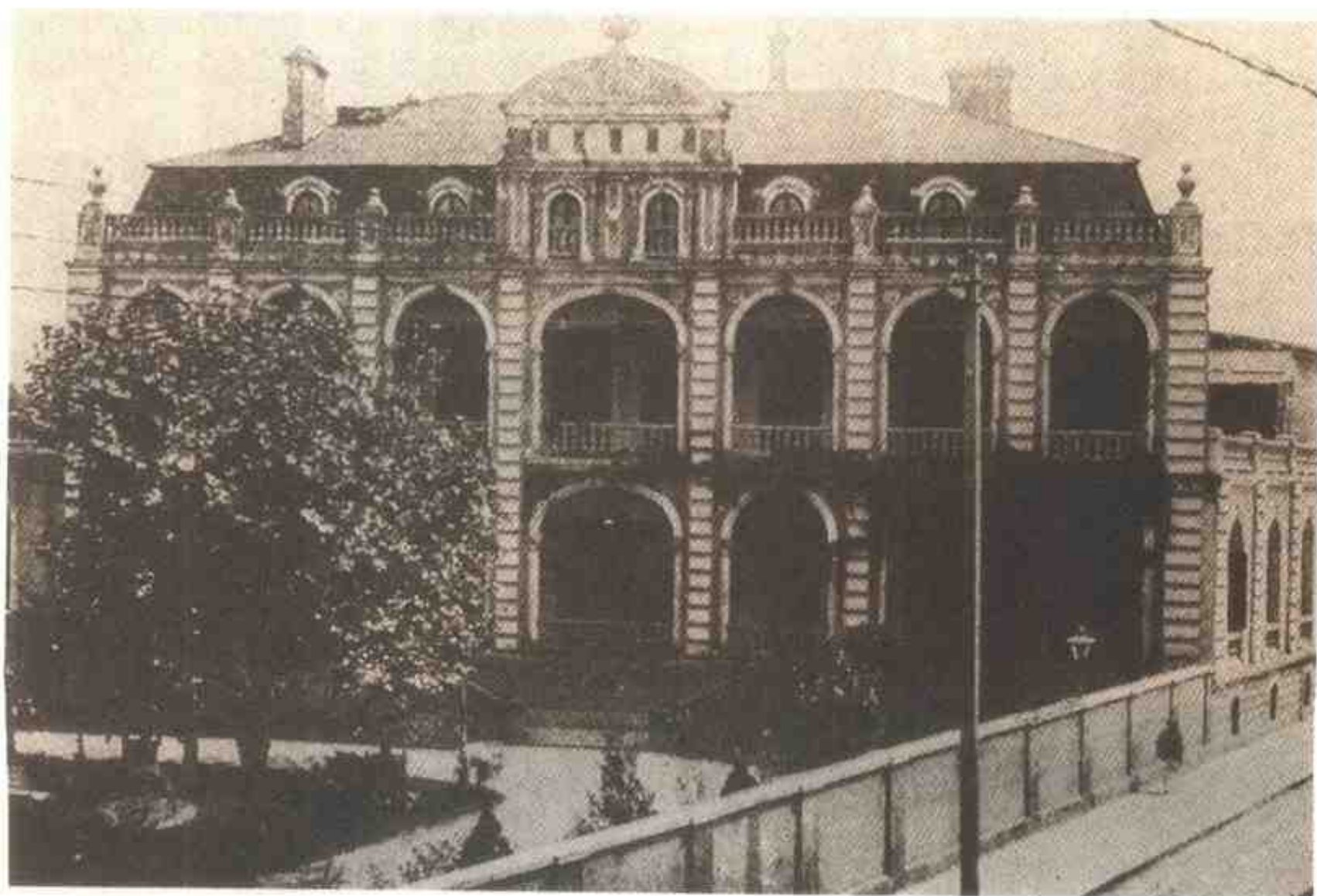


图 4-1-87 1896 年 1 月建成的上海法领事署, 位于公馆马路 (今金陵东路) 东口, 已拆除。建筑形式已开始脱离殖民式建筑的原型, 使用法国蒙莎式屋顶, 立面形式处理亦较为丰富, 不再是早期殖民式建筑的简单立面处理模式。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第二节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 (1900—1937) 西方复古主义 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

1900年以后,中国政局发生巨变,清廷于1901年在流亡之地西安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自此,学习西方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由中期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转入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反映在建筑领域,是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迅速发展,及受其影响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巨大变化。1901至1911年间清政府建造的官方建筑全部西化,古都北京发生巨变,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前期与中期(1900~1927)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迁都后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27~1949)因“都城十年建设(1927~1937)”而在这一时期取代北京成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更重要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包括以租界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商埠城市上海、天津,租界区与华界区同步发展的商埠城市武汉,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先驱城市广州,及1900年前后诞生的租借地城市如青岛、大连,铁路附属地城市如哈尔滨等,这一批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共同构筑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的主体建筑舞台。这一时期演出的大戏就是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的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也波及中国近代边缘城市。除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外,直接影响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是大批西方正宗建筑师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基本上改变了1900年以前主要由业余的传教士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甚至其他业余爱好者从事建筑设计的状况。而作为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成果之一的留学归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形成,也对这一发展趋势产生了影响。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更值得载入史册的贡献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这将在本书第六章专章论述。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前期与中期(1900~1927),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是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这种趋势至1927年以后才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影响波及中国,使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并逐渐取代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而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其时,重要的建筑发展趋势还有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从而形成这一时期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克隆现象的继续;及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探索三者共存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的西方复古主义建筑与折衷主义建筑并没有很严格的界线,复古主义建筑作品并不纯正,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以某种建筑风格为主,往往掺

杂了其他建筑风格的建筑形式构成要素,亦可称为以某种建筑风格为主的局部折衷主义建筑,但这与有意识地将各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构成要素混杂使用的折衷主义建筑不同,仍属复古主义建筑范畴。如中国建筑师沈理源设计的天津盐业银行就将西方古典科林新柱式的柱头按中国的回字形纹饰加以改造,但从整体上看,盐业银行仍属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原型的复古主义建筑范畴,西方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克隆并不纯正,对这些建筑的识别应从整体效果着眼。罗小未在论及上海外滩建筑风格时如是论述:“总的来说,外滩建筑风格除了少数几座属早期现代式与现代式之外,绝大多数是复古主义、折衷主义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是19世纪西方官方与大型公共建筑的流行样式,它们的特点是恢复与运用19世纪以前的建筑词汇、母题与比例进行创作。复古主义主要是起用古代希腊与罗马时期、中世纪罗马风与哥特时期、16—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的词汇与母题;而折衷主义则有意在一座建筑中把不同时期的词汇(甚至是古埃及或东方的)并列在一起。由于复古主义所复的“古”范围很广,因而在识别时除了时期的区别外还经常会冠以什么地方或什么国家的说明。例如文艺复兴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或其他什么国家的文艺复兴;古典主义也可有法国古典主义或什么国家的古典主义等等。由于复古主义、折衷主义正如现代人用古文来写文章一样,除非有意以假乱真,否则是不会把自己囿于某一朝代的词汇上的,故在识别时常会有意见分歧,但分歧不等于不能识别,一般是先看总的综合效果,再看它的局部与细部。”^[109]

西方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前期与中期(1900~1927)的主流发展趋势,但其影响也一直延续到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所以,本节论述的时间跨度是1900年至1937年,但仍要强调1900年至1927年是西方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克隆与传播的盛期。这一时期西方复古主义建筑的类型很多,本书仅以颇具代表性的,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原型的复古主义建筑为例论述之,为行文简洁,简称为西方古典主义建筑。

一、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正宗建筑师队伍的形成

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大规模克隆与传播始自1900年前后进入中国的正宗的西方建筑师,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创作的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作品中的优秀作品与西方建筑师相比也并不逊色,但重要作品不多。除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官方建筑外,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重要公共建筑基本上都由在华的西方建筑师事务所设计。

法国大革命以后曾一度被解散的皇家艺术学院于1795年重新恢复,1816年艺术学院扩充调整,更名为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 Arts)。整个19世纪,巴黎美术学院成为欧美各国艺术与建筑创作的精神领袖,它培养的建筑师成为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的热心传播者。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正是西方建筑发生巨变的时期,一方面,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仍在延续,另一方面,新建筑运动方兴未艾,但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却大多不是同步影响而是滞后影响,其中只有新艺术运动建筑的影响例外,新艺术运动建筑几乎与欧洲同步在中国传播,而现代主义建筑则迟至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才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还是只得皮毛未得精髓。这种建筑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使西方学院派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流行了近30年,从而产生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杂陈并列的建筑现

象。学院派建筑教育强调建筑师基本建筑素养的训练,强调基本建筑构图原理(或称建筑形式美的原则)的训练,时代变迁,建筑师应具备的基本建筑素养的内容及建筑构图原理自身都在更新与进步,但学院派建筑教育强调的这些建筑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永恒的。正是因为以一批具备了这种基本素质的优秀的西方建筑师为主体,也包括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建筑师群体的建筑创作活动,产生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建造的这一批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作品,抛开其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不论,单独考察其建筑形式美及其形成的城市景观美,从整体上评价,还是很完美的。正是这批建筑作品,形成了这些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基本城市风貌。

早期进入上海的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建筑师极少,大多是土木建筑工程师及从事城市基础建设的其他专业的工程师,而且流动性很大,定居上海者不多。“据不完全调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活动于上海的土木建筑工程师有哈特(John William Hart)、希林福特(A. N. Shillingford)、罗维尔(Samuel Rowell)、道森(Philips S. Dowson)、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field)、惠格纳尔(John H. Wignall)、克内维特(F. H. Knevitt)、斯蒂博尔特(Nicolai Stibolt)、皮莱格兰(Henri Auguste Pelegrin)、尤尔勃里奇(J. G. Ulbrich)、莫里斯(Samuel John Morris)、沃特斯(Thomas James Waters)、金斯密(T. W. Kingsmill)、斯美德利(J. Smedley)、玛礼逊(Gabriel James Morrison)、凯德纳(William Kidner)等人,其中以英国人居多,业务范围涉及土木、建筑、机械、测量、上下水、煤气、电灯、铁器制造、工厂、房地产、造船等行业……从1863年开始一直定居于上海的英国土木与建筑工程师金斯密的设计作品中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细部处理也是比较正规的西方建筑手法。另外,值得重点提出的是凯德纳,他是19世纪60年代上海唯一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会员,也是目前所知道的上海最早的正统建筑师,他受第二任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的邀请于1864年来到上海,在圣三一教堂建设中(1866~1869),作为上海本地建筑师负责对英国本土建筑师司各特所做的方案进行修改和具体实施。”^[10]凯德纳本人在上海的建筑作品有早期汇丰银行(1877)及有利银行(1878年)。

“19世纪末上海的西方职业建筑师数量开始增多,为大量移植正规欧洲建筑风格创造了前提条件。1880年以前,上海的开业建筑师人数从未超过三人,1880年有四人,1885年增加到六人,1893年增加到七人。1908年作为远东商贸指南出版的《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简称《20世纪印象》)一书中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10年代中活跃于上海的13位建筑师,他们是罗斯(Robert Rose, 1881~?)、海氏(Sidney Joseph Halse)、艾特金森(Brenan Atkinson, 1866~1907)、小艾特金森(G. B. Atkinson)、比斯利(P. M. Beesley)、爱尔德(Albert Edmund Algar, 1873~?)、道达(W. M. Dowdall)、马矿司(Robert Bradshaw Moorhead)、布雷(A. G. Bray)、达拉斯(Arthur Dallas)、迪纳姆(J. E. Denham, 1876~?)、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平野勇造(Y. Hirano, 1864~?)。此外还有格拉顿(Fredrick M. Gratton)、柯瑞(J. M. Cory)、卡特(W. J. B. Carter, ?~1907)、覃维思(Gilbert Davies)和托马斯(C. W. Thomas)等主要人物。其中柯瑞、格拉顿、道达、司各特和海氏5人具有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会员资格。他们中大多数从事设计活动的主要时期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之间,可以称为上海的第二代西方建筑师。这些第二代西方建筑师大多受过正规建筑师教育,如司各特虽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但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并在英国获得RIBA准会员资格后来上海;平野勇造曾留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接受了学院派建筑教育。同时,第二代西方建筑师中的大多数人与开拓时代的第一代建筑师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他们在上海设计经历的前期通常是在第一代建筑师的事务所中度过的:

艾特金森从18岁开始在金斯密事务所就职,历时10年(1884~1894),其间曾与金斯密合作设计了张园安塔第大楼(Arcadia Hall),1894年独立后,与辞去工部局助理市政工程师职务的达拉斯合伙创立了通和洋行;爱尔德在1888年至1896年间也在金斯密事务所就职,1896年独立,成立爱尔德洋行;司各特1889年来到中国后在玛礼逊与格拉顿的建筑事务所就职,后来继承了这家事务所,海氏、马矿司和道达在独立开业前也曾就职于这一事务所;迪纳姆和罗斯继承了斯美德利的事务所。同第一代的殖民地开拓时代的土木建筑工程师相比,第二代建筑师的业务范围明显缩小,比较明确地集中在建筑或建筑与土木工程方面,大部分同时还参与房地产经营。虽然设计业务中也有大量的工厂类和基础设施类项目,但公共建筑和住宅等以建筑设计为主的工作已经成为主要部分。第二代建筑师通常拥有大型事务所,本部设于上海,在其他各地的租界中开设分部,如通和洋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远东最大的事务所,在汉口、北京和天津都设有分部。同时,建筑师之间保持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107]上海的设计事务所中影响最大、作品最精的当属公和洋行。^[108]公和洋行早期在上海的建筑作品有:有利银行(1913~1916)、公共租界工部局(1913~1922)、永安公司(1916~1918)、扬子水火保险公司(1918~1920)、格林邮船大楼(1920~1922)、汇丰银行(1921~1923)、麦加利银行(1922~1923)、横滨正金银行(1923~1924)、江海关(1926~1927)等。这些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为基调的建筑作品,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也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重要性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天津早期可能一直没有正宗的专业建筑师。1890年,当时天津最重要的建筑,英租界的市政厅——戈登堂建成。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天津于19世纪末建造的如此重要的市政厅建筑仍然不是建筑师的作品,“戈登堂的计划草图是由昌布尔(Chambers)先生设计的,后来又经过‘一位像达·芬奇一样多才多艺的’第一任工部局秘书长斯密思先生和在年轻时做石匠而懂得各种建筑知识的德国面包师弗朗才本赫(Franzenbach)先生的修改”(参见本书第二章注释),所以戈登堂建筑带有随意性。西方建筑师在天津的出现应当是在1900年以后。上海的大多数设计事务所在开展建筑设计业务的同时还参与房地产经营,所以多以“洋行”为名,天津的设计事务所也属这种模式,在从事建筑设计业务的同时也参与房地产经营,只是天津的事务所不称为“洋行”,而称为“工程司”。

1900年以后,天津也陆续成立西方建筑师主持的设计事务所,天津重要的近代建筑多由这些事务所设计,这些事务所包括:同和工程司,天津同和工程司是通和洋行设于天津的分公司,由英国建筑师小艾特金森(G. B. Atkinson)与达拉斯(Arthur Dallas)合组。上海通和洋行由艾特金森(Brenan Atkinson, 1866~1907)与达拉斯(Arthur Dallas)合组,1908年以后由艾特金森(Brenan Atkinson)之弟小艾特金森(G. B. Atkinson)继任通和洋行合伙人。但在上海称通和洋行,在天津称同和工程司。还有景明工程司,由英国建筑师赫明(Hemming)与帕尔克因(Parkin)合组;乐利工程司,由瑞士建筑师洛浦(Loup)与英国建筑师杨(B. C. Young)合组;永和工程司,由法国建筑师慕乐(Müller)与赫琴(Hünke)合组;永固工程司,由英国建筑师库克(Cook)与安德森(Anderson)合组。此外,还有奥地利建筑师盖苓(Rolf Geyling)与斯卡福(Skaf)合组的盖苓美术建筑事务所,及意大利建筑师鲍乃第(Bonetti),瑞士建筑师凯撒(Kessler),英国建筑师奈尔(D. Lyle)等都曾在天津从事建筑设计。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天津建造的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大多数都出自这些西方建筑师的手笔,如同和工程司设计的天津开滦矿务局大楼是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永和工程司设计的天津劝业场是高水平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作品。

由英国建筑师翰明斯(Hemmings)与工程师伯克莱(Berkler)合组的汉口景明洋行是

当地著名的设计事务所,20世纪初在汉口开业,先后在汉口设计了几十项工程,如英商保安保险公司(1914),汉口交通银行(1921),浙江实业银行(1926)等。事务所还自行设计并建造了自己的办公大楼——景明洋行大楼(1920~1921)。^[109]

自庄俊于1910年赴美留学学习建筑专业,1914年学成归国后,20世纪20年代一批留洋学习建筑专业的留学生陆续归国,形成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队伍,他们的创作盛期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从整体上看,中国建筑师创作的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作品,虽有与西方建筑师的同类作品相比并不逊色的优秀作品,但数量不多,重要的公共建筑不多,往往淹没在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大量的同类建筑作品之中,并不引人注目。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创作成就更多地体现于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的创作,这部分内容,包括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队伍的形成,将在本书第六章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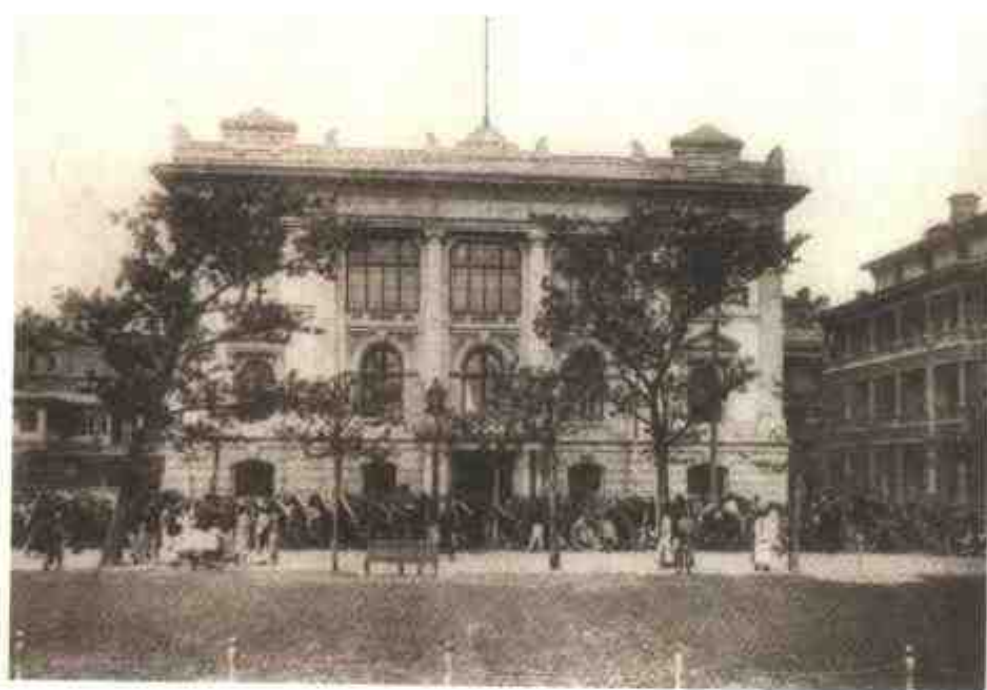
二、西方复古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克隆与传播 ——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例

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带给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是学院派建筑师的看家本领——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的完美组合,建筑总体形态的宏观控制,建筑尺度、比例、节奏、韵律的精细推敲,建筑材料、质感、色彩的恰当运用与建筑细部处理的精细完美等,从整体上看,这批建筑在建筑形式美的追求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创造了美的建筑与美的城市,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直至今日,主要由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组成的上海外滩近代建筑群仍然是中国最富建筑美的建筑群之一,外滩近代建筑群之美,不在于有无惊人的“标志性”建筑,而在于建筑群建筑形式美的整体水平很高,没有明显的败笔建筑,呈现的是一种平和完美之美,当然还有历史积淀之美。这正是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最宝贵、最值得借鉴的建筑文化遗产。本节试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代表,论述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西方复古主义建筑的优秀作品及其影响。

上海与天津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比较正宗,且大多数是银行建筑,这些银行建筑使用西方古典柱式,讲求对称,突出轴线,强调构图中的主从关系,形成规整对称,主次分明,比例严谨的立面构图,但亦能根据具体地形作灵活处理。建筑用材讲究,多使用花岗岩贴面,花岗岩柱式,或作水刷石面层,昂贵的进口钢窗,精制的黄铜大门,室内也作大理石地面、楼梯、柜台与大理石柱式。坚固耐久,典雅华贵,正符合当时银行界追求豪华,显示财富以求扩充业务的商业要求。

上海的早期实例是德国建筑师海因里希·倍高(Heinrich Becker)设计的华俄道胜银行(1901~1905),位于上海今外滩九江路口,占地面积约1460平方米,建筑面积5018平方米,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临街正立面为五开间,中部三开间作两层高爱奥尼克柱式,两侧开间以实墙面为主,形成典型的竖向三段式立面构图。一层外墙饰以粗犷的石材,二三层镶嵌大理石与乳白色釉面砖,质感与一层形成对比,二层窗的式样都不相同,重点处理的是二层的窗,三层挑檐以上作天际轮廓线颇为丰富的女儿墙,构成横向三段式立面构图。建筑室内装修精致华丽,三层高的中央大厅中的大理石楼梯与柱式典雅华贵,彩色玻璃窗与采光天棚已有新艺术运动装饰风格的影响。^[110](图4-2-1)

图4-2-1 上海华俄道胜银行。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1910)是通和洋行设计的较严谨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依然是竖向三段横向二段的立面构图,依然是两层高的爱奥尼克巨柱式,依然是三层都不相同的窗的样式处理,但因建筑位于今四川中路与广东路交口,建筑入口设于街道转角处,其处理顺应地形,在古典主义的严谨中增添了几分活泼。入口门廊之上原有寓意“谨慎”与“富裕”的两座大理石雕像分列左右,建筑转角处屋顶山墙之上也有名为“命运三女神”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建筑与雕像的关系处理,尤其是转角处屋顶雕像的处理恰到好处,尺度适宜,雕塑与建筑融为一体,使建筑的天际轮廓线生动而富于变化,严谨而突出重点,这正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形式美的精华所在。这一点,只要将原始的建筑渲染图与雕像被毁后的现状照片作一对比,就可一目了然。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建筑细部设计精美,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底层营业厅的彩色玻璃窗。^[11](图4-2-2,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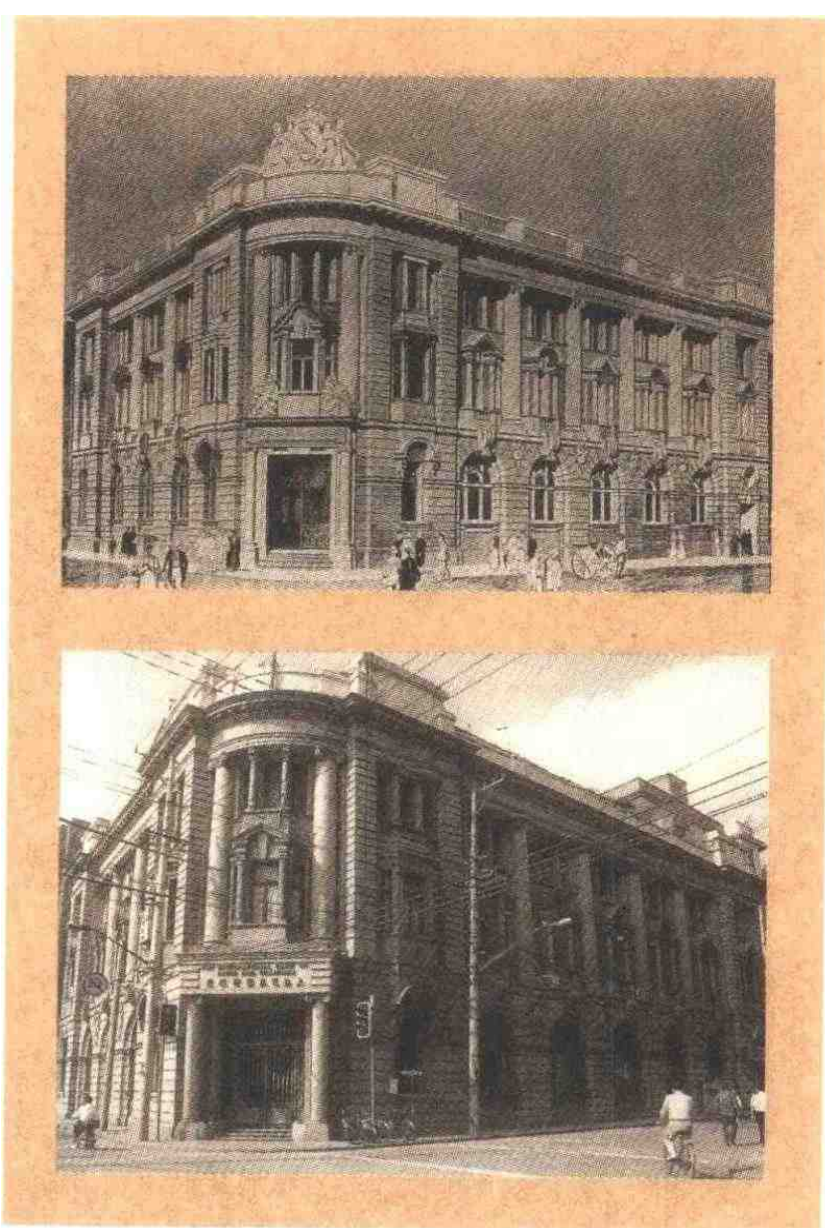


图4-2-2 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上图:永年人寿保险公司设计表现图;下图: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现状。当初建筑师是将雕塑作为建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来设计的,两者相比,失去雕塑的建筑就大为逊色。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上海东方汇理银行(1910~1911),亦为通和洋行设计。东方汇理银行临外滩的立面接近正方形,横向三段式立面构图的基座层,即三层建筑的底层几乎占了立面高度的五分之二。横向三段式立面构图的比例失调反映了建筑功能与形式的矛盾——首层营业大厅的高度限制了建筑师设计立面构图的自由度。(图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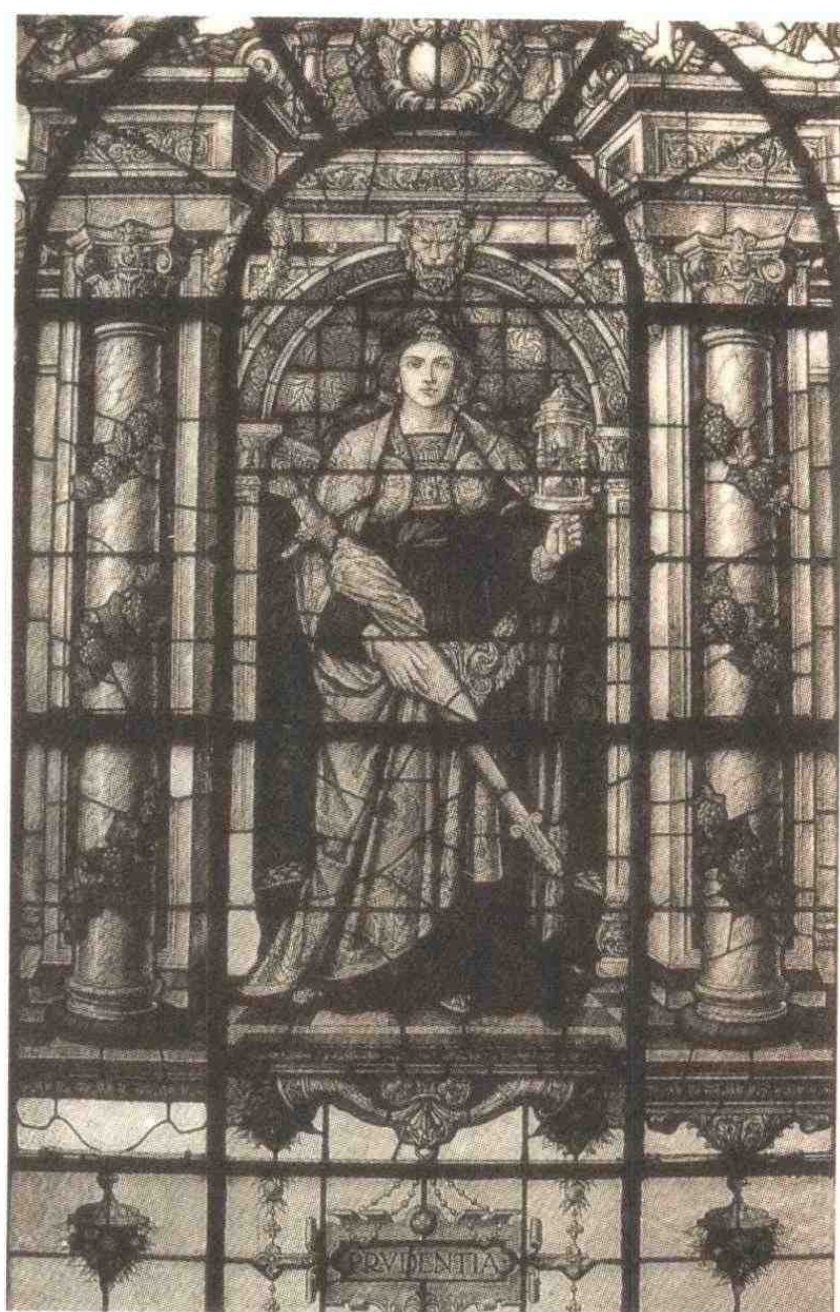


图4-2-3 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彩色玻璃花窗,精细的建筑细部处理是优秀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精细的古典建筑细部是西方古典建筑文化的积淀。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这一时期在上海外滩建造的西方古典主义银行建筑还有公和洋行设计的麦加利银行(1922~1923)与横滨正金银行(1923~1924)。五层麦加利银行的爱奥尼克巨柱式加高到三层楼的高度,(图4-2-5)六层横滨正金银行的爱奥尼克巨柱式更是加高到四层楼的高度。(图4-2-6)建筑师虽然用调整巨柱式高度的设计手法维持了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横向三段比例关系,体现了公和洋行建筑师们娴熟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素养,但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外滩,建筑高度的不断增长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如横滨正金银行那样,六层建筑使用四层高的巨柱式的处理手法恐怕已经达到极限了。



图 4-2-4 上海东方汇理银行。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图 4-2-5 上海麦加利银行，爱奥尼克巨柱式加高到三层楼的高度。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图 4-2-6 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爱奥尼克巨柱式加高到四层楼的高度。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上海汇丰银行于 1921 年在外滩福州路口建造新厦，1921 年 5 月 5 日奠基，1923 年 6 月 23 日落成，占地面积 8021 平方米，建筑面积 23415 平方米。^[12] 汇丰银行由公和洋行设计，主体建筑地上五层，首层设有夹层，第七层局部设塔楼，塔楼之上是鼓座及穹顶。钢框架结构，填充墙为砖墙，石材贴面，石材加工精细，门窗洞口的线角、挑檐线角等都用整块石材雕成。精细的施工保证了设计意图的完美体现，使之在近 80 年后的今天仍保持原貌，而这一规模巨大，施工复杂精细的工程却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完成的。^[13] 稍后几年，主体建筑五层，局部七层，建筑面积达 21000 平方米的天津劝业场于 1926 年开始筹建，1928 年 12 月竣工开业。可知当时中国的施工队伍已具相当规模，亦已具备相当高的施工水平。

汇丰银行堪称外滩，也是上海最精美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建筑临外滩的立面横向展开，五层主体建筑横向分为三段，一层是粗犷厚重的花岗石贴面底层基座。中部三层处理简洁大气，仔细观察，二至五层窗的高度逐层递减，窗的细部处理也逐层简化，构成微妙的竖向渐变韵律。这种经典的西方古典建筑处理手法，普通民众，甚至一般的建筑师都难以觉察，但其经典的建筑美正是体现于这种难以觉察的、精细入微的建筑细部处理。汇丰银行一、二层之间设通长的水平腰线，四层之上设檐口，檐口之上是第五层。为调整横向三段比例，第五层设计了较高的女儿墙。建筑竖向分为三段，中部的五个开间是中段，中段两端的两个开间平面微凸，开间加宽，以实墙面为主，在第五层设计精致的象征性的塔楼造型；中部的三开间，底层是三檐半圆拱券门洞，二至四层是三层高的科林新巨柱式，再加上顶部两层鼓座之上的穹顶，形成统率整个建筑的构图中心。建筑立面两端的两个开间与中段两端的两个开间处理手法相同，作为一个整体，临外滩立面的这四个开间，尤其是五层的四座小塔楼造型形成均衡的韵律感，加强了建筑的统一感与整

体感。中部五开间与建筑两端的两开间之间的左右各五开间则适当放松,强调的是横向均匀分布的窗的竖向渐变韵律。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所特别强调的建筑形式美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作者曾许多次在外滩的不同角度观赏这座精品建筑,感受它那精妙的建筑之美。最深地感受是,学院派建筑教育强调的建筑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永恒的,当代中国建筑缺少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大师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建筑基本素养、精细入微的细部处理与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在这方面,汇丰银行就是学习的样板。(图 4-2-7,4-2-8,4-2-9,4-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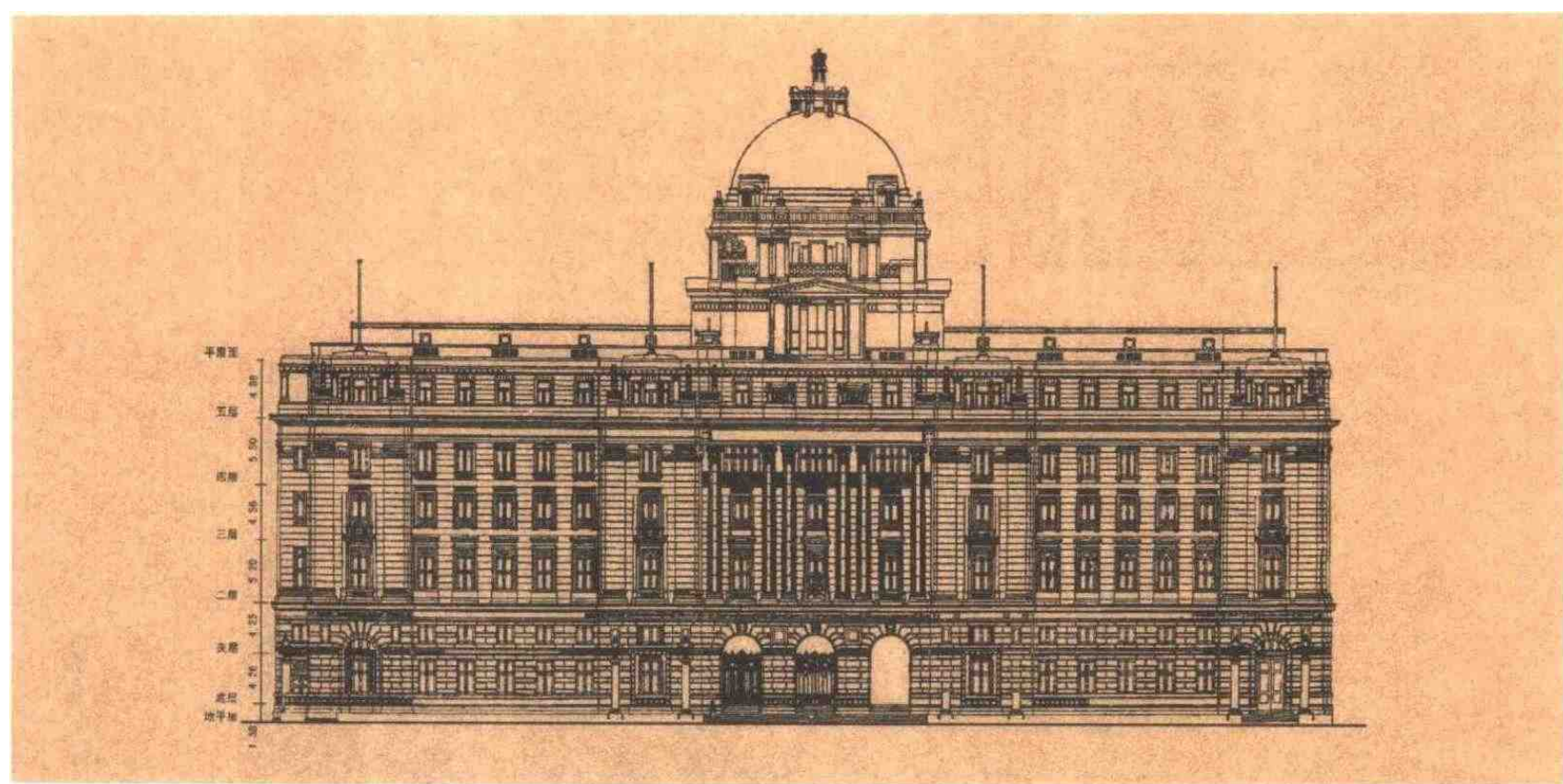


图 4-2-7 1923 年的上海汇丰银行立面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天津的西方古典主义银行建筑起步较上海稍晚,大量建造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集中建造在当时的天津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英法租界中街是天津租界区较早形成的街道,因集中建造了一批银行建筑而有“银行街”之称。

早期天津英法租界中街建造的银行建筑较为简朴,留存至今的今解放北路大同道路口的华俄道胜银行建于 1900 年前后,是中街建造较早的银行建筑。两层砖木结构,有地下室,外檐勒脚及檐口作水刷石面层,其余部分贴黄色面砖,与棕红色屋顶呼应,形成暖色调的基调。转角处三开间平面呈圆弧形,屋面耸起穹顶,上立塔亭,成为整个建筑的构图中心。两侧翼红陶瓦坡屋顶上开有老虎窗,沿街立面耸立着一排跳跃的山花。(图 4-2-11)

与华俄道胜银行隔中街相望的汇丰银行于 1924 年建造,占地面积 4400 平方米,连同后楼附属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5539 平方米,同和工程司设计。汇丰银行主楼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随街道走向在解放北路大同道路



图 4-2-8 上海汇丰银行。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姜承浩稿)。



图 4-2-9 上海汇丰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图 4-2-10 上海汇丰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口呈钝角形。解放北路立面中轴线上作三开间柱廊，四根三层高的爱奥尼克巨柱式，上部的三角形山花及檐口高出屋面。柱廊内豪华的黄铜大门上作巨大的半圆券窗，大门两侧的爱奥尼克巨柱式上顶着三角形小山花。柱廊两侧的小门廊左右对称，与中心柱廊呼应，左侧是窗，但也重复右侧门的作法以求对称。大同道立面中轴线上的柱廊作法与解放北路立面完全相同，但两侧各做有两根爱奥尼克巨柱式的凹廊与中心呼应。两个完全对称的立面呈钝角相交，既统一又略有区别，以突出解放北路主立面，表现了严谨的古典主义设计手法中的灵活性。（图 4-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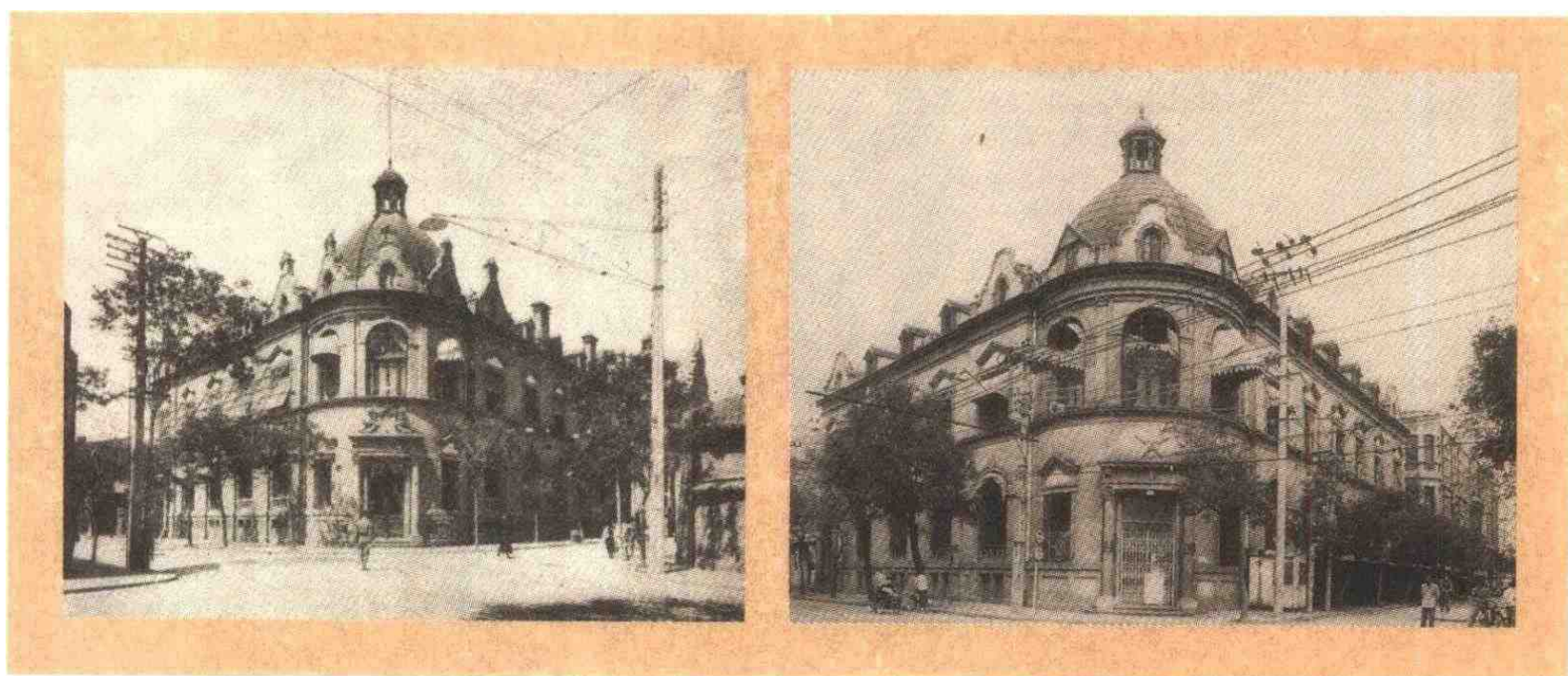


图 4-2-11 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左图：华俄道胜银行历史照片，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右图：华俄道胜银行现状，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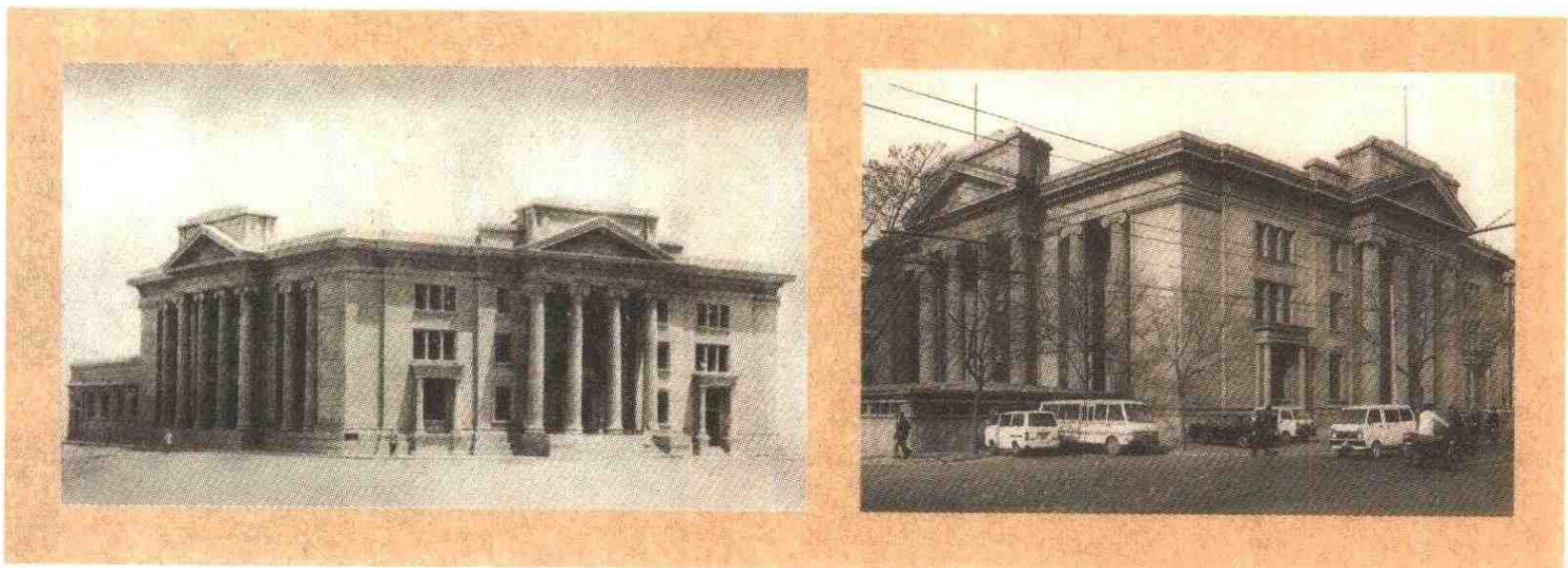


图 4-2-12 天津汇丰银行。左图：汇丰银行历史照片，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右图：汇丰银行现状，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麦加利银行位于今解放北路大连道路口，1924 年由景明工程司设计，1925 年建成，占地面积 2259 平方米，建筑面积 5933 平方米，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有地下室。麦加利银行解放北路正立面中轴线上作两层高五开间柱廊，爱奥尼克巨柱式，为角柱形式，柱廊左右两侧开间以实墙面为主，与中部五开间柱廊形成虚实对比，构成竖向三段式构图。基座、柱廊、厚重的檐口及其上的女儿墙则形成横向三段式构图。大连道立面处理与解放北路立面基本相同，但中部五开间作四分之三爱奥尼克壁柱，使之处于从属地位，以突出解放北路主立面。呈锐角相交的两个临街立面的交界处，建筑平面削 45°斜角使之自然衔接。（图 4-2-13）

天津英法租界中街两侧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银行建筑还有：东陆银行(Tung Lu Bank);(图 4-2-14)美商花旗银行(1921);(图 4-2-15)景明工程司设计的日商横滨正金银行(1926 年)等,(图 4-2-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信工程司的中国建筑师沈理源设计的盐业银行。沈理源为浙江杭州人,官费留学意大利,就读于罗马奈波利工科大学,初学水利工程,后学建筑学专业。华信工程司初建时由外国人

经营,1931 年起由沈氏主持经营,^[14]盐业银行位于今赤峰道 12 号,在中街与海河之间,建于 1926 年,占地面积 3174 平方米,建筑面积 6244 平方米。盐业银行因位于与中街垂直的赤峰道北侧,虽不临中街,但距中街很近,所以主入口朝向中街方向,主体建筑便形成沿赤峰道削 45°斜角的矩形平面,主入口设于面向中街一面的 45°斜角处,而与之对称的另一面虽不开门也作相同立面处理。建筑另在北面设突出于主体之外的矩形办公楼,单



图 4-2-13 天津麦加利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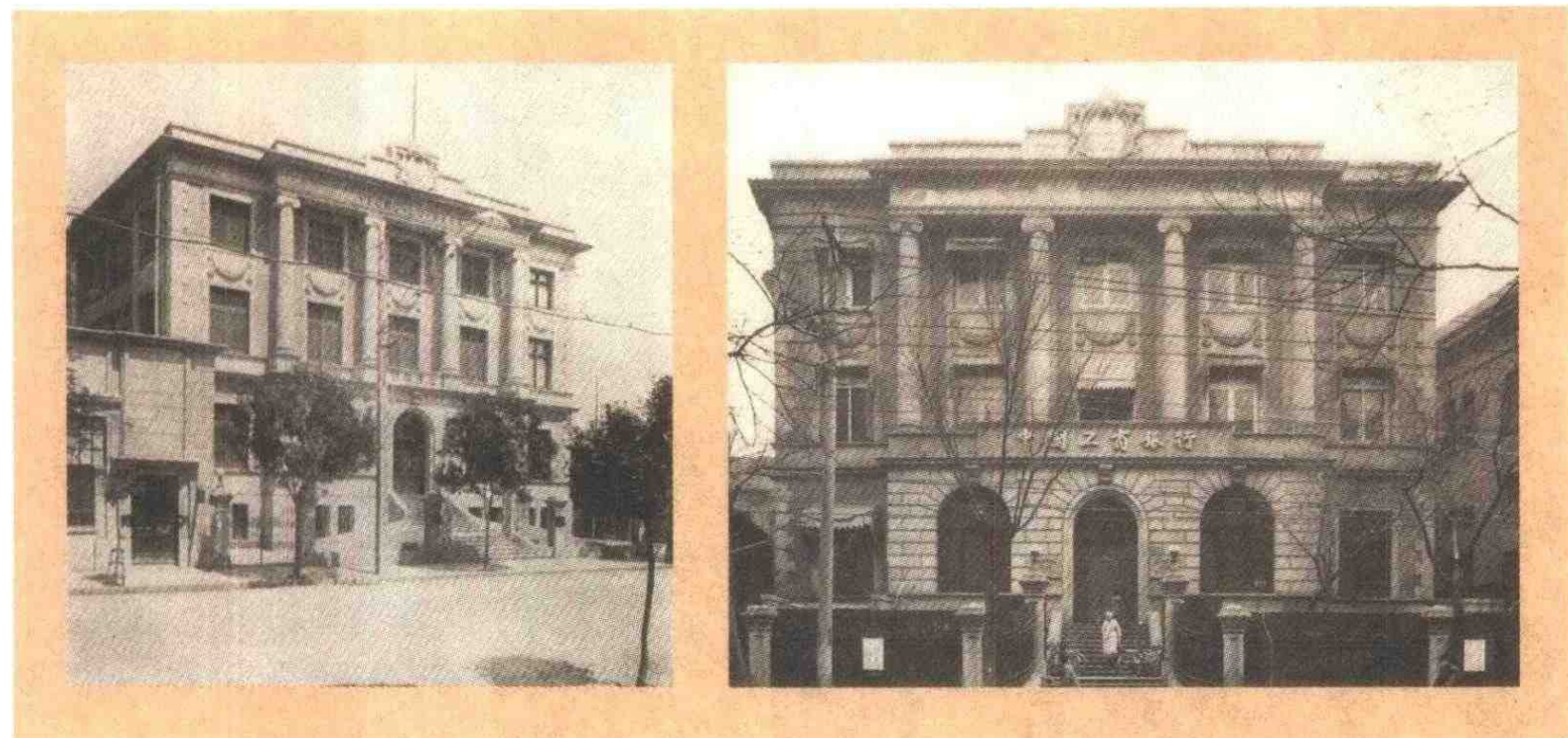


图 4-2-14 天津东陆银行(Tung Lu Bank)。左图:东陆银行历史照片,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右图:东陆银行现状,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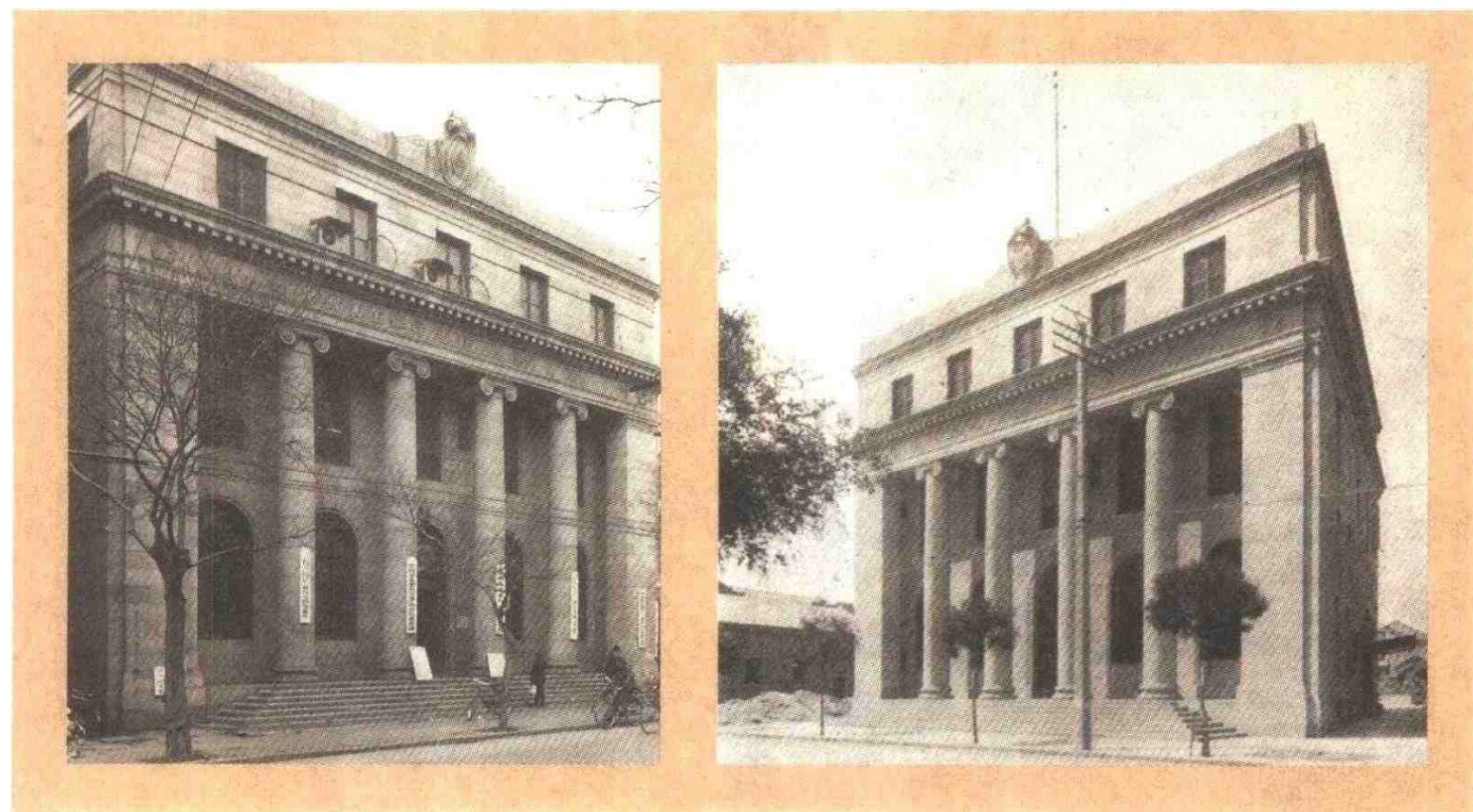


图 4-2-15 天津美商花旗银行。右图:美商花旗银行历史照片,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左图:美商花旗银行现状,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2-16 天津日商横滨正金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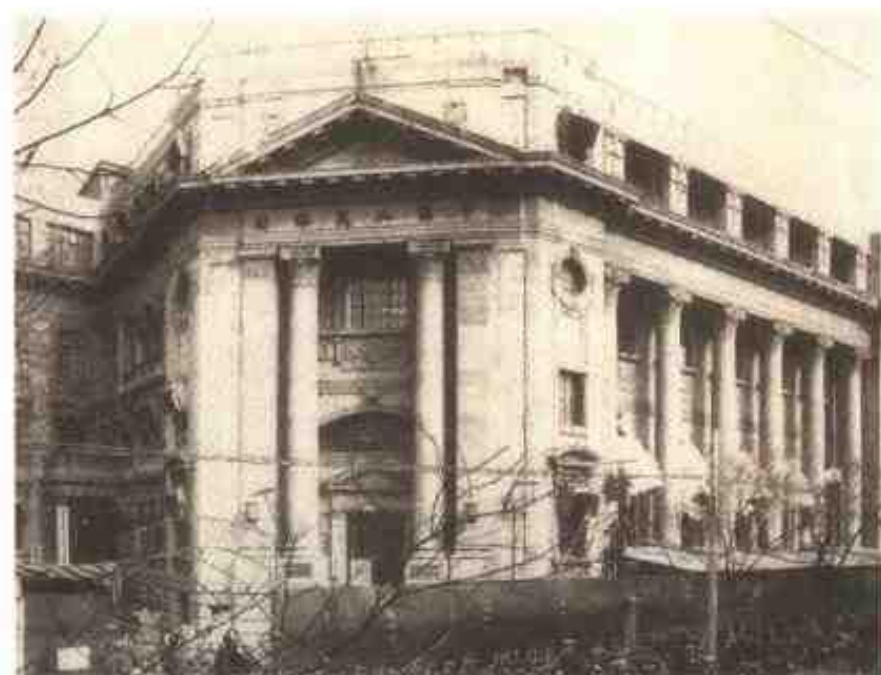


图 4-2-17 天津盐业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2-18 天津盐业银行变形的科林新巨柱式。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2-19 天津中法工商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设室外入口及室内楼梯，形成既基本维持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对称格局，又随地形与功能要求灵活处理的平面布局。建筑四层，并设有一层半地下室，中央营业大厅占用两层高度，宽敞大气，颇具气势。立面处理则以半地下室为基座层，一至三层设计三层高变形的科林新巨柱式，半地下室与一层之间有腰线分隔，三层之上设檐口，檐口之上的第四层女儿墙加高，建筑师娴熟运用古典主义建筑的设计手法，使横向三段的比例恰到好处。盐业银行设计的难度在于地形特殊，为求功能合理，使主入口迎向来自中街的主要人流方向，主入口设于建筑转角的 45° 斜角处，入口凹廊作三层高变形的科林新巨柱式，三层檐口之上作三角形山花以突出主入口。沈理源对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了局部中国化的尝试，将科林新巨柱式的柱头按中国古典回形纹饰予以改造。沈氏对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这种局部改造并非成功尝试，西方古典柱式是人类历史积淀形成的宝贵建筑文化遗产，是经历了若干年代的不断探索凝结而成的经典成果，以建筑师个人之力改造经典建筑遗产，当然不会成功。但瑕不掩瑜，天津盐业银行仍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中的优秀作品。(图 4-2-17, 4-2-18)

今营口道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1925 年建造的中法工商银行，于 1932—1933 年扩建，占地面积 155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240 平方米。建筑位于今解放北路与营口道路口，既在法租界内，又与英租界汇丰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毗邻，利于商业竞争，选址是很有心计的。由于英法租界各自为政，中街在英法租界交界处错位，从英租界中街看，随街道弯曲设计为弧形平面的中法工商银行成为街道的对景建筑，主入口就设在正对英租界中街的显要位置。扩建之后的中法工商银行，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韵味已经减弱。^[15](图 4-2-19)

天津正宗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当属中街附近今泰安道的开滦矿务局大楼(1919~1921),同和工程司设计,总建筑面积9180平方米。三层建筑,有半地下室,长方形平面,中央大厅两侧是办公室。开滦矿务局大楼的泰安道正立面横向展开,严谨对称,立面构图采用正宗的横向三段竖向三段的古典主义建筑设计手法,中部十五开间作两层高爱奥尼克巨柱式柱廊。(图4-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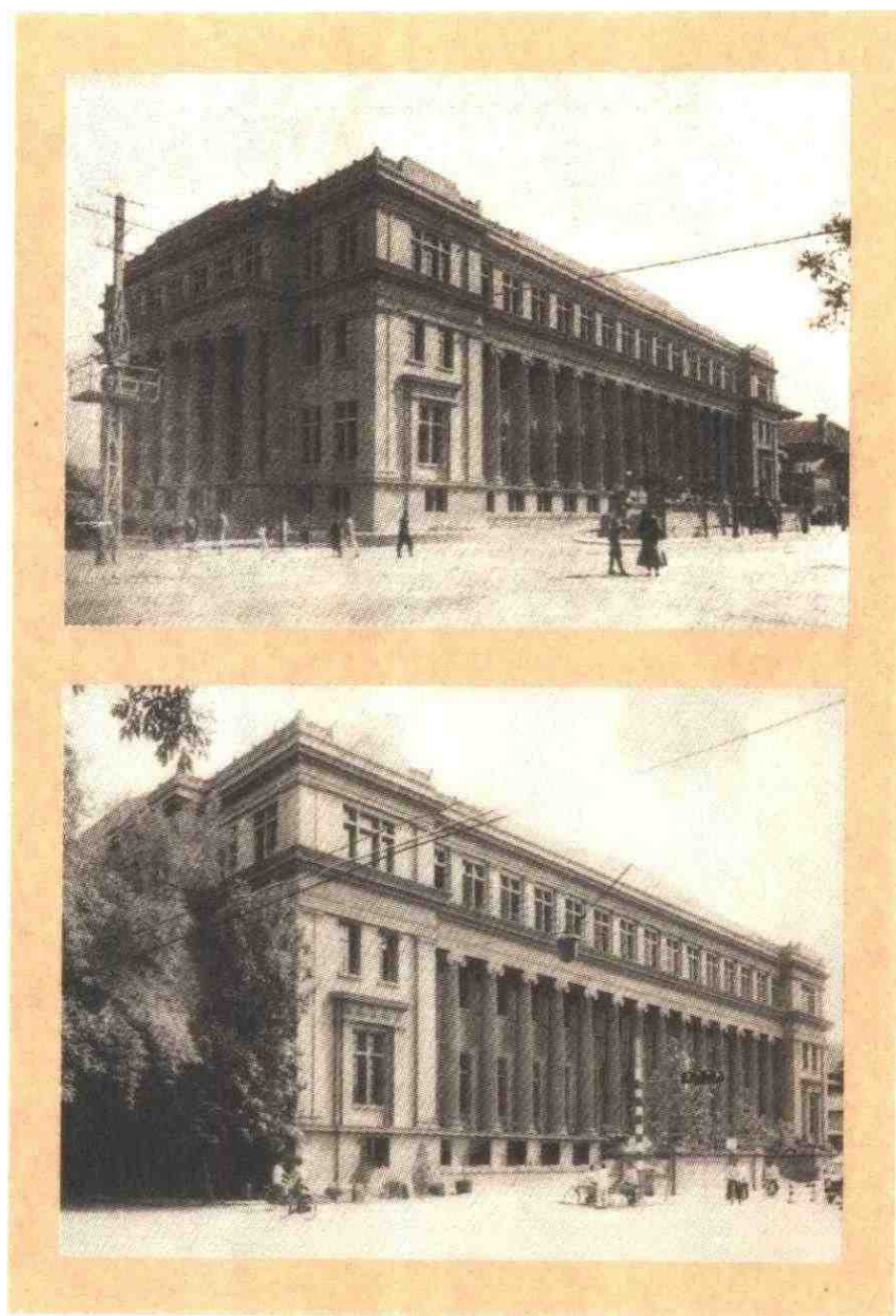


图4-2-20 天津开滦矿务局大楼。上图:开滦矿务局大楼历史照片,原图载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原书注:Architects: Atkinson & Dallas; 下图:开滦矿务局大楼现状,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武汉的西方古典主义银行建筑集中建造在汉口租界区,主要在英租界区内,典型实例是英商汇丰银行。汇丰银行1866年在汉口设立分行,曾在沿江大道建有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以后拆除改建新楼,位于汉口青岛路2号及沿江大道103号。首先建青岛路2号,英籍工程师派纳设计,1913年开工,1917年竣工。随后建沿江大道103号主楼,1914年开工,基

础完成后因欧战停建,1916年复工,1920年竣工。^[16]沿江大道103号汉口汇丰银行大楼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局部塔楼四层,并设有一层半地下室。沿江大道立面横向展开,高宽比为一比三,比例适宜。横向三段式立面构图以半地下室为基座层,一、二层作两层高爱奥尼克巨柱式,二层檐口之上是处理简洁的第三层,同样用女儿墙的高度调节横向三段的比例关系。竖向三段每一段都自成对称体系,三段组合形成对称的整体建筑构图,中部建筑处理较为简洁,用突出屋面的塔楼强调建筑构图中心。汇丰银行是汉口重要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图4-2-21,4-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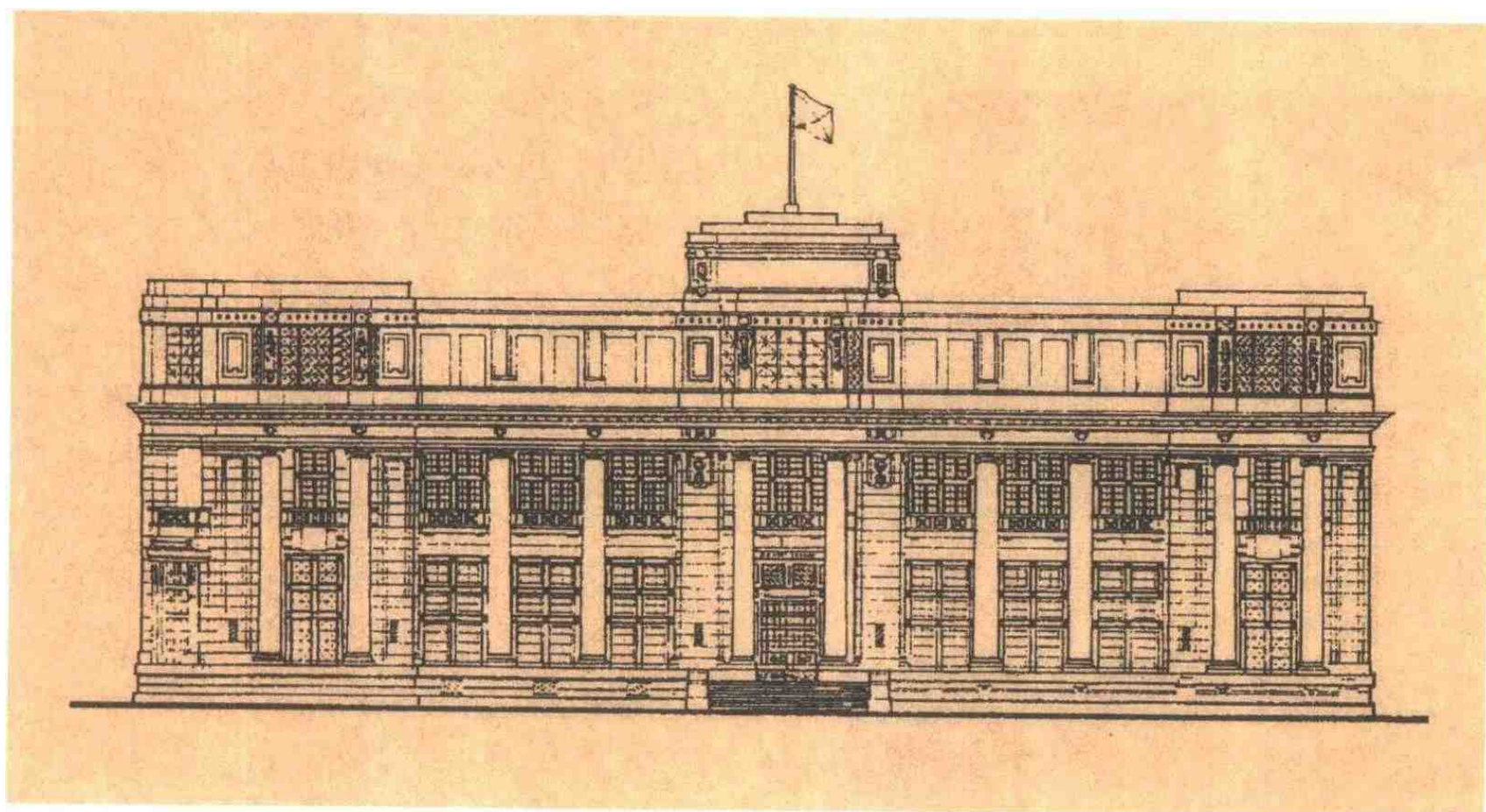


图4-2-21 汉口英商汇丰银行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图 4-2-22 汉口英商汇丰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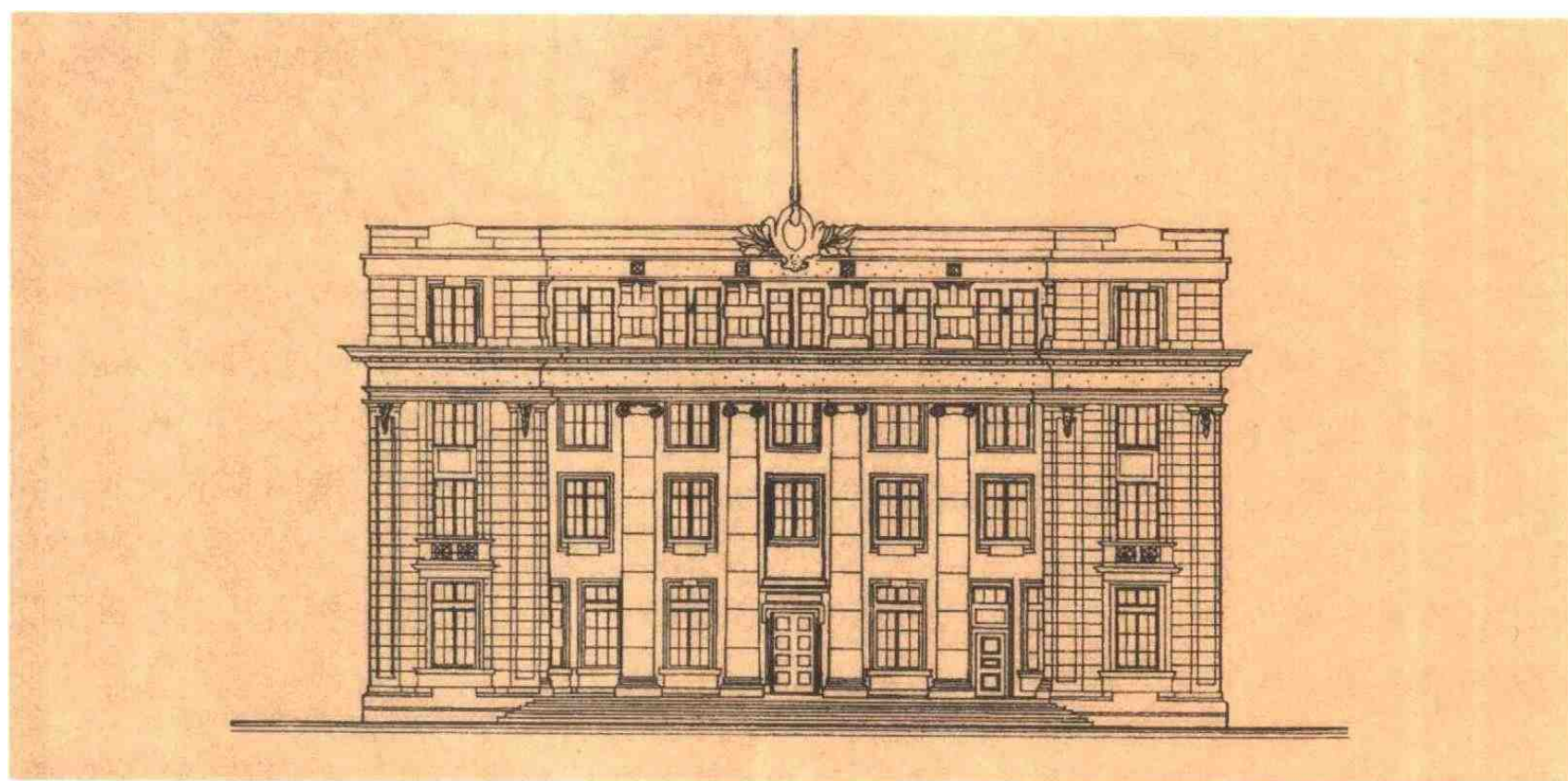


图 4-2-23 汉口交通银行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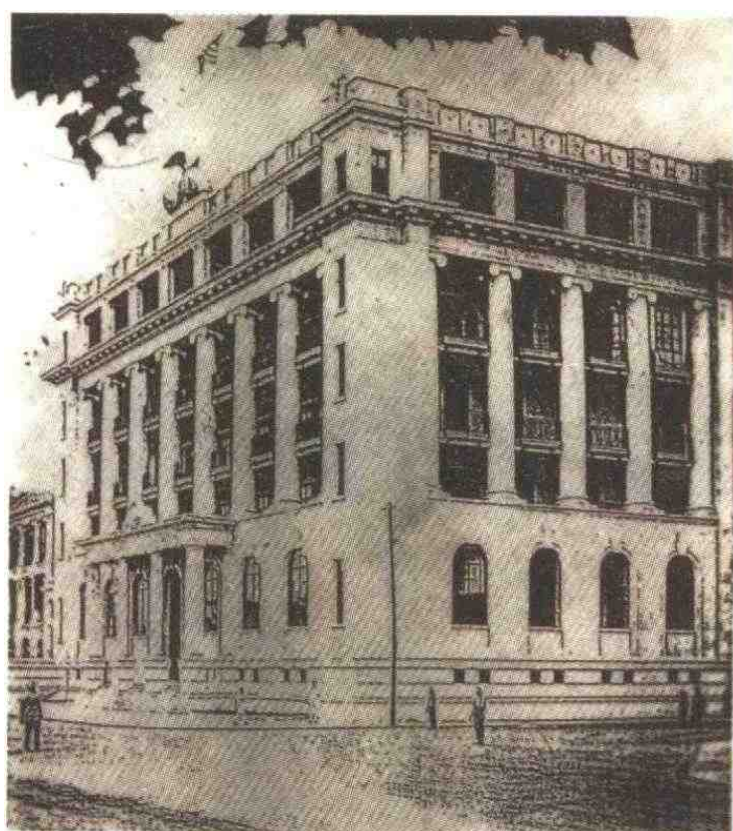


图 4-2-24 汉口美商花旗银行。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由英国建筑师翰明斯 (Hemmings), 工程师伯克莱 (Berkler) 合组的汉口景明洋行设计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有汉口交通银行(1921)。^[117]交通银行基座很矮, 三层高爱奥尼克巨柱式, 但三层之上的檐口线角亦相应加宽, 与窄窄的基座相呼应, 檐口之上是第四层, 交通银行的横向三段处理已略有变通, 但仍不失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优雅风度。(图 4-2-23)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的汉口美商花旗银行(1921)也是较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作品。^[118](图 4-2-24)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是西方建筑文化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向中国近代边缘城市扩散。在这一扩散过程中,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较为正宗的西方建筑文化产生变异,在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往往演变为“四不像”式的西方建筑文化,其中不乏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地方建筑文化融合的佳作,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一些教堂建筑,亦多有生硬拼凑的中西建筑文化混杂的产物,如重庆四川商业银行(1934)。(图4-2-25)



图4-2-25 重庆四川商业银行。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杨嵩林稿)。

三、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克隆与传播

与西方复古主义建筑相比,西方折衷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对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在近代商业建筑领域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集各种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甚至局部掺杂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的折衷主义建筑华丽新奇,引人注目,因此很得商业建筑青睐,其中巴洛克建筑手法的加盟更是大受欢迎。西方折衷主义商业建筑,以上海南京路、天津滨江道商业区最为集中,整条街道形成西方折衷主义建筑的大展台,各类建筑争奇斗艳,各式塔楼争相耸立,追求的是繁华热闹的商业氛围,建筑风格的混杂或纯正早已退居次位。

上海南京路上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首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中期(1912~1927)建造的先施公司(1917)、永安公司(1918)与新新公司(1925),四大公司中建造较晚的大新公司(1934)属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的建筑作品,已有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

先施公司位于上海南京路浙江路口,德和洋行设计,1914年开工兴建,1917年10月20日建成开业。先施公司是集商场、酒楼、旅馆于一身的综合性商业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七层建筑在南京路浙江路转角处耸起塔楼,沿街设券洞骑楼。街道转角处二、三层两层高的爱奥尼克巨柱式,阳台上精巧的铸铁花饰栏杆,再加上名为摩星塔的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塔楼,风格虽然混杂,商业气氛却很浓郁。(图4-2-26)^[19]



图4-2-26 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原图载《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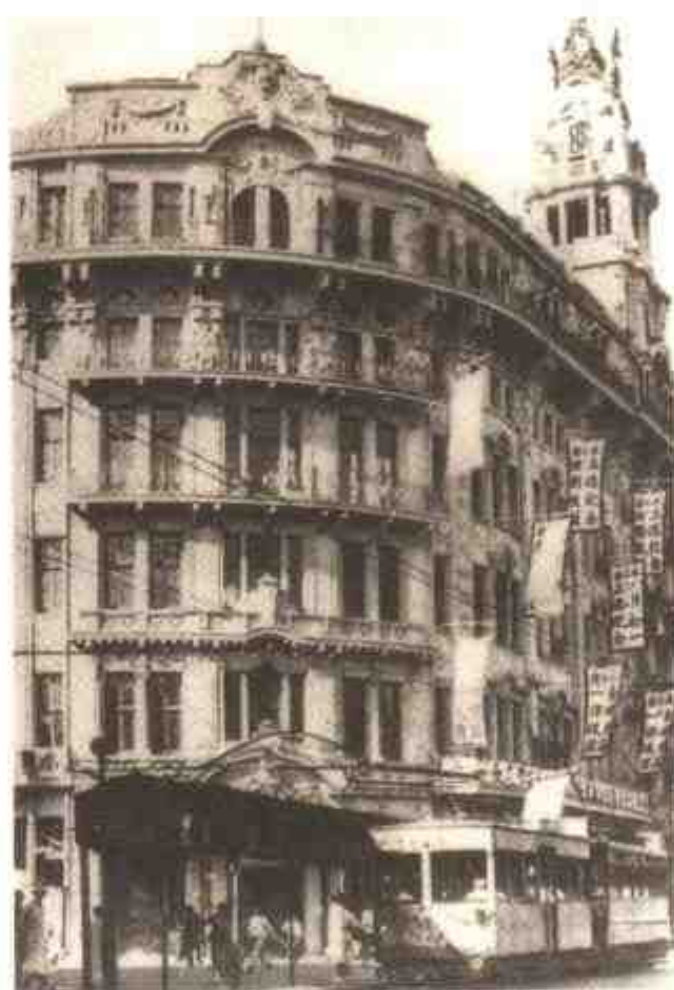


图 4-2-27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 娄承浩稿)。



图 4-2-28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 娄承浩稿)。



图 4-2-29 天津今和平路滨江道十字路口的惠中饭店。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1918 年建成的永安公司是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商业建筑,局部七层,外墙水刷石饰面,屋顶辟有“天韵楼”游乐场,同样是风格混杂的折衷主义建筑。(图 4-2-27)1925 年建成的新新公司,建筑细部处理较之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就要简洁一些。(图 4-2-28)

1900 年以后,天津的商业中心由旧城区逐渐转移到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天津劝业场一带的商业建筑与中街的银行建筑基本上是同一时期建造的,这些商业建筑与严谨的古典主义银行建筑不同,体型富于变化,多种风格的建筑设计手法并用,基本上属于西方折衷主义建筑范畴,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也已受到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

天津今和平路滨江道十字路口首先建造的是浙江兴业银行(1923~1925)。浙江兴业银行对角的惠中饭店(1926)是五层旅馆建筑,局部六层,一层是商业铺面。惠中饭店二至四层用竖向壁柱与水平窗间墙把立面划分为均匀的网格,由白色的窗框与窗四周一砖宽的清水红砖墙组成的构图单元在立面上均匀地重复,已经是现代建筑设计手法。五层作上下两道檐口,全部作水刷石面层以区别于二至四层,仍维持着古典的横向三段式构图模式。转角处中部三开间高出一层,三檐窗仅正中一檐作半圆券窗,这是整个立面上惟一的一檐半圆券窗,极小的一点变化,加强了中部三开间的构图中心地位。六层之上是高高的方塔,塔顶是法国古典风格的方底穹顶。(图 4-2-29)

1926 年,天津的买办富商高星桥在今和平路滨江道路口重金购地筹建劝业商场,由法国建筑师慕乐(Müller)当家的永和工程司设计,1928 年 12 月竣工开业。劝业场的建成是天津法租界商业中心形成的标志。随后高星桥在劝业场对面的路口购地,于三年后的 1931 年建成交通旅馆。自此,十字路口四角高大建筑对峙,加上四周陆续建造的大小商业娱乐建筑,繁华闹市远远超过了古老的旧城区,劝业场也成为天津的标志性建筑。

劝业场为方形平面,沿街随道路走向呈锐角形,钢筋混凝土结构,营业厅中部设四层高的中庭,正中布置相对的两部对分式楼梯,从四面进入的顾客都可方便地使用,三个入口附近都另设楼梯,可不进入一层营业厅而直达各楼层,在非常拥挤的情况下人流疏散也很顺畅。劝业场六、七层是娱乐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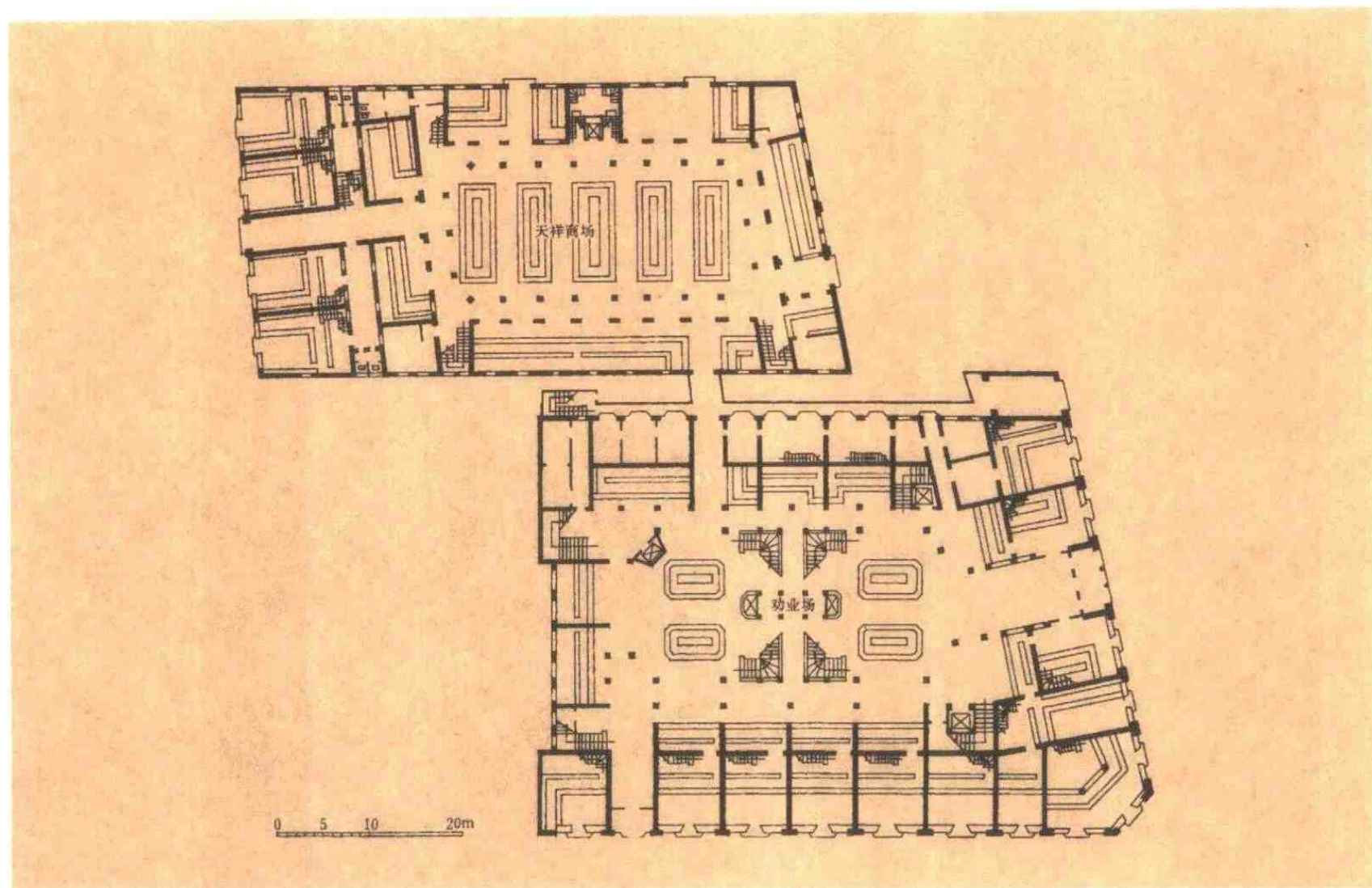


图 4-2-30 天津劝业场及天祥商场平面图。

所,设有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宫影院及天露茶社、天纬球社,夏季还在晒台上开设天外天露天剧场。(图 4-2-30)

劝业场主体五层,局部七层,转角处建有两层八角形塔楼,共九层,塔楼上立两层圆亭,上具穹顶,形成建筑构图中心,也成为城市中心的制高点,商业中心的标志。劝业场临街一层挑出通长挑檐,入口处挑檐升起作半圆券,并有复杂的花饰;五层厚重的檐口有牛腿支撑,装饰较繁;沿街立面的窗已经简化,将每开间的窗三等分,窗间墙与之呼应,亦作三等分简洁装饰,形成规整的韵律感。沿街立面局部设计饰有塔斯干柱式的凹廊,局部挑出阳台,又将方窗与半圆券窗交替使用,使立面有凸有凹,丰富多变。总之建筑师将各种设计手法混合使用,以追求商业建筑应有的丰富多姿的商业气氛,但仍保持构图完美、杂而不乱,是高水平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作品。(图 4-2-31,4-2-32,4-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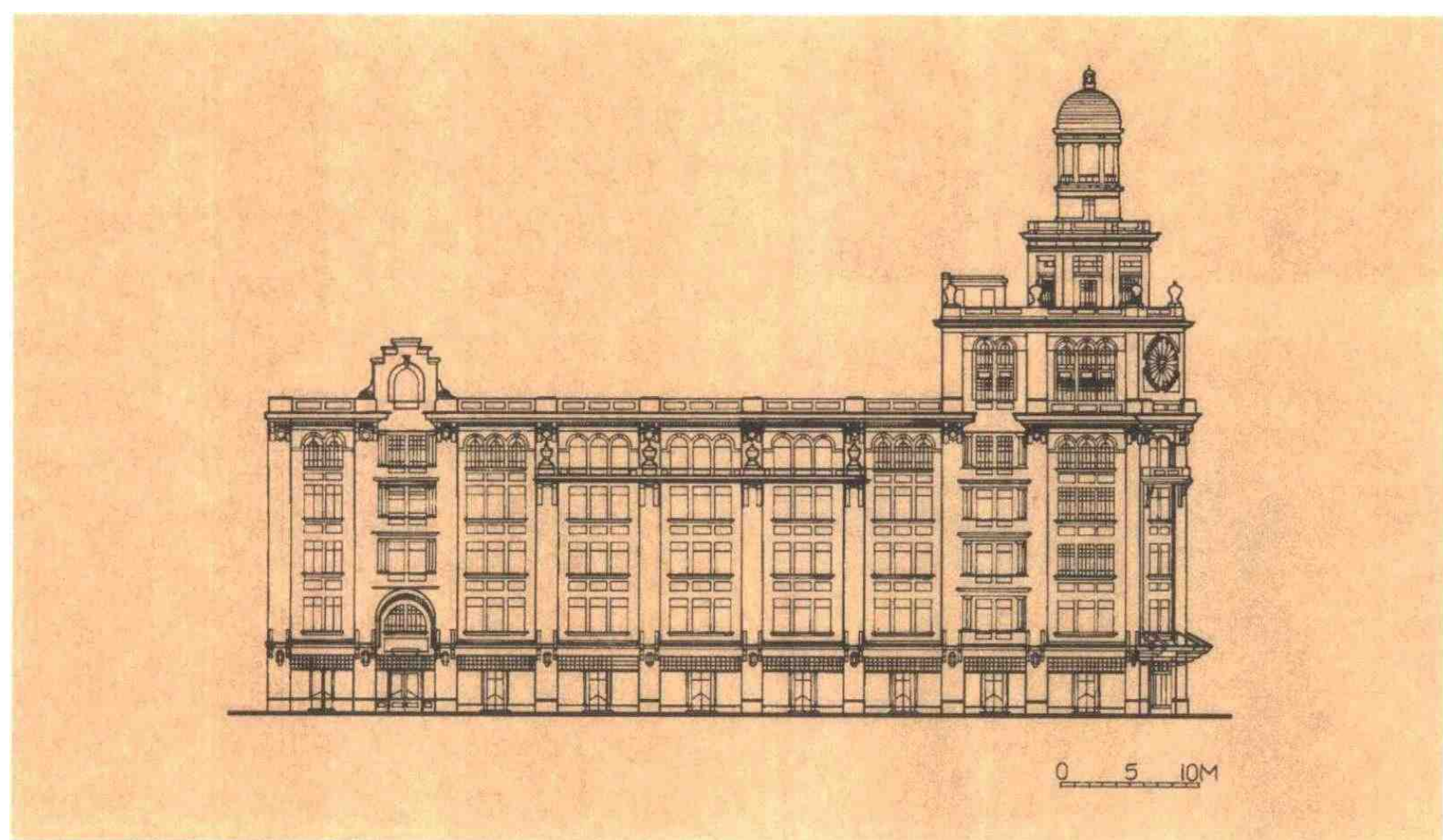


图 4-2-31 天津劝业场沿滨江道立面图。



图 4-2-32 天津劝业场。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左)

图 4-2-33 天津劝业场和平路入口。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右)



图 4-2-34 天津滨江道基泰大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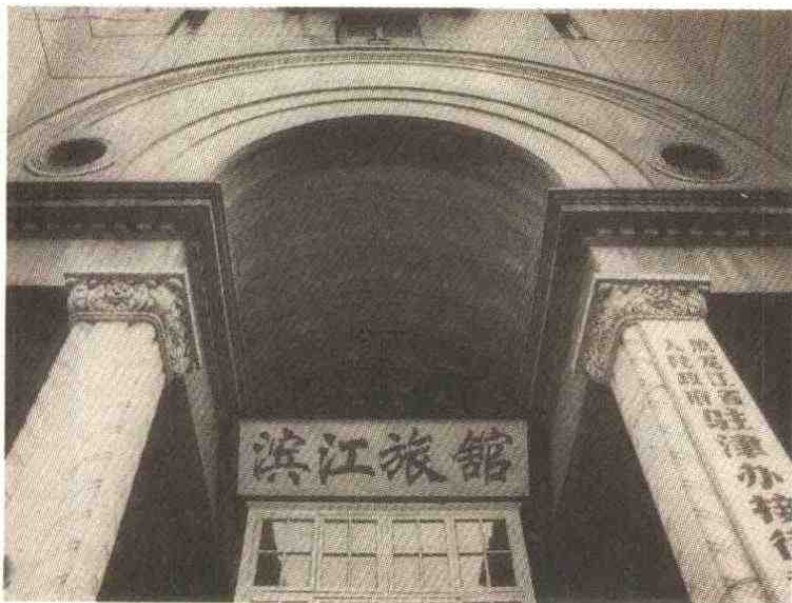


图 4-2-35 天津滨江道基泰大楼入口。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这一时期天津劝业场一带陆续建造的商业娱乐建筑很多,如与劝业场只隔一条防火道的天祥商场(1924),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营业厅中央设四层高中庭,侧天窗采光,中庭大跨度屋顶是木结构,其和平路立面则为三层,首层建有骑楼。天祥商场对面建有三层泰康商场(1927)。滨江道上的基泰大楼(1928)由基泰工程司设计,底层铺面,二、三层供出租用,四层是基泰工程司的办公室与绘图房。临街立面的墙面用青红砖相间砌出图案,人口处作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半圆拱券券廊,柱式却是伊斯兰风格的束柱,也是集各种风格于一身的折衷主义建筑作品。(图 4-2-34,4-2-35)

武汉的商业区集中在汉口英租界歆生路(今江汉路)一带。天津与武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城市,天津社会动荡与战争破坏的影响在 1900 年至 1937 年间主要集中于华界区,租界区基本上未受影响,所以有天津租界区 1900 年至 1937 年相对平稳的城市发展兴盛期。汉口五国租界区的面积(2800 亩)比天津的八国租界区(22874.5 亩)小得多,仅为天津租界区总面积的 12%,与汉口旧城区面积大致相同,汉口始终是租界区与旧城区同步发展的城市。而在 1900

年至1937年间,1911年辛亥大火使汉口旧城区元气大伤,1926年汉口官钱局倒闭使工商界受到沉重打击,1927年汉口英租界收回,1927年前后武汉政局动荡。处于多事之秋的武汉与上海、天津相比,城市建设就相对滞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歆生路一带的建筑活动才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开工,1931年建成,由上海联保水火公司投资兴建的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最重要的西方折衷主义商业建筑。^[120]

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是五层综合商业建筑,转角处建有三层塔楼,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构成要素混杂使用,也是西方折衷主义建筑作品。(图4-2-36,4-2-37)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的建筑整体构图也很完美,但左邻右舍缺少与之呼应的大型商业建筑,就没有形成如上海南京路、天津劝业场一带的商业中心区那样的整体建筑氛围。作者1980年秋在武汉调研,当时紧邻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的江汉一路临街仍是底层小铺面,二层住家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口近代城市发展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的相对滞后状况。(图4-2-38)虽然汉口城市发展的近代化进程与上海、天津相比不够充分,但与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相比仍是名列前茅的城市。

比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商业建筑更严肃、也更具纪念性的是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官方建筑,典型实例是上海江海海关大楼与汉口江汉关大楼。

上海江海海关大楼位于外滩汉口路路口,占地面积5915平方米,建筑面积20373平方米,与汇丰银行毗邻,二者体量相当,亦由汇丰银行的设计者公和洋行设计。^[121]在外滩最重要的地段毗邻的两座重要建筑由同一家高水平的设计事务所设计,协调统一,格调典雅,为外滩建筑群的整体效果增色。江海关大楼于1925年12月15日奠基,1927年12月19日启用,距汇丰银行落成(1923年6月23日)仅四年多时间。江海关大楼是高水平的西方折衷



图4-2-36 汉口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照片由作者摄于1980年。



图4-2-37 汉口璇宫饭店入口。照片由作者摄于1988年。



图4-2-38 汉口江汉一路紧邻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的临街建筑,1980年仍是底层小铺面、二层住家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照片由作者摄于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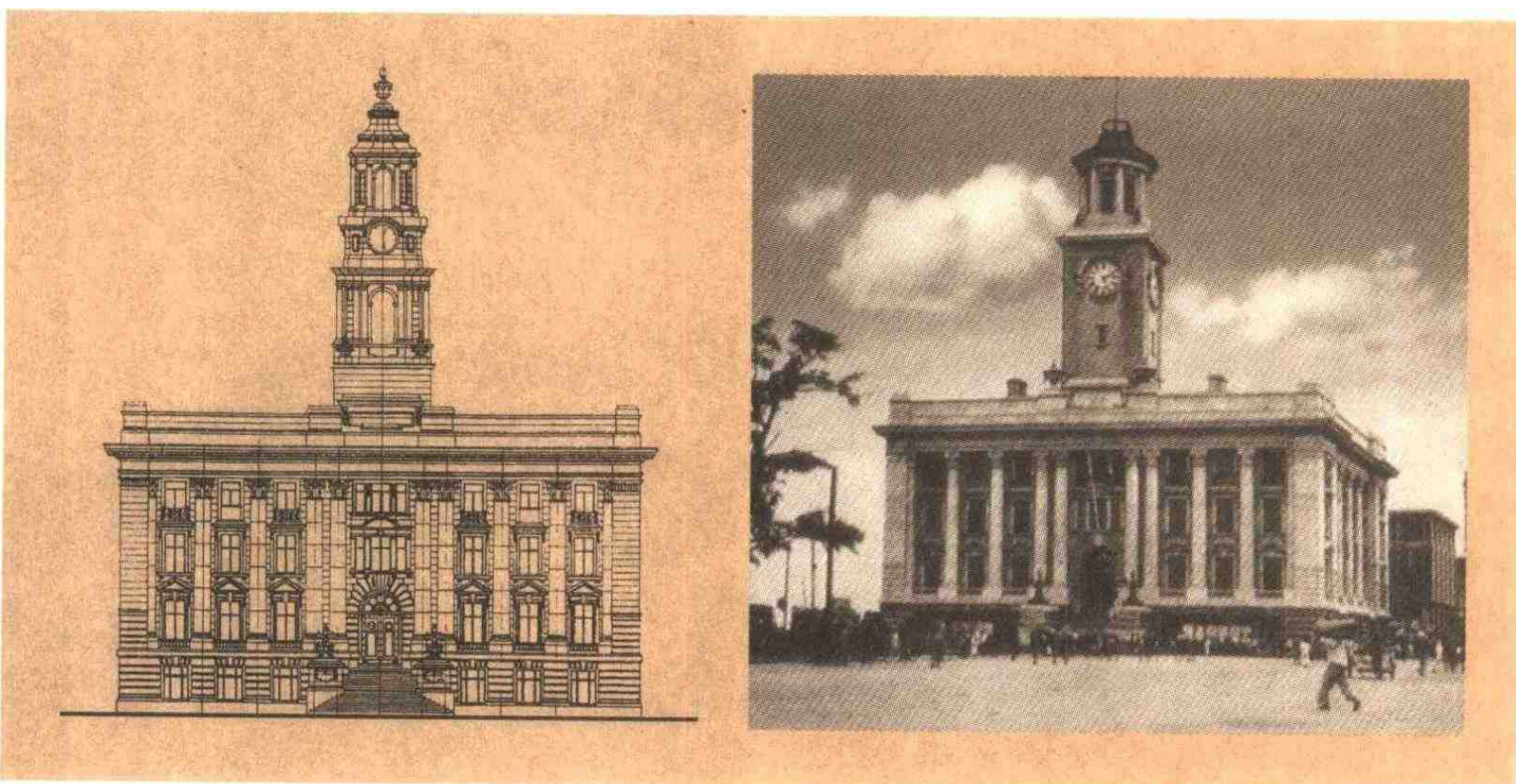
主义建筑作品,仍然使用横向三段、竖向三段的立面构图手法,入口处门廊建有地道的希腊陶立克柱式,但已留下受现代主义建筑影响的印迹。与汇丰银行相比,装饰简化,更注重体量组合的大效果,七层檐口之上建筑四角设计造型简洁的小塔楼,八层之上是中央方形钟塔,典雅端庄,建筑形式构图十分完美。建筑四角的小塔楼窗上尚有古典形式的三角形山花,中央钟塔则重在体量变化及其比例尺度的推敲,古典装饰已经很少。江海关大楼是公和洋行在上海的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作品的关门之作,此后公和洋行在上海的建筑作品已经开始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但学院派建筑师的基本建筑素养却不会与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一起消失,学院派建筑根底深厚的建筑师们接受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观念,依然是上海近代建筑创作的佼佼者。(图4-2-39)

上海思九生洋行设计的汉口江汉关大楼(1921~1924)建造时间比上海江海关大楼略早,大致与上海汇丰银行同期建造,也是典型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作品。^[2]江汉关大楼位于沿江大道江汉路路口,沿江大道在江汉路路口处略有转折,形成江汉关三面临街的特

图4-2-39 左:上海江海关大楼。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风格》。右:上海江海关大楼。照片由作者摄于2000年。



图4-2-40 左:汉口江汉关大楼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右:明信片中的汉口江汉关大楼。原图载《老明信片·建筑篇》。



殊地形,设计者因借地形,建筑平面设计为Π形,沿临江巷与沿江大道的两翼随街道走向倾斜,以面向英租界的北立面为正立面,正立面四层主楼之上设计四层塔楼,沿临江巷与沿江大道的两个侧立面也都作对称构图处理。江汉关大楼正立面仍遵循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横向三段、竖向三段的基本构图模式,但变形的三层高科林新巨柱式,人口处粗犷的蘑菇石半圆拱券大门,及高耸的钟楼等已构成其西方折衷主义建筑的基调。江汉关主体建筑水平展开,钟楼高高耸起,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系,是中国近代建筑中塔楼建筑的优秀作品,成为汉口沿江大道的重要景观建筑。(图4-2-40)

第三节 前期局部地区新艺术运动建筑东进与后期整体趋势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

一、哈尔滨建城初期的新艺术运动建筑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与发展于欧洲和美国的装饰艺术运动。对建筑艺术而言,新艺术运动建筑是从十九世纪欧美流行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走向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过渡阶段。贡布里希在他的名著《艺术的故事》中这样论述这一段历史:“从表面上看,19世纪末期是非常兴旺的时期,甚至是自鸣得意的时期。但是那些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的艺术家和著述家们对那种取悦公众的艺术目标和方法日益不满。建筑成为他们最便于攻击的靶子,建筑术已经发展成一套无意义的常规。我们还记得,在大规模扩建的城市里怎样矗立起巨大的公寓楼、工厂和公共建筑物,各种风格杂陈并出,跟建筑物的目的毫无联系。通常像是由工程师首先立起一个适合建筑物内在要求的结构,然后再从一本论“历史风格”的范本中找出一种装饰形式,在建筑物立面上粉饰出一点“艺术”。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建筑家竟有那么多年一直对这种程序感到满足。因为公众需要那些圆柱、半柱、腰线和线脚,那些建筑家就供应给他们。但是在19世纪即将结束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风气荒唐可笑。特别是在英国,批评家和艺术家对于工业革命造成的手工技艺普遍衰落的现象感到伤心,讨厌看那些根据一度有其意义和价值的装饰品仿制的廉价、俗气的机制装饰品。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那样一些人梦想彻底改革工艺美术,用认真的富有意义的手工艺去代替廉价的大批生产。他们的批评有广泛的影响,尽管他们所提倡的简陋的手工艺在现代的环境中已被证明是最大的奢侈。他们的宣传不可能废止工业大生产,但却有助于人们看清他们提出的问题,使更多的人爱好真实、单纯和“手工的”产品。”

拉斯金和莫里斯本来还指望通过恢复中世纪的创作条件使艺术获得新生。但是许多艺术家看到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渴望以一种新感受对待设计和各种材料自身所具有的潜力,去创造一种“新艺术”。于是在19世纪90年代举起了这面新艺术即Art Nouveau的旗帜。建筑家开始采用新型材料和新型装饰进行建筑实验。如前所述,希腊柱式本是从原始木头结构发展而来,从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建筑装饰业一直用做开业的家当。然而现在,当一种使用铁和玻璃的新建筑已经不知不觉地悄然出现在火车站和工业建筑中时,难道不正是这种新建筑演化出它自身装饰风格的大好时机吗?如果西方建筑过于墨守旧的建筑法成规,那么东方能不能提供一套新样式和新观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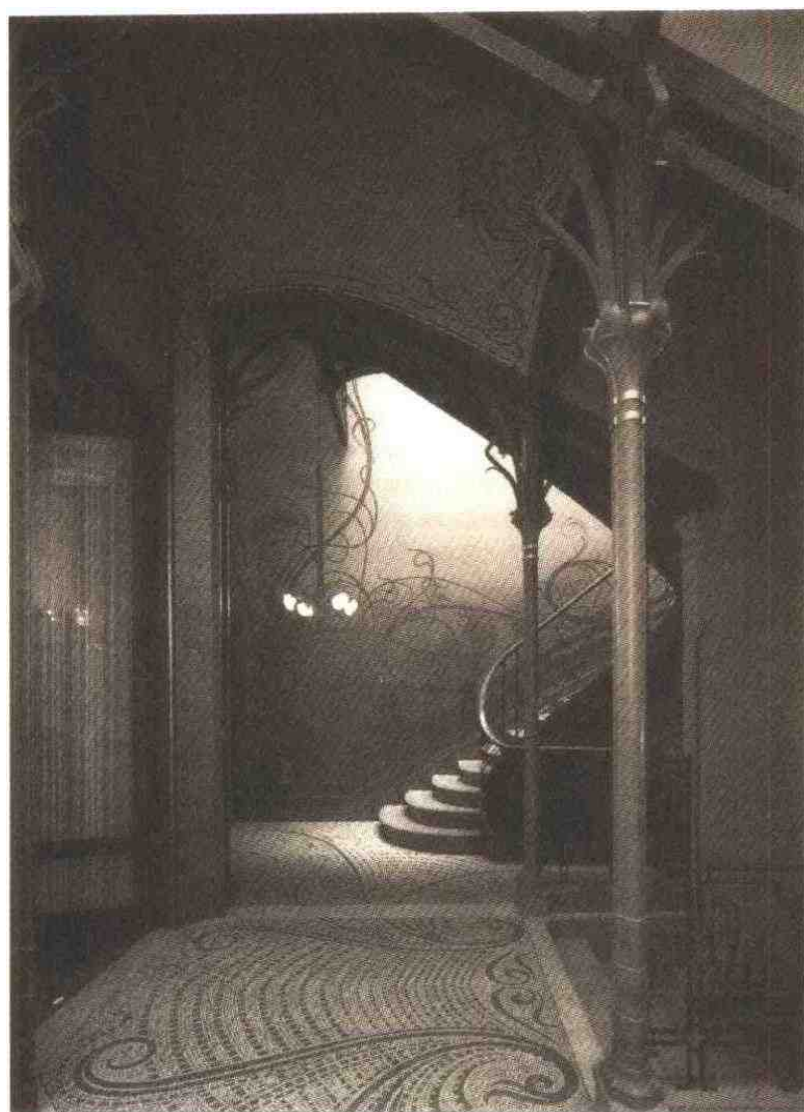


图 4-3-1 霍尔塔的新艺术运动建筑作品——布鲁塞尔塔塞尔旅馆室内。原图载《艺术的故事》。



图 4-3-2 霍尔塔的新艺术运动建筑作品——索尔维饭店。原图载《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

这种推理一定隐含在比利时建筑家维克托·霍尔塔 (Victor Horta, 1861~1947) 的设计方案的背后, 他的设计一出世就获得成功。霍尔塔从日本艺术中学会放弃对称构图, 学会欣赏我们记忆之中的东方艺术所具有的弯曲弧线的效果。但他并不仅仅模仿, 他把那些线条移植到跟现代要求十分相宜的铁结构之中。从布鲁内莱斯基以后, 这还是第一次给欧洲建筑者提出一种全新的风格。难怪这些发明创造会被归入新艺术运动之中。”^[123]

霍尔塔是新艺术运动建筑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作品布鲁塞尔的塔塞尔旅馆 (1893) 被认为是新艺术建筑的第一件作品, 铁制的栏杆、柱式及各种装饰品是作者运用新材料表达新的设计理念的结果, “在新艺术运动发展的初期, 该建筑说明了这种新的建筑风格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它完全摆脱了历史主义的影响并在细节处理上非常紧凑。”^[124] (图 4-3-1) 霍尔塔稍后设计的布鲁塞尔人民大楼 (1895, 已拆除), 建筑立面上已经布满精美的钢构架与大面积的玻璃窗。霍尔塔的新艺术运动建筑作品还有索尔维饭店 (1895~1900) 等。(图 4-3-2)

新艺术运动兴盛的时间不长, “新艺术在各种美术中是一种过渡性的风格, 一种短命的现象。从它过分的装饰性线条与它有些柔弱的形来看, 它是一种有意地在其他风格主义的时期中寻找范例的风格主义美术, 它也是一种抗议的、依赖于一个唯一的宣言的美术, 这个宣言一旦提出, 就没给进一步完善留下余地。不过, 这个宣言对各种美术具有深刻的解放作用; 尽管它有着软弱无力的精致, 但正是新艺术在美术界注入了激动并

提供了令美术与公众的想象得到最终解放的冲击, 以便使他们接受并期待新的形与空间的表现方式。因此, 与其说它是一种逆流的运动, 不如说它是一条水道更恰当, 十九世纪的潮流经由它涌入了二十世纪。”^[125]

就是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 新艺术运动建筑几乎与欧洲国家同步出现在 1898 年作为铁路附属地城市建城的哈尔滨。新艺术运动建筑通过法国传到俄国, 又由俄国殖民者带到建城初期的哈尔滨, 这是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

1903 年建造的哈尔滨火车站是新艺术运动建筑的典型作品, 惜于 1959 年拆除, 今天

我们只能从图纸与照片上领略它的风采。哈尔滨火车站平面大致为一字形,但正面略有凹凸,中央主入口处凸出较多,两翼凸出较少。哈尔滨火车站建筑设计的一大特点是在大体对称的整体格局中作局部不对称处理,这是高水平的建筑设计手法,也是新艺术运动建筑抛弃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强调的对称构图设计理念的结果。(图 4-3-3)在这一点上,哈尔滨火车站的建筑设计堪称完美。自然界的事物,包括植物、动物等,或基本对称,或不对称,但不会绝对对称,因而丰富生动;绝对对称是人工制造的产品才具有的特性,往往失之刻板。新艺术运动建筑从自然获得灵感,建筑从大格局到细部处理常取不对称构图,其装饰部件则常用金属材料模仿植物形态的天然曲线,丰富、多变、生动。哈尔滨火车站中央入口部分取对称构图,两侧翼在基本设计手法相同的前提下作不对称处理,使建筑的构图中心突出又充满生气,是很高明的设计手法。“哈尔滨火车站立面具有强烈的雕塑感,韵律节奏十分突出,门窗洞口脱离常规,采用圆角方额或三心拱券扁圆洞口。在洞口券额部位饰以凹凸的几何线纹,沿洞口周边做贴脸边框,以突出夸张洞口。窗间墙以圆盘或圆环与成组的竖向飘带状线纹结合而成的凹凸花饰代替古典壁柱。在重点部分经常以夸张的尺度突出曲线花饰,经常出现二次抛物线或落水曲线形体的装饰件。檐口部位与众不同,既不采用严谨的挑檐,也不采用镂空的女儿墙,而是将门窗间墙垛直接通天,做成上下贯通的装饰件,有时间断地保留一点挑檐,但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装饰,已失去常规挑檐的功能。檐口栏杆和雨篷支撑则采用模仿植物形态的金属件,增强了时代感。”^[126](图 4-3-4,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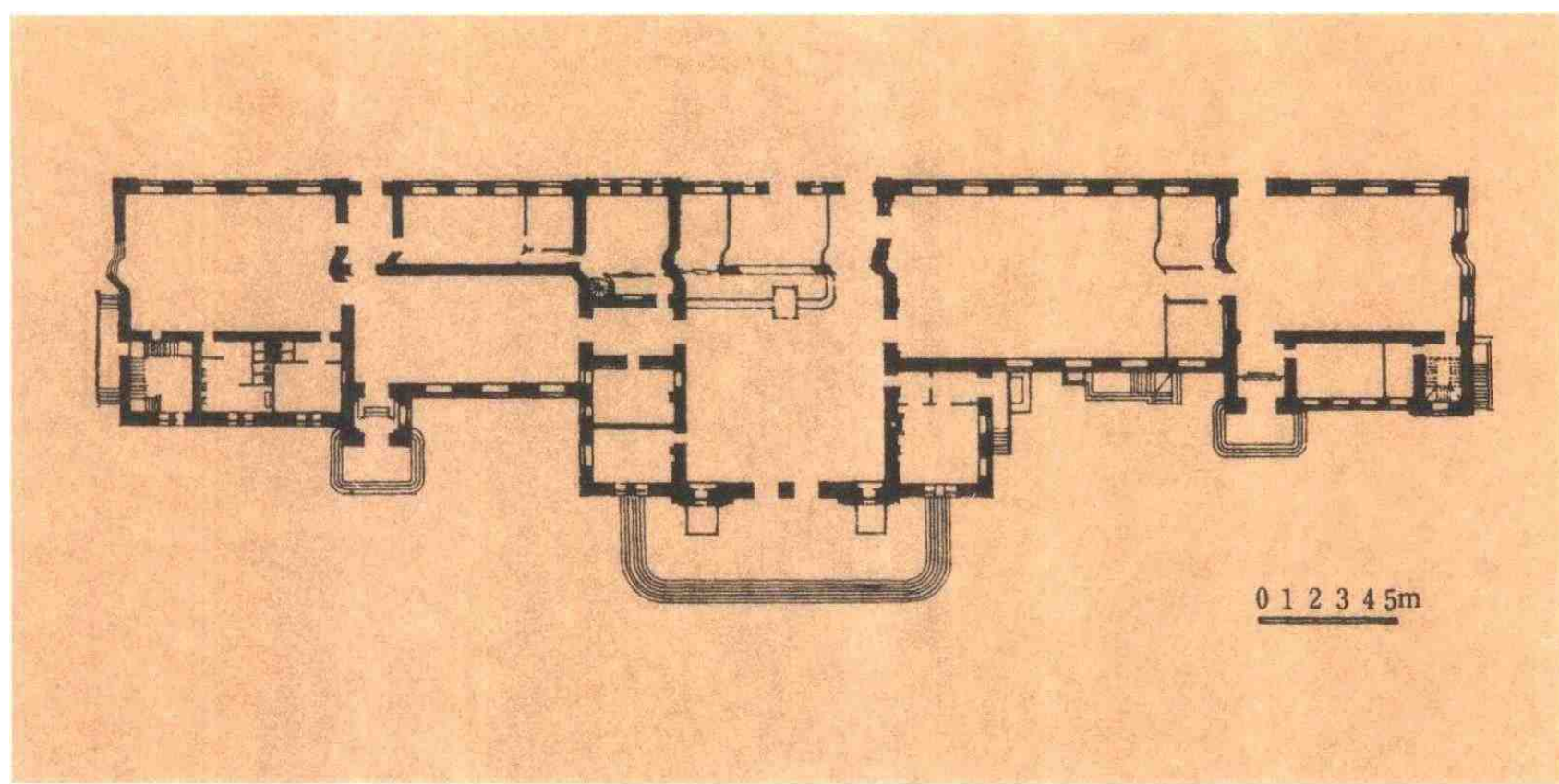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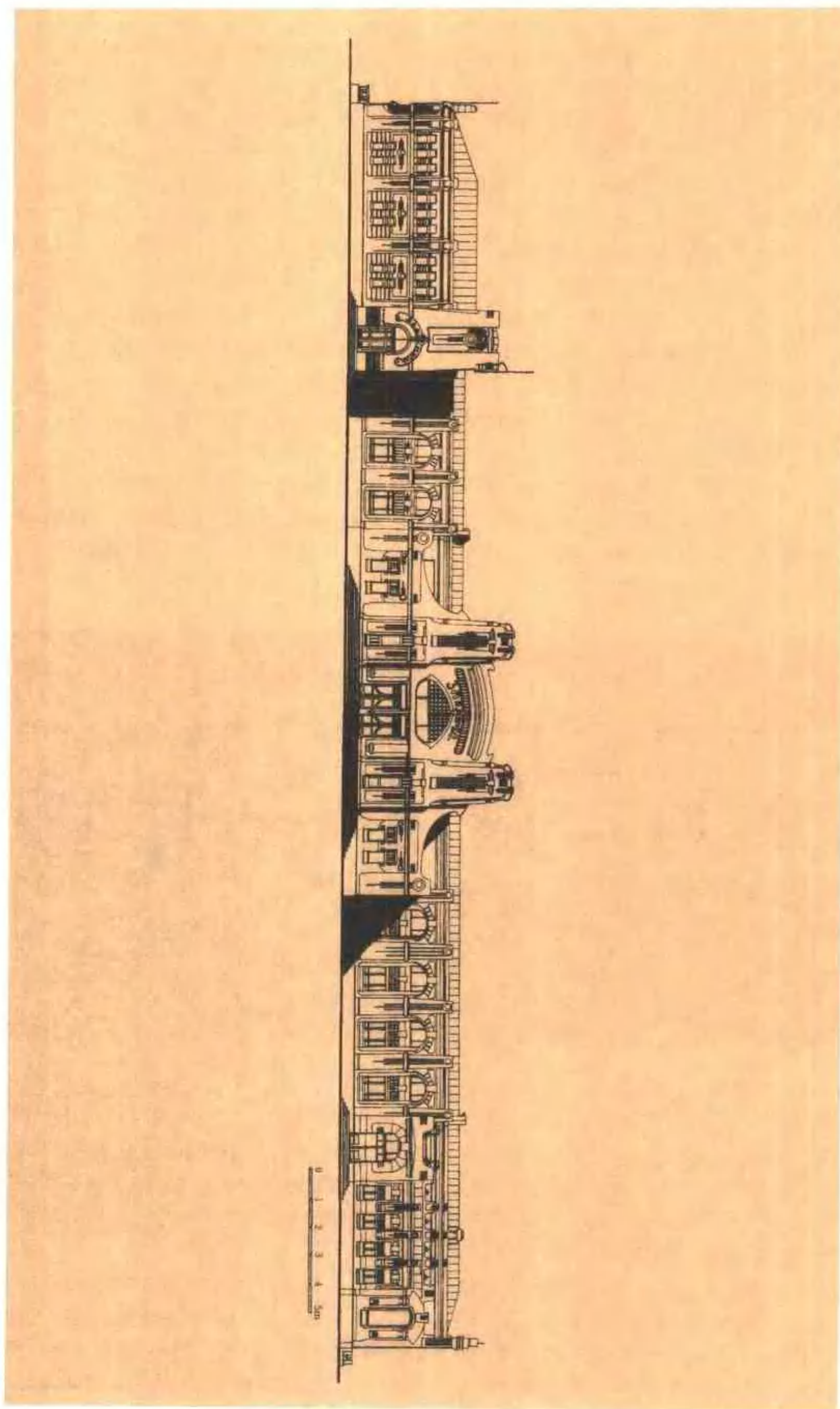


图 4-3-3 新艺术运动建筑作品——哈尔滨火车站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1904年)规模很大,也是新艺术运动建筑的优秀作品,装饰简化,施工精细,淡绿色石材饰面,楼前留有面积很大的广场。(图 4-3-6)位于南岗喇嘛台广场(今博物馆广场)西北侧的莫斯科商场(1906),由三个标准单元与两个转角单元组合而成,拱券门窗洞口、通天的曲线墙垛及檐口处理手法都与哈尔滨火车站类似。屋顶做红色法国式方底穹顶,使建筑色调丰富,天际轮廓线富有变化。这座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商场于 1922 年改为博物馆。(图 4-3-7)

哈尔滨早期建造的新艺术运动建筑还有火车站前红军街的某旅馆(1904,原设计为旅馆,一度改为沙俄高级军官俱乐部,后改为中东铁路理事会,日军侵占哈尔滨后改为大和旅馆)、(图 4-3-8) 中东铁路理事事务室兼住宅(1908)、南岗公司街 32 号住宅(约 1908 年)、南岗花园街中东铁路局副局长级官员住宅(20 世纪 10 年代)、(图 4-3-9,4-3-

图 4-3-4 哈尔滨火车站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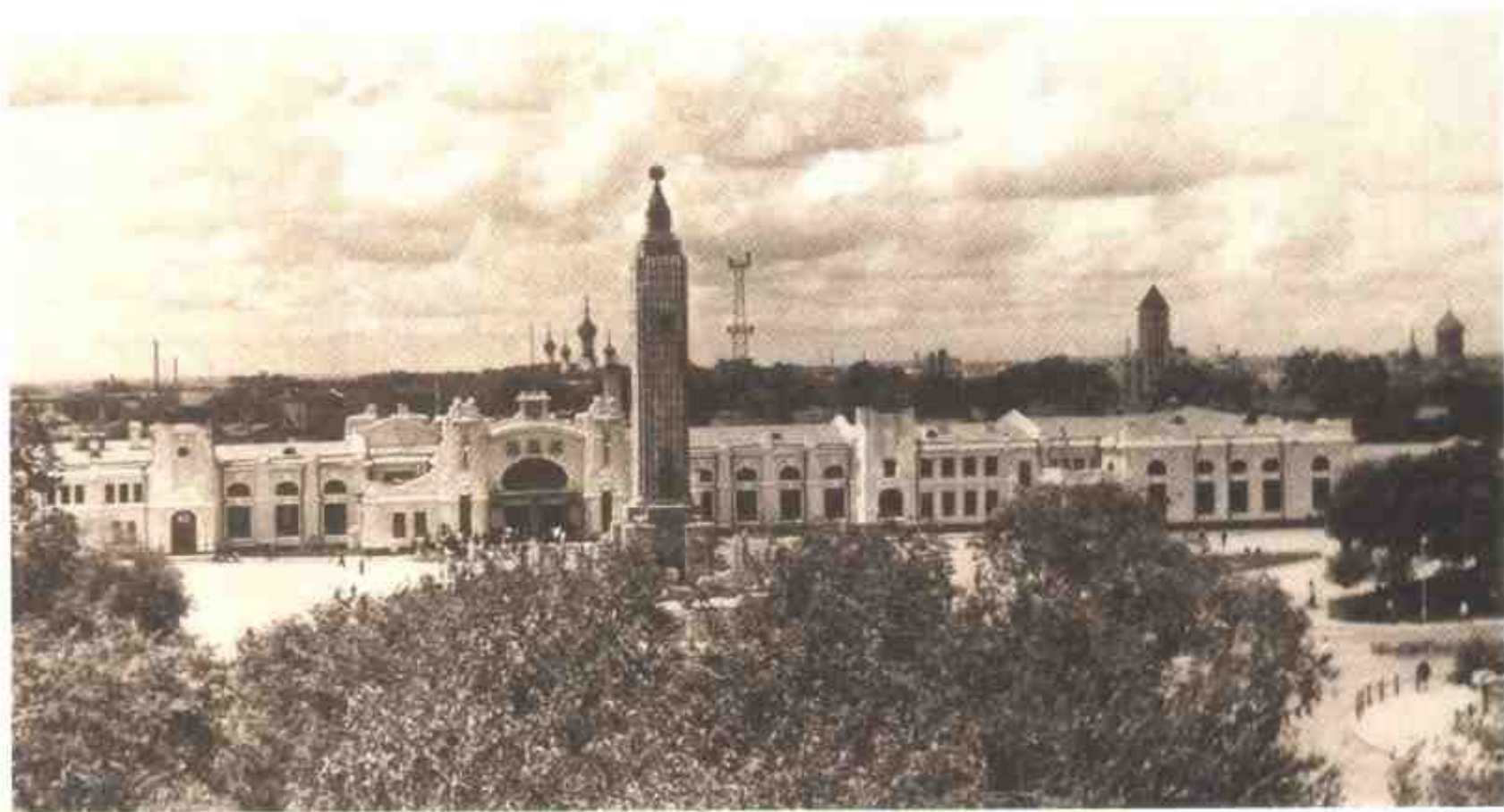


图 4-3-5 哈尔滨火车站历史照片。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图 4-3-6 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照片由作者摄于1993年。



图 4-3-7 哈尔滨南岗喇嘛台广场(今博物馆广场)西北侧的莫斯科商场,1922年改为博物馆。照片由作者摄于1993年。

图 4-3-8 哈尔滨火车站前红军街的某旅馆。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3 年。



10) 南岗红军街沙俄外黑龙江军区总司令官住宅(1904 年)等。稍晚一些建造的有道里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1913 年),(图 4-3-11) 更晚一些建造的有道里中央大街维克多利餐馆(1927 年,今哈尔滨摄影社)等,(图 4-3-12)是在欧美新艺术运动建筑已经衰落时,仍在哈尔滨惯性延续的受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影响的建筑。^[127]

哈尔滨建城初期建造的这批新

图 4-3-9 左:哈尔滨南岗花园街中东铁路局副局长级官员住宅平面图。右:哈尔滨南岗花园街中东铁路局副局长级官员住宅。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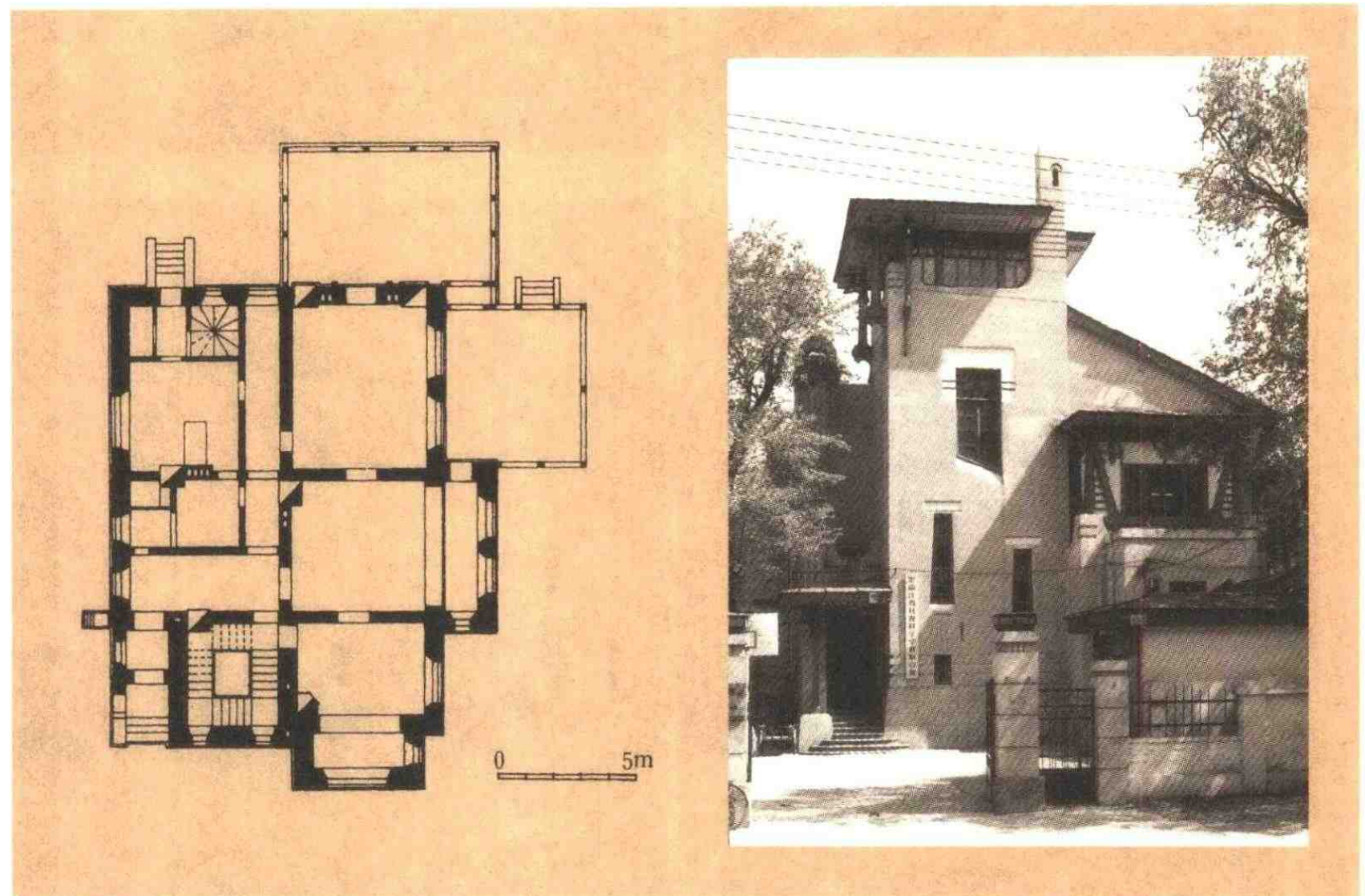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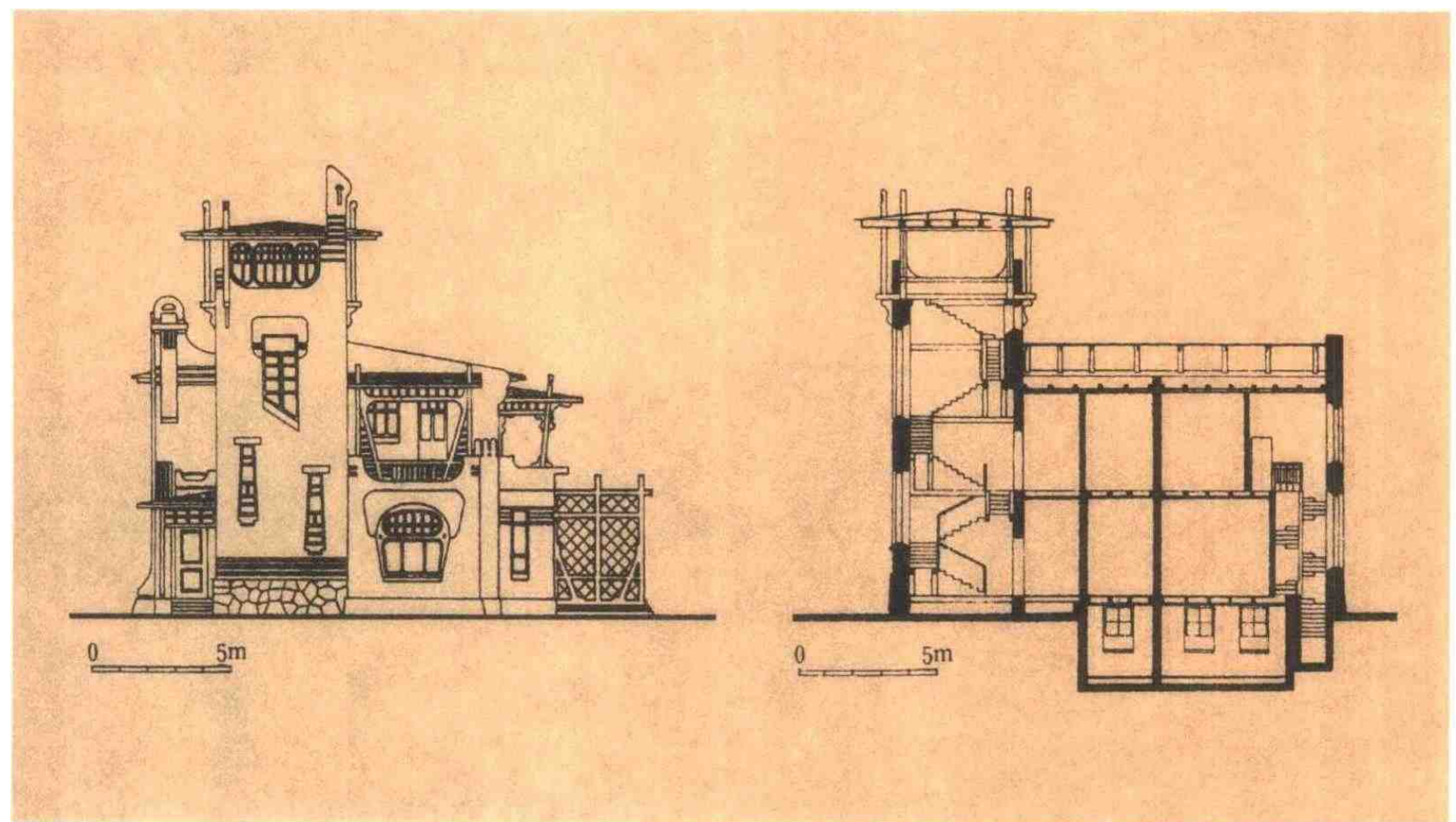


图 4-3-10 哈尔滨南岗花园街中东铁路局副局长级官员住宅立面、剖面图。左图:立面图;右图:剖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艺术运动建筑作品,“多为2-3层楼的砖木结构,外观形体较简洁,摒弃了陈旧的古典柱式,多用优美的曲线形体,门、窗常常呈半圆、椭圆、扁圆、方额圆角、三心拱券等形式,周边绕以柔和优美的曲线贴脸,墙墩、女墙、垂带常用流畅的抛物线形曲面;墙面饰以环线、竖线、曲线等富于流动感的线角,檐部多以窗间墙垛通天,点缀间断的挑檐,阳台栏杆、檐口栏杆、楼梯栏杆、门窗棧条和室内装饰,大量采用铁质植物卷曲花饰,建筑形象活泼生动,新颖亲切”。^[128]如前文所述,新艺术运动建筑对后期哈尔滨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也产生局部影响,使之掺杂了新艺术运动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

“‘新艺术运动’最后被1907年出现的以工业家、艺术家、建筑家、社会学家合办的‘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 Werkbund所取代。‘新艺术运动’和‘德制联盟’都是继承1875年开始的英国拉斯金与莫里斯倡议的‘工艺美术运动’,所不同的是英国人要复古,而德国人正相反,要使机器产物变为艺术品。”^[129]“工艺美术运动”分道扬镳,“新艺术运动”至1910年前后结束了它的使命,“德制联盟”则成为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声。如前文所引,新艺术是一条水道,“十九世纪的潮流经由它涌入了20世纪”。建城初期的哈尔滨是一张白纸,不存在任何建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建筑风格,新艺术运动建筑在欧洲产生的社会背景在哈尔滨并不存在。换言之,建城初期的哈尔滨并不存在“十九世纪的潮流”,哈尔滨的新艺术运动建筑也就不存在这种“十九世纪的潮流经由它涌入20世纪”的建筑史上的重要意义,剩下的只是建筑形式的克隆。所以,1910年以后,新艺术运动建筑在其发源地欧洲已经衰落,但在哈尔滨却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仍在局部克隆。建筑不能脱离其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特定的社会条件是建筑艺术生长的土壤,哈尔滨建城初期的新艺术运动建筑是脱离了其原型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的克隆品,因此只能在哈尔滨自生自灭,没有对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产生更大的影响。

二、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

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促成了建筑业的巨大变化,钢铁水泥等材料的大量生产,结构技术与施工技术的历史性突破,为适应社会变革不断出现的新建筑类型,及房屋建造数量的剧增等等,促使建筑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思想观念的滞后,建筑艺术仍墨守成规。1849年,英国著名学者、评论家、文学家兼建筑评论家拉斯金这样表达他的建筑艺术观:“我们不需要建筑新风格,就像没有人需要绘画和雕塑的新风格一样。但我们需要某种风格。”“我们现在已知的那些建筑形式对于我们是够好的了,远远



图4-3-11 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图4-3-12 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维克多利餐馆。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常怀生稿)。

高出我们中的任何人；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照用它们就行了，要想改进它们还早着呢。”^[130]正是这种保守的思想观念，使复古主义折衷主义成为19世纪西方建筑思潮的主流，虽有先行者改革的呼吁与实践，但并不能影响大局。建筑观念的根本变革仍有待于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这种变革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时，西方思想文化领域涌现出许多新思潮、新学说，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建筑界也开始了对新建筑的探索，就是现代主义建筑思潮(Modernism)。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一战之后，欧洲政局动荡，经济困难。梁启超一行于1918年12月底赴欧考察，至1920年1月回国，在一年的考察过程中亲身体会了欧洲战后的困境，至伦敦，“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吾侪日进苦苣耳，煤极缺，室中苦寒。”^[131]至柏林，“昨今两日(引者注：即1919年12月18、19日)，柏林全市饭馆罢业，旅馆亦不设食，吃饭问题闹得狼狈万状，闻铁路又将罢工，果尔吾侪将困饿此间矣。”^[132]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也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不光是终止了建筑师的的活动，严重限制了画家的活动，而且也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并把文化活动置于某种不同的轨道上。……在战争中遭受到的破坏(即使比不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的损失)及战争期间生产活动的停止，造成了严重而紧迫的重建问题。由于人口的重新增长，甚至在战争前几年就已经到处存在膳宿设备的问题。任务之庞大只有国家才能处理，因而受补贴的建筑成了重要因素，与之相关的法律也随之产生。建筑师的业主也有了变化：很少再有来自私人业主的任务，大多数来自国家和公共团体，很少有分散的住宅，多数是小区和综合体。城镇规划的重要性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这些任务所需要的设备方面的技术知识正在产生；由于1914年前不久刚在各国颁布了有关规定，战后钢筋混凝土的使用变得极为普遍。战争本身加快了许多领域的技术发展，比如运输及金属加工业。战败的奥地利和德国，同样受到战争的创伤，旧政治统治的废除，被占领和分割的费用等，这一切使已经困难重重的经济形势更趋恶化。所有这些事实都反映在文化领域，政治变化有助于文化进步，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出现进步的杰出人物，自然而然地应邀成为统治阶级。经济萧条，尤其是经济危机，迫使旧的阶级彼此搅和在一起，从而摧毁了扎根于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习惯而为改革趋势提供了机会。”^[133]一战后欧洲的特定社会背景把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推到第一线，箭在弦上，欲罢不能。“所针对的目标已经在战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详尽阐述，问题在于把文化行动与工业革命以来就已在发展着的技术、经济、社会的进程一致起来，去限定并控制这些文化行动而不是从数量上将其压倒”。^[134]一战后的欧洲诸国，以德、法两国受战祸最严重，战后重建，为建筑师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现代主义建筑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德法两国成为现代主义建筑最活跃的舞台。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格罗皮乌斯创办的“包豪斯”(Bauhaus)建筑学校(1919~1933)成为建筑与工艺美术的改革中心，勒·柯布西耶的名著《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 1923)提出了激进的改革宣言，1928年成立了“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组织(CIAM)。至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欧洲已成气候，强调现代建筑应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筑“必须满足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的需要”(密斯语)，主张工业化的建筑技术，反对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倡导全新的建筑美学与建筑风格。大师们创作了一批体现了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优秀建筑作品，如包豪斯校舍(1925~1926)、萨伏伊别墅(1928~1930)、巴黎瑞士学生宿舍(1930~1932)、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1929)、芬兰帕米欧结核病疗养院(1929~1933)等，注重功能要求，自由平面格局，非对称组合的简洁几何形体，平屋顶，没有附加的装饰，形成与历史上的各种建筑样式都不相同的全新建筑形式。这些耳熟能详的西方

建筑史上的名作,体现的是建筑思想与建筑风格的演变。更重要的是,建筑的平民化使为普通百姓服务的普通建筑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主体,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建筑的重心是住宅区规划与住宅建设,即为解决战后房荒而作的努力,这种大规模的战后重建产生的社会需求是现代主义建筑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现代主义建筑的鼎盛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年代,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思潮在欧美仍有市场,在美国更是盛行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中心才转移到美国,二战前夕,由于纳粹德国的迫害,现代主义建筑发源地德国的建筑大师们迁居美国,如格罗皮乌斯1934年到英国,1937年到美国,密斯1937年到美国,他们将先进的建筑教育制度与建筑设计思想带到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进展。

20世纪20-30年代与现代主义思潮并行发展的还有“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装饰艺术”运动得名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的“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旨在展示一种新艺术运动之后的建筑与装饰风格。与新艺术运动一样,“装饰艺术”运动也是一个含义泛泛的专用术语,不同的是前者强调中世纪的、自然风格的装饰,强调手工艺制作的美;后者恰恰相反,反对古典的、自然的、单纯手工艺的审美观念,主张现代的机械制作之美。“装饰艺术”运动也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强调装饰,注重为富裕的上层阶级服务,这使之有别于现代主义;赞同工业化,注重机器制品固有的设计特性,如相对简单、光滑、匀称和完全一样的重复等,又使之与“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有本质的区别。“装饰艺术”运动虽发源于法国,但在法国主要体现于工艺产品与艺术品设计,传入美国,则主要体现于建筑设计及与之相关的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等,对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建筑设计产生巨大影响。一战期间,欧洲饱经战祸,美国则在战争初期宣布中立,与交战双方做生意,静观时变,坐收渔利,至1917年才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战争期间美国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并导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9年经济危机之间的经济繁荣时期。一战后的美国,财源充足,国力鼎盛,高层建筑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大都市中大量兴建,“装饰艺术”运动建筑成为当时美国高层建筑的时尚,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1927~1930)、帝国州大厦(1929~1931)、洛克菲勒中心(1930年至20世纪30年代末)都是典型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作品。^[35]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1900~1937),在欧美建筑史的各个发展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装饰艺术”运动建筑及现代主义建筑,在脱离了这种社会背景的近代中国,一样样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克隆与传播,并逐渐传播到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甚至少数城镇、乡村。没有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只有横向的克隆与传播;不存在建筑风格自身产生与发展的演变进程,只有在不同城市中因不同的外来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克隆品种的差异。这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建筑文化现象。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建造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的典型实例是上海沙逊大厦(1929)与天津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约1934~1936)。上海沙逊大厦建于地价最昂贵的外滩南京路口,是主体10层、局部13层、高77米的高层旅馆与办公综合楼,公和洋行设计,1929年9月5日落成。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建筑,建筑平面布局满铺用地范围,沿南京路与九江路,建筑都与道路平行,自然形成A形平面。作为大型出租写字楼与旅馆综合建筑,不考虑对外交通联系,不考虑停车场及建筑与城市道路之间的缓冲地带的设置,当然是受商业目的驱使所致。商品化的建筑必须考虑经济效益,这无可非议,但应当建立在功能合理的前提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逊大厦仍处于较低层次。



图 4-3-13 上海沙逊大厦。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 姜承浩稿)。



图 4-3-14 上海沙逊大厦。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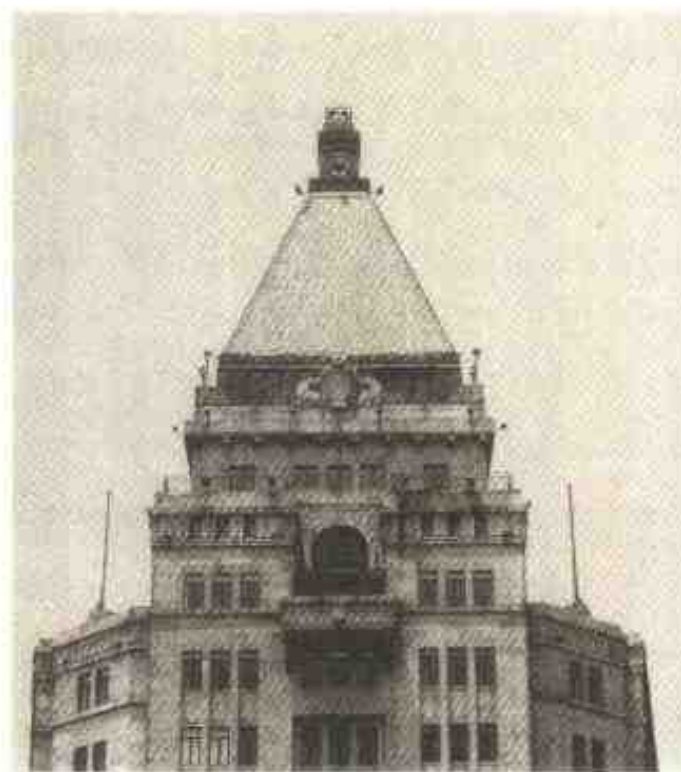


图 4-3-15 上海沙逊大厦塔楼顶部的方锥形塔顶,用精细的现代工业化手段制造,模拟埃及金字塔造型,注重表现金属的色彩与质感。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公和洋行的建筑师们的功绩是在实现商业目标的限定条件下较好地处理了建筑内部的功能关系,也创造了构图完美的建筑形式。沙逊大厦沿南京路与九江路的面宽很宽,但在窄窄的马路上很难看到高层建筑全景,临外滩的面宽很窄,却成为外滩建筑景观的焦点,所以建筑师将建筑形式处理的重点放在临外滩的立面。建筑平面在临外滩的窄面与临南京路、九江路的宽面转角处削 45° 斜角,又在 45° 斜面与沿街的三个立面之间构思了尺度适宜的凹槽,使从外滩看到的建筑形体的五个面的组合清晰明确、富有雕塑感,这是典型的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手法。沙逊大厦临南京路与九江路的立面仍维持横向三段式立面构图,二层之上设置通长的腰线,腰线之下是引人注目的两层高半圆拱券门洞,顶层之下也作了腰线,女儿墙作垂带装饰处理,构成横向三段式立面构图的顶部。但这些处理手法并没有延伸到临外滩的主立面,临外滩立面向上延伸,设置了高于主体建筑三层的塔楼,塔楼的顶部是 19 米高的方锥形铜绿色瓦楞铜皮塔顶,模拟埃及的金字塔造型。简洁的几何形体,从古代埃及建筑文化获得的构思灵感,却用精细的现代工业化手段制造,注重表现铜绿色的金属色彩与质感,这正是“装饰艺术”建筑的典型特征。沙逊大厦的细部处理也体现了工业化制造的“装饰艺术”建筑特征。(图 4-3-13, 4-3-14, 4-3-15)

天津今解放路滨江道路口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也是较典型的“装饰艺术”建筑作品。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7000 平方米,是这一时期天津建造的规模较大的银行建筑。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是六层建筑,局部八层,1934 年设计,当年 11 月开工,竣工时间不详,估计为 1936 年,天津华信工程司中国建筑师沈理源设计。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亦位于城市街道转角处,平面布局也几乎将建筑基地满铺,街道转角处削 45° 斜角,沈理源处理这个斜角沿街三个面的设计手法是在 45° 斜面凸出两条较宽的通天的竖向壁柱,与解放路及滨江道立面较窄的通天壁柱呼应,形成建筑整体上的竖向构图模式,亦与建筑转角处耸起的体量层层缩小的阶梯形塔楼呼应,形成简洁的建筑形体。建筑整体体量简洁明快,构图完美,只在一层之上设有雕饰精细的腰线,横向三

段式的立面处理手法已经消失。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最富特色的是入口处制作精细的黄铜大门与满布墙面的窗间墙上的黄铜饰面,精细的工业化装饰产品,简洁的放射型几何图案,具有明显的“装饰艺术”建筑特征。(图 4-3-16)



图 4-3-16 天津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建造的真正体现现代主义建筑精神的建筑作品很少,典型实例如大连火车站(1935~1937)、上海虹桥疗养院(1934)。1924 年,小林良治在“满铁”组织的大连站站房设计竞赛中获一等奖,后来重新设计,由“满铁”工事课太田宗太郎主持。大连火车站工程于 1935 年开工,1937 年建成。大连市区地势起伏,火车站前的市区道路今长江路路面较铁路轨顶标高高出数米。建筑师因借地势,设计了双层候车厅,首层地面与铁路站台标高相同,二层楼面则与长江路路面标高接近,站前自然形成缓坡倾斜的大广场,旅客可由广场进入首层大厅,也可经站舍两侧弧形伸展的坡道直接进入二层候车厅,人流车流顺畅,使用方便。站舍取简洁的矩形平面,对称格局,但平面布置按功能要求灵活处理,并不受对称格局的束缚。首层候车厅在均匀的结构柱网中灵活安排各类辅助房间,中轴线上设出站口,出站旅客通过首层大厅直接疏散到广场,与二层候车厅的进站旅客上下分流,互不干扰。其右侧设五米宽单跑大楼梯与二层候车厅相通,联系方便,也有足够的人流容量。大楼梯避开中轴线,注重使用功能,不追求中轴对称的堂皇气派,因而也不破坏二层候车厅大空间的完整。二层候车厅是一个 22 米×70 米,层高约 16 米的大空间,朝向广场的南侧在结构柱列间开设通高大窗,高大、宽敞、明亮,形成良好的候车环境。大连火车站建筑形体简洁,立面处理高度净化,没有多余的装饰,但建筑与坡道、广场的关系,建筑自身的比例、尺度及细部处理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体现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思想。(图 4-3-17,4-3-18,4-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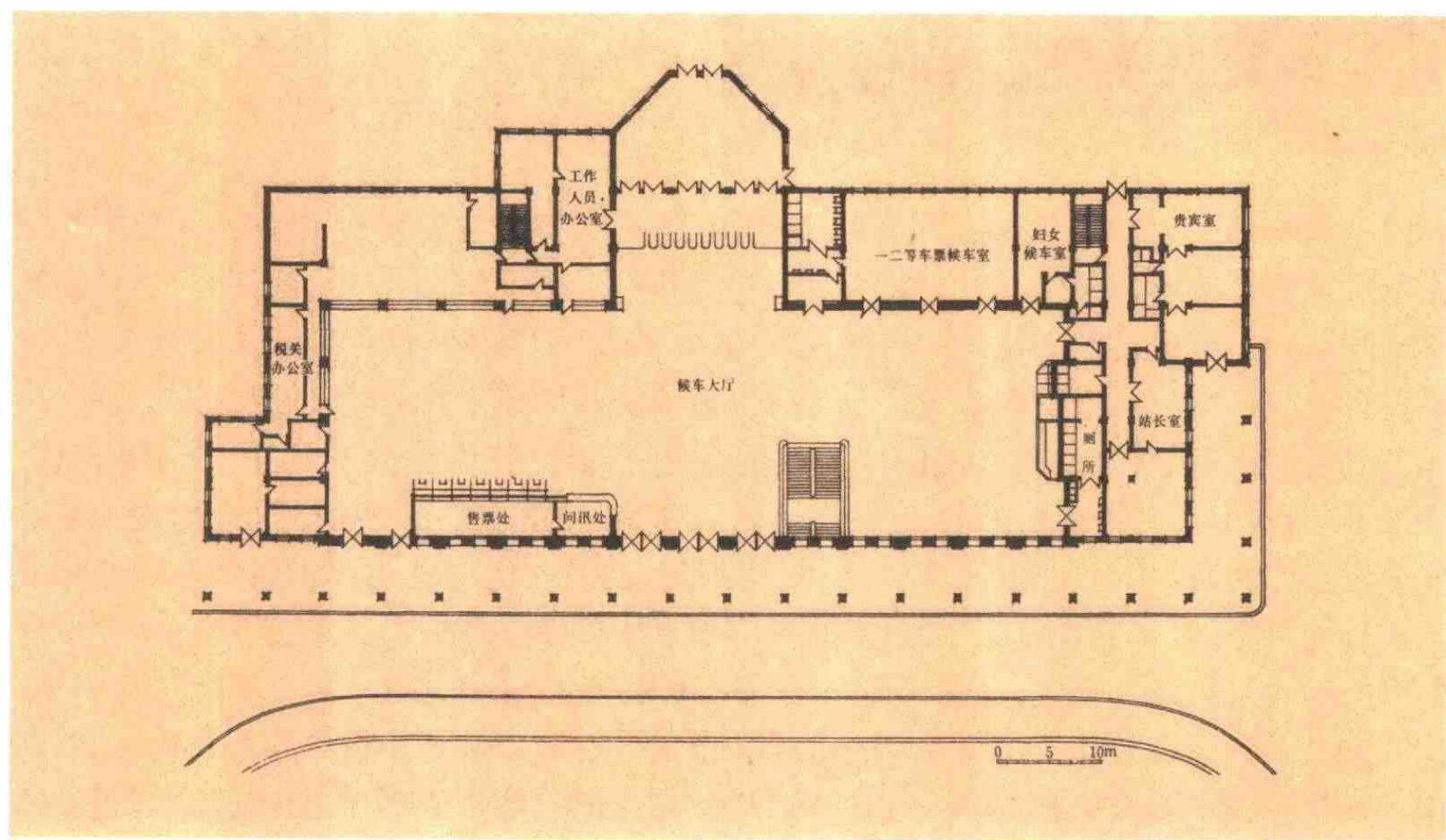


图 4-3-17 大连火车站二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伟伟稿)。



图 4-3-18 大连火车站。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1 年。



图 4-3-19 大连火车站二层候车室内景。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1 年。

上海虹桥疗养院(1934 年)是中国建筑师奚福泉的作品,位于上海西郊较安静的虹桥路,距静安寺不足 4 公里,是一座百余病床的结核病疗养院。考虑到隔离要求,疗养院建筑一分为二——设计为一幢四层主楼与一幢单层小楼(局部二层),两座建筑分开布置,其间有足够的隔离间距。主楼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除病房外,尚设有手术室、X 光室、诊疗室等。设计充分考虑到病房的采光要求,“按日光对于病人最为有益,对患肺病者尤感重要;故将病房部分均位于南部,并每室前均设阳台,以使各个病人随时吸收阳光。至于手术室、X 光室、太阳灯室、诊疗室等,凡无日光关系者,则均位于北部。”^[136]病房全部朝南,病人可以获得充分的阳光。

又将四层主楼的病房部分逐层后退,建筑呈阶梯形,病房南面宽敞的阳台上每层挑出雨篷,使病人在阳台上进行日光浴时上层不能看见下层,建筑师专绘“阳光剖视图”,分析病房日照与室外阳台的视线遮挡问题。特等病房的门窗使用紫光玻璃,可透过日光中的紫外线。诊疗室、走道以及其他重要房间均铺橡皮地面,以避免噪音。医院,尤其是传染病院,是最注重功能的建筑类型,虹桥疗养院将建筑一分为二,是为隔离;主楼设计为台阶形,并设室外阳台,是为保证病人享有充足的阳光以利康复。建筑造型随功能要求自由布置,不讲轴线,不求对称,没有附加的装饰,但随功能要求自然形成的建筑形式却生动活泼,清新明快,尺度比例的推敲恰到好处,已得现代主义建筑精髓,是不可多得的现代主义建筑佳作。(图 4-3-20,4-3-21,4-3-22,4-3-23)

但是当时大多数建筑师只是迎合业主要求,在建筑设计中模仿某种建筑形式,对这种照单订货的建筑设计来讲,无论是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装饰艺术”运动建

图 4-3-20 上海虹桥疗养院总平面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五期,193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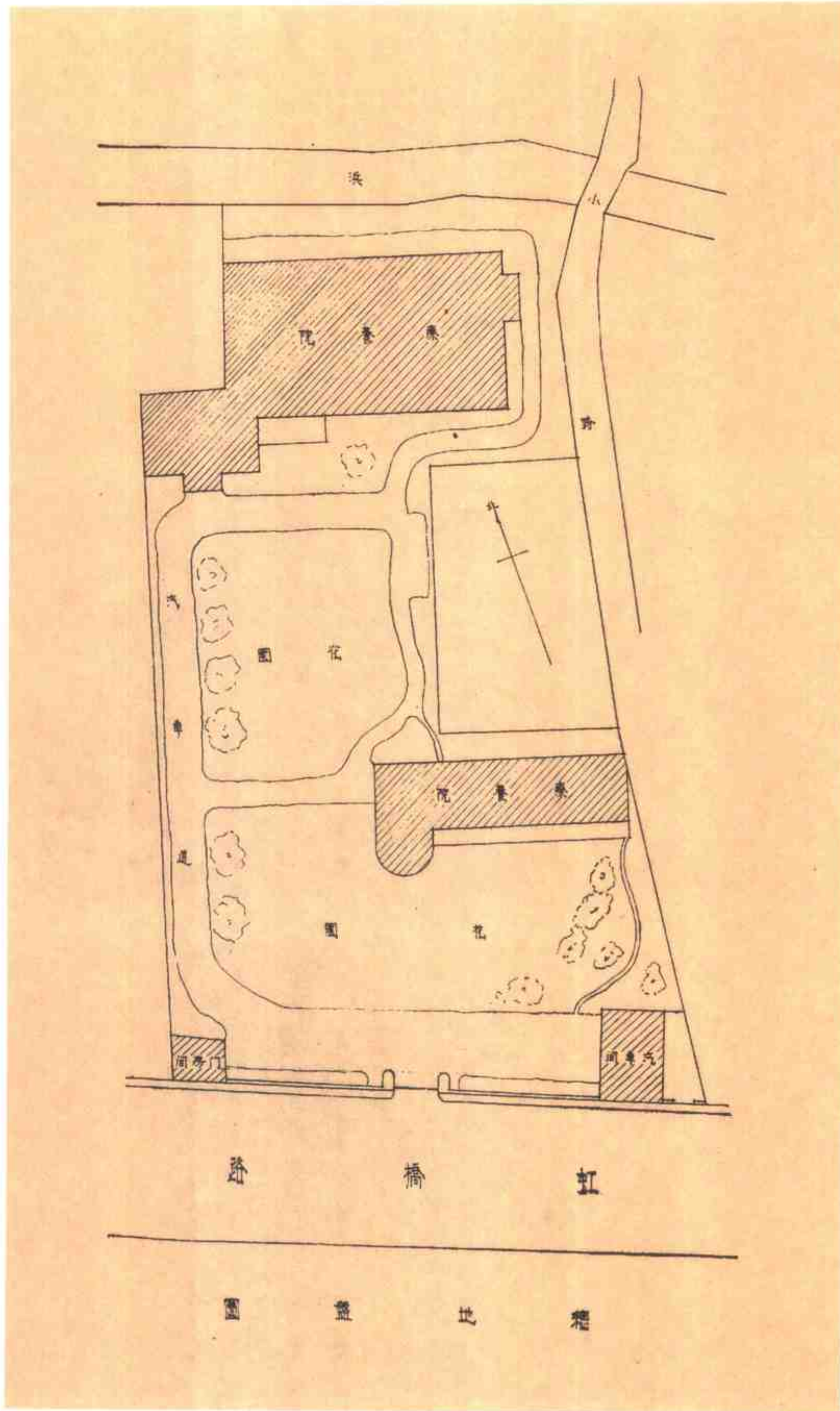


图 4-3-21 上海虹桥疗养院首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五期,193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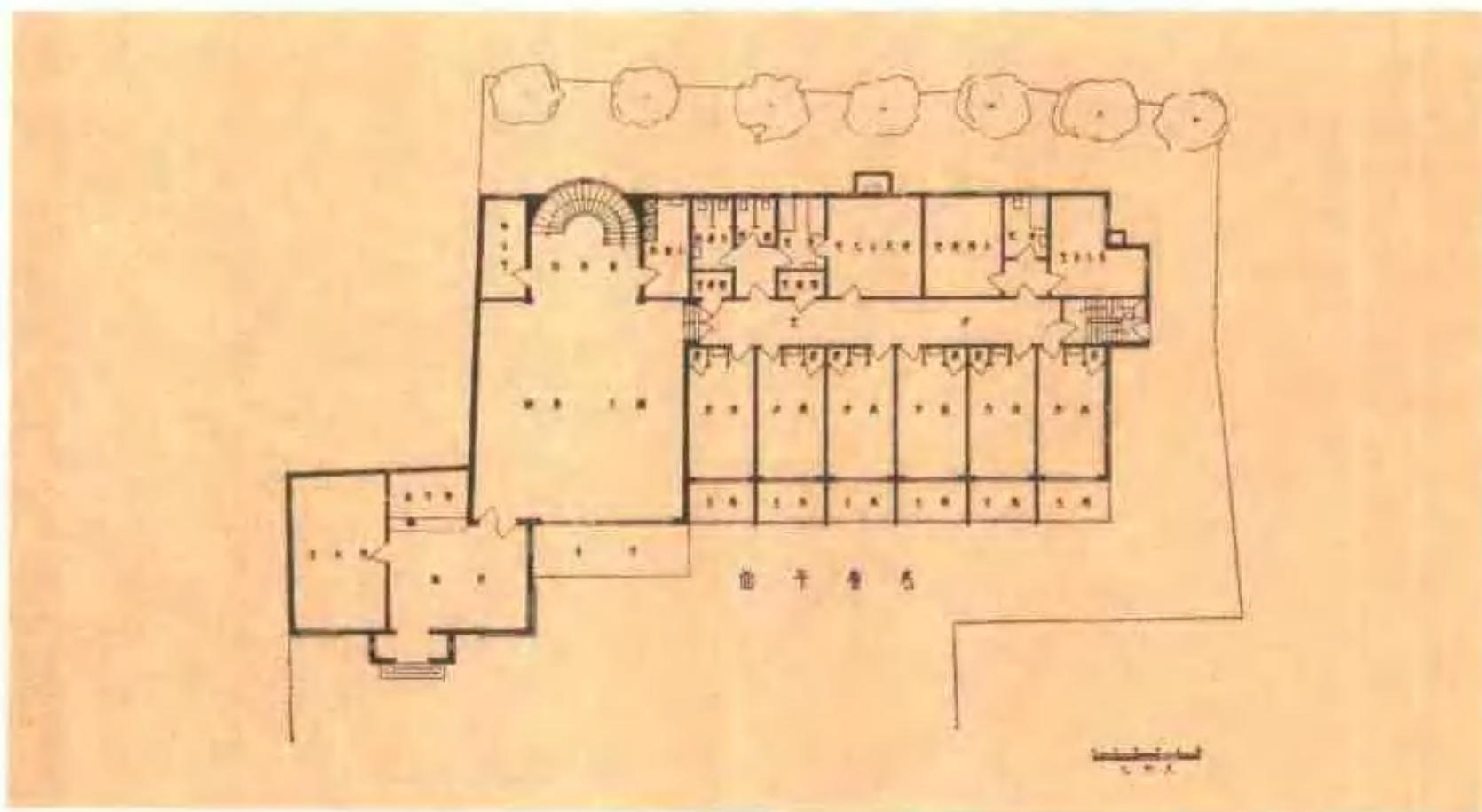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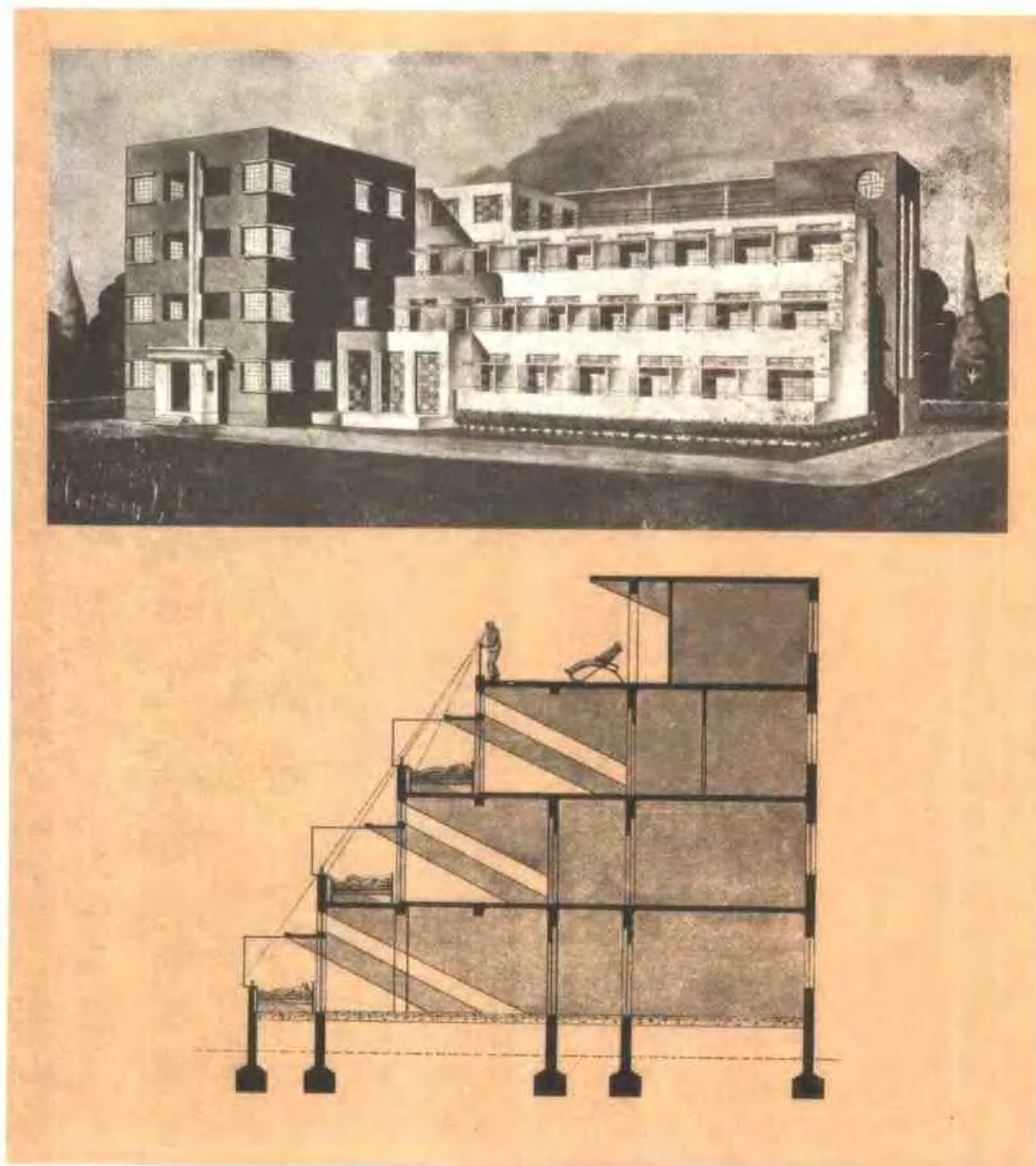


图 4-3-22 上海虹桥疗养院透视图与“阳光剖视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五期,193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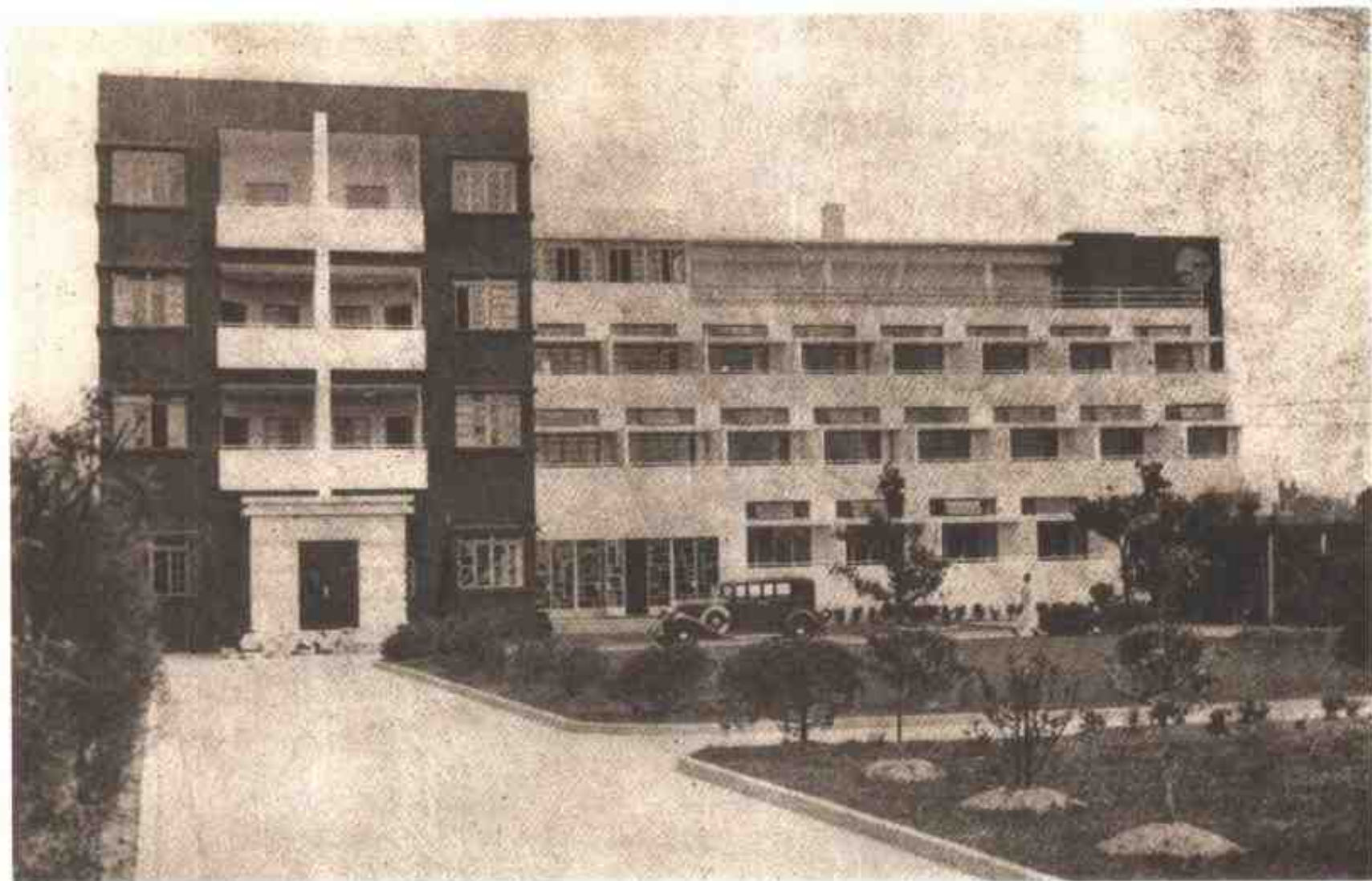


图 4-3-23 上海虹桥疗养院,由花园西南角北望。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五期,1934年5月。

筑、还是现代主义建筑,都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建筑形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仍在建造,如上海跑马总会大厦(1933,马海洋行设计),(图 4-3-24)天津法租界公议局(1929~1931,义品公司设计),天津法租界工部局(1933~1934,义品公司设计),(图 4-3-25)汉口金城银行(1930,庄俊设计),汉口商业银行(1931,上海中国建筑师陈念慈设计),汉口中国国货银行(1934,汉口中国建筑师卢镛标设计),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1930),青岛交通银行(1933,庄俊设计)(图 4-3-26)等等。但是,与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前期与中期(1900~1927)相比,尽管大多数建筑作品只是停留在建筑形式的模仿层次,并不是真正体现现代主义建筑精神的建筑作品,但现代主义建筑还是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近代建筑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作者称为“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在多元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对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产生明显的影响,其中以上海最甚,对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影响较小,时间上也滞后一些。历史赐予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时间很短,整个发展兴



图 4-3-24 上海跑马总会大厦,近处是大光明大戏院。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姜承浩稿)。



图 4-3-25 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图 4-3-26 青岛交通银行。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



图 4-3-27 上海国际饭店。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盛期(1900~1937)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而呈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的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则只有短短的十年,这种发展趋势还来不及充分展开,还刚刚对中国近代边缘城市产生影响,日本侵略者已经发动了万恶的侵华战争,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近代建筑就因战争而中断。

这一时期模仿美国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与呈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的建筑作品在高层建筑中最多。192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建造高层建筑的实力(包括建造技术与财力),也没有建造高层建筑的需求(地价还没有上升到必须建造高层建筑才可赢利的程度),所以美国早期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高层建筑对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主要是上海,已经具备了这种实力与需求。其时,高层建筑的发源地美国的高层与超高层建筑已经抛弃了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风格,转向“装饰艺术”运动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在这一时期建造的高层建筑基本上是美国同时期高层建筑的克隆版,但规模要小得多。其基本特征是简化装饰,重视体量组合,形成从中部体量最高处向两侧逐层跌落的整体体量,退台处不作装饰处理,将窗间墙凸出墙面形成直上直下的通天垂直线条等。典型实例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Ladislau E. Hudec)设计的上海国际饭店(1934)。国际饭店地面以上22层,地下2层,高82米,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褐色面砖贴面,15层以上逐层收进形成阶梯状,立面上直上直下的竖向线条处理,体现了当时美国流行的高层建筑的典型特征。(图4-3-27)这一时期上海建造的高层建筑较多,模仿美国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与体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的高层建筑还有:百老汇大厦(1934),21层,业广地产公司设计部弗雷泽设计;

(图 4-3-28)汉弥尔登大厦(1933)与都城饭店(1934),中部塔楼最高处 17 层,公和洋行设计;(图 4-3-29)峻岭公寓(1934),从中部 18 层跌落至两侧 13 层,公和洋行设计;毕卡第公寓(1934),从中部 15 层跌落至两侧 8、9 层,法商营造公司设计,毕卡第公寓已是单纯的体量组合,高低错落,颇富现代感,已经没有附加的装饰。(图 4-3-30)

天津的渤海大楼,利华大楼,广州的爱群大厦,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呈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趋势的高层建筑。天津渤海大楼(1934~1936)是带底层商店的写字楼,永和工程司慕乐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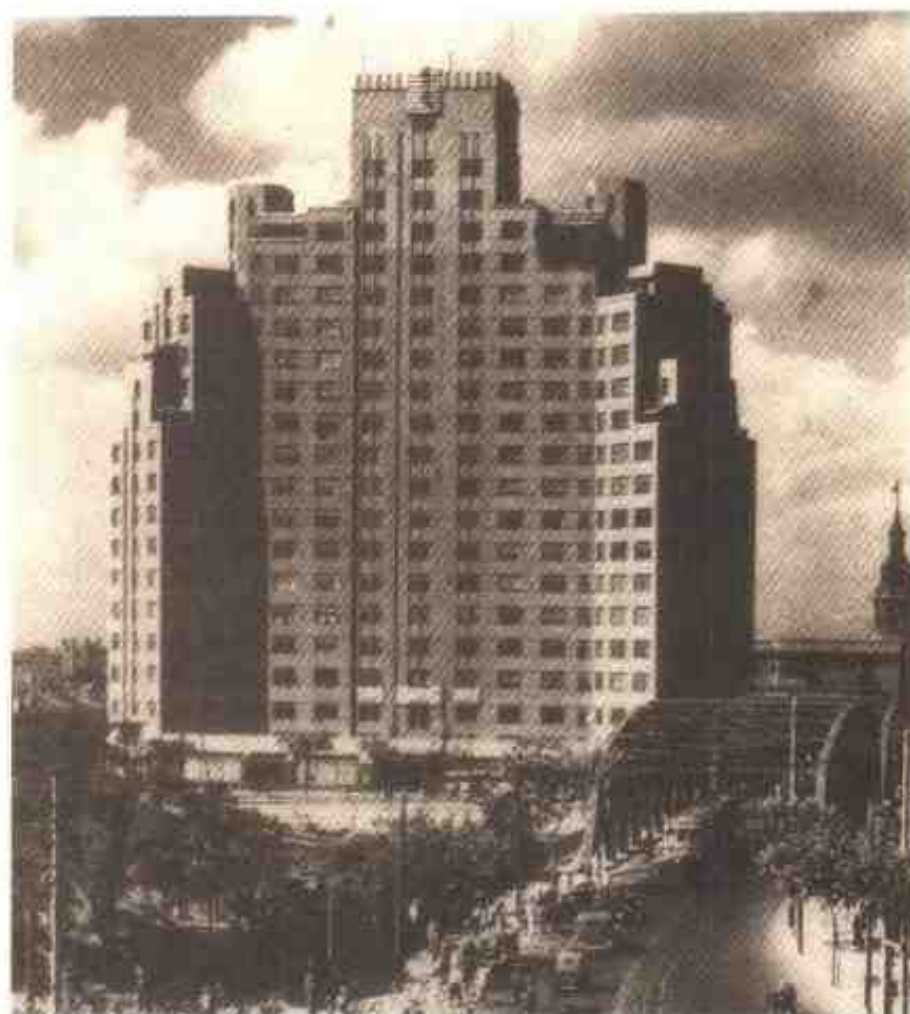


图 4-3-28 上海百老汇大厦。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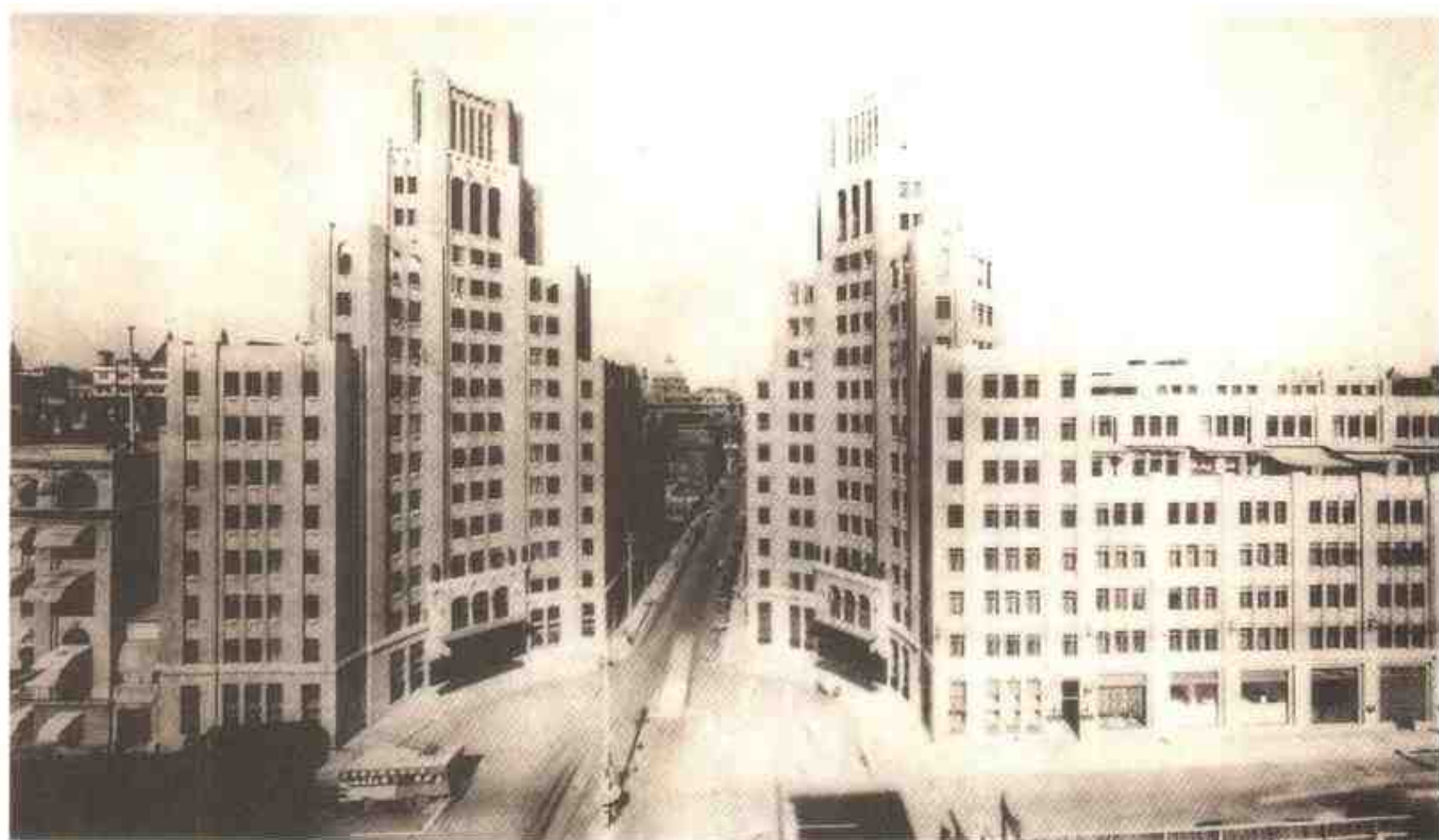


图 4-3-29 上海汉弥尔登大厦与都城饭店。右边是 1933 年建造的汉弥尔登大厦,左边是 1934 年建造的都城饭店。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筑师设计,建筑主体八层,局部十层,十层以上建有一层方塔,建筑总高 47.47 米,已是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建筑平面依不规则的基地地形设计,亦为不规则的四边形,临和平路丹东路交口处削 45°斜角,建筑形体简洁,没有多余的装饰,八层以上逐层作台阶式收分,形成富有体积感、雕塑感的建筑造型。外墙贴深棕色面砖,白色的窗框与窗间墙与深棕色的墙面色彩对比鲜明,并形成挺拔的竖向整体建筑



图 4-3-30 上海毕卡第公寓透视图。原图载《建筑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34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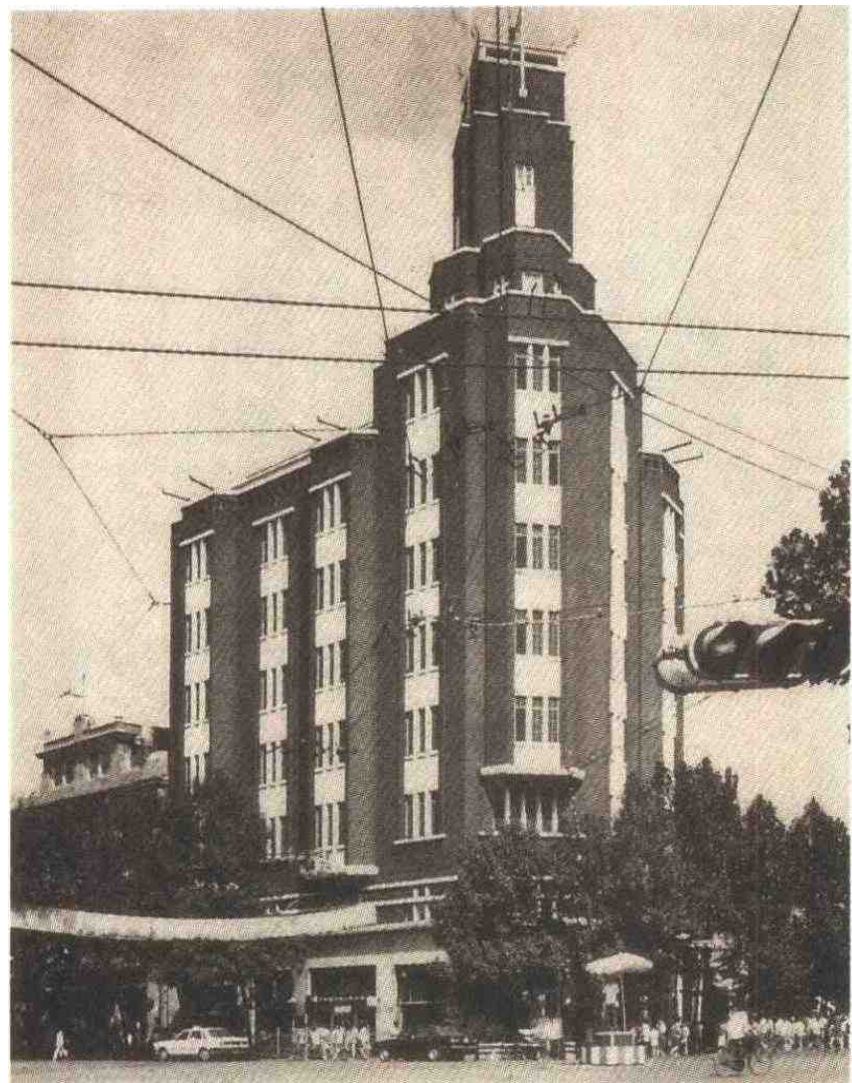


图 4-3-31 天津渤海大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3-32 天津利华大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3-33 天津利华大楼仰视照片。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构图。(图 4-3-31)天津利华大楼(1936~1938)亦由永和工程司慕乐建筑师设计,主楼 10 层,高 43 米,是一幢写字楼与公寓综合楼,利华大楼 8-10 层局部作台阶式退台,使用大面积玻璃窗,局部半圆形凸出的体量亦作大面积玻璃窗,整幢建筑注重体量组合,注重虚实对比,已经是比较正宗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图 4-3-32,4-3-33)广州爱群大厦(1934~1937)由中国建筑师陈荣枝、李炳垣设计,位于珠江江畔呈锐角相交的道路交口处,建筑在用地范围内沿街周边布置,中部留出小小的天井,首层留出骑楼,使街道的人行道得以连通,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土地的利用率已达极限,功能的合理与否已难考虑。但爱群大厦的结构、设备都是一流的,当时已安装暖气设备。爱群大厦建筑主体 14 层,上有塔楼 4 层,沿锐角街道交口处建筑平面为圆弧形,形体简洁,立面处理以通天的窗间墙形成的垂直线条为主,并无多余的装饰,18 层塔楼之上做古铜色方锥形塔顶,尚有“装饰艺术”运动建筑余韵。(图 4-3-34,4-3-35,4-3-36)

这一时期体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的建筑作品还有很多。上海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大戏院(1933)采用不对称立面构图,中部耸起半透明的简洁造型方塔,形成建筑构图中心,横竖交错的装饰性墙板、乳黄色曲面外墙、大面积玻璃窗,对比强烈、形式新颖。(图 4-3-37)同为邬达克设计的上海今北京路、铜仁路路口的铜仁路 333 号吴同文住宅(1935~1937)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层建筑,西面有螺旋形室外楼梯直达二层,立面流畅的曲面水平线条,大面积的玻璃窗,加上屋顶覆盖玻璃顶棚的圆形日光室,造型简洁,注重形体对比,已经是相当摩登的现代建筑形式。但是在这所西化的住宅中,却设有中国式的祖堂,祖堂内作中式彩绘天花,全套中式古典装修,陈列着神座供桌,与住宅中弹簧地板的西式舞厅、现代化的小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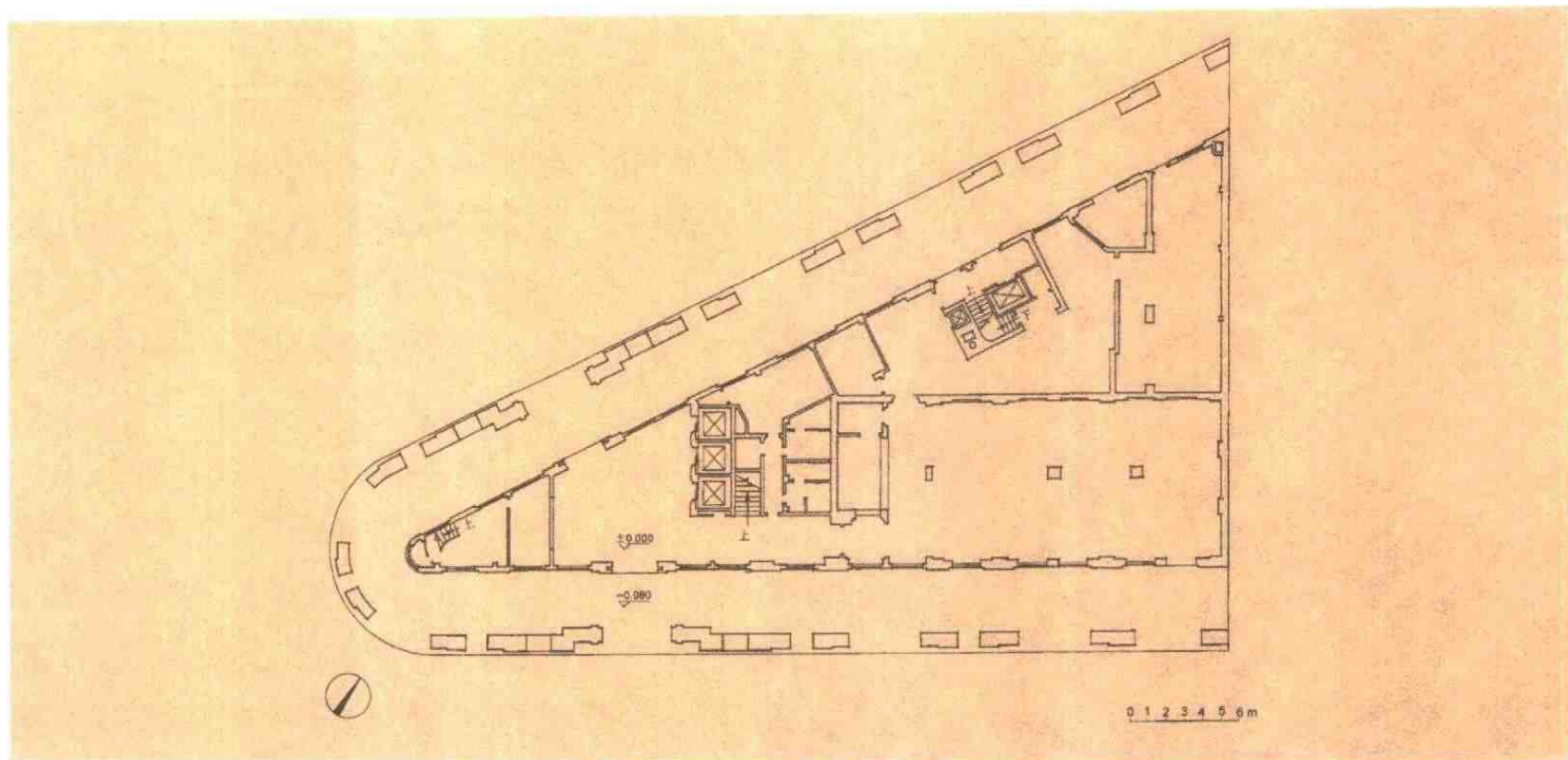


图 4-3-34 广州爱群大厦首层平面图。原图载《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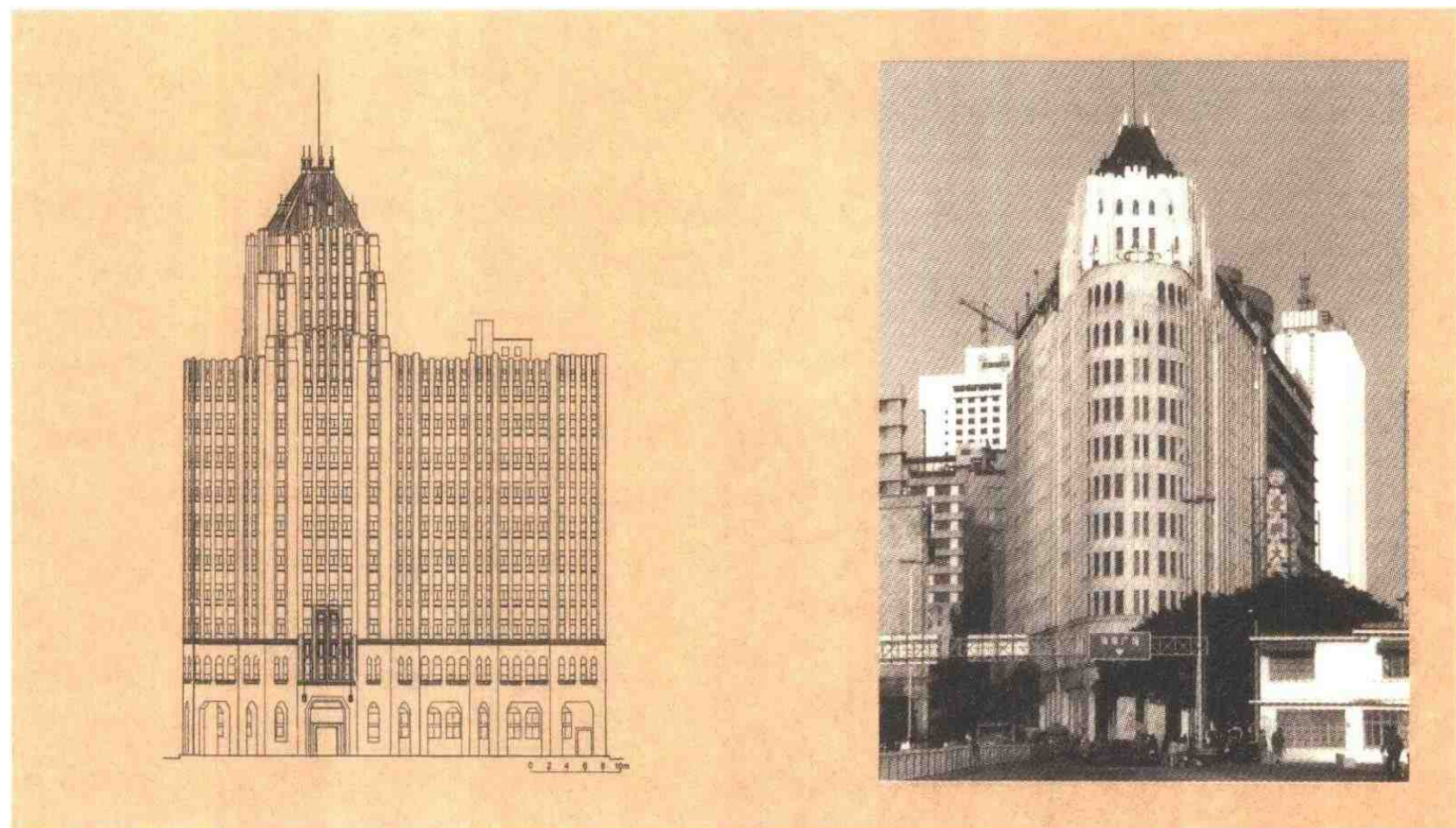


图 4-3-35 左:广州爱群大厦正立面图。原图载《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一)》。右:广州爱群大厦。照片由谢少明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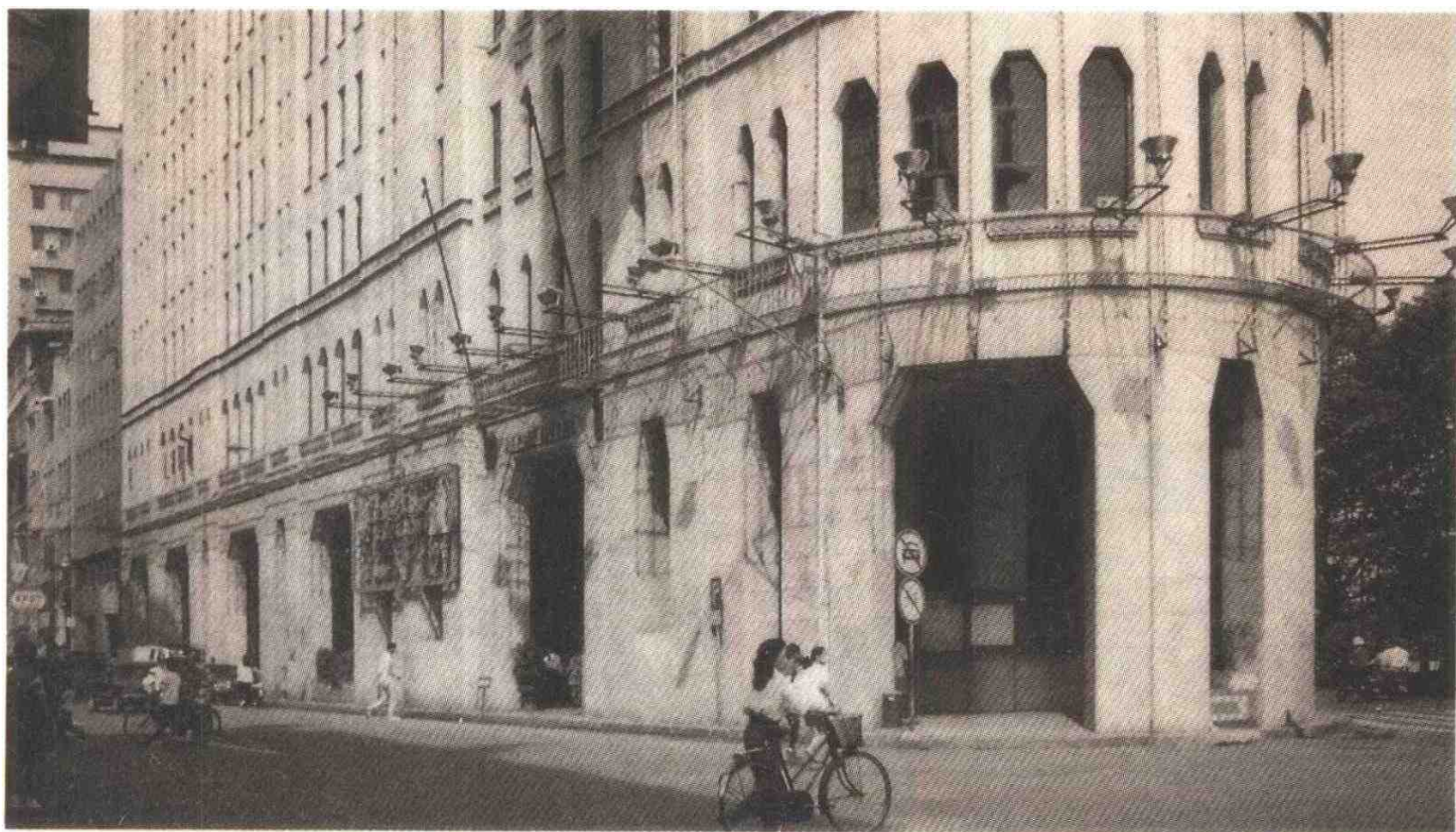


图 4-3-36 广州爱群大厦骑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4 年。

图 4-3-37 上海大光明大戏院。原图载《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电梯共存,是当时中西建筑文化杂陈并列的典型实例。^[137](图 4-3-38,4-3-39)

上海的同类建筑作品还有百乐门大饭店(1931,杨锡镠设计)(图 4-3-40);新亚酒店(1932~1934,五和洋行席拉设计);大新公司(1934)(图 4-3-41);恩派亚大厦(1934);(图 4-3-42) 广东银行(1934)等。(图 4-3-43)天津哈尔滨道中国戏院(1930)建筑形体简洁,女儿墙略有高低错落,墙面结合建筑形体变化作竖向线角,立面以实墙面为主,不多的几樘窗成组布置,位置、大小都作了精心推敲(图 4-3-43)。天津唐山道兴隆洋行(1929)由永和工程司设计,七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首层设有过街楼,装饰已经净化(图 4-3-44)。天津鞍山道第一日语学校(1934)是山字形三层建筑,中部入口处及两翼局部四层。中部是教室,教室后面建有礼堂,两侧翼作办公室,功能分区合理,使用较为方便。水平展开的沿街立面长达 145 米,中部入口处及两侧翼略作重点处理,为打破过长的沿街立面造成的单调感,还在左右两侧中部各作两个半圆形竖筒,为简洁的立面增添了一点情趣。(图 4-3-45)。

中国建筑师芦镛标于 1930 年在汉口独自开业经营建筑设计,此前芦氏曾在汉口景明洋行学习建筑设计两年,后又攻读美国土木工程函授课程,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建筑师。^[138]芦镛标设计的汉口四明银行与中国实业银行也体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汉口四明银行(1934~1936)位于江汉路 47 号,七层钢筋混凝土结构。^[139]四明银行形体简洁,

图 4-3-38 上海今北京路、铜仁路路口吴同文住宅首层平面图。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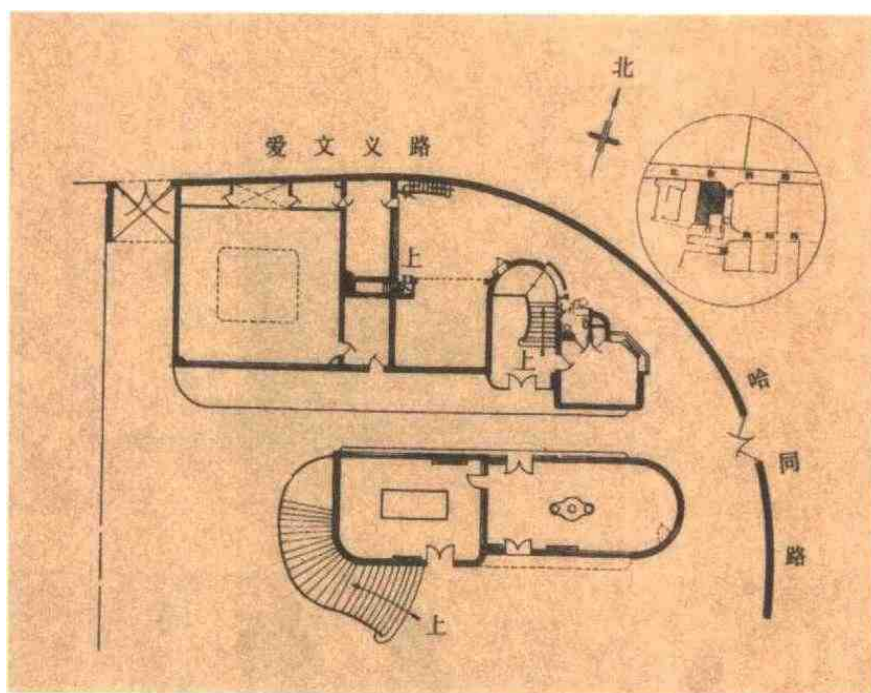


图 4-3-39 左:上海吴同文住宅。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右:上海吴同文住宅的祖堂。原图载《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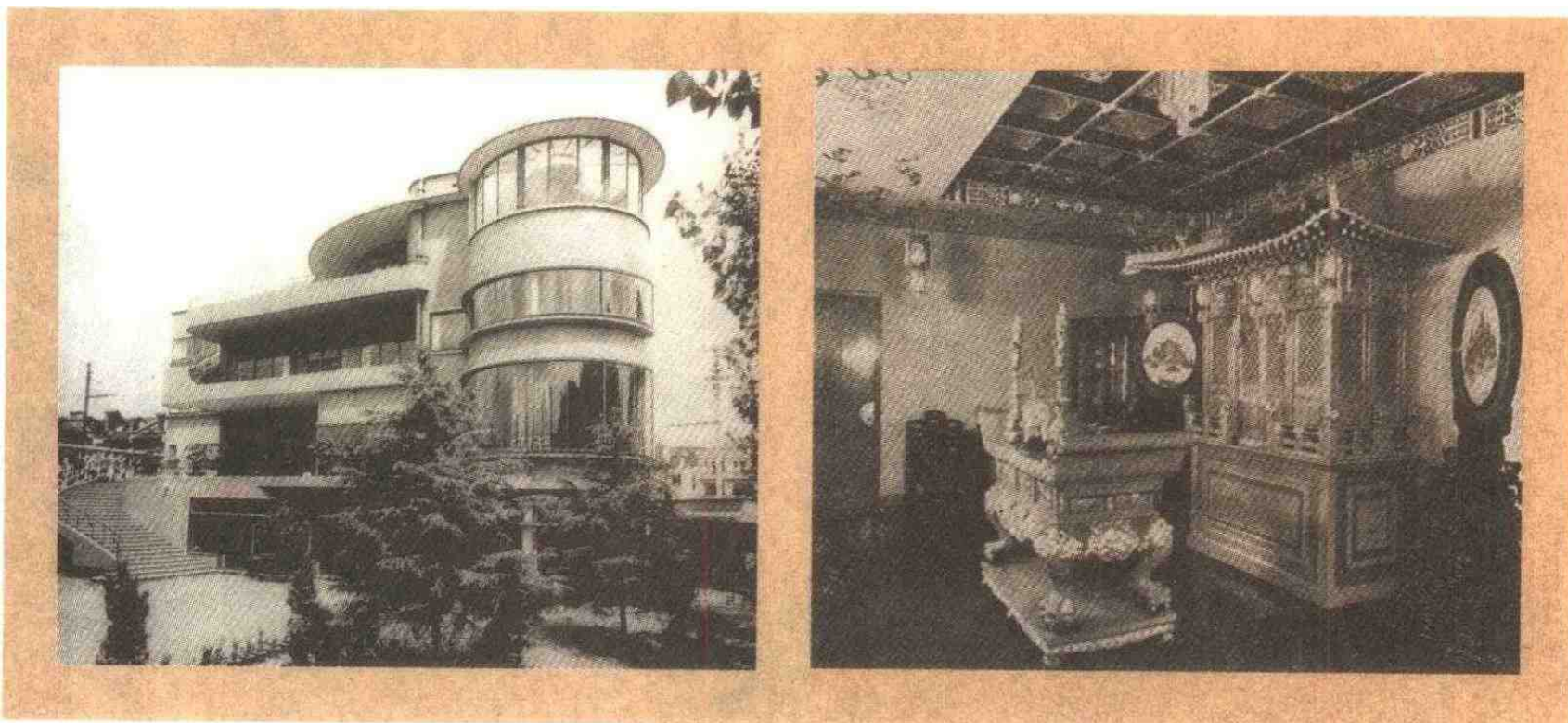




图 4-3-40 上海百乐门大饭店。原图载《建筑月刊》第二卷,第四号,1934年4月。(左)

图 4-3-41 上海大新公司。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章明,姜承浩稿)。(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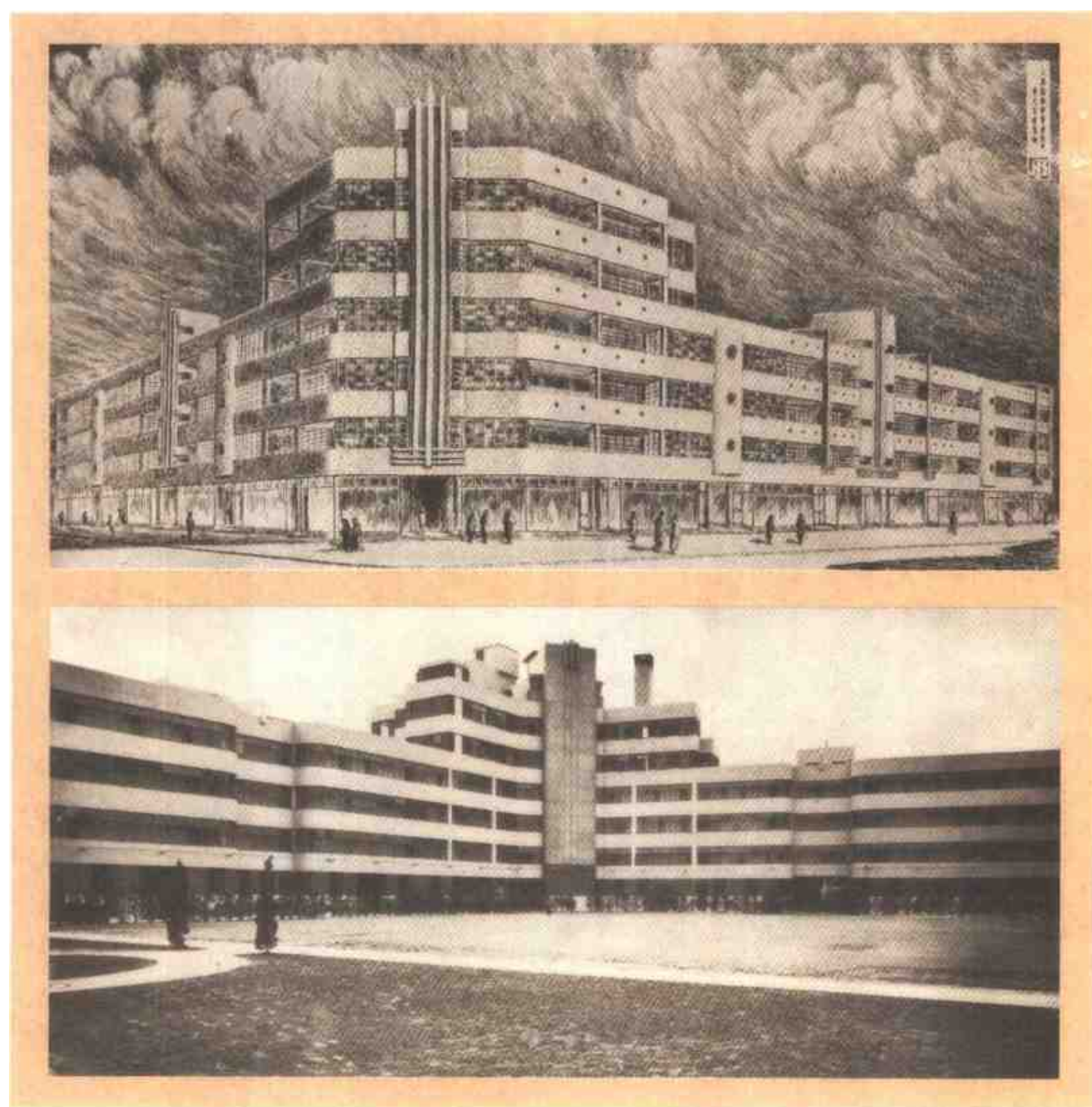


图 4-3-42 上海恩派亚大厦。上图:恩派亚大厦透视图;下图:恩派亚大厦内院外景。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四期,193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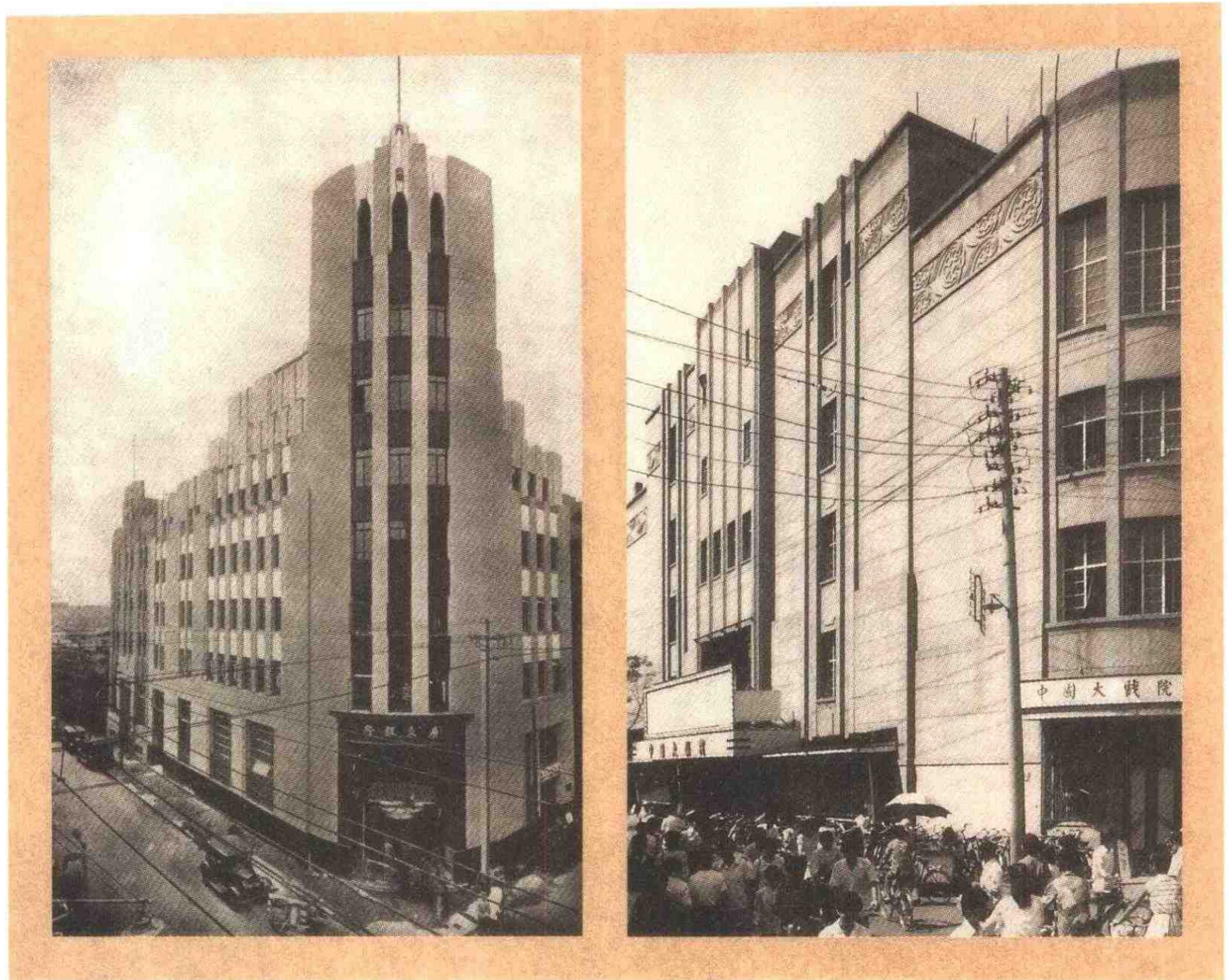


图 4-3-43 左：上海广东银行。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九、十期，1934 年 9 月。右：天津哈尔滨道中国戏院。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4-3-44 天津唐山道兴隆洋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中央部分自然耸起塔楼，窗间墙略作简洁线脚，形成通天的竖向线条，手法简洁，构图完美。(图 4-3-46, 4-3-47)汉口中国实业银行(1935~1936)位于江汉路 14 号，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在街道转角处耸起塔楼。^[140]中国实业银行建筑形体也很简洁，体量组合，街道转角处的塔楼作竖向线条，更加强了塔楼的高耸挺拔感(图 4-3-48)。

1934 年，青岛由几家银行联合租用中山路中段原第四公园地皮建成毗邻的银行建筑群，使中山路街景大为增色。当时，六家银行及青岛银行同业公会同时建造，其中除上海建筑师陆谦受设计的金城银行仍为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外，(图 4-3-48)上海建筑师罗邦杰设计的大陆银行与中国银行(图 4-3-49, 4-3-50)，上海建筑师苏夏轩设计的上海银行

(图 4-3-51)，青岛建筑师刘铨法设计的山左银行(图 4-3-52)，实业银行(设计者不详)，及工程师徐焄设计的青岛银行同业公会均为三四层建筑，亦体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这一时期青岛建造的同类建筑还有山东大戏院(1930)、中国国货公司(20 世纪



图4-3-45 天津鞍山道第一日语学校。照片由作者摄于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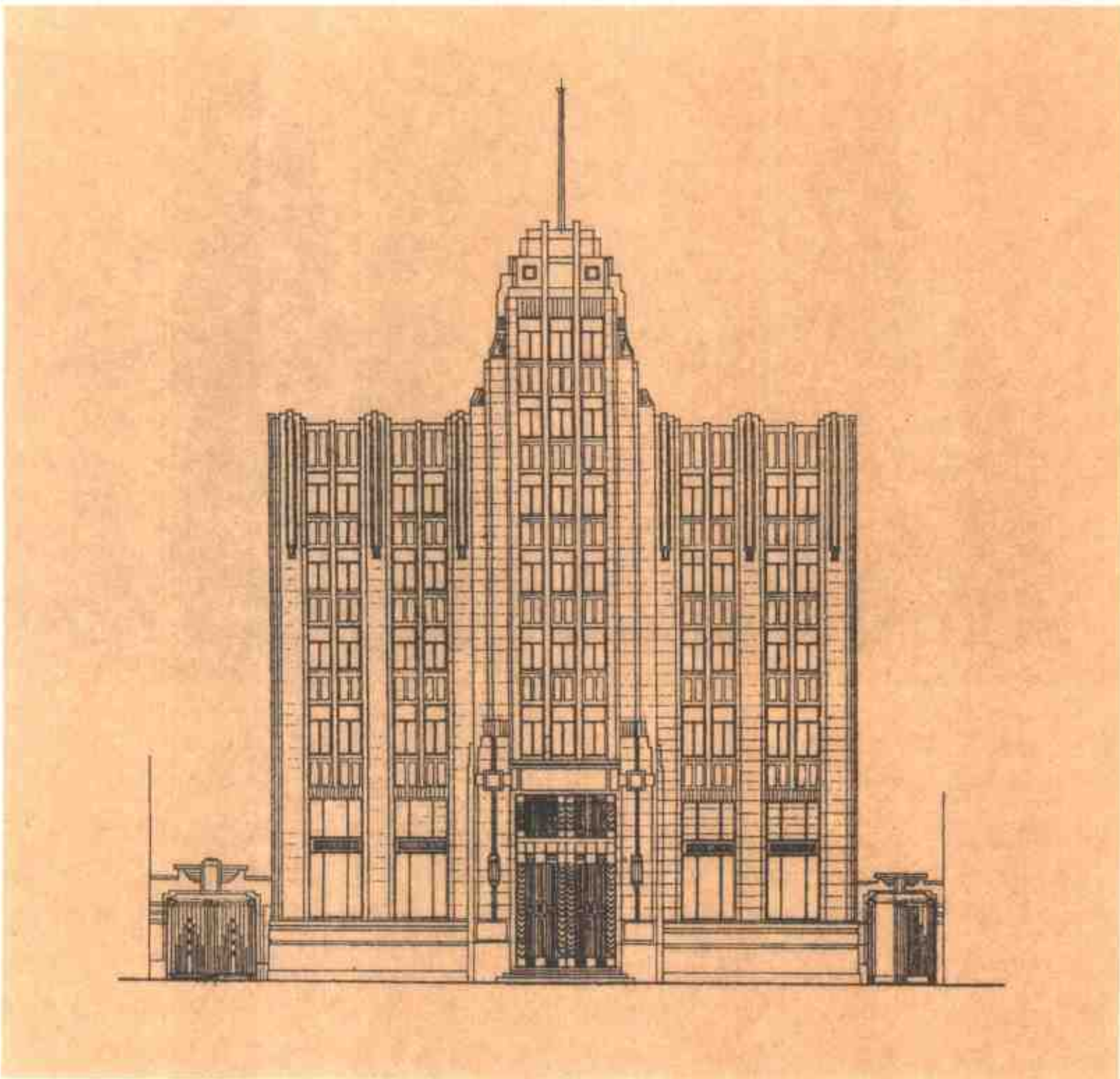


图4-3-46 汉口四明银行立面图。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李传义稿)。



图 4-3-47 汉口四明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图 4-3-48 左：汉口中国实业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右：青岛金城银行。1934 年建造，仍为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30 年代)及汇泉角东海饭店(1936)等。^[44](图 4-3-53,4-3-54,4-3-55)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建筑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虽有少数有识之士有清醒认识,并付诸实施,但多数建筑师还只是从表象看待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被认为是诸多建筑形式中的一种新样式,所以许多建筑师既设计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也同时设计“国际式”建筑。建筑刊物对建筑作品的评论与介绍也是如此。庄俊设计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上海金城银行(1925-1927)已时隔六年,1933 年 10 月出版的《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四期仍用很大篇幅详细介绍,刊照片 27 幅,并发表石麟炳的评论《对于上海金城银行建筑之我见》(图 4-3-56)。评

论云：“予详观庄俊建筑师之金城银行设计，颇多优越之点，虽古典派建筑不能盛行于当时，而庄严伟大之概，不减于近代建筑，特为介绍其要点，以供诸建筑家之参考焉！”^[142]1933年，庄俊设计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形式的青岛交通银行竣工，1934年3月出版的《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刊《青岛交通银行建筑始末记》，并刊青岛交通银行照片6幅，其中正面外景照片与室内内景照片之下编者各题打油诗一首，阐述始末记中的观点，十分明确而有趣。外景照片下的打油诗云：“新派建筑也好，古派建筑也好，建筑目的，所为的不过是适用与坚牢；费用十分经济。业主岂不更道好！”^[143]室内内景照片下的打油诗云：“古典式的房屋，装饰了摩登派的家具，说者或谓他不伦不类；可是新古相衬，反显着十分风光。”^[144]就在同一期《中国建筑》上，还刊有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大上海大戏院与金城大戏院，对这两座体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趋势的建筑，编者亦同样赞誉有加。大上海大戏院刊有五幅照片，编者赞曰：“大上海大戏院的外表，可说是一座匠心独运的结晶品。‘大上海大戏院’几个年红管（引者注：即霓虹灯）标识，远远的招徕了许多主顾，是值得提要的。正门上部几排玻璃管活跃的闪烁着，提起了消沉的心灵，唤醒了颓唐的民众。下部用黑色大理石，和白光反衬着，尤推醒目绝伦也。”^[145]（图4-3-57）对金城大戏院，编者云：“按金城戏院，于最近日完工，图样为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采用最新式。除人口上部开辟高大之窗数行外，另则设小窗几点而已。其余部分，则施之以极平粉刷，不尚雕饰，为申江别开生面之作。”^[146]（图4-3-58）《中国建筑》对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作品与体现了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趋势的建筑作品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及建筑界仅从表层浮浅认识现代主义建筑的现象。当时的中国建筑界，片面地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是“经济建筑”者有之：



图 4-3-49 青岛大陆银行。上图：透视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五期，1935年11月；下图：现状照片，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图 4-3-50 青岛中国银行。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图 4-3-51 青岛上海银行。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图 4-3-52 青岛山左银行。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图 4-3-53 青岛山东大戏院。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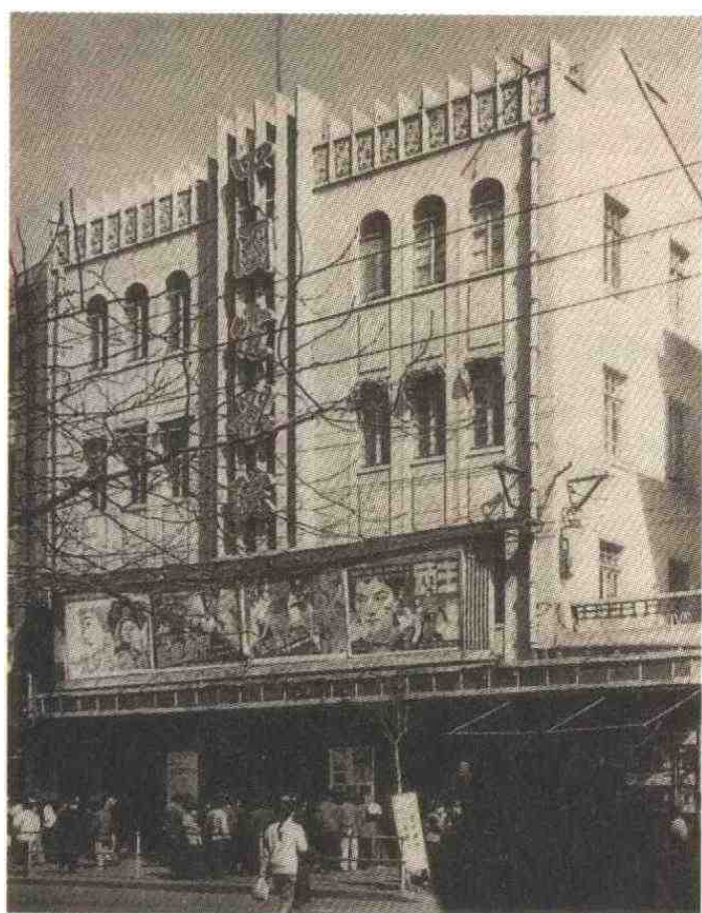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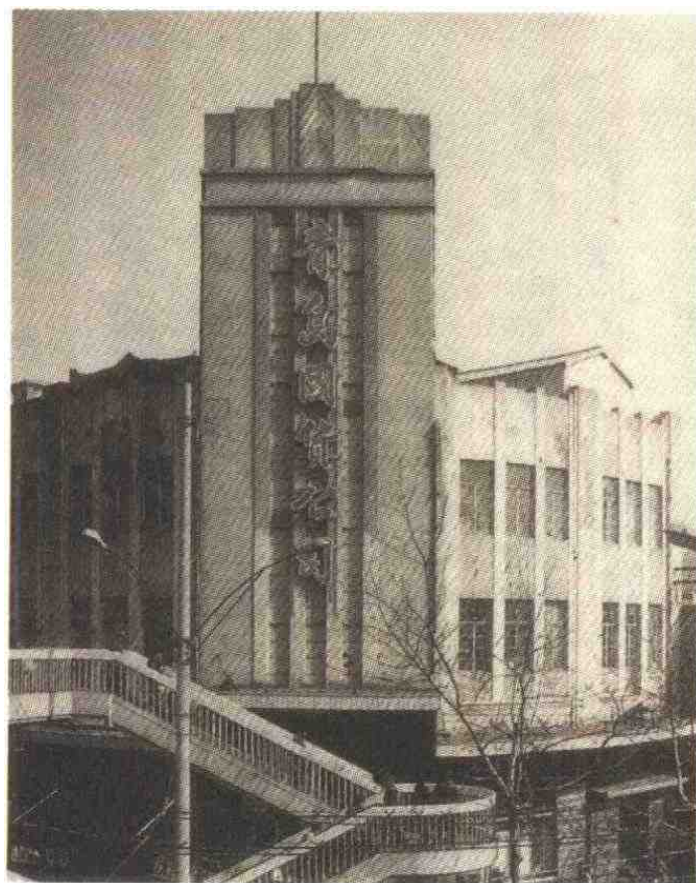


图 4-3-54 青岛中国国货公司。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德国发明国际式建筑，不雕刻，不修饰，其原因不外节省费用，以求挽救建筑上损失。俄国近来竭力提倡经济建筑。西洋古典派建筑，虽盛行于当时，近来已在屏弃之列，均足以表现趋向经济建筑之象征。”^[147]宣扬“建筑循环论”者亦有之：“可是演到近来，繁杂的建筑物又看的不耐烦了，所以提倡什么国际式建筑运动。将复杂的建筑，又恢复到简单。外部力求其平滑，省工，不加点缀，不尚曲线。内部亦不嫌其直率，不厌其简单。我们说这是复古么？这并不是复古，乃是天演公例，物归循环，想不久有人把简单的建筑看厌了，又要提倡向复杂之路，往前开步走！”^[148]离开了现代主义建筑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处于与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中国建筑师是很难理解现代主义建筑的，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并不存在现代主义建筑生长的土壤。中国建筑师也在宣传、介绍现代主义建筑，这一期的《中国建筑》就刊有从第二卷第二期(1934年2月)开始连载的柯布西耶1930年在苏联的讲演稿“建筑的新曙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还只有极少数建筑师真正理解了现代主义建筑，并努力付诸实施，整个社会与大多数建筑师则首先从经济性与摩登建筑形式两个方面接受了现代主义建筑。

建筑的进步，是建立在社会整体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社会较之20世纪初已有很大进步，但经济发展还很落后，思想观念还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即使在当时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商埠城市上海，在聘请外国建筑师设计的采用摩登建筑形式的吴同文住宅中，也仍然供奉着封建时代的祖堂，可知业主追求的只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摩登形式，对其精神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上海如此，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及偏远的城镇、农村更不待言。1930年，王家楨以接收专使身份接收当时收回的威海卫租借地，在威海卫住了两个星期，对当地社会的落后深有感触，王氏言：“我曾到四乡走访一天，乡下的农民勤劳淳朴，只有一点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在我走访期间，我没有看见一个男人不是带发辫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是裹小脚的，这已经是民国十九年啦！”^[149]从王氏的亲身经历，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一斑。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中国近代建筑在战争的间



图 4-3-55 青岛汇泉角东海饭店。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左)

图 4-3-56 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上海金城银行(1925~1927年),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四期,1933年10月。(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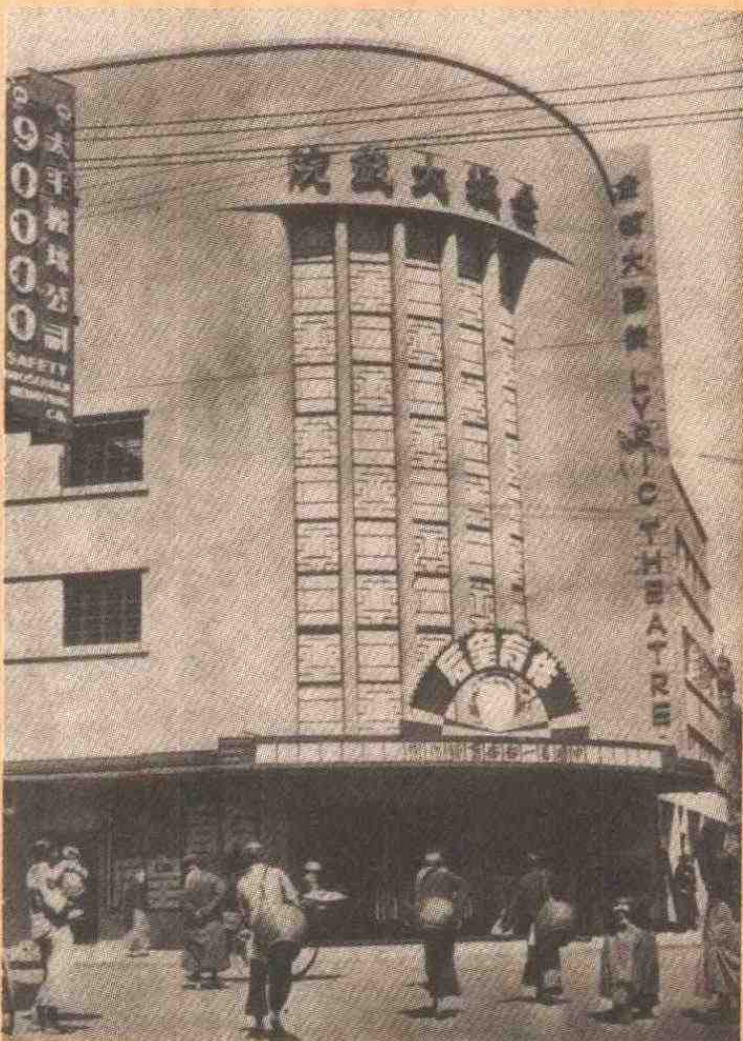


图 4-3-57 上海大上海大戏院。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左)

图 4-3-58 上海金城大戏院。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右)

隙中艰难发展,1927年结束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十年,日寇已发动万恶的侵华战争,使刚刚开始呈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趋势的中国近代建筑停止发展,而日寇侵华战争的直接破坏更使中国的城市与建筑遭受灾难性的损失,战争期间许多城市遭受日军疯狂破坏,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进攻上海,对上海地区狂轰滥炸,当时上海五千多家工厂有二千多家被炸毁,许多学校、民居也被炸毁,总损失超过三十亿元(图4-3-59);1938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中国平民达三十万人以上,南京城市也遭受严重破坏。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近代建筑史进入凋零期(1937~

1949)。这一时期,中国的建筑活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况,只有某些特定地区仍有局部的发展,战时大后方西南地区建筑活动较为活跃;上海、天津租界区仍有少量建筑活动;在东北的几个城市,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洲国国都的长春,日本侵略者开展了一些建筑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近代建筑凋零的状况就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呈现的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也没有更多的进展。

图 4-3-59 1937 年 8 月 13 日遭日军轰炸后的上海南京路。原图注:当这张照片拍摄时,许多死者已经被抬走。背景中有一辆汽车正在燃烧。原图载《中国杂志》1937 年 9 月刊,转引自《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



[1] 藤森照信,《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载《建筑学报》,1993年5期,第33页。此文附图略有不同的另一版本载汪坦,张复合主编,《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第21—30页。

[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研究公元635年至781年景教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1625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后,耶稣会神父曾德昭在三年后的1628年利用往西安修建教堂之便,曾亲自考察,他与金尼阁是最早把景教碑介绍给欧洲的人,后来引起欧洲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年来,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研究景教碑,先后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曾德昭《大中国志》第190—200页记述了景教碑的发现及其亲自考察的过程,并载有曾氏的译文及注释,中文译者的注释中载有景教碑原文。

[3]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如是记载:“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愬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4] 《唐会要》卷四十九:“玄宗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教经,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

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5]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41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转引自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第14—15页。

[6] 参见温玉成,《近瞻宝相 俨岩金身 远鉴神光 湛如留影——龙门石窟雕刻艺术浅论》,注释2,载《中国美术五千年》,第四卷,第301页。

[7] 黄心川,戴康生等,《世界二大宗教》,第43页。

[8] 《马可波罗行纪》,第127页。

[9] 《马可波罗行纪》,第344页。

[10] 《马可波罗行纪》,第352页。

[11] 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36页。

[12]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34页。

[13]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第17—18页:“在西欧历史上,宗教改革以后分裂了的基督教,通常分别被称为旧教(Catholics)和新教(Protestants);在我国习惯上旧教又称天主教(他们又自称公教),新教又称基督教或耶稣教。本书所称的基督教是指旧教的天主教,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是天主教内的一个主要保守集团。但考虑到基督教这个名称原应包括新教、旧教(乃至东正教以及一切奉耶稣为基督的人)都在内,所以译文仍按原文译作基督教。”张治江,李芳园,《基督教文化》,第154页:“天主教,基督教的主要派别之一,与东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教派。”

[14]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1978年法文版序言第457页。

[15]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第15页。

[16]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1978年法文版序言第468页。

[17]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26页。

[18] 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2页。

[19] 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61—264页。

[20]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15页。

[21] 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08—409页。

[22]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0页。

[23]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51页。

[24]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7页。

[25]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937—974页,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8页。

[26] 参见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97—98页。

[27]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苏尔,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1645—1941)》引言第1页这样论述:“许多年以前,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从17世纪30年代到1939年前后延续了三百多年。这是一场有关中国人祭奠祖宗及他们民族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的传统礼仪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有关中国人的礼仪,但是它并不是一场和中国人的争论。这场争论确实很激烈,却又很特别,它是在天主教传教士中间进行的。确切地说,争论的焦点是以基督教义为宗旨的天主教会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古老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礼仪。中国礼仪首先是对祖先和对孔子的崇拜,这使得西方基督宗教世界许多观察家们大为震惊。”

[28] 参见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126—127页。

[2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89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术教案》,卷一,第14页,中华书局,1996,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165页。

- [31]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82页,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25页。
- [32] 丁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7页。
- [33]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5页:“1860年中法条约法文本第六款重申以前中国的诺言:把所有被没收的教会和慈善机关的设施全部归还天主教会。中文本则走得更远,这显然是由于法方一个通译的欺骗行为造成的。〔原书注:大多数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认为,这个通译即传教士德拉马。尽管中国官员对中文本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至少试图敷衍地使之生效。1865年柏德美协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两种文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摩擦。〕”
- [34]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5页。
- [35]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6页。
- [36]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7页。
- [37]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84页。
- [38]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08页。
- [39] 必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第58页,转引自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第12页。
- [40]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第120页。
- [41] 卫三畏,《派往中国的全部传教士名单》,史其志译,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144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导言第12页。
- [42] 路秉杰,《上海的教堂》,载《新建筑》,1986年3期,第53页。
- [43] 路秉杰,《上海的教堂》,载《新建筑》,1986年3期,第54页。
- [44] 参见路秉杰,《上海的教堂》,载《新建筑》,1986年3期;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85—92页;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第54—59页;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14—125页。
- [45] 汤国华,《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一)》,第199页,关于石室天主教堂的具体尺寸,各家说法不一,汤国华书所载是测绘所得一手资料,故本书按汤国华书之说。
- [46] 邓其生,李佩芳,《论广州石室的建筑艺术形象》,载《新建筑》,1988年1期,第65页。有关石室天主教堂,还可参见吴庆洲,《中国最大的哥特式石构教堂——石室》,载《建筑学报》2001年8期;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8页,谢少明文。
- [47] 参见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22页。
- [48]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37页,李传义文。
- [49]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39—140页,李传义文。
- [50] 《清末教案》,卷一,第185页,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171—172页。
- [5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50卷,第10938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59页。
- [52]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17—318页,郑兴昌,元育岱文。
- [53]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97页,葛立三文。
- [54]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40页,陈重庆文。
- [55]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41、347页,陈重庆文。
- [56] 魏宏运,《民国纪事本末(二)》,第507页。
- [57]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65—266页:“天主教一部分依靠在中国的大量房地产的剥削收入和教徒的捐献,一部分来自国外的捐款,另外附属事业也有一些剥削收入。在1901年以前,还勒索到大量的教案赔款。基督教(引者注:即新教,下同)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接受资本家的捐款,包括在华各国鸦片商的捐助,各个差会主要依靠募捐和教徒的捐献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1901年以前还勒索到少量的教案赔款。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垄断资本家为了逃税而给教会“慷慨解囊”,教会的收入

大大增加,各个差会与垄断资本家所掌握的银行挂上钩,把钱存入作为“基金”,提取利息,再加上教徒的捐献和在中国所办附属事业的剥削收入及中国工商业者和官僚的捐款,使各基督教差会拥有大量的金钱,因此,各差会总部有专门聘请的会计师和律师,而且还把资本家平信徒请进各种“董事会”,帮助差会用这笔资金进行市场投机活动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58]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304页

[59] 参见魏宏运,《民国纪事本末(上)》,第508—513页;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304—308页

[60] 招观海,《国民政府下之基督教》,载《文社月刊》,1927年,第2卷,第7期,第18页,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307页

[61] 参见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图录》,第309—310页;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417—418页,沈阳文

[62] 关于徐家汇天主堂,路秉杰《上海的教堂》(载《新建筑》1986年3期)有较详细的介绍。并可参见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图录》,第311页;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88—93页;仇江,《上海百年建筑史》,第87页;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22—124页。路秉杰文载有《上海县法华乡志·教堂篇》关于徐家汇天主堂的记载,兹转录如下:“徐家汇天主堂,在徐文定公墓东北。江南全省主教驻节于此。道光二十七年,法国教士南格禄创建。同治二年,移肇嘉浜于东,并拓基址,增建西式楼房,规模宏敞。主教以上有会长、院长、司铎、修士等名目,专司教务。光绪三十二年,在老堂外东向新筑大堂,列钟楼二,十字塔高十七丈,堂塔高八丈,阔九丈,中阔十四丈,深二十五丈,设祭台十九座,大小石柱六十四根,阶十一级,可容二千五百人。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主教姚宗李(Prosper paris)行落成礼。计靡四十万金,为中国教堂之巨擘。”又关于徐家汇天主堂的高度,路秉杰文云:“另据法国耶稣会出版的法文杂志《中国通讯》(1911年),此堂于1910年10月23日,由主教姚宗李主持开堂大典。此堂面阔二一八米,进深七十九米,最宽处达四十四米,塔顶高三十一米(十字架不计在内)”文中所称“塔顶高三十一米”恐不确,陈从周,章明书引《徐汇纪略》所载“新堂钟楼高17丈”;仇江书称“正立面两座钟楼高50余米”;郑时龄书称“钟塔高达57米”。本书按郑时龄之说。

[63] 参见路秉杰,《上海的教堂》;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94—105页;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25—128页。

[64]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41页,陈重庆文。

[65]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47页,陈重庆文。

[66] 朱林,《永远的青岩》,载四川画报增刊《四川航空》,2001年,第21—22页。

[67] 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第1页。

[68]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284页,唐学易文。

[69]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291页,唐学易文。

[70]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21—122页

[71]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130页。

[72]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下),第1072页,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91页

[73] 常怀生,李健红,《圣·索菲亚教堂——哈尔滨建筑艺术馆》,载《建筑学报》1998年3期,第37页

[74] 参见常怀生,李健红,《圣·索菲亚教堂——哈尔滨建筑艺术馆》,载《建筑学报》1998年3期,第37—39页

[75] 参见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93—100页。

[76] 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中西500年比较(修订本)》,第149页:“北美洲原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

方。15世纪末,这里大约有100万印第安人,他们当时都处在母权制的氏族社会阶段。1492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以后,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殖民者先后侵入北美,他们屠杀和驱逐大批的印第安人,夺取了他们肥沃的土地,陆续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英国从17世纪开始对北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1607年5月,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依据英王的“特许状”,在詹姆斯河口的一个半岛上建立了詹姆斯城,并以此为据点,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这是英国在北美洲最早的殖民地。1620年英国移民乘“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共建立起13个殖民地。”

[7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10页。

[78]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二版,第250—251页。

[7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7—308页。

[80]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9—10页。

[81] 霍寒,《出卖上海滩》,第12—13页。

[82]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55页。

[83]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57—258页。

[84] 郁慕侠,《上海鳞爪》,第49—50页:“二十年前,(引者注:指20世纪初年)电风扇还未风行时代,到了夏天,商铺中如绸缎店、剃头店、酒菜店以及戏园中的包厢等,都临时装上几面白竹布做成长方形的风扇,扇端系了长绳,由人牵动,凉风即习习而生,此种土制风扇,名叫‘拉风’。考究些的,竹布上面也涂着书画。稍为体面的人家,也都装置一面或数面。等到电气风扇盛行以后,此项拉风就归于天然的消灭了(据说内地未有电气事业的所在,现在仍有装置拉风者)。”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作者亲见在广州的理发店中仍在使用这种“拉风”。

[85]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62页。

[86]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64页。

[87]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67页。

[88]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177页。

[89]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167页。

[90]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24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81页。亨特的两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旧中国杂记》与《广州番鬼录》,因是亲身经历的记载,除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因作者并非史家而时有错误外,具体事物的描述真实度很高,所以被很多严肃的史书引用,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即其一。

[91]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54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81页。

[92] 《广州记事报》(Canton Register),1832年,摘自《澳门月报》,1842年1月号,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81页。

[93]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35页。

[94]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3—84页。原文注:参见戴以思著《模范租界》(C. R. Dyce.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 1906)有关19世纪60、70年代上海外国租界的许多同时代记载。

[95] 霍寒,《出卖上海滩》,第12页。

[96]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第32页。

[97] 《官方文电》,载《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四版)》,第300页。

[98]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80页。

[99] 开埠初期来到上海的西方妇女很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开埠初期上海也建有少量单纯作为住宅使用的殖民式建筑。开埠之后最早来到上海的西方妇女是凯瑟琳·洛克哈特夫人,《西方妇女与上海、北京:谁是先驱?》一文如是论述:“根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第一个来到上海的西方妇女是凯

瑟琳·洛克哈特夫人(Mrs Catherine Lockhart, 1823~1918) 洛克哈特夫人出生于一个英国铁器制造商家庭, 父亲叫哈利·帕克斯, 洛克哈特夫人是这个家庭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 她们三个姐妹兄弟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妹妹伊莎贝拉同她丈夫也在上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弟弟哈利·帕克斯成为了远东地区最著名的西方人, 当时他的塑像就矗立在南京路的入口处。帕克斯一家与远东还有其他的一些联系。她们三人从小就父母双亡, 于是她们的一位亲戚格茨拉弗夫人就成为其监护人。格茨拉弗夫人的丈夫是位著名的医生, 在他的指导下, 哈利·帕克斯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础。凯瑟琳·帕克斯小姐与洛克哈特关师结婚前, 就同格茨拉弗家住在已被英军占领的舟山。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 她就同丈夫来到上海。她丈夫是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医生, 在上海创办了“山东路中国平民医院”。他们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上海平民的救死扶伤上。在他们来到上海的第十个年头, 太平天国攻占了上海。(引者注: 此处原文论述错误。太平军于1860年8月、1862年1月及1862年8月曾三次进攻上海, 但从未攻占上海。)在战乱不断的17个月里, 这家医院日夜不断同时接受敌对双方的伤病员, 成为了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洛克哈特夫人一直是她丈夫的得力助手, 直至她因病不得不在家疗养。后来, 她又随丈夫北上京城北京, 慈禧太后还因为他们的出色工作给予了一千英镑的资助。洛克哈特先生于1897年去世, 而洛克哈特夫人活到1918年, 享年95岁。根据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d Press)(1919年3月15日)报道, 上海妇女界与“山东路中国平民医院”董事会决定为这位“现代上海之母”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见秋叶,《西方妇女与上海、北京:谁是先驱?》,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

[100] 石海山,居内尔·菲尔塞特,《挪威人在上海150年》,第44—45页。

[101]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39页,李传义文。

[102]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96页,葛立三文。

[103]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71页,杨嵩林文。

[104]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90页。

[105] 罗小未,《建筑纵览》,载《上海百年掠影》,第78页。

[106]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10—111页,关于这些早期西方建筑师与工程师的相关资料,可参见郑时龄书中之相关注释。

[107]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13页,关于这些西方建筑师的相关资料,可参见郑时龄书中之相关注释。

[108]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202—203页:“1911年在上海建立事务所的公和洋行是家于1868年在香港创建的事务所,创始人是英国建筑师威廉·萨威(William Salway),1886年,由两位合伙人巴马(C.Palmer)和丹拿(A.Turner)作为事务所的主持人,洋行也改名为巴马丹拿公司(Palmer & Turner,简称P & T),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使用的中文名称为公和洋行。公和洋行在二三十年代留下了许多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十分有影响的作品。公和洋行在上海的总建筑师和工程师是乔治·利奥波德·威尔逊(George Leopold Wilson, 1881~1967),生于伦敦并在那里受教育,1898年至1901年间受雇于伦敦建筑师佩克(H.W.Peck),以后又曾在安森(E.B.J.Aanson)事务所当助理。在此期间,威尔逊经常在法国和意大利旅游。1908年来到香港,加入巴马丹拿公司,直至1952年3月退休,在远东工作了44年。其中有30年的时间,他是巴马丹拿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领导着一个由杰出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班子,负责远东地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一些最大又最富创意的建筑的设计。他于1912年来到上海,设计了包括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江海关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建筑。以后,威尔逊还设计过香港汇丰银行(1933),应约旦国王邀请设计约罗·巴鲁的新政府大楼(1934),并且还负责设计和建造在孟买和仰光的一些银行大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设计了香港的中国银行(1950)等建筑。”

[109]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43页,李传义文;范王国,张干臣,冯澄寰,王义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15—416页。

[110] 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64页。

[111] 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78—181页;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60页,第62页;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第327页。

[112] 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210页,原书注:“占地面积据上海市黄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黄浦区土地利用规划》课题组1998年10月编制的《上海市黄浦区土地利用规划》第34页附表:黄浦区内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占地面积一览表。”又“据杨嘉祐先生所引为9338平方米。”

[113] 关于上海汇丰银行,可参见《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第58页,第60—61页,第136页;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50—55页;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第311—313页;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第114页,第132—134页;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210—216页。关于汇丰银行的层数,《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第61页载汇丰银行立面图,明确注明了各层层高及层数,为主体建筑地上五层,首层设有夹层,第七层局部设塔楼,塔楼之上是鼓座及穹顶。关于汇丰银行的结构形式,《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51页:汇丰银行为“钢框架结构,外形模仿古典的砖石结构”,又在第52页载《后期汇丰银行屋顶钢架施工的情况》照片,此照片是填充墙已施工完成后的照片,极易误会为主体建筑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第313页载《银行钢架施工现场》照片,是钢结构施工时的照片,很清楚地展示了主体建筑的结构形式。又《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第136页在“新结构的发展及新材料的运用”一节中云:“到1923年建的汇丰银行和1925年建的江海关,钢框架已可作到8—9层”。综上所述,汇丰银行的结构形式是钢框架结构。

[114] 关于沈理源,《天津近代人物录》第192页有如下记载:“沈理源(1889~1949),浙江杭州人,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官费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奈波利工科大学攻读水利和建筑工程专业,回国后,在天津、北京等地执行建筑师业务,先后达三十年,早年曾和一位殷姓建筑师协作设计北京前门外劝业场和真光电影院,独自开业后,在津、京两地负责很多较大建筑物的设计,如北京的清华大学体育馆、图书馆、电气馆,天津的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以及新华大楼等建筑,对京、津两地建筑设计有一定影响。此外,还从事建筑工程教学工作,曾先后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北京人学工学院、天津工商学院等院校教授,日本侵华期间致力于福莱克契著的《世界建筑史》的翻译工作,此书为我国第一部世界建筑史的译本。”

[115] 天津中街的西方古典主义银行建筑,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高仲林,《天津近代建筑》。

[116] 参见范正国,张干臣,冯澄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欣,《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07—408页:汇丰银行“1866年在汉口设立分行,曾在沿江大道建有二层砖木结构的行屋,以后拆除改建大楼。汇丰银行位于汉口沿江大道103号及青岛路2号,占地35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44平方米。此楼分两次兴建,首先建筑青岛路2号,甲种混合结构楼房,由英籍工程师派纳设计,在1913年开工,1917年竣工。随后,建沿江大道103号,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由上海公和洋行设计,于1914年开工,基础完成后因欧战停建,1916年复工,到1920年完工。大楼外部麻石到顶,钢窗,内廊镶大理石,门窗装修均用上等柳安木及柚木,由汉协盛承建,造价纹银125万两,保固期100年。”引者注:汉口沿江大道103号汇丰银行大楼由上海公和洋行设计一说不能肯定,姑存疑。

[117] 参见范正国,张干臣,冯澄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欣,《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15页:交通银行“位于汉口湖南街(今胜利街)二号,占地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高21米,立面处理,较为雄伟,由英人汉明斯(引者注:即翰明斯)和白克来(引者注:即伯克莱)设计,民国八年,由汉合顺营造厂承建,1921年建成,造价八万二千两纹银。”

[118] 范正国,张干臣,冯澄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欣,《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20页:“美商花旗银行大楼,位于汉口青岛路口,沿江大道102号(今为83

号),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82.21亩,由景明洋行设计,1922年由魏清记营造厂承建,造价白银170000两。”关于汉口美商花旗银行的设计者与建造年代的另一种说法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43页,李传义文:“美商花旗银行建于1921年,……此楼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第159页,李传义文注3:“据美国康奈尔大学Jeff Cody博士提供的资料,美商花旗银行汉口分行由亨利·墨菲设计。”本书从Jeff Cody之说。

[119] 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194—195页;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63—64页;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第273页。年饰公司开工兴建的年份从郑时龄书之说,为1914年(其余二书为1915年)

[120] 参见范正国,张千臣,冯澄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25—426页:“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今市中心百货商店)是联在一起的一栋大楼,位于汉口江汉路45—47号,系上海联保水火公司投资兴建,由景明洋行仿照上海老永安公司布局设计,系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有角塔。璇宫饭店二楼以上为凌霄游艺场,另设大门用电梯上下,演出京汉楚剧及杂技、杂技、评弹等。大楼于1928年开始打桩,1929年分别由汉协盛、正兴隆两家营造厂承建,1931年完工。”

[121] 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216—217页

[122] 参见范正国,张千臣,冯澄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19页;江汉关大楼“于1921年正式开工,1924年完成。由英人思儿生设计,魏清记营造厂承建,总造价纹银100万两,其土建部分40万两。”

[123]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535—536页。

[124] 拉雷·文卡·马西尼,《西方新艺术发展史》,第94页。

[125] 萨拉·柯耐尔,《西方美术风格演变史》,第194页。

[126] 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94页,常怀生文。

[127]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94—195页,常怀生文。

[128] 侯幼彬,刘松茂,《哈尔滨近代建筑概说》,载侯幼彬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哈尔滨篇》,第9页。

[129] 童寯,《近百年西方建筑史》,第11—12页。

[130] 拉斯金(John Ruskin),《建筑七灯》,转引自吴焕加,《20世纪西方建筑史》第42页,原文载John Ruskin,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J.M.Dent & Sons Ltd,1907,pp.207.210.

[13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伦敦初旅》,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十二,第47页,转引自李喜所,元宵,《梁启超传》,第441页。

[132] 梁启超,《与仲弟片》,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2页,转引自李喜所,元宵,《梁启超传》,第444—445页。

[133] L·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第363—364页。

[134] L·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第364页。

[135] 关于“装饰艺术”运动,参见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第117—125页。

[136] 《虹桥疗养院设计经过》,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五期,1934年5月,第1—2页。

[137] 参见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第113—115页。

[138]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153页,李传义文。

[139] 参见范正国,张千臣,冯承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30—431页

[140] 参见范正国,张千臣,冯承寰,王又华,彭雪晴,《武汉近代建筑概述(1861~1949)》,载杨蒲林,

皮明东,《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431页。

[141]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289—290页,唐学易文。

[142] 麟炳,《对于上海金城银行建筑之我见》,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四期,1933年10月,第18页。

[143] 《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第4页。

[144] 《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第9页。

[145] 《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第12页。

[146] 《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第22页。

[147] 《中国建筑》编者,《为中国建筑师进一言》,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年11月,第1页。

[148] 麟炳,《建筑循环论》,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第2页。

[149] 王家楨,《收回威海卫英租地亲历记》,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445页。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第五章

移宫换羽——民间建筑
工匠的杰作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第二条渠道是民间传播渠道。民间传播渠道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广东、福建的侨乡建筑就是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作者研究范畴所限,本书仅以石库门里弄民居为例论述之。

石库门里弄民居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对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学者而言,它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对上海、汉口的普通百姓来讲,它寄托着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亲切情感。因此石库门里弄民居一直是建筑界研究探讨的目标,也成为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若干年来,有关著述、论文不断问世,多方位、多角度的论述详尽完备,报刊、电视亦时有报导,闲话石库门的小文风趣生动,电视节目中上海中学生对有关石库门里弄民居的问题对答如流。在上海谁不知道石库门呢。

作者与石库门里弄民居似乎有些缘分,1976年,还是完全不能过问学术的年代,也从未接触过这个课题,看到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描述上海弄堂房子中生活情景的文字,很觉真挚感人,当即保存于书箱之中,也保存于记忆之中,因之许多年后可在本书之中原文引述。1980至1981年,对里弄住宅(包括石库门里弄民居、新式里弄住宅等)作了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除上海、天津外,并发掘汉口这个里弄住宅宝库。1988年至1990年,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同时,对这一课题再度爬梳剔抉,理论上又有新的认识。1994至1995年,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之约,撰《石库门里弄民居》一书,对这个课题作了第三次系统的研究整理。时光流逝,阅历渐深,资料积累与理论探索均略有进展,此次研究这个课题,已经是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大课题下,从建筑文化视角宏观考察石库门里弄民居。对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整体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加深了对石库门里弄民居这一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的理解;而对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反复调查、研究、剖析,则使作者对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有直接的、微妙的、极细致的亲身感受。大课题的宏观研究与小课题的深入探索结合,相辅相成,也许是研究建筑文化的可行之道。

第一节 里弄住宅概论

里弄住宅,在汉口称里分住宅,或里份住宅,与上海的里弄住宅是同义词,上海的里弄住宅一词,又称弄堂房子,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含义泛泛的名词,可泛指1840—1949年间上海建造的除棚户与独院豪宅以外的所有城市住宅。所以一般的通俗读物与媒体宣传,及一些专业的建筑书籍论文,多有将这些不同类型的住宅统统称为里弄住宅者。一般将这些住宅分为四种类型:石库门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花园里弄住宅与公寓里弄住宅。^[1]对同一事物,研究的视点不同,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从建筑史学的角度研究石库门里弄民居,就应当对里弄住宅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定义。1982年,作者从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视角考察里弄住宅,有如下定义:“里弄住宅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受西方近代建筑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低层联排式住宅,它是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的产物,是中国住宅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里弄住宅最早出现在上海,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建造,到解放前夕已经成为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建造数量最

大的住宅类型。”^②按科学的住宅分类方法分类,石库门里弄民居属里弄住宅范畴,是一种低层联排式住宅(terraced house)。

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随着社会性质的转变,中国建筑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近代科学技术相联系的新建筑体系,其表现之一就是新的住宅建筑类型的出现。这种由房产商统一投资,成批建造,分户出售或出租的低层联排式住宅就是里弄住宅,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尽管各地的传统住宅建筑类型不同,风格各异,但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本质的变化,一直停留在自给自足的个体自建住宅阶段,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产生于上海的里弄住宅开中国住宅建筑商品化之先河,是中国的住宅建筑从自给自足的个体自建住宅发展到商品化住宅的转折点,是中国住宅发展史从古代住宅发展到近代住宅的转折点,因而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有其特定的价值与地位。

另一方面,随着住宅商品化的建造与经营方式同时引进的是新的建筑类型——低层联排式住宅,这是里弄住宅的基本建筑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上海近代的不同住宅类型统统称为里弄住宅之论,就不能成立,花园里弄住宅中的双联式住宅尚可视作联排式住宅的一种特殊类型,而多层公寓住宅属单元式住宅范畴,一梯两户或一梯多户,与每户都有单独出入口(单层与多层)与楼梯(多层)的联排式住宅已有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属于联排式住宅范畴的里弄住宅按其分户单元的特征可分为两种类型:旧式里弄住宅与新式里弄住宅。旧式里弄住宅是在中国传统住宅的基础上,受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中国化的联排式住宅,分户单元沿用传统住宅建筑的设计手法,平面严谨对称,房间无明确分工,所有房间依靠内院及内天井采光通风,总的印象是建筑包围院落,依然保留着传统住宅内向封闭的特征。新式里弄住宅是从西方直接引进的近代联排式住宅,分户单元采用近代住宅设计手法,平面布置灵活,功能分区明确,充分利用外墙面开设门窗以争取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有院落及绿化包围建筑的趋势,具有近代住宅外向开放的特征。

里弄住宅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旧式里弄住宅与新式里弄住宅都产生了多种类型,可列表详述如下。

表中院落式里弄住宅是在天津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旧式里弄住宅,建造地点以天津租界区以外的河北新区最为集中,其经营者基本上是华商房产商,其使用者多数是城市中下层居民,其建造年代集中在天津里弄住宅建造的早期(约1900~1920)。因此,院落式里弄住宅是里弄住宅中受外来影响最少而受传统习惯势力影响最深者。院落式里弄住宅的分户单元大体上还保持着北方传统四合院住宅的基本格局,在这个基础上作了一些简化但没有多少改进,只是在建造与经营方式上发展到由房产商统一建造,分户出售或出租。院落式里弄住宅基本上是平房住宅,虽有少数院落式里弄住宅在平房住宅的基础上加建局部二层或改建为全部二层,但基本的平面形式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得到推广而形成新的住宅类型。

应当特别阐明的是,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主要建造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各种城市住宅建筑类型,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社会需求,而从西方引进的各种近代住宅建筑类型,包括联排式住宅(旧式里弄住宅与新式里弄住宅)、多层单元式住宅(公寓式住宅)、独院式住宅与高层住宅等。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住宅建筑之间,不存在从旧式里弄住宅发展到新式里弄住宅,再发展到公寓式住宅这样一种发展进程。换言之,新式里弄住宅不是从旧式里弄住宅发展而来,公寓式住宅更不是从新式里弄住宅发展而来,而是因为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没有暖、卫设备,

里弄住宅分类一览表

里弄住宅	旧式里弄住宅	石库门里弄住宅	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	业主自用的大型石库门里弄住宅
				三间两厢石库门里弄住宅
				两间一厢石库门里弄住宅
				单开间石库门里弄住宅
		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	三间两厢石库门里弄住宅	
			两间一厢石库门里弄住宅	
			单开间石库门里弄住宅	
			改良石库门里弄住宅	
		院落式里弄住宅	三合院式院落式里弄住宅	
	四合院式院落式里弄住宅			
	二合院式院落式里弄住宅			
	新式里弄住宅	一间半新式里弄住宅		
		单开间新式里弄住宅		
		两开间新式里弄住宅		
		两间半新式里弄住宅		
自由式平面新式里弄住宅				

注：表中石库门里弄住宅即本书所称石库门里弄民居，因石库门里弄住宅多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所以本书称为石库门里弄民居，以突出其源自民间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特定的建筑文化特征。

功能分区不明确，建筑形式亦不适应当时有产者的西化审美观念的旧式里弄住宅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逐渐停止建造，从20世纪初就开始直接克隆的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新式里弄住宅）建造数量逐渐增多，此时开始大量建造，还克隆了一些多层公寓住宅与高层住宅，从内容到形式一概照搬。于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住宅建筑就发展到以新式里弄住宅为主体，也建造了一些多层公寓住宅与高层住宅。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上述各种住宅类型之间不存在时间上的纵向发展关系，只存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住宅建筑的克隆或移植，其中只有旧式里弄住宅在移植过程中产生了变异，形成了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中西交融的建筑文化现象。

将旧式里弄住宅与新式里弄住宅相比，前者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后者则主要是西方建筑文化的克隆，因此二者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价值。从建筑文化的视角考察，新式里弄住宅与前文所述的其他住宅建筑类型并无本质区别，所以本书不再详述。而旧式里弄住宅之中，院落式里弄住宅起步较晚（1900年以后），存在时间较短，建筑形式也比较简陋，难以反映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特定发展进程。因此本章仅论述作为早期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产生影响的第三条渠道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因石库门里弄住宅多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所以本书称为石库门里弄民居，以突出其源自民间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特定的建筑文化特征。

第二节 石库门里弄民居的产生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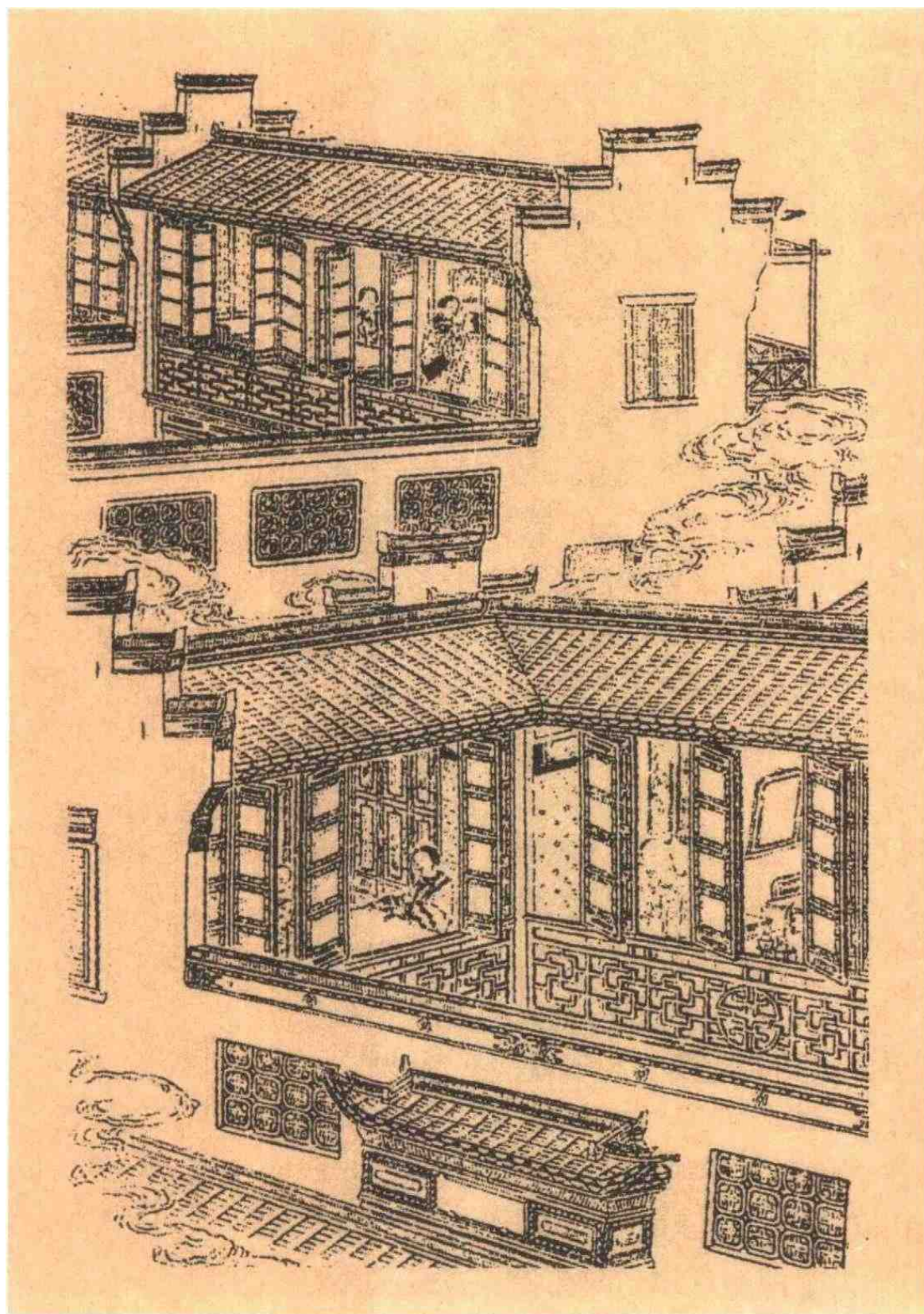
石库门里弄民居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新建筑体系产生、发展并取代旧建筑体系的新旧交替之际发展起来的城市民居。石库门里弄民居最早产生于上海,后来流传到汉口与天津,并在这三个城市,主要在上海与汉口大量建造,后期也扩展到一些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如杭州。

石库门里弄民居随上海近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英人居留地内。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十七个月,城厢内外及青浦嘉定等地的居民纷纷迁居上海英人居留地,“小刀会的占领县城及后来清军和小刀会的继续作战,使逃入租界的华人有增无已。一八五二年初(清咸丰二三年间),住在租界(引者注:应为上海英人居留地)内的华人数仅五百;到下一年,竟剧增到二万人以上。有的在英租界西北部搭盖茅棚,有的仅以船只置黄浦滩或洋泾浜岸上作为住所;此外,则还有富有的,能付昂贵的房租,极为租地洋人所欢迎。洋人积极建屋以谋厚利。一八五四年七月间(清咸丰四年六月初七日到七月初七日),所造华人居住的房屋约有八百所之多。”^[9]此时外商乘机在英人居留地建造了一大批木板房屋出租谋利。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当时英领阿利国欲禁止英人居留地华洋杂居,但遭只求快速发财然后离去的,持短期行为的洋商的反对而作罢。1854年7月11日,“英美法三界受治于一工部局。工部局向逃难入租界者征税,除地稅码头稅外,并須納房捐。”1855年1月,英領阿利國令驅逐英人居留地內無錢租屋的窮苦華人,“英領驅逐華人出界,焚其廬舍,至為殘酷。”1855年2月24日,在小刀會于2月17日退出上海縣城后,“沪道准华人有条件入界居住”。^[10]英領阿利國焚毀了洋泾浜一帶華人難民的茅棚,其后有条件进入租界居住的华人只能购买或租住外国商人为谋利而大批建造的木板房屋。1853年,太平天国战事已延及江浙两省,太平军于1853年1月占武昌,2月沿江东下,水陆并进,连克九江、安庆、芜湖,3月占领南京,又克镇江、扬州,并定都南京,改称天京。1860年8月、1862年1月及1862年8月,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连年战乱使长江中下游各省,主要是江浙两省的居民为避战祸大批迁入上海租界。“中国居民向租界汇聚,可以说是上海开埠以后人口流动的基本特点。开埠初期的1850年左右,由于华洋分居政策,租界内人口在当时整个上海人口的比重中不足0.1%,可称微不足道。但是,经小刀会、太平天国两次战争,这种人口比重的情况就明显改变了。到太平天国结束后的1865年至1866年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分别占上海人口总数的13.4%和8.1%,即两个租界的人口比重,已占上海人口总数的21.5%,也就是说,这时(租界出现后20年)全上海每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居住在租界内了,而这时租界的面积只是全上海面积的0.57%。”^[11]导致中国居民大批涌入商埠城市租界区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整个中国近代史时期(1840~1949),战争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作为不动产的建筑,对战争影响的反应最为敏锐,战争是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的极重要的因素。“租界制度既然是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那么,为什么在租界产生以后,总的趋势是,进入上海租界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呢?在众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上海出现了这种带有民族压迫性

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在中国的广大的地区,人民遭受的却是沉重的封建压迫、频繁的兵燹战乱。在腐败的封建统治和西方侵略的冲击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破产,民不聊生,啼饥号寒,大量破了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无家可归,只得流入看上去颇为繁荣和谋生较易的租界地区。特别是在战乱的年代里,租界的‘独立’所形成的特殊状态,使它能提供相对的安定生活因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仅是贫苦人民,还包括不少地主士绅、富商巨贾乃至失意官僚、退役军官等等也进入租界,这些人往往挟资而来,在租界或其附近经营各种行业。”^[6] 这种中国居民向商埠城市租界区汇聚的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上海如此,天津、汉口、广州如此,1900年前后陆续诞生的租借地城市如大连、青岛,铁路附属地城市如哈尔滨等也是如此,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是少数外国人所能造就的,华人、华资的进入,是这些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大批华人华资涌入上海英人居留地,居留地内的木板房屋大量建造,直至1864年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逃到上海的难民陆续返回故里,上海英人居留地内人口减少,木板房屋的建造才告停止。这种木板房屋由英商经营,首次采用了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建造方式,同时也是中国房地产商品化的开端,可以说是上海石库门里弄民居的雏形。1870年,为防止火灾,租界区内取缔木板房屋,代之以砖木立帖结构的联排式住宅,这就是最早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多分布在上海早期英租界范围内,建筑质量不佳,年代久远,今日已无遗迹。

图 5-2-1 上海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界画,原图载《百年上海滩》。图 5-2-9 上海公顺里厢房二层之窗下栏杆,与界画所绘基本相同,图 5-2-6 上海洪德里二层厢房之窗下栏杆详图亦与之基本相同。三者相符,可知这帧界画相当真实。



据有关资料记载,北京路兴仁里是上海最早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建于1872年,但并无确证,实物亦已拆除,无从考察,暂存疑。可以作为旁证的是,1872年的《申报》广告栏,已时时出现房地产交易的广告,出现地基出租、洋楼出租的广告,这些广告中有“厅式楼房一所,在石库门内,计十幢四厢房,后连平屋五间,坐落石路,”待租等语。^[7](图 5-2-1)

受租界区内建筑商品化环境的影响,早期进入上海租界区的乡绅豪富也开始尝试商品化运作的生财之道。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外商经营的航运、银行、保险、码头行业及工厂中都开始出现华商附股,其中也包括房地产业。“成立于1888年的上海业广地产公司在1891年就由大股东徐兰斋担任公司华股代表。(原书注:汪敬虞《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上)第2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近代上海房地产业号称四大台柱的张、刘、邢、庞四家,都是浙江南浔大地主出身,他们在移居租界后,虽继续从事丝茶生意,但主要投资却在购置房地产。其中刘姓一家在公共租界中心区的福州路、广西路一带买地建屋约占10余条里弄,如会乐里、会香里、洪德里、昭德里等。并自设经租账房,管理出租业务。后来刘氏兄弟分家析产,其

中刘景德一房分得里弄住宅近 700 幢,抗战前其房地租年收入达 5 万多银元。(原书注:《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第 15 页)一些洋行买办则对投资房地产业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早期买办徐润在 1883 年已拥有地产 3000 余亩、房屋数千间,年租金收益近 10 万余元。(原书注:《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第 14 页)步徐润后尘者是早期沙逊洋行买办程谨轩、周莲堂,均以租地造屋致富,1890 年两人已分别自设经租账房,程氏拥有南京路、北京路近西藏路地段里弄住宅数千幢,到本世纪(引者注:指 20 世纪)30 年代,程氏房地产总值近 2000 万元。周氏房产集中分布在福州路、广东路、浙江北路一带,规模宏大。由于在近代上海经营房地产业利润丰厚、且风险较小,吸引众多的工商业主纷纷兼营房地产,在 1918 年后,有颜料大王之称的贝润生转向房地产投资,到 30 年代共拥有各类房屋近千幢,房产面积 16 万平方米以上。此外如虞洽卿、祝大椿、陈炳谦、魏廷荣、朱子尧等也有可观的房产收益。到上海解放前夕,约有华籍房地产大业主 3000 多户,拥有近 6 万幢房产,面积达 1000 万平方米以上。其中个人占有 1 万平方米以上房产的有 160 多户,占有 3 万平方米以上的近 30 户。(原书注:《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第 15、14 页)^[8]

1900 年前后,外商在上海开设的房地产公司如沙逊洋行、业广地产公司、哈同洋行等在租界区内大量兴建石库门里弄民居。稍后,华商房产商如周莲堂、程谨轩、贝润生、严裕棠等也开始经营石库门里弄民居。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就在租界区内及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建造起来,如 1900 年前后建造的中山南路敦仁里、绵阳里、吉祥里。(图 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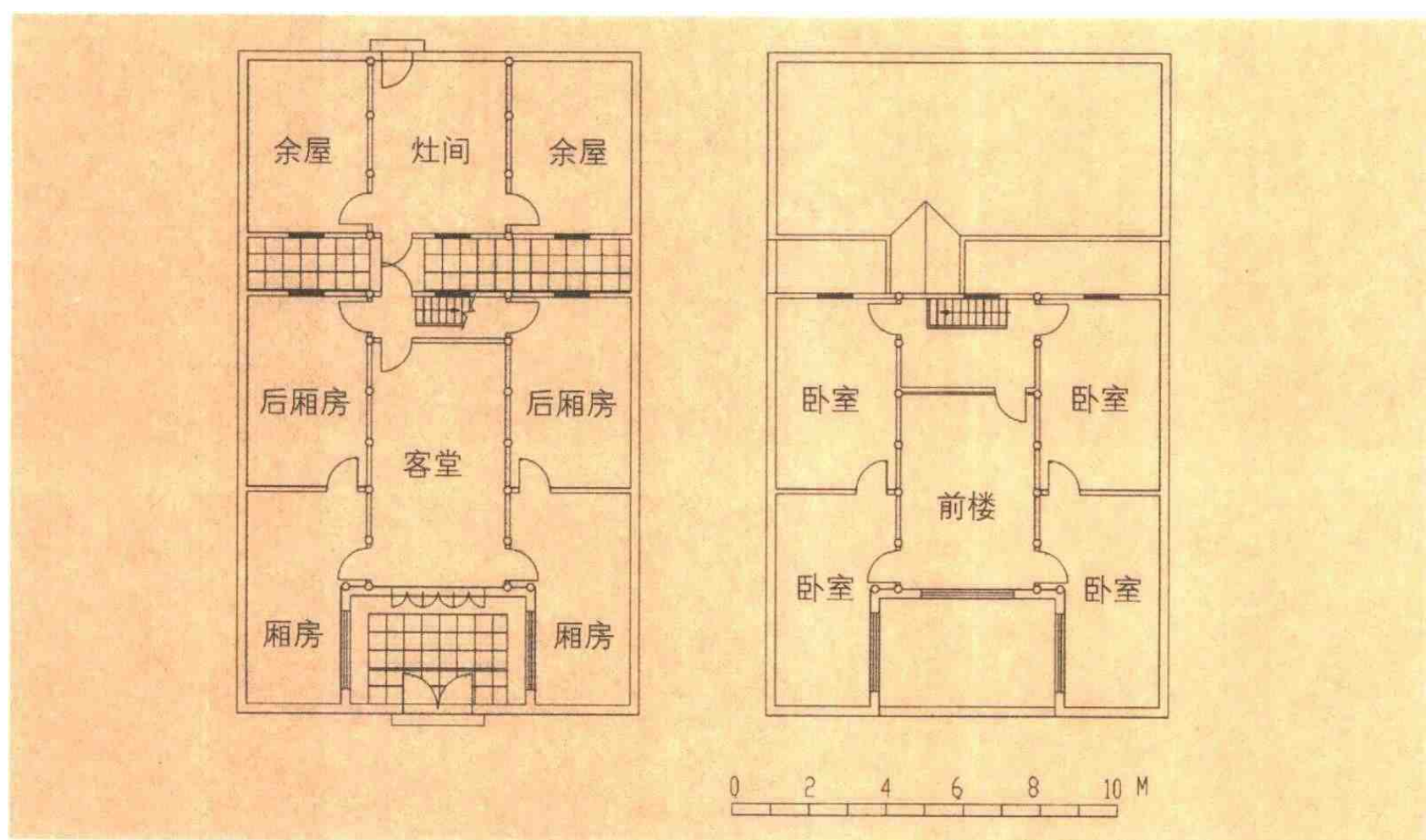


图 5-2-2 上海敦仁里、绵阳里、吉祥里平面图。左图:一层平面图;右图:二层平面图。上海敦仁里、绵阳里、吉祥里建于 1900 年前后,是建造较早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三处里弄连成一片,除绵阳里因地形限制建有少量两间一厢户型外,都是典型的三间两厢户型,石库门围墙很高,对外不开窗,后部次屋是独立的单坡顶平房,顶上不设晒台。(本章之图除注明者外均按童鹤龄先生所赐原稿由施建文绘制电脑图。这些原稿引者甚多,但未注明出处,当为前辈建筑师所绘,本书引用上海六处石库门里弄民居平、立、剖面及大样图,谨在此一并致谢。)

石库门里弄民居的雏形,1853 年开始建造的联排式木板房屋,与 1870 年以后最早建造的一批石库门里弄民居都由英商建造,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影响,采用各户共用山墙、成排建造的建造方式,而结构形式则受当时当地的建筑材料、施工方法与工匠水平的限制,仍为采用中国传统立帖结构的砖木结构。其平面形式与建筑艺术处理手法则是在江南民居建筑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平面形式仍保留传统民居的基本特征:封闭内向,严谨对称,正房厢房围合成天井,高达 5 米左右的石库门围墙使之与外界隔绝,房间对外不开窗,所有门窗都开向自家天井院落。因用地紧张,均建造二层楼房,传统民居的院落已缩小成为天井,山墙仍沿用江南民居常用的马头山墙,建筑细部处理及室内装修亦一如旧制,最典型的是每户必用的入户门——中国传统建筑的石库门。随着这种

民居的大量建造,石库门已成为上海人人皆知的名词,此类民居亦因之得名,称为石库门房子,即本书所称之石库门里弄民居。

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多为三间两厢户型——三开间、两侧都有厢房,也有少量业主自用的特殊户型,如上海兆福里的五开间户型,及上海洪德里那样规模更大的户型。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特征除户型多为三间两厢外,还有这么几条:主屋后部的次屋都是单层,顶上作晒台,还没有出现次屋上面的亭子间;建筑外观比较简朴,黑色蝴蝶瓦屋面,黑色石库门,白粉墙,色调素雅,对比鲜明,颇具江南民居风韵;石库门围墙很高,约达五米以上,后部次屋虽然只有一层,但屋顶向内倾斜,后墙也与石库门围墙一样高,外观封闭。建筑装修则仍维持江南民居特色。(图 5-2-3,图 5-2-4,图 5-2-5)

图 5-2-3 上海兆福里一层平面图。兆福里是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中较特殊的实例,除三间两厢户型外,还建有五开间户型,天井增大,房间很多,是适应较富裕的居住者需要的户型,传统四合院住宅的气氛也更浓郁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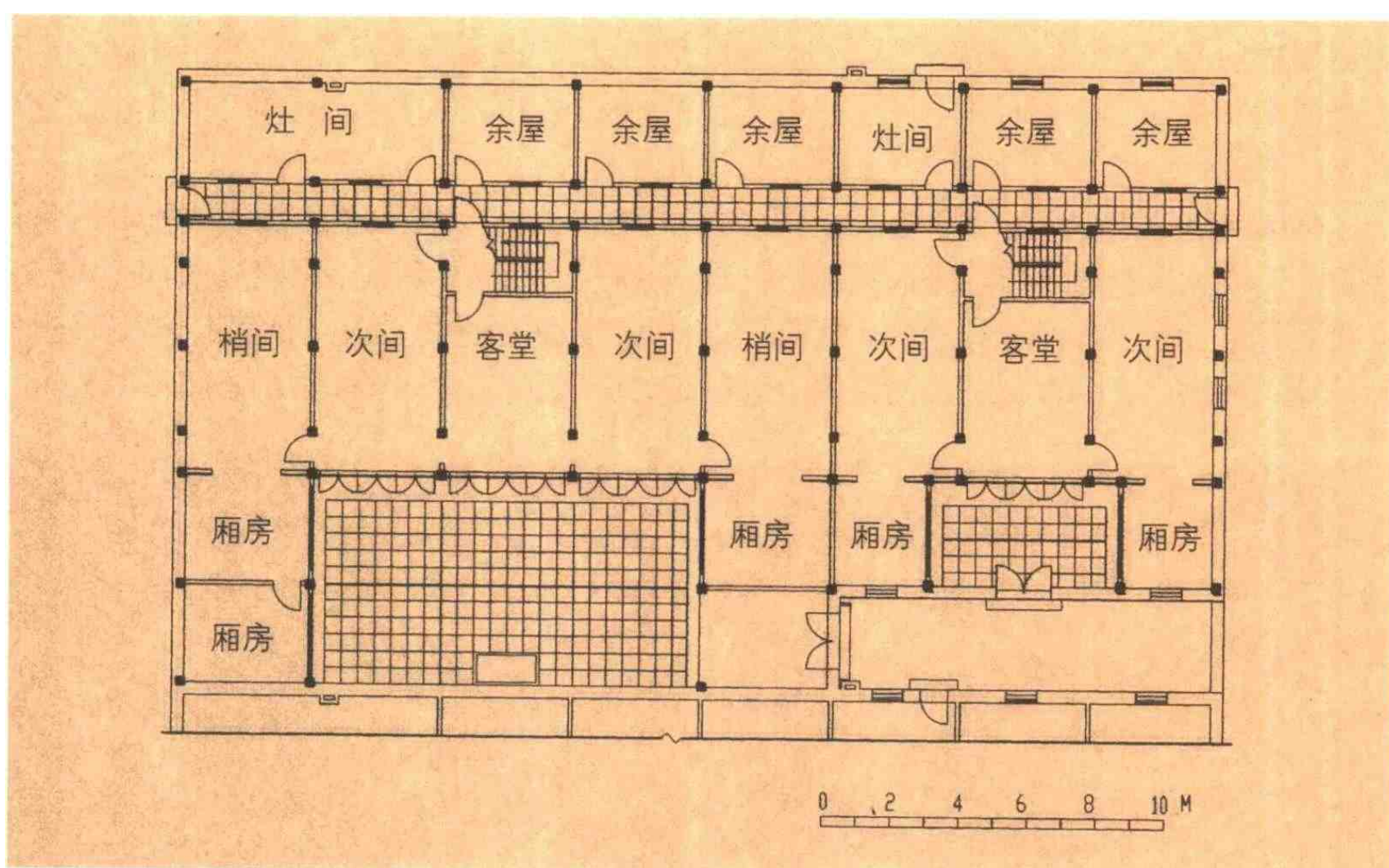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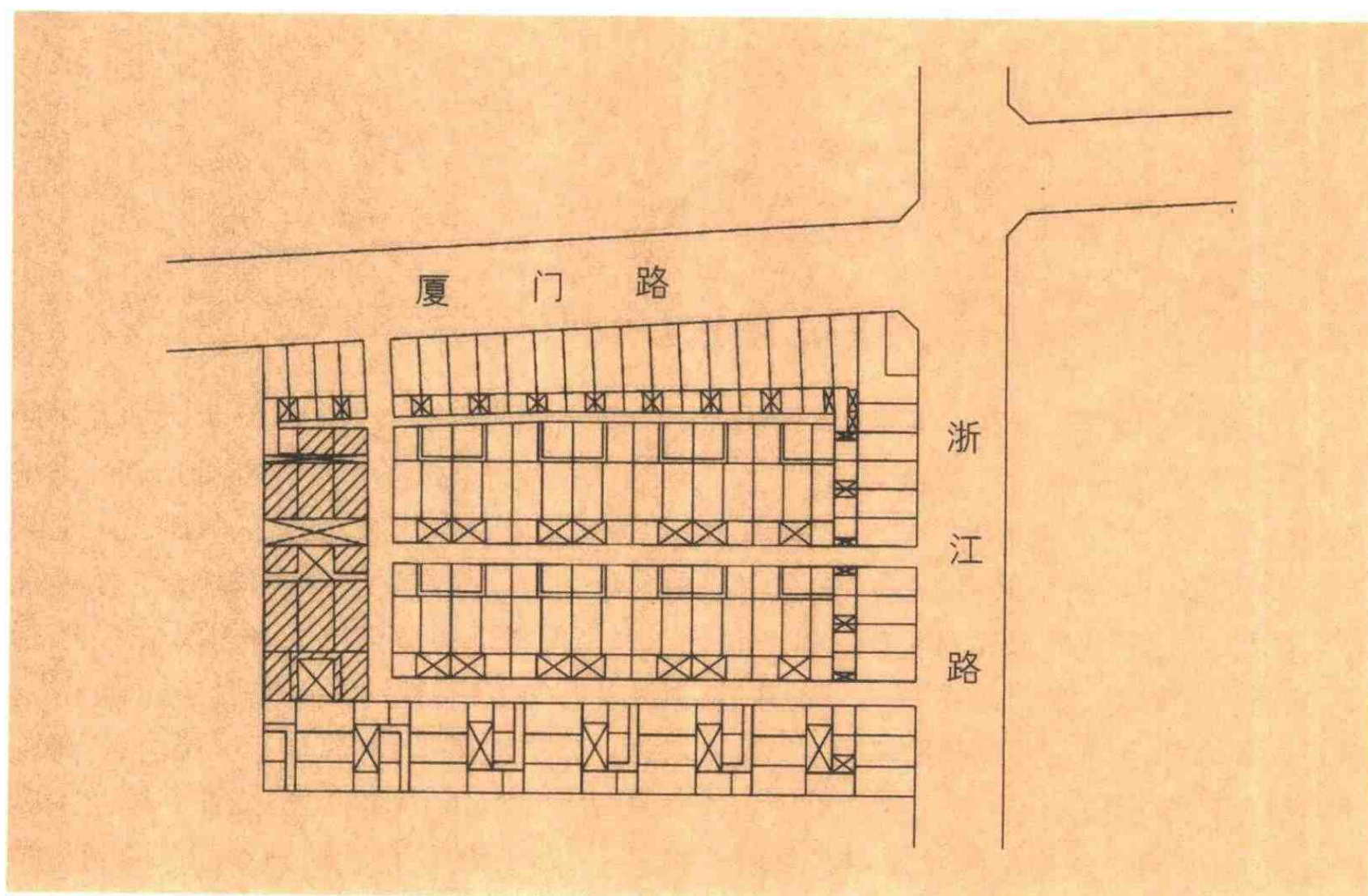


图 5-2-4 上海洪德里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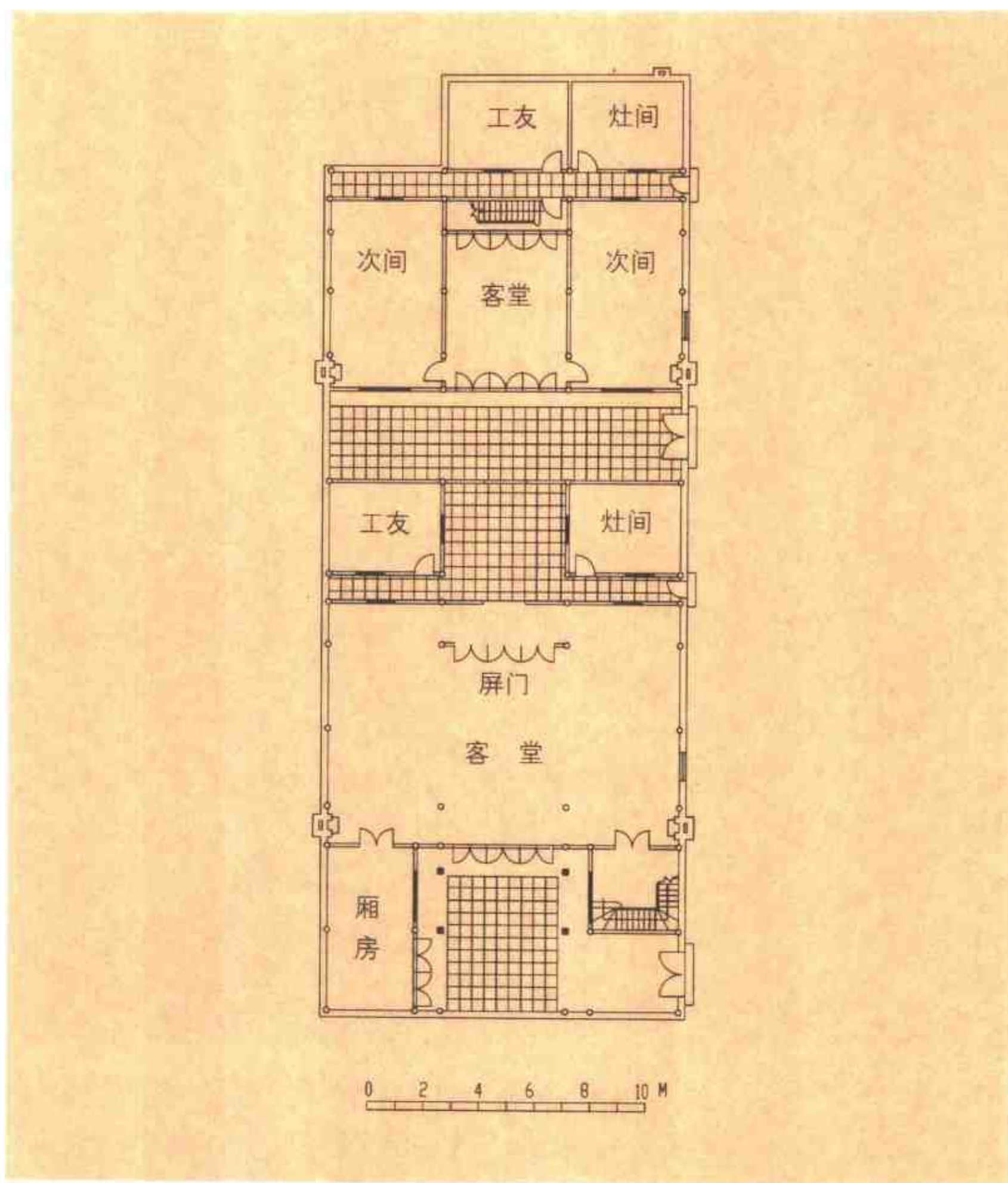


图 5-2-5 上海洪德里弄内的一户三开间两进石库门里弄民居一层平面图。这是早期建造的更为特殊的户型，估计是业主为自住而建，依稀可见多进四合院住宅的建筑格局。

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结构形式都取传统的立帖结构，由木柱、倭筒及小梁构成，屋面荷载由倭筒传至小梁，小梁传至立柱，楼面荷载则由直接架在木柱上的木梁传给木柱，这就构成民间所谓“墙倒屋不塌”的木结构体系，由于除山墙以外的墙都不承重，只起间隔作用，所以能做到“墙倒屋不塌”。也就是说，石库门里弄民居的隔断墙可以随意移动或取消，这对使用者来讲是极方便极实用的。正因如此，客堂面向天井的一侧就全部做成落地长窗，既是门，又是窗。夏天卸去，客堂与天井连成一体，又宽敞又风凉；家中来客多了，也可将落地长窗卸去，天井加客堂就形成一个大客堂，实在是方便实用。（图 5-2-6，图 5-2-7）落地长窗一般六扇或八扇并列，上下做木槛，用木摇梗启闭，上半截做格子窗，下半截镶条环板，落地到槛，做工精细，花心及腰华板的花饰仍为中国传统建筑花饰。二层客堂与厢房窗下作木栏杆与木裙板，木栏杆也采用传统建筑花饰，做工精巧。木栏杆内衬以木裙板，夏日卸去木裙板，有利于室内通风，这也是适应上海、汉口炎热气候条件的建筑做法。这些传统的木装修给石库门里弄民居增添了几分典雅，几分古朴。在一些比较讲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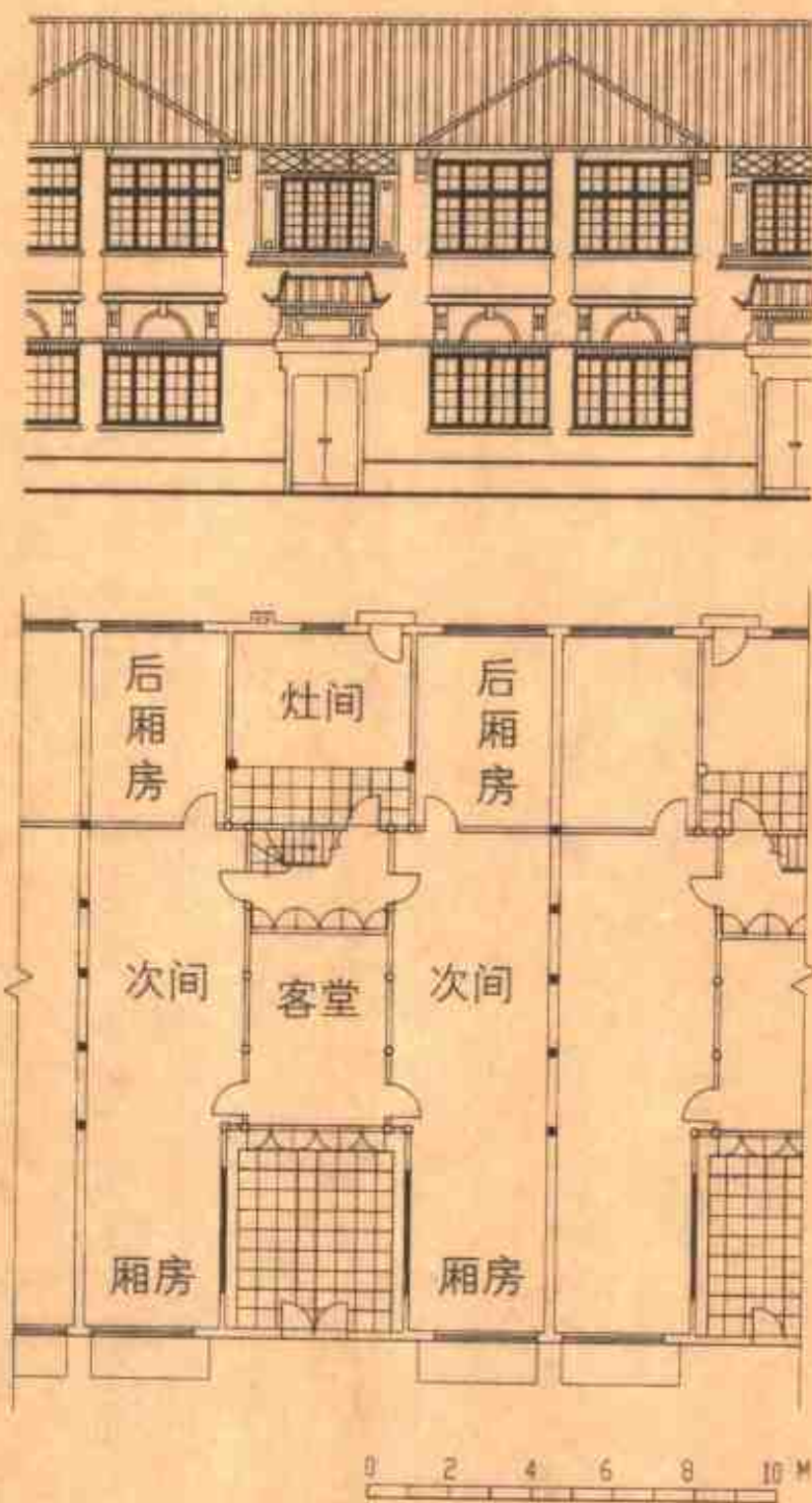


图 5-2-6 上海老会乐里立面、平面图。上图：正立面图；下图：一层平面图。老会乐里建于 1916 年，是较典型的三间两厢石库门里弄民居，前后厢房都已沿街开窗，前厢房二层还设有阳台，西方建筑的影响已逐渐渗透到石库门里弄民居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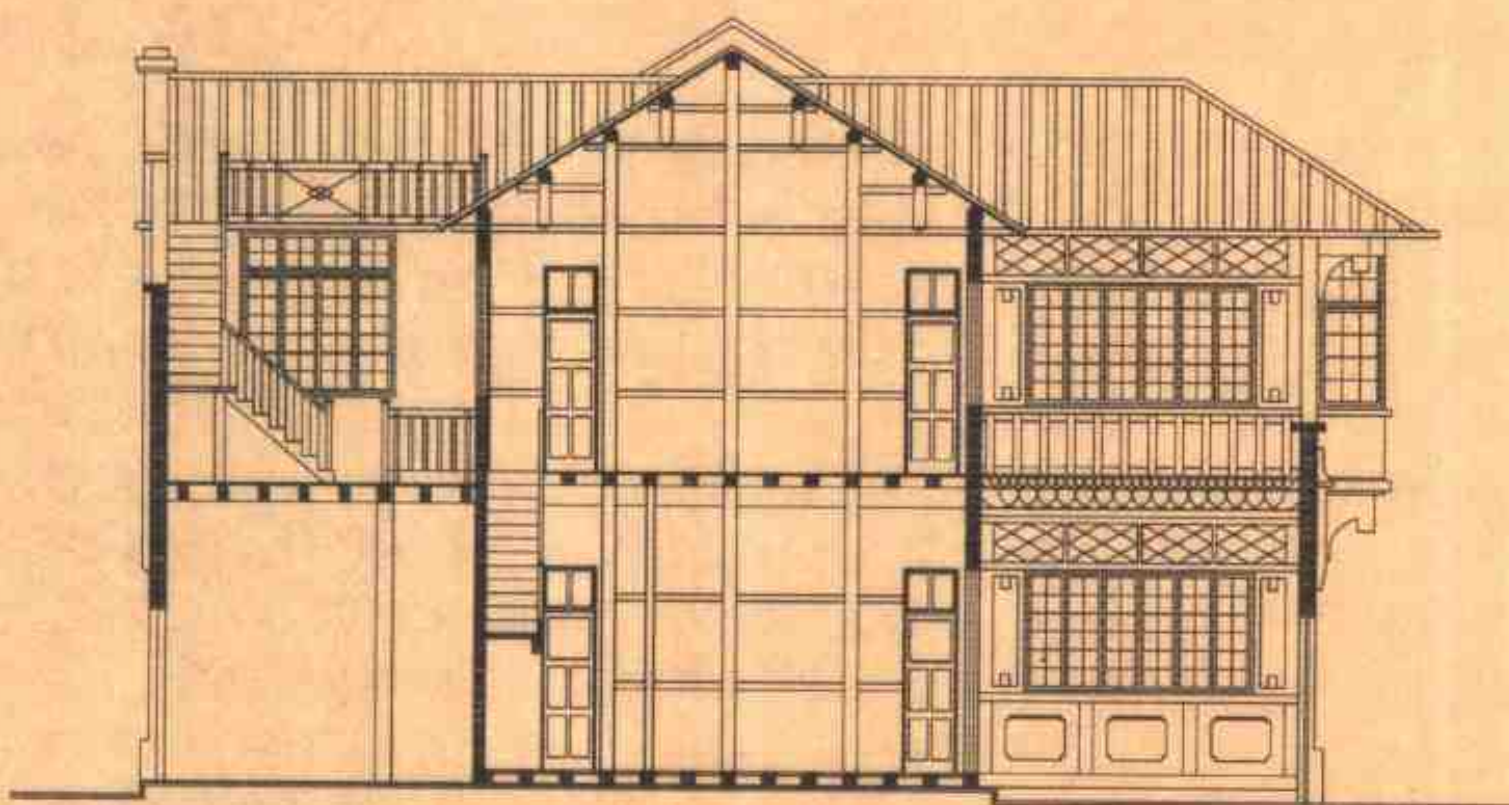


图 5-2-7 上海老会乐里剖面图。采用传统民居习用的立帖结构，后部单层厨房顶设木楼梯，通往后部厢房顶上的晒台，使用颇为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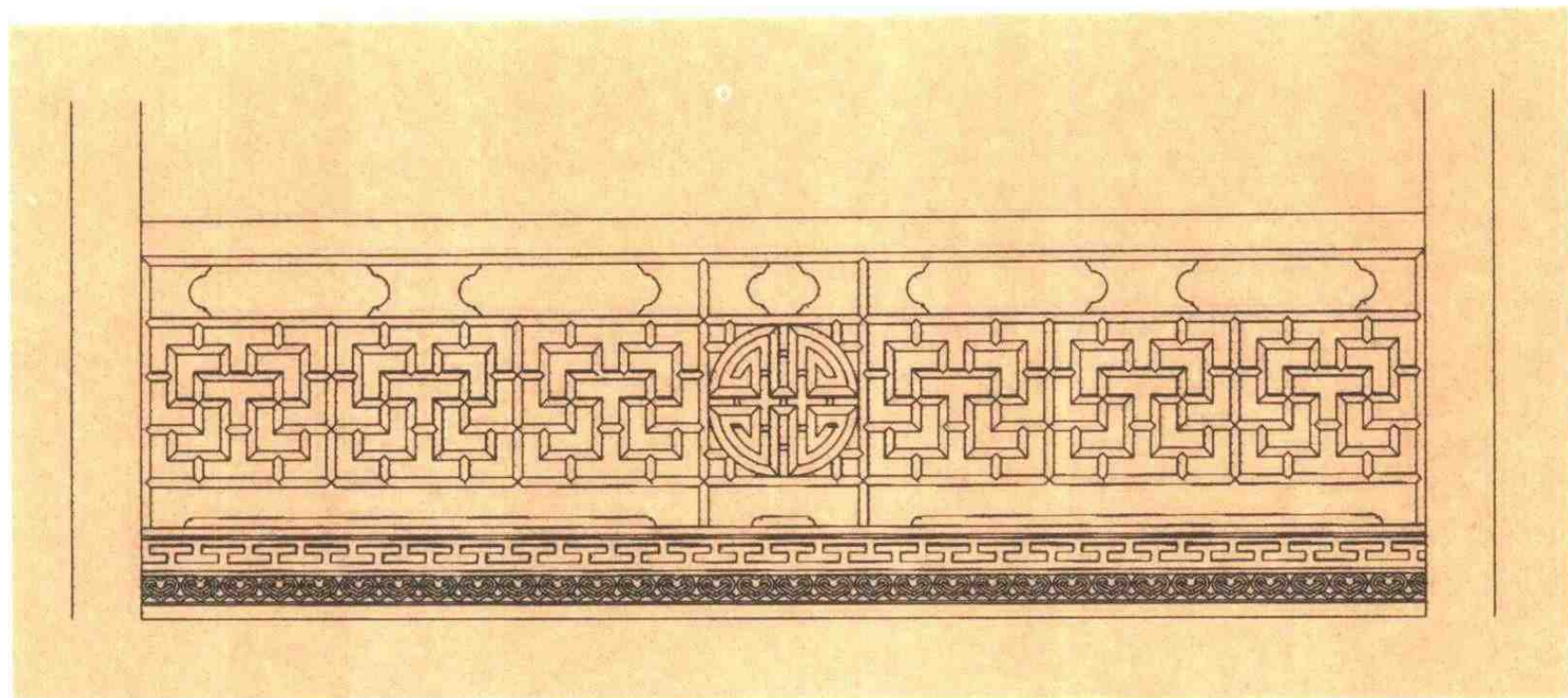


图 5-2-8 上海洪德里二层厢房木窗下栏杆详图。

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中，室内还采用了传统民居建筑的飞罩分隔空间，隔而不断，装修也很典雅。遗憾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尚存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中，作者没有找到使用飞罩的实例。（图 5-2-8，图 5-2-9）

辛亥革命后，在 1912 年至 1920 年这段时间里，上海城市扩展、人口剧增，对住宅的需求量大增。其时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大批建造，建造数量很大，分布范围极广。在法租界范围内，向西扩展到今重庆南路一带；在公共租界范围内，在苏州河以南扩展到今万航渡路静安寺一带，在苏州河以北则扩展到今西藏北路与杨树浦港之间，北至沪宁铁路虹口公园的广大地区。

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以单开间户型居多，三间两厢与两间一厢户型减少，如上海宝康里。这是因为城市扩展，石库门里弄民居

的居住者已由富裕人家扩展到中产阶级家庭，居住者经济收入并不十分宽裕，量入为出，居住条件要求降低，首先是减少面积，然后是简化装修。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已少用石料而改用水刷石装修，屋面蝴蝶瓦改用机制平瓦或上窑平瓦。石库门门头装饰已少用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多模仿西方古典建筑纹样或简化为几何体块，石库门围墙高度降低，大致降至二层窗台高度。后部次屋之上加建二层，除晒台外还有亭子间。1920 年以后，为节约用地，还建造了少量三层户型石库门里弄民居，如上海四明邨（1928）、梅兰坊（1930）。（图 5-2-10，5-2-11，5-2-12）

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每户建筑面积显著减少，约为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四分之一。而里弄规模则大大扩张。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中规模较大者如兴仁里共有三间两厢户型 30 户，又有单开间沿街店铺户型 27 户；而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中规模最大的是斯文里，1914 年开始建造，1921 年竣工，占地 3.21 公顷，各类户型住宅共达 664 户，其规模已远非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可比。这当然是城市人口剧增，用地紧张，地价飞涨的必然结果。（图 5-2-13）



图 5-2-9 上海公顺里二层厢房木窗及窗下栏杆，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花饰纹样，精致的木栏杆体现了江南民居素雅的装修风格。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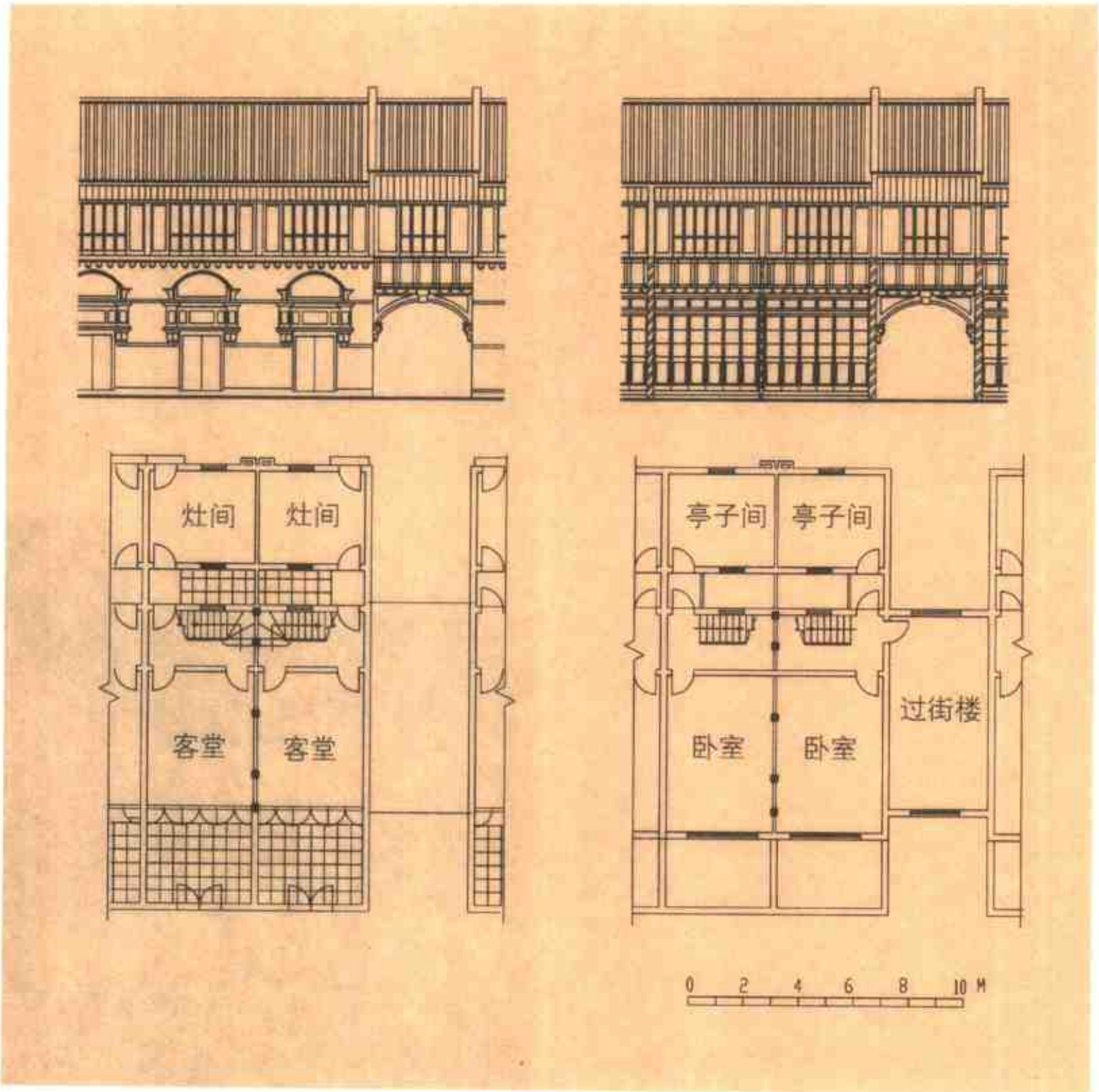


图 5-2-10 上海宝康里立面、平面图。上左图：正立面图；上右图：天井内正立面图；下左图：一层平面图；下右图：二层平面图。宝康里是单开间石库门里弄民居，每开间一个石库门，韵律感很强，也很有特色。

图 5-2-11 上海宝康里外景。石库门围墙已经降低到窗台高度，石库门则已采用西化的装饰。宝康里现已拆除改建地铁车站，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



1920年以后,上海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建造渐少,以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为蓝本的新式里弄住宅建造渐多。进入20世纪30年代,石库门里弄民居就完全被新式里弄住宅所取代。

石库门里弄民居,武汉俗称里分住宅,或里份住宅。在武汉开始建造的时间较晚,集中建造在汉口一地。武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系由来汉的上海房地产商首先经营,开始完全是照搬上海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于1905年前后开始建造,以后相沿成习,在汉口租界区与旧城区内大批建造。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武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建造渐少,与上海一样,也逐渐改建新式里弄住宅。

1895年以后逐渐形成汉口的英、俄、法、



图 5-2-12 上海四明邨。四明邨是后期建造的三层户型石库门里弄民居,照片由作者摄于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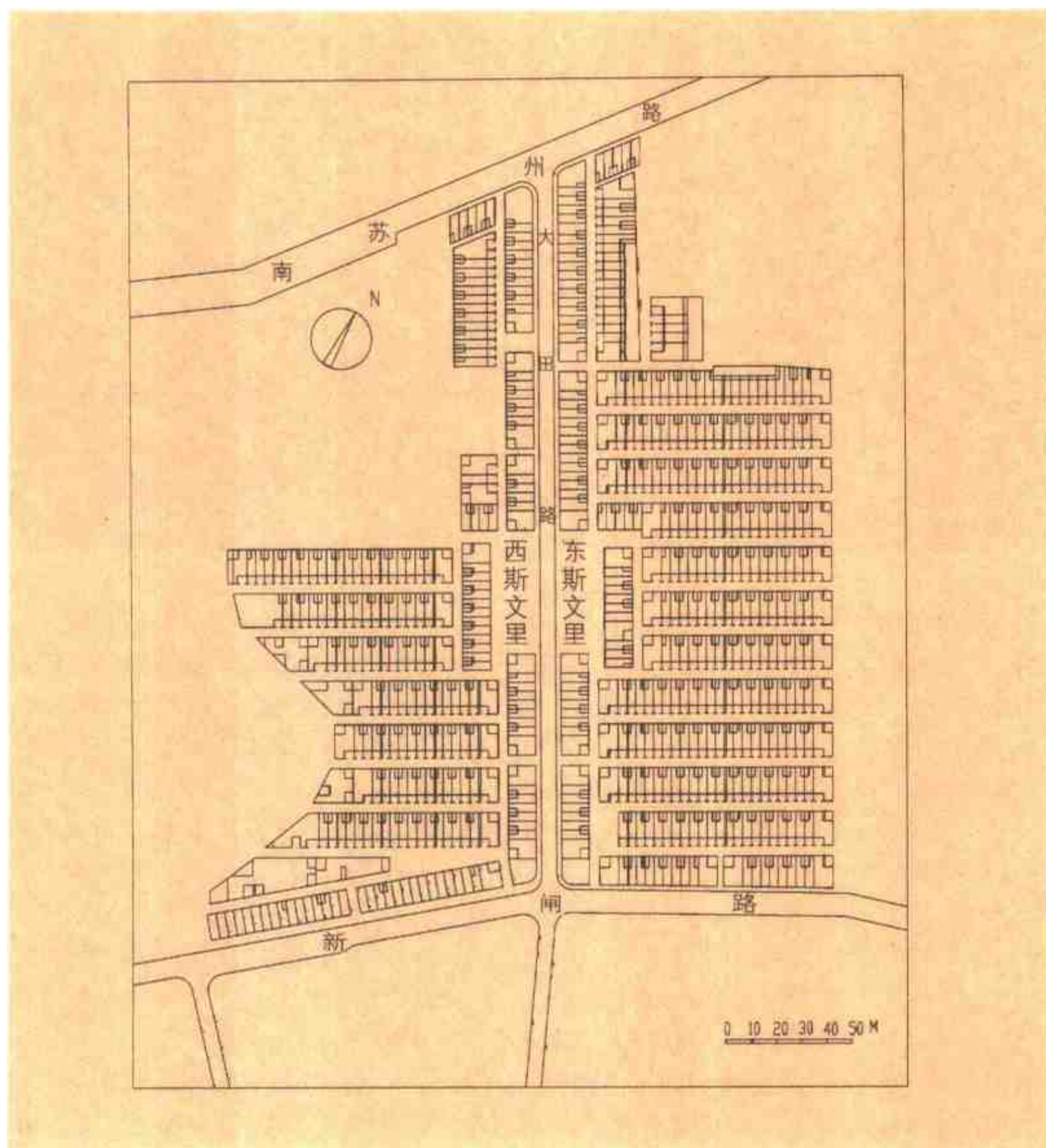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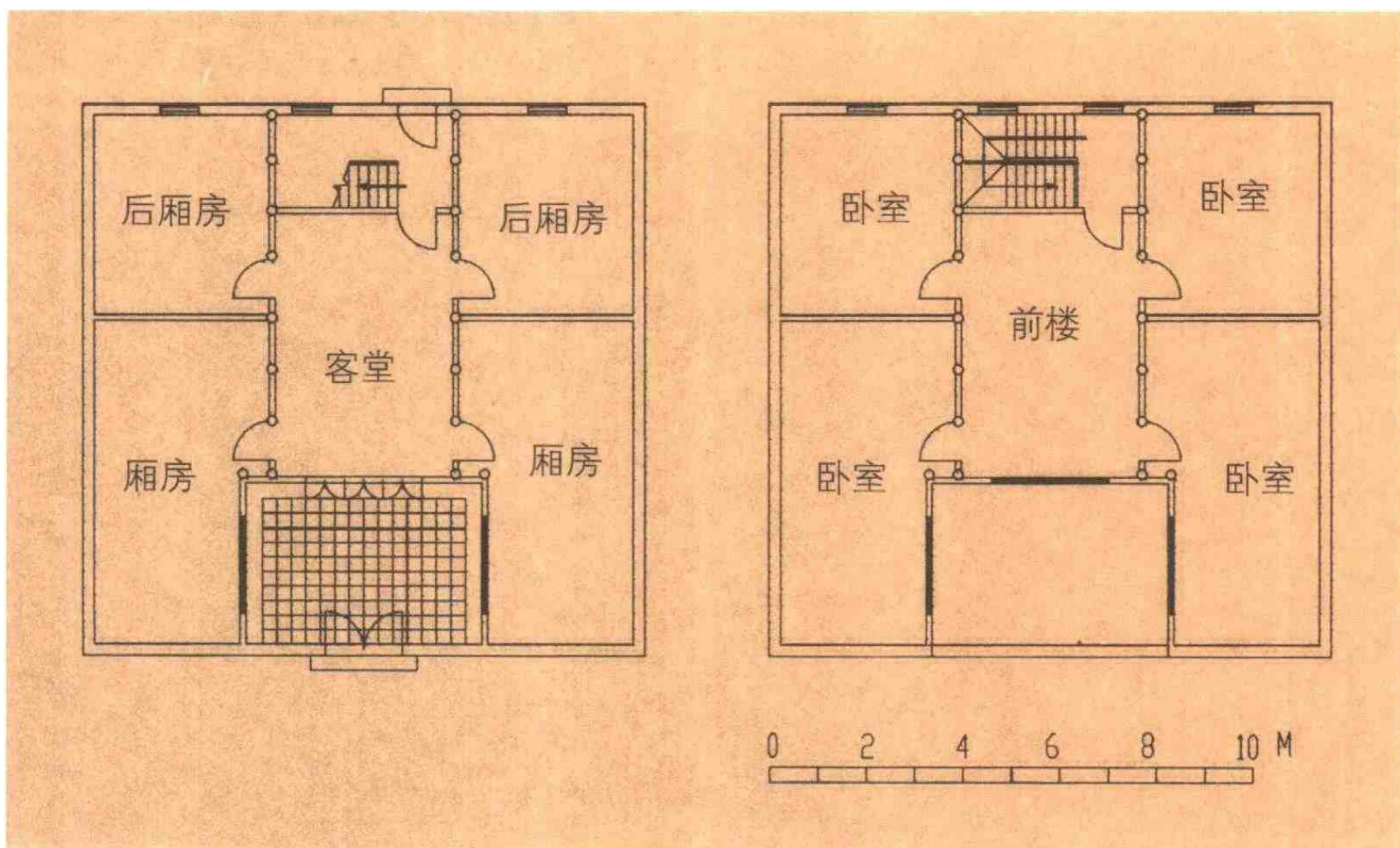


图 5-2-13 上海斯文里总平面图。斯文里位于苏州河畔,南苏州路与新闸路之间,大田路两侧,占地3.21公顷,建有石库门里弄民居664户(包括沿街店铺),是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石库门里弄。斯文里以大田路为界,东侧一半称东斯文里,西侧一半称西斯文里。

德、日五国租界,面积与汉口旧城区大致相等。汉口租界区沿长江展开,五国租界连成一片,背靠京汉铁路,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可谓得天独厚。1900年以后,租界区内建筑活动兴盛,租界区逐渐繁荣。与此同时,清末洋务派领袖人物之一的张之洞在武汉举办新政,在张任湖广总督的1889至1907年间先后修建铁路、堤防,开办工厂。其后,1908年汉口拆除旧城区城墙修建马路,加快了旧城区的发展。于是,自硃口至江汉路一带的旧城区也逐渐发展起来。汉口城市的迅速发展引起上海房地产商的注意,鉴于上海开辟租界后市区迅速发展,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经验,他们认为尽早在汉口经营房地产业有大利可图,于是纷纷来汉购地建房。最早来汉的刘貽德、蒋广昌、胡庆余堂,及曾任上海道的袁树勋等在火车站附近的法租界购买地皮建造了汉口的第一批石库门里弄民居,如1902年至1905年间建造的长清里,1905年建造的海寿里等。这是汉口石库门里弄民居的起源,上海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由上海的房地产商搬到了汉口,并且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在汉口大批建造。(图5-2-14,5-2-15,5-2-16,5-2-17,5-2-18)

图5-2-14 武汉长清里平面图。左图:一层平面图;右图:二层平面图。长清里于1902至1905年间陆续建造,是上海房产商在汉口最早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之一。长清里的三间两厢户型与上海敦仁里、棉阳里、吉祥里及天津永安里相同,都属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唯后部的平房次屋作者调查时已无存,当为维修时拆除。长清里现已全部拆除,平面图由作者于1980年测绘。



1911年辛亥革命,武汉是首义之区。冯国璋占据汉口与民军隔江对峙,纵兵放火焚烧汉口旧城区,但是完全不敢触动租界。1911年大火之后,旧城区元气大伤,繁华的商业区集中到租界区,主要是今江汉路英租界一带。早期来汉的上海房地产商鉴于辛亥大火,认为只有投资租界区房地产才有保障,他们在1911年至1917年间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多集中在租界区内及紧邻租界区的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武汉也是如此,汉口的房地产商纷纷投资购地,经营石库门里弄民居,汉口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建造进入高潮期。此时,租界区内自江汉路至三阳路一带已为捷足者先占,房屋林立,空地很少。而日租界一带则远离闹市,难于发展。于是,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建造范围逐渐扩展到租界区与铁道之间的地区及江汉路以南的前后花楼一带,先后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有永贵里、生成南北里等。1917年,汉口华商总会发起开辟“模范区”的营建活动,在今中山大道至铁道,保成路至大智路之间集中购买地皮建造房屋,先后建造了辅义里、东山里等一批石库门里弄民居。1923年,又有武汉的军阀势力集团,即当时所谓“将军团”与工商界组成“济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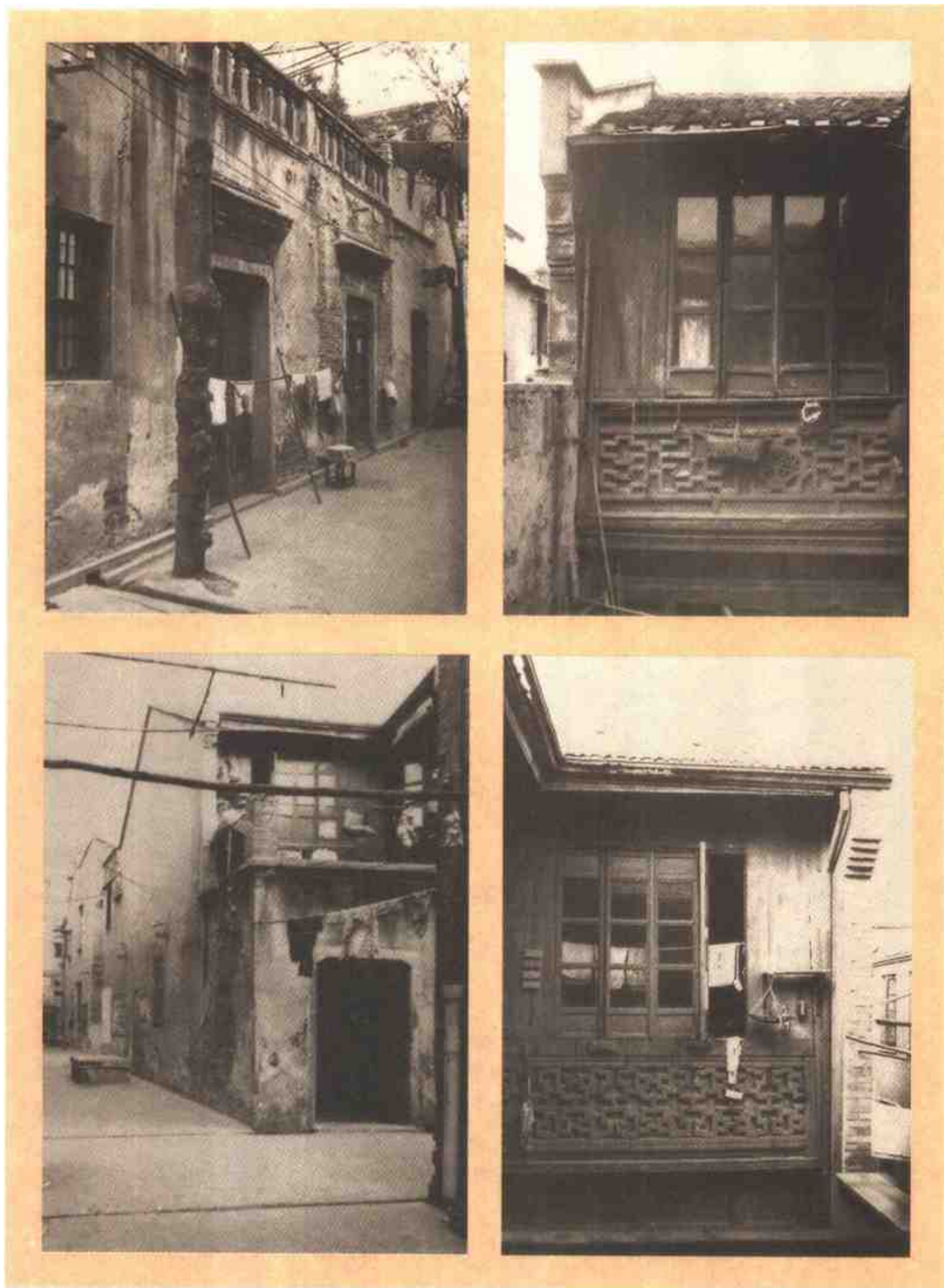


图 5-2-15 武汉长清里 33 号、34 号。长清里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石库门围墙很高，约 5 米左右。1980 年作者调查测绘时，石库门与石库门围墙仍保持着原始的面貌。石库门围墙上部作西式宝瓶栏杆装饰，其余部分则仍依旧制，体现出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初始阶段中西交融的建筑风貌。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左）

图 5-2-16 武汉长清里 33 号二层厢房木窗及窗下栏杆。武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源于上海，长清里就是由上海的房地产商按上海模式建造的，试将长清里与上海公顺里二层厢房木窗及窗下栏杆的木装修作一比较，实如一如同胞。这当然不是偶合，而是石库门里弄民居发展史的见证。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右）

图 5-2-17 1905 年建造的武汉海寿里 与武汉长清里一样，也是上海房产商在汉口最早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之一。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左）

图 5-2-18 武汉海寿里二层厢房木窗及窗下栏杆。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右）

产公司”，低价购进今中山大道至铁道，友谊路至前进一路之间的地皮，以后分片转卖，在 1923 年至 1926 年间建造了一批石库门里弄民居，如大陆里、富源里等。这段时间内，外商在汉口也建造了一些石库门里弄民居，但数量很少，都建造在租界区内，如首善里。（图 5-2-19, 5-2-20）

1926 年，湖北官钱局倒闭，发行的铜元票成为废纸，武汉工商界受到沉重打击。加之 1927 年前后武汉地区战事频繁，投资建房者极少，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建造亦大幅减少乃至终止。

图 5-2-19 武汉辅义里三间两厢户型平面图。左图：一层平面图；右图：二层平面图。辅义里建造地点在汉口当年的“模范区”内，位于黄石路一侧，弄内建有三间两厢、两间一厢与单开间户型，后部次屋二层，顶上是晒台。平面图由作者于 1980 年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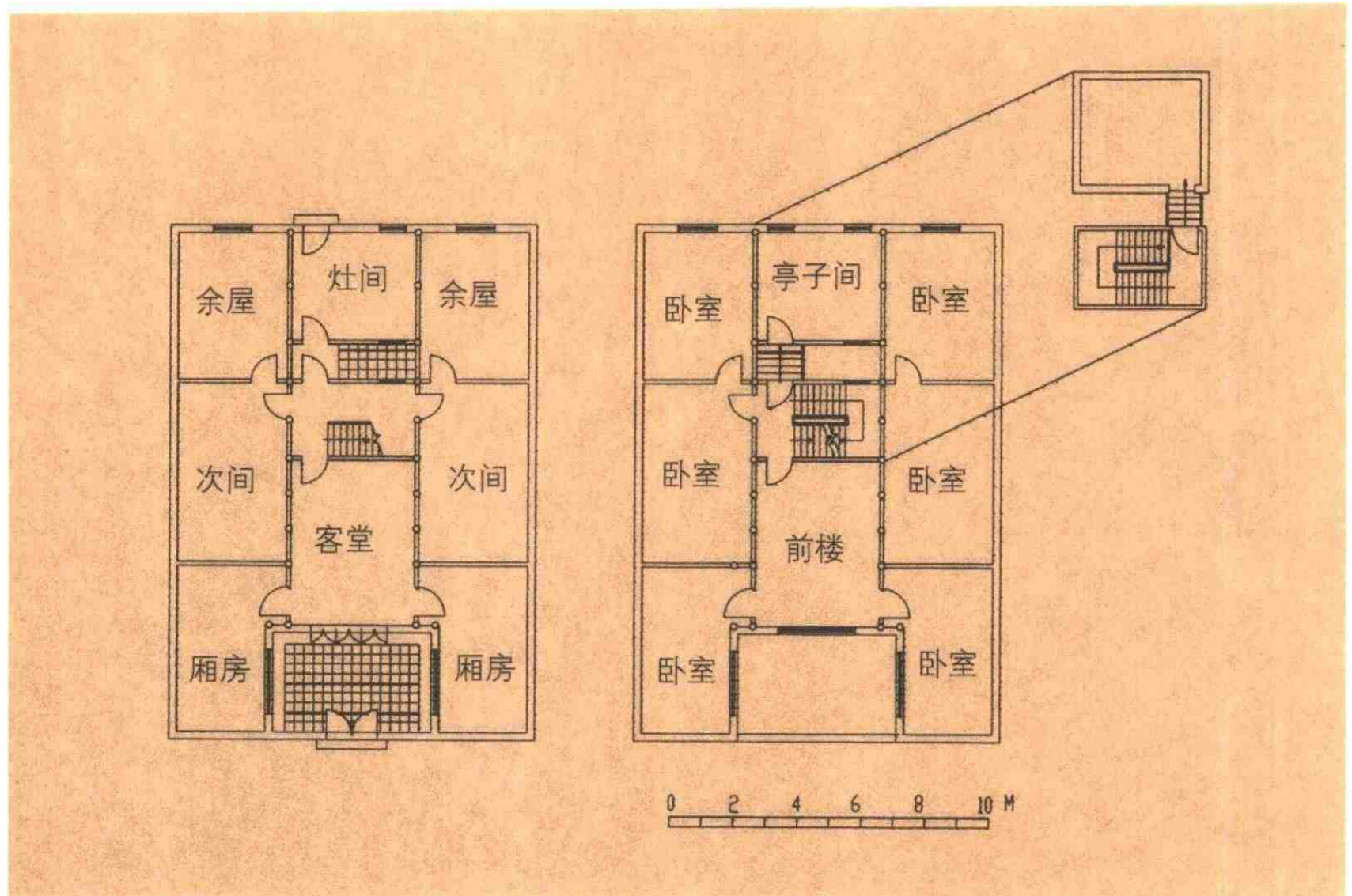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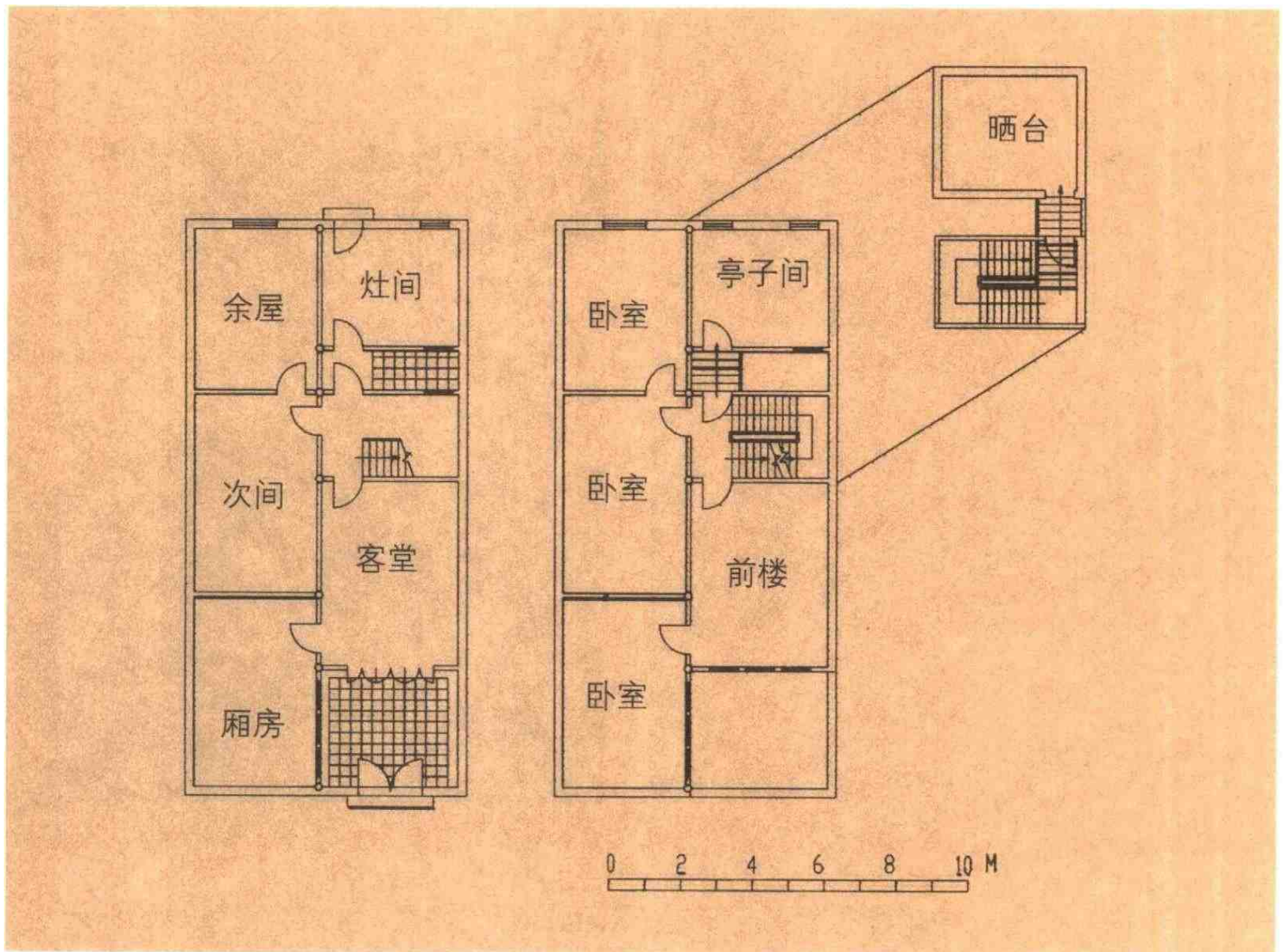


图 5-2-20 武汉辅义里两间一厢户型平面图。左图：一层平面图；右图：二层平面图。平面图由作者于 1980 年测绘。



1901 年至 1907 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在天津举办新政，兴办公共事业，开展市政建设，主要的经营对象是天津旧城东北的河北新区。举办新政期间建造的工厂、学堂、劝工所等多建在河北新区范围内，此外还建造了一些衙署、会所及官员私宅。辛亥革命后，天津市政府设在河北新区，又因铁路运输发展，居住在这一带的政府机关职员及铁路职工人数逐渐增多。此时河北新区的地价较之租界区要低得多，清末民初下野的

军政要人有许多在天津投资房地产,河北新区成为他们的投资热点,于是短时期内在河北新区建造了许多院落式里弄住宅。如曾任江西都督与江苏督军的李纯开办的东兴房产公司,在河北新区建有东兴里,曾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冯国璋建有择仁里,都是规模较大的院落式里弄住宅。院落式里弄住宅是在北方传统四合院住宅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住宅类型,由若干平房三合院或四合院并联建造而成,造价较低,也比较简陋。在天津主要建造在河北新区,后期在旧城区及租界区内也零星建有一些小规模院落式里弄住宅,如紫阳里。(图 5-2-21,5-2-22,图 5-2-23,5-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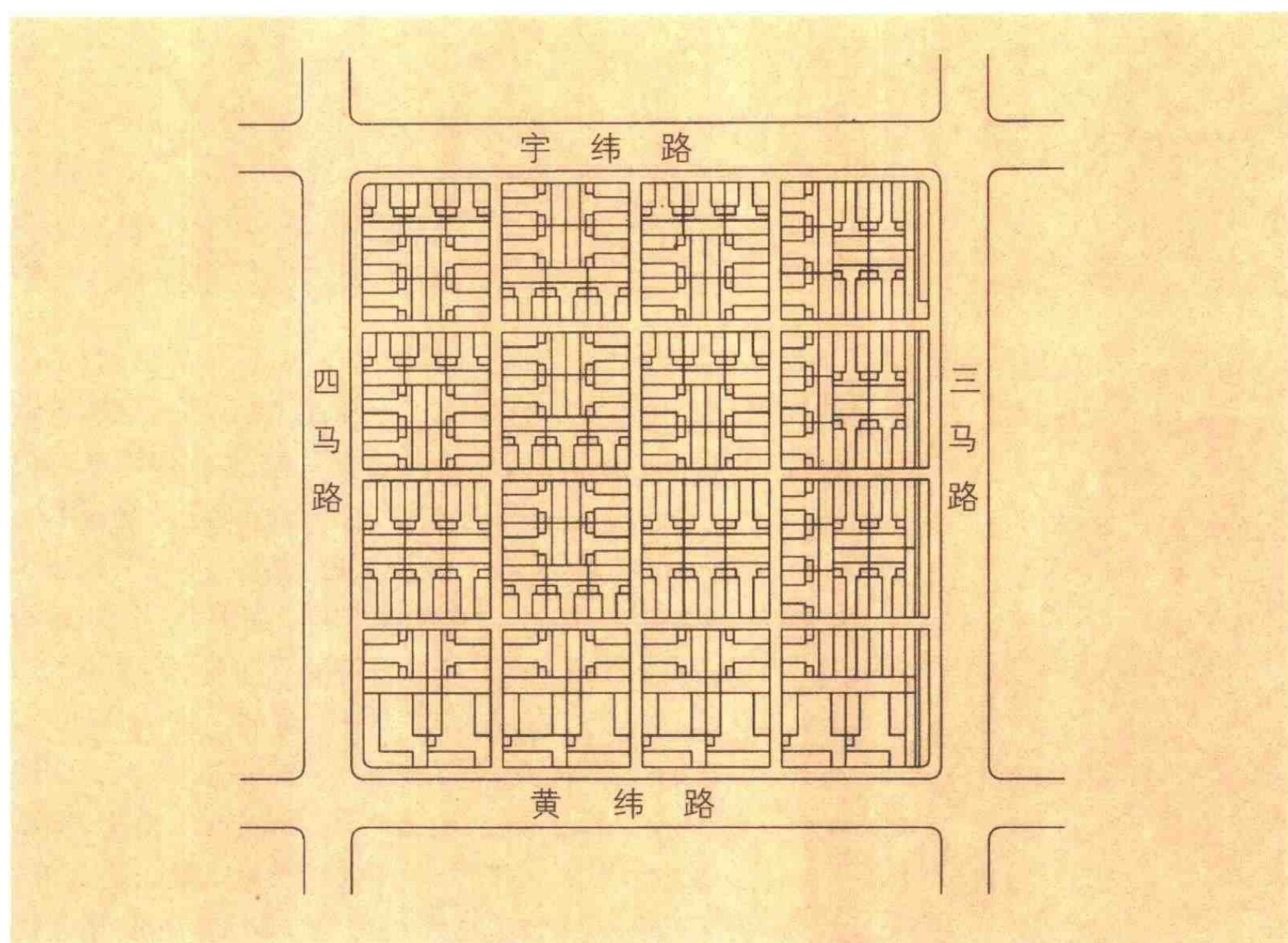


图 5-2-21 天津东兴里总平面图。根据天津市里弄住宅调查资料重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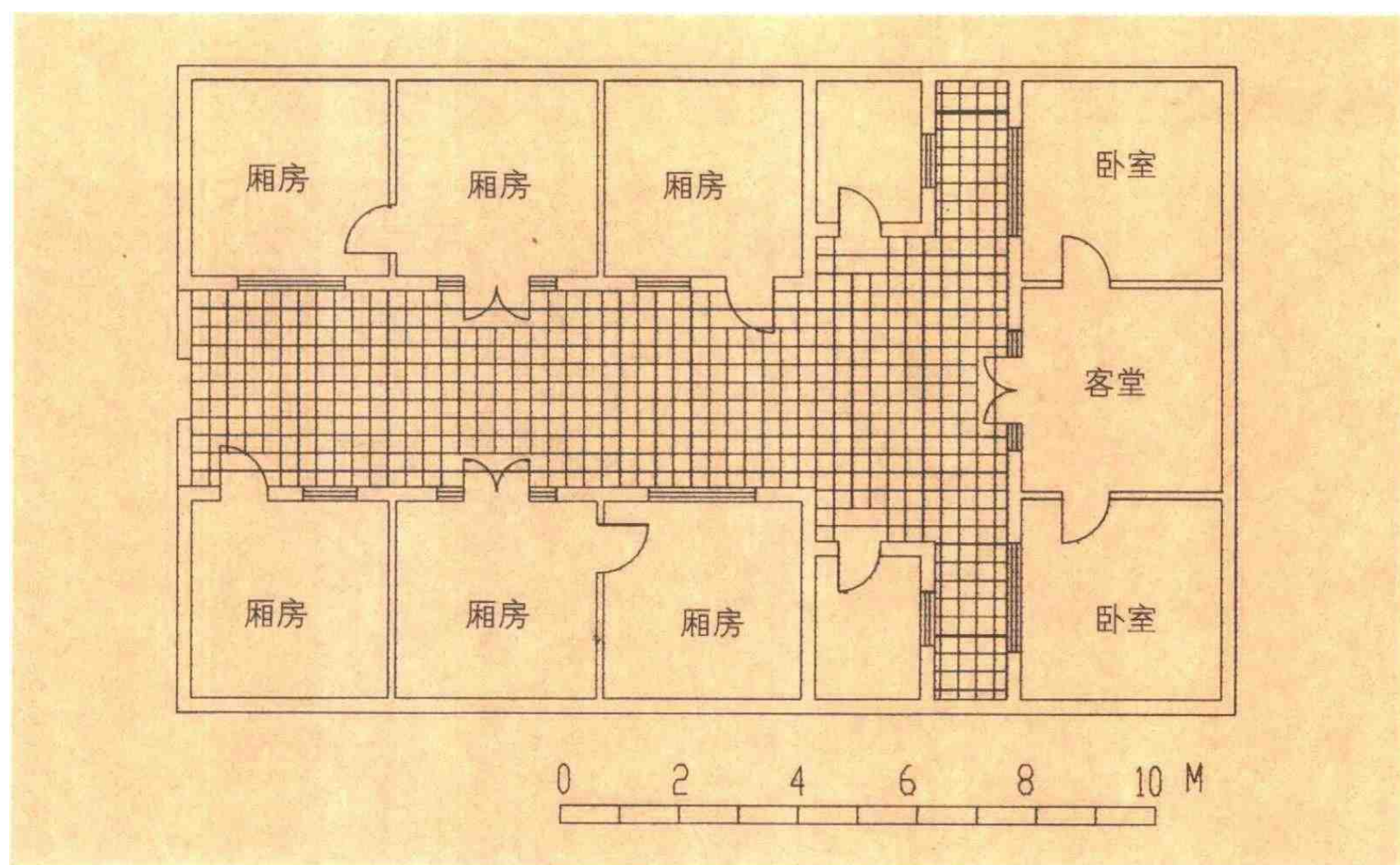


图 5-2-22 天津东兴里平面图。根据天津市里弄住宅调查资料重绘。

图 5-2-23 天津紫阳里平面图，由作者于 1981 年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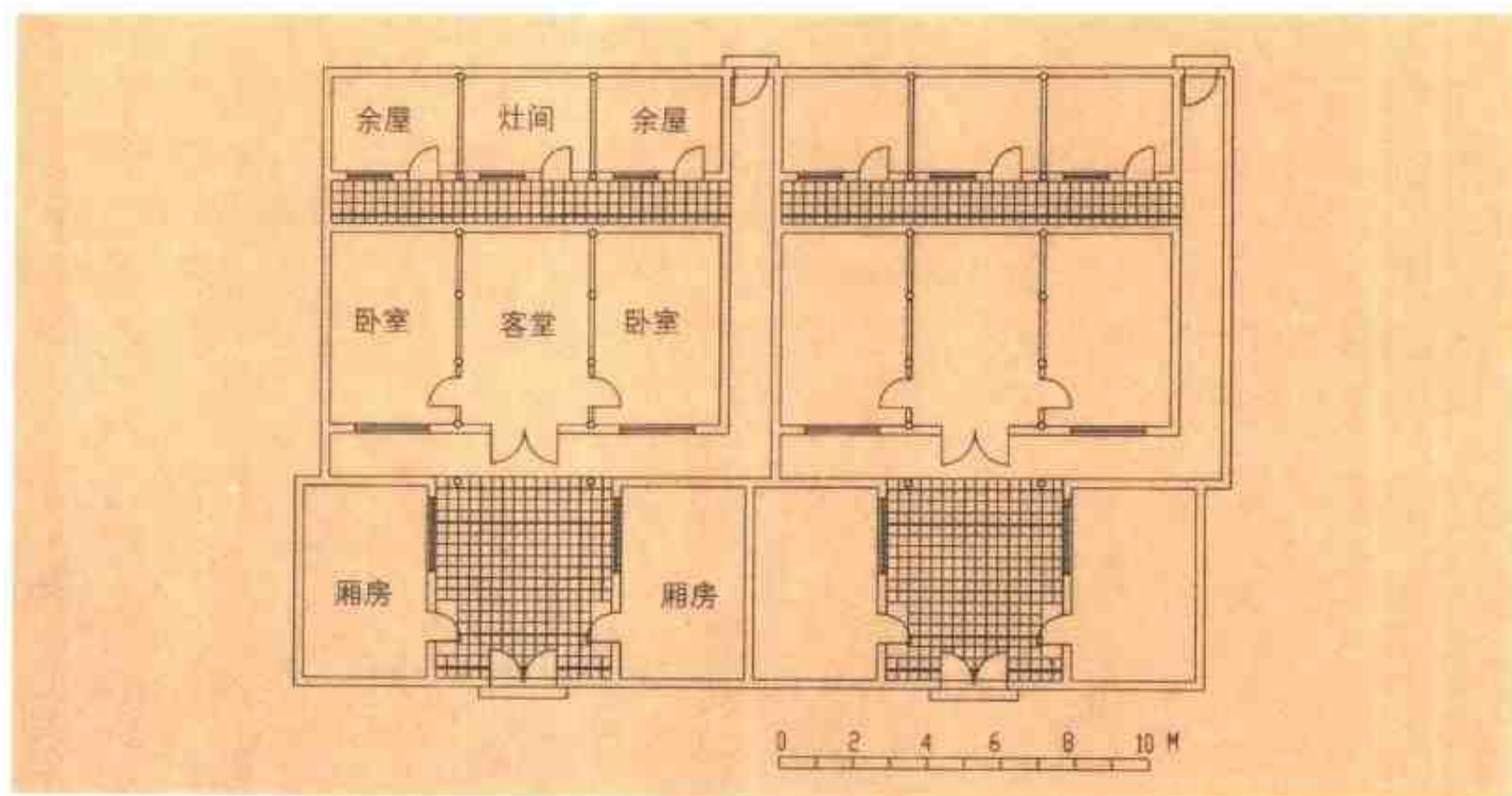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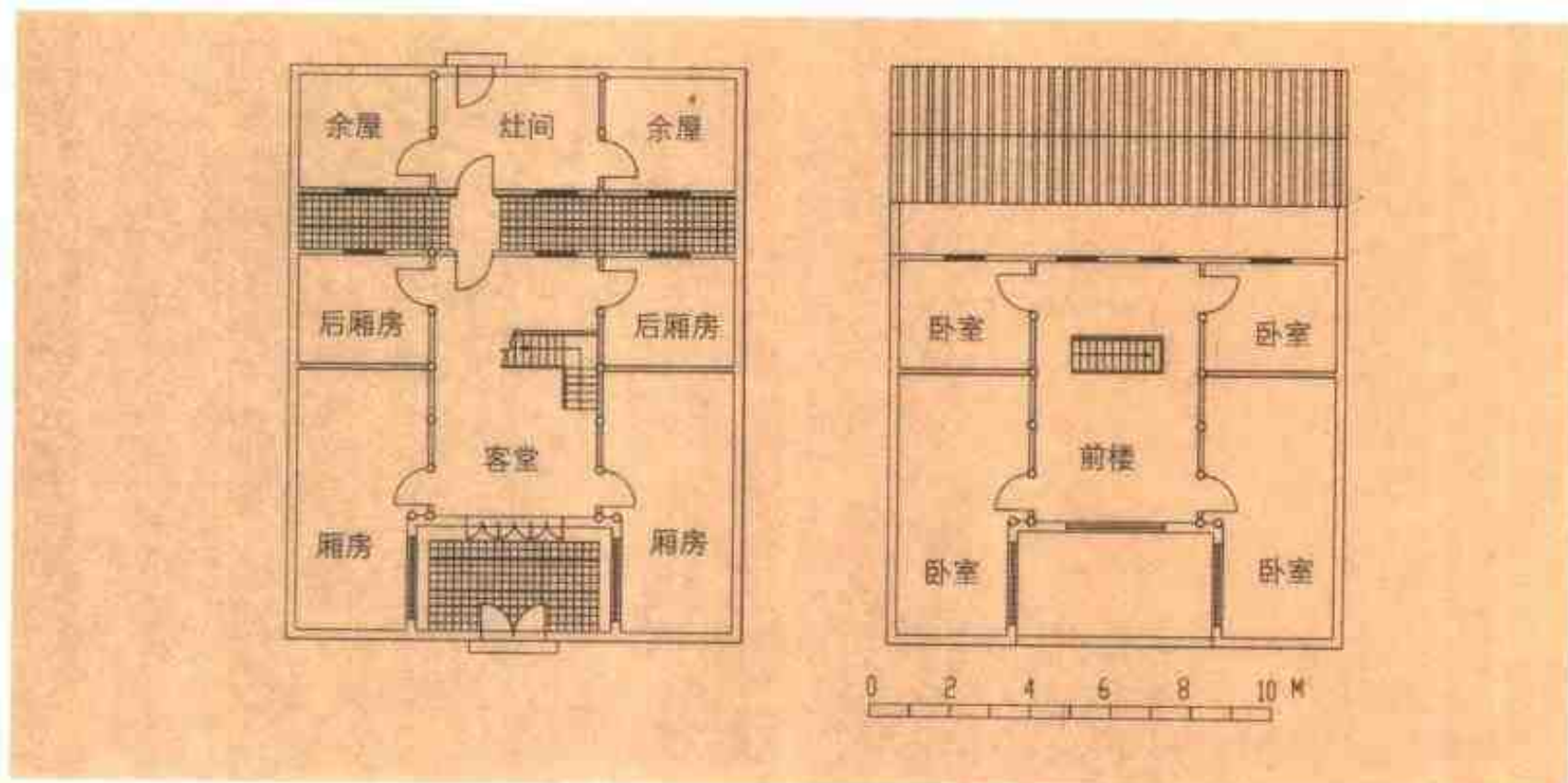


图 5-2-24 天津紫阳里外景。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1 年。

天津的南市位于旧城区与法、日租界之间，是各管界外围的闹市区。南市一带在 1900 年前后还是常年积水的水草地，后来逐渐填平，一些大房地产公司如前清直隶总督荣禄的荣业公司，曾任江西督军的陈光远的振德公司，及前面提到的李纯的东兴公司等都在这一地区大量购地建房。在 1900 年至 1920 年这段时间里，除建造许多简陋平房外，还建造了一些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天津俗称锁头式住宅。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在天津建造的时间不长，建造数量也不多，都建在南市一地，如南市永安里、群英后等。时光流逝，随着天津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开展，南市的锁头式住宅已无迹可寻。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作者曾测绘南市永安里，是较典型的锁头式住宅，平面类型与上海早期建造的三间两厢石库门里弄民居相同，装修则较为简陋。（图 5-2-25）

图 5-2-25 天津永安里。建于天津南市，是较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全部是三间两厢户型，天津俗称锁头式住宅，因平面似旧式锁头，故名之。试将永安里与上海教仁里、棉阳里、吉祥里的平面图作一比较，可知三者基本相同，属同一类型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永安里已拆除，平面图由作者于 1981 年测绘。



石库门里弄民居也流传到上海周边的一些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如杭州,在杭州现存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有思鑫坊等。(图 5-2-26,5-2-27)



图 5-2-26 杭州思鑫坊。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左)

图 5-2-27 杭州现状保存的石库门里弄民居。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右)

第三节 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变异

提到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空间,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四合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简单的、标准化的单体建筑组合成空间变化丰富、适应地形地势、适合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群体,而构成建筑群体的基本单元就是四合院。不管是宫殿、庙宇、官衙,还是书院、住宅、园林,小至百姓私宅,大至皇家宫殿,都是由一所、几所乃至几十所四合院组合而成。可以说,如同生物的细胞一样,四合院也是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的细胞。中国的传统建筑主要由三种要素——门、堂与廊——构成,以住宅建筑为例,门是入口处的门屋,堂是坐北朝南、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堂屋与两侧的耳房,廊是东西两侧的厢房、走廊及围墙。门堂分立,门屋与堂屋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两侧用厢房、走廊及围墙封闭,形成四面房屋围绕的中央院落,就构成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简单的四合院住宅只有一进,也就是一套四合院,人口众多的豪富之家则将若干套四合院串联起来,形成多进四合院住宅,更大的四合院住宅又将几套多进四合院并联,有的还附有花园。在传统的四合院住宅中,封建家族聚族而居,长辈居堂屋,晚辈住厢房,长幼尊卑有序;客厅在外院,女眷居里院,内外有别、宾主有别,充分体现了传统的礼教精神。四合院高墙深院,与外界隔绝,在战乱频繁的古代中国,它在安全保障方面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高墙之内,以院落为中心形成家庭公用的活动空间,在与外界隔离的自家院落中,家庭成员自由往来,融融乐乐,共享天伦。

石库门里弄民居就是在维持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的单体建筑模式的基础上,按西方

联排式住宅的群体组合模式建造的中西住宅建筑模式相互融合的近代住宅建筑。其分户单元的构成模式仍维持着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的基本形制,以保证大致维持居住者习惯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继承与延续,是对早期逃难来到上海的乡绅们的传统居住观念的妥协与适应;而建筑群的组合模式则模仿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是近代商品化的建筑经营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组合模式维持了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的单体建筑模式,却打破了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独门独院、纵向多进院落组合的整体格局,使得石库门里弄民居在采用维持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基本形制的分户单元的基础上产生整体格局的变异。对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的单体建筑模式的继承,将居住者习惯的传统生活方式保留在高高的石库门后面的分户单元之内;因采用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的组合模式而产生的整体格局的变异,则将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的大家庭生活模式中的精华成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式的亲情,带到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弄堂空间之中。这就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对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变异。

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分户单元仍维持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建筑的基本构成模式。门堂分立,建筑围绕天井,所有房间都朝天井开门开窗,对外则高墙壁垒,封闭内向,这正是传统四合院住宅的基本空间特征,强调的是住宅建筑的封闭性与私密性。19世纪末叶的上海,惜地如金,传统的单层四合院住宅自然难以为继,只好抛却对故土田园的怀念,因地制宜,入乡随俗。于是,院落缩小成为天井,房屋重叠而有二层,高高的围墙仍旧与外界隔绝,密不透风的石库门内留下一个家庭的生活空间。在典型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中,正对入口石库门的是客堂与客堂两侧的次间,客堂与天井同宽,以落地隔扇为门,夏日卸去隔扇,客堂天井就连成一体。天井两侧是左右厢房,楼梯在客堂后部。楼梯后面是生活必需的灶披间(厨房),灶披间层高较低,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灶披间之上是小小的晒台。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灶披间之上是一间小房间,从楼梯的休息平台进入,低矮窄小,本是供佣人居住或作仓库的小间,后来住房紧张,也单独出租,这就是许多文学作品中常常提到的大名鼎鼎的亭子间。20世纪30年代贫困的作家常常赁居亭子间,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作就是在亭子间中写成的。

石库门里弄民居采用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建造方式,分户单元横向组合,并联建造,又将若干排建筑组合而构成街坊——上海称为弄堂。正是这个石库门里弄民居特有的弄堂空间,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居住方式带到石库门里弄民居之中。弄堂空间的存在将里弄居民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基本人文精神。在这个弄堂空间中,散发着浓郁温馨的人情味,构成一种为石库门里弄民居所特有的、比较安宁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居住环境。在这个弄堂空间里,居民彼此交往,老人闲坐、儿童游戏、夏日乘凉、冬天晒太阳,这里的活动成为弄内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空间对老人和孩子更为重要,因为老人和孩子是最需要方便,也最需要安全保障的,弄堂中的这个公共空间正是能够提供这种方便与安全保障的活动场所。这个空间可以说是家庭的延伸,这里的活动使整个弄堂的居民形成一个没有亲缘关系却相处融洽的大家庭。研究环境心理学的学者们指出,在城市旧住宅区中,没有家庭关系、没有特殊友谊,也没有正式责任的邻居会彼此担负一些公共责任,石库门里弄民居也正是这样。里弄中的这个公共空间是一个对大家都有益的、应当共同维护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里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受到居民自觉的维护,而里弄居民彼此之间的互助精神、自觉执行的治安措施与对来访者的热情指点更是其它住宅区中难以见到的。形成这种生活环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建筑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后者包括几十年、两三代人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特殊邻里关系与行之有效的

管理体制等,但是,建筑因素还是基本的、起主要作用的(图 5-3-1,5-3-2,5-3-3)

人情是人类共同的天性,亲情、爱情、友情、邻里之情,是所有民族共同追求、共同向往的美好情愫。在陆大猷所著《三峡大移民》一书中,作为记者的作家记录了即将淹没的三峡坝区老农对故土故居的眷恋之情:“站在家门口,谁家弄啥吃都闻得到,到吃饭时上门去讨杯酒喝。街上家家的门都是敞着的,谁家有事都藏不住,一走上街,听到的尽是新鲜事,哪家用得着看报纸?不像城里那房,进门就关上,屋里闹鬼都不晓得。”^[1]这正是中国传统居住方式活生生的写照。如果说,四川农民的感慨稍嫌离题远了一些,那么,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回上海探亲时的感受则好像是专门为本节书写的,女作家对石库门里弄民居生活环境的感受实在是太真挚了,我们不妨多费一点篇幅,摘录作家的原文,作为本节的结尾。作家到上海探访多年不见的妹妹,妹妹的住宅是在弄堂房子,也就是石库门里弄民居之中。“我实在没时间去她家过夜或吃饭,但却抽出时间去了她家,她家在一个小弄堂里,巷很窄,两旁密密麻麻,尽是人家。但巷子扫得一干二净,就显得蛮明亮。我妹妹家在二楼,窄窄的楼梯上去,两间不算大的房,前房大些,有张双人床、五斗橱、方桌、衣柜等。家具却是红木的,光洁明亮。屋里坐着我妹妹一家人,及邻居的婆婆姑姑们。满满的一屋子。桌上摆着上海出的汽水、巧克力糖、蛋糕及糖果。她同她婆婆递茶递吃的,忙个不停,加上巷对面二楼上的邻居都拥出窗口,七嘴八舌的叫着我妹妹的名字:‘这就是你亲姐呀?像得来!一个印版出来的哩!不要怠慢她啊,这么远跑来看你!’我妹妹又兴奋,又不安地站又不是,坐又不是,嘴里不停地说:‘阿姐,你吃嘛!’我心里被她的亲情及她邻居们的友情塞得满满的,只是咧着嘴傻笑。我问妹妹:‘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好多年咯,解放后就住在这里的。阿



图 5-3-1 上海洪德里里弄环境。锤子、剪刀、布,孩子们玩得真高兴。闹市中心,过街楼外人车喧嚣,弄堂里却是孩子们的天堂。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3-2 上海建业里里弄环境。不必担心车辆,不会干扰他人,踢毽子的女孩聚精会神——只有在弄堂里才能这么自在。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3-3 上海尊德里里弄环境。弄堂同样是老人们的乐土,朝阳初升,练功的老人们目不斜视,气沉丹田,已经进入化境。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姐,你住的地方不会这样挤吧?’我摇摇头。当然无法告诉她我们有幢房子,但我们也是房子的奴隶,春天撒籽,夏天割草,秋天扫叶,冬天冒着苦寒铲六七寸厚的雪,而房子真正的主人却是银行。等你把银行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债还清时,你已经是个佝偻着背,无子无女的老人了,这时候你就得向吸了你二三十年青春的血的房子告别,而搬进等死的老人院了。当然更无法告诉她,住在城外郊区的独幢房子里的寂寞,邻居不会隔着窗子对你叫:喂,好好招待你的客人啊;有事也不能朝对巷叫一声:喂,替我看看小毛,我就来。你病了,如果家人不在,你的邻居不会知道。没法向她解释什么,只好摇摇头,说:‘是,不像你这样挤,但不如你的舒服。’^[10](图 5-3-4,5-3-5,5-3-6)

图 5-3-4 上海尊德里里弄环境。跨出自家的石库门就是干净、安全的弄堂,大孩子小孩子尽管放心玩耍。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3-5 武汉汉润里里弄环境。炎炎夏日,摘菜的老人,看书的孩子,拿个板凳,搬个躺椅,坐在弄堂里,多么舒适,多么惬意。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左)

图 5-3-6 上海建业里里弄环境。石库门前,邻里之间聊得正热闹。擦车的擦车,织毛衣的织毛衣,手里不闲着,嘴里也不闲着。是讨论菜价的贵贱,是诉说孩子的顽皮,还是夸耀丈夫的成功?对门的老人悠闲自在,笑容可掬——饭已煮好,孙子还没回来,“难得浮生片刻闲”呢。在这样的邻里环境之中,老人要出门,不是可以说一声:“替我看着锅,我打瓶酱油就回来。”转身就可离去么。这样的福分,住在城里高楼中的人们是久违了。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右)



第四节 石库门里弄民居建筑形式的演变进程 及其体现的城市民俗建筑文化现象

考察石库门里弄民居,弄堂里最显眼的是石库门,一户一门,依次排开,韵律感极强,石库门里弄民居因之得名。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约六十年的时间里,石库门与石库门里弄民居一起,随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演变,其源自民间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其强烈的城市民俗建筑文化色彩与市民文化意识,使之成为从特定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特殊标本。本节即以最能体现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建筑风格特征,因而成为它的标志的石库门为代表,探讨其建筑风格演变进程及在这一进程中体现的城市民俗建筑文化现象。石库门又称墙门或仪门,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常常用在每进院落间的塞口墙上,用条石作门边框与上槛,门则用约二寸厚的木料加工成实拼门,两头做木轴,称木摇梗,在上下石料上刻轴眼,门在轴眼中转动启闭。(图5-4-1)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石库门仍依旧制:门用木料实拼,木摇梗启闭,使用条石作门边框与上槛。当时出门乘轿、丧葬用棺,门的尺度就依轿、棺尺寸而定,门宽约155厘米,高约250厘米。门一律油漆成黑色,门上有铜环或铁环一对。在以后的演变进程中,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石库门的条石边框与上槛逐渐为砖砌门槛或钢筋混凝土门槛,及钢筋混凝土过梁所取代,木摇梗亦改用铁合页,石库门围墙高度降低,但石库门的基本形制与基本尺度并无本质的变化。变化最大的还是石库门的建筑形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江南民居建筑风格逐渐演变为中西合璧民俗建筑风格,乃至民俗化的几何体块建筑风格的发展进程。

石库门里弄民居早期(1912年以前)基本沿袭江南民居建筑风格,1900年以后受租界区内西方建筑的影响,已开始江南民居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呈现中西合璧的趋势。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居住者多为邻省进入城市的乡绅,家境富裕,人口较多,每户建筑面积较大,多数是三间两厢户型——三开间、两侧都有厢房,更有少量五开间(如上海兆福里),或规模更大(如上海洪德里)的户型。建筑外观则为黑色蝴蝶瓦屋面、黑色石库门、白色粉墙,色调素雅,对比鲜明,更有马头山墙高高耸立,颇具江南民居特色。石库门围墙很高,达5米以上,石过梁两端有石雕雀替,门头有精美的砖雕,刻的都是传统戏曲人物、花鸟虫鱼图案。此时期



图5-4-1 石库门的原型,苏州沧浪亭大门。照片由作者摄于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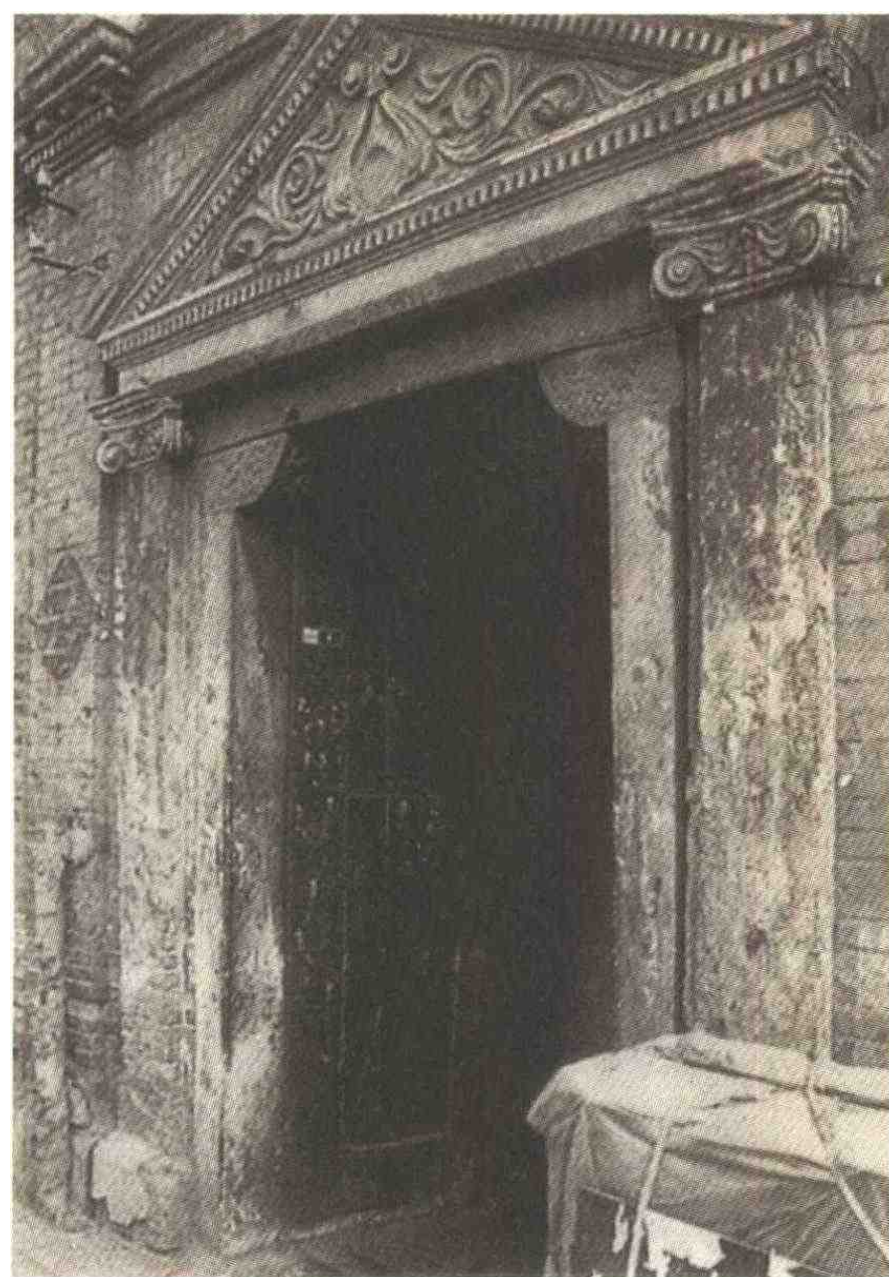
图 5-4-2 上海浙江中路 599 弄洪德里 13 号石库门的石雕雀替。洪德里是早期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受江南民居影响较大，但年代久远，面目全非，当年青砖黛瓦、马头山墙的风姿已不复存在。唯洪德里 13 号的石库门尚幸存一对石雕雀替，可窥见当年风貌，石雕雀替采用宋《营造法式》所载中国古代石雕四法之一的“剔地起突”，即高浮雕手法雕刻，起伏大，立体感强，远观虚实对比鲜明，近看亦颇精致生动。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4-3 上海天津路 157 弄老祥康里 4 号的石库门石雕雀替。1908 年建造的老祥康里历经沧桑，同样面目全非。但里弄中 4 号石库门的条石门边框、门过梁及石雕雀替仍保存完好。这对石雕雀替采用宋《营造法式》所载中国古代石雕四法之一的“压地隐起华”，即浅浮雕手法雕刻，凹下去的地大致在一个平面上，凸起的浮雕起伏不大，大约只有一至二厘米。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4-4 天津湖北路 1 号石库门。天津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数量很少，规模也不大，近年来随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开展已拆除殆尽，湖北路 1 号的这幢石库门 1995 年尚完整保存。石库门装修已经西化，采用爱奥尼克柱式，西式三角形山花，而条石门边框、门过梁与石雕雀替则仍依旧制，反映了天津早期中西建筑文化混杂的状况。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得以完整保留至今者不多，遗存者经历年维修改造，多数亦已面目全非。作者 1980 年在武汉考察所得，有 1902 年至 1905 年间建造的长清里，当时仍保持原始面貌，几年后已经拆除。1981 年、1986 年、1995 年至上海，曾三度考察当时尚幸存的洪德里（约建于 1900 年至 1910 年）与老祥康里（1908 年），其时洪德里与老祥康里尚有保存完好的石库门石雕雀替。据宋《营造法式》所载，中国古代石料雕凿四法曰“剔地起突”、“压地隐起华”、“减地平钹”与“素平”。洪德里石雕雀替采用“剔地起突”即高浮雕手法雕刻，起伏大，立体感强，虚实对比鲜明，造型亦颇生动。老祥康里石雕雀替则采用“压地隐起华”即浅浮雕手法雕刻，凹下去的地大致在一个平面上，凸起的浮雕起伏不大，只有 1—2 厘米。武汉长清里石库门围墙高达 5 米以上，这是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特征之一，石库门亦维持传统做法，但石库门围墙上部作西式宝瓶栏杆装饰，已体现出租界区内西方古典建筑对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影响。（图 5-4-2、5-4-3）

20 世纪 10 年代，石库门大量采用中西合璧民俗建筑风格，受租界区内西方建筑的影响，带有随意性的中西合璧民俗建筑风格成为主流。辛亥革命以后，在 1912 年至 1920 年这段时间里，上海、汉口、天津城市扩展，人口剧增，住宅的需求量大增。石库门里弄民居大批建造，户型改小，多数为单开间户型，一楼一底，建筑面积只有早期三间两厢户型的四分之一。但里弄规模则大大扩张。石库门已很少使用传统的石料，而改用砖砌门楣或钢筋混凝土门楣、钢筋混凝土过梁，水刷石饰面，石库门围墙也降低到二层窗台高度，屋顶的黑色蝴蝶瓦则改用土窑平瓦或机制平瓦。受租界区内大量建造的西方建筑的影响，西方古典建筑的各种装饰构成要素都在小小的石库门上亮相：三角形山花、半



图 5-4-5 上海兴业路 102 号石库门, 中国传统砌砖工艺, 西化的装饰, 砖工精细。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4-6 上海尊德里石库门之一。黑色实拼木门依旧, 石雕雀替取消, 条石门边框、门过梁简化。砖雕西式古典三角形山花砖工精细, 颇富美感。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左)

图 5-4-7 上海尊德里石库门之二, 同一弄堂中建造较晚者石库门已大为改观, 简化装饰, 略具现代建筑风采, 除条石门边框、门过梁外, 均使用水刷石饰面。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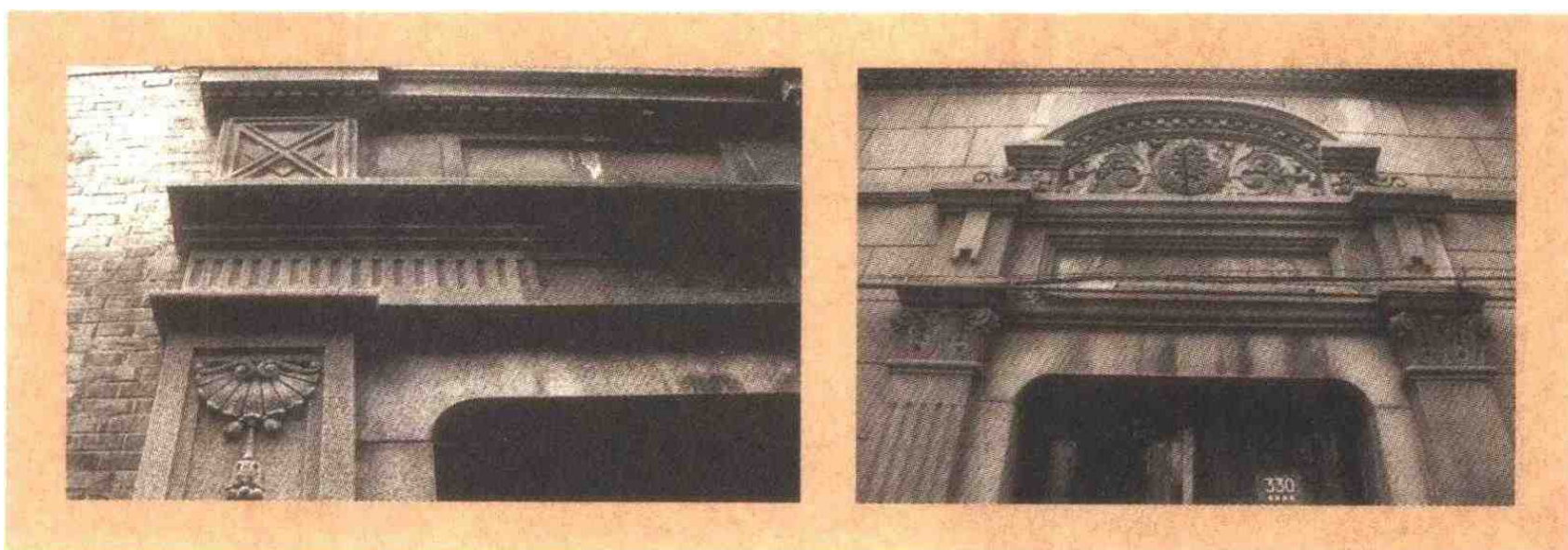


图 5-4-8 上海尊德里石库门之二的细部做法, 水刷石制作的西洋古典花饰亦颇为精美。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左)

图 5-4-9 上海黄陂南路 330 号石库门。西洋古典柱式、拱券山花及纹饰的作工都很精细, 构图亦颇完美。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右)

图 5-4-10 上海新闻路 557 弄石库门的西式柱头。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左)



图 5-4-11 武汉同兴里石库门的民俗化西式柱头。模仿西方古典建筑的，变形的爱奥尼克柱头带有几分中国民间工艺色彩。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右)

图 5-4-12 上海西湖路 34 号石库门，简化的西洋古典柱式。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图 5-4-13 上海慈溪路 180 弄石库门，几何体块造型颇具新意。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5 年。



圆拱券山花、模仿巴洛克风格的曲线山花、西方古典柱式、各种变形的或不变形的或中西合璧的柱头、西方古典纹饰、石库门围墙上的西式宝瓶栏杆等等。随意取用的是作为建筑装饰素材的各种装饰构成要素，不分类型、不拘风格、随意增删、重新组合，与原有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构成要素混为一体，于是形成不中不西、亦古亦洋、中西合璧的新式石库门。热衷的是对租界区内正宗西方古典建筑的局部模仿与借鉴，缺少的是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刻意追求，随意挥洒，任其自然，这也许就是民俗建筑的特点。发人深省的是，改变了面貌的石库门仍然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尽管洋式山花、柱头取代了传统的雀替、雕饰，石库门还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石库门！（图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4-10, 5-4-11, 5-4-12）

20 世纪 20 年代，石库门呈现民俗化的几何体块建筑风格，此时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建造已近尾声，简化装饰，简化造型，几何体块造型的石库门流行，或可称为民俗化的现代建筑风格。20 世纪 20 年代，石库门里弄民居建造渐少，其石库门则受租界区内现代建筑风格建筑的影响，简化装饰，采用几何体块造型，有的石库门甚至完全取消装饰，只剩下光秃秃的钢筋混凝土门框。审美观念随社会风尚变迁，亦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及水刷石饰面等新结构、新材料相适应，并可降低造价、缩短工期，可视为石库门里弄民居为与新式里弄住宅竞争而采取的，下意识的改良措施。但是，对住宅建筑而言，

功能要求终究是第一位的要求,与此时开始大量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及稍晚一些出现的公寓式住宅相比,石库门里弄民居已不能满足此时的居住者——政府机关职员、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及中小工商业者等——日益西化的居住要求,功能要求如此,审美要求亦如此。局部改良已无回天之力,所以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石库门里弄民居就告消亡。(图 5-4-13,5-4-14)

试以两位文人对上海后期建造的单开间石库门里弄民居,及对天津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的满意度作一对比,可知对住宅建筑来讲,功能要求始终居于首位,各类房间功能合理,有现代厨卫设备,甚至煤气暖气设备的新式里弄住宅取代使用马桶的石库门里弄民居是必然的趋势。两位文人,一位是作家梁实秋,梁氏 20 世纪 20 年代赁居于上海的一楼一底单开间石库门里弄民居是没有卫生间的,所以梁氏略带



图 5-4-14 武汉同丰里石库门。石库门围墙高度降低到二层窗台高度,石库门造型已高度简化。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

几分幽默地如是评价:“客人有时候腹内积蓄的水分过多,附着我的耳朵叽叽喳喳说要如此如此,这一来我就窘了,朱漆金箍的器皿,搬来搬去,不成体统。我若在小小的天井中间随意用手一指,客人又觉得不惯,并且耳目众多,彼此都窘了。”^[13]而于 1924 年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教育、交通总长,旋又摄行总统职权的黄郛,曾于 1917 至 1920 年在天津意租界居住三年。黄郛所居是天津意租界的新式里弄住宅,其妻沈亦云在回忆录中写道:“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帮我到处打听空屋,这时由北京逃难到津的人甚拥挤,屋极难得。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马路看到一排出租房屋,是两楼两底半独立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与翠花街相同,(引者注:翠花街指黄家在北京租住的四合院住宅)然房少而间间合用。”^[14]又称赞“这是我们在中国第一次住有自来水浴室的房子。”^[15]沈亦云对天津意租界的新式里弄住宅是很满意的。上海并不是没有新式里弄住宅,梁实秋只是因经济实力不够才屈居使用马桶的一楼一底石库门里弄民居,所以他自我解嘲道:“话又说回来了。一楼一底的房即或有天大的不好,你度德量力,一时还是不能乔迁。”^[16]有上下水设施、卫生间设施、煤气、暖气设施的新式里弄住宅受到有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的欢迎是必然的,新式里弄住宅带来的还有“房少而间间合用”的合理的功能格局。有足够经济实力的文人也就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有煤气,有卫生间的新式里弄住宅,如鲁迅就搬进了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大陆新村。^[17]

直接克隆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的新式里弄住宅与石库门里弄民居完全不同,这种新的住宅类型与中国的传统民居完全没有传承关系,20 世纪初期开始引进,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大量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与多层公寓住宅、高层住宅一起开始了中国商品化住宅全盘西化的进程。而在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与西方联排式住宅联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则经历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小,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强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建筑形式演变进程,但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基本功能模式却始终没有本质性的改变,这正是石库门里弄民居最终消亡的主要原因。如同所有的传统民居建筑一样,其保存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世纪的手工艺建筑文化令人陶醉,但其居住功能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

的需求,因此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优秀作品作为文化标本,作为建筑文物永久保存,绝大多数迟早是要被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新住宅类型所取代的。今天我们看到上海将石库门里弄民居成片地夷为平地建造新建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令人欣慰的是,上海已将作为建筑文物的优秀石库门里弄民居的保护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已开始逐步付诸实施。石库门里弄民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又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发展历程,因而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有其特定的价值,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发人深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第五节 发人深省的建筑文化现象——民间工匠 与普通民众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理解

回顾中国近现代建筑史,有一种建筑现象贯穿始终,至今仍是中国建筑界,也是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那就是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追求。与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中国建筑文化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弘扬民族建筑优良传统,创作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难题。以吕彦直 1925 年、1926 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为其前奏,中国建筑师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有意识地掀起“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将在本书第六章详细论述。不为人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批大多数不经建筑师之手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建筑,那就是石库门里弄民居,研究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同样是很有意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 1870 年以后在上海开始建造,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进入建造高潮期,20 世纪 30 年代已基本停止建造,是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第三条渠道——民间传播渠道,也是早期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民间渠道。而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始于吕彦直 1925 年、1926 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此前,西方建筑师主要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大致开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也就是说,石库门里弄民居这条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民间渠道的开通,是在中国建筑师有意识地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之前,也在西方建筑师主要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有意识地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之前,其建造高潮期则与西方建筑师在这一领域的探索高潮期大致同步。后者是科班出身的建筑师有意识地探索的结果,有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有理论,有目标,建筑师的个人素质起着主要作用,产生的建筑作品也因建筑师的观点、素养、水平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石库门里弄民居则多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体现在其中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所致,是无意识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式的感染。因此石库门里弄民居大同小异,有一个基本模式,流风所至,一段时间内流行一种式样。

石库门里弄民居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城市民俗建筑文化遗产,为研究其特定的文化价值,在这里有必要稍微探讨一下民居建筑的形成过程。我们知道,民居是一种没有建

筑师的建筑,它与我们习见的先由建筑师及其它专业工程师设计,再由施工队伍按图施工的建造模式完全不同,大致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工匠按业主要求自发的创造——一定范围内竞相模仿——在多次重复的建造过程中竞争改进——逐渐形成为业主接受的固定模式——不断流传形成有强烈地方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这个过程不断重演,因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的差异而形成风格迥异的各地区的民居建筑。民居建筑不见经传,鲜有记载,我们无法从历史记载中考察之,但却可以从当代新民居的形成过程中清楚地看到这个演变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较早富裕起来的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等地农村,农民大量建造新住宅。作者初步考察,在这些地区逐渐形成的新民居虽然尚处雏形阶段,已可看出建造方法与演变趋势正是上文所述的模式。

石库门里弄民居也是按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中极重要的因素是业主(房地产商)的参与与工匠的发挥,发展初期城市中西方建筑的影响尚微,居住者多为江浙两省及江西一带的乡绅,头脑中传统意识很浓,工匠多为世代相传建造传统建筑的好手。因此产生于上海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受江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结构形式与装修做法,基本上保留了江南民居的传统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1900年以后西方建筑的影响日益扩大,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居住者也逐渐改变成分,新一代的商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增多,生活方式日趋西化,而多年参与租界区内西方建筑建造的工匠也已熟悉了西方建筑的做法。西方建筑的影响就随业主与居住者的喜好,随工匠的发挥逐渐渗透到石库门里弄民居之中。

同样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自然渗透形成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与建筑师设计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大不相同。没有建筑师的参与,由工匠执掌大权,工匠则受命于业主,实际上由工匠与业主共同商议确定方案,往往以已建成的石库门里弄民居为样本,议论优劣、确定改进方案,就可照此施工。这样建成的建筑源自模仿,不免雷同,但在多次模仿的过程中不断改进,逐渐完善,可充分满足居住者的要求,对住宅建筑来讲,应当是一种理想的设计方法。而建筑细部处理则由工匠按业主要求自由发挥,迎合普通百姓的审美心态,迎合城市社会风尚,虽不免俗气、匠气,却保持着民间建筑纯朴自然的风格,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

[1] 非建筑类书籍如罗苏义著,《大上海·石库门:寻常人家》,第24页,称“如果将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四种长期并存的里弄住宅作一比较的话……”建筑类书籍如沈华主编《上海里弄民居》,第14页,称“通过修正后的上海里弄民居分类意见是:早期石库门民居、后期石库门民居、新式里弄民居、花园里弄民居和公寓里弄民居五类。”

[2] 杨秉德,《里弄住宅设计手法探讨》,载《建筑学报》1983年2期,第18页。

[3]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47页。又,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60页文云“在一百五十栋外侨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约八千所中国住户。”文中称“八千所中国住户”,居住人数当有数万人之多,似不符史实,与费氏前文之“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立即在外滩露宿或住进码头边的小船上;草棚、店铺和廉价住宅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后春笋那样涌现,以容纳这些人;”亦不符。本书取蒯世勋之说,参见本书第二章引文及注40。

[4] 参见徐公肃,江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7页,年表。

[5] 唐振常,《上海史》,第218—219页,原书注:参阅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及附表2、附表3。

- [6] 唐振常,《上海史》,第 219 页。
- [7] 《申报》广告栏,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二十七日,转引自罗苏文,《大上海·石库门:寻常人家》,第 14 页。
- [8] 罗苏文,《大上海·石库门:寻常人家》,第 28—29 页。
- [9] 陆大猷,《三峡大移民》,第 87 页。
- [10] 於梨华,《新中国的女性》,载香港《七十年代》,1976 年 5 月号。
- [11] 梁实秋,《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载《梁实秋散文选集》,第 18 页。
- [12] 沈亦云,《天津三年》,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 173,174 页。
- [13] 梁实秋,《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载《梁实秋散文选集》,第 18 页。
- [14] 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第 3 页。鲁氏这样论述:在收入中等偏上的 1933 年,“鲁迅共收入 10104.89 元,月平均为 842.07 元。800 多元,如按前面说的实际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人民币 24000 元。(引者注:原书作者按 1994 年上海物价换算)”“从《鲁迅日记》中,我们还看到,正是在 1933 年,鲁迅搬进了有煤气和上、下水道的‘大陆新村’寓所。”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第六章

探赜钩深——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

以吕彦直 1925 年、1926 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为前奏,中国建筑师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有意识地掀起“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在接受西方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功能的同时,力求继承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创作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这次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热潮,是在西方建筑师主要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早期尝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结果,但思路更开阔,涉及的建筑类型更多、更复杂,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的运用也更自如、更正宗,并创作了一批极富创意的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追根溯源,本章的论述就从探讨早期西方建筑师对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历程开篇。

第一节 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与西方建筑师探索 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早期尝试

本节试以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为例,探讨早期西方建筑师(正宗的职业建筑师与业余的传教士建筑师)对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历程。

这种因教会传教政策的需要,而将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教会大学校舍建筑的建筑形式中国化的尝试起步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叶,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1894)与科学馆(1899)等。而这时还没有中国建筑师,早期甚至正宗的西方职业建筑师也不多。这种尝试因教会传教政策的需要而产生,首先承担这一重任的是正宗的西方职业建筑师,还有一部分是业余的传教士建筑师。傅朝卿研究这一现象,有一段文字谈到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对这一现象的截然不同的见解:“西方学者史考特(A. C. Scott)曾经嘲讽的说‘(中国)在建筑上创造民族式样的运动,是得自美国人之启发。’的确,由教会率先以钢筋混凝土等新建材来建造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是饶有趣味而且值得探讨的。当时有一些对中国古典建筑持极高本位主义之中国建筑师,便自傲地认为此现象是因为 1910 年至 20 年代‘中国文化在西方出健旺的风头,于是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也随了那时髦的潮流,将中国建筑固有的许多样式,加到他们新盖的房子上去。’”^[1]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都未免偏激。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运用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教会大学校舍建筑的尝试,始自西方建筑师(正宗的职业建筑师或业余的传教士建筑师),这是历史事实,因此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首先产生了早期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虽然还很不成熟,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理解也很浮浅,但创始之功不可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建筑师掀起的“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创作热潮。西方建筑师早期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所做的探索,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创作动机与后来中国建筑师探索“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社会背景和创作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为传教服务,为“基督征服中国”服务的折衷手段;后者则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下,为发扬中国建筑优良传统而作出的努力。动机不同,背景不同,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程度更有天壤之别,因此

二者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的贡献也就完全不同。承认西方建筑师的首创之功,并将早期西方建筑师创作中国民族形式教会大学校舍建筑的全过程置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之,才能对这一段历史有正确的认识与评价。

一、教会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及其世俗化与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传教时,就曾建立初级学校,如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1842年迁香港)开办的玛礼逊学堂等。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陆续开办初级学校,这些初级学校中的一部分成为后来教会大学的起源。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后来演变为之江大学;1847年6月17日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第一任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一行11人抵达上海,数月后便在县城西门正式设立男童学校一所,后来演变为上海圣约翰大学;1864年1月15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牧师夫妇和郭显德(Hunter Corbett)牧师夫妇抵达山东登州,9月,狄考文与妻子狄朱莉亚开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后来演变为山东齐鲁大学。大多数教会大学的建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初级学校(小学)到中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学院(College)或大学(University)。当然也有少数白手起家,直接开办大学的,如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绝大多数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教,希望用基督教改造中国,英国传教士杨格非的一番话极具代表性:“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开发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中国。”^[2]所以早期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育事业的目的是为顺利传教铺平道路,是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早期的教会学校程度很浅,尽管也教授国文、英文及简单的格致课程,但以圣经为主课,教育目的是培养本地的传教士。开办教会大学的目的也是如此,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前身,于1879年4月14日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的圣约翰书院就是这一目标的产物。“1877年10月30日,施约瑟在纽约的天恩堂被正式祝圣为中国布道区第三任主教。施氏总结了美国圣公会和他本人在华传教的经验,认为直接的宣教事工在中国举步维艰,并且‘只要我们作为外国人到中国,在他们中间作为异族人和陌生人去宣教,这种处境就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圣公会在华的宣教事业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在中国建立一所教会大学。”^[3]在圣约翰书院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圣约翰大学于“1892年开设了大学课程,1906年在美国注册,1907年授第一批学士学位。”^[4]施约瑟建立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出发点是有代表性的,教会大学成为西方传教士为适应中国国情而建立的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媒介。

“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建立是西方差会差传政策调整的结果。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直接传教活动的受阻,新教在华各差会纷纷改变以争取下层群众为主的‘边缘战略’和‘成人战略’,教会教育事工为提高传教的功效和质量,改善教会形象与对中国社会精神空隙进行渗透的手段,开始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华教会大学几乎均为美国差会所办。美国新教教会在本国的传教运动中,常常以建立教会院校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美国差会在中国,自然也采用这一注重教育的差传战略,于是教会所属的各级学校,便次第建立。诚如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John F. Fairbank)所言,美国新教的海外传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本国文化的延伸。然而,尽管教会教育,特别是教会高等教育,在‘教堂,学堂,医院’这一‘福音传道的三位一体’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但其基本前提和最终目标仍然是宣教,实现所谓中国的基督化。”^[5]

使教会传教士的非宗教的教育活动改变立场的关键人物是狄考文。1864年来华不

到三个月,狄考文即在自己居住的登州观音庙中协助妻子狄朱莉亚建立了最初的蒙养学堂,1877年开始使用登州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的名称,仍属中学性质,1881年向山东传教团及国内差会总部申请将学校升格为大学(College),报告得到差会总部的批准,但建议其中文名称仍称“登州文会馆”,英文名称则为 Tengchow College(登州学院)。“因此,一般认为登州文会馆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9]但1882年登州文会馆除狄考文夫妇、狄考文的妹妹丽莲外,只有差会总部派来协助工作的赫士夫妇,外国教习仅有5人,还远远达不到学院(College)的规模与教学水准,教育史家并不把登州文会馆(登州学院)视为教会大学。狄考文的贡献在于他的教会教育观及其影响,狄考文明确提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10]狄考文的观点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普遍支持,恰恰相反,“在十九世纪中叶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前后开始,情况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批评,但是冰层打破了,在后来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成他的立场了。”^[11]在1890年召开的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的主张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此时已出现职业的教会教育家,“海亚特指出,在1877年的会议上就教育问题发言的那些传教士,像狄考文等人那样,他们是‘作为传布福音的人来到中国的,但却因偶然机会变成了教员。相反,1890年对办教育评头品足的许多人们……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倒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这些人都主要从事教育或文化工作,到中国都比较晚,并且代表了新一代和新型的教会教育家。’这种趋势在1900年以后更是显著。”^[12]进入20世纪,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变法,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随后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并设立学部。在这种形势下,原在私塾书院读书的学生纷纷转入新式学校,申请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大为增加,这促成了教会学校的急剧发展。“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了对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了一条决议,要求英美差会大力支援在中国发展中、高等学校,‘我们要通过差会力求母会帮助发展现有的中、高等学校,并在尚无此类学校的地区开设新学校。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派遣男女人员从事这项工作的数量方面,我们请求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有更多的支持。’”^[13]这样,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教会学校的发展达到高峰,这些教会学校以美国教会开办者占大多数,教会大学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至1925年,中国的16所教会大学中,除天主教的三所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北京辅仁大学与天津工商学院不属美国教会外,其余13所新教大学都由美国教会创办或由英美教会合办,在合办的几所新教大学中,美国教会的影响也是主要的。

如本书第四章所述,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4月9日闭幕,这次会议引发了1922年至1927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为反文化侵略运动,成果之一是“收回教育权”。此前,大多数教会大学在美国注册,没有一所教会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1925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之校长应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中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四、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

宗旨；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12]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延续了这一政策，要求一切外国在华设立的教会大学在教育部登记、注册，并由中国人担任校长。“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燕京大学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得到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捐资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13]至1933年，所有主要的教会大学都已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登记注册，只有上海圣约翰大学迟至1947年才向中国政府注册。

新教创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及其创办差会一览表^[14]

教会大学名称	创办差会名称
东吴大学	美国基督教监理会
圣约翰大学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
华西协合大学	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公谊会、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和加拿大循道会
金陵大学	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基督会和长老会
之江大学	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
沪江大学	美国基督教南、北浸礼会
燕京大学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联合会、公理会和英国伦敦会
福建协和大学	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福建省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闽南归正会
齐鲁大学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英国浸礼会、圣公会、加拿大长老会
岭南大学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
华中大学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英国循道会、伦敦会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监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圣公会、复初会和英国伦敦会等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

自1860年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由于传教士翻译在中文本中私自添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并由于最惠国条款而使各国传教士都获得了这种特权之后，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就遍及中国各地。传教士与商人完全不同，商人重利，来华的外国商人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对外交通方便，沿海、沿长江的设有租界的商埠城市。而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企图实现中国的基督化，所以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的城镇乡村。如前文所述，传教士良莠不一，这是事实，但其中也不乏具有献身精神，且智力超人、受过良好教育者。后者的信念是通过教会教育来改变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想法，认为这可以控制中国未来的社会领袖与知识精英，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卜舛济云：“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美国军队的力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单单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且提到西点军校，那里训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激励和训练。当被问到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力量来源从何处可最清楚看到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在中国的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福音传道人，而且还要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15]传教士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教会大学的学生对宗教的热情却日趋淡薄，使教会大学日趋世俗化，即使是西化程度最深的圣约翰大学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校规模的扩大，圣约翰的宗教教育日益流于形式。不少学生对宗教的态度是‘文凭到手，宗教变狗’，‘出了学堂，出了教堂’成了常见的现象。卜舛济本人便承认‘许多学生在学校走过场，而学校的精神却未在他们心里扎下根’。”^[16]这是后话，但20世纪初

来华在教会大学任教的教师,大多数是在美国读完大学课程后在“学生海外志愿布道运动”的激励下来到中国的,当时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他们与商人单纯物质谋利不同的精神追求,使教会学校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一起遍布中国各地。其结果不仅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而且在中国近代边缘城市都出现了一批教会大学。早期建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武汉、广州,及1927年以前的北京的新教教会大学大都在租界区(北京的使馆区)之外购地建校,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与沪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更多的教会大学选择了中国近代边缘城市:1927年以前的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及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还有1906年建校,后来并入武昌华中大学的长沙雅礼大学。

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强烈冲击之后,教会大学认识到中国化与世俗化是其在中国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体现在校舍建筑上,是许多教会大学校舍建筑有意识地采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但1927年以后,中国建筑师探索“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热潮已经兴起,并已取得极有价值的成果,此时期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中国民族形式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与同时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相比已大为逊色。简言之,西方建筑师设计的教会大学校舍建筑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其起步最早,开风气之先的初创之功,而不在于其最终达到的水准。1927年以后,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融会于中国建筑师对同一目标探索的洪流之中,数量较少,质量平平,已不占主流地位。因此,本节主要对外国建筑师早期(1927年以前)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这一领域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作详细论述,目的是阐明其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首创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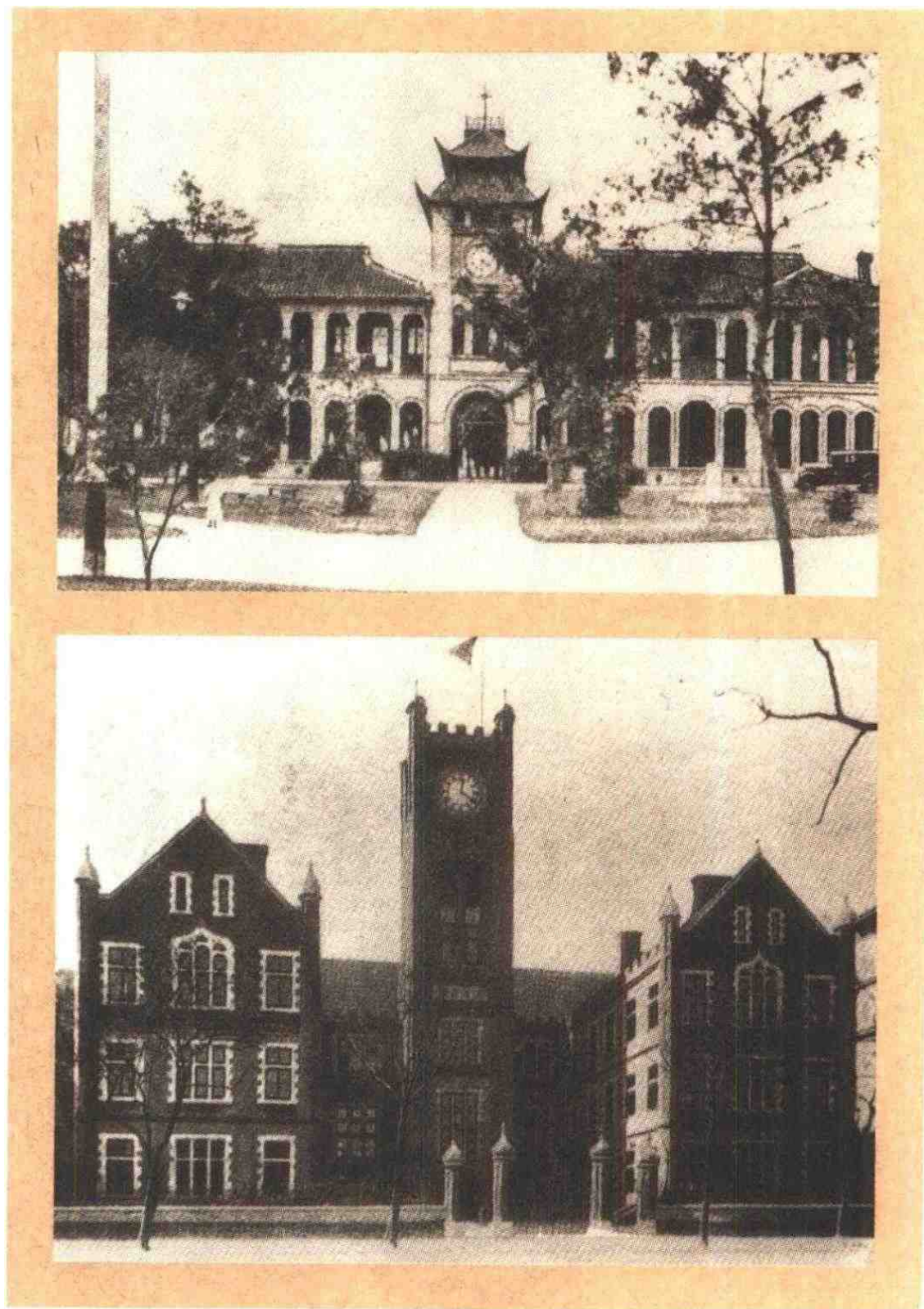
二、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与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早期探索

教会大学中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中西合璧校舍建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1894年)。这也许难以理解,因为圣约翰大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教会大学中西化程度最高的学校。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多元化的,圣约翰大学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学校,全部课程及学校所有的章程、布告、公文都使用英文,形成独特的校园英语环境。“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昂,不可一世……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学生甚至发展到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的地步。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厌倦,中文告示也常常无人注意。在谈话时,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时夹带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16]英语环境只是表象,这种大学教育美国化的风气,实际上涉及校园生活的各个层面,构成具有浓郁西方色彩的校园文化。但另一方面,圣约翰大学毕竟还是建在中国的学校,它的学生都是中国人,圣约翰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从1888年起至1941年转任名誉校长止,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2年的校长卜舫济(F.L. Hawks Pott)就是一位努力学习、体验中国文化的学者。卜舫济于1886年从圣公会总神学院毕业后从欧洲转道来华,同年11月18日抵达上海。“为了尽快学习当地语言和习俗,克服中国人仇洋的偏见,卜舫济与本国人断绝交往,独自一人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住进当地人家,完全‘与中国人打成一片’。一年后他被临时召回圣约翰任教。据圣约翰书院早期学生施肇基的回忆,当年卜舫济‘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俨然一中国绅士’。1888年

8月23日,卜舫济不顾当时差会反对传教士和当地华人结婚的政策,与1881年成立的圣公会圣玛利亚女校首任校长、圣公会老牧师黄光彩的女儿黄素娥结秦晋之好。……两人的结合确实使卜舫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获得了比一般外国传教士更多的体验和更强的亲和力。”^[17]所以圣约翰大学在强调英语教育的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教会学校的学生忽视本国的文化遗产,他们对于“福音事工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事实上,卜舫济在他1887年给布道部的著名报告中强调英语教学的同时,也指出国学和国学传统传授方式的重要性。像其他在华成功的教会教育家一样,卜氏亦深悟与当地环境和传统的妥协之道。”^[18]

了解了这一层人文社会背景,对早期圣约翰大学校舍建筑的中国化趋势就可以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即使是西化最彻底的圣约翰大学,最强调西化教育的校长卜舫济,也很早就明白“与当地环境和传统妥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在美国设计,于1894年开工建造的圣约翰大学怀施堂也就有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印迹。“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第一次之大校舍,今名怀施堂,1894年1月26日举行奠基典礼,隅石即为昔日房屋之隅石,以表新旧继续不绝之意,足资谈助也。”^[19]怀施堂是两层砖木结构建筑,红砖清水砖墙,屋顶铺中国传统的蝴蝶瓦。怀施堂建筑整体体量构成仍维持西方建筑模式,两侧是横向展开的三层教学楼,中部耸起钟楼,教学楼建有西式拱券外廊,钟楼人口处亦作半圆拱券门洞。更换的只是屋顶:两侧教学楼的中式单檐歇山顶与钟楼的中式重檐四角攒尖顶,塔楼屋顶模仿江南传统建筑,四角高高翘起,这就是当时西方建筑师与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房屋之特质”。试将怀施堂(1894年1月26日奠基,同年9月落成)与同期在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建造的第二代海关大楼(1891~1893)作一对比,两者建筑大体量的基本构成模式是相同的,主要区别是海关大楼两侧是三层建筑的山墙面,而怀施堂是长方形教学楼的长边一面,于是海关大楼形成以钟楼为中心的三个竖向建筑体量的组合,而怀施堂则形成以钟楼为中心的两个横向建筑体量与一个竖向建筑体量的组合,前者统一,后者牵强,有拼凑之嫌。(图6-1-1)塔楼是西方建筑形式构成要素中的点睛之笔,妙在与建筑整体体量融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建筑中以青岛建城初期建造的德国式建筑的塔楼最为精彩,各种形式的塔楼与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建筑融为一体,其建筑形式构图的完美令人惊叹。但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塔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塔是脱离其他建筑独立存在的,不能与庙宇建筑连成一个整体而共同组成一座单体建筑。水平展开的、建筑体量构成已经形成相对固定模式的中国传统建筑,自身已经形成完美的建筑形体,容不得附加的塔楼,按西方建筑模式生硬添加的塔楼就极易成为蛇足,这是中西建筑形式构成要素融合的难题,当然不能企望初次尝试的西方建筑师取得惊人的成果。但是,

图6-1-1 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与上海第二代海关大楼。上图:圣约翰大学怀施堂。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下图:第二代海关大楼。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怀施堂钟楼本身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创作思路是正确的，钟楼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建筑形式美的推敲也是完美的，需要解决的是个体完美的塔楼与建筑整体组合的完美，这是一直困扰着探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建筑师们的难题。今日反思，西方建筑师一开始就注重将西方建筑体量构成的设计手法运用于中国民族形式建筑，这是在西方建筑环境与西方建筑教育体系中饱受熏陶的西方建筑师的职业敏感。建筑师的水平有高下之分，建筑作品的品位亦有高下之分，但是这条创作道路是富有创意、极具活力的，后来终于在一流建筑师的笔下产生了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如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1919)，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南京中央医院(1931~1933)等。

圣约翰大学的早期建筑还有科学馆(1898年11月20日奠基,1899年7月19日落成),思颜堂(1903年10月24日奠基,1904年10月1日落成),罗氏图书馆(1903年10月24日奠基,1904年10月1日落成),思孟堂(1908年9月19日奠基,1909年9月落成)等。^[20]这些建筑都是同一类型的建筑作品——皆作飞檐翘起之中式屋顶,但又作局部体量穿插,作局部平屋顶,希望打破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的单一组合模式与建筑整体体量的单纯感,虽有中西混杂之嫌,应当说还是有创意、有活力的。(图6-1-2,6-1-3,6-1-4)倒

图6-1-2 上海圣约翰大学科学馆。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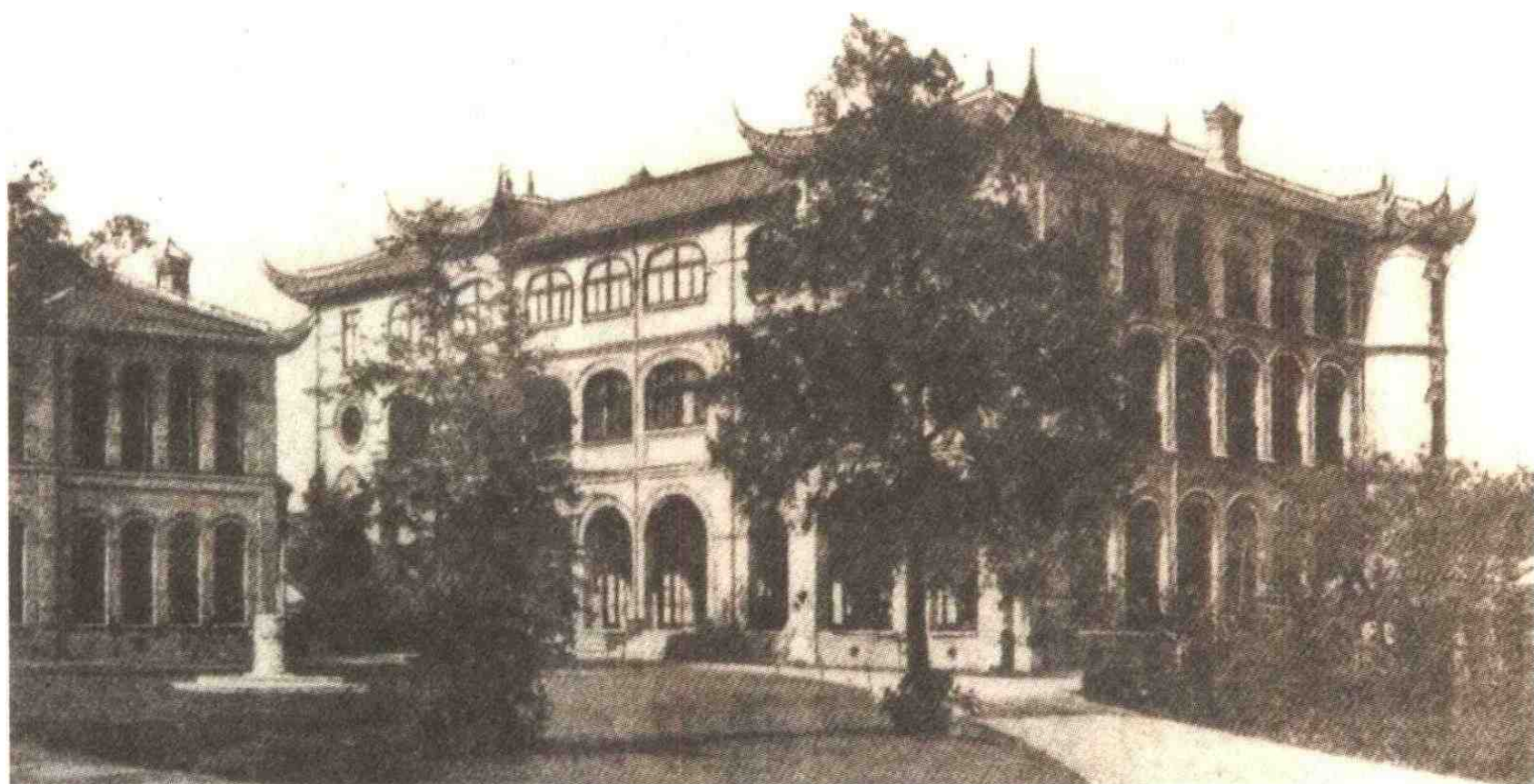


图6-1-3 上海圣约翰大学思颜堂。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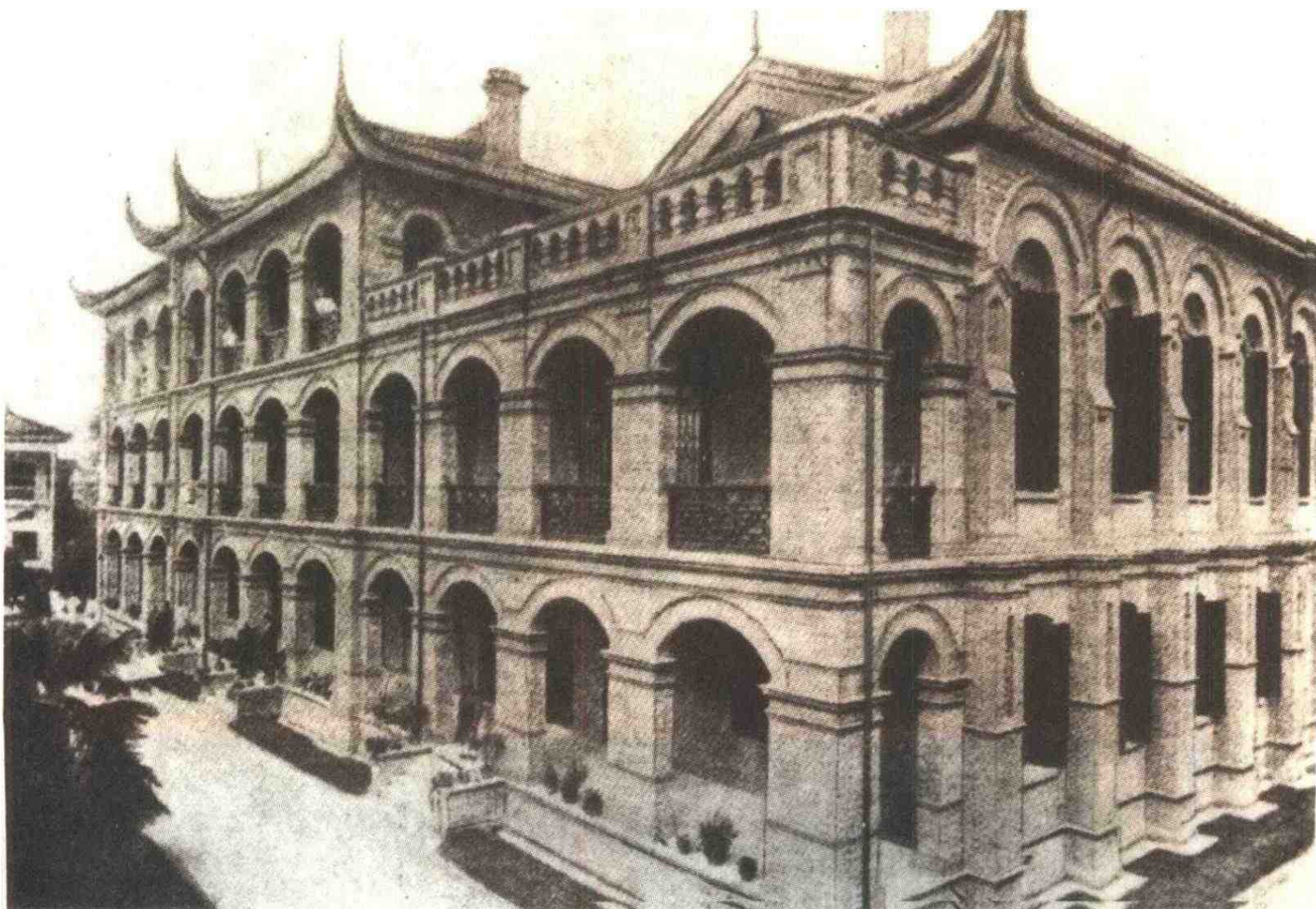




图 6-1-4 上海圣约翰大学思孟堂。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图 6-1-5 上海圣约翰大学新科学楼。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是圣约翰大学后期建造的建筑,如新科学楼(1918),已经纳入当时其他教会大学校舍建筑的标准模式,在规整的方盒子上扣上中式屋顶,反而缺少创意,失之平庸。(图 6-1-5)

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中建筑形式颇具特色的是位于偏远的中国近代边缘城市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1905年5月,由7个差会所组成的华西差会顾问部指定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对华西所有教会教育的统一化和集中化起草规划。在该委员会所提出的几项建议之中,有两项主要建议很快地得到了采纳。它们是成立华西教育协会(The West China Educational Union)和着手筹建华西协合大学。”^[21]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学,但此时的华西协合大学仅仅是象征性的开学,1910年3月11日,客士伦夫人的日记中如是记载:

“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了,老实地讲,只有 11 名学生。”^[20]但是校舍建设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从 1907 年开始,至 1910 年,在成都南门外护城河边陆续购买了土地作为校址,这片地区后来被成都人习惯地称为“华西坝”。建校之前也已经准备好了建筑材料,许多是成都地区的地方性建材。“这些努力在华西建立大学的人们,在合同签订之前已经烧好了砖,木料已经被伐木工砍好并带到校园内,石灰石散落在河岸边,而金属的器物 and 玻璃只能从西方进口……只有他们才能够设想到华大建设者的艰难程度!”^[21]

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舍建筑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并在国外举办了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早在 1912 年,托事部就宣布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国公开地竞争华大的建筑设计方案,提出关于行政大楼、图书馆、礼堂和医学院的设计草图,…… 1912 年 11 月 18 日,托事部选择了由弗烈特·荣特易(Fred. Rowntree),一个英国伦敦人所提交的方案。荣特易先生的设计融合了东西方建筑物的许多最精华部分,其结果使得整个校园形成一个统一与和谐的风格,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洋人都感到满意。(图 6-1-6)应托事部的邀请,1913 年春季,荣特易来到建筑工地上渡过了许多日子。一位在中国有数年经历的建筑师李克忠(Mr.

Raymond Ricker) 成为华大建筑的主管。出于某种需要,华大校园的建筑没有完全地依照荣特易的最初设计来完成,但是遵照了中国人关于整齐、平衡和对称的原则,一幢建筑物相配对的另一幢建筑物都与中轴点处于相等的距离。”^[24]1913 年 7 月,托事部作出决议,同意实施荣特易的设计方案。华西协合大学校舍建筑设计,除方案设计者英国建筑师弗烈特·荣特易及后来主管华大建筑基建工作的建筑师李克忠外,还有黄思礼书后附录《华西协合大学外籍职员名录》中所载的建筑学硕士叶溶清(Abrey, F. E. L),他在华大基建部门服务的时间是 1910 年至 1928 年,对华大建设也作出了贡献。但华西协合大学基本的中西结合建筑构思还应归功于其原始方案的设计人英国建筑师弗烈特·荣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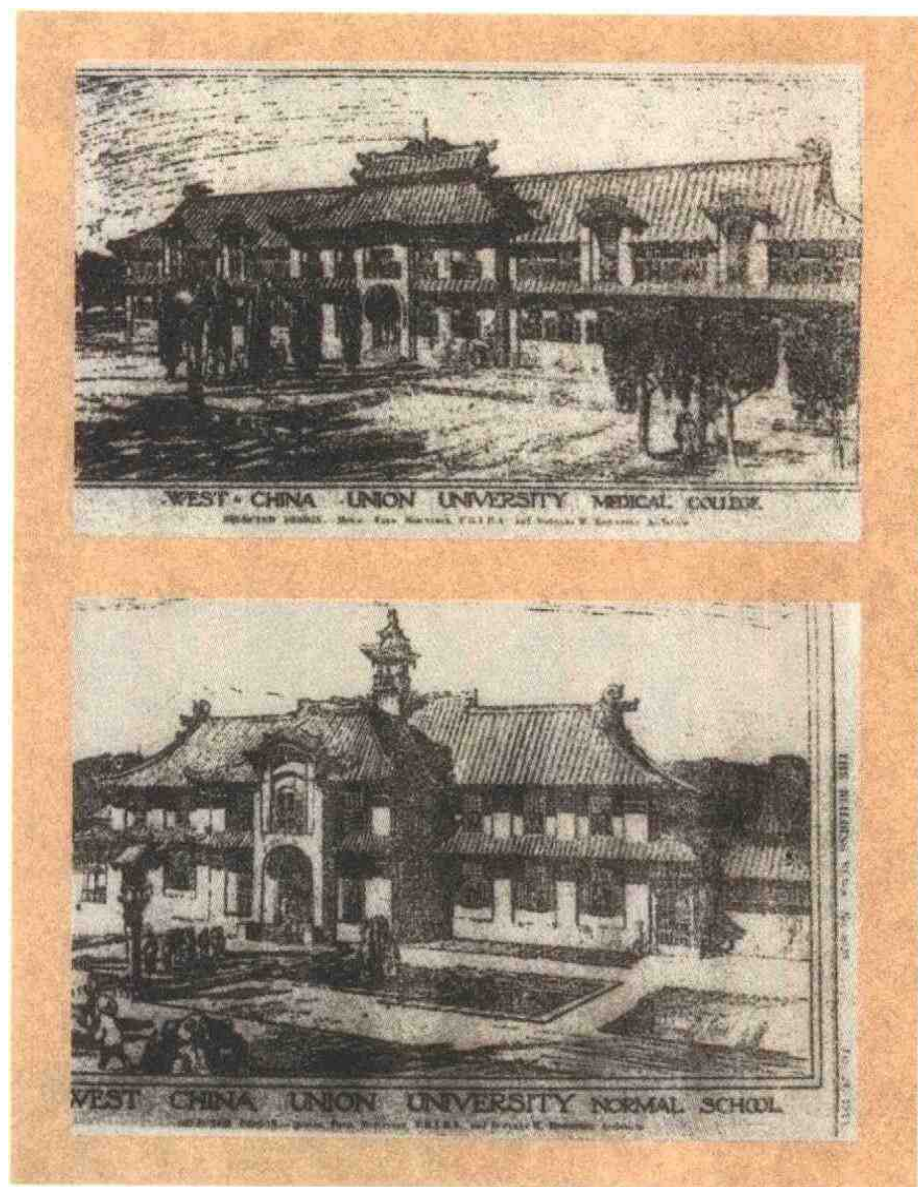


图 6-1-6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校舍建筑的原始设计图。上图:医学院;下图:师范学校。原图载《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校舍建筑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早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舍建筑的基本模式,体现了西方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及用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处理过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主要是屋顶。早期在教会大学单体建筑设计中尝试中西建筑形式融合的西方建筑师尚不能领悟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他们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中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屋顶,在屋顶中又选择了造型丰富的歇山顶与适合方形塔楼使用的四角攒尖顶。他们似乎更钟爱重檐屋顶造型,圣约翰大学怀施堂的钟楼是两重檐,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的塔楼已经是三重檐。从西方建筑方案构思的基本思维方式出发,强调的仍然是西方式的建筑体量组合,力求使每一个单体建筑都有丰富的建筑形体构成,这是早期西方建筑师创作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最宝贵的设计构思精华所在。

1914年以后,华西协合大学校舍建筑陆续建成,包括贾会督纪念楼及亚克门纪念楼(1914),怀德堂(事务所,1919),万德堂(万德门纪念学院,1920),合德堂(赫斐学院,1920),嘉德堂(生物楼,1924),雅德堂(广益学舍,1925),钟楼(1925),懋德堂(图书馆,1926)及嘉德楼(教育学院,1928)等。^[29]这些建筑在维持1912年荣特易初始方案的基础上,于建造过程中作了一些改动,但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建造的华西协合大学校舍建筑基本上维持了统一的风格,是早期西方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系列作品。(图6-1-7,6-1-8,6-1-9)



图6-1-7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怀德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图6-1-8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雅德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图 6-1-9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嘉德楼。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1920年建成的合德堂仍使用西方建筑体量组合的设计手法,将采用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方形平面塔楼与采用单檐歇山顶的主体建筑相互穿插,形成建筑的基本形体构成。但方塔不是从主体建筑坡屋顶正中的屋脊处对称插入,而是从主体建筑的前半部分屋顶插入。这是只有西方建筑师才有的建筑形体构思,将西方平屋顶建筑常规使用的塔楼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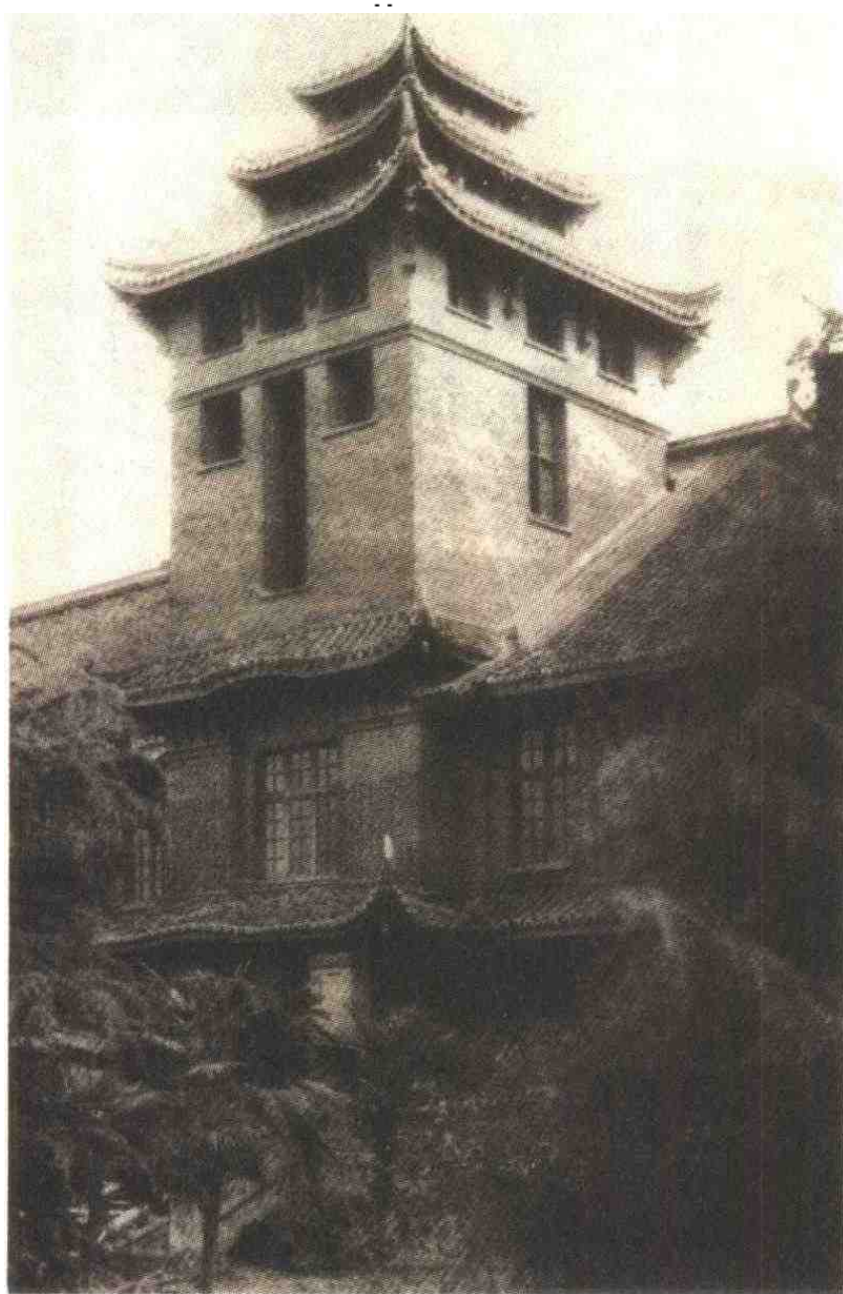


图 6-1-10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正面外景,塔楼与主体建筑形体穿插,是用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处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的早期尝试。原图载《华西协合大学》。

主体建筑的组合模式,运用于使用中国传统坡屋顶的建筑,大构思尚有新意,但由此产生的建筑形式处理的难题并没有解决,这也许是方案设计阶段西方建筑师没有想到的。西方建筑形体穿插的设计手法运用于使用中式坡屋顶的建筑,带来许多建筑细部处理的难题。合德堂塔楼平面的外墙较主体建筑外墙稍稍凸出,以强调建筑的主入口,这本是西方建筑的常规设计手法,但因此塔楼就切断了坡屋顶的挑檐,于是在塔楼二层另做一道披檐,这道披檐不仅破坏了塔楼的竖向体量感,其与主体建筑的坡屋顶也处于互不相干的尴尬地位,最终只好随意处理,不了了之,这就是建筑设计中的败笔。而产生这种败笔的缘由则是因为西方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很不熟悉,因而难以驾驭,在方案设计阶段尚不能预见到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处理的复杂性。(图 6-1-10, 6-1-11)



图 6-1-11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背面外景，塔楼与主体建筑有脱离之感，成为整体建筑形式构成的蛇足。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相比之下，同是 1920 年建成的万德堂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就较为成熟，同样是在正门入口处将局部平面稍稍凸出以强调主入口，但万德堂的这部分建筑体量不再处理成塔楼，而是按平面垂直相交的屋顶的常规手法处理。入口处局部凸出部分的屋顶做重檐歇山顶，重檐的下檐与主体建筑坡屋顶的檐口等高，檐口交圈，建筑细部处理就没有明显的败笔。入口三个半圆拱门之上另做仿牌坊式的屋顶，楼前设直达二层的大台阶。于是在建筑入口处形成壮观、丰富、中西混杂的建筑构图中心。万德堂的建筑细部处理也独出心裁，檐口之下不做斗拱，而用 45° 斜撑支撑挑出的屋檐，屋脊之上，还有一匹生有双翅的飞马，但青砖青瓦，朱红色的封檐板，中国式的大屋顶，四角高高翘起的飞檐，大体上又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形式特征，还具有四川传统建筑的地方特色。早期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尝试，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性，因使用当地地方材料，由中国工匠施工，也许还掺入了民间工匠的局部创意，与后来刻板僵化地模仿中国宫殿建筑的教会大学校舍相比，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早期校舍建筑更生动，更丰富，也更具启示价值。(图 6-1-12)

图 6-1-12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万德堂，同样使用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处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构成要素，处理手法较为成熟。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值得一提的还有钟楼，钟楼似乎并无特定的功能，只是一座标志性建筑，一组建筑群，总希望有这样一座标志性建筑。脱离了功能要求，耗资较少，建筑师也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钟楼使用了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形制之中最复杂的十字脊歇山顶，却独出心裁，在十字脊歇山顶之上





图 6-1-13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钟楼。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再插入一个尺度略小的方塔,小方塔之上再做四角攒尖顶。这也许可以用不伦不类来描述,也许可以用构思奇特来赞美,见仁见智,均无不可,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对中国传统建筑一知半解的西方建筑师才能有这种构思。但这正是华西协合大学早期校舍建筑的独到之处,反映的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西方建筑师的设计思路,西方建筑师在这种设计思路的指导下重新组合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可以说它们不像,但不宜说它们不好。(图 6-1-13)

正是沿着这种设计思路,西方建筑师也把西方建筑纵向展开的室内空间引进了华西协合大学的懋德堂(图书馆)。建筑细部处理都是中国式的:中式栏杆、雀替、天花藻井,但室内建筑空间已经完全西化了。我们可以把华西协合大学懋德堂(图书馆)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早的中庭建筑。懋德堂虽于 1926 年建成,但其

中庭室内空间的基本构思在 1912 年的初始方案设计中已经形成。其后,美国建筑师凯尔斯(F. H. Kales)设计的武汉大学工学院(1928 年设计)采用了钢屋架玻璃屋顶的五层中庭,室内装修仍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细部处理手法,也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图 6-1-14, 6-1-15, 6-1-16)

图 6-1-14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懋德堂(图书馆)。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与华西协合大学几乎同时建设的还有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大学于1910年由南京的几所教会学校联合组成。1906年,南京基督书院(1891年创办)与益智书院(1894年创办)合并成立宏育书院,1910年,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1888年创办)合并,成立金陵大学,汇文书院院长包文(A. J. Bowen)任首任校长。“1913年,金陵大学校园规划由美国纽约的建筑师凯蒂·X.克尔考里(Cody. X. Crecorey)完成。”^[26]其后,校舍建筑陆续建造,金陵大学早期校舍建筑中最有特色,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是由先后建造的三幢校舍建筑组成的建筑群体:北大楼(文学院,1919年竣工)、东大楼(理学院,又名科学馆,1912年或1913年竣工)、西大楼(农学院,又名裴义理楼,1926年竣工)。(图6-1-17)研究金陵大学的这组建筑有一个难题,即东大楼建造年代及其建筑师的确定。北大楼建成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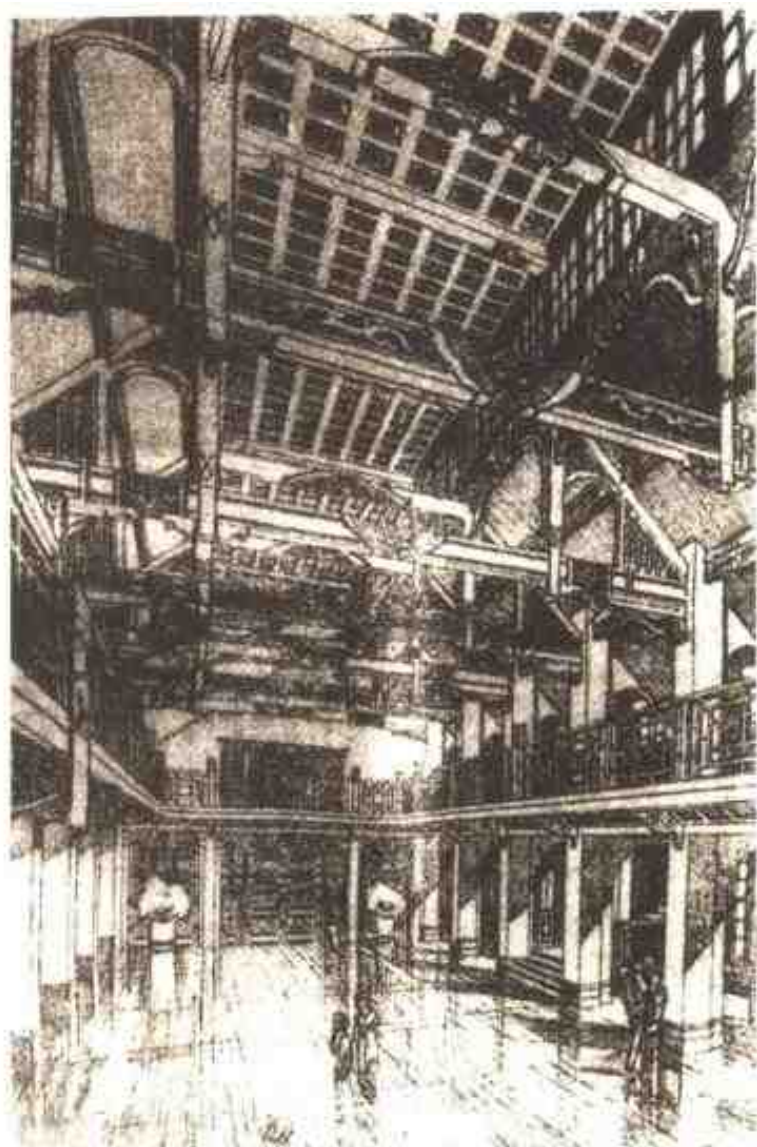


图6-1-15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懋德堂(图书馆)室内中庭原始设计图。原图载《华西协合大学》。



图6-1-16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懋德堂(图书馆)室内中庭仰视。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陈重庆稿)。

1919年,西大楼建成于1926年,由美国建筑师司马(A. G. Small)设计,这一点没有太多疑议。^[27]东大楼由齐兆昌设计,建成于1912或1913年,则有较大疑议,本书暂取此说。^[28]但齐兆昌是外国建筑师的中国名字或者是中国建筑师,亦无考证,暂存疑。(图6-1-18)

金陵大学东大楼形体规整,青砖青瓦,亦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单檐歇山顶。但这个歇山顶却不甘遵循常规,将正立面中部三分之一的屋顶向上延续升起,于是屋脊背立面形成建筑形体中部三分之一的整体体量升起,设计构思的出发点仍然是西方建筑的体量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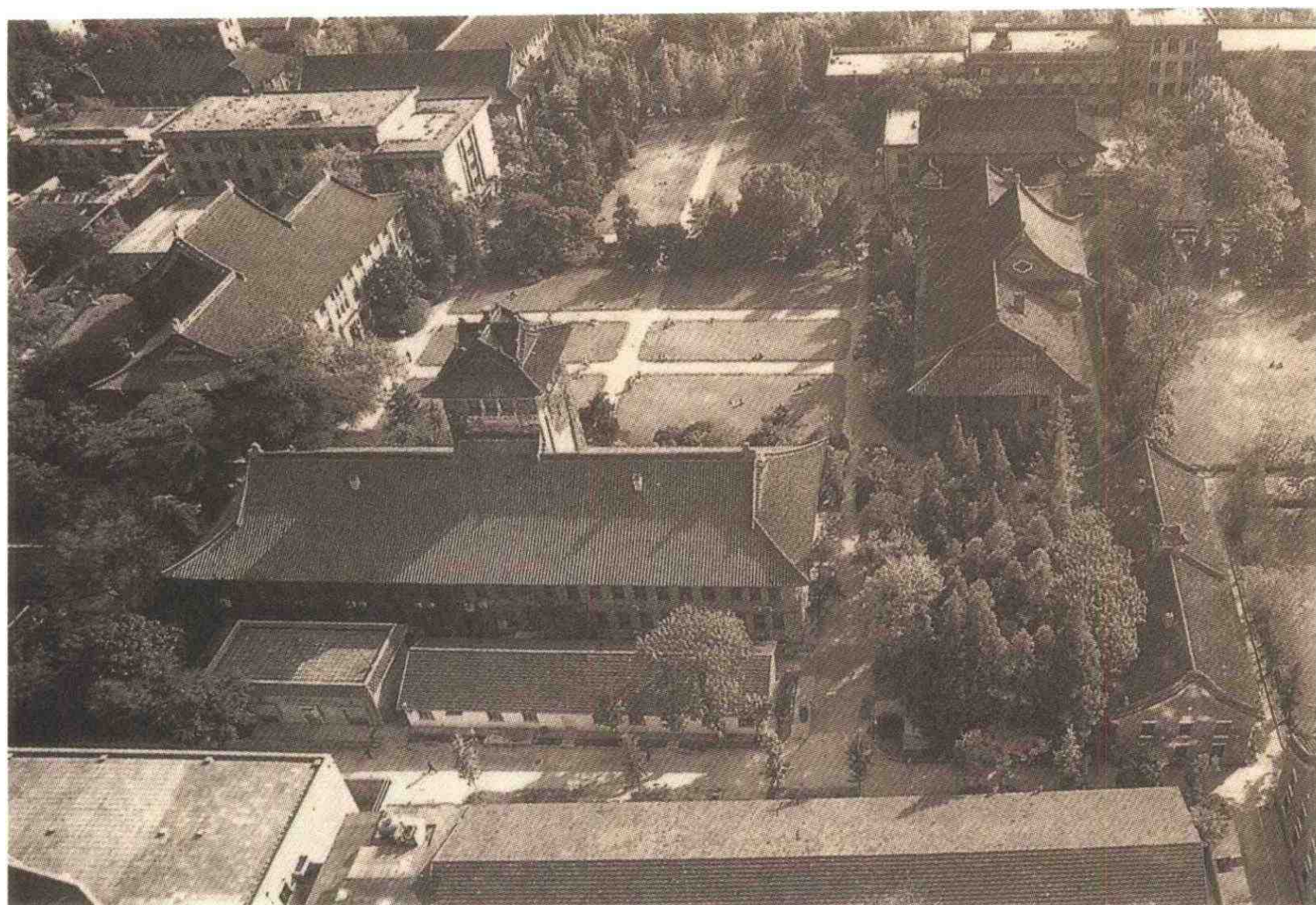


图 6-1-17 南京金陵大学先后建造的三幢校舍建筑——北大楼、东大楼与西大楼组成的建筑群鸟瞰。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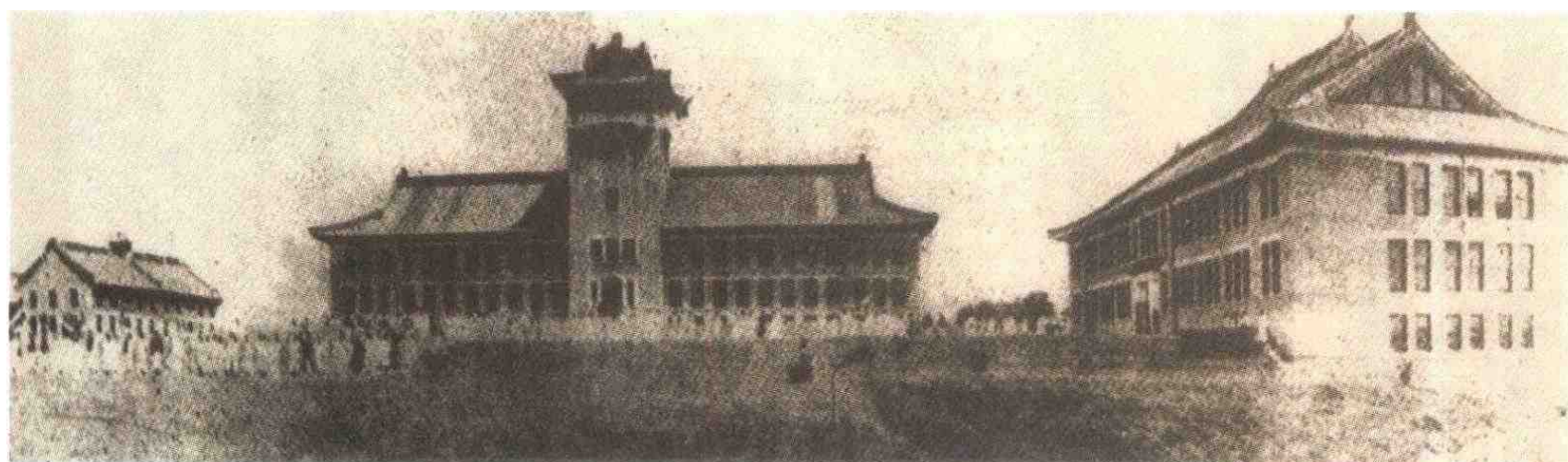


图 6-1-18 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与东大楼的照片，其时西大楼的位置还是一栋二层小楼。可证东大楼在西大楼之前建造。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

设计手法，仍然是中国传统屋顶的西方式变异。这是早期西方建筑师从西方建筑体量组合的基本设计思路出发，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屋顶)施以西化的建筑处理而产生的设计构思。建筑建成后设计效果的评价尽可见仁见智，作者就很赞赏，也并不认为有正立面不如背立面之嫌，而认为正立面的设计手法趋于创新，是有创意的设计构思思路；背立面则是正立面的创新构思带来的副产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与上述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一样，也是建筑师因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很不熟悉而产生的。(图 6-1-19, 6-1-20)东大楼虽有颇具创意的设计构思，却只是很不成熟的初步探索，但其基本的设计构思思路是正确的。六十年后建造的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王大闳设计，1972)被誉为极富创造力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其基本构思思路与金陵大学东大楼是相同的，将二者作一比较，只是同一设计思路在不同档次的建筑师笔下不同水平的发挥。从这个角度推断，齐兆昌或许是西方建筑师的中国名字。十几年后建造的西大楼是东大楼的翻版，不必多论，值得详细论述的是北大楼。

塔楼是西方建筑形式构成要素中的精华，一幢建筑，或一组建筑群，有了塔楼，就有了一个形式构图中心。所以西方建筑中塔楼比比皆是。教堂自不必言，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佛罗伦萨市政厅的方塔，罗马卡比多广场元老院的塔楼，彼得堡海军部大厦的中央塔楼等等，形式各异的塔楼都成为建筑形式构图的主角，可以说，没有塔楼，这些建筑

或建筑群就失去了生气。塔楼的作用是形成高耸的竖向体量,与横向展开的建筑主体形成对比,这是建筑形式美的基本原理。西方建筑师来到中国,也将西方建筑的这种形式构成手法带到中国,或应用于克隆西式建筑,或应用于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如前文所述,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及校舍建筑群中的钟楼,都是这种西方设计观念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主要是屋顶——相结合的产物。与上述三例相比,金陵大学北大楼设计构思更成熟一些,但基本的矛盾——西方建筑重体量组合的建筑形体构成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成熟的、已有定制的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的矛盾,仍然没有完美解决。北大楼的设计构思简单明了:在方整的主体建筑上扣上一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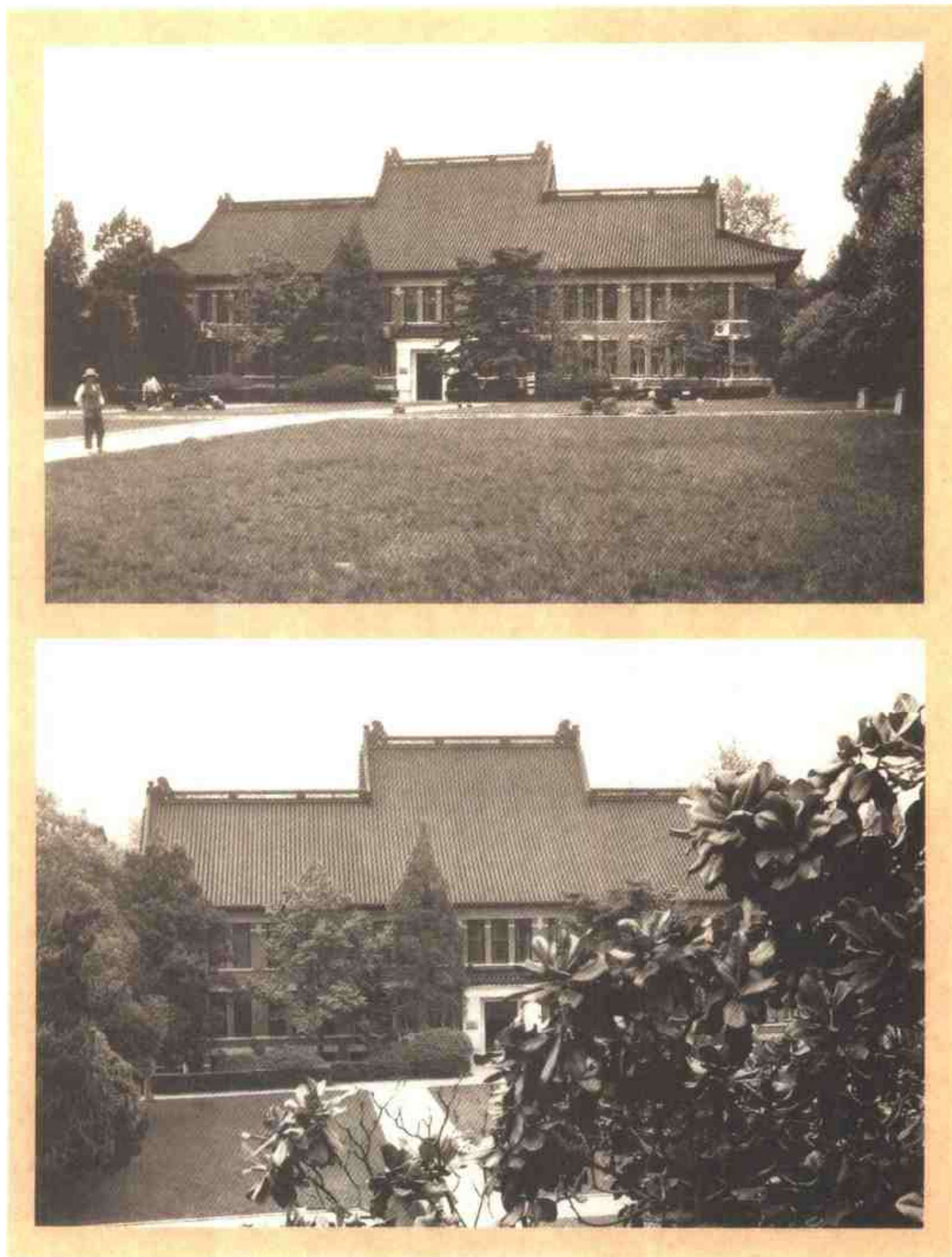


图 6-1-19 南京金陵大学东大楼与西大楼正面外景。上图:东大楼;下图:与东大楼建筑形式完全相同的西大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图 6-1-20 南京金陵大学东大楼背面外景。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

因传统的歇山式屋顶,形成横向展开的二层主体建筑,然后在建筑正面的中部插入方形平面的塔楼,塔楼的顶部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制中最复杂、最丰富、最具形式美的十字脊歇山顶。北大楼塔楼的进深约为主楼进深的一半,但塔楼平面较主楼稍稍向前凸出,以突出主入口的构图中心地位,于是塔楼就穿插在歇山式屋顶的前半部分,嵌入正面的半个坡屋顶之中,从正面观赏,建筑形式美的推敲完美而颇富创意,但是从背面考察,塔楼与主体建筑歇山顶的关系处理得就比较牵强,有塔楼脱离主体建筑的蛇足之感。但北大楼的特殊地形环境使人没有从背面观赏的足够距离,这只是职业

研究者详细考察才能得到的体验,普通民众,甚至一般的职业建筑师都不会在这种特定的地形环境中如此苛刻地观察一座建筑。从总体上看,北大楼已经是中西建筑融合的探索进程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与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相比,北大楼建筑处理简洁明了,塔楼直上直下,只在顶层于四面各设一阳台略作点缀,没有明显的横向构图要素破坏塔楼竖向构图的整体感。主体建筑虽然只有二层,但约占建筑立面高度五分之二屋顶调整了主体建筑的比例,使其横向展开的建筑体量的高宽比约为一比四,也使屋顶在主体建筑的体量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塔楼宽度约为主体建筑宽度的七分之一,高度约为主体建筑高度的二倍,塔楼自身的高宽比约为三比一,塔楼与主体建筑自身及二者之间的比例都很完美。(图 6-1-21,6-1-22,6-1-23)

图 6-1-21 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外景之一。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二十世纪初，教会大学校舍建筑规模尚小，都是二三层建筑，与多为单层建筑，但层高亦相当于教会大学的二三层校舍建筑的中国传统宫殿庑宇建筑体量接近，建筑功能也相对简单，所以采用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的难度就相对小一些。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中国建筑师已面临着在规模更大、功能复杂的建筑设计中采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挑战，那难度就要大得多，这是后话，当在本章第二节论述早期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采用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对我们的启示是：中西建筑有完全不同的建筑形式构成观念，早期西方建筑师为我们带来的是建立在西方建筑形式构成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这与后来墨菲等西方建筑师刻板僵化地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思维方式不同。但是中国建筑师中的佼佼者是很理解这一点的，而他们无论在建筑才华上，还是在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理解上都远在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西方建筑师之上，所以他们创作的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如吕彦直的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杨廷宝的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南京中央医院等，其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外国建筑师的同类建筑作品。



图 6-1-22 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外景之二。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图 6-1-23 从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背面看屋顶与塔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弄清楚这一概念，才能对早期西方建筑师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作出准确评价，并对今后中国建筑师在这一领域的继续探索有所启示。

论述西方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历程，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建筑师墨菲及其作品。墨菲因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中先后主持设计了长沙雅礼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而名声大振，被热衷于推行“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建筑顾问。^[2]墨菲早期来华创作的建筑作品与一般西方建筑师无异，亦属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范畴。如 1914 年后清华学校扩建，即由墨菲制订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1916~1920 年建成的主要建筑——图书馆（东部）、科学馆、体育馆（前部）和大礼堂——都由墨菲主持设计，也都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校园建筑风格。他早期在中国的建筑作品还有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汉口美商花旗银行（1921）。墨菲于 1919 年接受委托承担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与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的校舍设计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长沙雅礼大学的校舍建筑设计。从长沙雅礼大学校舍建筑设计开始的对教会大学校舍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使墨菲名重一时，因而受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器重，有机会在燕京大学新校园建筑设计中一显身手，完成了他在华建筑设计事业的巅峰之作——燕京大学校园规划与校舍建筑设计。

墨菲在中国的机遇与当时中国的人文社会背景密切相关。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进入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阶段，中国社会的巨变引起教

会的注意,并决定采取应变措施。1915年举行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二届年会提出组织中国教育调查团来华,1917年4月11日纽约各差会总部批准了这个建议,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延至1921年9月13日,中国教育调查团的全体成员才在北京会合。调查团分别到了中国的36个城市以及香港、马尼拉,调查了近500所各类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官立、私立学校,历时四个多月,至1922年1月结束。此次调查团调查的结果,是提出了应付中国社会挑战的教会学校的新口号:“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这些事实把教会学校放在完全不同于几年以前所占有的地位,以前几乎只有教会学校在中国是采用新式方法教学的。现在是意味着,要从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竞争已是不再有任何可能了。这种竞争已经过去,前十五年中国人设立的学校数已经获胜。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惟一地放在质量上。……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我们根据近年来教会学校的发展和当前发展中所提供的新机会作出的清醒的判断,就是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30]如前文所述,也正是在1922年,开始了自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并导致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的决策。1915年至1927年中国社会的巨变,使教会大学的领导者们认识到教会大学“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的必要性与紧迫感。司徒雷登云:“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地基督化,而同时又要甚至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31]为此,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针归结为四个方面,在校园环境方面是“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32]

于是为“基督化的目的”而实施的教会大学校舍建筑的中国化成为这一时期进入建校高峰期的几所教会大学的共同目标。1919年,墨菲大学毕业已经20年,正值一个建筑师的创作盛期,在长沙雅礼大学初试身手,得到好评,于是其他几所教会大学也相继选择了墨菲。墨菲也就停止了如汉口美商花旗银行那样轻车熟路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创作,转而主要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

1916年2月16日,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开学,1917年,开始了购买校址土地的谈判。“永久校址购买后不久,董事会要求沙特克——赫西的芝加哥建筑公司提供一份校园布局的整体设计。由于某种原因,画出的这张设计图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的地形特点,所以从一开始就毫无用处,如今已被遗忘了。1919年10月10日,墨菲——达纳建筑公司受聘根据实际情形绘制了设计图,并且连续几年提出了令人满意的工作目标,虽然这从来也没有完全成为事实。……他放弃了模仿西方大学校园建筑的一切尝试,大胆地将东方的庙宇式屋顶置于西式的科学馆和宿舍之上。”“校舍的实际修建是从1919到1923年由庄才伟聘请的美国工程师米尔斯(C. B. Mills)指导的。米尔斯离开后,福州美以美会的附属机构——福建建工局接管了校园建设,并得到物理学教授马丁(F. C. Martin)的帮助。”^[33]

几年之后,福建协和大学校舍建筑陆续建成,罗德里克·斯科特这样夸奖这些建筑:“两幢建筑在1924到1927年分别竣工。每座建筑有一个壮丽的‘亨利·K·墨菲式教堂屋顶’。的确,20英里远都看得见的建筑被农夫称作‘大学教堂’。”^[34]墨菲式的摆放在西式建筑之上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歇山顶居然成为“大学教堂”的象征,这也许正是教会大学的校长们所希望的。(图6-1-24)

图6-1-24 俯瞰闽江的福建协和大学校园,每座建筑都有一个“亨利·K·墨菲式教堂屋顶”。原图载《福建协和大学》。



1915年9月17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开学,1916年开始购买校址土地。金陵女子大学校舍建筑也由墨菲设计,“1919年7月,当金陵女大的校长继续其休假,以便利用在美国的机会同金陵学院委员会的成员接触,并同他们一起为这个年轻学校的未来工作之时,她随身带上了一套学校所需楼房的建筑计划,此前一年,大量的时间花在同董事部选派的默非——丹那公司的建筑师亨利·K·默非(引者注:即墨菲)先生(Mr. Henry Killiam Murphy)讨论建筑计划上了。这家纽约的建筑公司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办事处,默非先生对于采纳中国建筑艺术来修建近代学院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为金陵工作之前,他已经在雅礼‘练了一番手艺’。在金陵工作时,他兴味盎然。当美梦成真,9幢楼房耸立在校园中,他感到了极大的满足。”^[35]

1921年开工兴建的校舍建筑于1923年秋季竣工,刚刚赶上新学年开学。墨菲的作品得到了校方的赞誉:“新楼群共有6幢楼房,其中3幢是学院楼,3幢是宿舍。……社会和体育专业的教学楼,作为史密斯学院女校友赠送的礼物,在整个建筑楼群中格外引人注目,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当时将中式建筑风格用于现代建筑的典范。”^[36]墨菲的功绩是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中使用了用钢筋混凝土制造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但对中国传统建筑一知半解的墨菲,其笔下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构成要素也同样似是而非,如金陵女子大学主楼檐下的斗拱就不置于柱顶之上而与柱头错位均匀排列,成为脱离建筑结构逻辑的纯装饰品。(图6-1-25,6-1-26,6-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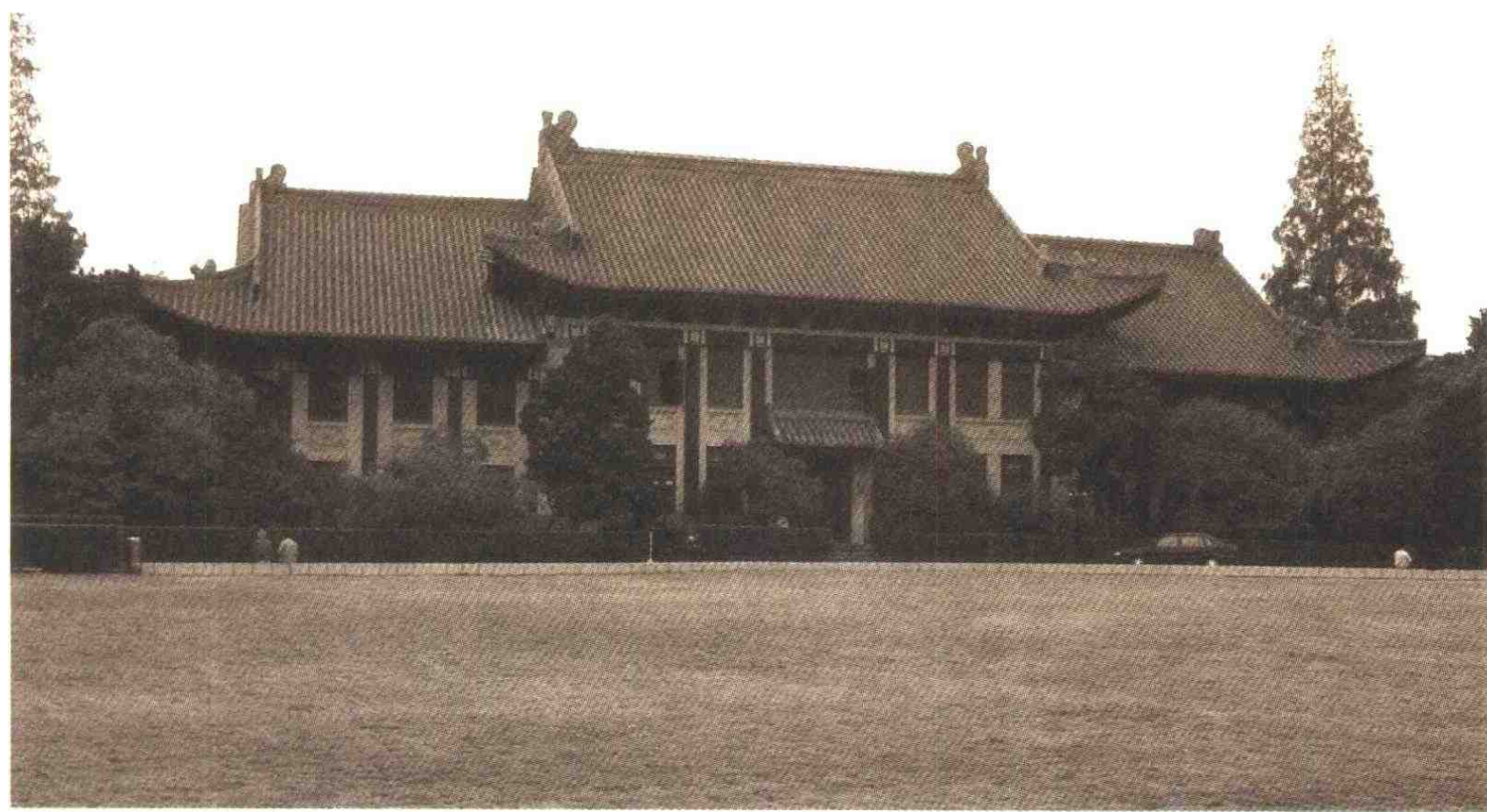


图6-1-25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楼。照片由作者摄于2001年。

墨菲的巅峰之作是北京燕京大学校舍建筑。1918年12月3日,设立在纽约的董事会正式决定聘请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1919年初,司徒雷登来到北京亲身考察,不久,他接受任命并按自己的计划开始了对燕京大学的改造,在使燕京大学有一个中国式环境的思想的指导下,司徒雷登决定另择新址建校。“对于校址问题,为了减少原合并学校的扯皮现象,也为了今后学校的发展,司徒



图6-1-26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楼屋顶。照片由作者摄于2001年。



图 6-1-27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楼。檐下的斗拱不置于柱顶之上而与柱头错位均匀排列。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雷登决定另择佳处,建一个全新的校园。他和其他人靠骑驴、步行和骑自行车转遍北京四郊,最后在城北海甸买下陕西督军陈树藩的 40 公顷土地,以后又在附近买些荒废田园,使燕大有了修建新校园的地皮。”^[7]墨菲应司徒雷登之聘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他在燕京大学重复了福建协和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的“亨利·K·墨菲式教堂屋顶”,只不过燕京大学校舍建筑的屋顶种类增加,有使用歇山顶的办公楼(1920 年设计,1927 年竣工)与图书馆(1920 年设计,1926 年竣工),也有使用庑殿顶的外文楼(1920 年设计,1926 年竣工),还有使用重檐四角攒尖顶的南北方阁(1920 年设计,1924 年竣工),更有模仿清代府第门殿的大门与仿辽代密檐塔的水塔等,可谓品种齐全,但这种墨菲式的中国民族形式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仍然只停留在略有进步的模仿阶段,并无新的创意。(图 6-1-28,6-1-29,6-1-30)

塔的水塔等,可谓品种齐全,但这种墨菲式的中国民族形式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仍然只停留在略有进步的模仿阶段,并无新的创意。(图 6-1-28,6-1-29,6-1-30)



图 6-1-28 北京燕京大学办公楼,楼前华表取自圆明园安佑宫大殿前。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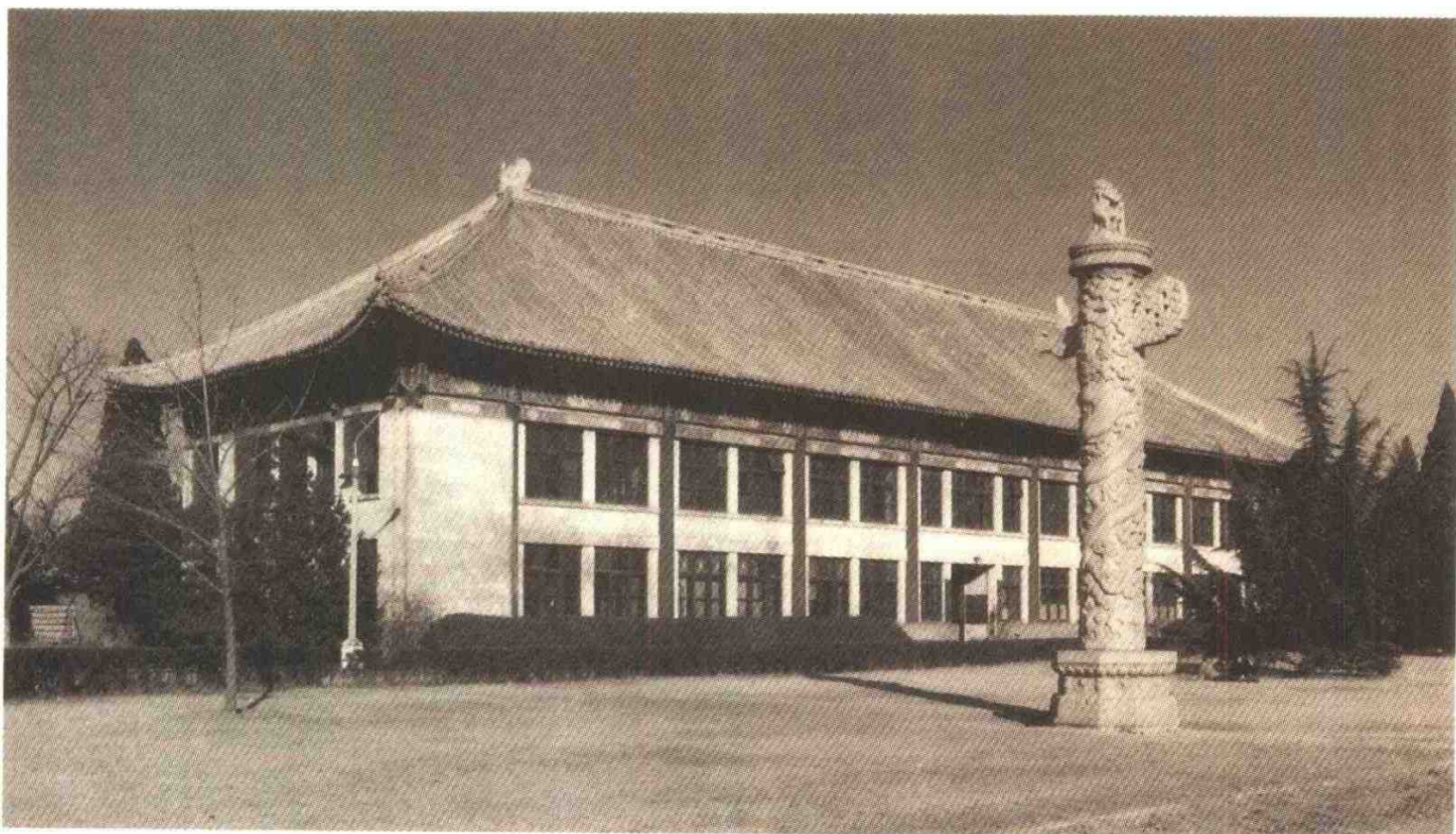


图 6-1-29 北京燕京大学外文楼。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9 年。



图 6-1-30 北京燕京大学南北方阁。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沈阳稿)。

燕京大学的校址得天独厚,位于清代北京西北郊广义的三山五园地带,燕大校园是在清代废园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墨菲的功绩在于对校园整体环境的保护与改造。燕大校园顺应地形地势,结合原有的水系山形,校舍建筑采用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设计手法,以未名湖为中心,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手法分组布置,形成一组组三合院式的建筑群,格局完整,区划明确,也注意到轴线对应关系。燕京大学建筑多为二三层建筑,体量不大,掩映于绿树碧水之间,环境之美,已使建筑本身退居次位。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工产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尺度关系是第一位的,人造的建筑物尺度较小,如燕园建筑掩映于参天大树之中,那环境就仍是自然环境;人造的建筑物尺度过大,如今日北大新校园之大体量建筑密集,建筑成为主体,绿地草坪只是点缀,就成了人造环境。用丁字尺三角板画出来的人造环境如何能与自然环境相提并论呢?社会发展,人口剧增,大城市中人造环境取代自然环境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北大新校园的建设也无可非议。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墨菲在燕京大学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燕大校址的天然地利条件,及墨菲对这种地利条件的保护性使用。至于燕大的建筑,仍然是在重复墨菲式的老套路,虽然增加了屋顶的品种,并无多少创意,而将水塔建成密檐塔的形式更是不伦不类。

为了使燕京大学的中国味更浓,燕大还从圆明园搬来许多建筑小品,点缀于校园之内。“前燕京大学建筑校舍(现为北京大学校舍)时,美国牧师翟伯在圆明园取材最多,比较著名的遗物有安佑宫华表三根(原书注:前燕京大学取走华表三根,另外一根被军阀运至天安门,后来北京图书馆建馆时,将天安门这一根运去,又将前燕大多余的一根拿来,凑成一对。这两对皆取自安佑宫大殿前),龙凤丹陛台阶石一块,汉白玉麒麟一对(以上物品现都在北京大学办公楼前),长春园西洋楼的“海晏堂”前喷水台两座(现在北大西校门内南路)。此外尚有观水法宝座正面的石屏风五块,本来也放在北大朗润园内,尚完好如新,上面刻有西洋甲冑枪炮武器花纹,此五块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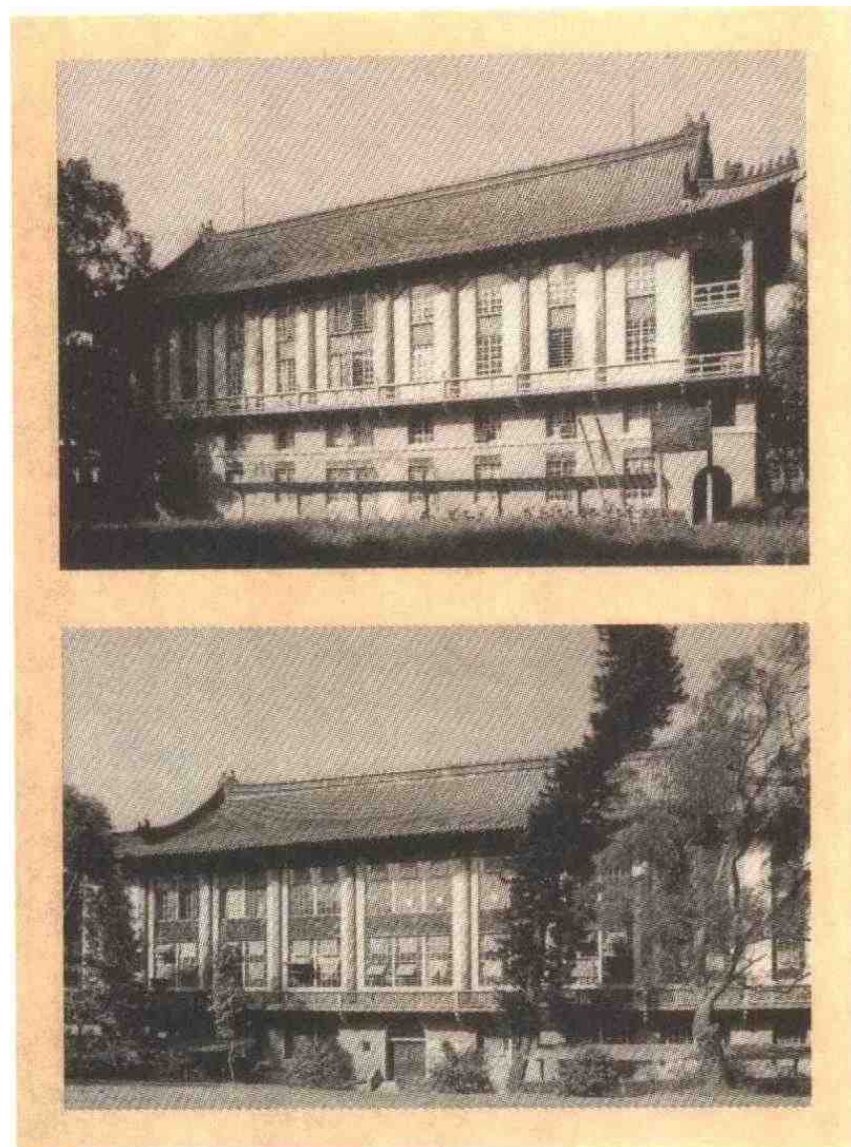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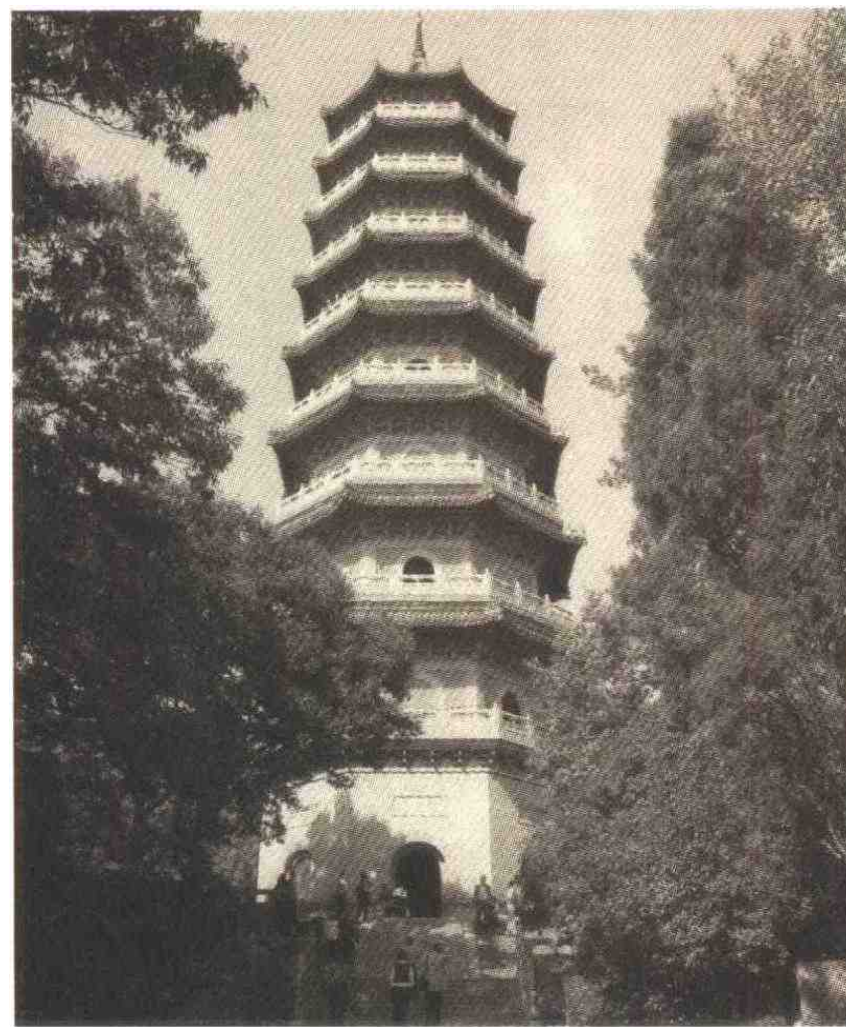


图 6-1-31 墨菲在岭南大学的建筑作品。上图：哲生堂；下图：陆佑堂。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谢少明稿）。

图 6-1-32 墨菲的建筑作品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今灵谷寺塔）。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屏风为载涛所运，现已由圆明园管理处诸同志的努力，将这五块石屏风放在观水法宝座正面的原来位置上。此外尚有‘方外观’前的石平桥一座，现建在北大校园里去岛亭的路上。另外散在北大校园内尚有很多西洋楼的精美雕刻，但未被利用，多散在北大民主楼的前后。”^[10]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是对圆明园文物的一种保护，也反映了当时燕京大学对中国建筑环境的追求，但已与建筑师的设计无关，只是燕大人文背景的一种反映。

墨菲后来的建筑作品还有岭南大学惺亭（1928 年设计）、哲生堂（1930 年设计）与陆佑堂（1930 年设计）及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今灵谷寺塔，1929 年）等，这些作品始终停留在用钢筋混凝土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阶段，虽然模仿的相似程度逐渐提高，但设计构思始终没有创意（图 6-1-31，6-1-32）。综观墨菲的建筑作品，拘谨而缺少创意，刻板而千篇一律，已经失去了他的前辈西方建筑师的创造力，从来也没有显示出大师级建筑师的想像力。墨菲生逢其时，1920 年前后，教会大学的建筑观念已经转变，优秀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或者还在留洋学习，或者刚刚开始建筑师的职业生涯，于是时代的选择就只有墨菲。几年之后，才华远在墨菲之上的中国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崭露头角，墨菲就完成了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特定阶段的特定使命，让位于朝气蓬勃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

三、题外补述——美国建筑师凯尔斯与国立武汉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与校舍建筑设计

虽然已在本节的论述范畴之外，最后仍然应当补充论述的是西方建筑师在教会大学范畴之外的国立大学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美国建筑师凯尔斯（F.H.Kales）与他的建筑作品国立武汉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

1928 年，国民政府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同年成立武大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任委员长，选址于武昌东湖之滨的珞珈山。1929 年 3

月1日工程破土动工,至1935年,除大礼堂、总办公厅及农学院、医学院外,各项工程都已陆续建成。1928年凯尔斯任武汉大学校舍建筑总建筑师。凯尔斯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20世纪20、30年代来华,参与许多大工程的设计。凯尔斯对武大规划的首要功绩是对校园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巧妙利用。总体规划因山就势,利用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侧为低洼地的区域规划校园中心区,低洼地作运动场,南山(火石山)建工学院,北山(小龟山)建理学院,东侧山脊规划了大礼堂。于是形成贯穿工学院、理学院的南北轴线,及由大礼堂延伸至体育场以西的体育馆的东西轴线,空间呼应,地形错落,章法井然却又十分生动而切合地形。中心区西北侧的狮子山从东、北两个方向可远眺东湖,从东湖亦可见狮子山山顶轮廓,凯尔斯遂将图书馆置于狮子山山顶,歇山屋顶高高耸起,文学院、法学院分置图书馆东、西两侧,建筑掩映于山形树木之中,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学生宿舍则在图书馆南侧顺坡建造,层层跌落。建筑师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为武汉大学校园的幽雅环境奠定了基础。(图6-1-33,6-1-34)

凯尔斯设计的这批校舍建筑有意识地追求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大量使用中国的传统大屋顶,并试图用新技术、新材料再现中国的传统大屋顶,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北轴线上的工学院,工学院设计了中央五层高的中庭,并使用了钢结构的重檐四角攒尖顶形制的玻璃屋顶,在当时实在是大胆的设想,又克服技术困难付诸实施,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历程上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但凯尔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毕竟缺乏深厚的根底,武汉大学的这一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还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其中的一些建筑,如体育馆,确有不伦不类之感。于是,凯尔斯就在武汉大学留下了一个相当完美的校园规划与一批尚不成熟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39](图6-1-35,6-1-36,6-1-37,6-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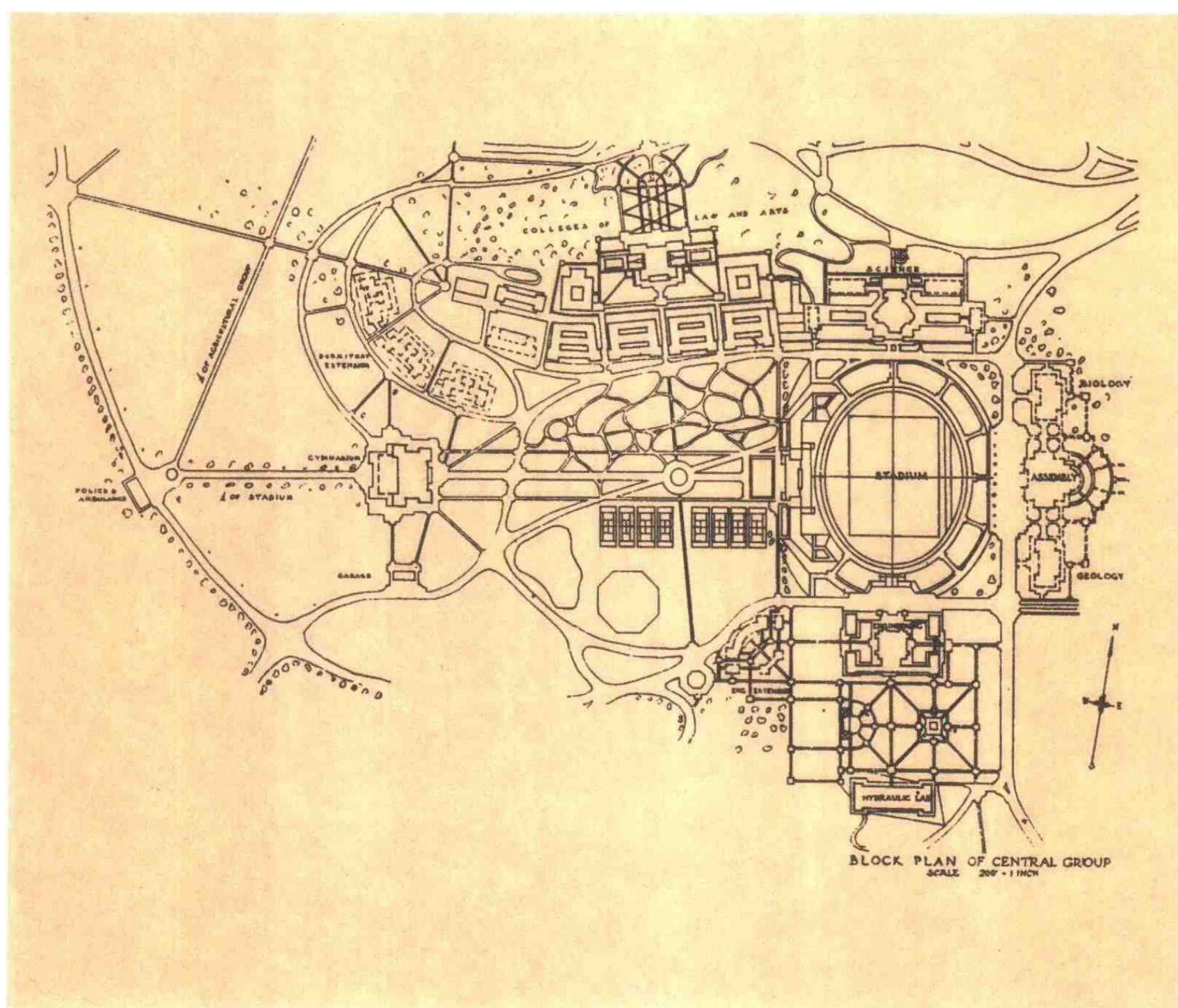


图6-1-33 凯尔斯设计的国立武汉大学早期校园规划图。原图载《建筑月刊》,第四卷,第二号,1936年2月。

图 6-1-34 武汉大学
教学中心区鸟瞰。近
处是重檐四坡玻璃屋
顶的工学院，远处右
侧是穹顶的理学院，
左侧山上是歇山顶的
图书馆。照片由作者
摄于 1988 年。



图 6-1-35 武汉大学
重檐四坡玻璃屋顶的
工学院。照片由作者
摄于 1988 年。



图 6-1-36 武汉大学
工学院五层中庭屋顶
仰视，使用现代技术
建造的钢屋架与玻璃
屋顶，细部处理模仿
中国传统建筑。照片
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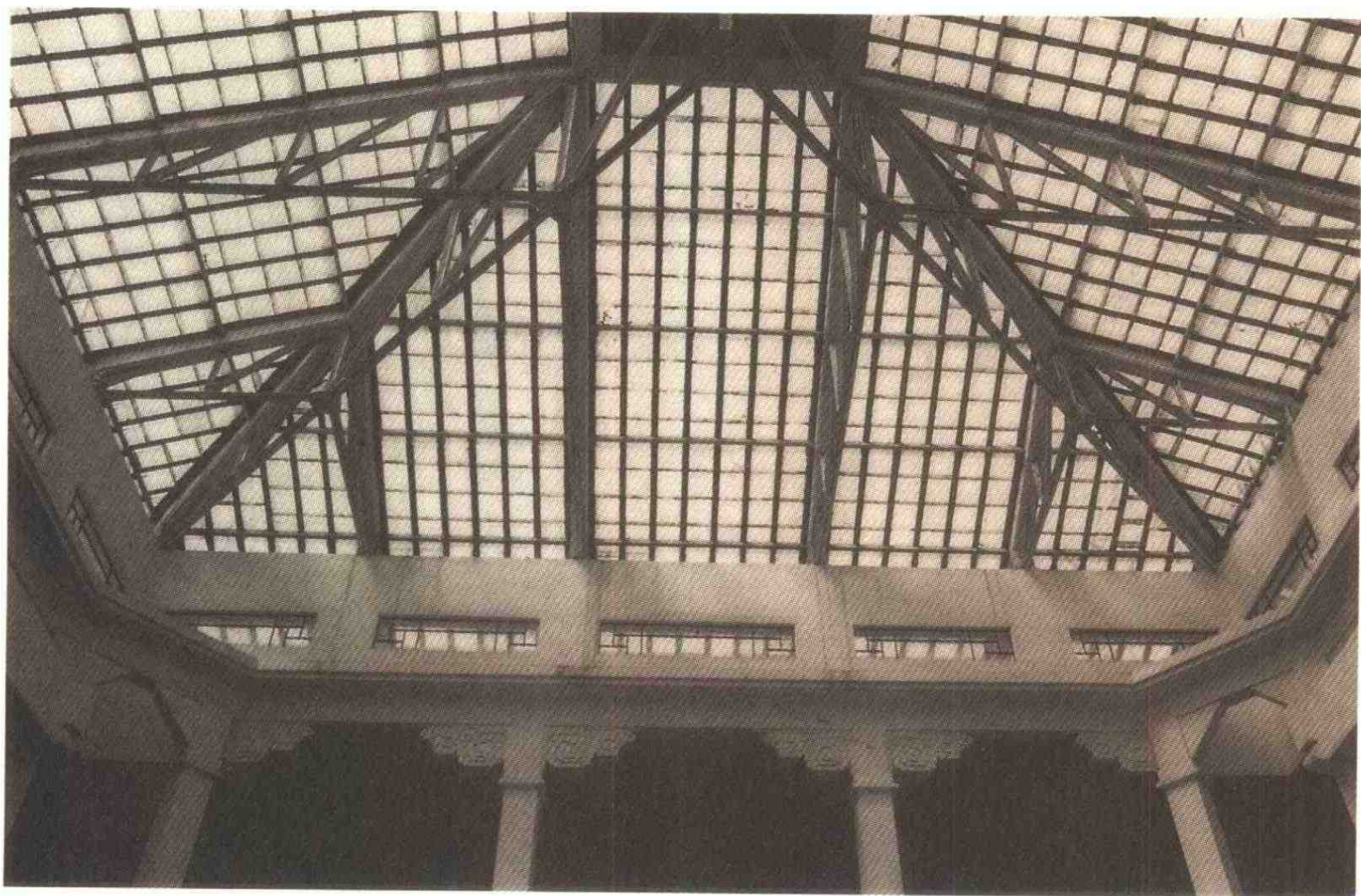




图 6-1-37 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建筑与地形的结合体现了设计者的功力。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图 6-1-38 武汉大学体育馆。不伦不类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第二节 参照体系——清末民初新式官方建筑的全盘西化趋势

一、清末民初新式官方建筑建造的社会人文背景及其整体上的全盘西化趋势

如上节所述,以教会大学建筑为代表的教会学校建筑,自19世纪末叶开始已经呈现建筑形式中国化的趋势,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建筑师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主要是屋顶——应用于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逐渐形成中国化的教会大学校舍建筑模式,开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建筑师有意识地追求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先河。而在同一时期,即清末的最后十年(1901~1911),及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大致是1911~1915),中国的官方建筑却走上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道路——追求西化的建筑形式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国的官方建筑,即政府投资建造的政府机构及一些商会、大学建筑,几乎全部采用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至1915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进入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达到新的高度,关于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争论引发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反映到建筑界,是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掀起的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即“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探索与实践热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政府行为倡导儒学,鼓吹尊孔复古,恢复封建伦理道德。此时日寇侵华野心日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加剧,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潮。于是,在这一时期,以国都南京及上海、广州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为主要舞台,以已经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为主角,在政府行为的引导下,主要在官方建筑领域,掀起一场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热潮,这一时期的官方建筑与清末民初的官方建筑相比,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多数是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就是在这一探索热潮中留下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这次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热潮,是在西方建筑师主要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探索形成的早期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基本模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结果,但思路更开阔,涉及的建筑类型更多、更复杂,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的运用也更自如、更正宗,虽然在当时中国近代建筑以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及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为主流的大格局中,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范围较小,影响不够大,主要局限于官方建筑范畴,也并不能认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风格或流派,而只是一种探索过程中的建筑发展趋势或现象,但其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形成了第一次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热潮,筚路蓝缕,开辟荆荒,功不可没,其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今日反思这一段历史,从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1901~1911)延续到民国初年,因政府倡导学习西方而导致官方建筑的西化趋势,到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倡导下,官方建筑全力追求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二者对照,官方建筑180度的建筑形式反转并非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是当时政府政治上的需要,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风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的外在因素在大多数时间里成为影响中国

近代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反而淹没在社会发展的外在大因素之中，其作用非常微弱，使建筑自身的发展时时处于被动地位，时时被战争、政权更迭与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等社会因素所左右，这是中国近代史百年动乱、百年巨变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的性质——外来因素诱发型发展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的过渡，也是在外部的冲击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巨变影响下导致的突变，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这一进程使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属于社会发展规律，与本书第一章概略论述的人文背景相印证，结论是：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才能真正理解与西方现代(Modern)建筑史发展规律截然不同的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慈禧发布“罪己诏”与“改革”谕旨，谕旨云：“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需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41]令督抚以上大臣限期议奏，这是清末“新政”的开端。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执行“新政”的机构。自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主要措施有四，首先是改革官制，实施了一系列撤销、合并、增设机构职官的措施，使传统的六部建置瓦解，并命令陆续编订各省官制。另一项措施是改革兵制，1901年停止武举，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裁汰一部分绿营与防勇，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新军”。第三项措施是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与“奖游学”三项内容，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奖励自费留学。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随后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并设立学部。第四项措施是奖励工商，1903年商部成立后，陆续颁布《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一系列章程，还颁布了《发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对保障工商业者的权益与提高其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42]

清末实施新政的四项措施之中，改革官制与改革学制对建筑活动的影响最大，前者因各部的设立而产生了建造各部建筑的需求，后者除设立官办大学及建造官办大学校舍外，还推动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热潮，为中国第一代新式学术人才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与建筑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1904年开始，清廷官员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清廷于1905年10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又令政务处设立“考察政治馆”。1906年8月五大臣考察归国后，清廷于9月1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不仅有名无实，而且显露出满族贵族借立宪以集权的种种迹象，引起各省官绅的普遍不满而发动了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作为对国会请愿的回应，清政府于1908年9月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43]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后，不满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诏令认真筹办立宪事宜，要求各省务于1909年内成立省谘议局，10月，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对建筑活动的影响是北京资政院大厦的筹建与各省谘议局建筑的建造。

这一时期随“新政”的实行与“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的开展，建造了一批为之服务的官方建筑，这种建筑活动也延续到民国以后最初的几年，主要是集中建造在北京的一批

图 6-2-1 北京清末陆军部南楼。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沈阳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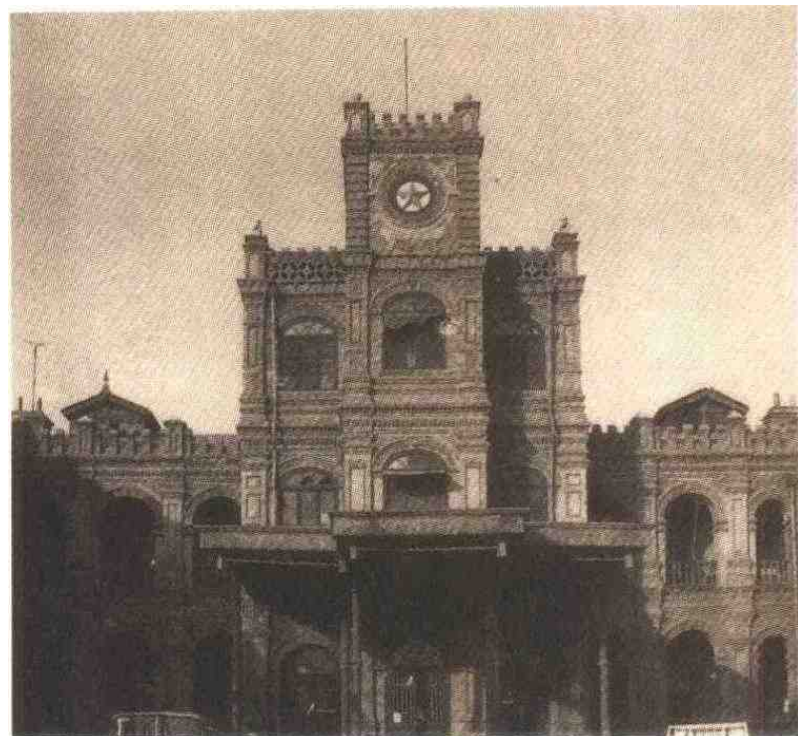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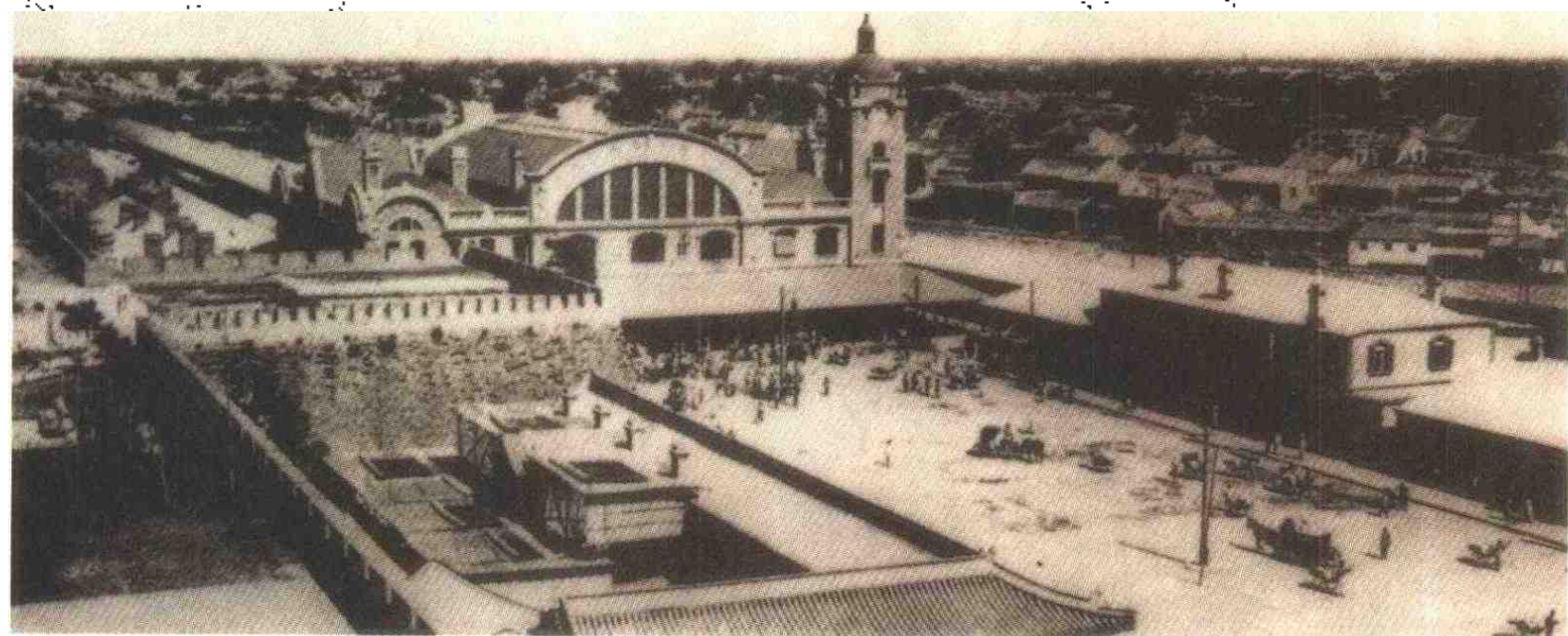


图 6-2-2 北京清末迎宾馆大门。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沈阳稿)。



图 6-2-3 北京京奉铁路前门火车站(东站)。原图载《旧京大观》。



官衙建筑,交通、工业、商贸等公共建筑及新式学校,还有各省建造的谘议局大楼、新式学校等。在北京建造的“绝大多数是官方投资或官督商办的项目,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与政权有关的大型公建,如大理院(1910),陆军部(1907),贵胄学堂(海军部,1909),军咨府(1911),外务部迎宾馆(1910),邮传部(1910),度支部印钞厂(1910~1912),北苑及南苑京旗常备兵营(1904~1905),模范监狱(1910),总税务司(1905),大清银行(1908),资政院(民国国会,1912)等。第二类是交通、工业、商贸等公建,如京奉、京汉、京张铁路各站(1903~1908),电话总局(1910),电灯公司及电厂(1905),自来水公司及东郊水厂(1908),工艺局陈列所(1905),京师劝工陈列所(1906~1908),农事试验场(1906)等。第三类主要是新式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式成立京师大学堂,设在原和嘉公主府内,并在府中建造了一批洋房,又于1908~1911年在安定门外新建分科大学;其后兴建了优级师范学堂(1908),女子师范学堂(1909),清华学堂(1911),五城中学堂(1908),以及法律、医学、测绘、实业、俄文等一批专门学校(1906~1911)。”^[43]这批建筑几乎全部采用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这当然是政府倡导学习西方的结果,作为“新政”及“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的工具的各类建筑,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建筑形式。(图 6-2-1,6-2-2,6-2-3)

其时,随资政院的设立,在北京还有资政院大厦的建设,但是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已经建造了基础工程的资政院大厦亦半途而废。1909年8月颁布资政院章程后,资政院即奏请于内城东部观象台西北的贡院旧址建造资政院大厦,明确提出“应按照各国议院定式先事筹备”,并获准建造。“资政院暨上下议院均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Curt Rothkegel, 1876—1946)进行设计。据《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载文介绍,罗克格设计的资政院大厦高四层,中部议院大厅、右侧参议院和左侧众议院上都覆有穹顶,同下部柱廊相配,十分庄重壮丽。议院大厅为八边形平面,高60英尺,两层,可容1550人(首层议员席1200座,二层楼座旁听席350座);厅外环以15英尺宽的走廊。参议院、众议院大厅均宽85英尺、深70英尺,通过宽36英尺、深66英尺的过厅同议会大厅相连。大厦的第二层设有记者室,配备有专用电话、电报装置;第三层为议员办公用,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写作间,以及专用电话、电报室。大厦内设28个楼梯间,有步梯和电梯,联系便利;备有电力照明、供暖设施,以及现代化餐厅和卫生设备。”^[44](图6-2-4)

审视西化的资政院大厦透视图,作者不禁设想,假如历史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十年、二十年时间,北京的城市面貌是不是将与上海、天津一样?但历史不容假设,辛亥之后,北京官方建筑的建造渐少,1927年国民政府南迁以后基本停止。北京作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得到发展的时间很短,其发展的主要时段只是1901年以后的十几年时间,而且即将灭亡的清王朝财政已临崩溃,北洋政府忙于军阀混战,都没有多少财力来支持北京官方建筑的建造,这一时期散布于北京的若干官方建筑还远远不足以改变城市的整体面貌。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北京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开展商品化城市建设的社会条件,这是其只能作为国都在特定时段内因政府行为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主要原因,南京也是一样。但是,这一时期在北京由政府投资,短时期内为政治目的而成批建造的这一批官方建筑还是使古都局部出现新的面貌。由于是政府行为建造的重要建筑,绝对数量与建设规模虽然难以与上海、天津、汉口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的租界区相比,但这些建筑活动属中国官方主动引进西方建筑文化的范畴,与后者的被动引进有本质区别,因而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有其特定的地位,同时也对北京近代建筑产生直接影响,如商业建筑中洋式铺面的出现。这种现象也延续到民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并影响到各省的官方建筑。

各省建造的谘议局建筑,以南京江苏省谘议局、武昌湖北省谘议局最为典型。江苏省谘议局(1908)“已聘用从日本考察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孙支厦进行设计,造型仿法国文艺复兴建筑式样,原来外墙亦为青砖砌筑,内部仍为砖木结构。”^[45](图6-2-5)湖北省谘议局(1909)“地址在武昌阅马场,是清政府为实行君主立宪而建,二层,砖木结构,红砖红瓦,平面呈“山”字形,……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筹建,1909年建成。”^[46]湖北省谘议局取对称格局,正面采用砖砌柱廊,西式山花、穹顶,因大楼采用红砖红瓦,故又称红楼。(图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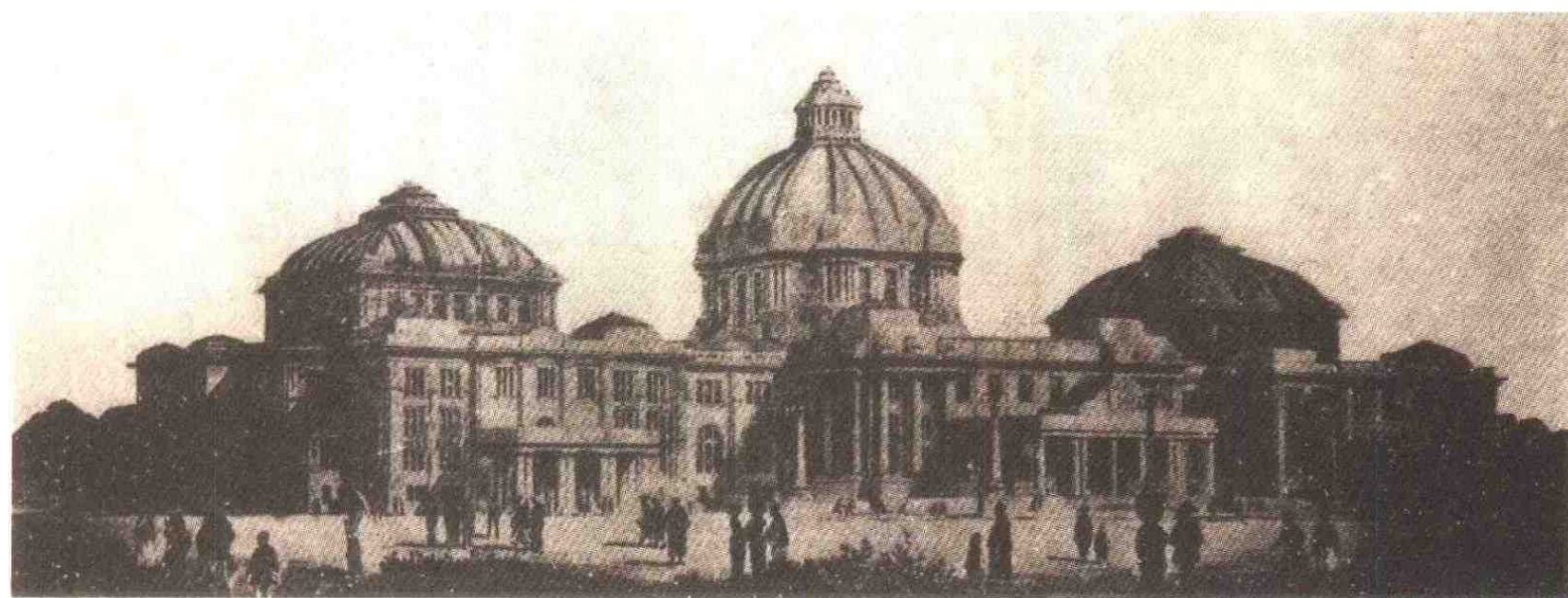


图6-2-4 北京清末资政院大厦透视图。罗克格绘,原图载《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第十卷,第四期,1913年9月号,转引自张复合,《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清末资政院大厦和民国国会议场》,载《建筑学报》1995年5期。



图 6-2-5 清末南京江苏省咨议局。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艺术》。



图 6-2-6 清末武昌湖北省咨议局。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8 年。

二、清末国立大学初创期的社会人文背景及其校舍建筑的西化趋势

这一时期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北京、天津、上海,三所国立大学建造的校舍也都采用了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京师大学堂建于1898年6月,即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故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重,观其会通’的教育原则。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47]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重,观其会通”的教育原则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以后建造的校舍建筑都是西式建筑。京师大学堂初办时利用马神庙原和嘉公主府(后为官书局),1902年后陆续添建一批西式建筑(即北大二院)。现存尚有中西混合的平房“西斋”与二层西式“藏书楼”,另在北河沿建造一批二层西式楼房(原为译学馆,后为北大三院)。分科大学在德胜门外黄寺大街,现存二层主楼两栋,配楼三栋。日本建筑师真水英夫设计的主楼为仿欧洲古典式,砖木结构,清水砖墙,外拱廊,墙面有砖雕花饰,比例及装饰手法成熟。^[48]

北洋大学的前身为北洋西学学堂,建于1895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利用梁家园原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所建博文书院旧址建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旋改天津大学堂,1902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建校之初,盛宣怀即聘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为总教习。丁家立参与创办北洋大学,对北洋大学早期发展有重要影响。“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成立后,丁家立马上辞去中西书院院长之职,全力筹办北洋大学。1896年,丁家立兼任北洋留美学生监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此时北洋大学所在地梁家园属德租界,校址遂为德军所占,丁家立‘深痛五载兴学,夷为异国营房’,于1902年赴德国交涉,‘卒索到赔偿费海关银五万两’,后即用以建筑北洋大学在西沽武库的校舍。”^[49]

北洋大学建校初期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大量聘用美国教习,成为当时美国化色彩最浓的大学,这一时期建造的校舍建筑也取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西沽武库的教学大楼建成于1903年,“大楼呈H型,砖木结构,东西方向。”“除地下室外分上下两层。正中间门洞上边的楼顶还有一个大钟楼,装有一座四面钟。”“一层楼北部主要有材料试验室和水力实验室;南部全为标本陈列室,“楼上全部是绘图教室。”^[50]1929年北洋大学主楼因火灾焚毁。从遗存的历史照片看,北洋大学主楼整体为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但大楼入口处在西式陶立克柱式与半圆拱券之上有“北洋大学堂”匾额与“二龙戏珠”图案浮雕,中国传统匾额、浮雕与西方古典柱式、拱券并列,在这个小小的建筑局部呈现中西建筑文化混杂的现象。(图6-2-7,6-2-8)

南洋公学(后发展成为交通大学)由时任清大理寺少卿的盛宣怀创办于1896年12月,由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任监院,“盛宣怀非常信任福开森,从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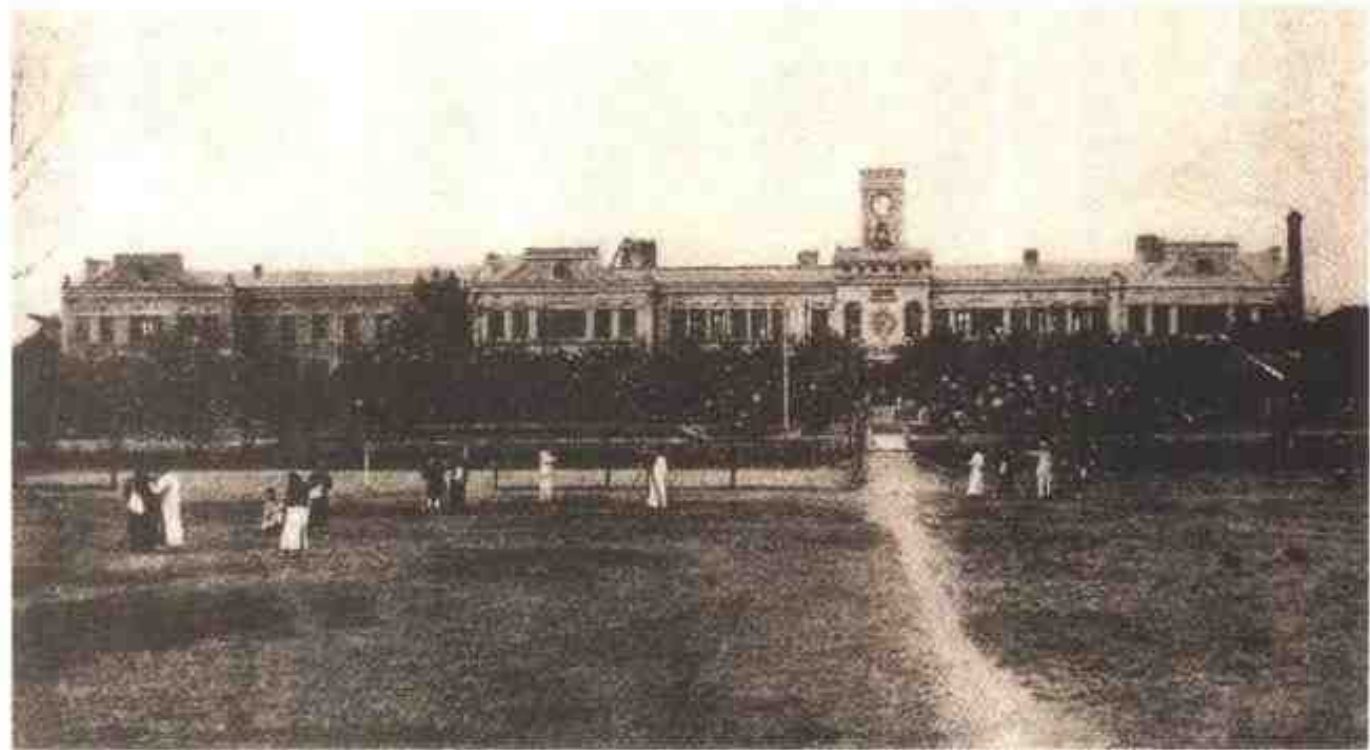


图6-2-7 天津北洋大学主楼。原图载《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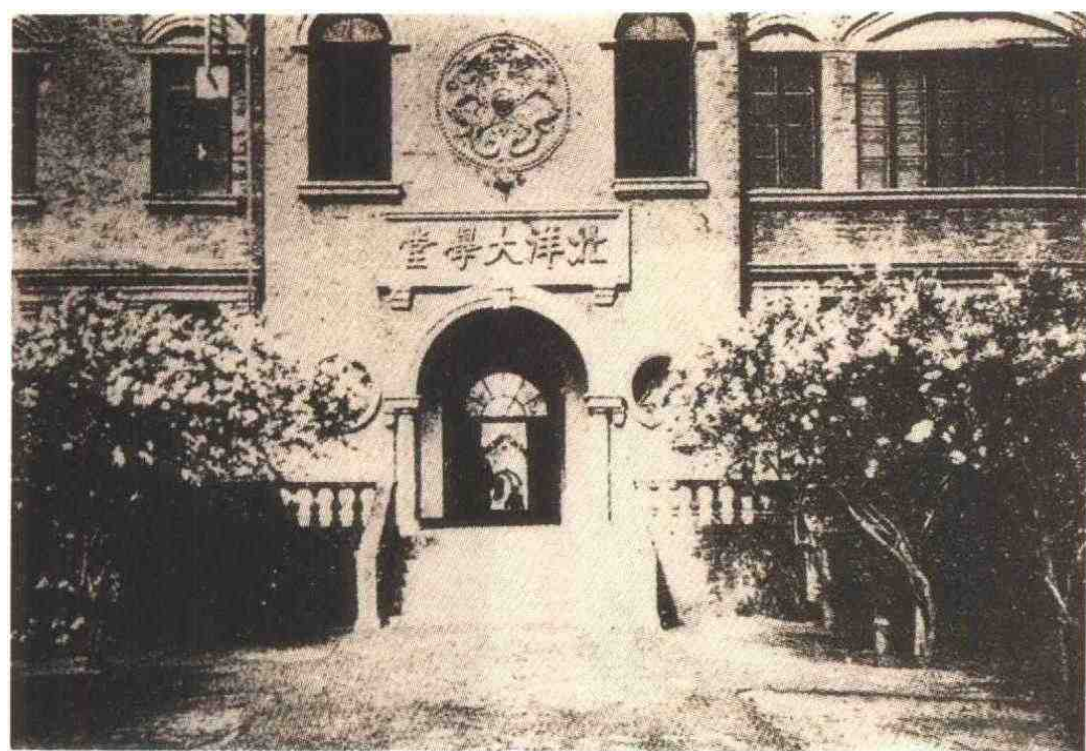


图 6-2-8 天津北洋大学主楼入口。中国传统匾额、浮雕与西方古典柱式、拱券并列，在这个小小的建筑局部呈现中西建筑文化混杂的现象。原图载《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

学校制度到教学方案的制定，从对学生的监督到学校建筑的设计，均有福开森主持或参与。^[151]福开森后来这样回忆南洋公学校舍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院和上院的设计是我画的，我还准备了计划书和交付承包合同。我的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楼房建成只供学校使用，当时有许多校舍常常被政府改作其他用途。我还设法在符合使用良好建筑材料的条件下使房屋造价尽可能地降低。……这些楼房很朴实但很坚固。我亲自监督楼房的建造，务使所用的材料是最好的。^[152]福开森这位业余的传教士建筑师居然从设计、绘图到选材、监理一包到底，办法大概只有抄，到西方国家购买类似大学校舍建筑的图纸，然后照搬照抄。后来南洋公学设立商科，建商务学堂，仍由福开森一手包办。“在商科建立过程中，福开森的作用最大。盛宣怀认为‘商务一门为富强之本’，因此‘于南洋公学之旁购地建屋，设立商务学堂，并派洋教习福开森前往美、英、比、法、德、奥、瑞、意各国，考察新学堂章程及造屋图式’。福开森用半年时间将欧美‘各学堂异同办法悉心留记，并造屋图样’，回校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南洋公学正是在福开森考察基础上建立了商科。”^[153](图 6-2-9, 6-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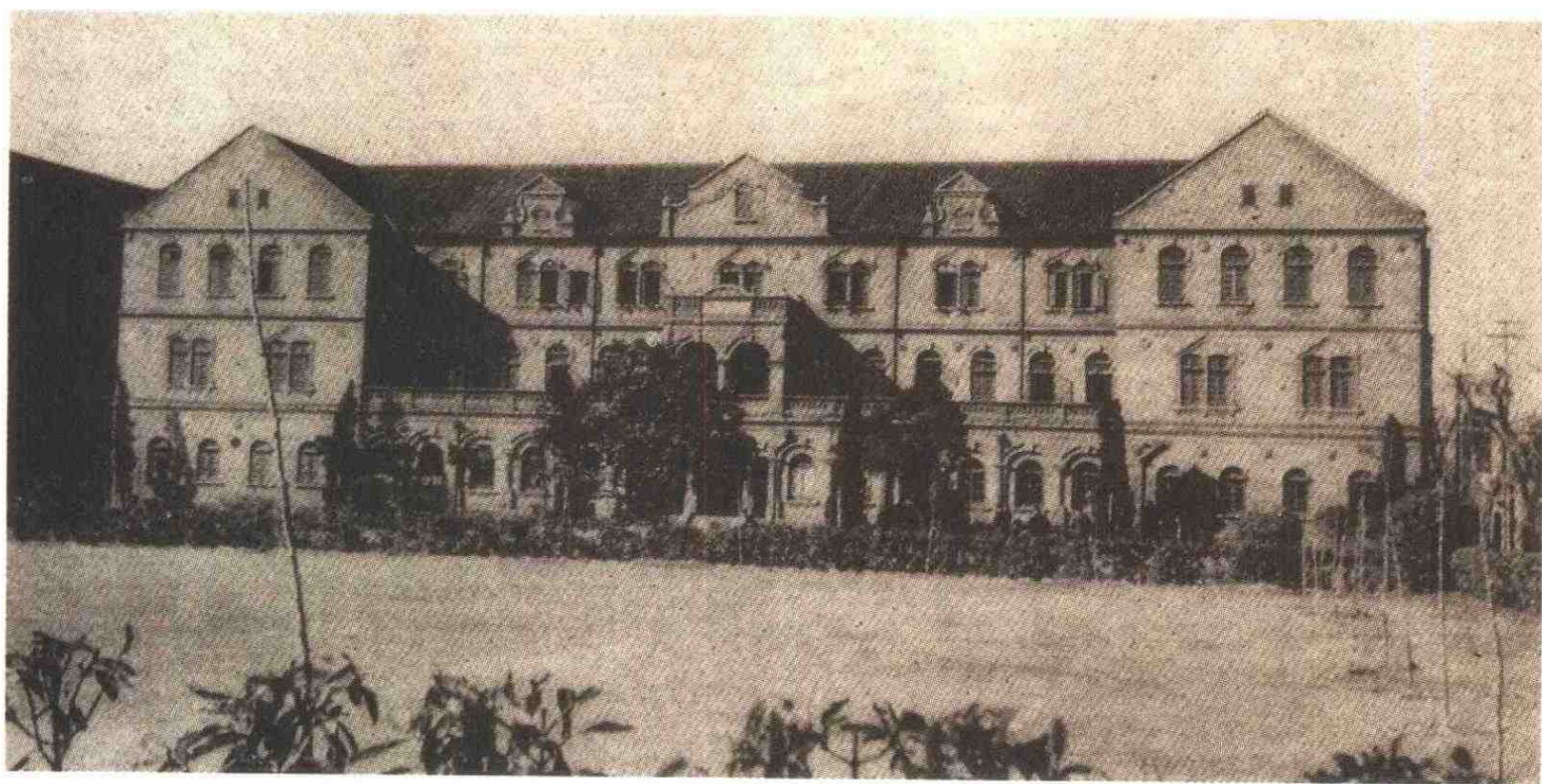


图 6-2-9 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图 6-2-10 上海南洋公学图书馆。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这段记载反映了当时一种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模式，即先到西方诸国考察，按类似功能、规模之建筑购买图纸，然后照样仿造，在仿照过程中当然会加入业主的某些要求与中国工匠的即兴发挥，于是形成早期的一批西方折衷主义建筑。这种设计模式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亲见数处按类似模式建造的当代建筑，建造程序是领导带队参观——选择中意的类似建筑——购买图纸

克隆。作者饶有兴趣地详细考察、询问其操作的全过程,而作者本人的建筑作品也有幸被纳入此种操作模式,有两件建筑作品被操作这种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模式者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办理合法手续后予以克隆。当然,在克隆过程中亦同样按业主要求作了局部修改,但基本没有大的改动。

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与上海的外滩公学都是清政府创办的国立大学,但都聘请了西方传教士为总教习(或监院),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氏 1902 年即被解聘,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丁家立对北洋大学,福开森对南洋公学的影响)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为北洋大学总教习,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为南洋公学监院。传教士不仅为国立大学带来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近代大学教育思想与制度,还带来了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文化,这当然是建立在 1901 年以后清廷实行“新政”,举国上下学习西方而形成崇尚西化的社会思潮的基础之上的。

试将 20 世纪初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与中国国立大学建筑作一对比。前者是西方教会投资建造的教会大学,按常理其建筑似应取西方建筑形式,却反而大力推行中国化的建筑形式,校舍建筑纷纷戴上“亨利·K·墨非式”的中式屋顶;后者是中国政府投资建造的国立大学,按常理似应推崇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却反而全盘西化,以西方柱式、拱券、钟楼为荣。这种反常现象当然不可能用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解释,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建筑形式是社会思潮的产物,教会大学于庚子之后,惧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为达到使中国基督化的目的而采用传教方式中国化的手段,作为这种手段之一的教会大学建筑就自然转向中国化的民族建筑形式。而中国政府创办的国立大学,本来就学习西方为办学宗旨,所以毫而皇之聘西方教习,用美国教材,作为学习西方的手段之一的建筑,也就理所当然地采用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而无任何后顾之虑。中国近代建筑史就是这样一部完全不同于西方建筑史的极具特殊性的建筑史,为深入研究这部建筑史,只有将中国近代建筑史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之,才能弄清楚许多建筑表象掩盖着的建筑实质,理清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第三节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第一次高潮期

一、中国近现代建筑史时期(1840~2000)

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整体回顾

中国建筑师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有意识地掀起“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在接受西方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功能的同时,力求继承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创作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探索始于吕彦直 1925 年、1926 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其后在 1927 至 1937 年,及 20 世纪 50 年代与 80 年代形成二次探索高潮期。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巅峰期,也是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第一次高潮期。其开端则稍早一些,始于吕彦直 1925 年、1926 年相继在南京

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但此时还未进入在政府倡导下有意识地讨论与实践的探索高潮期。以政府行为倡导“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并掀起讨论与实践的热潮,则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民族意识的觉醒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提倡,促成中国建筑师从民族自尊自强的观念出发,致力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这是其社会背景。而20世纪20年代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多数留美,在美国接受了学院派建筑教育,饱受当时美国流行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思潮的熏陶,整体上创作思想倾向于当时应纳入折衷主义建筑范畴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则是其学术背景。在1927—1937年第一次探索高潮期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建筑师作了三种不同趋势的尝试与探索:套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构成模式的整体仿古模式;在建筑整体采用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的基础上局部增加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或楼阁作为“中国固有形式”标志的局部仿古模式;以及建筑整体采用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局部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简约仿古模式。由于探索时间的短促,探索范围的限定,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这一次探索并未形成固定的风格模式,但其影响是长远的,直至今日,仍对中国当代建筑产生影响。这三种类型中都不乏优秀作品,整体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如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局部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如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博物馆,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如南京中央医院,这些早期创作的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体现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力。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带来的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同时带来的还有当时苏联国内流行的俄罗斯古典主义与巴洛克风格的示范性样板作品——北京苏联展览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在政府的提倡与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其探索趋势主要集中于局部仿古模式与简约仿古模式两大类,前者已总结出竖向三段(屋顶、屋身、基座)与横向五段(中部主体、两侧翼与连结体)的建筑形式基本构成模式,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建成的优秀建筑作品有:北京友谊宾馆与四部一会办公楼、长春地质宫、南京大学东南楼等。后者则在功能与形式的关系上更容易处理,更多地应用于功能性较强的建筑,如北京首都剧场、王府井百货大楼及北京天文馆等。这一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风格建筑,如使用穹顶的新疆人民剧场,使用蒙古包式屋顶的内蒙古成吉思汗陵等。更有一些建筑师注意从民居中吸取营养,创作了如上海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那样具有江南民居风格的作品,这种尝试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55年的“反浪费”运动使大屋顶建筑告一段落,但到1959年,随国庆工程的建造又掀起一次小高潮。这批国庆工程建筑规模宏大、功能复杂,建筑设计根据各工程特点采用不同的处理手法,较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有长足进步,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进入成熟期。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北京民族文化宫等都是成功之作。这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或称新古典主义建筑作品对中国建筑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影响的范围遍及全国,影响的时间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1978年以后,中国建筑进入健康发展时期。短短几年中,出现了西方建筑理论热、园林热、民居热。全国范围内研究建筑理论的热潮,使建筑师能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探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繁荣为建筑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建筑师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由于姗姗来迟的西方后现代建筑理论的影响,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与使用单位的偏爱,也由于旅游建筑的大量建造,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

探索又一次成为建筑界的热点。这一次探索热潮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已经汇入建筑百花园,成为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各种建筑形式探索趋势中的一种,不再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支独秀的惟一”的建筑形式。

20 世纪 80 年代,大屋顶仍在建造,但大屋顶下的门窗已开始使用简洁的铝合金门窗,古典建筑装饰已经开始简化、变形,并且用新材料制作。更有意义的是,随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民居建筑研究工作的深入进展,建筑师不再仅仅通过宫殿庙宇建筑认识中国传统建筑。学术视野的开阔使中国古典园林与民居建筑的优秀设计创意与设计手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当代建筑设计,出现了一批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的建筑作品,如四合院民居格局的中南海院、园林建筑风格的江苏省国画院,及云南傣族竹楼风格的竹楼式宾馆与西双版纳体育馆设计方案等。新疆出现的一批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民族形式建筑,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件一流水平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戴念慈设计的阙里宾舍与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它们都是受到普遍赞扬,也引起种种争议的建筑作品。^[54]

1992 年以后,突如其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中国建筑陷入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迷途,匆匆上马,粗放作业,几年之间,数量巨大的商品化建筑已经填满中国的城市,淹没了为数甚少的优秀建筑作品。商品化的建筑浪潮冲淡了社会对建筑文化的追求,也冲淡了中国建筑师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追求。直至 1998 年,北京《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国际竞赛才为中国建筑界吹来一阵清风,《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以“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个建在天安门的剧院”这三句话表达了其对《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采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期盼。^[55]中国建筑师也投入巨大的热忱,开展了多层次的探索。但其时对此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与学术准备的中国建筑师,从整体上已经淡漠了 20 世纪 80 年代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信念与追求,竞赛的结果几经周折,以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放弃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以全新的现代建筑形式形成天安门广场新面貌的设计方案中标并付诸实施而告结束。《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国际竞赛的结果对国家大剧院本身,对天安门广场的建设都作出了贡献,使之获得事先意想不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建筑师惯用的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方法与思路提出了质疑,这将促使其对此重新反省,这也许是这次竞赛另一个最大的收获。热切期盼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北京国家大剧院采用了全新的现代建筑形式,恰恰在举办《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国际竞赛的 1998 年,在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并无热切期盼的上海浦东新区,却耸立起由美国 SOM 建筑设计公司在建筑设计方案竞赛中标,于完成方案设计后与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成为举世公认的既体现中国建筑传统又体现当代高科技成果的优秀建筑作品。回顾历史,中国建筑师梦寐以求的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追求,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西方建筑师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开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创作的先河,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又由西方建筑师创作的上海金茂大厦宣告从仿古层次上升至融合层次才是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成功之路,这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学术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中国建筑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心胸,只有与世界建筑前进的步伐同步,才有可能使中国建筑真正进入实现中华建筑文化重构与再生的文化创新阶段,这也许正是本书回顾 1840—1949 年历时 110 年的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在这里简要回顾中国建筑师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不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全过程,目的是希望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全面考察在这一探索历程中,涉及本书论述

的历史范畴的第一次探索高潮期(1927~1937)及其前奏——吕彦直 1925 年、1926 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的历史贡献与历史价值。如本书第四章所述,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是中国近代建筑史进入主体建筑文化有意识地主动融会客体建筑文化的标志,从这一时期开始起步,中国建筑师的这种探索一直延续到今天,探索的成果渐趋成熟,探索的方向日益多元化,但直到今天,也只能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实现中华建筑文化重构与再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还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筚路蓝缕,创业之功永不可忘,其探索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社会变革催生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探索热潮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915 年以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入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已经达到新的层次。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论争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争,这一论争触及的核心问题是外来文化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永远不会有终结的,时时需要反省、讨论、研究的课题。但是在当时,这场论争的确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许多有关中西文化的问题,也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展了关税自主与改订新约运动。“1927 年 4 月 21 日,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公告:决定‘采取攻势外交策略,先就关税自主自动地宣布独立’。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关税自主运动。1928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借全国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声势,发起了一场改订新约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南京国民政府迫使各国列强在正式条约中公开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关税自主,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具有相当的进步性。”^[56]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还以政府行为倡导儒学,鼓吹尊孔复礼,恢复封建伦理道德。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有 1932 年 1 月 28 日夜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勇抗战,历时 33 天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华民族亡国危机加剧,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1934 年,国民政府要员相继发表文章与谈话,提出“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由此再度引起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这已在本书第一章中详细论述。这里只引当时著名学者张熙若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一段评论,张氏之论与清末民初对西方建筑向往而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建筑形式之美视若无睹已有天壤之别。“我现在不妨大胆的举几个不必西化或不应西化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属于艺术,或美术范围,在艺术的领域里,中国的造诣向来是极高的。许多方面不但与西洋的比较起来毫无逊色,而且,就是在今日,教有知识有训练的西洋人见了,除了五体投地的佩服崇拜外,再无别事可作。在那些地方,在这些有特别艺术价值而为中国人的创造能力所表现的地方,我们只有保存和继续的发展,绝对不应该西化。……最明显不含糊的一个例子便是中国的坛庙宫殿式的建筑。我常说一个建筑要具备美丽与庄严(或伟大)两个原则是不容易的。我并不是说这两个原则在其本身上是彼此不相容的,我只是说要把它们极适宜的表现于一物是不大容易的。美丽本来容易流于轻俏,庄严又容易变为笨重。轻俏与笨重的混合物当然更是看不得的。光是美丽比较容易,光是庄严也有办法。美丽而庄严,庄严而美丽,美丽与庄严两个原则配合到天衣无缝的圆满境界,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最好的坛庙宫殿式的建筑

所以能使稍有审美能力的人见了都一齐拜倒的秘密,就是因为它含着这两个不容易调和成功的美术原则。北平的天坛与太和殿就是两个有目共赏不容争辩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下面几句话。他说:‘中国今日事事不如人,使我们和外国人谈起来总觉得有些惭愧。但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到北平,我陪他去游览三殿。我们一进太和门,老远望见那富丽堂皇的太和殿,我不知不觉的长出了一口气,陡然觉得我和他一样,不,我觉得我比他还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他们外国人还强!’我个人在地球上也跑了不少的地方,宫殿类的建筑也看见了许多,也觉得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上北平宫殿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美术价值。伦敦的俗气,柏林的笨重,巴黎和凡尔赛的堆砌,罗马的平板,那一处可与北平媲美?’^[57]

张氏之论,当然有偏激之处,赞赏北平的天坛故宫之美不必以贬低伦敦、柏林、巴黎与罗马建筑为参照物,春兰秋菊,各为一时之秀,西方建筑自有西方建筑之美。但张氏文中表达的对中国传统建筑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却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1927年以后,中国建筑界亦掀起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热潮,这一热潮主要体现于官方建筑,探索时间很短,以吕彦直1925年、1926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为其前奏,主要探索时段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主要建筑实践活动集中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包括上海、广州、青岛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还波及北京等中国近代边缘城市,而这一探索热潮的主角则是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三、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队伍的形成与其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整体贡献及其正确定位

中国有留学生自容闳等三人留学美国开始,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三人由香港马礼逊学堂的美籍校长塞缪尔·布朗带到美国,1848年黄胜因病归国,黄宽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学成后归国,在广东行医。容闳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855年归国。容闳虽受传教士布朗博士知遇之恩而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但爱国之心并未稍减,大学毕业前夕,心中已有宏图:“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58]归国后,容闳上下奔走,大力倡导,终于促成第一批留学幼童于1872年赴美,开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留美幼童撤回后,清政府又于1877年、1882年、1886年、1897年派遣赴欧留学生,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人数总计80余人。至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纷纷赴日留学,人数之多是空前的,费正清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59]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将退款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及开设一所预备学校。1909年选送了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预备学校于1911年开办,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清华由退还庚款而生,而交涉退还庚款者为驻美公使梁诚,功不可没。大家都知道当中国为列强瓜分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主张门户开放政策,暂解中国之危。但在庚子赔款方面,海约翰自始就蓄意超索。及梁诚晓之以义,动之以情,海氏始承认超索。梁诚得知美方超索后,就主动交涉退还。他接触的美国高层政治领袖包括总统、国务卿、各部首长和国会议员,以外,还到处演讲游说,劝美国为国际正义建立典范,为中美友谊之永固建立基础。他不屈不挠,经三年之努力,终于成功。”^[60]“但是他因为同意美方将退款用于派遣留学和设立学堂,使此退款‘断不致竟归他人

掌握’,违背了外务部尚书和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意旨,被催促交卸返京供职。最后他还是坚持到1907年6月15日收到美国务卿来函,同意退还超收部分以后,才起程回国。”^[60]梁诚是留美幼童中的第四批学生,受容闳影响,热心教育,争取到退还庚款办学,功劳非浅,因已规定此款用于中国发展教育与资助留学,因此未被清政府及辛亥后北洋军阀移作他用,也是梁诚之功。庚款留美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很大,早期留美学生中很多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开创者,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学术带头人。

1909年5月游美学务处奉准设立,并于当年7月20日、21日举行第一次庚款留美考试,650名考生中仅录取47人,其后又于1910、1911年举行了两次庚款留美考试,分别录取70人、62人,这几批未经留美预备学校学习,通过甄别考试确定留美资格的学生又称为甄别生。中国第一位留美学习建筑专业的留学生庄俊,于1910年赴美留学,1914年学成归国,庄俊应属甄别生留美。在庚款留美的影响和推动下,民国初年,中国学界掀起第一次留美热潮。辛亥后1914年留美中国学生会会员为1170人,1917年为1500余人,留美自费生也大量增加,1915年为997人,占当年留美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辛亥之后,在美国的各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数量已占据首位,1912年中国留美学生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4%,至1925年,已占三分之一以上。^[61]1902年,清政府饬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留学,清末官派留欧学生遍及英、法、德、比、俄、奥等国,1908年至1910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总计约500余人。辛亥后,北洋政府曾派遣一批“稽勋留学生”出国留学,其中部分留欧,这批留学生多为有功于辛亥革命的青年,或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子弟。20世纪20年代,中国赴欧官费生与自费生都增加很多,其中包括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于1917年加入协约国参战,对德、奥两国的庚子赔款因中国对其宣战而取消,其他各国的庚子赔款因中国参战而允许停付五年,中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要求各国在停付期满(1922年12月)后退还这笔赔款,经各方努力,各国陆续将赔款余额退还中国,其条件中都要求将退款的一部分用于兴办教育及与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62]但这批退款退还时间较晚,数量也较少,对中国教育与留学事业产生的影响就小一些。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近代建筑专业的留学教育也逐步开展,“从现有资料看,我国最早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建筑都始于1905年。这一年,徐鸿遇到英国利兹大学学习建筑工程,许士谔到日本东亚铁道学校学习建筑科。(原书注:据王焕琛编著,《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国立编译馆1980年出版)他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攻读建筑学专业的留学生。此后,中国陆续有官费、自费留学生出国学建筑,到20世纪20年代末,赴日学建筑的留学生总数已超过130人。(原书注:据徐苏斌博士学位论文,《比较·交往·启示——中日近现代建筑史之研究》)赴欧美学建筑的势头也渐次掀起,继徐鸿遇之后,贝寿同于1909年官费留学德国,1910年入柏林工科大学学习建筑。同年,庄俊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他是庚款留美的第一位学建筑的学生。由于他的影响,先后通过清华庚款赴美留学建筑的人数颇多。受庚款留美的制约,前期赴欧美的建筑留学生中,以留美占绝大多数,主要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等著名学府。其次是留法、留英、留德,也有少数留意大利、奥地利和比利时的。在这些留学的学校中,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影响最大,范文照、朱彬、赵深、杨廷宝、陈植、梁思成、童寯、卢树森、李扬安、过元熙、吴景奇、黄耀伟、哈雄文、王华彬、吴敬安、谭垣等,都先后毕业于该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成了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建筑史学的奠基人和主要骨干。”^[63]

自1921年吕彦直与过养默、黄锡霖合组上海“东南建筑公司”,吕氏又于同年创办“彦记建筑事务所”后,这批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陆续开办建筑事务所,1927年以后,已

经形成一支颇具实力的中国建筑师队伍。但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仅仅赐予这批中国建筑师十年左右的安定创业时间(1927~1937),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的力量还远远不能与实力雄厚的在华外国建筑师队伍抗衡,而由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教育家开创的中国建筑教育事业所培养的第二代中国建筑师则连这段黄金时间也没有遇上,这一时期最早毕业的二代中国建筑师也只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尚不能独立开业,他们建筑创作的黄金年代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天津、汉口,都只有少量中国建筑师可以争取到不多的几项重要工程,大量的重要建筑仍由在华西方建筑师事务所承担设计。

以下对中国最重要的近代主流城市上海与天津最重要的两处街区——上海外滩(今中山东一路)与天津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1937年已建成的重要建筑及其设计者作一统计,列表如下:

1937年上海外滩(今中山东一路)已建重要建筑名称及其设计者一览表

地 址	建筑名称	设计者	设计者是否中国建筑师
中山东一路1号	亚细亚火油公司,麦边洋行	马海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2号	上海总会(英国总会)	马海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4号	有利银行(原名天祥银行)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5号	日清轮船公司	德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9号	招商局	玛礼逊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0—12号	汇丰银行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3号	江海关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5号	华俄道胜银行	倍高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6号	台湾银行	德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7号	字林西报大楼	德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8号	麦加利银行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19号	汇中饭店	玛礼逊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20号	沙逊大厦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23号	中国银行	中国建筑师陆谦受及公和洋行	是(与公和洋行合作)
中山东一路24号	横滨正金银行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26号	扬子水火保险公司	公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27号	怡和洋行	思九生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29号	东方汇理银行	通和洋行	否
中山东一路33号	英国领事馆	格罗斯曼与鲍伊斯建筑师	否

注:本表按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一书附录一《建筑师表》及附录二《建筑作品年表》编制

1937年天津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已建重要建筑名称及设计者一览表

地 址	建筑名称	设 计 者	设计者是否 中国建筑师
解放北路4号	裕中饭店	同和工程司	否
解放北路8—10号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华信工程司中国建筑师沈理源	是
解放北路34号	法租界工部局	比商义品公司	否
解放北路74号	中法工商银行	永和工程司	否
解放北路77号	东方汇理银行	比商义品公司按东方汇理银行 巴黎总行提供的设计图纸建造	否
解放北路80号	横滨正金银行	同和工程司	否
解放北路84号	汇丰银行	同和工程司	否
解放北路104号	华比银行	比商义品公司	否
解放北路114号	利华大楼	永和工程司	否
解放北路153号	麦加利银行	景明工程司	否
解放北路158号	泰莱饭店	比商义品公司	否
解放北路201号	英国俱乐部	上海安利洋行	否
解放北路219号	利顺德饭店	早期西方建筑师	否
解放北路268号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华信工程司	是

注：天津同和工程司是通和洋行设于天津的分公司，由英国建筑师小艾特金森(G. B. Atkinson)与达拉斯(Arthur Dallas)合组。上海通和洋行由艾特金森(Brenan Atkinson, 1866—1907年)与达拉斯(Arthur Dallas)合组，1908年以后由艾特金森(Brenan Atkinson)之弟小艾特金森(G. B. Atkinson)继任通和洋行合伙人。但在上海称通和洋行，在天津称同和工程司。

分析以上两表统计结果，可有如下结论：按1937年已建成建筑的状况统计，上海外滩仅中国银行一座重要建筑由中国建筑师陆谦受设计，而且是在公和洋行的旗下参与设计。而天津英法租界中街仅两座重要建筑由中国建筑师沈理源的华信工程司设计，上海与天津这两处重要街区的重要建筑至1937年基本上仍由在华的西方建筑师设计。这一结论也代表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基本状况，直至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建筑师也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筑市场上占据主流地位，他们在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始终只能承担一些较小、较不重要的工程，这种情况也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建筑史终止的1949年。中国建筑师自立自强，独立承担起中国建筑设计的重任，已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但是，在中国建筑师整体上不能成为中国近代建筑的主流设计队伍，没有能力在整体上使中国近代建筑史成为中国建筑师自立自强的历史的大前提下，却因社会背景的变化与政府行为的支持而在一个特定领域成为主流设计队伍，这就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主要在1927—1937年，由于政府倡导“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在由政府投资建造的一批官方建筑设计中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客观评价，这批建筑数量不多，与同一时期建造的中国近代建筑的总体建筑数量相比，只占很小的份额，但这批建筑却给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以显露才华的特殊机遇，使之在这一局部的、特定的领域有超出西方

建筑师的成就。

1927年以后,中国建筑师队伍已初具规模,虽不能与在华的西方建筑师抗衡,亦已成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集中在上海。1927年冬,上海建筑师学会成立。此前,范文照、张光圻、吕彦直、庄俊、巫振英等“集议联络同业,组织团体”,因人少未成。1927年,“国府倡议建设,其时建筑界之同志,或归自海外,或来自内地,日形踊跃,因于十六年冬,(引者注:1927年冬)正式成立上海建筑师学会,规模既具,舆论亦稍加注意。并于十七年(引者注:1928年)呈请国民政府工商部备案注册。旋以范围扩大,建筑同志,不仅限于上海一隅,乃改上海建筑师学会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并设分会于南京。”⁶⁴1931年,上海还成立了成员范围扩大到建筑界各专业人员的“上海市建筑协会”。其章程规定“本会以研究建筑学术改进建筑事业并表扬东方建筑艺术为宗旨”,“凡营造家建筑师工程师监工员及与建筑业有关之热心赞助本会者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并经执行委员会认可均得为本会会员。”⁶⁵1933年,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共55人,按《中国建筑》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7月)第39—40页所载名单列表如下:

1933年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名录

姓名	字	学 历
吕彦直	仲宜、占愚	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学士
张光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李锦沛	世楼	美国纽约普赖特学院
刘福泰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范文照	文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士
庄俊	达卿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学士
黄锡霖		英国伦敦大学
赵深	渊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卢树森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刘既漂		法国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
董大酉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进修
李宗侃		法国巴黎建筑专门学校
刘敦桢	士能	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
陈均沛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杨锡镠		南洋大学工学士
贝寿同		德国柏林夏洛滕堡工业大学
杨廷宝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关颂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士
黄家骅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士
奚福泉	世明	德国达姆施达特大学工学士,夏洛滕堡工业大学工学博士
李扬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巫振英	勉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士
罗邦杰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工学士
谭垣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陆谦受		英国建筑学院(AA)
陈植	植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林徽音		美国彭城大学学士
梁思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童寯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姓名	字	学 历
朱 彬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薛次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士
苏夏轩		比利时
林树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硕士
莫 衡		南洋大学工学士
裘燮钧		
吴景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黄耀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
孙立已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学士
朱神康		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士
徐敬直		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士
黄元吉		
顾道生		
许瑞芳		
繆苏骏	凯伯	
杨润玉	楚翹	
李惠伯		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士
王华彬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哈雄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张至刚		
丁宝训		
张克斌		
浦 海		
葛宏夫		
庄允昌		
李 蟠		

注：本表参照《中国建筑》第一卷第一期所载“1933年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名录”及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第163—164页表4—7编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时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大多数留学美国，在美国大学中又以宾夕法尼亚大学最多，而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20世纪10—20年代正是美国建筑院系学院派教学模式盛行的年代，“据统计，至1911年，全美建筑院系几乎都聘有巴黎美院毕业生。1894年，美国成立了‘鲍扎建筑师协会’(The Society of Beaux-Arts Architects)，1916年该协会又成立了‘鲍扎设计研究会’(Beaux-Arts Institute of Design)，该研究会成了二战前全国学校在设计教学方面的指导与仲裁机构，其1928—1929年颁发的教学计划被全美51所大学建筑系中的46所采用。尽管巴黎美院的‘画室’制被大学的学期制及班级制所取代，但其设计的训练模式仍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66]这一时期留美学习建筑专业的学生在美国建筑院系，尤其是在宾大建筑系接受了学院派建筑教育，这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设计创作思想影响很大，而由第一代建筑师创办的中国建筑教育事业又将这种创作思想传授给在中国建筑院系毕业的第二代建筑师，这种影响就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甚至80年代。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建筑师陆续开设建筑师事务所，从事建筑设计。1921年吕彦直与过养默、黄锡霖合组上海“东南建筑公司”，同年由吕彦直独自创办“彦记建筑事务

所”；1922年刘敦桢、王克生、朱士圭、柳士英合组上海“华海公司建筑部”；1925年庄俊开设“庄俊建筑师事务所”。此后，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广州等城市陆续开设的中国建筑师事务所还有：基泰工程司（建筑师关颂声、朱彬、杨廷宝，结构工程师杨宽麟）、华盖建筑事务所（建筑师赵深、陈植、童寯）、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董大酉、哈雄文）、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范文照）、同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李惠伯）、大方建筑事务所（建筑师李宗侃）、李锦沛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李锦沛、李扬安、张克斌）、杨锡镠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杨锡镠）、启明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奚福泉）、五联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陆谦受、黄作燊、王大闳）、凯泰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黄元吉）、中国工程司（建筑师阎子亨）、华信工程司（建筑师沈理源）、林克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师林克明）等。^[67]在汉口还有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卢镛标从1930年开始独立开业从事建筑设计，并颇有成就。

中国建筑师事务所中以基泰工程司与华盖建筑事务所的影响最大，同为近代中国建筑事务所中的佼佼者，基泰与华盖，杨廷宝与赵深、陈植、童寯都是留学宾大的高材生，杨廷宝曾多次获得全美建筑系学生设计竞赛的优胜奖，1924年一年内连续获得政府艺术社团奖和爱默生奖。童寯在1927年和1928年两年分别获得全美建筑系学生设计竞赛布鲁克纪念奖的二等奖和一等奖。陈植于1927年也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归国后他们的设计水平很快就可以与来华的一流西方建筑师平起平坐，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建筑师中的另一位才子建筑师是吕彦直，惜天不假年，于1929年3月18日，年仅36岁时就因肝肠癌病逝于上海。但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成后，自1921年归国至1929年去世，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吕彦直已成长为中国的一流建筑师，并为我们留下两件最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国建筑》第一卷第一期刊吕彦直生平小传云：“吕彦直，字仲宜，又字古愚，山东东平人。先世居处无定，迨清末叶曾与安徽滁州吕氏通谱，故亦称滁人。君生于天津，八岁丧父，九岁从次姊往法国，居巴黎数载，时孙慕韩亦在法，君戏窃画其像，俨然生人，观马戏还家，绘狮虎之属，莫不生动，盖艺术天才至高也。回国后入北京五城学堂，时林琴南任国文教授，君之文字为侪辈之冠。后入清华学校，民国二年毕业，遣送出洋，入美国康南耳大学。初习电学，以性不相近，改习建筑。卒业后助美国茂斐建筑师，尝作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及北平燕京大学之设计，为中西建筑参合之初步。十年回国，与过养默、黄锡霖二君合组东南建筑公司于上海，成绩则有上海银行公会等。嗣脱离东南与黄檀甫君设立真裕公司后，又改办彦记建筑事务所，获孙总理陵墓及广州纪念堂碑设计首奖，以西洋物质文明，发扬中国文艺之真精神，成为伟大之新创作。君平居寡好，幼学成疾，困于医药者四年，卒于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以肝肠生癌逝世，年止三十六岁。闻者莫不为中国艺术界惜此才也。”^[68]关于吕彦直，目前尚未有更多的资料，但从这段短短的小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吕彦直的四大优势：天生的艺术天赋、良好的中国文学（国文）根底——受业于名师林琴南并获“文字为侪辈之冠”之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接受的西方建筑教育，及在墨菲事务所期间所从事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工程实践，有此优势，在两次关键性的设计方案竞赛中连获头奖就是势在必得的了。但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吕彦直虽在墨菲事务所有一段工作经历，但这只是从学校毕业后开始建筑师职业生涯的必经阶段，目的主要是熟悉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学习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施工图设计组织经验，经过一段时间、若干实际工程磨练后才可开设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是每一个开业建筑师的常规经历。作为刚刚毕业的学生，吕彦直在墨菲事务所的工作更多的应当是落实墨菲设计方案的具体工作，而不是方案构思思路的探索。换言之，这段经历对吕彦直的影响应当是偏重于设计方案的落实，而不是偏重于设计理念的训练，所以离开墨菲事务所后的吕彦直在上海东南建筑公司期间设计的上海银行公

会也并无对中国民族形式的刻意追求。直至1925年南京中山陵举办设计竞赛,吕彦直才有显露才华的机遇,而且设计思路与墨菲完全不同。吕彦直之才远在墨菲之上,且与墨菲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理解完全不同,如果沿袭墨菲思路,决无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方案构思。因此,不宜因这一段短短的工作经历而称吕彦直与墨菲有“师承渊源关系”,过于强调墨菲对吕彦直的影响。^[60]

四、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前奏——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是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期。这是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环境发展的结果,如前文所述,社会变革催生了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探索热潮。社会变革是渐进发展的,但也有发生突变的转折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革发生突变的转折点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建筑界体现为政府行为对“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倡导与支持。在此之前一二年,吕彦直于1925年、1926年相继在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大奖并得以实施是其前奏,这两件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的整体实施主要是在1927年以后,如果仍然是北洋政府时期,没有政府行为的全力支持,很难设想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会有最终实现的完美结果。

南京中山陵是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早期作品,也是最优秀的作品。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按其临终前嘱咐葬于南京紫金山。1925年4月11日、21日、22日宋庆龄、孙科等人二次赴南京紫金山勘定墓址,于22日确定墓地的大致位置应在山南中段平阳处,即中茅山的南坡。此后,杨杏佛再赴南京拍摄了中茅山南坡的照片,并请江苏陆军测量局协助测量了墓地。而最终墓室与祭堂的具体位置则于设计方案确定后的1926年1月8日,由杨杏佛、林焕廷与建筑师吕彦直等现场确定。北京治丧结束后,成立了葬事筹备处,其任务是负责建造中山陵,由广东革命政府每月拨5万元作为建陵经费,又与江苏地方当局交涉圈地2000亩建陵。“在选址、圈地的同时,悬赏征求陵墓设计图案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5月2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确定奖金总额为5000元。然后,由孙科及主持工程的常务委员宋子文的代表赫门起草《陵墓悬赏征求图案条例》,5月13日在葬事筹备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并从5月15日起登报公布。原定8月31日截止,为期3个半月,后来因海外应征者要求延期而延至9月15日截止。到9月15日止,共收到应征图案四十余份,全部陈列于上海大洲公司二楼,从9月16日起到9月20日止,由葬事筹备处敦请评判顾问到陈列室阅览评判。评判委员会成员包括全体葬事筹备委员、家属代表,并聘请四名专家为顾问,即土木工程师、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

1925年9月20日,在上海四川路大洲公司二楼召开了葬事筹备委员及家属联席会议,对应征图案进行评判。出席会议的有宋庆龄、孙科及夫人、林焕廷、叶楚傖、孔祥熙、陈去病、杨杏佛。特聘评判顾问也都在前一天写了书面评判报告,由杨杏佛在会上报告了顾问们的评判结果,大家对第一、第二两奖意见一致,但对第三奖有不同看法,最后表决,通过了得奖名单:大奖吕彦直;二奖范文照;三奖杨锡宗。名誉奖:1. 孚开洋行乃君(Cyrill Nebuskad);2. 赵深;3. 开尔思(francis Kales);4. 恩那与弗雷(C. Y. Amney and W. Frey);5. 戈登上达(W. Livin Goldenstaedt);6. 上达打洋建筑公司(Zdanwitch and Goldenstaedt)等。(图6-3-1,6-3-2,6-3-3)

得奖者由葬事筹备委员会发函通知,未得奖者每人赠送一幅孙中山遗像及著作,以示感谢。同时,在《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布评判结果。从9月22日到9月26日止,公开展览5天,每天都有上千多人前来参观。上海的各家中西报纸都发表文章加以评论,称誉这次悬奖征求陵墓图案是历史上空前的建筑设计比赛。

9月27日下午4时,葬事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中再次开会,详细审查比较了吕彦直和范文照设计的陵墓图案、说明书及估价表,一致决定采用吕彦直设计的陵墓图案,并聘请他为陵墓建筑师。^[10]

中山陵设计方案国际竞赛,即“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设计竞赛。中山陵属纪念性建筑,没有具体的物质功能要求,因此,建筑创意居建筑设计构思的首位,建筑形式成为方案设计的焦点,所以称“征求图案”,并同时向全世界建筑师与艺术家征求图案,区别只在于奖金额,艺术家应征者只交陵墓图画,未附有建筑详图者,头奖1000元,二奖750元,三奖500元。建筑师应征者交有全部建筑详图者,头奖2500元,二奖1500元,三奖1000元。评选结果,前三名都是建筑师,而且都是中国建筑师,名誉奖获奖者除排名第二的赵深为中国建筑师外,其余都是外国建筑师,可知当时外国建筑师也是倾全力参与竞争的。

《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对祭堂、墓、祭堂前的广场与大台阶等都有具体要求,对采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即“中国古式”,但不得使用砖木结构,亦已有明确规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祭堂前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备举行祭礼之用;祭堂须面南,登临之径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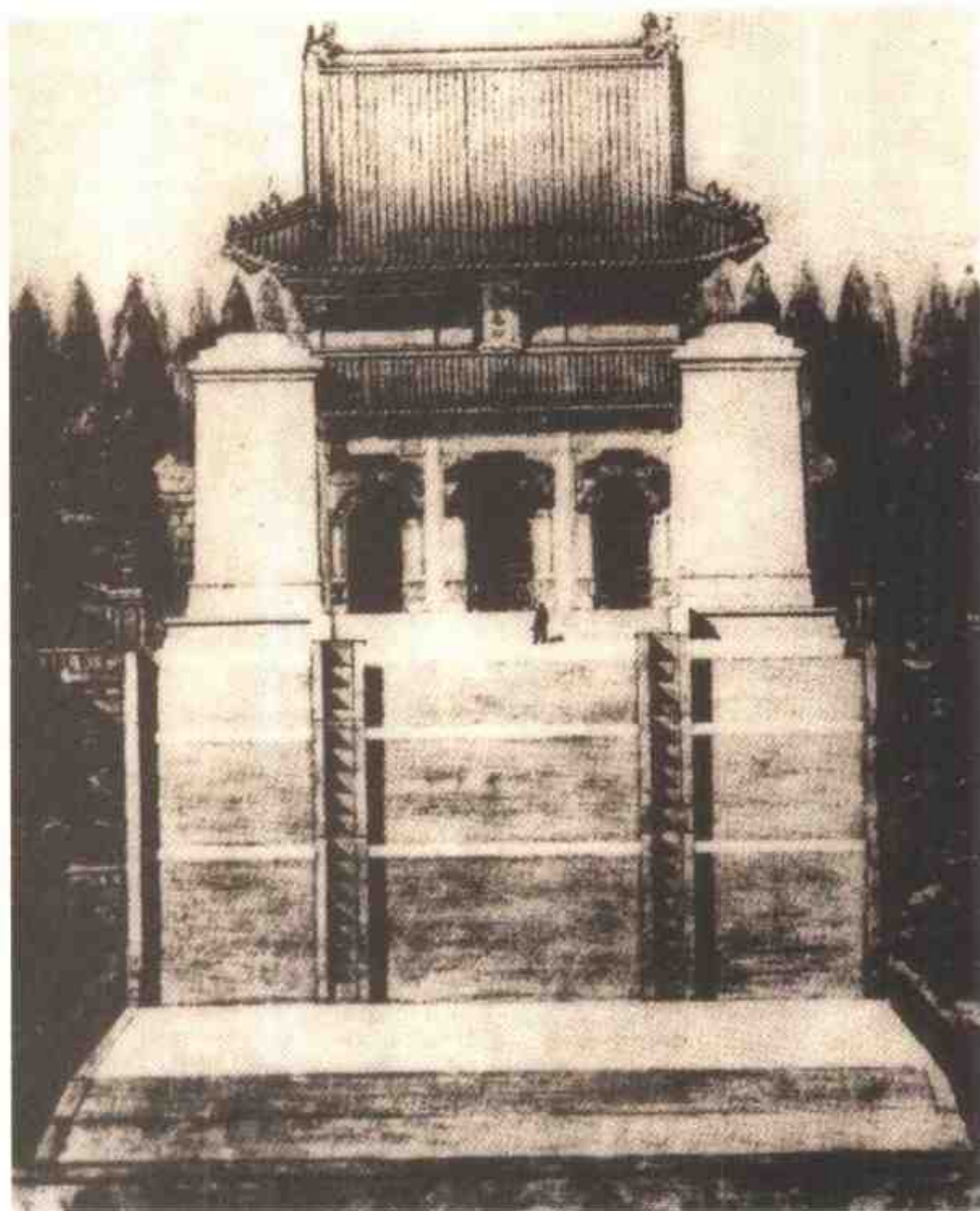


图6-3-1 南京中山陵“陵墓悬奖征求图案”获大奖的吕彦直方案。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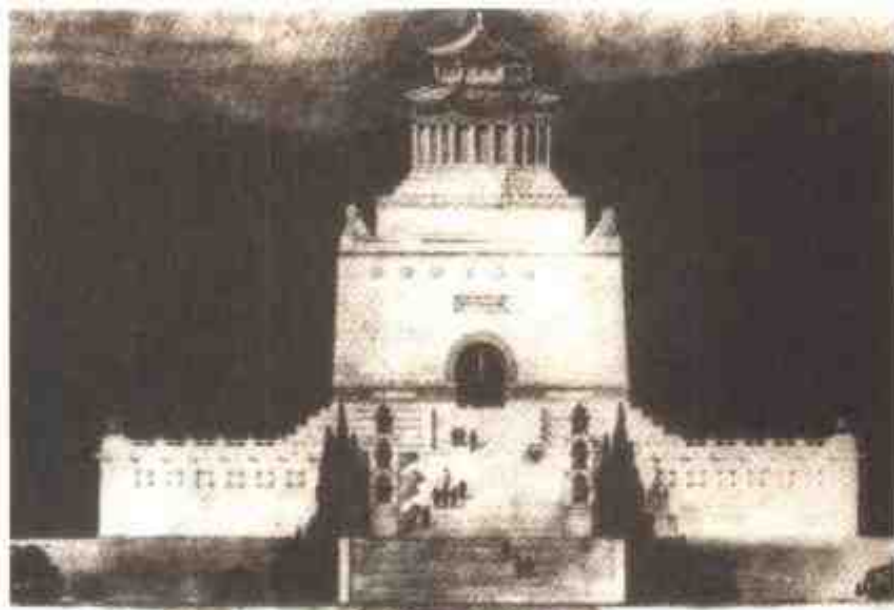


图6-3-2 南京中山陵“陵墓悬奖征求图案”获二奖的范文照方案。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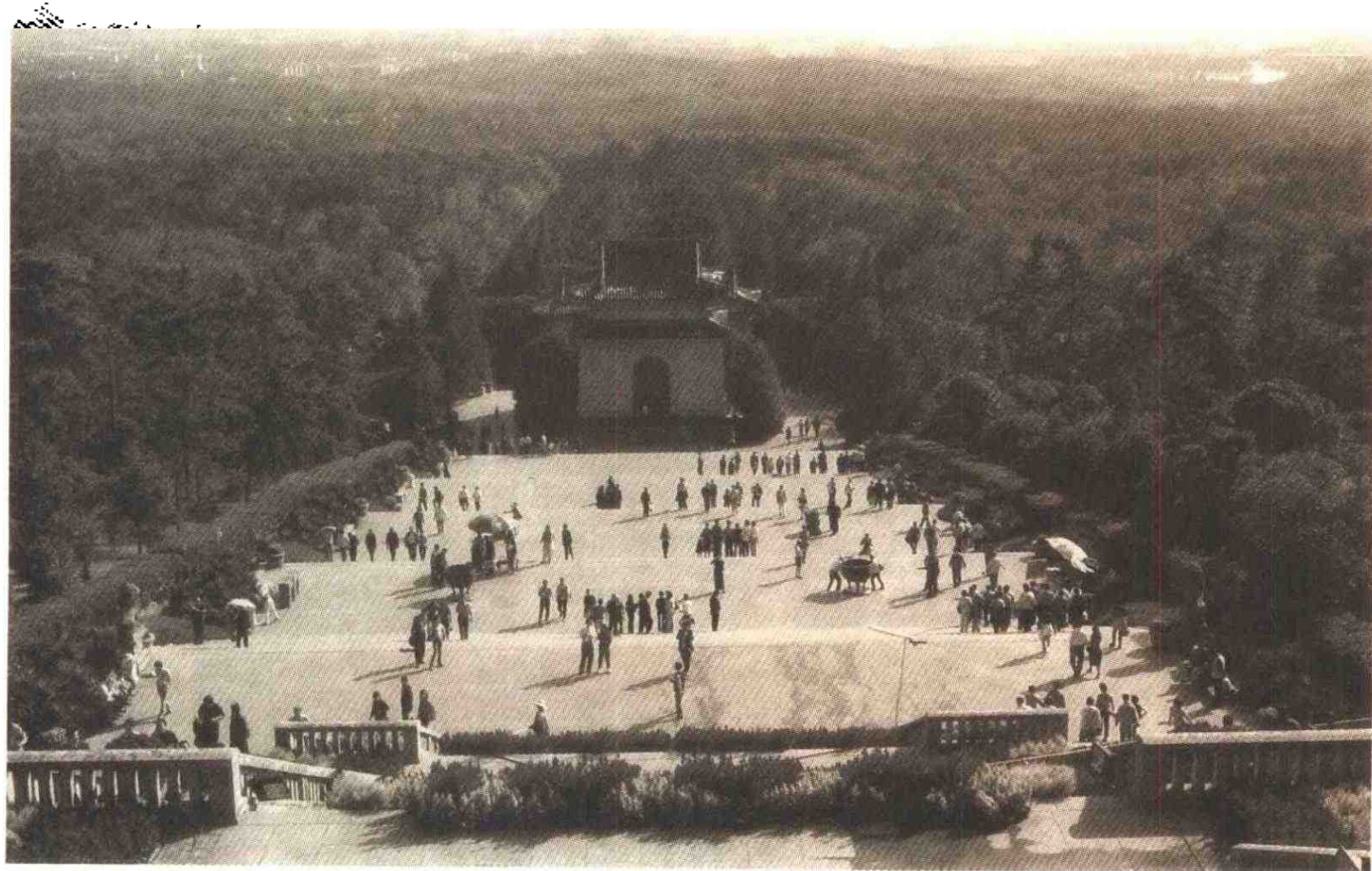


图6-3-3 南京中山陵“陵墓悬奖征求图案”获三奖的杨锡宗方案。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

大台阶或石级,向南直达山脚;祭堂应建在水平线 175 米高坡上;祭堂虽拟采用中国式,惟为永久计,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钢筋混凝土,不可用砖木之类等。所以,中山陵建筑设计竞赛实际上是一次创作用钢筋混凝土与石料建造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竞赛,竞争焦点是祭堂的建筑形式。而其他构思,如从山脚直达祭堂的大台阶与 175 米标高的祭堂前广场等,都是竞赛条例已经规定,任何方案都须遵守的前提条件,并非吕彦直方案所独创的设计构思。

试对获大奖的吕彦直方案、获二奖的范文照方案与获三奖的杨锡宗方案作一比较分析。三个方案优劣之分首先在于对建筑与环境的理解,即方案设计构思是以环境为依托设计建筑,还是单纯强调建筑忽视环境。二、三奖方案都是独立的集中形制建筑,独立性很强,强调的是建筑本身的宏伟壮观,这一点,三奖方案较二奖方案更甚,所以评选中对二奖方案颇有争议。二、三奖方案,尤其是三奖方案,是可以在其他任何地形地势建造的方案,而将巨大的北京天坛祈年殿式的殿堂建筑置于高台(二奖方案)或主体建筑(三奖方案)之上,更是违背了结构规律,也违背了建筑形式美的规律。相比之下,大奖方案构思立意水平就远在二、三奖方案之上。祭堂已位于 175 米标高的平台之上,巨大的实体基座或建筑基座都已属多余,所以大奖方案放弃对建筑本身规模与气势的追求,简朴凝重,体量较小,反而突出了中山陵整体上的雄浑气势,祭堂建筑让位于陵园大环境,是大奖方案的构思精华所在。作者二次拜谒中山陵,对此感受颇深。从祭堂前的第十层平台上回首俯瞰,远处丘陵绵延,秦淮如带,近处大树参天,风声飒飒,回顾中山陵祭堂,庄严肃穆,质朴无华,静静地融会于壮丽的自然环境之中。(图 6-3-4)整个中山陵,从陵前广场、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前 40 米宽的 392 级石阶,到庄严质朴的主体建筑祭堂与祭堂后的墓室,共同的特征都是建筑让位于环境。在紫金山特定的山峦地势中,将一组体量不大的建筑单体用广场、墓道、大台阶连成一个整体,中轴线依然存在,却因地形起伏而觉生动,传统帝王陵墓的基本建筑构成要素: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依然使用,却另创新意而非袭旧。

图 6-3-4 从南京中山陵祭堂前的第十层平台上回首俯瞰紫金山麓的中山陵园,建筑让位于环境,建筑融合于环境,是南京中山陵成功的关键构思之一。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完全不同于获二、三等奖的方案,吕彦直方案的另一特征是祭堂建筑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建筑构思创意。明清帝王陵墓,自明孝陵始按宫殿形式修建,明孝陵的稜恩殿(享殿)与方城明楼有如宫殿建筑中的前朝后寝,构成陵墓建筑的主体。明长陵将方城明楼平面由长方形改为止方形,并在明楼正中置石碑。此后,明代帝陵形成以方城明楼为核心,与稜恩殿组合形成的三进院落的宫殿式帝陵模式。清代帝陵沿袭明代制度,清孝陵仿明长陵而建,前院以隆恩殿为中心,后院有方城明楼和宝城,以后清代帝陵都依孝陵制度。中山陵祭堂不取明代帝陵稜恩殿与清代帝陵隆恩殿的面阔九间、重檐庑殿顶的建筑模式,这是前三名方案的共识。但二、三等奖方案型制过于宏伟,只有大奖方案建筑构思似源自明清帝陵形制较简朴的碑亭,基本建筑形态简朴而不失庄重。吕彦直的创意是在祭堂四周设计了四个正方形方室,在立面上形成四个角墩,这四个角墩切断了重檐歇山顶的下檐,又在正立面两个角墩之间稍稍后退的墙面上作三椏拱门,使墙面在整体上形成虚面效果,又作凸出墙面的壁柱与额枋雀替,壁柱与额枋雀替及重檐歇山顶的下檐一起将两侧角墩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加强了这部分建筑体量的整体感。实体角墩与连系角墩的歇山顶下檐及凸出墙面的壁柱与额枋雀替一起构成颇富雕塑感、现代感的建筑形体,这部分创新的建筑形体与基本保持传统建筑形制的重檐歇山顶的上半部分融洽自然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西方式的建筑体量组合构思与中国式的半个重檐歇山顶的完美结合,这就是一流中国建筑师的创意——只有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训练又熟谙中国传统建筑精神(不是斗拱正吻是否符合法式等细节)的中国建筑师才有的构思创意。(图 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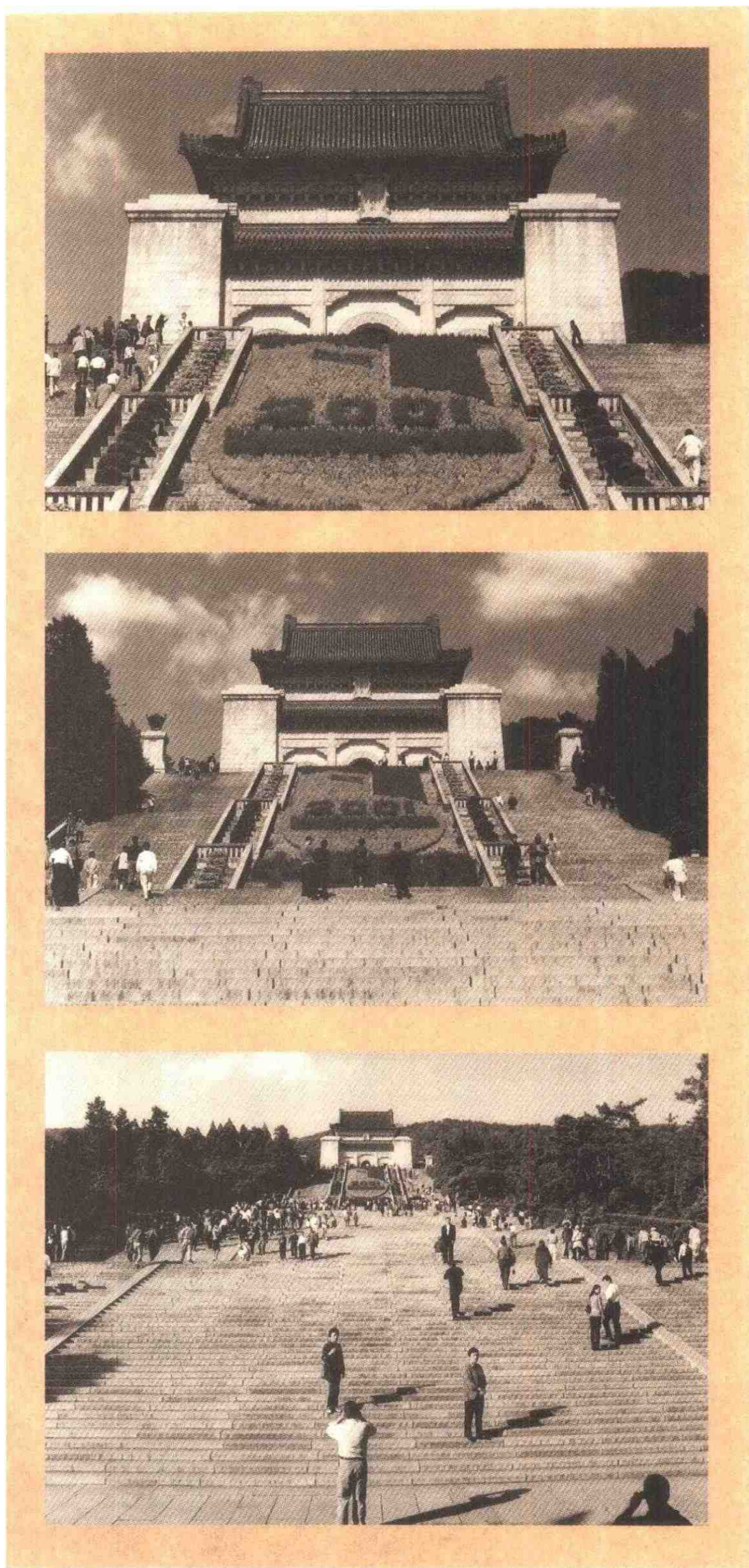


图 6-3-5 南京中山陵祭堂。由远至近不同观赏距离拍摄的南京中山陵祭堂照片。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中山陵祭堂的细部处理极精致。因竞赛条件中已规定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与石材,因此祭堂建筑的细部处理,包括壁柱、额枋、雀替、斗拱等都仿中国传统石结构建筑,这当然是明智之举。琉璃瓦色彩的选择也是中山陵的一大成功,不取皇家专用的黄琉璃瓦,也不取易与树木色调混杂而不能突出体量较小的建筑的绿琉璃瓦,而选择与花岗石

图 6-3-6 南京中山陵祭堂中央拱门。仿中国传统石结构建筑的拱门与壁柱、额枋、雀替等设计与施工制作都很精细。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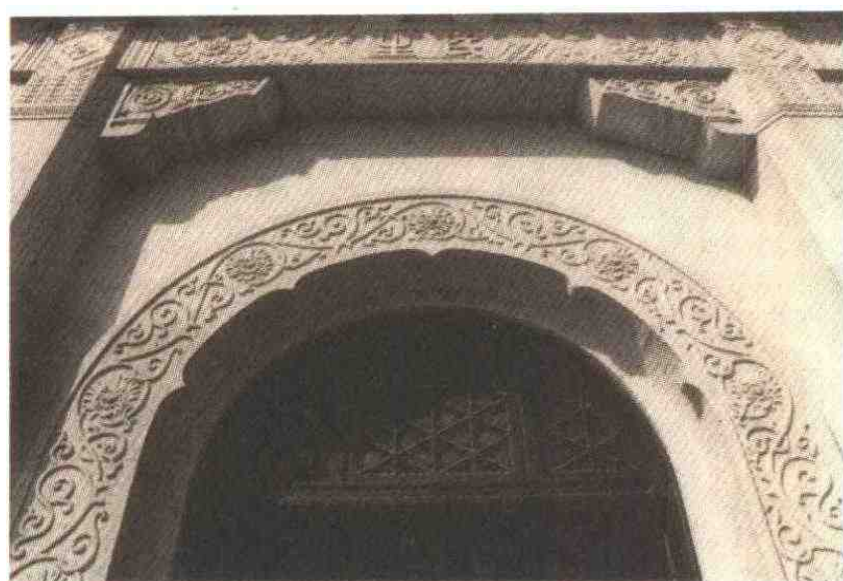


图 6-3-7 南京中山陵入口广场的牌坊。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图 6-3-8 南京中山陵陵门。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墙体协调的宝蓝色琉璃瓦,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之下,建筑更显高雅肃穆。(图 6-3-6)

中山陵的其他建筑,牌坊、陵门、碑亭等都依传统形制,按祭堂建筑的基本模式建造,构图严谨,尺度适宜。入口牌坊是传统的三间冲天石牌坊,陵门为单檐歇山顶三拱门石建筑,碑亭为重檐歇山顶石建筑,均为宝蓝色琉璃瓦顶。(图 6-3-7,6-3-8,6-3-9)

传世之作层次的建筑,不仅仅取决于建筑师的方案构思,也取决于自方案设计至施工图设计,至施工实施的全过程,还包括环境设施、绿化设施、雕塑、建筑小品等的设计与实施,更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以保证材质上乘、施工制作精细。这种种条件,只有作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官方建筑才能做到,而在这一时期建造的一批中国民族形式的官方建筑中,政府的支持强度以中山陵居首位,而且远远超过其他官方建筑,这是一般建筑难以相比的。

首先是陵园圈地,1925 年孙中山逝世时尚属北洋政府时期,葬事筹备处交涉圈地只以 2000 亩立案,至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 年即批准将紫金山全

部划为陵园用地，如果依然是北洋政府时期，2000 亩的中山陵如何能有今日的气势。然后是经费，1925 年“悬奖征求陵墓图案时规定陵墓建筑费以 30 万元为限，实际上，后来大大超过了这一限制，到 1929 年 6 月奉安大典前为止，仅第一、第二两部工程就已耗资 143 万元，还不包括购地费及道路、桥梁等费用。到第三部工程完工时，共耗资 240 余万元。”^[1]这种超出事先估价 8 倍的造价也只有重要的官方建筑才能承受。二是周边配套的附属工程的建设，二期工程完成后，“为迎接孙中山灵柩安葬，1928 年 9 月，国民政府又决定暂借华侨飞机捐款 150 万元，建筑一条从下关江边直达中山陵的迎榭大道，其中从中山门到中山陵这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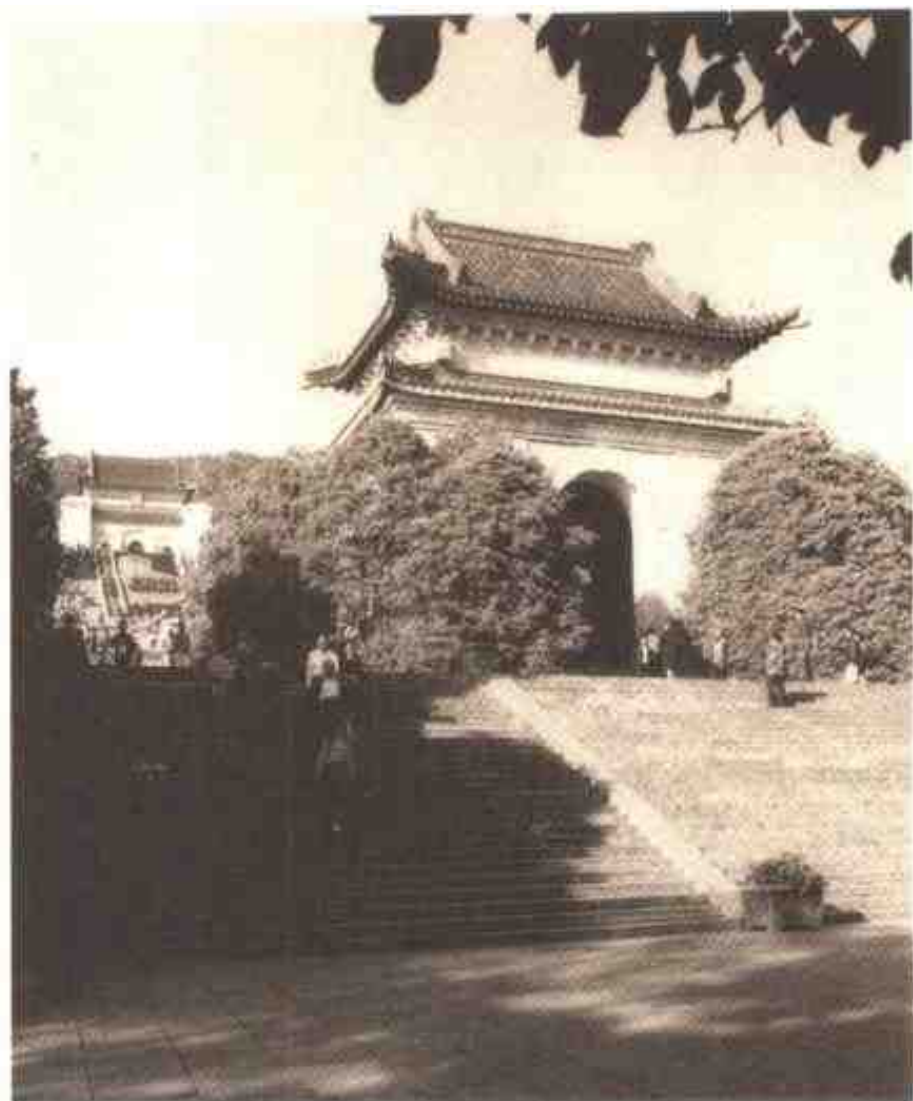


图 6-3-9 南京中山陵碑亭。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由葬事筹备处负责。迎榭大道于 1929 年 5 月全线通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葬事筹备处聘请各方面专家成立陵园计划委员会，并经江苏省政府同意，接收了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把紫金山全部划入陵园范围，在全山开展植树造林，并在陵墓栽植观赏花木。”^[2]绿化工程也是很艰巨的工程，“因为陵墓筑在布满砾石的山上，为保证植树成活，必须换上，有些地方还得除去大块巨石，重新填上好土才能栽树。有的树坑，直径达 3 米，深 2 米以上。掘坑不能用炮轰，以免影响已建成的建筑物的质量，只能用人工开凿成坑，再用骡马从山下运来好土，填实夯紧，所用土方之多，竟在陵墓下西侧留下了一个去土挖成的大池塘，面积达五六亩，深达四五米。”^[3]此外，中山陵的许多雕塑、小品都是精品之作，祭堂两侧的华表与石鼎都由泉州雕刻家蒋文子设计，蒋源成雕刻铺制作；祭堂正中的孙中山坐像石雕由法国雕刻家保罗·朗特斯基在巴黎雕成后运南京；墓圻正中的汉白玉孙中山卧像则由捷克雕刻家高崎雕刻。所有这些，都是只有作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官方建筑才能解决的，拥有这种优雅环境与配套工程的中山陵才可能有现在的雄浑气势。(图 6-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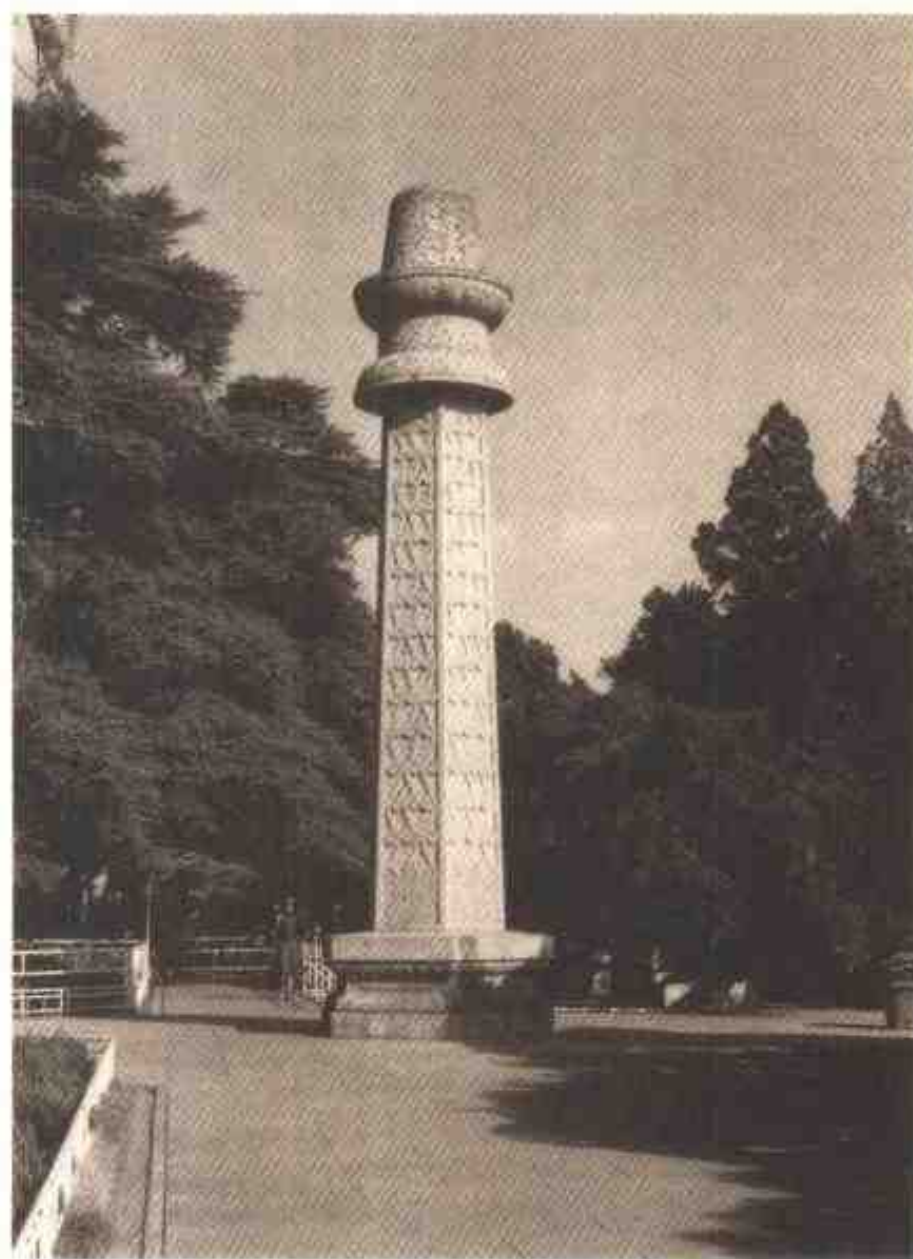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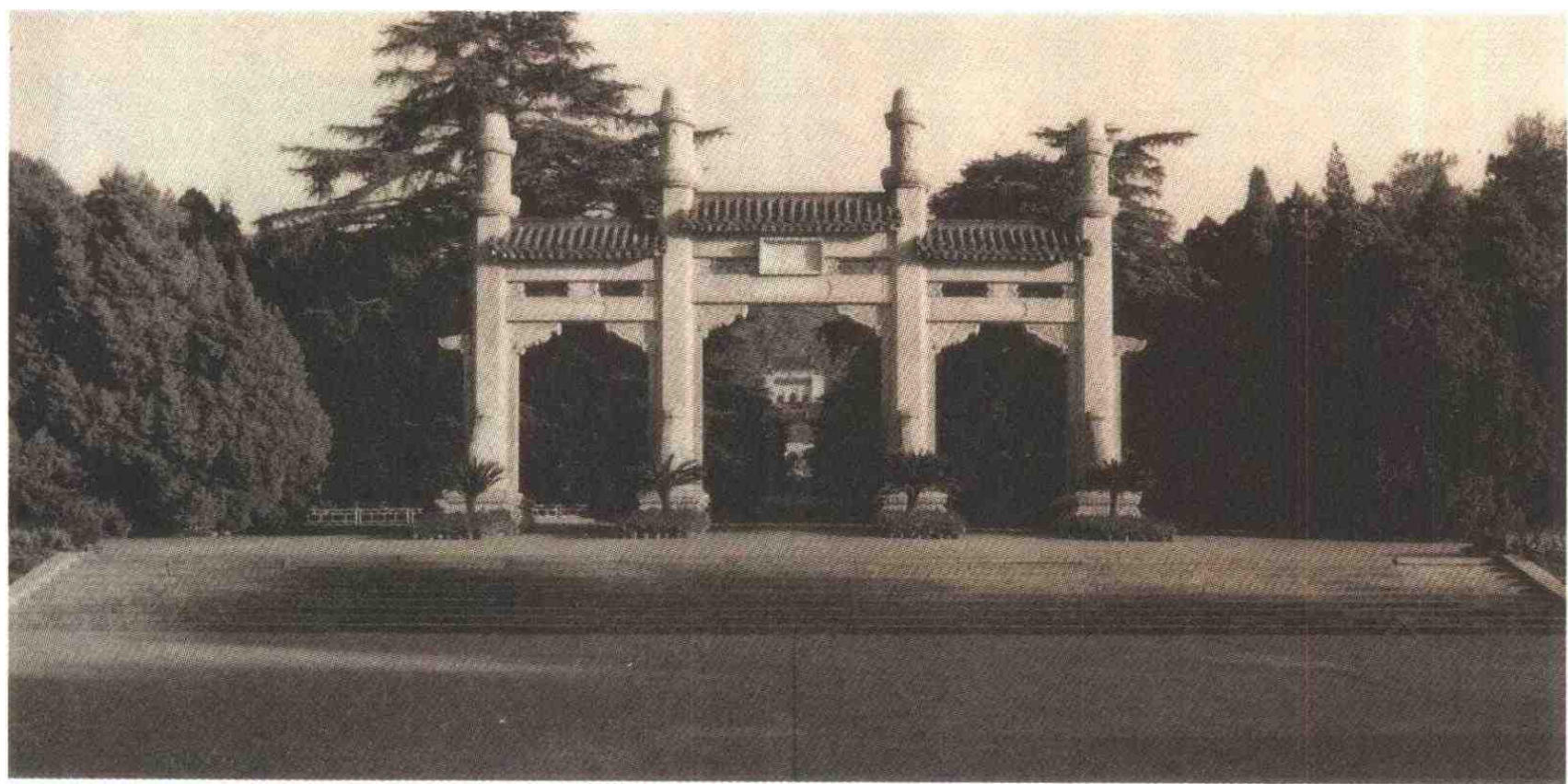
图 6-3-10 南京中山陵祭堂两侧的华表，由泉州雕刻家蒋文子设计，蒋源成雕刻铺制作。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建筑师的功绩则在于对工程全过程的监理与对设计方案基本构思的坚持。施工期间，吕彦直长期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各项工程开工前，须根

据详图事先做成模型,经吕彦直审定后才可开工,可谓事必躬亲,尽心尽力。所以 1929 年吕彦直去世后,陵园管理委员会在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为吕彦直立了一块纪念碑。碑的上部是吕彦直的半身像,下部刻有于右任所书的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值得注意的是,碑文表彰的是吕彦直“监理陵工”之功,而不是方案设计之功,可知政府对施工全过程的重视。

中山陵的第三期工程是在孙中山葬入中山陵之后进行的,三期工程包括牌坊、陵门、碑亭、围墙、卫士室等。此时,吕彦直已去世,由彦记事务所李锦沛、黄檀甫继续完成这些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监理。李、黄二人全力维持吕彦直的初始方案,功不可没。以入口广场的牌坊为例,“吕彦直最初设计牌坊时,牌坊是置于陵门前的。后来,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夏光宇提议在陵门前增加一条墓道,以增添陵墓的雄伟气势。这样,牌坊就移到了墓道南端。”^[74]这是合理的提议,使方案增色,因而顺利采纳。但后来拟将三间石牌坊改为五间,就因李、黄二人的坚持而维持了原设计方案,“葬事筹备处曾一度想把牌坊改为五间,请美国建筑师茂菲另行设计,并已绘就通过,但彦记建筑事务所坚持要求用吕彦直原设计的三门图案,葬事筹备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仍采用吕彦直生前设计的三门图案,未作改动。牌坊在施工时,石匠误将牌坊西首的一根 12 米高的石柱凿短了一米,吕彦直的同事又设法补救,令石匠将截下的石料以投榫的办法接上,今天,细心的游人仍能看出接合的痕迹。”^[75]拟将牌坊由三门改为五间,显然是因为明清帝陵的牌坊都是五间。一旦修改,不仅不符合原设计的基本构思,也使牌坊尺度过大,影响中山陵的整体格局,彦记事务所据理力争,功不可没。正是彦记事务所的建筑师们对后期工程的全力投入,尽力维持吕彦直的初始设计方案,每一个细节都不放松,才使中山陵以完整的建筑格局,统一的建筑风格留传于世。(图 6-3-11)

图 6-3-11 南京中山陵入口广场牌坊与整体环境的尺度关系。在此大环境中,当然应当用尺度适宜的三门牌坊,而不宜用明清帝陵形制的大尺度五间牌坊。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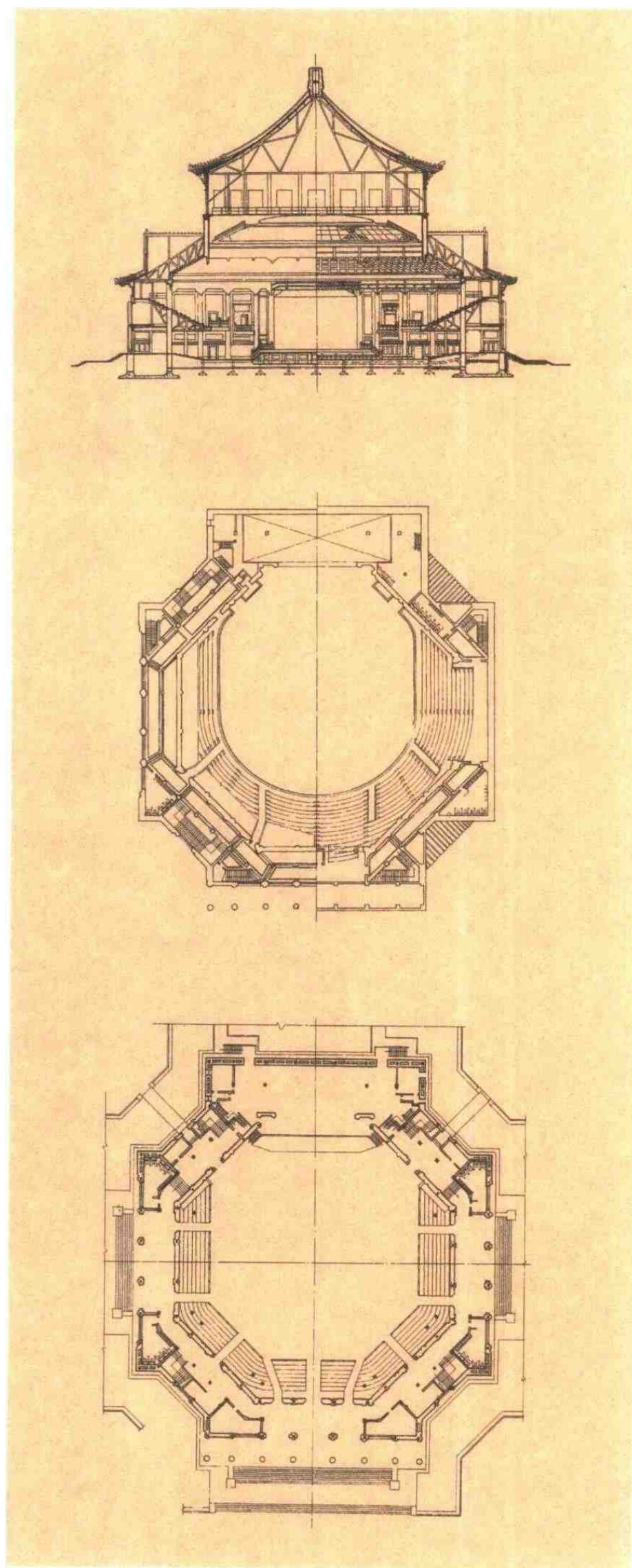
吕彦直在回国后短短八年的建筑师职业生涯中还为我们留下另一件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广州中山纪念堂。与南京中山陵相比,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同属政府行为支持的官方建筑,同样有充足的建设资金支持,同为设计竞赛头奖作品,同样在设计竞赛要求中即明确必须采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两者的差异是:南京中山陵是纯纪念性建筑,没有太具体的物质功能要求,方案设计的焦点是建筑形式,是正确处理建筑形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广州中山纪念堂则“要求该堂成为举行纪念周和大型集会的场所,堂内要

能容纳 5000 人，^[76]是有复杂的功能要求的大空间会堂建筑。吕彦直同样在设计竞赛中获头奖，也同样创作了另一件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但面对复杂的功能要求，复杂的结构系统，就因建筑的功能与形式、结构与形式的种种矛盾而留下许多缺陷。这是建筑发展史上的大课题：新功能、新结构呼唤新的建筑形式，这个大课题当然不是吕彦直以个人才华在短时期内能解决的。所以，南京中山陵留给我们的是一件完美的纪念性建筑作品，而广州中山纪念堂则是一件有缺陷的优秀建筑作品。南京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但南京中山陵却不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里程碑，它的成就建立在吕彦直个人才华的高水平发挥与政府行为全力支持的基础之上，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偶然性、特殊性的建筑作品，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普遍水平与发展趋势。后来的同类建筑作品，包括吕彦直本人的同类建筑作品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没有再次达到这种水平。

广州中山纪念堂由广州人民与海外侨胞筹资兴建。“1925 年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广东省当局筹建纪念堂，成立了由广东省主席李济琛主持的建设管理委员会，全面管理建设工程。1926 年 4 月，建委会登报征求设计方案。在二三十名应征者当中，32 岁的青年建筑师吕彦直获第一名。其后，纪念堂设计工作由吕主持，参加者尚有裘燮钧、葛宏夫、庄允昌、卓文扬等，李铿等负责钢屋架结构设计。设计于 1927 年 4 月完成，1928 年 4 月 26 日开工，1929 年 1 月 15 日奠基。施工由上海馥记营造厂以 928085 两白银承包，特从北京聘请彩画技工负责内部装修，基础工程和纪念碑工程另由专业队伍承包。”^[77]吕彦直于 1929 年去世后，设计工作由彦记建筑事务所李锦沛继续完成。纪念堂于 1931 年 10 月 10 日竣工，总造价共约三百多万银元（包括纪念碑和各项分包工程及拆迁补偿费用）。其时林克明白 1929 年起在纪念堂建委会任顾问建筑师，负责审核设计与监理工程。

广州中山纪念堂基址位于广州市行政中心区的中轴线上，原为广州政府总统府旧址，坐落在秀丽的越秀山脚，与纪念堂同时建造的还有越秀山山顶的中山纪念碑，连同越秀山半山腰的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的纪念碑，共同构成一组孙中山纪念建筑。纪念堂设计为八边形平面，中部为观众厅，观众厅分上下两层，共有座位 4608 座，其中首层堂座 2181 座，廊座 837 座，楼座 1590 座，由于设计要求仅为会议使用，所以不设舞台，只设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由于八边形平面的限制，观众厅视线、音响效果都不理想，也没有休息厅，只有观众厅四周的走廊可供观众休息用，较为拥挤。室内从观众厅首层地面至圆拱吊顶高度为 23 米，而从建筑屋顶的宝顶至地面高度为 57 米，大量空间成为服务于建筑形式的无功能空间。吕彦直就是在这种功能与形式的尖锐矛盾中创作了完美的建筑形式，却没有能力解决处处存在的诸多功能问题。（图 6-3-12）

图 6-3-12 广州中山纪念堂平、剖面图。上图：剖面图；中图：二、三层平面图；下图：首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中山纪念堂的建筑形式是完美的，八边形的观众厅顶上覆以单檐亭式八角攒尖顶，形成集中形制的大体量大空间中国民族形式主体建筑，八边形主体建筑的南、北、东、西四面各设抱厦，南面主入口抱厦为七开间，朱红色柱廊，重檐歇山顶，北面抱厦与南面相同，但不设柱廊，东西两侧抱厦则为单檐歇山顶，四面抱厦簇拥着中央单檐亭式八角攒尖顶的建筑主体，构成庄重、丰富又颇具独创性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中山纪念堂仍使用宝蓝色琉璃瓦屋顶，朱红色圆柱，斗拱、彩画、脊兽、宝顶，都依传统形制，但建筑的总体体量

组合方式却使用了西方建筑的设计手法。作者多次考察中山纪念堂，对中山纪念堂建筑形式处理的基本设计手法渐有所悟，其建筑形式构思借鉴了西方集中形制建筑的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结合近代建筑功能要求，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八角攒尖顶置于大跨度大空间的观众厅之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在西方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这正是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构思的成功之处。(图 6-3-13,6-3-14)

图 6-3-13 广州中山纪念堂近景。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图 6-3-14 广州中山纪念堂。照片由作者摄于 1980 年。



五、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期(1927~1937)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在政府行为对“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倡导与支持下,有为期十年的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

潮期。

这一时期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中,与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设计构思思路异曲同工的建筑作品是杨廷宝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如是记载:“音乐台在中山陵的东南角,建于1932年,占地4200余平方米。设计特意利用原有天然坡地,整理、加修路面、踏步,埋设排水管道,铺植草皮而成,观众席地而坐。外圈设计一道半圆形钢筋混凝土花架、花坛和坐凳,种植花草爬藤。花架梁柱尺度宜人,施工精湛,至今历半个世纪,益显得古朴浑厚。舞台照壁系设计主体,壁高约12米,底为须弥座,顶部云纹图案并饰有龙头、灯槽,可种垂挂植物。台下设公共厕所,工具贮藏室等。台前辟一月牙形水池,用以汇集全场雨水,池中养殖金鱼莲萍。”^[78]音乐台在中山陵东南侧,与中山陵近在咫尺,系孙中山奉安大典前后海外华侨捐款建造。音乐台与中山陵同享紫金山优雅的自然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杨廷宝的作品亦深得此中三昧:环境为主,建筑服从环境。设计利用原有地势略加点缀而成,身临其境,首先感受到的是自然环境之美,然后才体验到建筑之美,建筑虽退居次位,但处处融于自然环境之中,处处可见建筑师的匠心,深厚建筑素养体现于每一个经过仔细推敲的细部。(图6-3-15)

音乐台的大格局亦源自西方建筑模式,无论半圆形花架,向心倾斜的草地,还是露天舞台与照壁,都留下西方园林建筑几何形体构成的痕迹,但建筑的每一个细部都已经中国化了,这种中国化的西式园林建筑,正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典范。杨廷宝不取遍布江南的传统戏台建筑、园林建筑为参照模式,而取西方几何形体构成的园林建筑为参照模式,应当是因音乐台设计于中山陵建成之后,受中山陵雄浑气势的感染所致。试想,小家碧玉的江南传统戏台、园林建筑模式如何能与中山陵的气势呼应呢,只有这种几何形体构成模式的园林建筑,才能适应与中山陵近在咫尺的特殊地理位置。(图6-3-16,6-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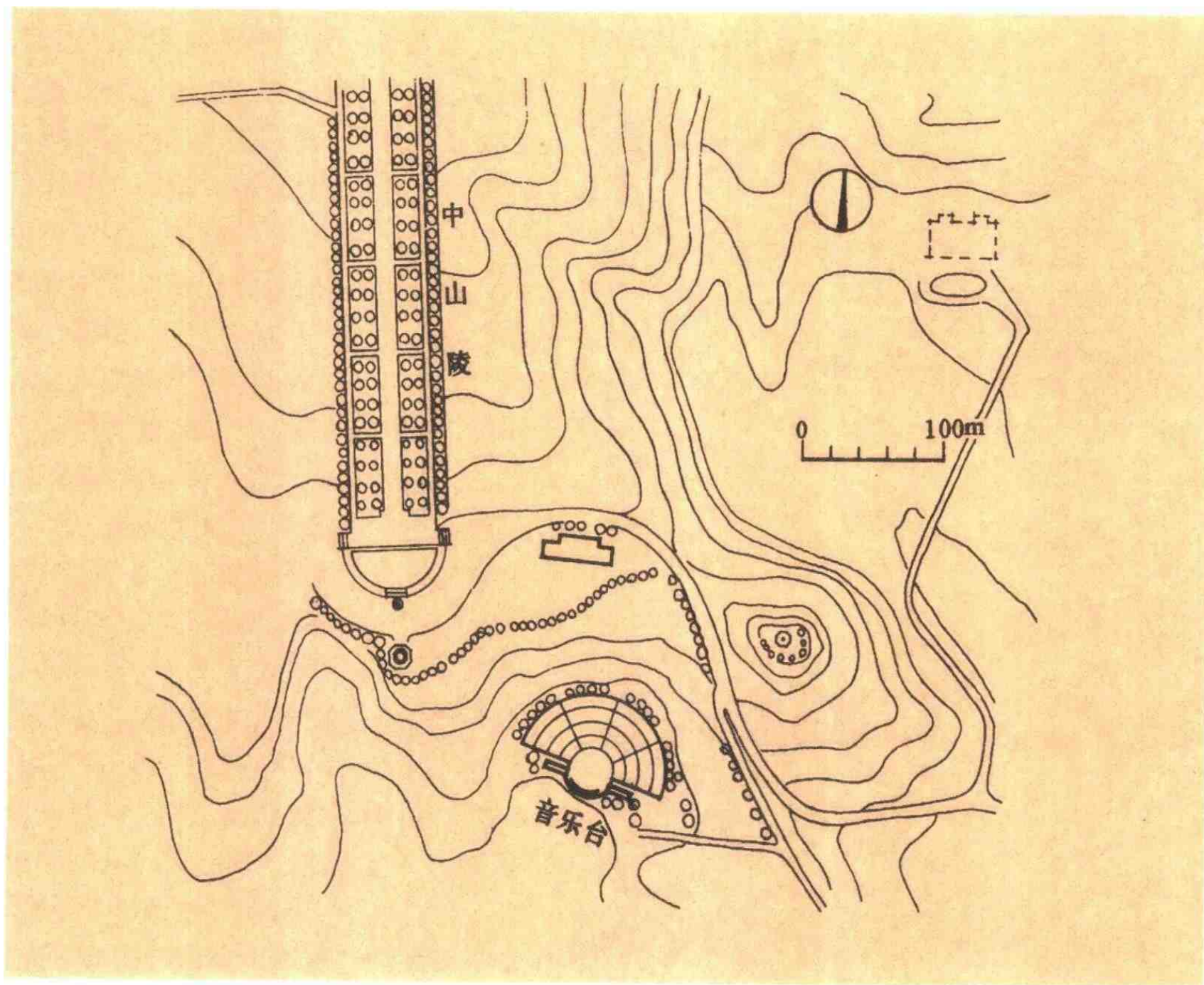


图6-3-15 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总体位置示意图。原图载《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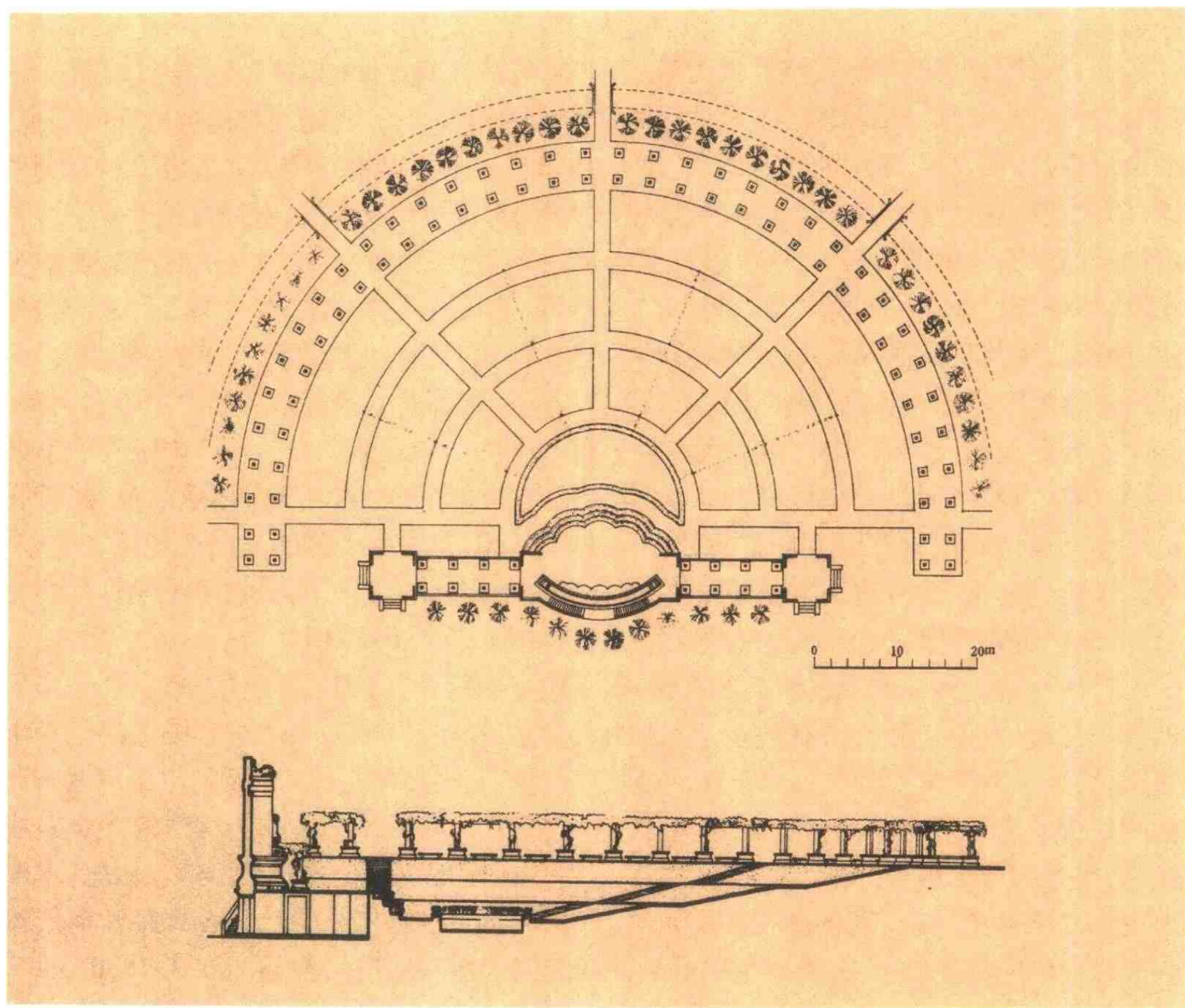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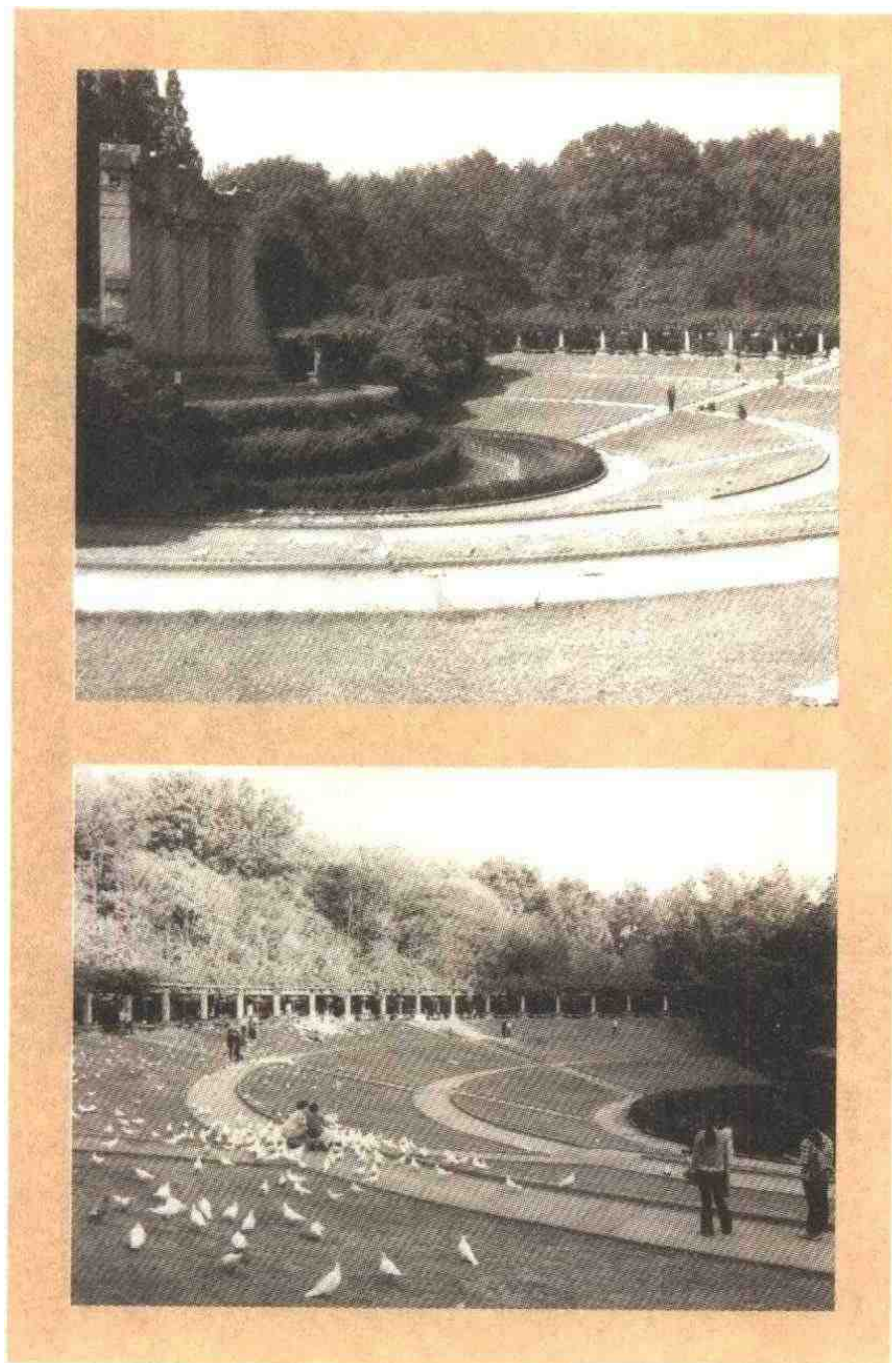


图 6-3-16 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平、剖面图。上图：平面图；下图：剖面图。原图载《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图 6-3-17 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全景。上图：上午从东面看中山陵园音乐台；下图：傍晚时分从西面看中山陵园音乐台。建筑融合于自然环境之中，建筑师的功绩首先是利用自然环境，保护性地改造自然环境。设计构思留下西方园林建筑几何形体构成的印迹，但建筑的每一个细部都已经中国化了。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但是音乐台却是地道的中国建筑，半圆形花架立于花坛之上，花坛却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须弥座变化而来。舞台照壁作成弧形，上部挖一横向凹槽作灯槽，这本是西方建筑的雕塑造型设计手法，但照壁顶部的云纹花饰使其顶部自然形成丰富的轮廓线，横向凹槽中嵌入三个石雕龙头，又使照壁充满中国建筑情趣，照壁下部的须弥座更是精致丰富，造型完美。作者在音乐台流连竟日，深感建筑师深厚的中西建筑文化素养已落实到这座建筑的每一个细部。难怪杨廷宝将中山陵园音乐台列为自己的最佳作品之一，“他在自己众多作品中，相当偏爱中山陵音乐台和谭墓这两例，至老徘徊不已。”^[79](图 6-3-18, 6-3-19, 6-3-20)值得注意的是，谭延闿墓设计于 1931 年，建成于 1933 年，中山陵园音乐台建成于 1932 年，杨廷宝受聘于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参加和主持当

时北平九处古建筑的修缮工程则是在1932-1935年间,他自己偏爱的这两件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都是赴北平参加和主持古建筑修缮工程之前设计的。换言之,杨廷宝的这两件自己认可的最佳建筑作品的创作与参加和主持古建修缮工程并没有因果关系。一个优秀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深刻理解主要源自其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也包括中华建筑文化素养,但这种素养却是建立在自小耳濡目染的中华文化熏陶的基础之上,并不需要建立在直接研究、测绘、修缮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之上,那更多的是建筑史家的工作。这一点是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的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这一课题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主要体现于作为政府行为的官方建筑,而这些官方建筑主要集中建造于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按1929年《首都计划》的要求,建筑形式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使这一时期南京建造的一批官方建筑都采用了中国建筑民族形式。1927年夏至1929年冬,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特别市政府开始酝酿和制订上海都市发展计划,于1930年1月制订了《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并在江湾五角场一带划定7000余亩土地开发上海市中心区,这一计划只得到局部实施。由于是政府投资的官方建筑,也同样强调以“中国固有形式”为设计准则,因而形成此时期上海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的一次小小热潮。这一时期,广州、北京、青岛等城市也建造了一些“中国固有形式”建筑。这一批政府投资的官方建筑,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因政府倡导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作了三种不同趋势的尝试与探讨,即套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构成模式的整体仿古模式;在建筑整体采用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的基础上局部增加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或楼阁作为“中国固有形式”标志的局部仿古模式;以及建筑整体采用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局部施以中国传



图 6-3-18 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弧形花架细部处理。照片由作者摄于2001年。



图 6-3-19 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屏风中国化的细部处理之一。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构成要素却创造性地设计为弧形,在传统形制的基础上增添了几分新意。照片由作者摄于2001年。



图 6-3-20 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屏风中国化的细部处理之二。屏风的横向凹槽与凹槽中嵌入的龙头。照片由作者摄于2001年。

统建筑装饰的简约仿古模式。由于探索时间的短促,探索范围的限定,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这一次探索并未形成固定的风格模式,但仍然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整体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基本特征是:维持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基本建筑形式构成形态,包括横向展开的基本建筑体量,由屋顶、屋身、基座构成的横向三段式构图模式,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仿造的柱式、额枋、斗拱等建筑部件,及不可或缺的中国式大屋顶。与此前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教会大学的中国民族形式校舍建筑相比,中国建筑师仿的更像,仿的没有错误,但也只是更像和没有错误而已,并无新的创意。

这类建筑的典型实例是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杨廷宝设计,1934年设计,1935年2月动工,1936年7月建成。陈列馆是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层按基座层处理,以实墙面为主,仅开小窗,平面大于二层部分的屋顶为平台,作望柱栏杆中式勾栏,以突出其作为建筑基座的形式特征。二、三层作五开间重檐歇山顶,重檐的下檐之下为二层,下檐之上为三层,所以将重檐的上檐升高,在上、下檐之间开柱间通宽玻璃窗,供三层房间采光。这座建筑就这样将一座具备近代建筑功能的陈列馆塞进了用近代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的程式化的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外壳之中。建筑形式构图是完美的,这是杨廷宝所有作品的共同特征;建筑形制是标准的,其时已有在北京修缮古建筑经历的杨廷宝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所有细节都已了然于胸。但陈列馆的设计构思却失去了设计中山陵园音乐台时的灵气,这也许是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图6-3-21,6-3-22,6-3-23)这类建筑作品还有南京谭延闿墓之祭堂(杨廷宝设计,1931年设计开工,1933年建成),(图6-3-24)南京中山陵园藏经楼(卢树森(卢奉璋)设计,1935年3月开工,1936年10月建成),(图6-3-25)南京国民党中央博

图6-3-21 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二层平面图。原图载《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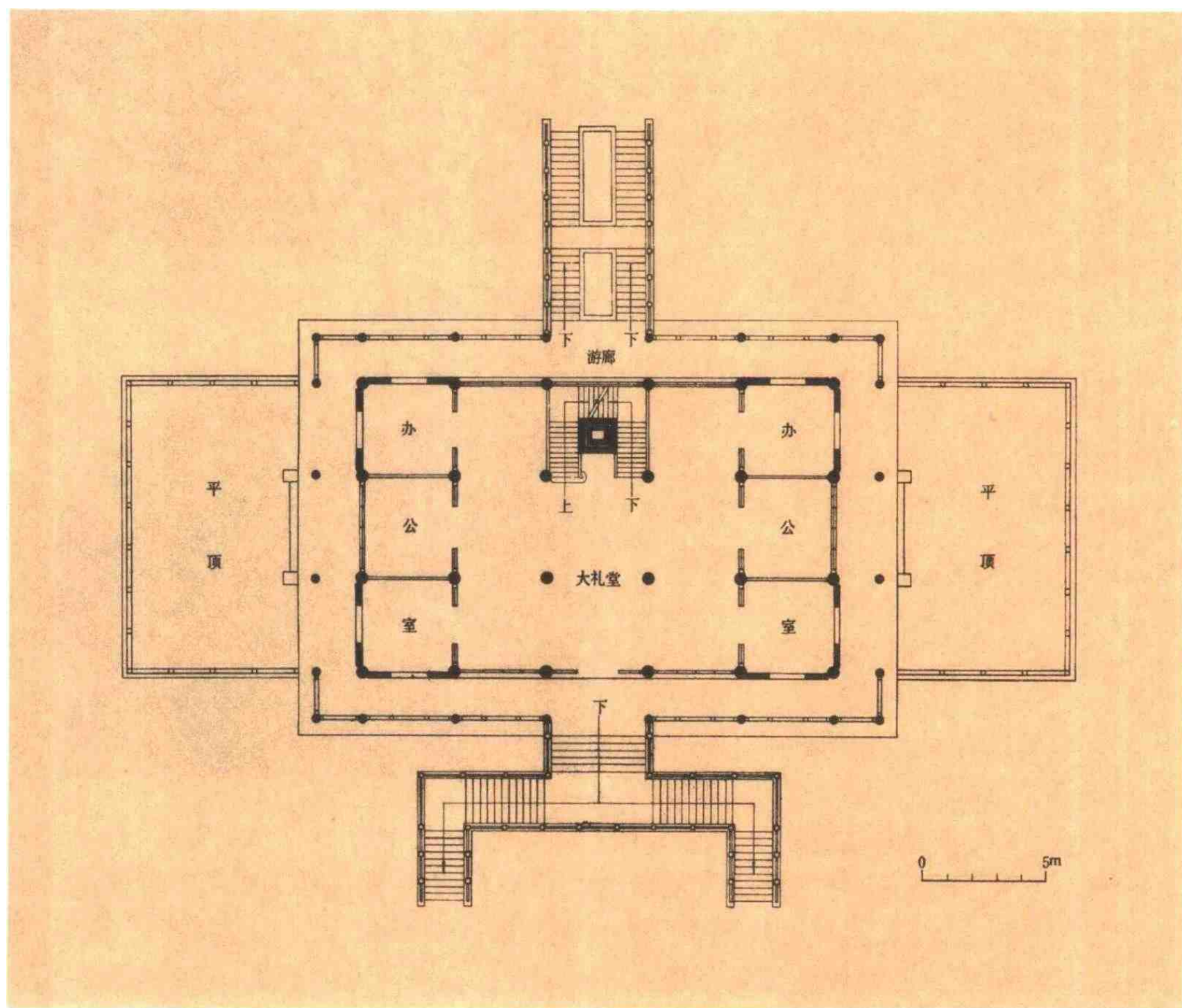




图 6-3-22 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图 6-3-23 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正宗的仿古细部处理。左图:屋顶;右图:檐口。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博物院(兴业建筑事务所徐敬直、李惠伯设计,梁思成顾问,1935—1936 年设计,1936 年开工,1948 年建成)等。其中(国民党)“中央博物院更是以钢筋混凝土结构做出地道的辽代佛寺大殿的形象,它的瓦当、鸱尾等构件都是经过一番考证后加以制作的,檐柱还做出‘升起’、‘侧脚’,保持着严格的辽式细部”。^[80]

(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于 1935 年计划建设自然馆、人文馆与工艺馆,拟分三期进行,一期工程包括行政办公楼与人文馆等,人文馆暂由三馆共用。1935 年 4 月 16 日,由翁文灏任委



图 6-3-24 南京谭延闿墓之祭堂。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二期,1933 年 8 月。



图 6-3-25 南京中山陵园藏经楼。原图载《南京民国建筑艺术》。

员长,张道藩、傅斯年、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具体领导建筑工作的“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通过了征选建筑图案章程,邀请李宗侃、李锦沛、徐敬直、杨廷宝等 13 位建筑师送设计图参选。除一人来函辞谢外,其余 12 人都送来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及刘敦桢、梁思成、张道藩、李济等 5 人组成。经审查,全部图案均不符合章程规定,故决定从各图中选出比较合用,最有修改价值的图案。经不记名投票,审查委员们一致选出兴业建筑事务所徐敬直设计的图案为当选图案,报呈(国民党)教育部备案。(国民党)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聘请徐敬直为本院建筑师,由他会同专门委员梁思成等修改原图,测量院址,并指导、监督建筑工作。另外,建筑委员会还奖励陆谦受、杨廷宝等 4 人以 2000 元至 500 元不等的奖金,参选方案于同年 10 月公开展览。(国民党)中央博物院一期工程于 1936 年 6 月动工兴建,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工程于 8 月停工,直至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 12 月才重新开工,仍按原设计图施工,1948 年 4 月竣工,包括人文馆陈列室、大小讲堂及图书室、理事会及院长办公室、人文馆保存库、研究室等。^[81](图 6-3-26,6-3-27,6-3-28)

图 6-3-26 南京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将 1935 年南京国民党中央博物院“征选建筑图案”与 1925 年南京中山陵“陵墓悬赏征求图案”两次重要的中国民族形式官方建筑设计方案竞赛作一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从评委构成看,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评委中的相关专业专家为土木工程专家一人,外国建筑师一人,画家一人,雕刻家一人;而国民党中央博物院设计方案竞赛的评委中相关专业专家为建筑史家二人——同为中国营造学社职员的梁思成与刘敦桢,梁思成还是(国民党)“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具体领导建筑工作的专门委员。这样的评委构成,当然导致完全不同的评选结果。中山陵的评选重方案构思,也考虑经济因素,因此吕彦直富有创意的设计方案理所当然地获得大奖。(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的评选重视的已经不是方案构思而是建筑仿古的朝代选择。其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已取得许多成果,1932 年,梁思成等调查河北蓟县独乐寺,并发表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蓟县观音寺白塔记》,论证独乐寺建于辽代,这是当时所知最古的一座木构殿堂。1932 年 6 月,梁思成等调查河北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并发表调查报告,这是继蓟县独乐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辽代建筑。1934 年,梁思成应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邀,拟定蓟县独乐寺、应县佛宫寺木塔修葺计划。^[82]正处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学术高峰期的梁思成,为辽代建筑优秀作品蓟县独乐寺的发现而兴奋不已,且正投身于其修葺计划的拟定,如何能对建筑师们的仿清式建筑方案满意呢?更加刘敦桢也同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专家,于是否定所有方案,选定徐敬直方案后由梁思成、刘敦桢两位顾问指导,将仿清式建筑改为仿辽式建筑,以蓟县独乐寺山门为蓝本,所有细节一一考证仿造,于是产生用钢筋混凝土建筑仿造的正宗的仿辽式宫殿建筑——付诸实施的国民党中央博物院。这已经属于建筑史家考古复原性质的仿古建筑,与其说是建筑师徐敬直、李惠伯的作品,不如说是作为建筑史家的梁思成借建筑师之手实施的,复原辽代宫殿建筑的学术研究式的工程实践。虽然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留下一件特殊的建筑作品,自有其独特的贡献,但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建筑,并无普遍意义,这一特例也不能反映当时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总体趋势。

广州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领域颇有成效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除前述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外,中国建筑师林克明在广州的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中



图 6-3-27 南京国民党中央博物院建筑细部之一。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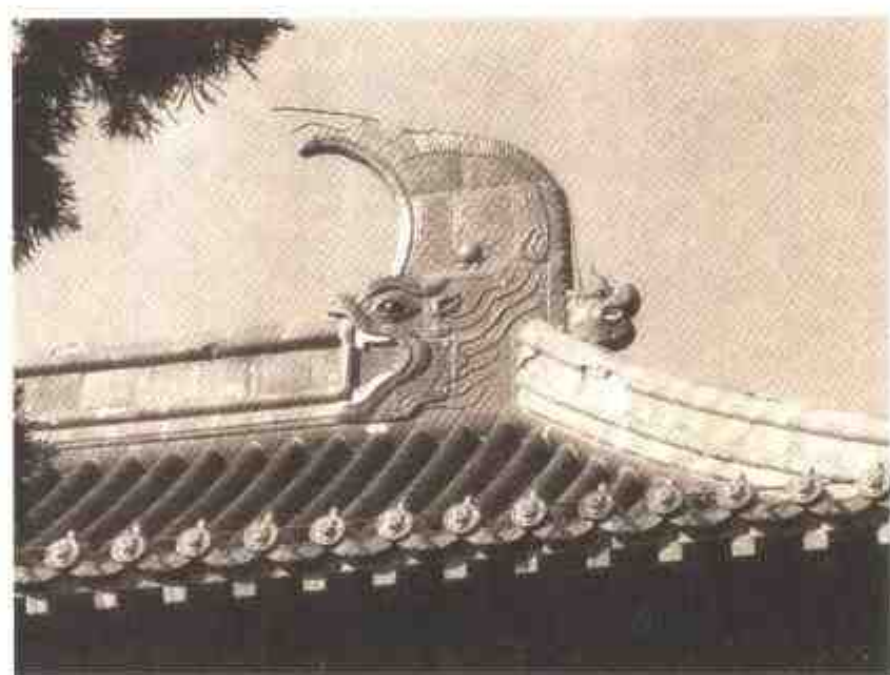


图 6-3-28 南京国民党中央博物院建筑细部之二。仿辽式建筑的正吻、瓦当。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也作出贡献。林克明,1900年出生,1918年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英语系修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被选送到刚刚成立的里昂中法大学进修建筑工程,其后,进入里昂建筑工程学院。1926年春在巴黎 Agasche 建筑事务所实习半年,1926年冬毕业回国,任汕头市政府工务科科长。1928年从汕头至广州,任广州市工务局设计课技士,1928-1929年设计广州中山图书馆。1930年,受聘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工程顾问,负责工程设计的技术审核与现场监理工作。1929年兼任广州第二职业学校讲师,随后任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大专学制)兼职教授。1932年,广东省立勳勤大学成立,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改为该校的工学院,林克明建议校方设立建筑工程系,获批准并任命林克明为建筑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1932年,林克明辞去工务局职务,专心在勳勤大学任教,并

成立了林克明建筑设计事务所。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于1938年10月21日沦陷,林克明在勳勤大学的教学生涯告一段落。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再任中山大学建筑系教授。^[3]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林克明主要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有:广州中山图书馆(1928~1929),(图6-3-29,6-3-30)广州市府合署(1930~1934),广州中山大学校舍建筑二期工程(1933~1935),包括农学院化学馆,理学院教学楼,物理系教学楼,天文系教学楼,化学系教学楼与法学院教学楼。(图6-3-31)另于1935年参加旧广东省府合署方案设计竞赛获

图 6-3-29 广州中山图书馆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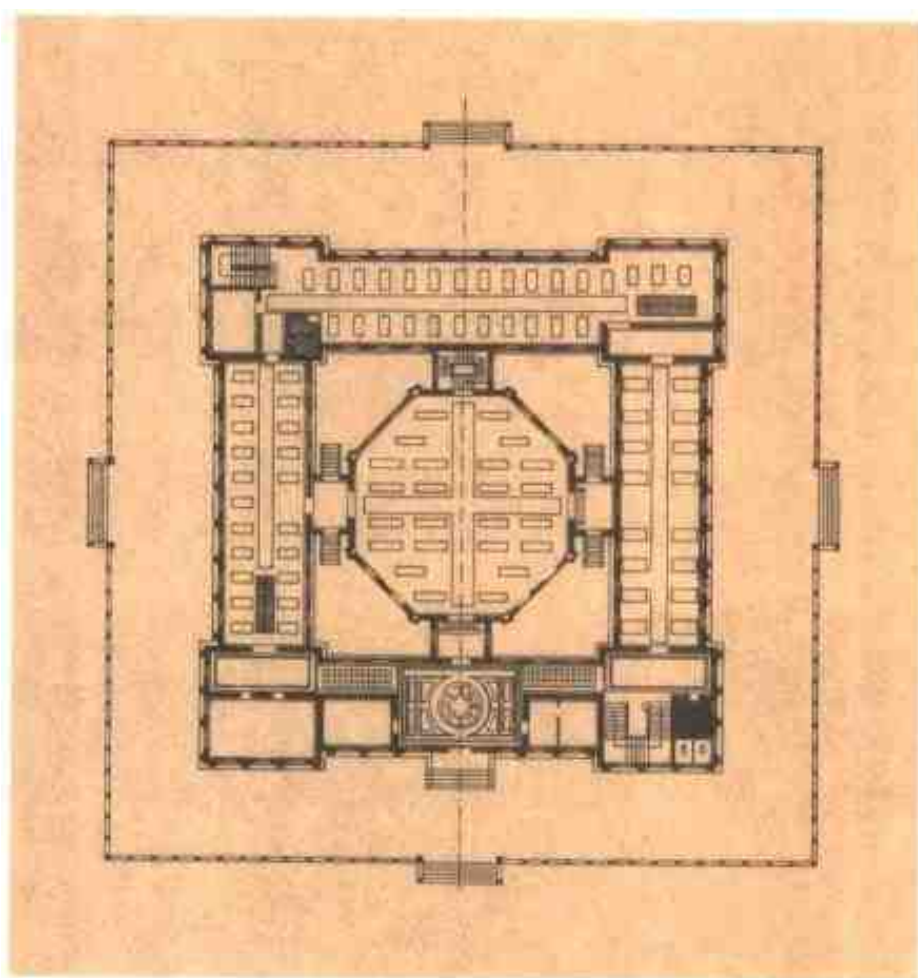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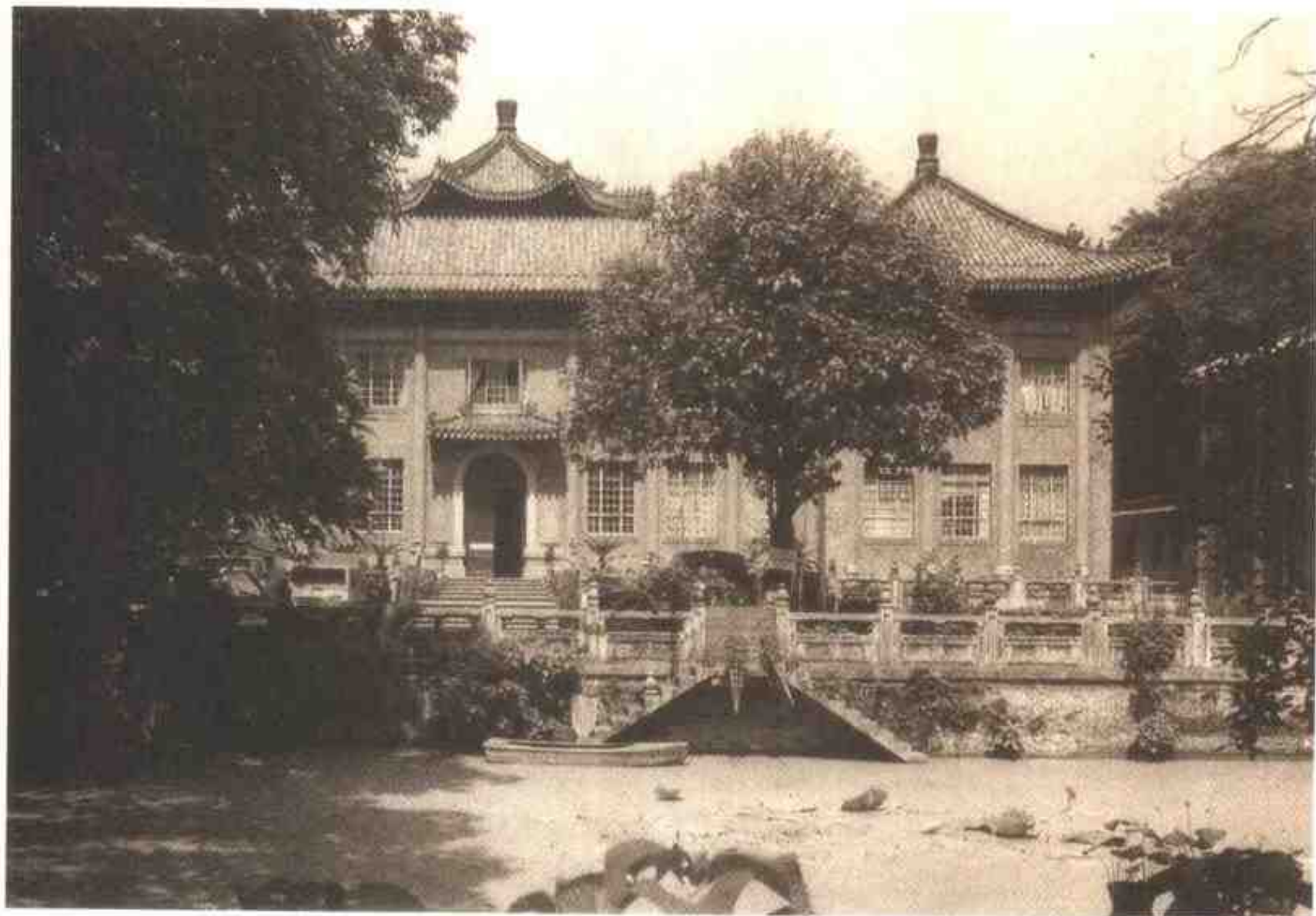


图 6-3-30 广州中山图书馆。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金牌奖,但未实施。中山大学农学院教学楼方案亦未实施。

旧广州市府合署于1929年8月至10月登报征求设计方案,共征得方案十余份,应征者为余清江、高大钧、陈立洲、刘既漂、杨锡宗、林克明、何想等。1930年1月,公布评定结果为:第一名林克明(得15分),第二名余清江(得9分),第三名高大钧(得6分),最后以林克明的方案为实施方案。旧市府合署“图案系根据当时征求图案条例设计,于规定各项条例符合



图6-3-31 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教学楼。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外,且能于实用的要求,及美观的感想均能达到好处。合署图案之立体样式,系规定采用中国建筑图样,故本设计系根据中国式图样及合署的精神,为设计要素。”^[6]因建筑规模较大,旧广州市府合署设计方案将建筑分为若干部分,组合成周边式建筑,院内设有会堂,局部设重檐歇山顶与重檐庑殿顶,建筑的天际轮廓线较为丰富,已是介于整体仿古模式与局部仿古模式之间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因资金不足,分三期建设,第一期工程于1931年4月开工,1934年10月建成,但二、三期工程因1936年广东政局发生变化而停建,以后就再也没有建造。现在看到的旧广州市府合署(今广州市府大楼)只是设计方案的一部分。(图6-3-32,6-3-33,6-3-34)

青岛在1931年至1937年12月沈鸿烈任市长期间也建造了一些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但数量不多,而且体量都不大,并没有破坏青岛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只是作为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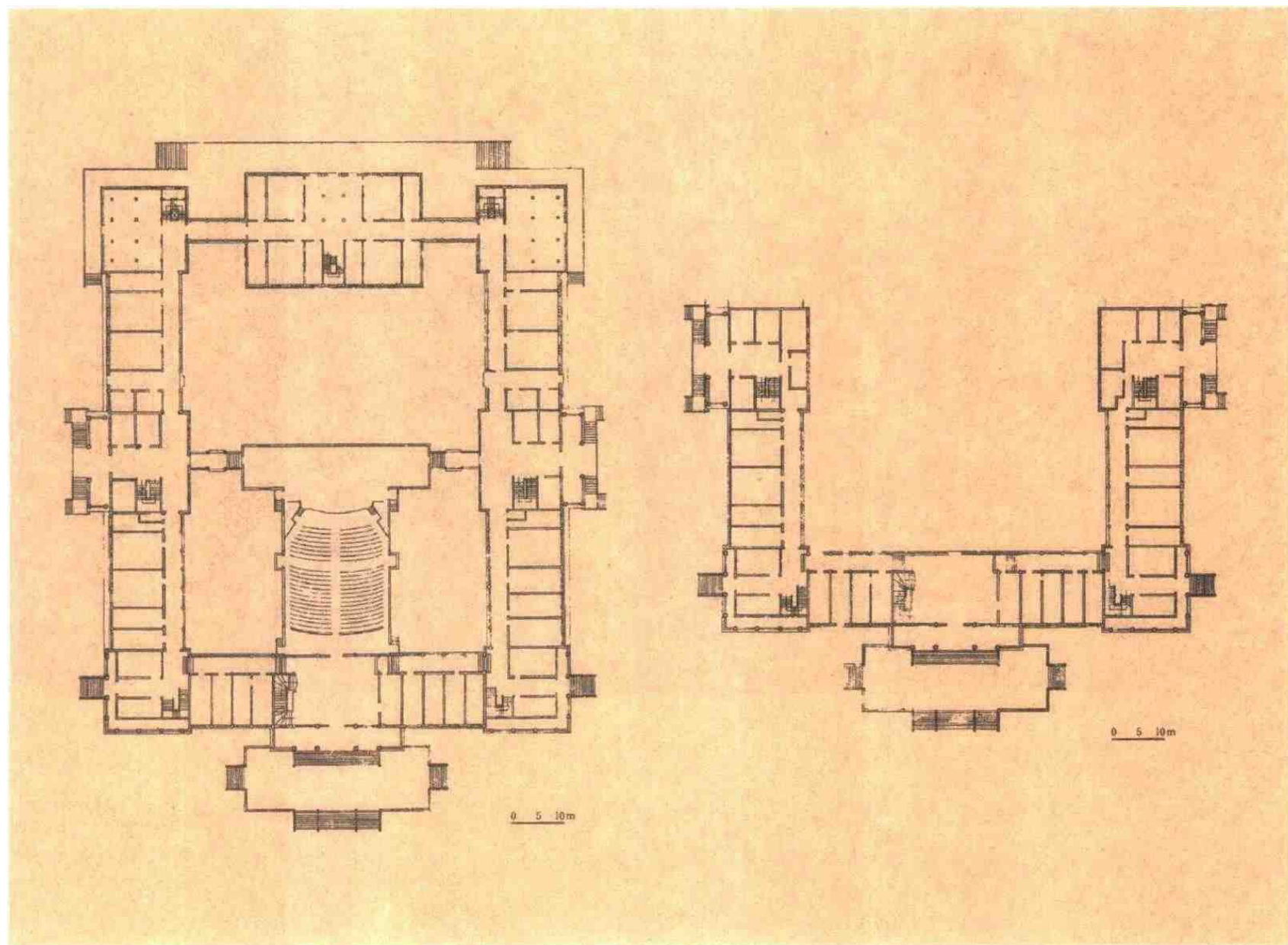


图6-3-32 旧广州市府合署平面图。上图:原设计方案首层平面图。下图:实施的一期工程首层平面图。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图 6-3-33 旧广州市府合署外景之一。原图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图 6-3-34 旧广州市府合署外景之二。照片由谢少明供稿。

风景区的点缀散布其间。这些建筑包括：若愚公园(今鲁迅公园)主入口的中国传统牌坊建筑(北京工匠设计并修建,1931),前海栈桥端部的回澜阁(1933),仿烟台蓬莱阁建造的若愚公园水族馆,及水族馆东面的海滨生物研究所(1936)。(图 6-3-35,6-3-36,6-3-37,6-3-38)



图 6-3-35 青岛若愚公园（今鲁迅公园）主入口的中国传统牌坊建筑。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旧上海市政府大楼是按“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实施的第一幢建筑，1929年开始征集方案，1930年2月评出赵深、孙熙明方案为第一奖，但当时上海市政府对所有应征方案都不满意，于是另请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顾问董大酉在此基础上另行设计。大楼于1931年6月开工，1932年1月因“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停工，战争结束后再度开工，于1933年9月建成。旧上海市政府大楼作为实施“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的重要内容，明确规定：“立体式样应采用中国式。”“市政府为全市行政机关，中外观瞻所系，其建筑格式，应代表中国文化。……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之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矫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市政府建筑，采用中国格式，足示市民以矜式。”^[8]在这种明确的采用“中国式”建筑形式要求的指导下，董大酉的设计方案采用了整体仿古模式，只是建筑体量较大，于是将建筑竖向分为三段，中段作单檐歇山顶，两侧作单檐庑殿顶，将歇山顶与庑殿顶置于同一建筑屋顶，颇有堆砌之嫌。加上功能不合理，结构设计及建筑施工都很复杂，带来许多问题。因此，董大酉在此后设计



图 6-3-36 青岛前海栈桥端部的回澜阁。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图 6-3-37 青岛仿烟台蓬莱阁建造的若愚公园水族馆。照片由作者摄于 1990 年。



图 6-3-38 青岛水族馆东面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原图载《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唐学易稿)。

的上海市图书馆与上海市博物馆就另起炉灶,走上局部仿古模式的探索之路。(图 6-3-39,6-3-40)

局部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基本特征是:在整体上采用西方体量组合设计手法形成的建筑基本体量的基础上,局部添加仿古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如门楼、亭子或屋顶等,形成中国传统建筑标识,以展示其不同于西式建筑的建筑形式特征。

上海市图书馆(1934 年开工,1935 年建成)与上海市博物馆(1934 年开工,1935 年建



图 6-3-39 1933 年 9 月建成的旧上海市政府大楼全景。上图：西侧照片；下图：正面照片。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六期，1933 年 12 月。

成)是局部仿古模式中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典型实例。上海市图书馆与博物馆都位于当时新规划的中心行政区内,两馆东西相对,建筑体量与建筑形态都大体相仿。这两座建筑“馆屋之外观,取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因纯采中国式样,建筑费过昂,且不尽合实用也。”^[86]这是董大酉此前设计旧上海市政府大楼工程的经验之谈,但两馆建成之后还是有费用过昂之非议,“董大酉先生谓市博物馆建筑费规定为三十万元。现在有人非议,认为建筑所费太巨,应加撙节,俾将余资购置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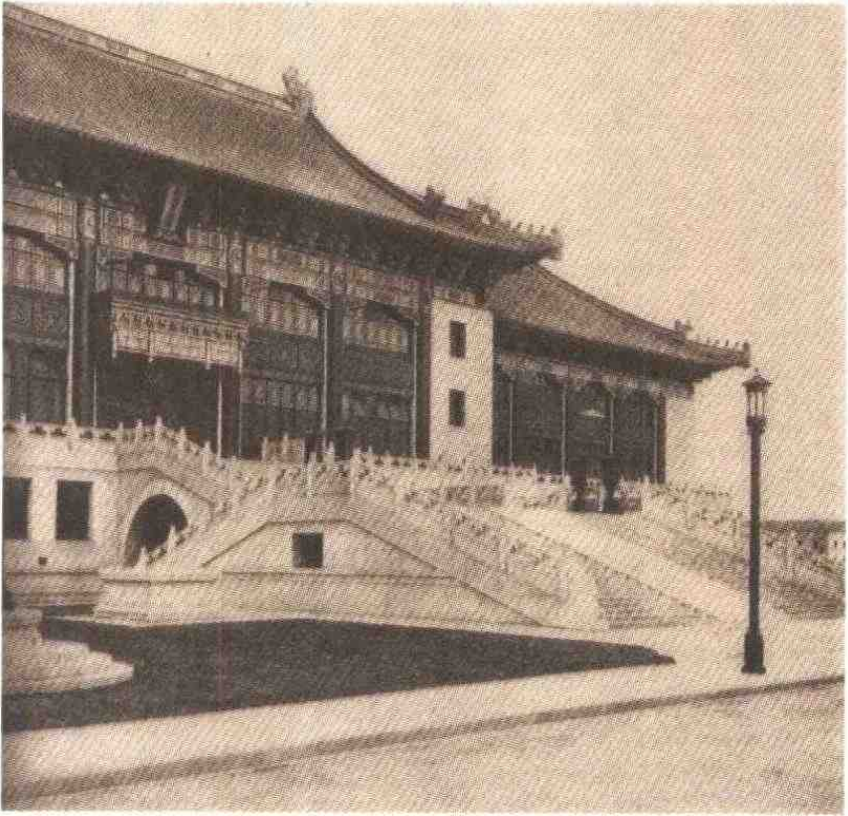


图 6-3-40 1933 年 9 月建成的旧上海市政府大楼近景。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六期，1933 年 12 月。

部陈设。但余(董先生自称)信苟能在建筑费中节省若干,亦必早被移作别用,不复再有余裕矣。”^[87]董大酉之言,答非所问,大屋顶建筑较之平屋顶耗资较多本是正常现象,应当用“中外观瞻所系,其建筑格式,应代表中国文化”所应有文化投资来回答。但上海终究不是南京,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呼声要弱得多,董氏也只好含糊过关。其实,董大酉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也并非发自内心的事业追求,他在为“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设计了一批中国民族形式官方建筑后,却为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现代风格的西式住宅建筑。倒是当时提倡“立体式样应采用中国式”的上海市市长吴铁成身体力行,为自己建造的住宅是纯“中国式”。(图 6-3-41)但是,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在使用西方体量组合建筑设计手法设计的基本建筑体量之上,局部加建中国传统建筑城楼的局部仿古模式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创作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建造的北京火车西站还可以看到这种局部仿古模式的影响。(图 6-3-42, 6-3-43)

图 6-3-41 上海吴铁成住宅。原图载《建筑月刊》,第二卷,第二号,1934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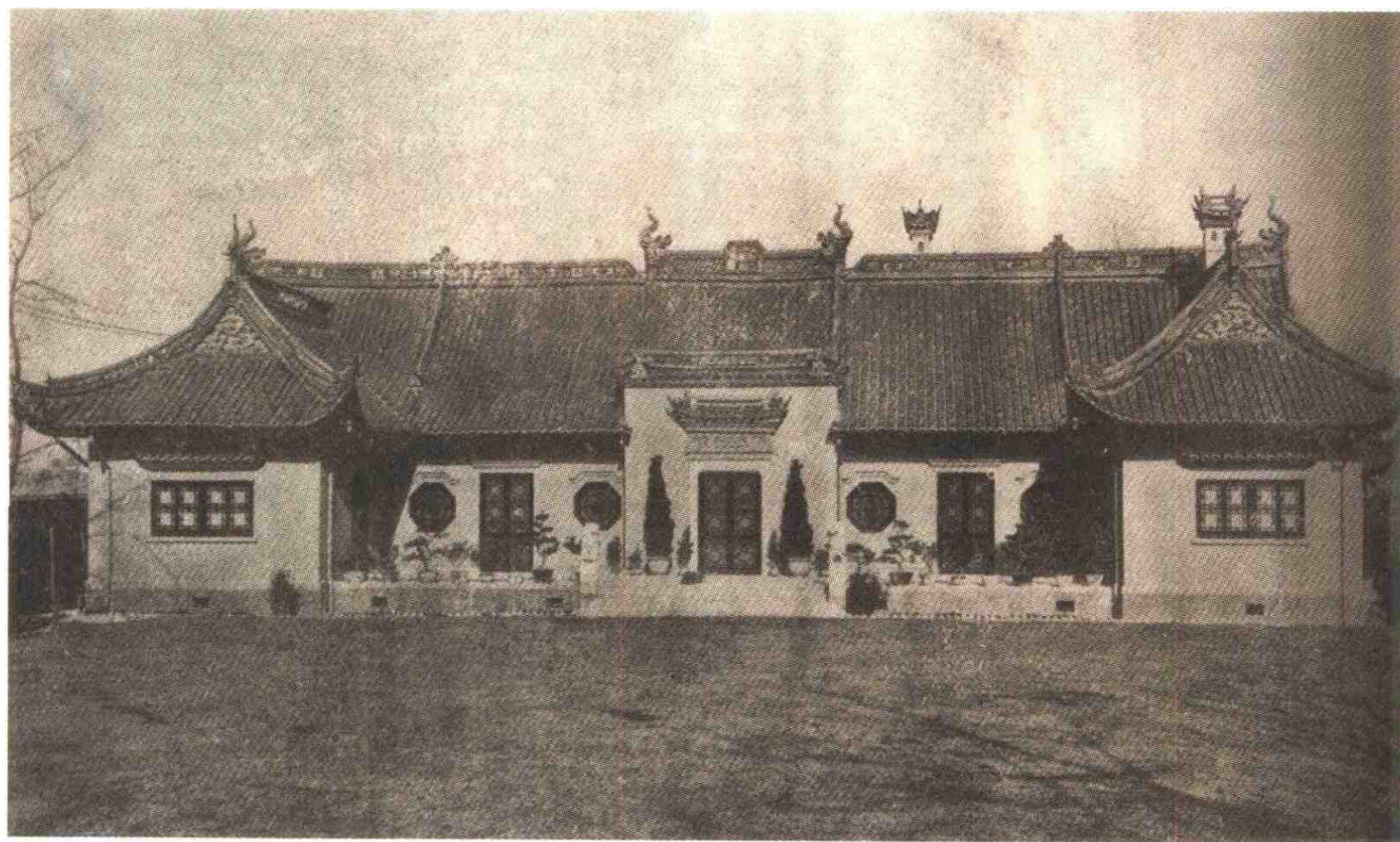


图 6-3-42 上海市图书馆。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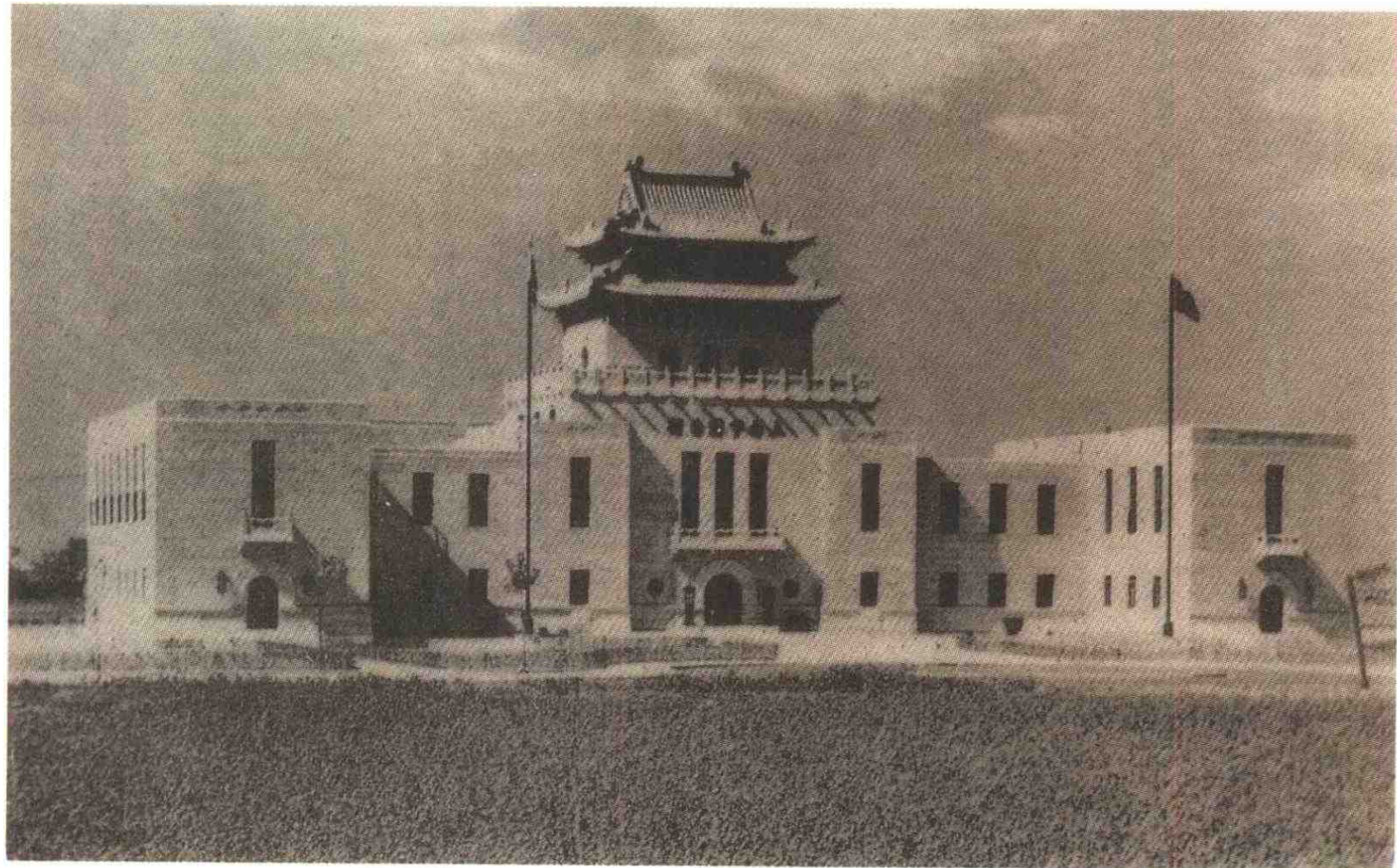




图 6-3-43 上海市博物馆。原图载《上海百年掠影》。

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基本特征是：摒弃大屋顶，基本上使用平屋顶，在基本维持横向三段竖向一段建筑形式构成模式的基础之上，局部施以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主要是局部装饰构成要素，如檐口、须弥座、建筑纹饰、花格、门廊等。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典型实例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最初于 1931 年 3 月由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杨廷宝设计，为工字形平面，重檐歇山顶的整体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方案。（图 6-3-44, 6-3-45）“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屋计划，始于民国二十年春，初议以六十万建造外交宾馆，二十万建造临时办公大楼（外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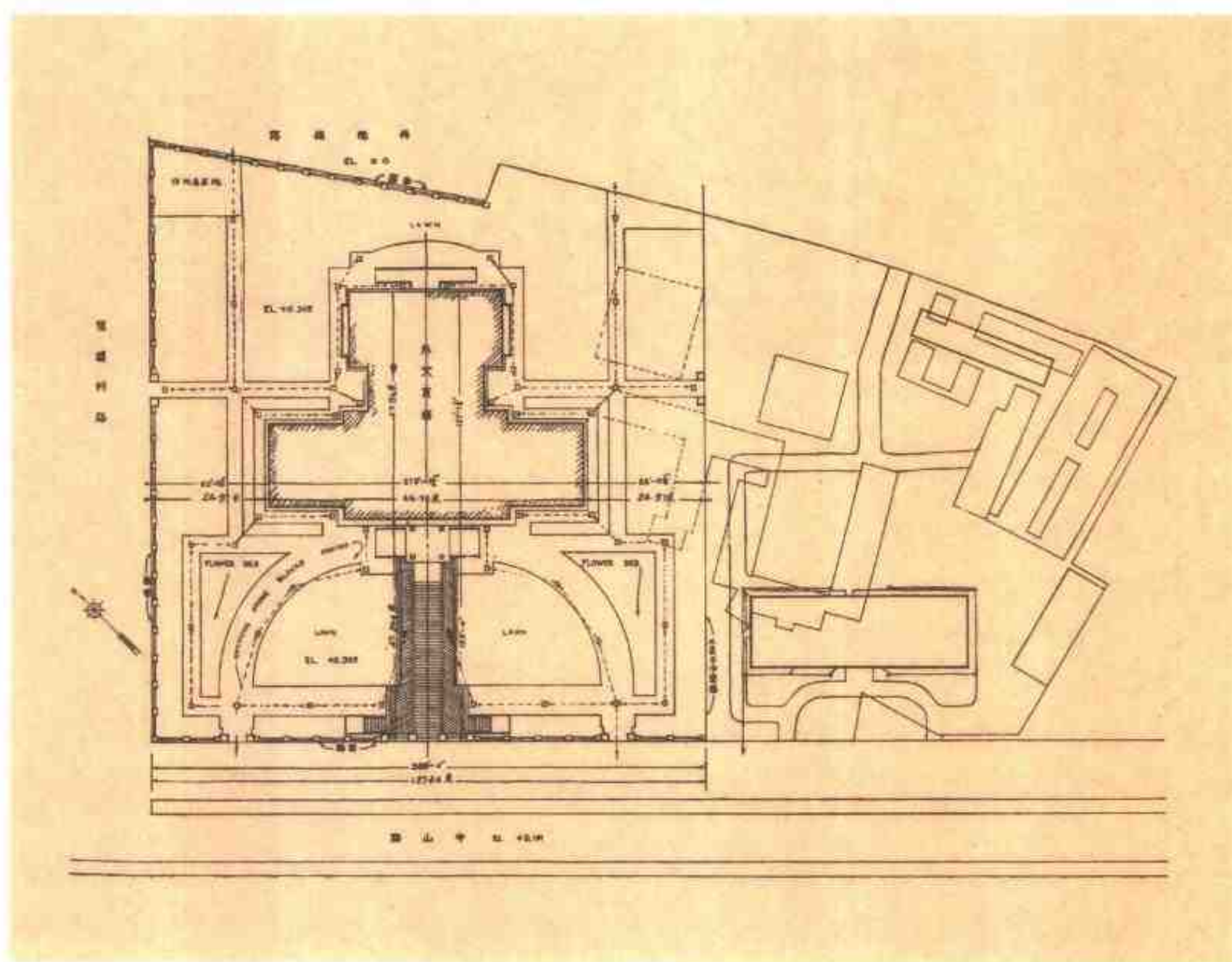


图 6-3-44 基泰工程司设计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宾馆设计方案总平面图（方案未实施，后改为外交部办公大楼，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并实施）。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 年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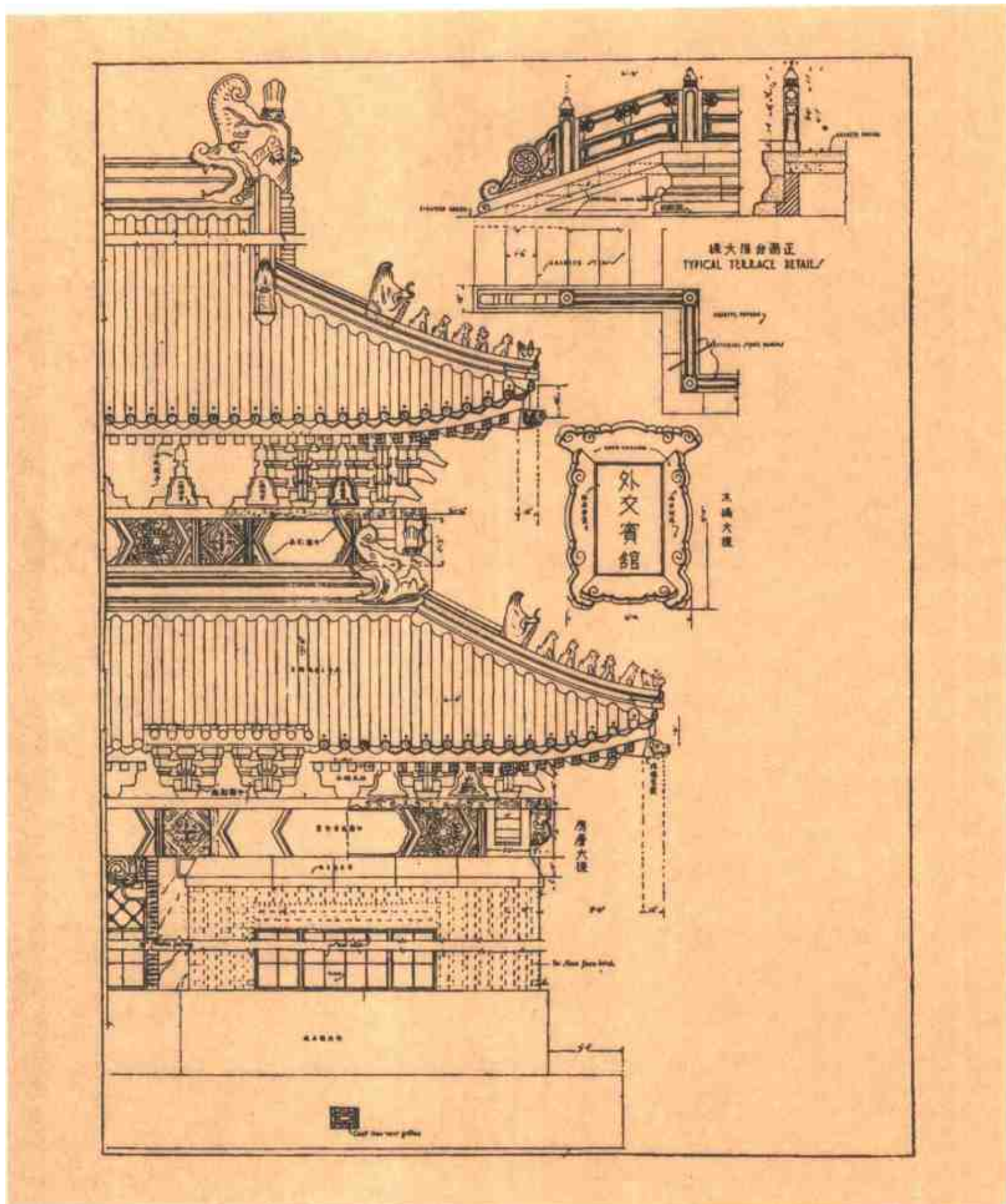


图 6-3-45 基泰工程公司设计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宾馆设计方案局部立面图及详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 年 11 月。

为行政区之一部将来永久计划将在明故宫旧址)。嗣后为求紧缩起见，决定抛弃宾馆计划，并将办公大楼酌量扩展，以其一小部分作为迎宾之用，以合乎实用不求华丽为主要目的。故初拟图样不能适用。第二次设计对于方向又详加研究，因中山路偏南北向，若新屋正面朝西，冬夏两季均不相宜。始决定大楼正面朝鼓楼。在基地之中部辟大圆路，东西辟两门，使往来车马可以东西贯通。”^[88](图 6-3-46)

1932 年设计，1933 年建成的华盖方案在总图布置上作了较大调整，放弃了建筑主立面临街的习惯作法，改由贯通中山路与传德桥路的内部道路及圆形转盘进入建筑主入口，并在建筑四周设计环路，建筑背面亦有直通城市道路的出入口。从整体环境出发，综合考虑建筑布局，是设计观念的更新。但建筑主立面之朝向实际上是由基泰方案之朝西南改为朝东南，而华盖的方案是丁字形，丁字形后部建筑仍朝向西南，与基泰方案无异，因此在朝向上两方案并无优劣之分。对比两个方案的功能布局，排除功能要求改变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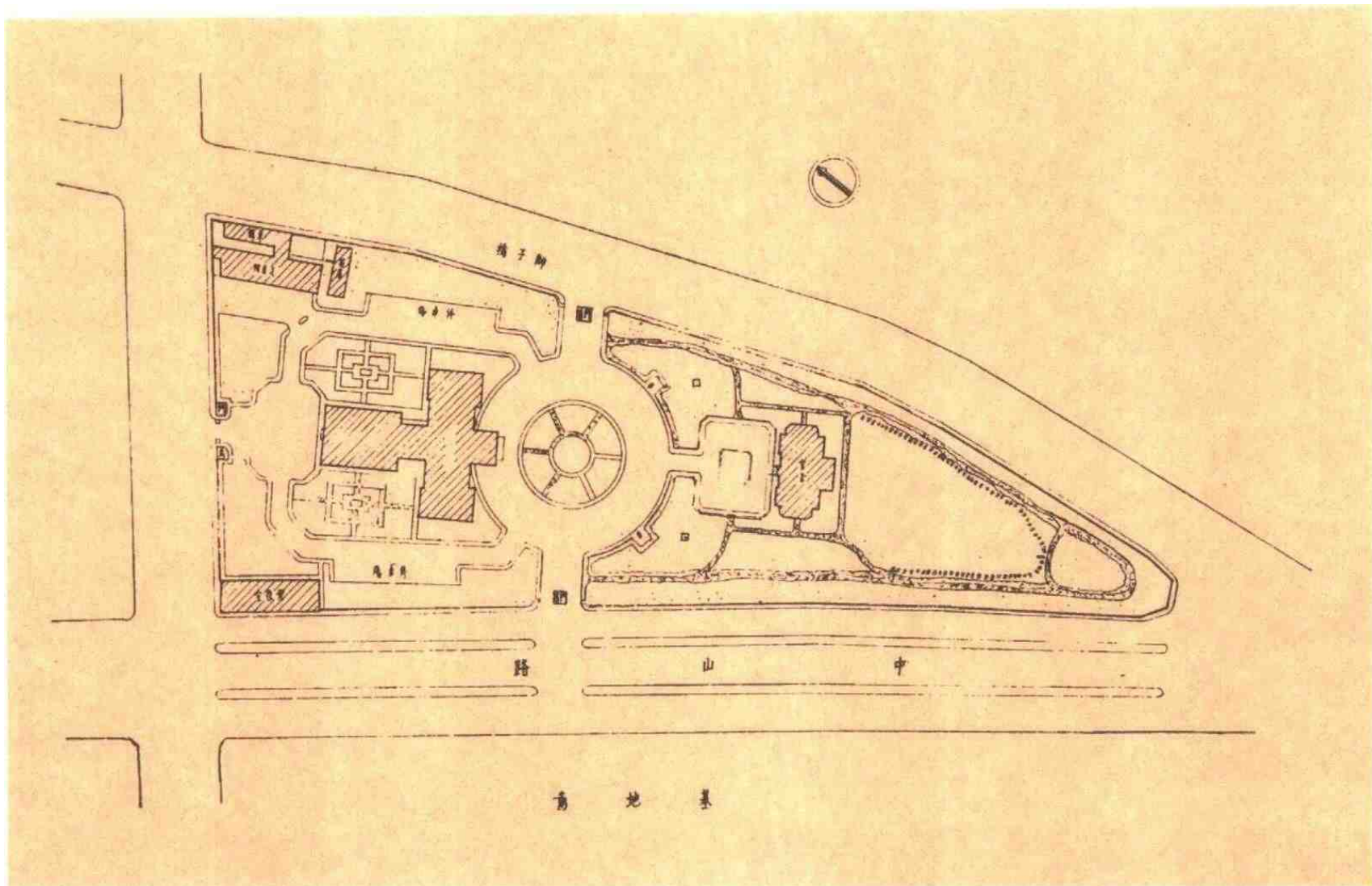


图 6-3-46 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总平面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8月。

素，也没有设计水平上的太大差异。基本差异还是在于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理解——基泰取整体仿古模式，华盖取简约仿古模式。

华盖方案仍保持横向三段、竖向三段的基本立面构图，横向三段为檐部、屋身与勒脚。抛弃大屋顶，只在檐部施以型砖砌筑的斗拱造型，屋身贴面砖，按功能要求开窗，一层作成简化的须弥座式样作为基座，简洁的门廊饰有几个简化的蚂蚱头。但室内还是做了清式彩画天花与大红柱子，应当是对业主要求的妥协。(图 6-3-47, 6-3-48, 6-3-49)

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体现了华盖建筑事务所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基本观念。赵深、陈植与童寯在上海共组华盖建筑事务所，“其间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赵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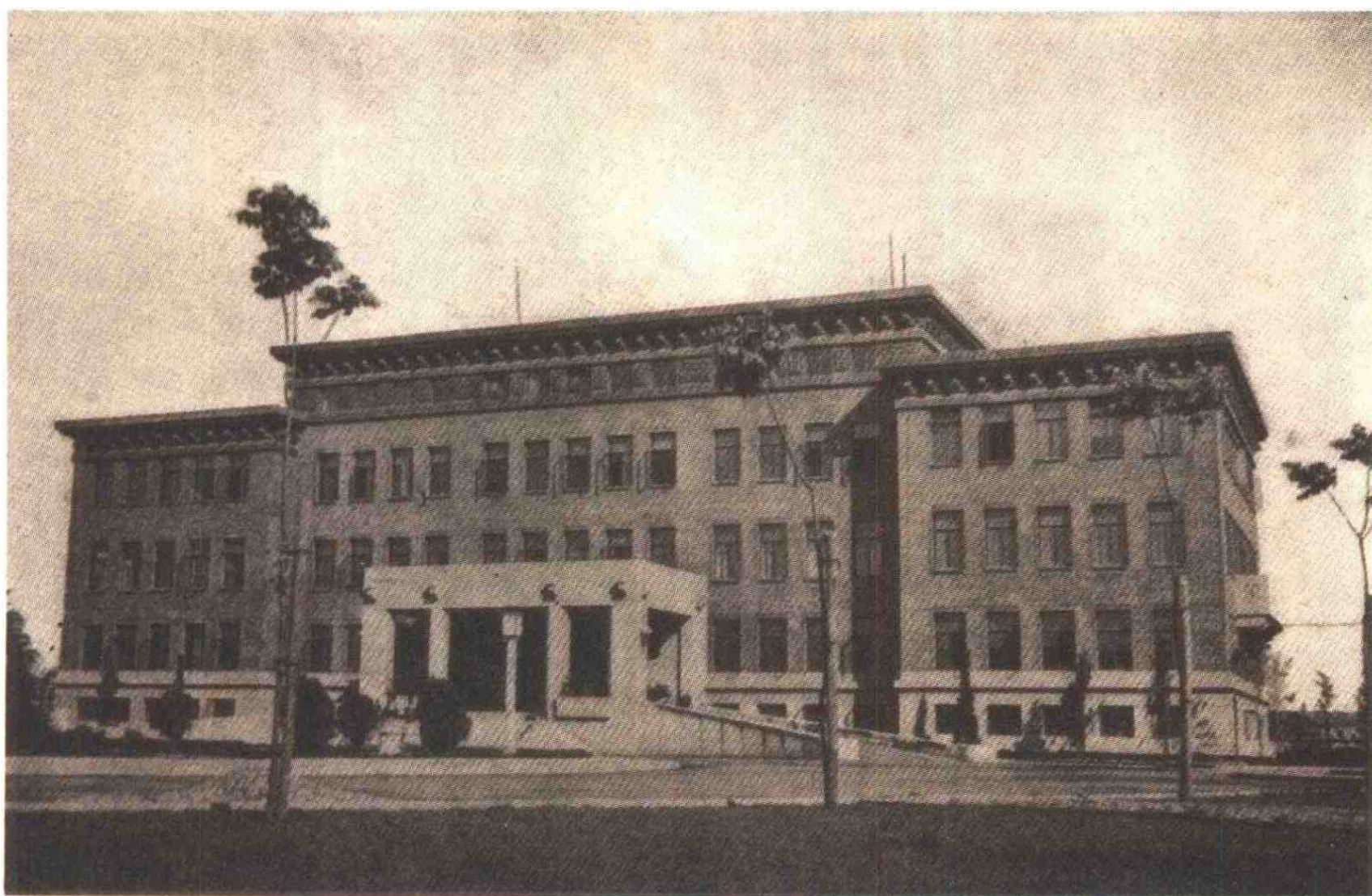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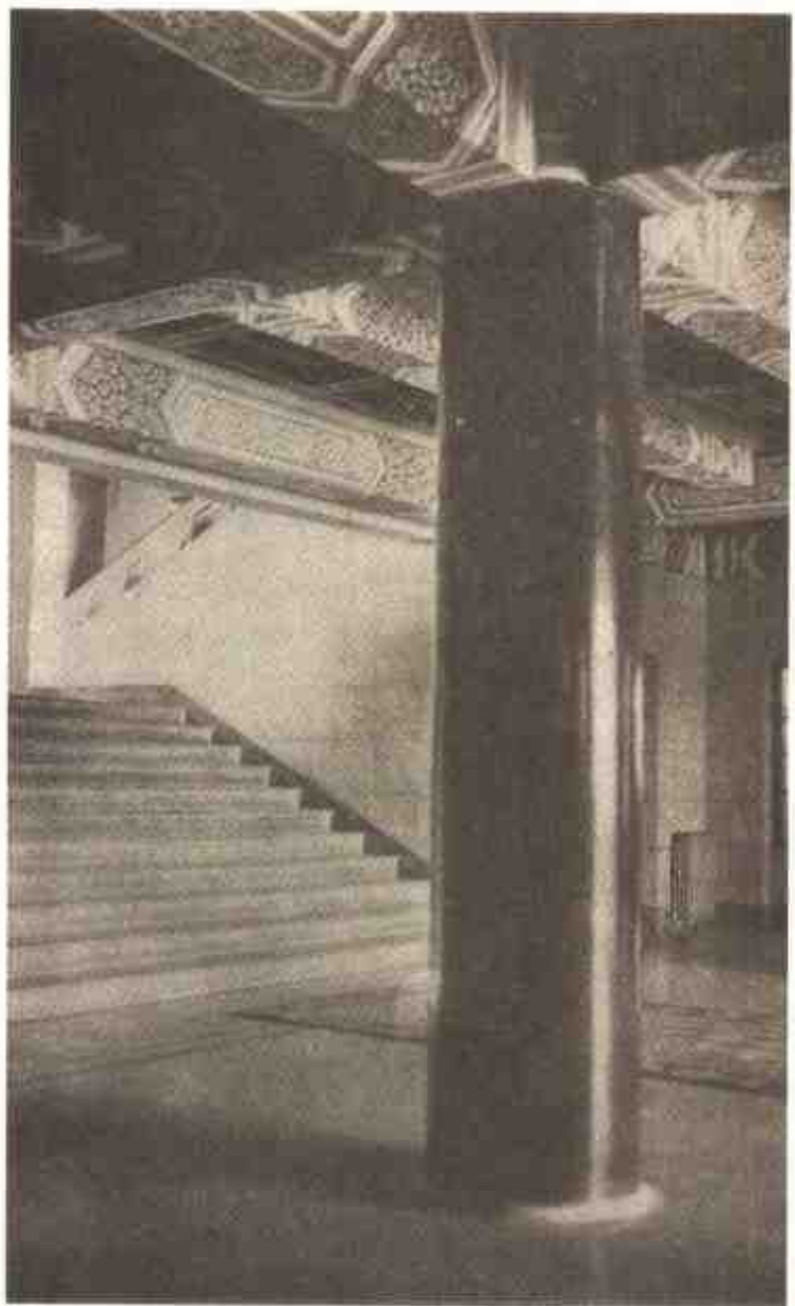


图 6-3-47 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外景。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8月。

图 6-3-48 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入口。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8月。



图 6-3-49 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内景。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8月。



童三人契约的合同中有若干守约，其中一条就是不在事务所外（政府、财团及党派）兼职，而全力于建筑设计探讨和拓展华盖的业务；另一条守约就是摒弃“大屋顶”。^[90]后来在 1946 年，童寯撰文论述中国公共建筑的外观，也极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念：“一个房屋既然建筑在中国，就应该多少表现点中国彩色。我羡慕中国女人的旗袍，合用美观而不脱离本地风光。中国现代的建筑师，在他的太太早已将旗袍设计妥善并充分享用之后，尚未能设计出一座堪与旗袍媲美的房屋。只知道把立体式或好莱坞布景搬来救急。……我们希望宫殿式洋房，在战后中国的公共建筑中，不再被有封建趣味的达官贵人们考虑到。以前很有几座宫殿式的公共建筑，是由业主指定式样而造成的。”“将宫殿瓦顶覆在西式墙壁之上，便成功为现代中国的公共建筑式范，这未免太容易吧。假使这瓦顶为颶风吹去，请问其存余部分的中国特点何在？我们所希望的，是离开瓦顶斗拱须弥座而仍能使人一见便认为是中国的公共建筑。欲达到这目的，既然不能由平面的布置安排有何成就，又很难在建筑物的立面上，靠高下参差或突出凹入而多有收获。一般讲来，建筑师在公共建筑物外表上，能施展才气的地方，恐只在压顶墙基正门附近，或藉雕饰或藉彩色，多少点出一些中国风味。教会大学建筑式样，本系西人所创。他们喜爱中国建筑，又不知其精粹之点何在。只得认定最显著的部分——屋顶——为中国建筑美的代表。然后再把这屋顶移植在西式堆栈之上。便觉得中国建筑，已步入“文艺复兴”时代。居然风行一时。这种式样，在今后中国公共建筑上，毫无疑问的应当成为过去。”^[90]

童寯在此文中还称道“抗战前我国建筑，间有不用宫殿式屋顶而仍带有中国作风的。这已是好现象。并证明中国建筑师，也有觉悟分子，而不是随波逐流的。”^[91]童寯此语，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抗战前的华盖正是不用宫殿式屋顶而仍带有中国作风的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8月）是华盖建筑事务所专辑，刊有华盖作品九件，除上述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外，建于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亦为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而建于南京下关的首都饭店则明确宣称“建筑式样为国际式”，建于上海的六件作品则无一例外都取平屋顶现代建筑形式。

简约仿古模式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还有：北京交通银行(杨廷宝设计,1930年设计,1931年建成),(图6-3-50)南京旧中央医院(杨廷宝设计,1931年设计,1933年建成),南京国民大会堂,(奚福泉、李宗侃设计,1935年建成),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建(梁思成、林徽因设计,1932年),(图6-3-51,6-3-52)上海市体育场(董大酉设计,1934年设计,1935年建成),(图6-3-53)上海市体育馆(董大酉设计,1934年设计,1935年建成)等。在上海简约仿古模式中国建筑民族形式还开始应用于高层建筑,中国银行大楼(中国建筑师陆谦受与公和洋行合作设计,1936~1937)是上海外滩唯一的一幢尝试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高层建筑,也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滩唯一的一幢由中国建筑师设计(与公和洋行合作)的重要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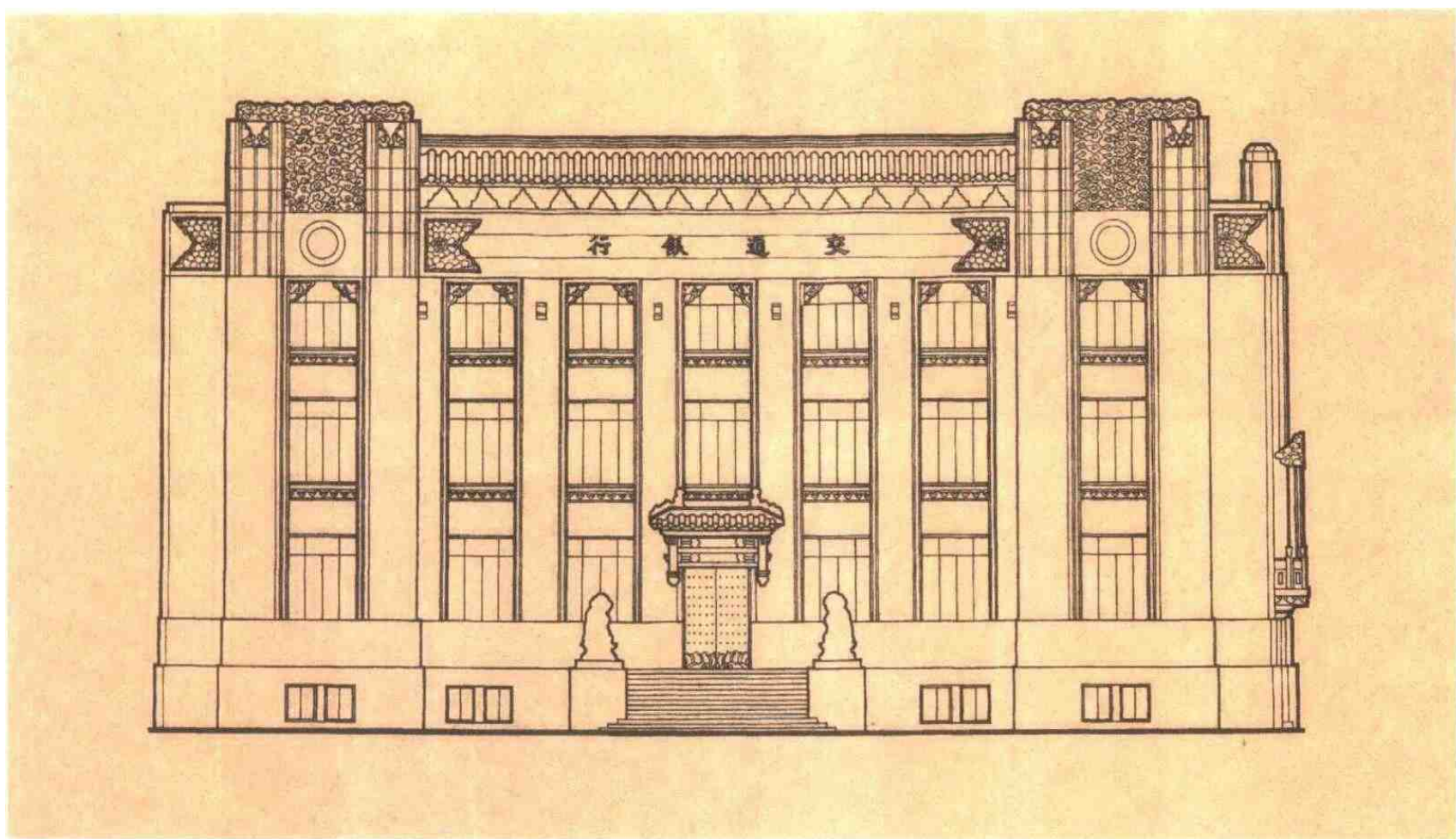


图6-3-50 北京交通银行立面图。原图载《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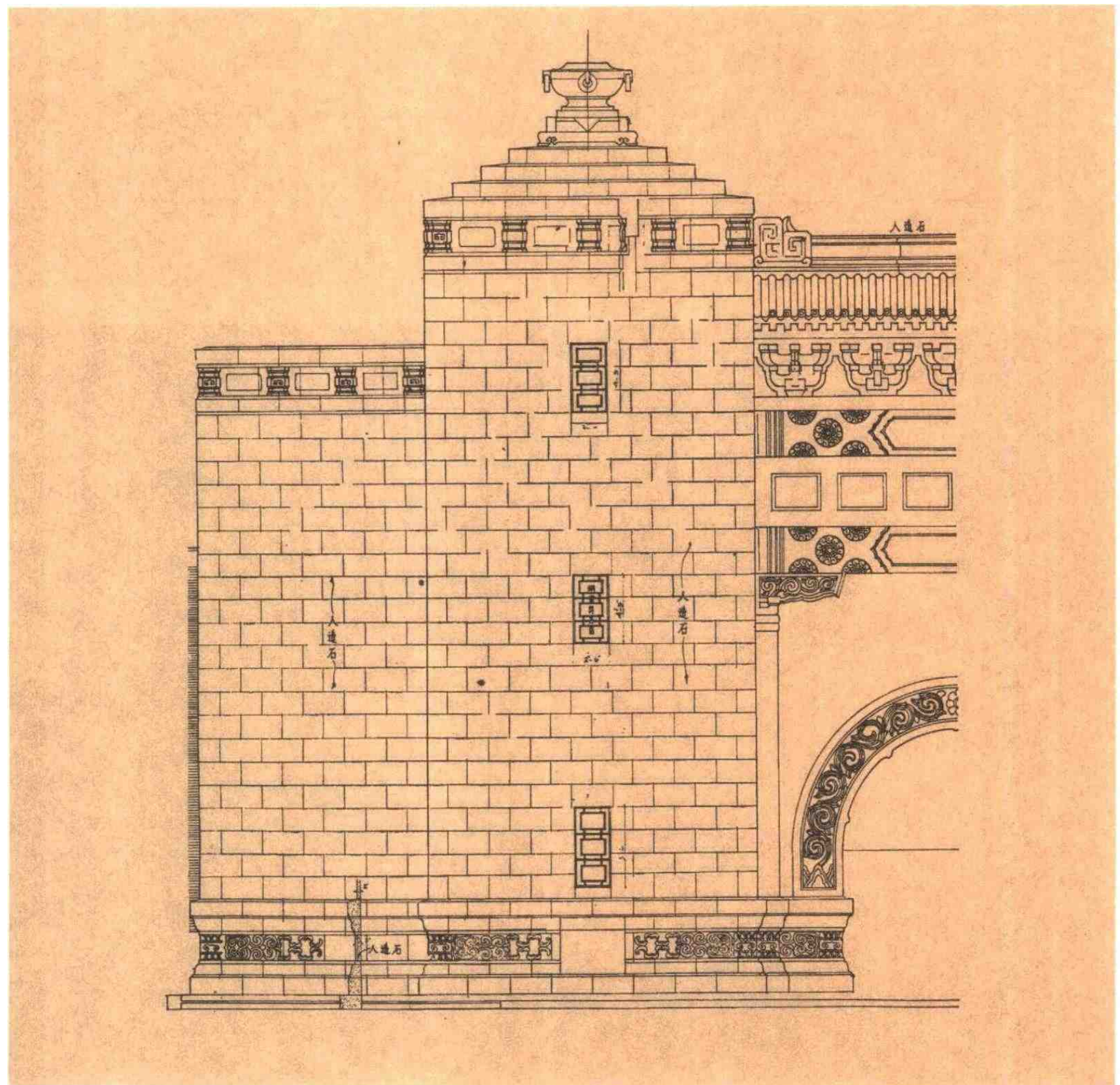
图6-3-51 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建。正门及陈列室夜景。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月。



图 6-3-52 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建。前厅内景。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月。

按设计年代排列，杨廷宝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1930年设计)开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先河。但以杨廷宝为代表的基泰工程公司与赵深、陈植、童寯合组的华盖建筑事务所不同的是，前者整体仿古模式与简约仿古模式并行，并且都有优秀建筑作品；后者则坚持只走简约仿古模式之路。作者在南京拜读杨廷宝的简约仿古模式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南京中央医院，深感一代宗师功底深厚。极简单的平面，高仅四层(设计原为三层，建造时改为四层，后来中央部分加建为五层)，面宽达80余米的扁宽建筑形体，经建筑师略作处理，便构成完美建筑形体。借楼梯间设塔楼，将建筑竖向分为三段，为强调中段，于屋顶设置花架，塔楼顶部四角平面削45°斜角，这已经是到今天也不落

图 6-3-53 上海市体育场立面设计详图。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八期，193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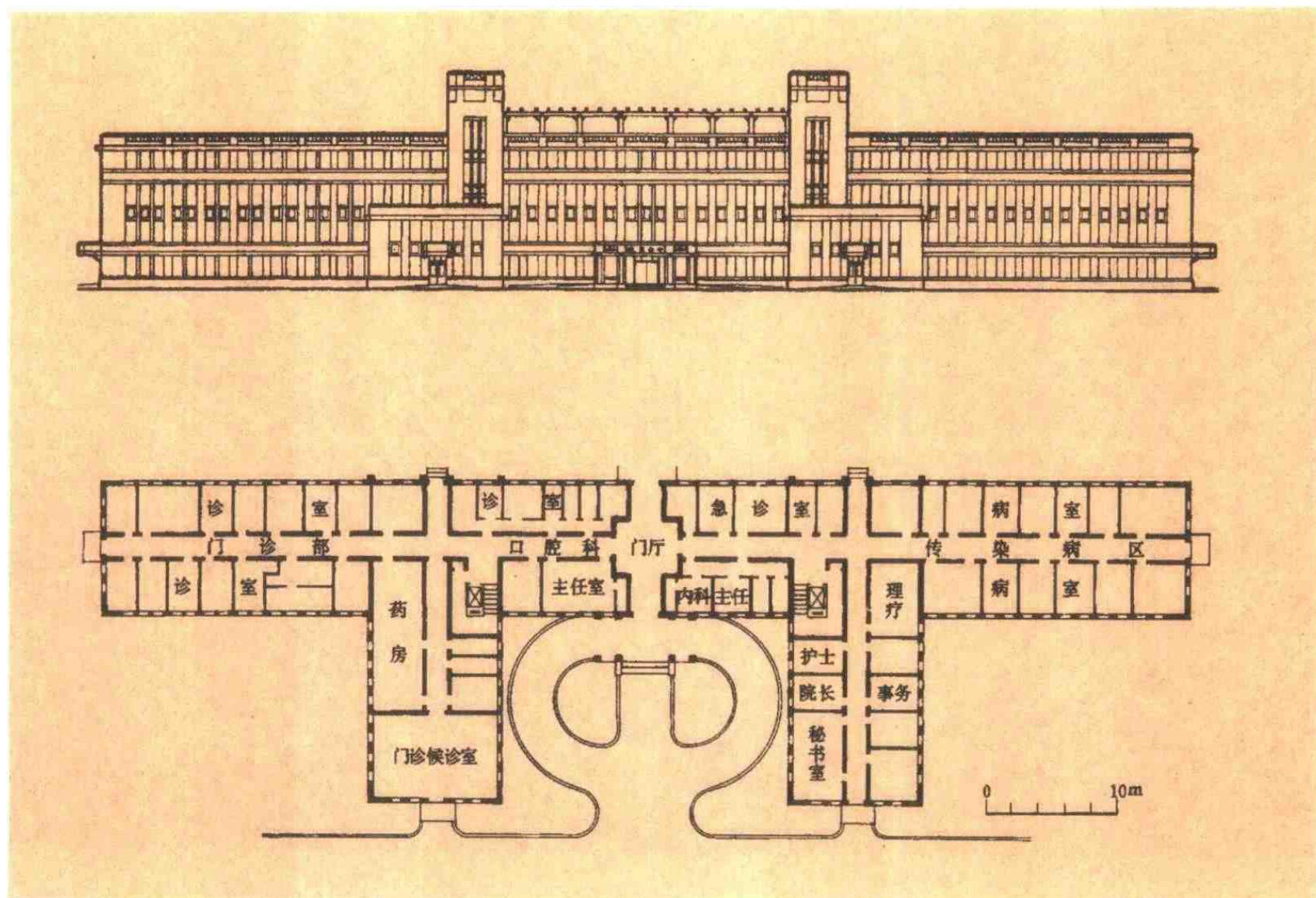


图 6-3-54 南京旧中央医院立面图、一层平面图。上图：立面图；下图：一层平面图。原图载《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伍的西方现代建筑处理手法。但这种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却处处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细部处理手法结合，透出一种淡淡的中国建筑风韵。(图 6-3-54, 6-3-55)大楼之前，临街建传达室与大门，传达室是两个分列大门左右的极简洁的立方体体量，仅用墙面质感变化(贴面砖与抹灰)构成横向三段式构图，女儿墙上开一周小洞，成为简洁的传达室立面上的点睛之笔，而这小洞的形状却源自中国传统的砖砌围墙。



图 6-3-55 南京旧中央医院现状。建造时比设计方案加高一层，后来中央部分加建为五层。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建筑师取中国传统冲天牌坊的柱与横额，与立方体体量的传达室组合成似牌坊非牌坊的整体建筑造型，使用的是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手法，得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重构。(图 6-3-56, 6-3-57) 对比旧中央医院与杨廷宝的同期建筑作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后者全盘复古，建筑师的才华被不适应近代建筑功能的传统建筑形式所束缚，手脚被捆，处处都很拘谨，得到的只是建筑自身形式构图的完美，是仿古的“像”与“准”。但一旦遇到允许建筑师自由发挥的题目，如前文所述中山陵园音乐台与南京中央医院，一流建筑师的才华就得到充分发挥。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赐予杨廷宝很多这种允许他自由发挥的机遇，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短暂的发展兴盛期的后期，正当盛年的杨廷宝不得不因业主特定要求的限制而在整体仿古模式与简约仿古模式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之间摇摆。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对建筑师的制约，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表现方式不同，但建筑师面临的社会挑战是相同的。建筑师是为社会服务的，他们不可能脱离社会，躲进建筑艺术的象牙塔中孤芳自赏。如上述华盖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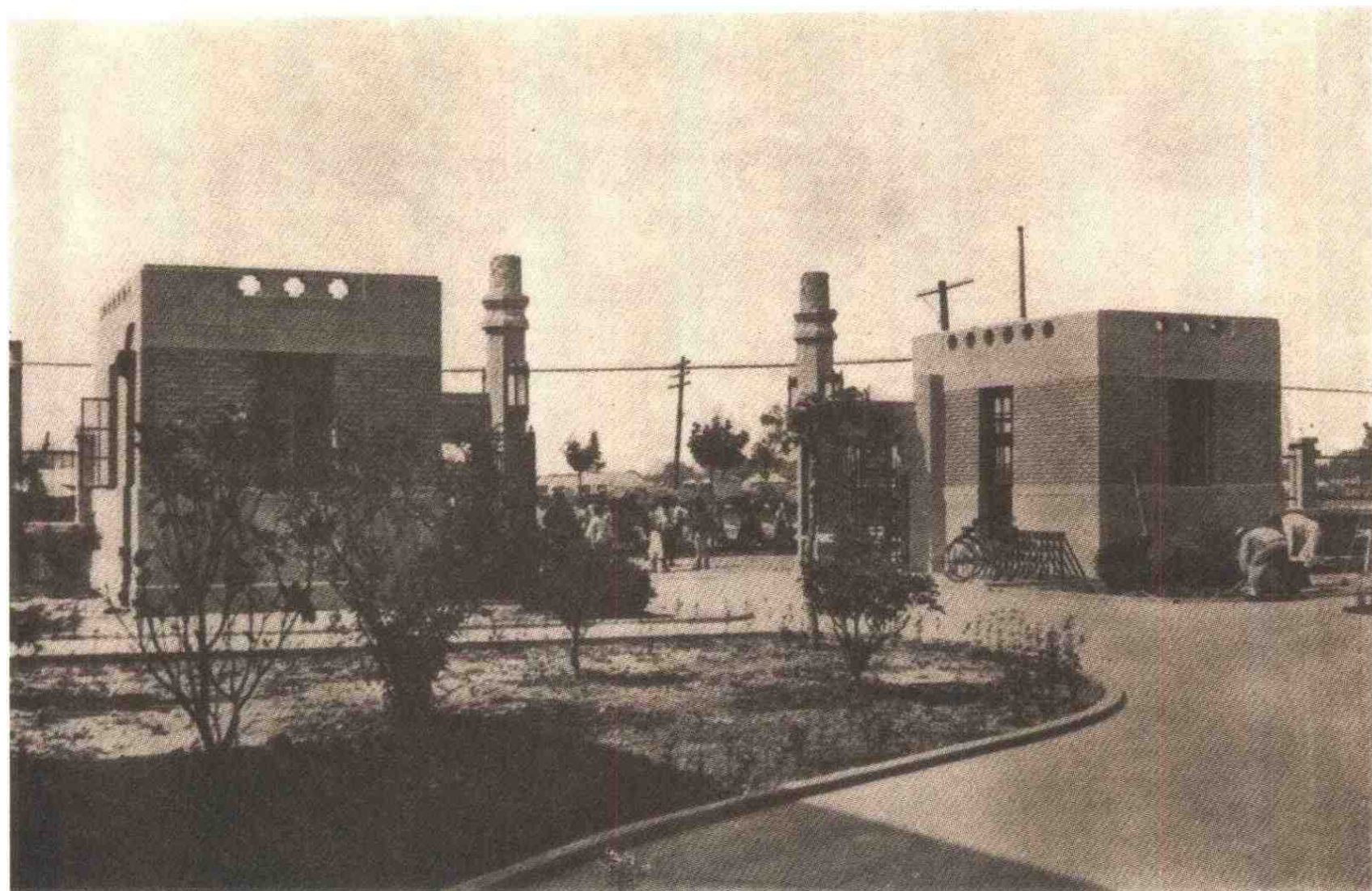


图 6-3-56 南京旧中央医院大门背面。原图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4月。



图 6-3-57 南京旧中央医院入口大门现状。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1 年。

取简约仿古模式，但室内还是做了适应业主要求的清式彩画天花与大红柱子，与整体仿古模式的室内设计无异。研究建筑史，必须将建筑师的建筑活动置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正确理解、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建筑师与他们的建筑作品。

这一时期上海外滩尝试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高层建筑中国银行大楼采用了极简洁的简约仿古模式。关于中国银行大楼，有一桩传闻已久却长期得不到证实的公案，即中国银行与沙逊大厦的高度之争。^[2]近日读薛理勇 2002 年出版的新书《外滩的历史和建筑》，对这一说法持保留态度：“由于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资料去证明中国银行新大楼原设计的高度，也找不到沙逊是否真的有过反对或阻止中国银行的原设计方案实施的

举措，这里仅作为历史留下的疑案，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资料后，再重新补写。”^[3]《建筑月刊》第三卷第一期刊有中国银行原方案设计表现图，并有报导云：“上海外滩中国银行计划改建新屋，面积总额达六万方尺，其高度将为沪上冠。（按报载美领署拟建高凡三十八层之联合办公署，则又更上一层楼矣）。该行地址狭长，面临黄浦之滨，后部直达圆明园路，其间距离近六百尺，故在设计时颇费苦心。在面临狭长街道之处，将高度减低，两翼则特别升高，如此则光线与空气，两皆充足；此外如何利用极长之走廊等问题，诸待考虑者也。……全部房屋用钢骨水泥建筑，外墙用国产花岗石。因接近浦滨，故对

于防御水灾各点,予以特别注意。该屋四周尽属高楼大厦,故底基及打桩颇感困难,地址四周将围以四十尺长之钢板桩。屋之两翼,桩深一百六十尺,正中轻低部分则深入八十五尺,全部造价预计一千万元云。又见报载该行当局鉴于社会百业萧条,经济衰落,费资千万,建造高厦,尚非当急之务。故已酌量减低层数,以求撙节云。”^[9]《建筑月刊》刊出的,只是一张建筑表现图及一段简单的报导,按上引报导原文所述,基本功能问题尚未解决,“诸待考虑者也”。从表现图看,在窄长的基地上建前后两座完全相同的34层高层建筑,方案尚不成熟,只能算是前期可行性研究方案,而造价一千万元也不是中国银行所能承担的。薛氏文中称应留作疑案是可取的。(图6-3-58)

中国银行的实施方案由中国建筑师陆谦受与公和洋行合作设计,建筑占地面积5075.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548平方米,比前述可行性研究方案减少近一倍,层数由34层降至17层,也降低了一倍,建筑总高度为76米。(如按实施方案推算,一座17层的高层建筑改为两座34层的高层建筑,面积应增为4倍,与裙房合计,上述前期可行性研究方案的建筑面积至少应为10万至12万平方米,而不是6万平方米,可证其仅为前期可行性研究方案)中国银行正立面朝向外滩,建筑大体量亦取高低错落的体量组合模式,顶层作平缓的四角攒尖屋顶,覆以绿瓦,檐部作石质斗拱,立面两侧从4层至16层在实墙面上每层作一个中式漏窗,14层与16层的女儿墙及入口大门都饰以中国传统建筑纹饰,主入口处虽作重点处理,方柱及两侧墙面的中国传统建筑纹饰都很简洁。中国银行是采用简约仿古模式尝试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高层建筑,虽然这种仿古模式只体现于局部装饰,如局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檐部、斗拱、漏窗及纹饰作法等,但在外滩建筑群中,还是明显地显现出中国民族建筑的风韵,与其他纯西方建筑风格的各类建筑形成对比,与公和洋行设计的外滩其他建筑也有明显区别。(图6-3-59, 6-3-60, 6-3-61, 6-3-62)



图6-3-58 上海中国银行前期可行性研究方案表现图,原图载《建筑月刊》,第三卷,第一号,1935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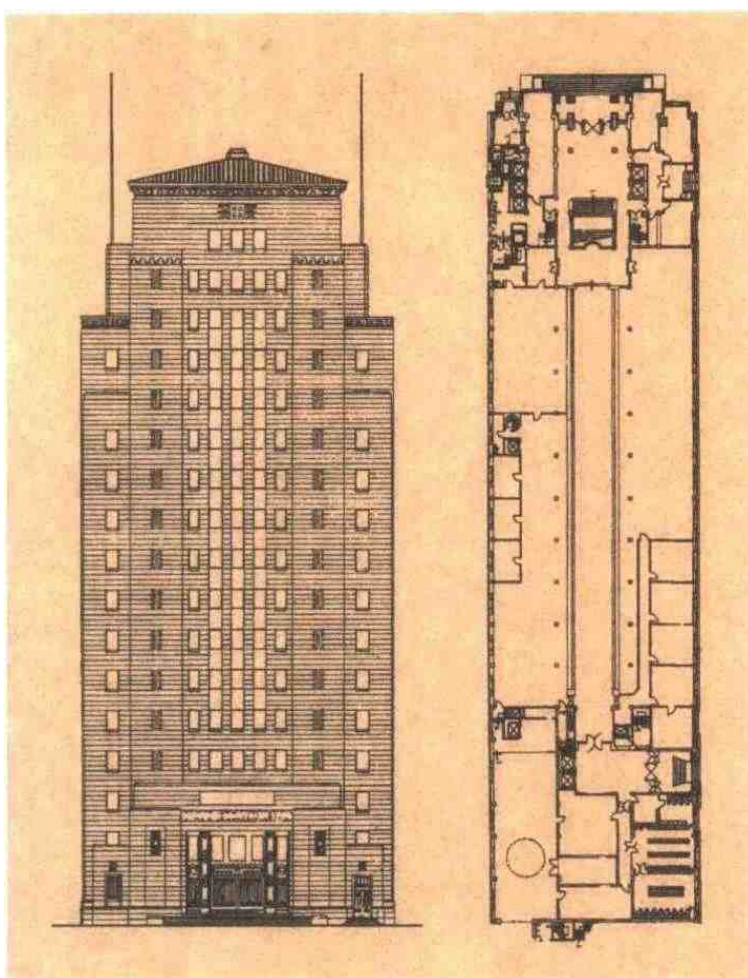


图6-3-59 上海中国银行平面图、立面图。右图;平面图;左图;立面图。原图载《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图6-3-60 上海中国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2000年。



图 6-3-61 左：上海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的景观关系之一。从中国银行方向看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右：上海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的景观关系之二。从汇丰银行方向看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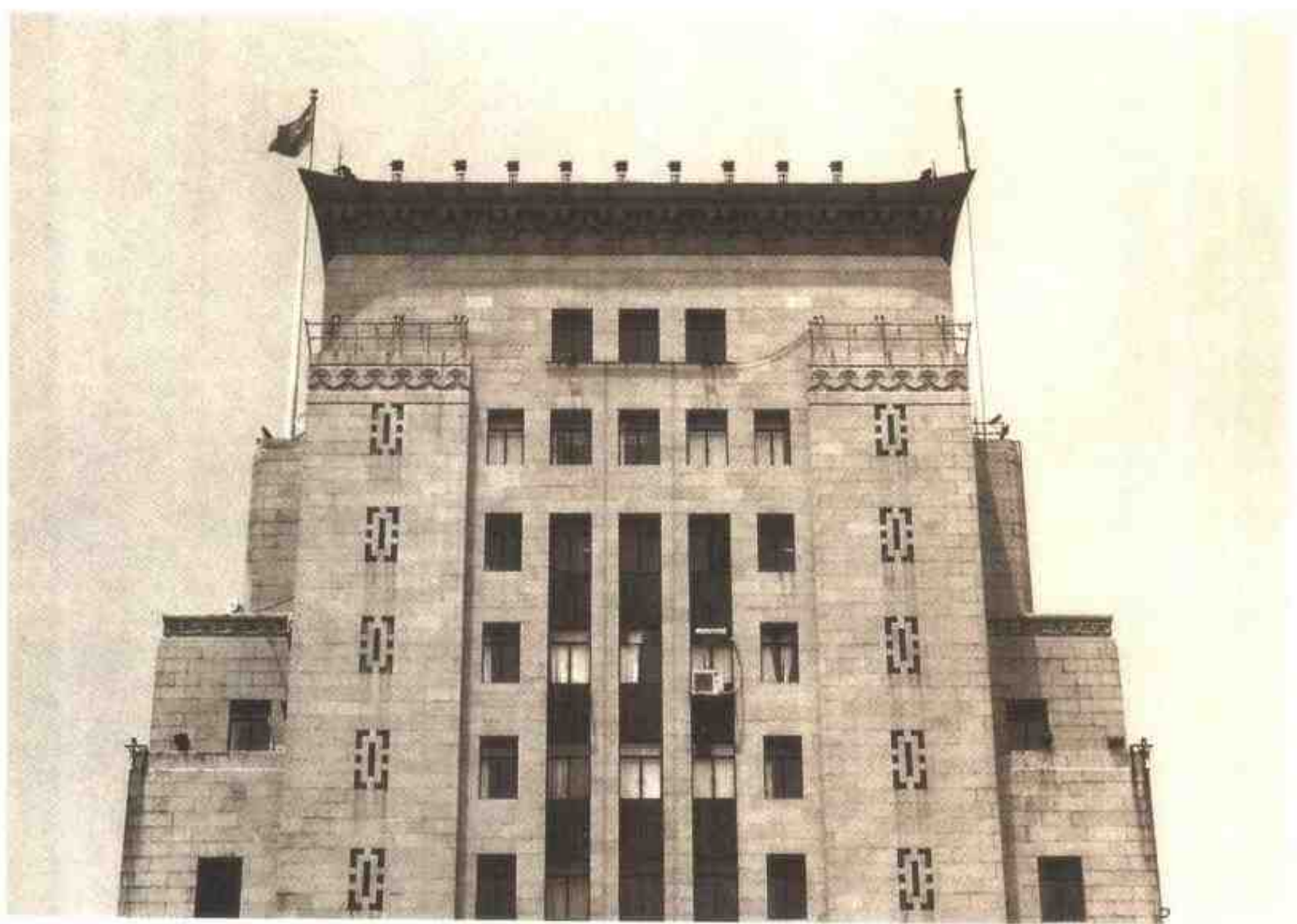


图 6-3-62 上海中国银行顶部之建筑细部处理。屋顶檐部作石质斗拱,14 层与 16 层女儿墙饰以中国传统建筑纹饰。照片由作者摄于 2000 年。

六、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体系的创立及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起步

1930 年朱启铃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社址设于北平,营造学社得到管理中美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经费资助,朱启铃还利用个人影响,争取到一些私人捐款。朱启铃对中国传统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中

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讲中说：“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生活之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名胜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窥其时代，由是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95]正因为立足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以朱启铃的目标不止于研究建筑本身，他这样论述中国营造学社的命名：“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须以建筑本身，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而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博古，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当究探讨者。”^[96]朱启铃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后，梁思成于1931年入社，任法式主任，刘敦桢于1932年入社，任文献主任。此后，先后有单士元、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罗哲文、卢绳、王世襄等人入社，高峰期的1934年至1937年，职员人数17人。“学社从1930年成立，直至1945年结束，前后达15年。仅在1937年以前就完成了我国有关建筑的重要古籍的整理、校对及出版。调查了2783处古建筑，测绘了重要古建筑206组。从而基本上弄清了我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源流。”^[97]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年成立至1945年停办，15年中的主要工作是在1937年以前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完成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营造学社发三月薪金，暂时解散。1938年至昆明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分队，其时成员只有五人，即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西南分队开展了昆明、云南西北部及四川古建筑调查。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学社亦随迁李庄。此前1939年天津水灾被淹，学社1937年存放于天津英租界英商麦加利银行地下室保险库中的资料也被淹，朱启铃将劫余资料整理后寄李庄。李庄时期经费短缺，且无法外出调查，这一时期学社的主要工作是梁思成于1942年开始编撰《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莫宗江、卢绳参加这一工作，1944年成书。1945年，营造学社解散。

营造学社的主要功绩是大量开展中国古建筑实例的调查、测绘、研究工作，拟定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复原计划，搜集、整理重要的古建筑文献资料，校勘重印宋《营造法式》、明《园冶》、《榫卯录》、清《一家言·居室器玩部》等古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从1930年起至1945年止，共7卷23期。发表了梁思成、刘敦桢及学社其他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修缮复原计划、营造史料阐述、哲理史料阐述等大量学术著作。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带头人梁思成、刘敦桢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成果得到国内外建筑界、考古界、及国外汉学界的公认。同时学社也培养了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单士元、卢绳、罗哲文等一批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专家，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直接贡献则是“梁思成在杨文起、祖鹤州两位老匠人的帮助下，读懂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又深入研究整理了学社收集的大量民间做法抄本，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并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著作。”^[98]其后又于1935年至1936年“发表梁思成主编，刘致平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0集，前5集简说由梁思成执笔，后5集简说由刘致平执笔。”^[99]

研究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应特别注意的是这两种著作的发表时间，《清式营造则例》发表于1934年，《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发表于1935年至1936年，其时，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已近尾声，大多数优秀建筑作品已经完成设计，所以这两种著作，尤其是后一种，对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直接导向或参考作用都不是很明显的，这种直接的导向或参考作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建

筑师掀起的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第一次高潮期才体现出来,其功过如何评价则已是当代建筑史的研究范畴。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亦开始起步。1923年5月,“江苏省第二工业学校”获准升为“公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同年11月改称“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并于当年增设建筑科,学制三年,是当前建筑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个(高等专科)建筑科,由留日归国的柳士英等创办。1927年秋,苏州工专并入刚刚成立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4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建筑科”改为“建筑系”。^[100]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同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设建筑系;1932年,广东省立勸勤大学成立,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改为该校的工学院,林克明建议校方设立建筑工程系,获批准并任命林克明为建筑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后于1937年并入中山大学;1937年重庆大学土木系增设建筑专业;同年天津工商学院设建筑系。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兴起为中国建筑事业培养出新一代人才,即中国第二代建筑师。虽然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于20世纪30年代初已陆续毕业,部分毕业生从事建筑设计或建筑教育工作,但他们生不逢时,刚刚进入中国建筑师队伍就遭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自此中国近代建筑史进入凋零期(1937~1949)。中国第二代建筑师的才华真正得到发挥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七、结 语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作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探索,创作了一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其中富有创意的传世之作有之,成功的优秀建筑作品亦有之。但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历史赐予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安定创作时间很短,而在财政艰难的近代中国,以政府行为指定建筑风格的官方建筑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全面的财力支持。因此,这一探索不足以、也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建筑流派或风格,只能称之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种建筑现象——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主要在政府行为支持的官方建筑领域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建筑现象。官方建筑是一种非市场经济、非商品化的建筑,这是官方建筑最重要的特征,其他特征都由此派生。如可不计成本——以南京中山陵一期工程承包商姚锡舟的亏本经营,^[101]及中山陵工程超出预计8倍的造价最为典型;又如以政府行为指定建筑风格等。这一特征成就了“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传世之作——南京中山陵,也成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但是,这一特征也制约了建筑师的建筑创作活动,将其限定在一个以政府行为指定的固定的建筑形式范畴,如前文所引童寯之言,“以前很有几座宫殿式的公共建筑,是由业主指定式样而造成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才主要在以市场经济、以商品化建筑为主体的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同时也在部分中国近代边缘城市,脱离了市场经济轨道,形成上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主要在政府行为支持的官方建筑领域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作为这种建筑文化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杨廷宝对这一探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却并非件件完美,也无固定的追求目标,如前文所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条件制约建筑师的建筑创作活动的结果。杨廷宝现象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是有典型意义的,对此,罗小未有一段中肯的评价,这里就引用这段评价,作为本章的结尾:“假如我们认真地回顾他(引者注:指杨廷宝)自20年代至今几十年中的创作道路,会吃惊地发现这俨然像一部我国近60年来创作历史的注解。他的作品有今有古或古今结合;有中有西,或中西合璧。虽然人们可以任取其一而冠之以这种或那种主义,或凭自己的爱憎而进行褒贬,但这不是历史。杨老和我国其他几位杰出的第一代建筑师——

样,其贡献不在于倡导了什么现成的学派,而在于虽处在我国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变革中,仍坚持了严谨的现实主义探索精神,努力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这个艰巨的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地认识社会、适应社会与工作任务对他们的要求,尽心创作,并不断地充实与改进自己,力图在不同的要求与有限的条件下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这就是他们的贡献。”^[102]

[1] 傅朝卿,《传教士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在 1890—1949 年》,载台湾《建筑师》,1992 年 12 期,第 124 页,原文注 1:见 A. C. Scott 著《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第 211 页;原文注 2:见《中国建筑资料集成》,台南:成功大学建筑系,序,第 4 页。

[2] Records of the Conference 1877, p.32,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第 277 页。

[3] “Consecration of the Missionary Bishop of Shanghai,”SM(1877),665—667,转引自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 7 页。

[4]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 26 页。

[5]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引言第 1 页,原书注:John K. Fairbank, 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4), 31—54。

[6]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第 51 页。

[7] C. W. Mateer,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Records of the Conference 1890, P.456—467,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第 57 页。

[8]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620 页。

[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621 页,原书注: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 73—74 页。

[10]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44 页。

[11] 原表载:王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第 190—191 页,《中国基督教大学创办差会一览》,原表中“华西协和大学”为“华西协合大学”之误,本书表中已改正。

[12] 转引自李宽敏,《中国基督教史略》,第 279—280 页,原书注:王志欣,《传教与教育》,第 167—168 页。

[13]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第 236 页,原书注: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之语,Peperentative Estimates of the plac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Education, Dec.6,1927.The United Board。

[14] 转引自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 16—17 页,原书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1890), 496—497,这篇“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讲话的略有不同的版本载于 The Annual Report for St. John's College and Preparatory Schools for the Year 1889—1890。

[15]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 194 页,原书注:F. L. H. Pott, “Annual Repor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for the Year Sept. 1922 to July 1923,”AHCEC, RG79—11。

[16] 刊于 1929 年 11 月 22 日圣约翰学生主办的英文《约翰周刊》(The St. John's Dial),转引自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 29—30 页。

[17]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15—16页,原书注: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6页。据卜舛济次子卜威廉(William S. A. Pott)的回忆,其父是1892年第一次回美国休假时才重着西服的。见William S. A. Pott,“Remarks Made at a Luncheon of the Berkeley Committee, April 4, 1966”, AHCEC, RG138—9—20。

[18]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35—36页。

[19] 卜舛济著,《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第11页,台湾圣约翰大学同学会重印,1972年版,转引自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第187页。

[20] 建造年代据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第229—231页。

[21] 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第15—16页。

[22] 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第29页。

[23] 周忠信,《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第34页,转引自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第37页。

[24] 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第37—38页。

[25]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347—348页,陈重庆文;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第39—40页。

[26] 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第99页。

[27] 金陵大学北大楼与西大楼的建成年代与建筑师,有关著作说法不一:刘先觉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第46、47页,设计人均均为司马(Small),施工单位均为陶馥记营造厂,建成年代为北大楼:1919年,西大楼:1926年。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第104页、106页、111页,“金陵大学的主要设计者是美国建筑师司斐罗”(即司马, A. G. Small),建成年代为北大楼:1919年,西大楼:1926年,董氏书中第104页称西大楼1925年竣工,第107页又有“1926年西大楼落成之后,金陵大学档案中不再出现司斐罗的名字”之说,并有注27云“参见上注的有关记录”,上注26云“《金大房屋和财产委员会会议记录》,英文档案,1924年7月7日,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924年的档案可证司斐罗1924年尚参与金陵大学西大楼设计工作,却不可证司氏1924年以后何时离去,也不可证西大楼是1926年落成,姑存疑。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第159—160页,北大楼“建于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司马(Small)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3473平方米”,西大楼“建于1925年,由美国建筑师司马(Small)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3604平方米。”本书从二书中共同认定之说,北大楼、西大楼建筑师均为司马(A. G. Small),北大楼于1919年建成,西大楼则从刘先觉等之说,建成年代为1926年。

[28] 金陵大学东大楼的建成年代与建筑师,有关著作说法不一:刘先觉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第46页,建成年代:1926年,设计人:齐兆昌,施工单位:陶馥记营造厂。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第104页、116页,建成年代:1912年,建筑师:董氏书116页注24云:“关于东大楼亦有两说:一说为《金陵大学史料集》所载《金陵光》民国二年四月第一期和《南京大学校史》,P.194,称东大楼建于1912年,系理化总教员马丁手定其平面,建筑师不详,并附有东大楼独自矗立校园的照片。一说见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1926年设计图纸,建筑师齐兆昌。东大楼于1958年曾被焚毁,后照原样重建。”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第159—160页,“东大楼:在北大楼的东南侧,当时称‘科学馆’。建于1913年,由齐兆昌建筑师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3905平方米。”卢氏书中第161页刊有20世纪20年代所摄金陵大学北大楼与东大楼的照片,其时西大楼的位置还是一幢小小的两层建筑,可证东大楼建造在先。董氏书第122页所刊金陵大学东大楼独自矗立的照片也是东大楼建造在先之证,但只有东大楼一幢建筑,说服力较差。本书暂取东大楼建于1912年或1913年之说。又关于东大楼之火灾,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第160页云:东大楼“在50年代因火灾烧毁屋顶,1958年修复。”

[29] 《建筑月刊》刊茂飞(引者注:即墨菲)小传云:“国民政府建筑顾问茂飞建筑师(Mr. Henry K. Murphy),美国纽海文籍。(New Haven, Connecticut)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得学上位。1900年至纽约,经五年之训练,自1904年起,在业务上即颇活跃。1908年与台那君(Richard Henry Dana,系名诗人

Longfellow 之孙)合夥组织公司,志居凡一二年,业务范围充仅及于纽约及新英格兰,继及于近东及远东。故在 1914 年茂氏曾游历东方;今番蒞沪,已属第八次矣。1920 年,因但氏专致力于纽约附近之业务,故脱离公司,另由马奇与汉伦二氏(Mr. Gill and Hamlin)加入,与茂氏合作。至 1923 年,马汉二氏退出,乃由茂氏单独经营。茂氏在美洲设计殖民地式建筑(Colonial Architecture)著称。……因茂氏在业务上之成功,于 1913 年由耶鲁大学赠以艺术学士(B. F. A.)学位,以示激励。茂氏在国民政府建筑顾问任内,曾将南京自初步之首都设计,交置各院部会,以壮瞻观。并……设计南京紫金卫阵亡将士墓。”《茂飞建筑师小传》,载《建筑月刊》,第二卷,第一号,第 51 页,1934 年 1 月。

[30] 司徒雷登教育在中国(纽约版),第 12—15 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49 页。

[31]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66 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80 页。

[32]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65—66 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80 页。

[33]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第 26 页。

[34]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第 40 页。

[35] 德本康夫人,蔡路行,《金陵女子大学》,第 27—28 页。

[36] 德本康夫人,蔡路行,《金陵女子大学》,第 43 页。

[37]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第 178 页。

[38] 王威,《圆明园》,第 63 页。

[39] 参见杨秉德主编,《新中国建筑·第一辑》,第 50—55 页。

[40] 《光绪朝实录(上)》,中华书局版,总第 4602 页,转引自乔志强,《论清末“新政”》,载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一年》,第 238 页。

[41] 参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第 314—318 页。

[42]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第 372 页。

[43] 王世仁,《中国近代历史的界标》,载《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第 231 页。

[44] 张复合,《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清末资政院大厦和民国国会会议场》,载《建筑学报》1995 年 5 期,第 45 页。原文注:参见《The Far Eastern Review》,Vol. X.,No. 4,September 1913,pp.121—123。

[45] 刘尔觉,杨维笑,《南京近代建筑概说》,载刘尔觉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第 6 页。

[46] 范正国,张士良,冯静寰,王义华,彭青瑛,《武汉近代建筑概本(1861~1949)》,载杨浦林,皮明珠,《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第 402 页。

[47]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71—272 页。

[48] 参见王世仁,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概说》,第 15 页,载王世仁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第 15 页。

[49]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66—267 页,原书注:李书田,《北洋大学五十年之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第 41 卷第 20 号。

[50] 和春芳,《北洋母校大楼被焚目睹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 73 页。

[51]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70 页。

[52]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 1 卷,第 12 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70 页。

[5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71 页,原书注:《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 41 页,第 14 页。

[54] 参见杨秉德,《中国建筑民族风格探索的历史与现状》,载高介华,《建筑与文化论集》,第 220—225 页。

[55] 参见哈欣,《何家人剧院:中国的表演中心》,载《天津青年报》,1998 年 4 月 17 日。

[56] 魏宏运,《民国史纪事本末》(二),第 7 页。

[57]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载罗英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43—444页,原文发表于1935年4月。

[58] 容闳,《西学东渐纪》,第89页

[5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93页

[60]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23—24页。

[61] 参见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第163—171页。

[62] 参见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04—305页。

[63]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四版)》,第361—362页,侯幼彬文,原书注:在徐鸿遇、许上琛之前,已有中国留学生在外国选学建筑学的有关课程。据赖德霖考证,早在1873年清政府派遣船政学堂优秀生赴法留学,教学大纲中已列有学习“房屋制造法”的要求。1905年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程机械专业学成回国的张瑛绪,在留日期间也曾学过建筑学课程。这种早期学过建筑课程的留学生估计还有一些人,只是他们学的并不是完整的建筑学科。

[64] 范文照,《中国建筑师学会缘起》,载《中国建筑》创刊号,1931年11月。

[65] 《上海市建筑协会章程》,载《建筑月刊》第二卷,第二号,1934年3月。

[66] 潘谷西,单踊,《关于苏州工专与中央大学建筑科——中国建筑教育史散论之一》,载《建筑师》第90期,第92页,1999年10月。

[67] 参见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四版)》,第366—367页,侯幼彬文。

[68] 《故吕彦直建筑师传》,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7月,第1页。

[69] 持此种观点者如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第199页:“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自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助美国墨菲建筑师尝作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及北京(引者著:《中国建筑》)所载原文为北平)燕京大学之设计为中西建筑参合之初步。”为他以后运用中国民族形式创作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年,吕彦直26岁,刚刚开始建筑生涯,墨菲43岁,已有十九年的建筑实践经验,十二年的开办建筑事务所的经历,这其中的师承渊源关系一目了然。”

[70] 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第430—433页。

[71] 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第25—26页。

[72] 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第28页。

[73] 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第30页。

[74] 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第30页。

[75] 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第30页。

[76] 林克明,《广州中山纪念堂》,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第26页。

[77] 林克明,《广州中山纪念堂》,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第25页。

[78]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第77页。

[79] 郭湖生,《纪念仁辉师》,载《建筑师》第15期,第16页,1983年6月。

[80]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四版,第383页,侯幼彬文。

[81] 参见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第127—130页。

[82] 参见《梁思成全集》第九卷,《梁思成年谱》,第102—103页。

[83] 参见林克明,《建筑教育、建筑创作实践六十二年》,载《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第1—2页。

[84] 参见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23页,谢少明文,原书注:《广州市工务报告》,第56—57页。

[85] 《上海市政府新屋之概略》,载《中国建筑》,第一卷,第六期,1933年12月,第8页。

[86] 《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工程概述》,载《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2月,第5页。

[87] 杜彦耿,《座谈追述》,载《建筑月刊》第四卷,第三号,1936年3月,第4页。

[88] 《首都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暨官舍》，载《中国建筑》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8月，第4页。关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设计权从基泰转至华盖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李海清，《历史的误会——南京原外交部办公处建筑设计引发的思考》，载张复合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第189—19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89] 《纪念童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编者按》，载《建筑师》第95期，第4页，2000年8月。

[90] 童寯，《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载《建筑师》第95期，第8页。童寯此文亦载《童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该书第118页注：此文原载《公共工程专刊》1946年出版。但《童寯文集》将童寯文字成行漏掉，使人无法读懂，幸而又见《建筑师》亦刊此文，因自《建筑师》第95期引此文。

[91] 童寯，《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载《建筑师》第95期，第9页。

[92] 许多书刊文章——建筑专业的或非建筑专业的——几乎都要讲述这一段故事，正宗的建筑史书这样论述：中国银行大楼“原设计34层，总高约100多米，计划成为当时上海层数最多、最高的建筑。由于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的高度只有77米，因此，中国银行在向工部局申请执照时，沙逊出面干涉，不准中国银行高出沙逊大厦的锥形屋顶。中国银行被迫放弃原设计，而改为17层，高度降为76米。”（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第248页。）普及性的知识读物这样描述：“沙逊大厦旁边原本有1907年建造的德国总会，也是上海洋场最豪华的俱乐部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这座大楼被中国政府封闭。后来由中国银行收购，拟建造一座34层高的远东第一大厦，图纸亦已完成，但是沙逊为了雄峙外滩，不准中国银行大楼高度超过沙逊大厦的锥尖。沙逊有租界工部局撑腰，不发营业执照，官司打到伦敦。中国银行虽有四大家族为后台，还是败诉，大楼只得降成16层，比沙逊大厦低一头（30厘米）。”（杨嘉佑，《外滩》，载叶树平、郑祖安，《百年上海滩》，第17页）。

[93] 薛理勇，《外滩的历史和建筑》，第177页。

[94] 《建筑月刊》第三卷，第一号，1935年1月，第1页。

[95] 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1930年7月。

[96] 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1930年7月。

[97]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第124页。

[98] 《梁思成全集》第九卷，第102页。

[99] 《梁思成全集》第九卷，第104页。

[100] 参见潘谷西，单踊，《关于苏州工专与中央大学建筑科——中国建筑教育史散论之一》，载《建筑师》，第90期，第89—97页，1999年10月。

[101] 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第26—27页，“中山陵是姚锡舟承办的最后一项工程。据姚锡舟自述，他建造中山陵，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抱一名誉观念、义务、决心，’‘当估价之初，即其一崇拜伟人观念，以故一再删削，实觉无利可图，殊与寻常营业有异’。……姚锡舟承建中山陵，除费尽艰辛以外，还亏本14万两银子。后来林森曾对姚说：‘先生这次为修总理陵寝出了力，亏了本，国民政府是知道的……’”

[102] 罗小未，《社会变革与建筑创作的变革》，载《建筑师》第42期，第7页，1991年9月，原文注：1979年在安徽屯溪与齐康谈话记录，1985年3月修改、补充。

主要参考文献

1. 罗荣渠主编.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 罗荣渠, 牛大勇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 戴逸著.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
4. 汪澍白著.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5. [美]费正清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6. [美]费正清编. 杨品尔等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7. 张宪文主编. 中华民国史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8. [日]依田憇家著. 卞立强, 严立贤, 叶坦, 蒋岩松译. 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9. 周宁著. 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0
10. 秦国经, 高换婷. 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98
11.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近代中国报道.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3. 牟安世著. 洋务运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14. 张之洞著. 李忠兴评注. 劝学篇.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5. 王中江, 范淑娅选编. 陈独秀等著. 新青年.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16. 程歆, 温乐群主编. 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 刘北成, 郭小凌译. 历史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8. 李喜所, 元青著. 梁启超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9. 于桂芬著. 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0. 郑大华著. 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1. 魏宏运主编. 民国史纪事本末.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22.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23. 李侃, 李时岳, 李德征, 杨策, 龚书铎. 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4. 陈旭麓, 方诗铭, 魏建猷主编. 中国近代史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25. [美]马士著. 张汇文, 姚曾虞, 杨志信, 马伯煌, 伍丹戈合译.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26. 上海图书馆编. 近代文献.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7. 周振鹤主编. 上海历史地图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8. [意]L. 贝纳沃罗著. 薛钟灵, 余靖芝, 葛明义, 岳青, 赵小健译. 世界城市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9. 宁越敏, 张务栋, 钱今昔著. 中国城市发展史.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 30.孙健著,中国经济通史(上中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31.叶世昌,潘连贵著,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32.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 33.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合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 34.杨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 35.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36.唐振常,沈道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 37.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38.刘惠吾编著,上海近代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39.刘惠吾编著,上海近代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40.郑祖安著,百年上海城,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41.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此书辑有:徐公尚,丘瑾璋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测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日]金城正笃著,丁义忠译,1854年上海建立的税务司——南京条约以后的中英贸易和建立税务司的意义;葛下慧译注,清代上海日侨杂记 [日]峰原藏,清国上海见闻录
- 42.[法]梅胡,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43.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 44.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编写办公室编著,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
- 45.叶树平,郑祖安编,百年上海滩,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0
- 46.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 47.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 48.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编写组编著,天津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 49.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 50.扬铎,龙从启,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附租界图),载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0
- 51.梁嘉彬著,广东十二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52.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53.吴瑞炳,林荫新,钟哲聪主编,鼓浪屿建筑艺术,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
- 54.魏瀛涛,李有明,李润苍,张方,刘传英,曾绍敏著,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55.周勇上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 56.[美]罗兹·墨非著,章克生,徐肇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57.[美]霍塞·越裔译,出卖上海滩,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 58.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 59.王绍周主编,上海近代城市建筑,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60.邓明主编,上海百年掠影,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 61.伍江著,上海百年建筑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 62.郑时龄著,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 63.《天津港史》编辑委员会,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
- 64.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65. 杨人辛主编, 近代天津图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66. [英] 雷穆森著, 许逸凡, 赵地译. 天津——插图本史纲. 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辑. 天津: 天津历史研究所, 1964
67. O. D. Rasmussen.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Tientsin: The Tientsin Press, Ltd, 1925
68. [英] 雷穆森著, 许逸凡译. 天津的成长(租界). 载《天津历史资料》(第十辑). 天津: 天津历史研究所, 1981
69. 杨蒲林, 皮明麻主编. 武汉城市发展轨迹.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7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武汉文史资料》(第一辑). 1980
71. 徐明庭辑校. 武汉竹枝词.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72. 李新主编.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3. 刘敦桢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74. 潘谷西主编. 中国建筑史(第四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75.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建筑简史·第一册·中国古代建筑简史. 北京: 中国工业出版社, 1962
76. 王世仁. 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77. 董鉴泓主编.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78. 王珏, 藤森照信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各篇.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1997
79. 徐城北著文. 老北京·变奏前门.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0
80. 蒋赞初著. 南京史话(上).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5
81. 沈嘉荣主编. 南京史话(下).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5
82. 马伯伦, 曹永林, 韩品峰编著. 南京.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1
83. 卢海鸣, 杨新华主编. 南京民国建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4. 张燕主编. 南京民国建筑艺术.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85. 胡绳.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86. 邹德侬著. 中国现代建筑史. 天津: 天津科技出版社, 2001
87. 赵国文.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 载《华中建筑》1987年第2期
88. 王绍周. 中国近代建筑概说. 载《建筑师》第28期.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89. 于吉星主编. 老明信片·建筑篇.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1997
90. 哲夫主编. 明信片中的老天津.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91. 葛兆光著.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92. 牟寯著. 最后的论述.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
93. 黄鸿钊著. 澳门简史.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9
94. 费成康. 澳门四百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95. 邓开颜, 陆晓敏主编. 粤港澳近代关系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96. 蒋祖缘, 方志钦主编. 简明广东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97. [瑞典] 龙思泰著. 吴义雄, 郭德焱, 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注. 早期澳门史.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98. 万明著. 中葡早期关系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99. 香港艺术馆(Hong Kong Museum of Art). 珠江十九世纪风貌. 香港: the Urban Council, 1981
100. 香港艺术馆(Hong Kong Museum of Art). 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 香港: the Urban Council, 1987
101. [美] 亨特著. 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 旧中国杂记.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102.[清]沈复著,俞平伯校,浮生六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103.广州博物馆编,广州历史文化图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04.侯仁之,邓辉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105.常润华著,圆明园兴衰始末,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 106.张恩荫,杨文运编著,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 107.张恩荫,圆明人观话盛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 108.于威,圆明园,北京:北京旅游出版社,1983
- 109.王其明著,北京四合院,北京:中国书店,1999
- 110.周维权著,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 111.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所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62
- 112.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13.[日]藤森照信,张复合译,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载《建筑学报》1993年5期
- 114.[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李申校,大中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15.赖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版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116.[韩]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117.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118.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19.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120.张治江,李芳园主编,基督教文化,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 121.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五千年(第四卷),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1991
- 122.黄心川,戴康生等编著,世界二大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79
- 123.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124.[意]利玛窦,[比]金尼路著,何高济,于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25.[美]苏尔,诺尔编,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26.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27.路秉杰,上海的教堂,载《新建筑》1986年第3期
- 128.汤国华编著,张田栋审定,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录集(一),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 129.邓其生,李佩芳,论广州石室的建筑艺术形象,载《新建筑》1988年第1期
- 130.吴庆洲,中国最大的哥特式石构教堂——石室,载《建筑学报》2001年第8期
- 131.高仲林主编,天津近代建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 132.王绍周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图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133.常怀生,李健红,圣·索菲亚教堂——哈尔滨建筑艺术馆,载《建筑学报》1998年第3期
- 134.[美]罗伯特·文丘里著,周卜颐译,建筑的复杂性矛盾性,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 13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亦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136.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修订本),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 137.陈志华著,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 138.郁慕侠著,上海鳞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 139.[挪威]石海山,居纳尔·菲尔塞特著,宋荣法译,乔步法,鲁纳校,挪威人在上海150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140.秋叶,西方妇女与上海,北京:谁是先驱,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
- 14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与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近代人物录,天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出版,1987
- 142.[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林夕校,艺术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1999
- 143.童寯著,近百年西方建筑史,南京: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
- 144.童寯,新建筑与流派,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 145.[美]萨拉·柯耐尔著,欧阳英,樊小明译,西方美术风格演变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
- 146.[英]拉雷·文卡·马西尼著,马凤林,李晓明,姜陆,刘平,张敦敏译,西方新艺术发展史,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4
- 147.[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殷凌云等译,范景中校,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北京:三联书店,2001
- 148.吴焕加著,20世纪西方建筑史,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 149.[意]L·本奈沃洛著,邹德侬,马竹师,高军译,西方现代建筑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 150.卜受之著,世界现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 151.沈华主编,上海里弄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 152.徐景猷,上海里弄住宅,载《城市规划资料汇编》1979年第2,3,4,5期
- 153.罗苏文著,大上海·石库门:寻常人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154.王绍周,陈志敏编,里弄建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 155.罗小未,伍江主编,上海弄堂,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 156.陆大猷著,三峡大移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 157.於梨华,新中国的女性,载香港《七十年代》1976年5月号
- 158.徐静波,梁实秋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
- 159.鲁湘元著,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
- 160.仲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在1890—1949年,载台湾《建筑师》1992年12期
- 161.王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162.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3.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4.董黎著,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5.德本康夫人,蔡路得著,杨天宏译,王薇作校,金陵女子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6.柯约翰著,马敏,卞彬译,李亚丹校,华中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7.黄思礼著,秦和平,句启浩译,刘家峰,王薇作校,华西协合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8.罗德甲克·斯科特著,陈建明,姜源译,福建协和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9.郭合理著,梅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70.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二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71.文乃史著,王国平,杨木武译,田文载,顾卫星校,东吴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72.杨秉德主编,新中国建筑(第一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 173.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74.张复合,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清末资政院大厦和民国国会议场,载《建筑学报》1995年

第 5 期

175. 傅公馥编撰. 日京大观. 北京: 人民中医出版社, 1992
176. 高介华主编. 建筑与文化论集.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3
177. 容宏著, 沈潜, 杨增麒评注. 西学东渐记.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78. 安宁, 周棉主编.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79. 李喜新, 刘集林等著. 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180. 苏云峰著.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181. 范文照. 中国建筑师学会缘起. 载《中国建筑》创刊号, 1931年11月
182. 上海市建筑协会章程. 载《建筑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1933年6月
183. 孙中山纪念馆编. 中山陵同史话.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184. 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编委会. 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1
185.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186. 童寯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 载《建筑师》第95期.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187. 薛堃勇. 外滩的历史和建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188. 朱启铃. 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 1930
189. 林洙著.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190. 梁思成全集·第九卷.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191. 潘谷西, 单踊. 关于苏州工专与中央大学建筑科——中国建筑教育史散论之一. 载《建筑师》第90期.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192. 罗小未. 社会变革与建筑创作的变革. 载《建筑师》第42期.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

后 记

窗外秋雨绵绵,已是金秋季节。坐在电脑前的作者心中也充满收获的喜悦,从1980年开始的研究工作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果,就是这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作者从1980年开始研究上海、天津、武汉三个近代城市,其后,重点研究天津近代建筑史。1988至1990年,与十二城市学者合作,由作者主编,撰七十万字学术专著《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这段学术经历使作者对中国主要近代城市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对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学术思路,及由此派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大致理清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脉络。1990年,作者提出以下基本学术观点:把中国近代建筑史置于近代中国剧烈变化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中,将中国近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将中国近代城市与城市中新建筑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论述近代城市发展脉络的同时论述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并提出了作者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方案。1994至1995年,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之约,撰《石库门里弄民居》一书,再次梳理历年研究工作的成果,选择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一个局部作深入的纵向剖析,从特定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在新的起点上对中国主要近代城市作了较全面的实地考察与较深入的研究。其中重点城市曾反复多次实地考察,考察范围包括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北京、南京,及中国近代边缘城市济南、烟台、厦门、成都、重庆、宜昌、沈阳、开封、长沙、杭州等。同时,不断收集、查阅、研究作者所能找到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筛选出与研究课题密切相关

的基本史料。作者也认识到,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或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重点是在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中国近代建筑史而言,上海就是半个中国,只有在深入研究近代上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开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所以自1980年以来,作者每隔四五年就要到上海对上海近代城市作扫描式的实地考察,调查正在逐渐消失的近代城市形态与不断减少的近代建筑;与上海的普通市民接触,了解普通百姓心目中的近代上海;并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查阅、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史料中的近代上海。同时,持续关注与学习跨学科的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课题的新成果,从文化视角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正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撰写这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20世纪80年代,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其与我们习见的编年体史书完全不同的编撰体例——由研究清史某专题的学者执笔分撰有关章节,前后各章衔接而成完璧——使作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多位学者合作撰史的极佳模式。而我们的老祖宗太史公司马迁撰《史记》,开创纪传体撰史模式,这早已成为后来中国史家撰史的范例。写历史,重要的是表达作者对历史的认识,编撰体例因史而异,因人而异,并无一定之规。明白了这一层道理,这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就自创体例,不求面面俱到,只写作者熟悉的、曾经下过功夫研究的课题,只在浩繁的历史进程中重点论述若干个关键性的节点,提纲挈领地写出这部历史的主流发展脉络。论述不到之处虽在所难免,已无伤大局。如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之一的民间传播渠道,涉及的范围很广,同样重要的其他建筑类型如广东、福建的侨乡建筑也是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作者研究范畴所限,就仅以石库门里弄民居为例论述之;又如书中并没有论及台湾、香港及1840年以后的澳门建筑,都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

本书在作者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础上,从建筑文化的视角切入,研究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但涉及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史实与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观念是相同的,这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基础上撰写的这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与“中国近代边缘城市”的基本概念,及以城市为研究单元,在论述近代城市发展脉络的同时论述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的学术思路;论证了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教会传教渠道、早期通商渠道与民间传播渠道;概述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中主要由来华的西方建筑师组成的建筑师群体的概况,与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队伍的形成及其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整体贡献与正确定位;论述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最后一章全面地回顾与评价了建筑师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探索的全过程。

文化学上有一个概念谓之“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现象,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时,因其所依存的社会、人文、历史、地理等诸方面条件的差异,两种文化都不能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从而出现主客体文化相互接受对方的文化特质,使两种文化逐渐接近的趋势,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涵化。主体文化在与客体文化接触、继而涵化的过程中,融会客体文化特质,更新自身文化传统,使主体文化在维持其基本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这是文化涵化的进步意义。完整的文化涵化过程应当包括文化传播、文化融合与文化更新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虽然互有联系,互相叠合,不能截然分开,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按这一先后顺序相继发生的。文化涵化的过程包括文化交融过程中被动的自然演变过程,也包括主客体文化自觉的、有目的的主动选择、融会与创

新的过程,而这也是互有联系,互相叠合,不能截然分开的。

本书论述的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正是这样一部建筑文化涵化的历史。从早期西方建筑文化在商埠城市租界区中的大量克隆开始,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逐渐进入文化涵化的第一阶段:西方近代建筑文化在中国克隆与传播的阶段,西方近代建筑文化的影响从商埠城市的租界区波及华界区,从商埠城市波及传统城市,从沿海城市波及内地城市,从中国近代主流城市波及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影响所及,甚至波及边远的城镇乡村。这一建筑文化涵化的初始过程,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始期(1840~1900)进展较为缓慢,影响范围有限;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1900~1937)进展速度加快,影响范围也大大扩展,遍及中国的许多城市,甚至一些城镇乡村。1900年以后,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从初始期无意识地被动接受阶段逐渐转入第二阶段,即主体建筑文化有意识地主动融会客体建筑文化的阶段。而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建筑文化重构与再生的文化创新阶段,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1840~1949)刚刚起步,只是作了初步的尝试,这种状况也一直延续到今天。立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人文、历史、地理条件,继承中华建筑文化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融会中西建筑文化特质,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中华建筑文化的历程是漫长的,还需要许多代人不懈的努力。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研究工作,正是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而进行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一。

书稿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童鹤龄教授、聂兰生教授。感谢合作撰写《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一书的各位学者,两年时间的愉快合作使作者受益匪浅。还应当感谢的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科技进步,各地区、各城市、各学科学者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成果使作者视野开阔、多方受益。在这方面,上海的学者,尤其是同济大学的学者群体若干年来的研究工作硕果累累,作者从中受益甚多。

2002年1月,作者从天津大学调至浙江大学,开始了新的工作历程。本书完稿之时,谨借这一小小的成果表达对母校多年培育的感激之情。最后,特别要感谢浙江大学提供的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使作者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这项艰辛的工作。

杨秉德 2002年9月6日于浙江大学